

目 录

前 言	(1)
回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	格·马·克尔日札诺夫斯基 (5)
在狱中和流放地	(17)
《火星报》时期	(23)
第一次革命	(27)
我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第一次会见	
.....	玛·彼·哥卢别娃 (32)
往事漫忆	伊·瓦·巴布什金 (37)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彼得堡	瓦·安·舍尔古诺夫 (39)
尼古拉·彼得罗维奇	弗·亚·克尼亚泽夫 (43)
在“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的日子里	米·亚·西尔文 (50)
弗·伊·列宁和 1893—1895 年间的第一个莫斯科	
马克思主义组织	谢·伊·米茨凯维奇 (61)
弗·伊·乌里杨诺夫的文章《什么是“人民之友”	
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是怎样印	
出来的?	阿·亚·甘申 (72)
1898—1899 年间弗·伊·列宁就哲学问题写给我	
的几封信	弗·威·林格尼克 (75)
在两个世纪交接的时期	潘·尼·勒柏辛斯基 (77)
关于伊里奇	罗·萨·捷姆利亚奇卡 (94)
弗·伊·列宁在伦敦(1902—1903年)	
.....	尼·亚·阿列克谢也夫 (100)

回忆列宁(片断)	尼·列·美舍利亚科夫	(107)
革命历史片断	策·萨·博勃罗夫斯卡娅(捷利克桑)	(117)
同列宁的会见	玛·莫·埃森	(125)
论列宁(1924年1月28日在克里姆林军校学员 晚会上的演说)	约·维·斯大林	(152)
山鹰		(152)
谦逊		(153)
逻辑力量		(154)
不灰心		(155)
不骄傲		(155)
原则性		(156)
相信群众		(158)
革命天才		(158)
侨居时期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会见记事	阿·瓦·卢那察尔斯基	(161)
同弗·伊·列宁在日内瓦和巴黎的会见	莉·亚·福齐也娃	(166)
列宁做编辑工作	维·阿·卡尔宾斯基	(190)
十八年来	弗·维·阿多拉茨基	(204)
一		(204)
二		(208)
三		(212)
四		(214)
五		(216)
在第一次革命的烈火中	米·伊·瓦西里也夫-尤任	(220)
在日内瓦的生活。与列宁同志相识		(220)
“波将金”号装甲舰上的起义。我返回俄国		(227)
列宁在1905年(回忆片断)	阿·瓦·卢那察尔斯基	(236)

同列宁的几次会见	米·格·茨哈卡雅	(247)
导师和朋友	叶·德·斯塔索娃	(252)
列宁同志	米·斯·奥里明斯基	(265)
列宁和高尔基	玛·费·安德烈也娃	(271)
我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第一次会见		
.....	克·叶·伏罗希洛夫	(278)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党的武装工作的领导(我党军事		
组织和武装组织史实片断).....	叶·米·雅罗斯拉夫斯基	(283)
弗·伊·列宁	阿·马·高尔基	(286)
难忘的形象	尼·亚·谢马什柯	(333)
在捷里奥基和巴黎	塔·费·柳德文斯卡娅	(347)
弗·伊·列宁在巴黎	绥·伊·霍普纳尔	(359)
在布拉格代表会议上	尼·亚·谢马什柯	(372)
永远同我们在一起	叶·彼·奥努弗里也夫	(375)
弗·伊·列宁在克拉科夫和波罗宁	谢·尤·巴哥茨基	(380)
列宁在帝国主义大战前夕	雅·斯·加涅茨基	(407)
列宁与国家杜马布尔什维克党团	阿·叶·巴达也夫	(414)
我们的英明领袖	格·伊·彼得罗夫斯基	(419)
在1914年	费·尼·萨莫伊洛夫	(425)
往事片断	维·阿·卡尔宾斯基	(430)
弗·伊·列宁在布尔什维克苏黎世支部		
(1913—1917年3月).....	拉·波·哈利东诺娃	(436)
《帝国主义论》是怎样产生的	米·尼·波克罗夫斯基	(452)
从二月到十月	雅·斯·加涅茨基	(459)
回到祖国	米·格·茨哈卡雅	(471)
在白岛火车站的会见	亚·米·阿法纳西也夫	(475)

1917年4月弗·伊·列宁回到彼得格勒

- 费·尼·萨莫伊洛夫 (478)
- 难忘的日子 绥·伊·霍普纳尔 (483)
- 在奥布霍夫工厂 谢·雅·阿利路也夫 (490)
- 在普梯洛夫工厂工人中间 瓦·瓦·瓦西里也夫 (492)
- 在全俄农民代表第一次代表大会上 安·巴·库奇金 (494)
- 在1917年七月事变的日子 谢·雅·阿利路也夫 (499)
- 关于伊里奇(回忆片断) 叶·德·斯塔索娃 (503)
- 在最后一次地下活动中 尼·亚·叶梅利扬诺夫 (505)
- 伊里奇在七月事变的日子 格·康·奥尔忠尼启泽 (514)
- 列宁在地下活动时期(1917年7—10月)
- 亚·瓦·绍特曼 (519)
- 第二百九十三号机车的“司炉” 胡·埃·雅拉瓦 (531)
- 回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 埃·阿·拉希亚 (533)
- 列宁隐藏在赫尔辛福斯“警察局长”家的经过
- 古·谢·罗维奥 (540)
- 伊里奇在1917年十月革命前夕 玛·瓦·福法诺娃 (550)
- 弗·伊·列宁在1917年(回忆片断)
- 尼·伊·波德沃依斯基 (555)
- 列宁给党中央的一封信 叶·德·斯塔索娃 (561)
- 列宁在斯莫尔尼宫 亚·米·柯伦泰 (563)
- 列宁在十月的日子里(回忆片断) 安·谢·布勃诺夫 (567)
- 守卫在列宁身旁的斯莫尔尼宫赤卫队战士
- 伊·费·叶烈梅也夫 (571)
- 斯莫尔尼宫的不平凡之夜 阿·瓦·卢那察尔斯基 (575)
- 作者小传 (578)
- 译后记 (600)

前 言

本书是五卷本《回忆列宁》的第二卷，收入叙述 1891 年起到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为止这段时期的回忆文章。

这些回忆文章的作者，有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亲密战友、我们党老一辈的活动家，他们在漫长的岁月中曾幸运地在他的直接领导下进行革命斗争；也有那些时常同列宁见面或者在各种会议上听过他演说的工人。这些文章塑造了列宁这样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为人民服务而献身的炽热的革命家、苏联共产党和工人阶级以及千百万劳动群众在他们反对专制制度和资本主义的斗争中的英明领袖的形象，记述了列宁生活中的各个阶段和他多方面的活动中的不同侧面。

本卷是以老布尔什维克、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朋友格·马·克尔日札诺夫斯基的回忆文章开头的。这篇文章说明了列宁在俄国马克思主义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关于列宁在萨马拉的活动，在彼得堡的活动，关于他为捍卫革命马克思主义的斗争，为使科学社会主义同工人运动相结合的斗争，以及建立俄国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斗争，在玛·彼·哥卢别娃、伊·瓦·巴布什金、瓦·安·舍尔古诺夫和米·亚·西尔文的回忆文章中也有阐述。

本卷载有《火星报》代办员策·萨·博勃罗夫斯卡娅（捷利克桑）、罗·萨·捷姆利亚奇卡、尼·列·美舍利亚科夫、玛·莫·埃森和莉·亚·福齐也娃的回忆文章。这些文章描绘了列宁领导

《火星报》和俄国火星报组织的活动，他在第二次党代表大会上同机会主义者的斗争，以及为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斗争，描绘了他对日益发展的革命准备工作的领导。

弗·伊·列宁身在国外，但仍然密切注意俄国国内革命运动的发展。他同党的各个委员会保持着紧密的联系，领导它们的工作，制订布尔什维克在革命中的战略和策略。关于这方面的活动情况，在米·伊·瓦西里也夫-尤任、叶·德·斯塔索娃、克·叶·伏罗希洛夫、阿·瓦·卢那察尔斯基和叶·米·雅罗斯拉夫斯基的回忆文章中都谈到了。他们的文章描绘了列宁在1905—1907年革命中作为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的鼓舞者、组织者和领袖的形象。

革命的失败招致黑帮反动势力的猖狂反扑，引起革命的暂时同路人的变节和背叛，以及一批不坚定分子的脱党。弗·伊·列宁坚信新的革命必将到来，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为了捍卫党，为了聚集和团结真正的革命力量，他对孟什维克取消派、召回派和其他机会主义者进行了无情的斗争。他的这些活动，在阿·马·高尔基、绥·伊·霍普纳尔和塔·费·柳德文斯卡娅的回忆文章中都有记述。列宁为召集和举行具有党代表大会作用的布拉格代表会议而进行的活动，他对《真理报》和第四届国家杜马中布尔什维克党团的领导，在尼·亚·谢马什柯、叶·彼·奥努弗里也夫、谢·尤·巴哥茨基、阿·叶·巴达也夫和格·伊·彼得罗夫斯基的回忆文章中得到了反映。

1914—1918年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爆发后，这一斗争仍然没有停止。老布尔什维克雅·斯·加涅茨基、维·阿·卡尔宾斯基、费·尼·萨莫伊洛夫、米·尼·波克罗夫斯基所写的回忆文章，说明了列宁在制订党对战争态度的策略，在恢复被战争中断的同俄国国内党组织的联系和对党组织的工作的领导，以及在出版党的中央

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等方面所进行的巨大工作。这些回忆文章刻划了列宁作为真正的革命的国际主义者，作为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反对出卖工人阶级利益的叛徒——社会沙文主义者和中派分子的不妥协的战士，作为国际革命工人运动的领袖的形象。

俄国的二月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为革命运动的新阶段打下了基础。关于弗·伊·列宁结束国外侨居生活回到俄国和在彼得格勒受到欢迎的激动人心的场面，关于列宁的四月提纲的意义，关于他所领导的党为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而进行的斗争，以及他在七月事变后处于地下时期的活动，在费·尼·萨莫伊洛夫、绥·伊·霍普纳尔、尼·亚·叶梅利扬诺夫、谢·雅·阿利路也夫、玛·瓦·福法诺娃和其他人的回忆文章中记载下来了。十月武装起义的参加者：安·谢·布勃诺夫、格·康·奥尔忠尼启泽、约·维·斯大林、尼·伊·波德沃依斯基、叶·德·斯塔索娃、阿·瓦·卢那察尔斯基、亚·瓦·绍特曼和埃·阿·拉希亚所写的回忆文章，是非常引人入胜的。这些文章内容鲜明生动，描绘了党和人民的鼓舞者、组织者和无所畏惧的领袖列宁的形象，描绘了领导工人赤卫队和陆海军士兵为推翻俄国的地主资本家政权、建立世界上第一个苏维埃社会主义工农国家而进行忘我斗争的天才革命统帅列宁的形象。

在回忆文章中反映了弗·伊·列宁的生活、工作和撰写确定革命斗争道路的理论著作的环境。这些回忆也指出了列宁所具有的那些特点，这就是：精通马克思主义理论，创造性地运用并发展这一理论，建立在了解社会发展客观规律基础上的乐观主义，对工人阶级的力量、对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的坚定信念。

这些回忆文章刻划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形象，在他的身上，集中地体现了高度的原则性，异常的勤劳、谦逊、纯朴，对同志、对劳动人民的亲切关怀等等优秀的品质。

* * *

收入本卷的大部分回忆文章，是按作者生前最后发表的文本，或是按经作者重新审订和修改的文本刊印的。其中某些材料在刊印时略有删节。这些文章按照年代先后顺序排列，使读者能完整地、连贯地研究弗·伊·列宁的生活和活动。全部文章都同有关资料作过仔细的核对。对正文的必要说明由编者加了脚注。卷末附有回忆文章作者的小传。

回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

格·马·克尔日札诺夫斯基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世时，对我们所有这些有幸跟他接近的人来说，最为津津乐道的话题，恐怕就是谈论他了。因为我们这些同他一起生活、一起工作过的人，当然应该比别人更早地从他身上了解并感觉到，同我们一起工作的是个什么样的人。但这个人所特有的伟大的谦逊，却不允许我们在当时谈论他。

现在，当大家都清楚地知道，他同最广泛的人民群众有着多么牢固的联系；当全世界都在谈论他的时候，我们却感到难于谈论他。这完全出于另外的原因，因为我们怎么也不能想象，他已经永远离开了我们。

当然，现在许许多多的人都清楚地知道，我们失去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这样一位对千百万劳动群众非常亲近的人，失去了一个具有非凡的杰出天赋而且经历过一条历史性道路的人。这条历史性道路的伟大意义是不容争辩的，正如我国至今无人与他媲美这个事实一样是不容争辩的。

然而，要探究这个人的天才的秘密，揭示他的个性的基本特征，从而真实地说明使他能远远超过我们的那些特点，却并不那么容易。

在人类的历史上不时出现一些人，他们象一根根火柱，给别人照亮生活的道路。我们把这样的人叫做天才。但当我们试图为这

些人的天才作出解释时，却往往显得无能为力。我们不妨回想一下，人们究竟是怎样说明一个有天才的人的。

比如说，有这样一个定义：天才，这是各种优秀品质在人的个性中的异常成功的积累。天才，这是量怎样变为质的明显的例证。喏，在我们面前的只是一个有优秀品质、有能力、有才干的人，只要在他身上加上并不很多的，但对这一各种品质的组合物特别重要的东西，于是，在我们面前的就不只是一个有才干的人，而是一个有天才的人了。但是，说得这样笼统，等于什么也没有说。你们从中得不到对天才秘密的任何解释。

还有这样一个定义：天才，这是一种特殊的劳动能力，这几乎总是巨大而集中的劳动能量所创造的成果。但是我们立即就会想到，我们知道不少劳动相当出色的人，然而他们与天才却毫不相干。看来必须承认，提出这样的任务——给天才下一个一般的定义，是不正确的。只有结合某种特定的情况，才能提出这个任务，而且，对各种不同的人，我们将得出完全不同的答案。

如果这样提出任务的话，那就必须承认，要整个刻划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这样一位巨人，是特别困难的。但我并不准备完成这项任务，而只限于提供一些素材。这项任务是巨大而困难的：“大概，时代是会把一幅没有完成的肖像画完的。”初看起来，他并不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但请回忆一下，马克思曾经论述过，同资产阶级革命比较起来，无产阶级革命有些什么特点。无产阶级运动的实质本身，排除了这些革命的主要英雄人物——人民群众行动中的外表上的神奇色彩和供观赏的戏剧动作。如果这种说法是对的，那末，我们是不是有权利设想，在肩负无产阶级真正领袖的历史重任的那些人身上，会表现出一种可以说是特殊的纯朴呢？不管怎样，不存在外表上的供观赏的光华，这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突出的特点。

我们就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纯朴、谦逊的外表谈起吧。他个儿不高，戴着普通的便帽，很容易融合在任何一个工厂区里，不会惹人注目。令人喜爱的黝黑的脸庞，略带东方色调，这两句话就几乎可以把他的外貌全部概括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穿上粗呢外衣，也很容易同伏尔加河流域的任何一群农民融成一体。这是因为，在他的外貌中，就有一种象是直接来自人民底层并同他们血肉相连的东西。但是，只要瞧一下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眼睛，瞧一下他那双不寻常的、敏锐的、充满内在力量和坚强毅力的深褐色的眼睛，你就会开始感觉到，在你面前的决不是一个平常的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多数肖像都未能表达出他的那种特殊天分的印象，但只要你开始稍微谛视一下他的外貌，那种特殊天分的印象很快就取代了从他纯朴的外表中的得来的最初印象。正因为这样，一位著名的法国雕塑家，虽然未必能预见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以后的历史性活动，但却对他前额优美的轮廓惊讶不已，赞赏备至，所以一直在巴黎缠住他不放，再三表示要雕塑他的头像。用这位艺术家的话来说，他的头部具有一种特殊的、能体现精神面貌的美。他发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前额的轮廓，同古代伟大思想家苏格拉底的雕像极为神似。^①

然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精神面貌，却不是在他的外表上，而是在他同人们的交往过程中才更强有力地显示出来。我曾多次随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到那些原先没有机会认识他的人们中间去，每次都能事先料想到那种必然会出现的景象。这就是：不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出现在什么地方，不论他出现在什么样的人中间，只要他的到来是因为有必要发表重要讲话，那就可以预言，他将很快成为全场瞩目的中心。他从不大喊大叫，从不夸夸其

^① 关于这件事，阿·瓦·卢那察尔斯基在《侨居时期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会见记事》这篇回忆文章中，有比较详细的记述（见本卷第162—163页）。——编者注

谈,但他所要说的一切,是那么深刻有力,那么准确生动,这使大家都能看到,能够这样讲话的人,是具有特殊天分的。

当人们回忆列·尼·托尔斯泰的时候,有时会特别提到,托尔斯泰往往在必要的时候,就说起地道的英语和法语来,他善于使那些硬要把他引为知己的对手懂得,他同这类凡夫俗子是格格不入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虽然并不改用英语或法语说话,但他也有同样的才能,而且更为高出一筹。由于对自己真正的朋友,对他为之毫无保留地献出毕生精力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工作人员,他是忠诚的朋友和富有同情心的同志,因此,对一切庸俗习气和市侩作风,对一切同恶劣环境妥协的调和主义,不管是披上什么伪装的调和主义,他始终疾恶如仇,毫不容情。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场的时候,他不用花多大的气力,就能造成一种赤诚相见的特殊气氛,不知不觉习惯已经成了自然,只要他来到一个地方,那儿一切废话和空话都自然而然地显得不合时宜,更不用说那种庸俗无聊的话了。

他的外貌初看起来平淡无奇,但仅仅初看起来才是这样;而后来呢,这个人的外貌却具有极大的吸引力,闪耀着一种特殊的、能体现精神面貌的美。他的词汇朴实无华,但运用自如,一说话就显示出凝聚着他的智慧的非凡力量。当然,这不过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天才个性中的个别特征而已。他有很强的劳动能力,有多方面的才能(正因为这样,他在中学读书时连续几年都名列第一),还有用之不尽的体力,这些都是毫无疑问的。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传记资料中提到他体魄强壮,我们曾不止一次地读到这一点,甚至不免感到有点奇怪。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身材并不魁梧,这同通常的强壮这个概念似乎联系不起来。但事实却是:在他那并不高大然而结实的身體里,确实不仅显示出精神的活力,而且涌现出健康壮实、生理正常的人的生命力。我回忆起西伯利亚流

放时期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一次谈话，我把当时一位著名外科医生俾洛特对健康所下的定义讲给他听。这位医生说，健康表现为感情活动清楚明确。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这个定义非常满意。

“一点不错，”他说，“一个健康的人如果要想吃，那就是真的想吃；要想睡，也就是真的想睡，他不会去考虑睡的是软床还是硬床；如果他要恨，那同样也是真正地恨……”当时我瞧了瞧他红润的面颊和炯炯发光的深褐色的眼睛，心里想，你正是这种健康人的最好典型啊！

不过，人生的道路是短暂的。因此，当一个人还在青春年少的时候，就能了解自己的使命，确定自己远大的抱负，这是莫大的幸福。一般说来，一生中主要的成功，不正表现在这一点上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末，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这方面是十分成功的。他对我说过，在中学五年级时，他已经同宗教一刀两断：把十字架摘下来扔进了垃圾堆。我初次见到他时，他是一个才二十三岁的青年人，虽然还不很老练，但已经非常清楚地表现出是一个十分坚强的人，这个人注定以后要在全世界面前显示出自己完美的内心世界的无比力量。

在我的脑海中展现出上一世纪九十年代初彼得堡和彼得堡大学生革命小组的一幅幅图景。我想举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彼得堡初期活动的例子，来说明这个不寻常的青年人的抱负是什么。我觉得，他的杰出个性的那种特殊气质，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在当时显露出来了。而正是这种素质，使天分高明、生命力旺盛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杨诺夫成为天才的列宁。

我们把科学社会主义的学说看作是劳动者的最伟大、最重要的一门科学。这门科学为理解最重要的问题提供了钥匙，它指出应该怎样生活，应该怎样斗争，以改变和改造生活本身，使生活从

你反对我，我反对你的争斗变为和谐、快乐、亲如兄弟的制度。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给劳动者为实现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艰难过渡准备了强有力的斗争工具。然而，西欧的政治事件却是这样形成的：八十和九十年代成了阶级斗争战线上比较沉寂的年代。确实，恩格斯曾经说过，在这些进展缓慢的年代里，德国社会民主党养得红光满面，但最终的结果却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这样两位开创未来的巨匠所铸造的珍贵武器，通过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种种努力，竟被放在这一“合法反对派”的保险武库中储存起来了。

就在这个时候，在我国的北方平原上，出现了一个不平凡的人，他比任何人都更清楚地看到马克思的天才所铸造的武器的强大威力。他认识到，马克思主义者首先应当是一个革命家。他勇猛地冲进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这个备用武库，从墙上摘下盔甲，打开门窗，敲响警钟，把千百万劳动者召唤到自己身边，用马克思铸造的武器把他们武装起来，去同资本主义及其仆从作殊死的斗争。这个人就是弗·伊·乌里杨诺夫-列宁。

最好的政策是原则的政策。就这个意义来说，由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用马克思学说的指导原则出色地武装了自己，所以他成了一个卓越的政治家。

然而，一个优秀的政治家，还必须具有那种可以称之为现实感的特别的感觉。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以他在三次俄国革命时期活动的事例，清楚地向我们表明了这种深刻地概括和体察现实的光辉榜样。

1889年，我才十七岁，在思想上还十分幼稚。我来到彼得堡，进了彼得堡工艺学院学习。入学第二年，我参加了当时的大学生左翼团体。我记得，最初，我和我的那些新朋友们，都满怀某种模糊不清而又不可抑制的愿望，准备“破釜沉舟”，即同庸俗生活决

裂。我们这些从外省各地来到一起的人，本来是在这种庸俗生活的长期熏陶中成长的。各种思潮，通过不同的渠道传到我们中间，这样或那样把我们同革命英雄斗争的回忆连结起来。这些革命英雄恰恰是在这里，在这座城市里，光荣地经历了他们“豪迈而高尚”的道路。六十年代平民知识分子的最初的探索（这是我们从《同时代人》和《祖国纪事》杂志发黄的书页上读到的），萨尔蒂柯夫-谢德林的揭露现实的言论，米哈伊洛夫斯基政论中的爱好自由的浮词丽藻，拉甫罗夫的深奥难懂的说教，土地自由派和民意党人出版物中的一些小册子，还有从“劳动解放社”出版物中传来的惊人的钟声（它恰好与我们的青春时代同时出现），——这就是我们读过的作品的清单，按照这份书单排列的次序，我们经历了从认识模糊不清、具有爱民思想的人转变为十分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象丰碑一样矗立着，最后标志它的转折点的，是马克思的巨著《资本论》……

在钻研这部著作的时候，我们才第一次开始感觉到自己脚踏实地了。我们找到了批判地对待形形色色民粹主义的立足点，不管这种民粹主义涂上了什么样的革命色彩。在我们这个主要由工艺学院学生组成的小组里^①，很快就对马克思产生了一种特别的崇敬心情。

遇到新来的人，我们首先要了解他对马克思持什么态度。就拿我自己来说吧，我当时就坚决地认为，一个人如果没有研读过两三遍马克思的《资本论》，他就决不会有出息…… 遗憾的是，我们不仅对大学生提出了这个要求，而且对工人也提出了几乎同样的

^① 参加这个小组的有：斯·伊·拉德琴柯、格·波·克拉辛、阿·亚·瓦涅也夫、瓦·瓦·斯塔尔科夫、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彼·库·扎波罗热茨、亚·列·马尔琴科、米·亚·西尔文、米·康·纳兹万诺夫、季·巴·涅甫佐罗娃、索·巴·涅甫佐罗娃、阿·亚·雅库波娃及其他人。——格·克·注

要求。当时，我们已经尽力设法同一些工人保持经常的联系，并把他们编成了固定的宣传小组。当我回想到，那时我们怎样用《资本论》第一章中的“常礼服”或“粗麻布”去折磨我们的第一批来自工人阶级的朋友，我至今仍深深地感到内疚。我们的工人革命小组还有许多纯文化性质的工作要做，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这是由于当时的先进工人渴望满足巨大的精神需要所促成的。

1893年秋天，弗·伊·乌里杨诺夫来到我们这里。这件事，就其效果来说，可以比作一场使人精神振作的大雷雨。从那个时候起，我们开始了新的生活。那年秋天，我暑期下厂实习回来，发现我们整个小组处在一种前所未有的活跃气氛里，而这正是因为我们的新朋友，从伏尔加河畔来到我们这里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杨诺夫，在很短的时间里就成了我们组织里的核心人物。他是亚历山大·伊里奇·乌里杨诺夫（1887年被处死的最后几个光荣的民意党人中的一个）的胞弟，这一点就为我们友爱地接待他创造了最良好的前提…… 回顾过去，想起当时二十三岁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他身上那种心灵纯洁、热情洋溢的特点，我至今还记忆犹新。这种热情是同他随时准备建立功勋和作出彻底自我牺牲的精神完全吻合的。也许这直接来自他的家庭悲剧，来自他哥哥的英雄形象，这一切使他同过去英勇的革命斗争传统的联系与我们有所不同。然而，他那种掌握马克思的武器的惊人本领，根据第一手统计资料了解国内经济状况的非凡才能，则更使我们这些书生气十足的马克思主义者钦佩不已。

我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第一次会见是在季·巴·涅甫佐罗娃的寓所里，当时他给我们小组作了《论市场》的报告。在这个报告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向我们展示了大量丰富的统计资料，这使我看到马克思主义对认识本国的经济提供了威力如此强大的武器，感到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但我们小组的某些成员，对如此

独特、具体地论证为发展中的资本主义建立市场这样的理论问题，却感到难以接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运用俄国经济发展的材料，驳倒了他们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种种含混不清、牵强附会的论点。^①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前额宽阔，学识渊博，从而使他得了个“老头”的外号。这个外号同他年轻好动的性格和他身上焕发出来的青春活力恰恰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然而，这个青年人具有运用自如的深湛的知识，善于有分析地、恰如其分地处理重大问题和对待各式人物，他在与工人接触时善于把自己放在适当的位置，正如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克鲁普斯卡娅正确地指出的，他不是以盛气凌人的老师身分，而首先是以朋友和同志的身分去对待工人，^②这一切使我们起的那个外号在他身上生了根。在同这个与众不同的“老头”相识几个月之后，我已经开始发觉，有这个人在这场，在同他亲切交谈时，就会感到生活特别充实。他一走，生活就不知怎么地一下子失掉了光彩，思想也就随之飞走了……

同我们搞熟之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便立即着手使我们的秩序革命化。他首先要求的是，从对一些由优秀工人组成的人数不多的小组进行的“深奥的”讲课，过渡到对彼得堡广泛的无产阶级群众扩大影响，也就是从宣传过渡到鼓动。为此目的，他把彼得堡所有的马克思主义工人小组组成了统一的“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

从1894年冬天开始，彼得堡的警察密探机构就不得不在更大

^① 弗·伊·列宁所作《论市场》的报告中的材料，为他的《论所谓市场问题》（见《列宁全集》第1卷第59—105页）一文提供了基础。——编者注

^② 指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在1924年1月26日全苏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举行的追悼会上的讲话（见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忆列宁。文章和演说集》1965年俄文版第19页）。——编者注

的范围同“令人头痛的”“秘密传单”打交道了。这些传单尽管是用极简单的胶印机印成的，但它们正是从这个时候起，十分引人注目地在彼得堡的主要工厂里传播开来。在这些以我们同工人的谈话为基础起草的传单里，我们尽量从日常的需要出发，从某个工厂的特定具体情况出发，尽快地转到政治性的口号上去。沙皇政府在工人争取纯经济福利的斗争道路上设置了重重障碍，政治口号正是针对这种情况提出来的。飞行集会，定期举行的五一集会，以及建立常设的写作机构，这些都是在实现鼓动口号所提出的任务时自然而然地会出现的事物。我们当然知道，即使在进行宣传活动的较小范围内同工人建立的那种联系，也不可避免地会因我们这个发起小组遭受巨大损失而告中断，因为我们同老奸巨猾的警察机构（当时“官方的”彼得堡就是这一机构的化身）所进行的是一场力量悬殊的战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提出了进行鼓动的倡议，推动我们过渡到同工人群众建立更广泛的联系，在这方面当然会招致更大的危险，因而可以预言，逮捕和监狱就象命中注定一样会降临到我们头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责备我们在私人交往中常犯知识分子那种自由散漫的毛病，他是完全有道理的。我们这些人常常你来我往，并不是有正经事要办，而只不过是“开怀畅谈”一番，这显然是错误的，而且，我们当时的保密方法也极为幼稚。

1895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得了严重的肺炎，他不得不到国外去休养一段时间。然而这次出国的主要任务，则是与“劳动解放社”建立直接的联系。你们很容易想象这次出国对我们有多么重大的意义，我们又是多么急切地等待着他的归来。盼望着的一天终于来到了。我们的“老头”，这个象水银一般不停地活动着的人，又回到我们中间来了。^①他向我们生动地讲述了他怎样同普列

^① 弗·伊·列宁于1895年4月25日（5月7日）离开彼得堡出国，同年9月7日（19日）返回彼得堡。——编者注

汉诺夫、阿克雪里罗得和查苏利奇相识，他们给他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然而他对几次同巴黎无产阶级会见的描述，却更为强烈地印在我的脑海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谈到，法国的工人宣传员总的说来文化水平高，接受能力强，待人亲切热忱，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话来说，这样的工人宣传员，正是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最自然地希望能物色到的人才。普列汉诺夫有一封给司徒卢威的信（我们是后来才知道这封信的），正是与这一时期，与列宁的这次出国有关的。这封信谈到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给“劳动解放社”留下的印象。普列汉诺夫在信里写道，在他多年侨居国外的时期里，有许多从俄国来的人到他那里去过，可是，他还没有对任何人象对年轻的乌里杨诺夫那样寄托过这么大的希望。我还记得，他在这封信里提到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惊人的学识、完备的革命世界观和用之不尽的精力。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这次出国决不是不切实际的。从那时起，我们同“劳动解放社”建立了直接的联系。不用说，我们借助于这种联系，立即着手扩大自己在俄国的熟人的圈子。在此期间，我们同马尔托夫、利亚霍夫斯基医生，以及同下新城、莫斯科、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维尔诺和几个伏尔加河流域城市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小组的关系密切起来了。使我们感到非常高兴的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还从国外带来了一件礼物：他成功地利用箱子的夹底把一部当时刚开始使用的油印机运过了国境线。^①这部油印机后来在教育彼得堡无产阶级的事业方面起了不小作用。

作为一个著作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当时已经写了不少著作，他用细小工整的字迹，在短时期内写满了几个厚厚的本子，这些著作特别使当时民粹派的那些可怜的“英雄们”显得狼狈不堪。

^① 关于这件事，请参看米·亚·西尔文的回忆文章（本卷第58页）。——编者注

与此同时，外界对我们的鼓动性传单的需要量很大，加上我们同“劳动解放社”建立写作方面协作的可能性也得到了保证。这样一来，我们自然就想到了要出版一份专门的工人报纸。《工人事业报》创刊号是经过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仔细校订的、四分之三篇幅是由他亲自编写的；但令人遗憾的是，这号报纸没有送到印刷所，却直接落到宪兵手中了。^①然而这号报纸已为社会民主主义运动整整十年的工作制订了完全正确的路线。我们运用彼得堡各工厂送来的报道上的具体材料，尽力把彼得堡无产阶级的自觉性提到这样的高度，使大家都能清楚地看到建立革命工人政党的必要性，我至今还觉得，在这方面我们是干得相当出色的。据我所知，这一号《工人事业报》的材料，跟当时在彼得堡革命团体中传阅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其他手稿一样，大部分都没有保存下来。不过，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那本题为《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的小册子^②，幸而还留下了四分之三。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这篇专论观点鲜明，分析有力，高瞻远瞩，洞察未来，是一部真正了不起的作品，直到现在读起来，它仍然给人以新鲜的感觉，而这篇文章可是六十年前写的啊！工人阶级在俄国和俄国革命前途中的作用，工人阶级同农民的联系，政治斗争的畅通无阻的道路和对俄国共产主义革命胜利结果的预见，我国革命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前途的必然联系，这一切，在这本小

① 列宁为《工人事业报》创刊号写了下列文章：《告俄国工人》（社论）、《我们的大臣们在想些什么？》、《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95年雅罗斯拉夫里的罢工》。1895年12月8日（20日），在“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一个小组的会议上，对这份准备付印的《工人事业报》创刊号进行了讨论。但这号报纸没有问世。因为在12月8日（20日）夜晚到9日（21日）凌晨阿·亚·瓦涅也夫被捕时，放在他寓所里的全部稿件，都被警察局没收销毁了，后来只找到《我们的大臣们在想些什么？》一文的抄件（见《列宁全集》第2卷第65—68页）。——编者注

② 见《列宁全集》第1卷第109—309页。——编者注

册子里都有鲜明生动的阐述。然而，这本小册子还显示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另一个强有力的方面——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位具有强大威力的雄辩家，他正在愤怒地驳斥所有那些对唤醒无产阶级独立革命思想进行阻挠的人，驳斥那些对无产阶级正确理解其伟大历史作用进行这样或那样歪曲的人。

我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彼得堡交往的最初阶段，从我思想上反映出来，他就是这样的人。我们看到，他很早就了解到自己的使命，确定了行动的路线，坚定不移地沿着这条路线前进，这使他成为劳动群众的伟大的朋友和领袖。他善于把自己全部惊人的工作能力，把自己炽热心灵的全部精力汇集起来，为一个压倒一切的目标服务，这就是：组织和动员革命的无产阶级群众，有效地发动他们去迅速改变生活的基础，改变社会生产过程中人与人的关系。

在狱中和流放地^①

1895年冬末，乌云显然在我们头上密布起来了。最为不妙的是，密探常常采用难以捉摸的方式进行监视。你从家里出来，遵照一切保密规定，尽力消灭痕迹，而突然在身后相隔一大段路的地方，却出乎意外地看到明明有个密探在钉梢，就象是从地底下冒出来似的。要是在以后发现这类朕兆，我们当然会用巧妙得多的办法来对付，如更换身份证啦，调换活动地区啦。但在那个时候，我们还是缺乏经验的新手，加上年轻气盛，爱采取大胆的行动作直接的、正面的攻击，而不乐意“头脑冷静地”考虑一些退让的做法。但不管怎样，在1895年12月8日（20日）深夜，我们终于落到什帕

^① 小标题是根据1933年的版本加的，下同。——编者注

列尔街被称作彼得堡“拘留所”的一幢不同于一般的房子里了。我们得在这幢房子里度过整整十四个月的光阴。从积极的革命活动转到单独监禁那种折磨人的生活制度，还忧心忡忡地惦记着亲密伙伴们遭受的厄运，面对着不久将来那种绝非乐观的前景，这当然是很不轻松的。

这次监禁永远毁掉了我们中间的两个同志：阿·瓦涅也夫得了严重的肺结核，不久就离开了人世；彼·扎波罗热茨则得了无法医治的迫害狂。对我个人和大多数的同志来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友谊是异常宝贵的强身救命的良药。尽管当时“拘留所”的制度极为严格，我们仍然成功地利用监狱图书馆，并通过探监的人穿针引线，互相建立了密切的联系……

关于我们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狱中频繁通信的内容，我现在已经回忆不起来了，但有一点是记得很清楚的：收到他的信，读完以后，等于服了一种特别有效的强身提神的饮料，这就是说，精神立刻就振作起来了。这个人拥有巨大的精神财富，善于用适当的方式从必要的方面去影响缺少这种财富的其他人的情绪。单是这些品质，就使他在任何情况下，特别是在监狱里，成为一个无法代替的人。

拘留所牢房里的小窗开得很高，必须踮起脚来才能通过窗户的铁栅看到监狱的院子，因此要这样做是不太容易的，特别是看守人几乎一刻不停地从上了锁的沉重的牢房门上的小圆洞监视着，不让犯人做这种动作。但是，当我根据观察推算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要到围着栅栏的院子里（从我的牢房的窗口可以看到这块地方）来放风了，在这个时候，任何邪恶的力量都不能制止我踮起脚去看。他也同样相信，有时候，这种远距离会面的可能性是不小的，于是我们立即按照监狱中使用的密码打着手势交谈起来。直到现在我的脑海里还能浮现出他那亲切的面容，急促发出的信号，

以及不由自主地向那个脸色阴沉，在放风的人群中间来回走动的岗哨一瞥的神色。有一回，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带着特别愉快的紧张神情看着我，匆忙地发出密码：“霍霍尔^①就在你下面！”我趴在那令人厌恶的牢房的地板上，对着穿过我牢房地板的铁暖气管接头周围的孔隙，向我的邻居喊起话来……唉！这就是我们那个最有经验的秘密工作者斯·伊·拉德琴柯（现在也已去世了），他压低了嗓门回答我：“难道住在这里的是你吗？”真的，监狱当局这回确实是失算了：两个同案的人居然做了邻居，而没有按照惯例，在中间隔一个刑事犯的牢房，于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立刻就利用了这个机会。检察官和宪兵看来只好大吃一惊了，因为新近被捕的斯·伊·拉德琴柯的口供竟同我们的口供完全一致，而且他对我们案件的诉讼程序也了如指掌，而这一点只是因为我们侥幸成了邻居才能做到的。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同我们大家保持密切联系的同时，也并没有忘记自己对狱外应起的作用。在这段时间里，他写了许多传单和一本谈罢工的小册子，但遗憾的是，这本小册子由于“民意社”的拉赫塔印刷所被破获而没有问世。当时他已开始写《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这部巨著，直到流放时期才告完成，后来用弗·伊林的笔名发表。^②

在坐牢的这十四个月中，我没有在“拘留所”的任何一条长廊里碰到过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我们每个人出来放风或受审的时候，他们都要采取一整套防范措施，包括不停地用口哨声通知这幢房子其他几条横廊里的看守人，以防止我们有相遇的危险。但每当有人辘辘地拖着整筐整筐的书通过这些走廊时，我准能猜到，只有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一个人才能“吞”得下这些书。他有一种惊人

① 旧时指乌克兰人。——译者注

② 见《列宁全集》第3卷第1—558页。——编者注

的本领，会用难以置信的速度，甚至只要很快地把书翻阅一遍，就能切实地掌握它的内容，正象俗语所说的那样：野兽自己跑到猎人门口来了。常常有这样的情况：他当着你的面翻看一本厚厚的书，很快引出几段文字来，就能使作者的面目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而如果你拿起一本书，这本书是他读过的，他在空白的地方写满了批语，恰当地划出了重点，那末，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通过那些辛辣的、一针见血的感叹词“哼哼！”“哈哈！”等等所表露出来的批评，准会牢牢地把你吸引住。

至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狱中学习的榜样怎样感染我们，以及我们怎样共同把坐牢当作进一所特殊的高等学府学习，这些我就不多说了。不过，在流放期间，他在这面对我们整个小组起了更大的作用。

我们是第一批来到西伯利亚东部的社会民主主义者，老流放者都怀着一半好奇一半怀疑的心情观察着我们。在我们中间，有一个光彩夺目的新型战士的形象，那就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瓦·瓦·斯塔尔科夫和我被判处在米努辛斯克专区流放三年。我和斯塔尔科夫被指定住在捷辛斯克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则住在离我们一百多俄里的舒申斯克村。这并不妨碍我们互通信息，而写信写得最勤的人，那当然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了。我们大约每星期接到他两封信，从而我们能及时了解他所从事的工作，获悉他从广泛的通信联系中得来的消息。这种通信联系之所以能够保持，不仅因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来信总是实质性的，总是针对涉及的问题的实质，言简意赅地作出深思熟虑的答复；而且因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这方面向来一丝不苟而且严于律已：他能对收到的信件作出尖锐的、论战性的答复，但是，要他对向他提出的问题保持缄默或者甚至“搪塞”一番，那他是决不允许的。

我在流放时期收到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一大堆来信，由于以后备受折磨和不断遭到警察搜查的危险而散失殆尽，一想起来我就感到痛心。因为这些信件是说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流放期间锐意进行巨大准备工作的珍贵资料。我们也曾同他讨论过各种各样的问题，这是与他在那个时期写作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涉及的广泛题材有关的；讨论过我们所能收到的俄文和德文的各种新的书刊；还讨论过当时我们认为重要的一切时事问题。我认为，这些通信还能很好地说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一个特点，这是通过他善于直截了当地揭示各种问题实质的特殊本领表现出来的。正是这个特点决定了他的文笔异常朴实，甚至可以说是异常简洁。严格遵循涅克拉索夫“思路要开阔——文字要紧缩”这一忠告去做的著作家，除了他恐怕难以找到别的人了。

从报刊上发表的舒申斯克农民所写的回忆文章中可以看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流放期间那种刻苦自励和有规律的生活方式，给他们留下了多么深刻的印象。他学过法律，一贯刻苦钻研，善于解答各种问题并及时提供法律方面的意见，这使他很快就博得了与众不同的声誉。

好象是在流放的第一年吧，我找了一个借口，获准到舒申斯克村逗留几个星期。这次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一起生活的情况，我至今记忆犹新。那时他过的完全是单身汉的生活，工作日的每分每秒都经过精打细算，在大量的工作时间中有规律地穿插着最低限度的必要休息时间，安排得非常出色。早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通常精力特别充沛，毫不反对打打闹闹、活动活动，不知怎么搞的，我也曾多次同他角斗，直到我十分认真同他较量一番他才罢休。早晨玩过一阵之后，接下来就按计划进行学习。他拨出一定的时间进行写作，根据统计资料准备素材，研究哲学，阅读我国和西欧的经济学著作。照例还要读些小说作为休息。

我们当然要隔上很长一段时间才能收到报纸，而且一下子就收到一大堆。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却巧妙地想出了一个系统地读报的办法：他把报纸按收到时间的先后分配在每天阅读，但只读某一天的那几份报纸。这样一来，他就象每天都收到报纸似的，不过要晚得多就是了。当我要想打乱他那种读报的节奏，故意抽出一张新到的报纸读起新闻来的时候，他就会捂住耳朵，激烈地进行争辩，说他所采用的方法要好得多。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非常喜欢寒冷的新鲜空气，喜欢快速步行、滑冰、下棋和打猎。在新鲜空气中进行这种休息或是在棋盘上进行厮杀的时候，他显得是一个何等快乐、活泼和可亲的同志啊！

我们的流放生活就这样一个星期接着一个星期过去了。我们亲眼看到，这个不平凡的人，为了扩大知识面，使自己在这方面多多少少有所进步，一天也没有放松过学习。他的紧张的工作节拍，对我们起了很大的鼓舞和推动作用。在他的面前，每一个人都想使自己表现得更好一些，同时也更愿意同这个个性鲜明、朝气蓬勃的人接近。

我不打算在这里描绘那个时候米努辛斯克流放地的“时俗和风尚”。我只提出一点，就是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为首的我们这伙社会民主主义者终于成为引起流放者之间不和的因素。这个小小的世界一分为二，所有的工人群众都是站在我们这一边的。库斯柯娃女士在她的宣言书即那份著名的《信条》中力图证明，在无产阶级中间进行政治宣传是很不慎重的，说什么在目前这个阶段，无产阶级只能走经济斗争的道路，而一切政治性质的斗争，则只能让“贵族老爷”，也就是那些自由派的先生们和各类平民知识分子去进行。当这份宣言书传到我们米努辛斯克草原的时候，在流放者中间对它的态度是各不相同的。当时只有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一个人能够正确估量这种对无产阶级阶级觉悟加以歪曲的全部

危害性，因为这种歪曲是可能同尾巴主义和对残缺不全的俄国自由主义顶礼膜拜有联系的；也只有他能够看清这些似乎是实际拥护纯经济斗争的人多么缺乏远见。对《信条》作者的有力驳斥（后来它以西伯利亚东部十七个流放者署名的一封信的形式传遍整个俄国），完全出自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手笔。^①在这样的时刻，他总是保持警惕，总是横眉冷对这类敌人的。

流放期快要结束了。还在流放期满之前，我获准去西伯利亚铁路局工作。我还清楚地记得，在宽广的叶尼塞河边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最后一次散步的情景。这是一个寒冬的月夜，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西伯利亚一片冰封雪盖、辽阔无垠的大地。他雄心勃勃地跟我讲述了回到俄国后的计划和设想。创办铅印的党报，把它迁往国外出版，利用这张中央机关报来建党，这样，这个机关报将成为建造整个无产阶级革命组织大厦的特种脚手架，——这就是他的论据的要点。应该承认，开始我感到他过高地估计了这种党报的作用，而这只是因为，在漫长的流放生涯中，他身不由己，只好单一地把重点放在写作活动上。

实践证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确定要走的道路是完全正确的。

《火星报》时期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西伯利亚流放期满后就出国筹备出版《火星报》，这个时刻是我党历史上的转折点。大家知道，在《火星报》的报头上有一行题词：“行看星星之火，燃成熊熊之焰”。我们亲眼看到，这股火焰确实已经燃成十月革命的熊熊烈火，这熊熊烈

^① 指《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抗议书》（见《列宁全集》第4卷第146—158页）。——编者注

火又在整个被奴役的世界的上空点亮了红彤彤的曙光。如果现在翻阅一下刊登在旧《火星报》上的那些文章，那就可以深信，这份报纸的热情宣传，对唤醒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意志是起了巨大作用的。你会看到，在遵照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思想聚集在《火星报》旗帜下的卓越著作家的行列中，他那起着核心和主导作用的形象，他那朴实而明晰的见解，他那满怀义愤，英勇无畏，不断号召人们同无产阶级事业的敌人进行新的战斗的火一般的言词，是显得何等地突出啊！旧《火星报》将永远是值得学习的榜样，它告诉我们应该怎样办好党报，使党报既成为把人们召唤到自己身边和向人们发出危险警告的指路明灯，又成为有力地唤起人们的革命激情和鼓舞人们的行动决心的战斗号角。在《火星报》的旗帜下，革命力量开始在俄国逐步积聚起来，这股力量以后将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显示出列宁的策略和列宁的“行动中的马克思主义”的无坚不摧的威力。正是在这面旗帜下，形成了“布尔什维克钢铁队伍”的第一批分队。

我在这里不谈作为未来各委员会组织雏形的那些最早的《火星报》组织俄国分部，不谈同《南方工人报》的联盟，不谈第一个筹备召开党代表大会的组织委员会（组委会）的活动，也不谈萨马拉中心的工作。我只准备谈谈同我在基辅时期（1903—1905年）革命活动有关的那些往事。

我回想起1903年的第二次党代表大会和刚刚建立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队伍中的第一次分裂。这次代表大会把我选为第一届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因此，我同日内瓦中央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中央委员会的主要机构当时设在基辅，在最初阶段，我们在那里感到十分棘手。

中央委员会负有在全俄范围内安排工作的责任，要把散沙一般初次组成的各个委员会融合成一个整体，要对正在同敌人进行

斗争的同志们提供支持，因为那些同志们是在力量十分悬殊的条件下，同行将灭亡，但由于巨大的历史惯性而还显得强大的沙皇制度的祖巴托夫组织和奸猾的警察机构进行斗争的。

当时提出了种种伟大的争取解放的目标，千百万人民群众日益显著地自发参加运动，而职业革命家为数不多，经费短缺，不断地进行“整顿”又不断地遭到失败，这就是在全俄范围内最初建立党的机构时面临的形势。在建党初期的这场斗争中，定期出版的《火星报》所起的巨大作用，对我们来说是怎样估计都不会过分的。尽管我们遭到各种失败，但在警察势力鞭长莫及的地方，由普列汉诺夫、阿克雪里罗得、查苏利奇、列宁、马尔托夫和波特列索夫组成的“六人小组”却一直在工作着。只要想到这一点，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刻，我们也会获得力量。我们早已知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党报编辑部中起着最重要的决定性作用，但1903年党代表大会的最初结果，却正是在这个“六人小组”中发生了分裂，而且他竟处于完全孤立的地位。所以这个消息给我们带来多么沉重的印象，你们是完全可以想象得到的。

在这样的条件下在基辅主持工作使我感到非常困难，于是，我非法地搞到一张护照，就立即动身到国外去了。一来到日内瓦，我就置身在侨民纠纷的热锅中了。我同一些老朋友见面的时候，他们相互之间的仇恨之深竟达到了这样的程度，使我简直认不出他们来了。在这群动荡不安的人们中间，多数人的矛头是针对着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我记得特别清楚的是普列汉诺夫那蛊惑人心的申诉，他竭力说服我，为了《火星报》旧编辑部（他认为这是一支“无敌舰队”）的团结，即使作出比解释党员资格条文时的这种或那种让步大得多的牺牲，也是值得的。

不言而喻，在这些混乱的日子里，大部分时间我是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一起度过的。在这些手足无措的人们中间，只有他

却显得镇定自若。我清楚地看到，他有意尽可能少地对我“进行鼓动”，让我自己不持偏见地来弄清楚已经发生的分裂情况。当时我还没有同俄国国内革命形势产生的特有的实用主义一刀两断（关于国内的革命形势，我在上面已经讲到），所以这一回，命运对我残酷无情，让我扮演了一个极不讨好的和事佬的角色。为了使不久以前还是朋友的人们和解，我真是尽了最大的努力啊。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内心世界是完美无缺的，因此在实质上，他是一个非常谦逊和毫不妄自尊大的人。我还记得，有一次我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一直争辩到深夜。我知道，他认为俄国国内革命实践的需要是具有重大意义的，我就竭力使他相信和解的必要性，把分裂对革命实践的危害作用渲染了一番。“最后，”我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请你注意目前出现了什么样的局面。要知道，实际上是所有的人，确实是所有的人都在反对你！依我看，甚至在那些跟着你投票的为数不多的人里面，有的也主要是出于个人对你的忠诚才这样做的。因此，你是一个人在反对所有的人。”

我们知道，在这次日内瓦谈判期间，列宁、普列汉诺夫和马尔托夫之间曾订立过某种休战协定。我认为这三个人之间的个人团结是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而个人因素似乎是解决了。但是，由于我过高地估计了个人因素的作用以及在政治上缺乏远见，我不得不为此而受到严厉的惩罚！

时隔不久，我又回到了基辅，并竭力使基辅的朋友们相信，分裂的危险已经过去，我们的旧《火星报》仍然是一支“无敌舰队”。唉！在几个星期之后，我们在基辅也收到了国外寄来的许多信件，并附有必要的文件，证明双方已彻底破裂。战斗重新在全线爆发了，所不同的只有一点：双方都因为我采取了“泥潭派”做法而对我大肆攻击，这是我罪有应得，而后来的事件也清楚地表明，确实只

有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一个人才具有历史上的远见卓识。如果说，天才指的是能够预见到常人在事隔多年以后才能理解其本质的那些事件，那末，早已作出孟什维克背离革命这一判断的事实，就特别明显地表明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天才的历史洞察力。

布尔什维主义和孟什维主义代表着对事物客观本质的两种截然不同的认识。但只有通过事件的进一步发展，只有随着人民起义的街垒在俄国大地上发展壮大过程，这一点才十分清楚地显示出来。

第一次革命

1905年的事件发生时，我还在基辅。当时我通过私人关系在西南铁路管理局找到了一个工作。我利用这个机会积极参加了基辅的铁路大罢工。罢工后期，我担任罢工委员会主席。铁路当局对此大为不满，因为他们极不乐意看到一个持有大学毕业证书的工程师担任这一角色。我们依靠铁路员工这支宏大队伍，勇猛地展开进攻，很快就不仅在铁路沿线，而且在这个城市控制了局势。当局张惶失措了。但这并不说明我们已清楚地看到当时应走的道路。我们在内心越来越感到忐忑不安，因为我们不知道怎样使这一连串开不完的群众大会圆满收场。10月17日的宣言，就是在铁路员工和参加他们行列的基辅各革命组织的队伍开始显得惊慌失措的时刻发布的。就是说，被全俄罢工运动的巨浪所席卷的居民群众其实是急于求成的，只要能在他们原有很少的经济权利和政治权利上稍微增加一些东西就行了。不难理解，在这些人中间，要号召他们对宪法不抱任何幻想并积极准备同凶恶的敌人进行不可避免的武装斗争，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

基辅的十月庆祝活动，是以聚集在十字广场和市杜马大厦附

近的数千群众遭到枪杀和马队袭击而告终的。接踵而来的是大规模蹂躏犹太人的暴行；过了不久，又是对起义工兵进行更为残暴的血腥镇压。我只是因为到彼得堡去才免于被捕。当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住在彼得堡，也正是从那儿明确地对我们发出过警告，要我们首先必须随时准备战斗。

从备受蹂躏的基辅来到依然沉浸在“宪法自由”中的彼得堡，这个转变简直是惊人的。我在基辅已经养成了枪不离身的习惯，以随时防备黑帮分子袭击——黑帮分子的《基辅人报》几乎每天都在谴责我们这些铁路员工罢工领导者的叛国行为，这是不无原因的。而在这里，在彼得堡的大街上，却到处都是措词激烈的谴责性读物，报童们机灵地叫卖当时为数众多的报纸和幽默刊物，他们一边用一只脚跳舞，一边念着讽刺总理大臣的顺口溜：“维特把舞跳，维特蹦得高，维特唱小调……”

基辅惨遭蹂躏（当时的情景我至今依然历历在目），我的亲密的同志遭到逮捕，这一切当然不会使我怀着乐观心情来看待彼得堡的这一片升平景象。不是每一个人都能象鹰一样高高飞翔，超越于现实生活的惨痛失败之外。我被基辅事件弄得惘然不知所措，因此最怕对我们自己的力量和可能性作过高的估计。我记得，我曾因此而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发生过多次争论。但与此同时，这个时期他在彼得堡所发挥的巨大力量，却不能不使我感到惊讶和钦佩。可以说，这是他从地下活动跨向广阔历史舞台的第一次“尝试”，但所有有眼光的人都已清楚地看到，正是在这种广泛的公开活动的条件下，这个人将成为一个怎样的历史巨人。看来，那农民起义的火光，那威力强大的武装暴动的先声，那波涛汹涌的罢工浪潮，都在他一个人的身上找到了中心。这个中心能够英明地计算出它们的全部力量，不因遭受任何损失或因起义斗争中的风云变幻而显得惊慌失措，能够指引革命航船驶向能使革命受到最小

损失而获得最大成就的港湾。

尽管不是所有的人都普遍承认，尽管还有人将信将疑，但在很大一部分人的心目中，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当时已成为俄国无产阶级这艘革命航船的一致公认的船长了。“一天等于一年！”这是革命时期战士们为夺取伟大的革命成果所必须遵循的口号。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是坚定不移地按照这个口号去做的。他不仅自己充分利用在报刊上公开发表意见的每一个机会（他的文笔犀利明快，从不采用那些意义隐晦的词语），而且也正是他推动和组织了我们所有的党员作家，使他们在对人民群众进行广泛的真正革命教育的斗争中，不丧失宝贵的时间。当你现在翻阅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与第一次俄国革命时期有关的许多著作时，他那敏锐的目光，准确的打击，英明的预见，会使你钦佩不已。在人民群众奋起行动的革命意志觉醒起来的时候，人民的敌人非常喜欢戴上各种各样的假面具，他在揭穿敌人假面具方面所做的大量工作，也会使你赞叹不已。

我想起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帕宁伯爵夫民众文化馆里一次很大的群众集会上的讲话。^①全彼得堡闻名的演说家相继登上了讲坛。立宪民主党和劳动派的那些知名人士都发表了演说。可就在这个讲坛上，却出现了一个广大群众素不相识的讲演人。只有那高高隆起的前额的凸出线条和略微有些斜视的眼睛的熠熠光辉，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他不过讲了十来分钟话，但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个讲演人已经完全控制了会场，并以他特有的魅力吸引了听众，几千双眼睛都带着紧张的神情盯住他瞧……毫无疑问，站在我们面前的，是具有无比威力的人民的代言人。他以辩驳

^① 1906年5月9日(22日)伊·弗·列宁化名卡尔波夫在帕宁伯爵夫民众文化馆举行的群众大会上，就对国家杜马的态度问题发表了演说。大会通过了列宁提出的决议(见《列宁全集》第10卷第379页)。——编者注

不倒的逻辑向听众分析了他们亲眼目睹的事件，于是大家都清楚地看到，对这些事件不能作出别的解释，就象二加二等于四那样一清二楚。既然如此，所以，对那些不懂得这些事件的明显意义和看不到人民群众运动在这些事件中的决定性作用的人，历史将满怀义愤地作出判决。而那些有意竭力掩盖事件的真正意义，拚命歪曲劳动群众的自觉精神，用似乎已经取得和平安宁之类廉价的空话去麻痹劳动群众意志的人，则更将落得可耻的下场。那末，把不仅为了自身，而且也为了全体劳动者的事业而进行解放斗争的无产阶级所作出的巨大牺牲化为乌有的那些叛徒，究竟是些什么人呢？经过检验可以发现，在娓娓动听的漂亮词句的掩盖下，包括孟什维克在内的一切党派都在干这种叛卖的勾当，而只有布尔什维克才朝着明确的方向，坚定不移地去夺取真正的而不是虚假的革命成果。

这个讲演人的每一句话，都使人感觉到是经过深思熟虑和充满坚定信念的。这比任何措词造句的艺术和抑扬顿挫的技巧更具有吸引力。当他走下讲坛时，全场掌声雷动，接着转为欢呼。我们不由发现，就连那些刚才被他揭露的人，也一致参加了这鼓掌欢呼的行列。要知道，人民代言人的威力正在于此，他能够使听众折服，而不管他们的成份多么复杂。我们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是这样的人民代言人。不过，在这种众所瞩目的演说场合，为了使尽可能少的人知道弗·伊·乌里杨诺夫—列宁的名字，在保密方面是很费了一番功夫的。

莫斯科的十二月起义被镇压下去了。彼得堡悲切地沉默着。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脚下的土地一天比一天炽热起来。对第一次俄国革命杰出活动家的迫害也愈来愈明目张胆了。为了党的利益，当时决定尽快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出国。可是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真是花了不少的气力啊！作为船长，可以说，他确实

实是最后一个离开船的。当初，我们好不容易才说服他至少要搬到芬兰去住。^①

我还记得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一次谈话，这是在他临行前不久进行的。一天晚上，他到我的住所来，虽然已经劳累了一整天，但他还是那样精神饱满，生气勃勃……不用说，谈的是最近发生的事件。我向他证明，群众运动受到严重损失，将为某些游击式的进攻提供有害的依据，而整个这种局部的恐怖和各种各样的“剥夺”活动则标志着革命热情的衰退。与之相反，他却认为，组织第二次和第三次决定性革命进攻的机会是不难获得的，而这是群众运动新的高潮的保证。归根到底，完全正确的毕竟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他说，1905年播下的种子太有实际意义了，而且正是在这样的土壤层中播种下去的，认为这样的土壤不会开花结果，那就等于认为这个充满力量的巨大国家生命脉搏停止跳动。如果说，1905年的事件清楚地表明，为数不多的几个职业革命家怎样使几十万无产者和无产者的亲密伙伴行动起来，那末在下一次，在党的旗帜下组织起来的几万个人，将使千百万无产者和它的伙伴们行动起来，胜利将是毫无疑问的。

载于格·克尔日札诺夫斯基：《伟大的列宁》1956年莫斯科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版第16—44页

^① 弗·伊·列宁于1906年8月20日（9月2日）后离开彼得堡去芬兰，住在库沃卡拉地方的“瓦沙”别墅里，这个别墅当时是由布尔什维克加·达·莱特伊仁一家租下来的。——编者注

我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 第一次会见

玛·彼·哥卢别娃

我是1891年秋天在萨马拉认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杨诺夫的，那正是我被流放到那里受警察公开监视的时候。按照当时的习惯，我掌握了几个我可以视为同志的人的地址。在这些人当中有一个老民粹派尼古拉·斯切潘诺维奇·多尔哥夫。是他第一个告诉我乌里杨诺夫一家住在萨马拉。亚历山大·乌里杨诺夫我当然是知道的，但是多尔哥夫把乌里杨诺夫家所有的人都说得使我感到很亲切，并且特别指出弗拉基米尔·乌里杨诺夫是一个不寻常的民主主义者。我问他弗拉基米尔·乌里杨诺夫的民主主义表现在什么地方，他回答说：“在一切方面：在衣着方面，在态度方面，在谈吐方面，——总之一句话，在一切方面。”我还记得乌里杨诺夫家那朴素的陈设，宽敞的餐厅，餐厅里有一架钢琴和一张大餐桌，桌上铺着白桌布……然而即使是在这样朴素的环境里，弗拉基米尔·乌里杨诺夫也还是显得特别朴实。那时我看见他不是穿一件短衫就是穿一件斜领衬衫。在那一时期他经常穿的是一件花蓝布斜领衬衫，身上束一根腰带。

乌里杨诺夫一家人对我都非常热情，但是我听了多尔哥夫的话以后，当然首先想看看弗拉基米尔·乌里杨诺夫。说老实话，起初我甚至有点失望，因为他是个并不显眼的青年，看上去比他实际

的年龄要大些；虽然应当说，他那双眯缝着的、闪烁着特殊光芒的眼睛一下子就引起了我的注意。他几乎整个晚上没说话，只顾跟多尔哥夫下象棋。直到我要回家而玛丽亚·亚历山大罗夫娜又不放心让我一个人步行到城市的另一端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才自告奋勇要伴送我。

我清楚地记得我第一次跟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沿着萨马拉又脏又暗的街道一起走路的情景。我说第一次是因为后来我们常常这样一起走路：每次我晚间从乌里杨诺夫家回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总要伴送我，于是我同他就谈个没完，争个没完；不过争辩的多半是我。现在还是回过头来谈第一次一起走路的情景吧。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非常详细地问我是怎样和为什么来到萨马拉的，当他知道我是因雅各宾-布朗基派案件被流放，我是一个雅各宾派^①时，他对这个情况非常感兴趣，他似乎把我当成了一个研究对象。一般地说，当我回忆萨马拉时期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时，我总要得出这样的结论：他当时不仅研究马克思，他还利用一切机会，一切交往吸取以往革命运动的经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不仅把我送到家门口，还进到我屋里，在这第一个晚上我同他就辩论了很久。话题从雅各宾派转到车尔尼雪夫斯基，从车尔尼雪夫斯基又转到马克思。我记得，关于科学社会主义，我说了一些非常胡涂的话，但又不肯放弃自己的意见，于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平心静气、坚信不移地进一步阐述自己的观点，略带讽刺但决不使我难堪地驳倒了我，这就给我上了短短的，但是很好的一课。我们分手的时候态度很友好。我当然打过这样的主意，要使他相信雅各

^① 当时有一个彼·格·扎伊奇涅夫斯基小组，以雅各宾-布朗基派而出名，参加这个小组的有阿·伊·罗曼诺娃，尔·格·罗曼诺夫，弗·普·阿尔策布舍夫，阿·伊·奥尔洛夫，谢·伊·米茨凯维奇，玛·彼·哥卢别娃-雅斯涅娃，特罗叶彼尔斯托夫等人。——编者注

宾主义，刚试着这样做，马上就感到这是极端困难的事。不过我们的友好交往并未停止。每星期我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总要见两次面。在我到乌里杨诺夫家去的那些日子（这总是在星期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通常要送我回家；在星期三前后他又到我家来一次，带给我尼·一逊的书，有时还把他自己写的东西读给我听。我和他经常谈起“夺取政权”的问题，而且谈得很多，——因为这是我们雅各宾派极感兴趣的题目。根据我的记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夺取政权的可能性和愿望都没有提出过异议，他只是怎么也弄不明白——我们想依靠的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民”；他开始详细地解释说，人民不是一个单一的整体，人民是由一些代表各种不同利益的阶级组成的，等等。

我记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非凡的工作能力曾经使我大为惊讶。我通常是在傍晚到乌里杨诺夫家里去，同安娜·伊里尼奇娜和玛丽亚·亚历山大罗夫娜一起度过晚上的时间，我不大看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他总是在自己的房间里用功，只有在喝茶和吃晚饭的时候才走出来。我几乎没有进过他的房间，连他家里的人也很少到他的房间去；只记得十二三岁的小姑娘玛丽亚·伊里尼奇娜到他那里去得最多，因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常常把她带到自己的房间里去。尽管这样，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房间我还是记得很清楚：房间不大，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书桌和书，很多的书；使我感到奇怪的是，我看见在他的书桌上，除了马克思的著作以外，还放着一些统计资料，而且是地方自治机关出版的。星期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也在自己的房间里工作，直到吃午饭的时候才走出来；吃饭时同马·季·叶利札罗夫（安娜·伊里尼奇娜的丈夫）说几句话，向我打听打听新闻。午饭后通常总有人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坐下来下象棋；他试着教我下棋，但我在这方面是个笨学生。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起初有些生气，后来干脆不教我了。有时在

星期日，我们，也就是叶利札罗夫夫妇、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我和一些常到乌里杨诺夫家来的青年人（阿·巴·斯克利亚连柯、阿·亚·别利亚科夫和安·莫·卢卡舍维奇），常常结伴去看望亚·伊·李万诺夫和他的妻子维·尤·维坦（他们夫妇俩因一百九十三人案件被流放过）。这样的访问都是由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发起的，我记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总是那么聚精会神地听着维·尤·维坦叙述她那些简单但有时是离奇的往事，我觉得很惊奇。

我还记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到省自治局的统计工作者伊万·马尔科维奇·克拉斯诺彼罗夫家去过一两次。我曾经在克拉斯诺彼罗夫家给孩子们上过课，记得有一次我上完课出来，在过道里竟碰上了马·季·叶利札罗夫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这使我感到很意外。叶利札罗夫一面同克拉斯诺彼罗夫打招呼，一面指着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我们俩冲着您来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同克拉斯诺彼罗夫谈话的时候，我不在场，但听叶利札罗夫后来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把这位老民粹派克拉斯诺彼罗夫狠狠地批评了一顿。克拉斯诺彼罗夫甚至到1917年还没忘记这件事。

令人费解的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有些论敌一开始就对他不友好，尽管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同他们辩论时从不进行人身攻击。也许他们感到他比他们高明，而他们又不甘心认输吧。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却相反，他是个真正的战略家，对每一个新人都很注意，都很感兴趣，从对未来的战斗有用这个观点出发，把他作为一个士兵来评价，而所作的评价很少是错误的。我记得在萨马拉的那段生活中有过这样一件事。1892年春天，我的好朋友、我的同志、当时的雅各宾派罗曼诺娃从外地来看我。罗曼诺娃是个聪明人，是个很好的演说家，但她的理论水平比较低，因此在辩论时她多半只能用老一套来对付。她到萨马拉来看我，我当然首先把她带到乌里杨诺夫家去，一路上我说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

许多好话。由于这些好话，她骂我是雅各宾原则的叛徒，但尽管如此，她对乌里杨诺夫一家还是很感兴趣。她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好象见过两次面：一次是我们到乌里杨诺夫家去，另一次是她在我家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到我家来。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反对派当中还有这样一些人，他们对他们说不上喜欢不喜欢，而是对他们不感兴趣。瓦西里·瓦西里也维奇·沃多沃佐夫就可以算在这一类人里面。沃多沃佐夫也是我们的难友，也就是说他也在萨马拉接受行政流放。他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完全相反。那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是把自己的全部知识都用到实践中去，而沃多沃佐夫却是个枯燥无味的长了两条腿的辞典，是个塞满了书本的提箱，对别人很少有用处。我有点为知识白白浪费掉可惜，就动员沃多沃佐夫给萨马拉的青年做一次专题报告。根据我的记忆，冬天他在他的住处做了一个关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报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也出席了这次报告会。他以沃多沃佐夫的反对者的身份，对沃多沃佐夫的过于“议会主义”（我找不出别的字眼）的观点提出了不同意见。我不记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意见有什么特别尖锐的地方，但我记得沃多沃佐夫对这次辩论一直心怀不满。开头一个时期，也就是从1891年秋天开始，沃多沃佐夫到乌里杨诺夫家去的次数相当多，后来就不大去了。我问他为什么不大去乌里杨诺夫家，他回答说，在他们家里他感到“无聊”。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没有兴趣跟沃多沃佐夫来往，大概他跟沃多沃佐夫在一起也是感到无聊吧。

载于《弗·伊·列宁在萨马拉（1889—1893年）。回忆文集》1933年莫斯科党的出版社版第63—68页

往事漫忆

伊·瓦·巴布什金

我们忙于革命活动，忙于与日益增多的熟人联系，完全埋头于工作之中，竟然没有觉察星期日学校开学的时刻已经来到了^①。我们焦急地等待开学的日子，这一天终于来临了。当然，我们大家无一例外地向学校报了名，这所学校既是强有力的文化机关，又是排除杂质筛选纯种的筛子，还是促使一个人同另一个人碰头的机构；在这里逐渐形成了一个相当牢固的联络网，虽然范围并不太大。这时候，我们有一个小组正准备进行系统的学习，也许还有别的小组，但我不知道，也没有去打听。彼得堡的秋天刚降临，就从各地涌来了许多知识分子，于是开始了紧张的学习生活。由于各方面的学习都很紧张，我和柯斯嘉简直无法平静下来。有一个新朋友，我们管他叫恩·^②，是个住在涅瓦关卡外的工人，他同一些知识分子有联系，这些知识分子大概有一大批自己的干部，因此希望也能在涅瓦关卡外开展系统的小组学习，于是他就组织了一个小组。我的房间被用来作为学习的场所，因为这里最方便，没有外人。小组由六个组员和一个主讲人组成，开始学习政治经济学，学习马克思的著作。主讲人^③用口授的方式给我们讲解这门学科，没有任

① 指的是 1893 年秋天彼得堡星期日夜校开学。——编者注

② 这是瓦·安·舍尔古诺夫。——编者注

③ 小组的主讲人是弗·伊·列宁。——编者注

何书面材料，他常常想办法引导我们发表不同的意见，或者启发我们要求开展辩论，这样一来他就可以用激将法叫一个人向别人证明自己对于某一问题的观点为什么是正确的。因此，我们的课上得很生动，很有趣，还带有培养演说家技巧的性质；这种学习方法是让学员弄清问题的最好方法。我们大家对这些课感到很满意，常常称赞我们的主讲人聪明，并且彼此开玩笑说，他是由于太聪明才掉光头发的。这些课同时还教会我们独立工作，教会我们去获得材料。我们从主讲人那里得到一张张单子，上面写着要研究的问题，要求我们细心地熟悉和观察工厂生活。于是我们在工厂干活时常常要利用各种借口到别的工场去，而实际上我们是去了解 and 收集必要的情况，如果有机会的话，也跟工人们聊聊。我的工具箱里经常塞满各种各样的纸条，吃午饭时我总要设法悄悄地把我们工场的工时和工资的数目记下来。当然，收集各种情况的最大困难在于没有空闲时间，不过事情总还是有所进展，尽管并不如想象的那样圆满成功。

载于《伊万·瓦西里也维奇·巴布什金回忆录(1893—1900年)》1955年莫斯科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版第43—44页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彼得堡

瓦·安·舍尔古诺夫

1893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来到彼得堡以前，这里已经有了马克思主义小组，并且是知识分子和工人分别组成各自的小组。工人当中有一个中心组，参加这个组的有费舍、凯泽尔、诺林斯基和舍尔古诺夫；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中参加这个组的有斯塔尔科夫、克尔日札诺夫斯基、拉德琴柯。

彼得堡的工人已经参加过1891年和1892年的五一节活动。工人小组在彼得堡已经相当多了，不过这一切都带有某种偶然的性质。这就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没来以前彼得堡的情况。

我当时常到工艺学院学生格尔曼·波里索维奇·克拉辛那里去上课。有一次我到克拉辛那里去的时候，他告诉我说，来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伏尔加河流域的人，要同我认识认识。我当然表示同意。于是我就同格尔曼说好，让他通知我什么时候到他那里去。在约定的日子我到格尔曼·波里索维奇那里去了。他当时住在谢苗诺夫团的一个什么地方。过了两三分钟，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也来了。在格尔曼那里我们只简单地谈了几句，谈的是一本新出版的书，后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邀请我上他那里去。

过了两三个星期，我到哥萨克胡同去看望伊里奇。他一见面就对我说：“来得正巧，我有一本很有意思的书。”说着就把书拿给我看，我一看，是用德文写的。我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我不懂德

文。他回答说：“没关系，我们可以用俄文来读。”书的名字叫《工业辛迪加、卡特尔和托拉斯》，布鲁诺·舍恩兰克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读这本书花了大约三个小时。读完以后，他给我提了一些问题。在他提问题、甚至要求对某些问题作出书面回答时，我发觉他读这本书并不是为了宣传，而是为了用这本书来考考我。当他问我“在彼得堡您的熟人中间象您这样的工人有多少”时，这一点就更加清楚了。我把中心组同志们的姓名报给他听，他立刻要求我把他们介绍给他。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从一开始就下功夫认真研究我们的组织。他高高兴兴地到各个小组去，详详细细地了解每个工人革命者。

1894年在我们工人中已经提出了在工厂之间合理分配力量的问题，也就是说，如果在某一个工厂里没有我们的人，而这个工厂又是个大厂的话，那么我们就要想办法从我们的同志当中派一个人去，要做到在所有的大厂里都起码有一个我们的人。

* * *

1895年春天在彼得堡出现了一本论鼓动的小册子^①。这本小册子曾经在西尔文住处的一次会议上宣读过。参加会议的知识分子有七八个，有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斯塔尔科夫、克尔日札诺夫斯基、瓦涅也夫和其他几个人。在读这本小册子的时候，有一部分知识分子认为，过渡到用印刷品鼓动为时尚早。提出的理由是，如果在某一工厂散发传单，而我们自己的工人又非常少的话，那么他们就会全遭逮捕，工作就会停顿下来。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却认为，这一点用不着担心，因为传单能

^① 指的是阿·约·克烈美尔1894年写的小册子《论鼓动》，这本小册子连同巴·波·阿克雪里罗得写的跋于1896年在日内瓦由“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出版。——编者注

起到这样的作用：一个人被捕了，将会出现几十个新的同样的乃至更强的工人。参加会议的所有工人都赞成过渡到用印刷品进行鼓动。

印刷的马克思主义的传单直到1895年秋天才开始出现。一共散发过四五种。根据我的记忆，这些传单是在拉赫塔（叶尔金）印刷所印刷的。传单下面的署名通常是：“一群社会民主主义者”。在出了几种传单以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提出了必须建立组织的问题。他说，“一群社会民主主义者”，这不说明任何问题，工人应该知道有明确的组织。

根据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委托，1895年8月就由我建立了一个秘密住所，这个住所的主人是谢勉尼柯夫工厂的一个工人，好象是姓阿法纳西也夫。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利亚霍夫斯基、塔赫塔烈夫、斯塔尔科夫等到这个住所来的次数相当多。我当时在涅瓦关卡外算是个组织者，因而也常到这个住所来。在这里奠定了“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的基础。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要我们注意，应当采取措施，使我们的年轻组织不致走上英国工联主义者的道路。从这里已经可以看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特别关心的是要使组织沿着革命的道路发展。虽然我们在接近工人时不得不多讲一点经济问题，不得不以切身的经济利益为前提去团结工人，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总是说，事情的政治方面永远也不能忘记。

在涅瓦关卡外，除了上面提到的这个住所以外，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还到丰季科夫的住所，博德罗夫兄弟的住所和我在亚历山大街二十三号的住所去过。我还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到亚历山大街附近一个叫“船舶”的新村去过，但到底去过哪里，几号，现在记不起来了。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斗争协会”刚刚建立的时候就使它走上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轨道，这一点在后来发挥了巨大的组织作

用。尽管在1895年12月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中的所有领导成员和大量工人被逮捕，1896年5月在彼得堡还是爆发了俄国前所未有的三万人以上的工人大罢工。工人的基本要求是要求发给加冕日的工资，因为在加冕日工人被迫停工，没有拿到工资。那时是尼古拉二世加冕。这次罢工是从未有过的现象。要求发给加冕日工资这件事本身就说明了工人对沙皇这个“高贵人物”的大不敬态度。

由于“斗争协会”的活动而引起的这次罢工起到了这样的作用：工人运动从秘密的变成公开的了。因为大量的工人见到了传单，见到了一般的秘密书刊，他们已经开始大声谈论社会主义者了。如果说1905年革命是1917年革命的总演习，那么1896年的罢工应该算是准备1905年革命的最重要的演习之一。

载于1937年1月21日《列宁格勒
真理报》第17号第3版

尼古拉·彼得罗维奇

弗·亚·克尼亚泽夫

从1884年起我就在新船坞港钳工车间当学徒，1889年满师当技工。港口里的工作进行得毫无生气，工作方式也很原始，连车间已有的机床也不利用。有时候你去向领班要砂纸磨铜制品，他会回答说：“哎呀，你真是个差劲的师傅！还想要砂纸呢，你就弄点刨屑，撒点金刚砂磨磨好了。”工作就是这样进行的——工作的时间少，浪费的时间多。

从波罗的海工厂来了几个青年技工；后来知道，他们是作为“危险分子”被波罗的海工厂开除出来的。他们给港口带来了一股朝气。搁置不用的机床一下子开动起来了，计日工改成了计件工，因而工资也提高了。

同时，这几个技工还在工人中进行社会主义宣传，从工厂的青年中挑选优秀分子。着手组织了一些小组，我参加了其中的一个。我在小组里获得一些知识以后，立刻就到我的朋友中间去传播。除了口头宣传以外，还传阅一些介绍社会主义思想的小册子。偶尔也有一些秘密书刊传到我们手里来。但是这些秘密书刊不容易“扎根”，因为很难保存。

为了让工人在政治上受到正确的培养，我们在港口建立了一些当时称之为“民主大学”的组织，每个组织的人数不超过五人。

我们都这么说：“如果工人自己不能来上大学，大学就去找他。”果然不错，小组成员的发展工作这样一来就进行得很快。

我们这些小组的领导人是一些高等学校的学生，他们也是小组的组织者。

1894—1895年期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杨诺夫同扎波罗热茨和斯塔尔科夫一起制订了一个学习大纲，我们工人小组的工作从此就开展得更加深入、更加切合实际了。

我记得，当我在彼得堡区，在瓦西里岛，在维堡区和在科尔皮诺镇组织了几个工人小组，表示必须派一些知识分子到这些小组去做报告时，中心组的人对我说：“好，尼古拉·彼得罗维奇会到你们那里去的。他是我们当中一个出色的同志，因此小组的成员应该是可靠和正派的人。”

由于这一指示，我在要参加小组的工人当中挑选了四个我最了解的人——伊林、阿斯塔菲也夫、克雷洛夫、尼良杰尔，第五个就是我自己。我们这个小组的第一次会议是在我住的房间里举行的。我的房间在彼得堡区斯也任斯卡娅街和大普什卡尔斯卡娅街转角上的一幢房子里，从楼梯到我的房间有一个单独的过道，因此有人到我这里来，房东是看不见的。

到了约定的时间，有人来敲门了。我打开门，看见是一个三十岁左右的男人。他有一撮浅红色的小胡子，圆圆的脸，目光很敏锐，一顶便帽戴得快盖住眼睛了。虽然是夏天，他穿的却是秋季大衣，领子翻得高高的。总之，从外表上看，我说不出这个人是什么身份。他一进门就问：“克尼亚泽夫住在这里吗？”我作了肯定的回答以后，他说：“我是尼古拉·彼得罗维奇。”我说：“我们都在等您。”——“因为我不能直接到这里来……所以耽误了。人都到齐了吗？”他边脱大衣边问。

他的脸色显得那么严峻，好象在发布命令，这就使得你不自

主地要听从他的话。于是我急忙宽慰他说，人都来齐了，可以开会了。

他走到参加会议的人跟前，同他们一一认识以后，就坐到给他指定的座位上，开始给大家介绍我们为之来开会的那项工作的计划。他讲话的特点是严肃、明确、周密，并且他的话好象是不容反驳的。参加会议的人都注意地听着他讲。他们回答他提出的问题：是干什么的？在哪里工作？在什么工厂工作？厂里工人的水平如何？他们的观点怎样？他们能不能接受社会主义思想？工人们最关心什么？他们在读些什么书？等等。

我们认为，尼古拉·彼得罗维奇的主要思想是，人们还不了解自己的权益，而主要的是还不会利用能够加以利用的东西。他们不知道如果他们能够联合起来，团结起来，他们身上就会有一股巨大的力量，足以摧毁妨碍他们得到美好未来的一切障碍。如果掌握了知识，他们就能独立自主地改善自己的处境，使自己摆脱奴隶状态，等等。

尼古拉·彼得罗维奇的讲话持续了两个多小时，但我们听得并不吃力，因为他把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都讲清楚了。把他的讲话同别的知识分子的讲话比较一下，就能明显地看出，他的讲话别具一格，与众不同。当尼古拉·彼得罗维奇确定了下次会议的时间，离开我们的时候，参加会议的人都问我：“这是谁？讲得真带劲。”

但是我没法向他们说明尼古拉·彼得罗维奇是谁，因为当时我自己也不知道。他常到我们这里来——每周一次。他也常到给他指定的其他小组去。在黑河边上，工人普·德米特里也夫那里也组织了一个小组。虽然路很远，尼古拉·彼得罗维奇还是常到这个小组去。他也常到瓦西里岛七马路克罗契金-费多罗夫的小组去。去这个小组对尼古拉·彼得罗维奇来说是很危险的，因为

在那里有人跟踪他。这个小组的五个人在1894年11月全都被捕了。

因为我是中心组的成员，所以经常有其他小组的代表和知识分子在我的住处集会。这些会议是更加秘密的。主持这些会议的就是那个尼古拉·彼得罗维奇。但是他的真名叫什么，连在这里开会的工人也是谁都不知道。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在这些会议上把当宣传员的知识分子分配到各个小组去，给他们作指示，向他们介绍这些小组的情况，告诉他们在小组里要讲些什么。

1893年我的祖母死了，遗产应该由我继承。我知道我有什么事时同志们总是会出主意的，为了获得这笔遗产，我便去找他们商量了。他们叫我去找助理律师弗·伊·乌里杨诺夫，并且警告我说，不要把他的地址写下来，记住就行了，如果非写不可，就有意在门牌号码和房间号码前面加个九字。

我找到了哥萨克胡同七号第十三号房间，我是按照别人给我画的图找到这个地方的。按门铃后，女房东开门对我说，乌里杨诺夫不在家，但很快就会回来，并让我在他房里等他。房间有两个窗户。家具很简单：一张铁床、一张写字台、三四把椅子、一只五斗橱。打量了这全部陈设以后，我心里想：“这是个什么样的律师呢？他会不会承办我的案子……”门铃响了，一会儿一个男人走进了房间。“啊，您已经在等我啦？”他说着，迅速地脱下大衣，整了整他那身有点皱了的燕尾服。“请您稍等一下，我马上换好衣服，来和您谈问题。”

我朝这位律师的面孔看了看，楞住了：这不是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吗！等我清醒过来，出现在我面前的已经是换了一套衣服的尼古拉·彼得罗维奇了。他指着椅子让我坐下，并对我说：“您从头给我讲起。”我坐下以后，就尽我所能把来龙去脉都讲给他听，他不时打断我的话，要我解释清楚，好象是要把一件件事情都从我嘴里

掏出去一样。我说我的祖母是在一个将军家里做奴仆死的，这个将军自己虽然有一幢三层的石砌楼房，还是有可能要强占遗产。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听了以后，搓搓手，加重语气说：“如果我们能胜诉，就能把房子接收过来。困难只在于很难找到户口册，因为死者是农奴。”

说完他就拿出一张纸，写借阅纳税人口花名册^①的申请书。写好以后，他告诉我要到哪里去递交申请书，并且嘱咐我一得到关于这一案件的消息就立刻去找他。

“好，现在我们来谈另一个问题吧。小组的情况怎么样？工厂里怎么样？”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开始详细地问起我来。我勉强回答了他的问题。“您，”他对我说，“作为各个小组的直接联系人，应该经常了解工厂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工人有什么不满，这是谁的过错造成的。您应该了解工人的需求，要知道他们最关心什么，怎样去接近他们。”

我听着，感到要达到他提出的这些要求是相当困难的，但是尼古拉·彼得罗维奇说得那么坚定，我当然不敢加以拒绝了。

“现在，”他继续说，“您组织了一个小组。您自己要在知识上超过组员，才能起领导作用。您应当多读些书，提高自己，提高别人。我听说您喜欢跳舞，抛弃这个爱好吧，应该全力以赴地去工作。您应当在政治上提高自己，到那时，您在小组里的全部工作对您来说就会是一种享受了……”

我们告别后分手了。想起他交给我的这些任务，我的心情很不轻松。从他那里出来走到街上以后，我就开始考虑怎样才能完成这些任务。过了两三天我见到扎波罗热茨，我向他讲了我同尼

^① 一种纳税人口的调查表。最后一次调查是在废除农奴法的时候进行的。——编者注

古拉·彼得罗维奇(弗·伊·乌里杨诺夫)见面的情形以及他要我完成的任务。扎波罗热茨听我讲完后笑了笑说：“没关系，没关系，您要以他为榜样，他自己也在做大量的工作。我们也要这样工作，要帮助他。”

从这时起我便定期到弗·伊·乌里杨诺夫那里去，把从工厂里收集到的情况告诉他，每次也从他那里接受新的指示。

“您等着瞧吧，”他说，“我们要他们听我们的话，我们可以取得组织权的时刻就要到来了。到那时我们就会好过些了。必须使工人了解我们，这样的话，我们就能获得力量，就能按照我们的意愿来安排我们的生活。”

弗·伊·乌里杨诺夫说这些话的时候非常兴奋。我离开他时也是情绪高涨，干劲十足。

在工厂里，我尽力把我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那里听来的一切都讲给工人们听。工人们聚精会神地听着我讲，他们对我的态度改变了，他们开始尊敬我了。但好景不常。我进行宣传这件事让上级知道了，我只好离开工厂了。

有一次，我到弗·伊·乌里杨诺夫那里去，我听到他这样问我：“怎么样?!如果您被捕，您知道在审讯中，在法庭上该怎么办吗?”“我知道，”我回答说。……在审讯中应持的态度就是不作任何交代。“那么，”他继续说，“既然您知道，那您就向所有的同志都说一说吧!你们有互助储金吗?有图书馆吗?里面有些什么书?我们要建立一个好的图书馆，制定一个相应的读书计划。应该知道怎样帮助被捕的同志们和被流放的同志们。办这些事需要经费。要责成党员缴纳党费，要举办抽彩活动，要利用一切可行的办法筹集经费。”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把我们这个组织所必须做的一切事情都尽量告诉我了。我在他那里坐了大约一小时，答应他尽可能去做，

然后我就走了。

不久，我听说他被捕了。在他被捕后不久，我也被捕了，后来我就被流放到维亚特卡省去了。

载于《关于伊里奇(论文、回忆录、文件和资料汇编)》1924年列宁格勒波涛出版社版第112—117页

在“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的日子里

米·亚·西尔文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出席了我们交流经验的几次小组会以后，很快就建议我们研究理论问题，要我们从作报告或专题报告开始，报告可以由组员轮流来作。我自告奋勇第一个作报告。

“那您能给我出个什么题目吗？”我问。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用手指了指刚出版的瓦·沃·（沃龙佐夫）写的书《我们的方向》，于是我就从这本书着手了。我写了一篇专题报告，到现在我还记得，报告的措词很尖锐，但内容却很贫乏。报告我是在自己房间里作的。听报告的人除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以外，还有克尔日札诺夫斯基、斯塔尔科夫、马尔琴科、瓦涅也夫和格·波·克拉辛。由于报告的内容太贫乏，没有进行专门的讨论，也没有交换意见，大家都尴尬地闷坐在那里，最不好受的当然是我这个作者本人，因为这彻底的失败是我造成的，我灰心极了，等听报告的人一走，就把报告稿撕得粉碎。

格·波·克拉辛当时被大家默认为我们小组的领导人，他倒是决定要挽回这个局面，提议在下一次会议上作一个关于市场问题的专题报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皮包里大概不止有一篇这样的报告，但他故意不作声。他显然是想先知道谁来作这个报告。

会议是在斯·伊·拉德琴柯那里举行的，他这时已经结婚了，

在彼斯基的某个地方有一个单独的住所。到会的人相当多，除了老相识以外，还有一些我不认识的陌生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坐在窗户旁边一个不显眼的地方，远离围坐着报告人和我们小组其他许多人的大桌子。格·波·克拉辛口才很差，报告是照着一个四开的本子念的，本子折成两半，因此就留有半页空白，在这些空白处写了许多反对意见，这都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事先看这篇报告时写的。这个本子后来在我们中间传阅过；我们既看正文，也看反对意见。不过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反驳报告时所作的发言却要完整得多。他的发言很长，发言显示了他特有的技巧，他总是设法避免刺痛报告人，但报告人还是感到无地自容，我们在座的人都觉察到了这一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这次发言可以说只是个大纲。他没有引用任何统计数字，也没有引用马克思的任何词句，直截了当地提出，应当做一个现实主义者，应当从研究我们的现实出发，而不是从公式出发。他用鲜明的线条给我们描绘了一幅图画，说明正是由于农民的破产和分化，正是由于货币经济排挤了自然经济才出现了国家的经济发展和资本主义生产的增长。

所有这些意见后来都得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详尽的发挥，现在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了，但在当时这些意见听起来完全是一种新发现。

“他才是我们的领袖，我们的带路人，我们的理论家哩，跟着他我们决不会吃亏。”每个人都这么想。我们的心头充满了难以抑制的喜悦，因为正是我们小组、我们这个组织拥有这样一个大睿大智的人。当时决定再举行一次会议，继续进行辩论。克拉辛试图反对，但已经没有人听他的话了。克拉辛的领导地位垮了。

自从这次辩论会以后，我便常常到小哥萨克胡同七号去找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不久他就在那里长住下来，一直住到1895年春天。他的无穷的智慧，他的知识，他的刚毅的性格给我留下了深

刻的印象。我非常尊敬他。我把他看作鼓舞我去进行我愿意为之献身的事业的巨大精神力量，我对这个事业是无限忠诚的。他了解这一点，他珍视我的忠诚，因而在革命事业中给我以信任，对于我的许多大小弱点都友爱地加以宽容。他性情非常温和，同别人谈话时十分亲切，他是个赤诚的同志，在待人接物方面既朴实又爽朗。当同志们偶尔聚在一起乐一下的时候，他一点也不拘束，总是非常高兴。有两三次在彼得堡，有几次在我家里和在流放地，我看见他对朋友们是那么亲密，那么随和。但他作为一个政治家，却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思想集中，寸步不让，极端严峻，从不温情。

他说：“革命不是儿戏，来不得半点庸俗。”

他为人爽直，从不矫揉造作，装腔作势，从不自我标榜。他用自己平常使用的语言跟工人们谈话，为他们写文章，从不借口使用纯粹的大众语言而生造词语，他不用这种低级庸俗的办法去迎合“下等人”，他不象某些同志那样，好象是为了使意思更明了，用廉价的大众化方法来叙述自己的思想。

他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干巴巴的书呆子，他热爱人们，热爱生活，热爱生活中的乐趣，但他最大的乐趣是斗争，是争取胜利。他把自己完全献给了革命。除了与革命密切相关的生活以外，他没有别的生活，也没有别的需求。对于那些不能全心全意参加工人运动，不能同无产阶级的敌对阶级彻底决裂的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是不大喜欢的。他认为一个职业革命者要比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变种好得多。

当时在民粹派的杂志上，特别是在《俄国财富》杂志上，接二连三地出现了不同作者而主要是米哈伊洛夫斯基的反对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者的文章。我们大家都再三要求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回击他们，答应他用最大的力量去印行他的著作（哪怕是用胶印版），使它在我们这个范围不大的小组之外广为流传。弗拉基米

尔·伊里奇这才着手写作，1894年春天《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这本书便写出来了。他写得很快，关于米哈伊洛夫斯基的那部分在4月间就已经完成。这本书没有在小队里朗读过，至少我不记得有这回事。我个人读过这本书的大部分手稿，是在作者家里抽空读的。第一版的印制工作由拉德琴柯负责。究竟是谁印的，我不知道。用胶印版印的书页印好以后一包一包地陆续送到我们的住处来，我和瓦涅也夫把书页整理好，装订成小册子，然后由瓦涅也夫送到工艺学院，由我们在那里的同志向外发行。按当时的技术条件，第一版不会超过五十册。我相信一次不可能调制出更多的胶印油。

有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著作，当然使我们非常高兴。我主张一定要寄一本给米哈伊洛夫斯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却就这一点向我指出说：

“我写这本书，不是为了给米哈伊洛夫斯基，而是为了：第一，向尽可能多的读者解释清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第二，揭露民粹主义的资产阶级性质，指出这是小市民思想，是为小生产者辩护的。”

第二编也是4月间开始写于彼得堡。第三编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夏天在莫斯科或莫斯科郊区写成的。

1894年春天第一编在彼得堡和莫斯科同时发行。有几本分别寄给了一些报刊编辑部，其中包括《俄国财富》杂志。书价没有规定，给多少就收多少。书款交给了我们小组的出纳处，但连印刷费都难以抵偿。书很受欢迎，这一版一下子就销完了，于是便考虑印刷第二版。

9月中旬瓦涅也夫又负责印刷了第三版（如果把甘申和马斯连尼科夫在莫斯科印刷的一版算作第三版，那么这就是第四版），这一版注明的日期是1894年9月，并标有“一个外省的社会民主

主义者小组印行”的字样。

第二编，即论尤沙柯夫的那一编，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还在5月间就写好了，我们阅读过。第三编是他在夏天写成的。但他要先印第三编（论克里文柯）。

当我们完成了第一编第四版（也就是我们彼得堡的第三版）和第三编第一版（也是唯一的一版）的印刷任务以后，我们曾要求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允许我们着手印行第二编（论尤沙柯夫）。

这已是1894年10月的事。而这时发生了一些情况，使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不再考虑用我们的资金去印行论尤沙柯夫的著作。

写书和有关的操心事并没有使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离开我们组织的地下活动，相反，他的注意力主要正是集中在这方面。

我们的秘密活动在那时是相当原始的。我们当中很多人只是由于私人友谊才联系在一起。不过为了谨慎起见，我们都起了外号。瓦·瓦·斯塔尔科夫叫“捷姆利亚尼卡”，扎波罗热茨叫“古楚尔”，格·马·克尔日札诺夫斯基叫“苏斯利克”，瓦涅也夫叫“米宁”，我叫“波扎尔斯基”^①，等等，等等。这都是些开玩笑的外号，宪兵们始终没有弄清楚真相。

后来，到了1895年，过渡到了“鼓动”阶段，组织扩大了，除了老同志的中心组，还发展了庞大的外围组织，即由宣传员、技术员、秘密书刊的保管员和传递员、联络员等组成的几个附属小组。这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坚持要做到以下几点：第一，将组织成员按区分组；第二，严格划分每个成员的职责和在党内应尽的义务；第三，停止一切不必要的相互往来；第四，任何私人通信都要减少到最低限度，因为喜欢写信，特别是喜欢往外省写信的人，往往

^① 这些外号在俄语中是“草莓”、“古楚尔人”、“黄鼠”、“地雷”、“烈火”的意思。
——译者注

会情不自禁地用各种方法或明或暗地提到老相识，提到事业的发展情况，等等。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还不断扩大自己和我们小组中的工作，他注意组织的成长，逐渐改组了组织，分出了中心工作组和写作组，并按区建立了分组。他向我们提出了我们的工作与群众运动脱节的问题。

顺便说一下，我们当时在涅瓦关卡外的谢勉尼柯夫工厂有一些关系。1894年底或1895年初，这个厂发生了一次风潮闹得很凶的罢工。工人们捣毁了工厂办公处，痛打了某些高级职员，向赶来镇压的警察投掷了石块。这时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到一个小组去（在这个工厂里有一个小组是他亲自掌握的），问自己的组员：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不及早告诉他必然要发生的事件？事件发生后为什么又不及时让他了解情况？小组里的人只是就运动应当先深入后扩大等问题作了泛泛的解释。这又一次证明，我们那些参加小组的工人严重脱离群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搜集了关于事件的材料以后写了一份传单——一份归纳了罢工工人要求的告罢工工人书，然后就去找扎波罗热茨（当时他也掌握着谢勉尼柯夫工厂的一个工人小组），问他是否有可能把传单印出来。当时没有这种可能。而事情又很紧急，于是他们两个人就用印刷体把传单抄写了几份，交给谢勉尼柯夫工厂的工人小组去散发。传单当然是发迟了，因为事件已经结束，工厂也已平静下来。不过人们还是在工厂各处大声朗读了传单，传单很有意思，受到了欢迎，也引起了议论^①。

在这前后，出现过一本引起很多议论的小册子《论鼓动》。它的主题涉及我们活动中最尖锐的问题：怎样从小组活动过渡到群

^① 给谢勉尼柯夫工厂工人的这份传单至今没有找到。——编者注

众活动，怎样吸引群众参加运动？

研究各厂工人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的问题早就由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提出来了。这时他编了一份详细的《调查提纲》，现在要是能在旧宪兵档案里找到它才有意思呢。这种四开纸的调查提纲有四页多写满了他那密密麻麻的字迹。这种调查提纲我们每人都有一份。我们还把它复制出来发给其他小组的宣传员。我们非常热心于收集情况，有一个时期，连宣传工作也放弃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收集情况也十分热心。我们工人中不知是哪一个（是舍尔古诺夫，也可能是美尔库洛夫）到他家去看他时，常常被他盘问得汗如雨下。

关于工人生活的似乎很简单的问题，要得到准确的回答也并不那么容易。比方我们问工人当前最不满意什么，抱怨什么，希望在工厂里取消什么时，有时会得到这样出人意外的回答：“厂里停止供应开水了，大家都在闹着要开水呢。”或者从别处会听到：“计件工资减少了五戈比，为这五戈比估计要罢工。”这些“开水”、“五戈比”之类的事挂在大家的嘴边，到后来开展了鼓动工作以后，给我们惹了不少麻烦。反对地下工作新方法的人，主要是斯·伊·拉德琴柯和格·波·克拉辛，提出了反对意见，说我们是在鸡毛蒜皮的小事上耗费精力，把革命工作归结为要求开水的斗争，这是在葬送社会主义宣传事业，因为进行广泛的鼓动工作必然会使参加我们小组活动的所有工人很快就被宪兵抓走，一切工作都将停顿下来。

怎样实际运用调查所获得的材料的问题我们还没有解决，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又提出了新的主张：要以“合法”要求为依据开展鼓动工作。根据调查提纲从每个工厂收集来的材料不止一次地表明，现行法律已经在哪些方面遭到了破坏，程度又如何。鼓动工作应当从要求遵守法律做起。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还介绍了莫伊

先柯和他的同志们在 1885 年奥烈霍沃-祖耶沃大罢工中所采取的策略。大多数组员显然都同意在实践中试行新策略的决定。召开过一次会议来形成这个决定，并请来了一些工人代表参加会议。

这次意义重大的会议是在特罗伊茨基大街三号我和瓦涅也夫的住处召开的，时间是在 1894—1895 年的那一冬天。到会的人除我们两人以外，还有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娜·康·克鲁普斯卡娅、格·波·克拉辛、斯塔尔科夫、扎波罗热茨、拉德琴柯、雅库波娃、舍尔古诺夫、巴布什金、美尔库洛夫以及其他几个参加小组活动的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问题作了说明，有人朗读了小册子《论鼓动》中的片断，再一次听取了“守旧派”的反对意见，也听取了为新办法辩护的理由，在克拉辛和拉德琴柯表示反对的情况下，以多数票通过了决议——由小组宣传（并不停止这种宣传）过渡到以群众的迫切要求为依据，在群众中进行鼓动工作。任何与运动的政治任务无关、与“劳动解放社”老原则无关的话都没有谈起。当时认为，运动的政治方面可以体现在小组宣传和将要用来进行鼓动的口号之中，如果运动领导人——工人们认为这样做合适的话。

严格说来，1895 年春天，我们还没有进行鼓动，但工作范围毕竟扩大了。各区小组的数目增加了，我们的组织不仅包罗了范围相当广泛的工人，也包罗了范围相当广泛的知识分子。尽可能把在彼得堡进行同一方面活动的小组联合起来的问题也提出来了。为了利用技术设备，我们同民意社建立了联系。由于作出了以要求遵守现行法律为依据开展鼓动工作的决议，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特地写了小册子《对工厂工人罚款法的解释》^①，这本小册子是由民意社印刷的。

政治警察对我们的监视明显地加强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

^① 见《列宁全集》第 2 卷第 13—52 页。——编者注

打算到国外去，以便同“劳动解放社”建立更为密切的关系，并为争取经常供应我们通俗的秘密书刊进行一些活动。复活节那天，同志们聚集在皇村我住的地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制定了下一步的工作计划，并给我们分配了在他万一被捕的情况下我们应该分担的任务。这是4月间的事，5月他就出国了。

9月初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从国外归来。他知道我们需要书刊，他象我们组织的任何一个普通成员一样，用夹底箱从国外带回了满满一箱秘密书刊。箱子顺利地带进来了，也许是故意放过他的，为的是进一步监视他。后来这只箱子给我们添了许多麻烦。必须把箱子和箱子里的东西尽快藏起来。密探到了也没找到箱子。

秋天，马尔托夫来到彼得堡之后，我们同他的接触多起来了。马尔托夫有一批人，他们在国境线上有可靠的关系。此外，他们还有一部油印机，这对我们来说实在太有用了，对印刷传单极为重要。现在传单不必再用手抄了，可以用打字机打出来，无须忙碌地调制胶印油就能很快地印出相当象样、便于阅读的传单来。我们第一次试用油印机是在11月，到12月我们就用它全速进行工作了。

把在彼得堡进行活动的所有社会民主主义者小组全都联合起来，这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又一个主张，但这件事直到他被捕以后通过一次大规模的罢工才得以实现。利用有生力量的大量补充以及与民意社取得的协议，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决定创办《工人事业报》。为这件事我们的组织在拉德琴柯家里（辛比尔斯克街十二号）召开了两次扩大会议。一次会议称之为“立宪会议”，在这次会议上确定了与马尔托夫小组进行合并，建立了一个由五人（乌里杨诺夫、马尔托夫、克尔日札诺夫斯基、斯塔尔科夫、瓦涅也夫，都作为区的代表）组成的核心，并整顿了组织。会上还确定了中心组的候补人选，中心组当时由十七人组成。另一次会议是编辑会议，

是在被捕前三天召开的。在这次会议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以《工人事业报》编辑的身份给我们朗读了第一号的全部稿件。在第一号也是唯一的一号上有四篇文章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撰写的：一篇是一般政治性内容的社论，一篇是《1895年雅罗斯拉夫里的罢工》，一篇是悼念弗·恩格斯逝世的文章，^① 还有一篇是评论杜尔诺沃通令的文章（《我们的大臣们在想些什么？》^②）。被捕前几天，扎波罗热茨劝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不要把他那笔迹容易被人认出来的手稿直接交到印刷所去，并有所准备地把它重抄了一遍。因此，后来宪兵就把扎波罗热茨当作这些文章的作者，把他看作头头，判了他更长期限的流放。在那次会议以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把全部材料都交给了负责与印刷所联系的瓦涅也夫；在12月9日凌晨的那次搜查中，这些材料也全都从瓦涅也夫那里抄走了。

但是鼓动运动仍在轰轰烈烈地进行。普梯洛夫工厂的工人波里斯·季诺维也夫和彼得·卡拉梅舍夫同由他们挑选出来的一批青年人，在凡是可能的地方都进行了公开的鼓动，他们在大街上，在成堆的工人当中，在厂门口和其他地方堂而皇之地散发传单。传单往往触及时弊，例如，舞弊营私，违反法律，不预先通知就削减工资等等。于是工厂督察来了，开始了侦查，警察也进行了讯问。这一切在单调的工厂生活中是大事件，它引起了人们的议论和关心。大家都紧张地等待着：传单事件将会导致什么结果。舞弊营私、专横跋扈本来只是内部知道的事情，现在把它公之于众，当然激起了人们的义愤。

“骂得真痛快！”有人在人群里一边读刚检到的新传单，一边说。

传单现在已经被人大声地朗读，也就是公开地朗读了，这样朗

① 作者提到的弗·伊·列宁的这三篇文章至今没有找到。——编者注

② 见《列宁全集》第2卷第65—68页。——编者注

读传单的人多半是那些给传单提供过材料并负责散发的工人。

宣传员现在到小组里去，不再是去物色那些能够理解剩余价值理论的、知识水平高的工人了。他现在要找的倒是那些能够掌握群众情绪、能够发现重要事实、有可能成为鼓动员的活跃积极的同志。“鼓动”使我们着了迷，过了不久我们简直就没有时间去搞小组工作了，于是警察对我们的监视更加强了。

我们当时念念不忘的是，要给群众运动灌输自觉的政治思想，即为推翻专制制度、为争取政治自由而斗争的思想。但是由于害怕采取为时过早的、策略上错误的步骤，我们不自觉地滚进了“经济主义”的泥坑，“经济主义”过两三年以后在《工人思想报》上被大肆宣扬了一番。

这种“尾巴主义”的因素，这种为运动服务而不是去领导运动的倾向，在 1896 年我们所有的传单和声明中都能看得出来。这是因为我们的理论水平不够，不能胜任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被捕以后由我们来充当的重要角色——运动领导人的角色。

我至今还记得，在我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认识的最初阶段，我思想苦闷时去找他，他总是用这样的话来鼓舞我：

“您一定会看到，我们很快就会成长为一个真正的党。革命一定会到来，我们将作为一个准备去完成自己使命的共产党出现在世界上。”

载于《回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
第 1 卷 1956 年莫斯科国家政治书籍
出版社版第 141—149 页

弗·伊·列宁和1893—1895年 间的第一个莫斯科 马克思主义组织

谢·伊·米茨凯维奇

我第一次见到弗·伊·列宁是1893年8月在下新城(现在的高尔基市)。经过情形是这样的。我当时是莫斯科大学医科五年级学生，夏天霍乱流行时我在下新城附近的索尔莫沃工厂工作。那时我已经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会见过下新城的马克思主义者巴·尼·斯克沃尔佐夫和米·格·格里哥里也夫，他们是喀山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小组——费多谢也夫小组的成员，小组是以它的优秀组员尼·叶·费多谢也夫命名的。

有一次我从索尔莫沃去下新城，顺便去找斯克沃尔佐夫，在他那里看到一个陌生人同他和格里哥里也夫谈论得很热烈。经过介绍才知道他就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杨诺夫。他从萨马拉去彼得堡路过下新城，他想住到彼得堡去。他到这里来是为了结识斯克沃尔佐夫，他是看到斯克沃尔佐夫在《法律通报》杂志上发表的一些文章(俄国合法马克思主义者论述俄国经济的第一批文章)知道他的。他决定离开下新城以后还要到弗拉基米尔去看费多谢也夫，根据他获得的消息，费多谢也夫应该得到保释。但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并没能见到费多谢也夫，因为过了一些时间

他才被释放出狱。

话题转到了费多谢也夫。斯克沃尔佐夫和格里哥里也夫非常了解他，说他是杰出的人才，很有发展前途，很能实干。后来我们同伊里奇又谈到其他一些问题。我们告诉他，我们在青年知识分子中已有的一些关系，谈到我们在莫斯科和下新城工人中着手进行的工作。我记得，伊里奇特别强调，必须建立可靠的组织，必须建立城市之间的联系。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把他姐姐安娜·伊里尼奇娜在莫斯科的住址告诉了我，有时他从彼得堡到莫斯科以后就在她家里会见莫斯科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们还谈到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前景，谈到农民，谈到同民粹派的斗争，谈到西方的工人运动。

我们交谈的时候情绪十分兴奋。当时在俄国，马克思主义者还很少，我们只有几个人，但是我们明白，马克思的伟大学说一定会教给我们解决“老大难问题”的方法，未来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我们同伊里奇一连谈了好几个钟头，直到他应该上火车站的时候才罢休。

我们觉得年轻的列宁学识非常渊博，他的论断特别有根据，也特别深刻。值得指出的是，当时已经可以看出他是我们党未来的组织者；他非常注意集合现有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力量，也非常注意在散居各城市的马克思主义者之间建立联系。

9月初我回到莫斯科，第一件事就是按伊里奇给我的地址去找安娜·伊里尼奇娜和她的丈夫，在库尔斯克铁路局工作的马尔克·季莫费也维奇·叶利札罗夫。我记得他们当时是住在库尔斯克车站附近的雅柯夫列夫胡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弟弟德米特里·伊里奇（他那时是医科一年级学生）和妹妹玛丽亚·伊里尼奇娜（当时是五年级或六年级学生）也住在他们家里。我立刻就同这一可爱的家庭亲近起来了，并且从此以后，在我的一生中都同他

们保持着友好的关系。我在莫斯科工作期间他们给予我各种支持，并且帮助我建立了一些重要的关系。我在他们家里认识了铁路职工奥库利奇，他在工人中有一些朋友，我通过他结识了从维尔诺来的叶·伊·斯庞蒂，斯庞蒂后来在莫斯科马克思主义组织中发挥了明显的作用。

安娜·伊里尼奇娜积极参加了这个组织的工作，她是这个组织所有关系的枢纽——由她恢复遭到破坏的关系，由她为新来的干部建立他们之间以及他们同工人之间的联系。安娜·伊里尼奇娜还把宣传资料从德文翻译过来；她翻译过豪普特曼的剧本《织工》，这个剧本曾经用胶印版印刷过；她用通俗的语言介绍过杰緬季也夫的著作《工厂》，等等。1898年她参加了第一届莫斯科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是在明斯克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以后成立的。

当时是青年马克思主义者的德·伊·乌里杨诺夫参加了大学生的马克思主义小组，不久又开始在工人中进行工作；1897年11月他曾经因莫斯科工人协会案被捕。

我同安娜·伊里尼奇娜认识后不久（1893年9月底），在莫斯科成立了由六人组成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小组（“六人小组”），目的是为了在莫斯科工人中进行系统的宣传和鼓动。我是这“六人小组”的成员之一。我们小组在整个活动期间都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保持着联系。

1893年12月底我到下新城去过圣诞节，1894年1月12日（24日）回到莫斯科。

莫斯科的人都在谈论不久前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命运》一书的作者、著名作家瓦·沃·同彼得堡的一位马克思主义者之间所进行的辩论。^①我从安·伊·叶利札罗娃那里了解到，非常成功地发言反驳瓦·沃·的那位彼得堡人就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他现

在到下新城去了。这样一来，我正好和他错过，使我既没能听到他在莫斯科的发言，又不能听到他在下新城的发言。我感到非常遗憾。安娜·伊里尼奇娜给我详细地叙述了这次发言的情况；后来她还把这情况写进了她的文章。

安娜·伊里尼奇娜写道：“我记得……辩论很快就热烈起来，特别是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起来反驳一个举止非常庄重的民粹派以后，此人身材不高，但很结实，淡黄色头发，秃顶，青年人对他很尊敬，他坐的地方有几分象是‘贵宾席’。

我记得弟弟当时只是个二十三岁的青年，他和一群年轻人站在通向另一房间的房门口，他先是说了几句引人发笑的讽刺话，使得所有的人（其中大多数人带着很不赞成的表情）都转过头来看着他，接着他就发起言来。

他满怀青年人的激情，以广博的知识为武器，用深信不疑的语气，大胆而坚决地驳斥了民粹派的理论，使它绝无立足之地。对这种‘后生无礼之词’的敌视态度也开始逐渐转变，可以说已经从敌视态度变成尊敬态度了。大多数人都把他当作一个认真的对手来看待了。特别是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第二次发言答复那个举止庄重的民粹派以后，少数几个马克思主义者高兴得不得了。年长对手的倨傲态度和科学根据的反驳并没有窘住弟弟。他也用科学证据和统计数字来进一步阐述自己的见解，用更加尖锐的语言和更大的气势回击对方。整个讨论变成了‘父与子’两代人代表之间的对阵。所有的人，特别是青年人，都怀着极大的兴趣注视着这场舌战。那个民粹派的声调开始低下来了，话也说得有气无力，不清不白了，最后竟慌乱起来了。

在各个青年小组中热烈地议论了这次辩论，弗拉基米尔·伊

① 指1894年1月9日(21日)弗·伊·列宁在莫斯科一次秘密会议上发言反驳民粹派分子瓦·沃·(瓦·巴·沃龙佐夫)。——编者注

里奇使其中的许多人放弃了原来的观点，促使他们走上了学习马克思著作的道路。马克思主义者引人注目地抬起头来了，痛斥瓦·沃·的‘彼得堡人’的名字一时间被人们广为传诵。”

玛·彼·哥卢别娃在回忆这次发言时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发言给人的印象非常深刻，大家谈起他时都说他是出现在天际的一颗新星，——有人高兴，满意，也有人妒忌，懊丧，——他们说，结果会怎么样呢。”

在保安机关的材料里，在莫斯科保安处处长别尔嘉也夫 1894 年 1 月 20 日（2 月 1 日）关于密探监视从尤里耶夫到莫斯科来度假的约·莫·达威多夫的报告中，也提到这次发言：

“因接去年 12 月 18 日第七千二百七十一号公函，谨向警察司报告如下：尤里耶夫大学学生约瑟夫·莫尔杜霍夫·达威多夫在莫斯科逗留期间专与政治危险分子为伍。除消极参加本月 12 日纯正之学生晚会外，据密探获悉，本月 9 日在由八级文官之子尼古拉·叶菲莫维奇·库申斯基借沃兹德维任卡街扎列斯卡娅家秘密举行之晚会上，达威多夫曾积极参加辩论。参加此次晚会之著名民粹派理论家、作家瓦·沃·（瓦西里·巴甫洛夫·沃龙佐夫医生）列举论据反驳达威多夫，使其哑口无言，以致于达威多夫之观点由一姓乌里杨诺夫者（据云系统罪犯之弟）起来加以辩护，不料竟头头是道云云……”^①

在这次发言以后，伊里奇就到下新城去了，并在那里作了一次报告。格里哥里也夫是这样回忆这次报告的：

“……米诺多拉·叶哥罗夫娜·雅库波夫斯卡娅的那所不大的住所被用来作为弗·伊·乌里杨诺夫作报告的地方……大家对弗·伊·乌里杨诺夫报告的兴趣非常大。但由于房子小，也由于

^① 《红色文献》杂志 1934 年第 62 期第 76 页。——谢·米·注

保密的原因，来听报告的人并不太多，这些人都是经过挑选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探讨巴·尼·斯克沃尔佐夫也探讨过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命运这一问题时，阐述得更加透彻，在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时讲得十分明确，而他的知识又非常广博，——这一切给人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在出席的人中间没有一个人敢起来反驳他。”^①

列宁在莫斯科和下新城所作的发言大大地加强了马克思主义者在这两个城市的地位。

伊里奇从下新城回到莫斯科以后，我同他见过面；我们一起去找过亚·尼·维诺库罗夫，维诺库罗夫也参加了起领导作用的莫斯科马克思主义小组。我们向伊里奇谈起我们莫斯科工人小组的情况，谈起我们想在最近用散发传单的办法过渡到进行群众性鼓动的打算。他非常注意地听着我们汇报，并深表赞许，他特别赞同我们从小组活动过渡到进行鼓动的打算。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这次在莫斯科逗留的时间不长。这一冬他又来过一次，我记得是在2月底谢肉节的时候，我去看过他，又跟他一起去找过维诺库罗夫，在维诺库罗夫那里见到过从下新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阿·斯·罗扎诺夫。

1894年夏天，我们的组织在工人中做了大量的工作：在莫斯科许多工厂里建立了关系，散发了几种很受工人欢迎的鼓动性传单，在莫斯科和莫斯科附近的工厂里组织了几次罢工。^②

在紧张活动的这一段时间里我常常同伊里奇见面。这年夏天他是在别墅村镇库兹明基，在库尔斯克铁路柳勃利诺车站附近安娜·伊里尼奇娜的别墅里度过的。伊里奇有时到我这里来，我也到叶利札罗夫家的别墅里去看过他几次。我和他一起在郊区散步，

^① 《无产阶级革命》杂志1924年第4期(总第27期)第103页。——编者注

^② 详见拙著《革命的莫斯科》1940年国家文艺书籍出版社版。——谢·米·注

在池塘里洗澡，并且谈论了很多事情。他问起我们的工作情形，谈到过使当时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激动不安的一些问题。有一次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让我读他的著作《农民生活中新的经济变动》。这是伊里奇用他那特有的笔迹写成的厚厚一本手稿，是一篇研究南俄农民分化（即从农民群众中一方面分化出在自己的耕地上利用机器和雇佣劳动力的经济实力强大的富农集团，另一方面又分化出逐渐无产阶级化的破产的贫苦农民集团）的著作。伊里奇想把这篇文章发表在公开刊物上，就把它交给了《俄国思想》杂志编辑部，尼·阿·卡布鲁柯夫是这个杂志经济部的负责人。已经是伊里奇离开莫斯科以后了，我受他的委托去找卡布鲁柯夫，了解一下这篇文章的处理结果。卡布鲁柯夫说这篇文章不准备刊用，因为不合他们杂志的方针，说完就把文章还给了我。

文章放在我身边，1894年12月3日搜查时被抄走了。直到1923年，也就是说差不多过了三十年，我才在档案里，在关于我的案件的“物证”里找到了它，同一年它就被发表在党史委员会编辑的《纪念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二十五周年》文集里，并被收入了《列宁全集》第一卷。^①

在给我看这篇文章以后，伊里奇又把他的巨著《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的三个部分都交给我阅读。这一著作当时给了我深刻的印象。

应该指出，在1893—1894年的冬天，在自由派和自由民粹派的杂志上出现过好几篇反对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文章。报刊上的这一反马克思主义运动并没有遭到马克思主义者无论是在公开报刊还是秘密报刊上的回击，总而言之，当时没有理论工作，不能表达马克思主义者在理论上的观点，不能论证马克思主

^① 见《列宁全集》第1卷第1—57页。——编者注

义者基本的纲领性和策略性的口号。普列汉诺夫的著作《社会主义和政治斗争》和《我们的分歧》是批判那些思想已经不切合当时实际的老民粹派（巴枯宁、特卡乔夫、拉甫罗夫）的；他们的追随者不接受革命民粹派的思想，散布的是机会主义的小市民民粹派的思想。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感到迫切需要这样一部著作，它要既能回击民粹派批评家们的猖狂进攻，又能揭露他们的小资产阶级实质，还能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经济、政治的思想归结为一个统一的体系，运用到现代俄国的具体环境中去。

这样一部著作终于出现了。可以说这部著作是俄国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宣言书，是布尔什维主义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

实际上，俄国所面临的革命运动的主要纲领性理论问题和组织上的策略问题都已经在列宁的这部著作里提出来了，在这里面同时也提供了按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精神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列宁在这部著作里完成了由普列汉诺夫开始的摧毁民粹派思想体系的任务。

这部基本上能回答当时一切迫切问题的辉煌巨著的手稿那时候就在我手中。我的心情激动是不难理解的。考虑到这部著作的巨大意义，我想无论如何应该把它印出来。莫斯科高等技术专科学校学生亚·尼·马斯连尼科夫和弗·尼·马斯连尼科夫兄弟和他们的表兄弟、彼得堡工艺学院学生阿·亚·甘申承担了这一任务。我是通过安娜·伊里尼奇娜认识这几个人的。伊里奇也认识甘申（他们是在彼得堡组织里认识的）。但是他们的工作不知为什么过了很久也没有安排好。弗拉基米尔·伊里奇8月底或9月初动身到彼得堡去了，而他们的工作还是没有搞完。有一次甘申来找我，对我说，从彼得堡伊里奇那儿来了一个人，把所有搞好的材料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文章的原稿都拿走了。

根据在彼得堡参加这一著作翻印工作的米·亚·西尔文的回

忆录和其他资料,可以看出,第一编在1894年春天就用胶印版印刷过不到五十本;第一编的第二版也是由同一个小组7月间在彼得堡印的,也是胶印版(就是说也不超过五十本)。9月间西尔文的小组又印完了第一编的第三版。西尔文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发现莫斯科的“技术不过关,印得很慢,而且印数又少……因而感到很伤脑筋……当他看到我们的工作进行得至少并不坏时,他立刻就请马尔琴科到莫斯科去,从甘申那里拿回所有印好的材料和手稿。”

西尔文小组印第三编时注的是1894年9月,为了保密起见,还标注了“一个外省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小组印行”的字样。直到同年11月甘申才从彼得堡给我弄来了黄色封面的胶印的这一编。这样说来,第一编共印过三版,其中只有前两版靠得住,因为这两版在沙皇的档案里找到过;第三编只印过一版。莫吉梁斯基提到的切尔尼哥夫省的版本(《往事》杂志第二十三期)只印过二十至二十五本(第一编)。第二编是否印过,值得怀疑,尽管警察机关的情报说它在莫斯科出版过。^①但随便怎么说,它至今没有找到。

现在还没有关于这部著作印刷情况的更为可靠的材料。在收入1906年《时势》文集的我的一篇文章中,我第一次在文字上提起这件事,1919年在莫斯科,我又在《工人运动初期》这本文集里提起过。当时,根据我提供的线索开始寻找这部著作,直到1923年才获得圆满的结果,第一编和第三编在彼得格勒的公共图书馆里发现了,差不多与此同时,在柏林的社会民主党档案中也找到了这两编。接着就由莫斯科工人出版社第一次出版了这部著作,后来又收进了《列宁全集》第一卷。^②

^① 见彼得堡行政长官1895年5月27日的报告(《红色文献》杂志1934年第62期第82页)。——谢·米·注

^② 见《列宁全集》第1卷第109—309页。——编者注

也跟列宁的第一篇文章一样，《什么是“人民之友”……》这本书耽搁了二十九年才印出来。不过尽管如此，当时党的领导干部差不多都已经读过这部天才的著作了。

这本书问世以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马克思主义者当中威信更高，更为人所公认了。年轻的俄国马克思主义学派感到，从他身上获得了巨大的政治力量和理论力量。

但是在认识他的人的记忆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不仅是一个伟大的理论家和领袖，而且是一个朝气蓬勃、乐观愉快的人。他听别人谈话和问别人的话都很认真，好象非要从谈话人身上弄清问题不可，而他那机智的插话又往往会使谈话的内容按新的思路发展下去。跟他谈话使人感到真正的满足，跟他谈话常常能使讨论的问题得到准确而清楚的结果。在以后我们遇到政治工作中某些新的理论问题或实际问题时，我们总是非常关心伊里奇对这件事是怎么看的，他的意见怎么样，事实上总是他的思想、他的指示最英明，最正确，引导着党和无产阶级勇往直前，走向最终的胜利。

1894年12月我被捕了；同我一起被捕的还有我们“六人小组”的其他两个成员——亚·尼·维诺库罗夫和普·伊·维诺库罗娃夫妇；马·尼·利亚多夫、叶·伊·斯庞蒂和工人斯·伊·普罗科菲耶夫没有被捕。这时我们组织已经吸收了一批新人，宣传鼓动工作仍在广泛进行。在1895年五一节的工人集会上莫斯科组织正式定名为“工人协会”。

伊里奇通过斯庞蒂和马斯连尼科夫兄弟继续同莫斯科组织保持联系。

在莫斯科遭到夏季大破坏，利亚多夫、马斯连尼科夫兄弟和其他许多人被捕以后，列宁曾多方设法要恢复他同莫斯科组织的联系，这可以从1895年11月他给苏黎世的阿克雪里罗得的信中看出来：“我到莫斯科去了。谁也没有找到，因为‘生活的教

师’^①渺无音信。他安然无恙吗？（他在1895年12月12日（24日）被捕——谢·米·注）如果您知道他的消息并且有他的地址，请写信给他，让他把地址寄给我们，不然我们在那里找不到关系。那里曾遭到巨大的破坏，看来还有人留下来，工作也没有停止。我们从那儿得到了一些描写几次罢工的材料。”^②

在写这封信以后不久，列宁也被捕了，那是1895年12月9日（21日）的事。

载于《历史杂志》1941年
第1期第11—15页

① 指叶·伊·斯庞蒂。——编者注

② 《列宁全集》第34卷第1页。——编者注

弗·伊·乌里杨诺夫的文章 《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 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 是怎样印出来的？

阿·亚·甘申

1894年初春，我听马斯连尼科夫兄弟（他们既是我的亲戚又是我的朋友）说，他们几经周折终于在莫斯科弄到了印刷铅字。我便立即建议我们工艺学院学生马克思主义者小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杨诺夫、斯·伊·拉德琴柯、瓦·瓦·斯塔尔科夫、格·马·克尔日札诺夫斯基、格·波·克拉辛、米·康·纳兹万诺夫、亚·列·马尔琴科、阿·亚·瓦涅也夫、彼·库·扎波罗热茨）利用铅字来印刷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刚刚写好的文章《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并且由我去承担全部印刷任务。约好6月中旬在莫斯科由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交来手稿。

我到莫斯科以后，才从马斯连尼科夫兄弟那里知道，铅字没有了——弄铅字来的那个工人害怕印刷所检查又把铅字拿回去了。不过，还有希望从别的地方搞到铅字。答应一两天内就搞来，但时间过去了，铅字却没见到。论米哈伊洛夫斯基的那部分手稿由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花园街谢·伊·米茨凯维奇家里交给了我，手稿

是交给米茨凯维奇过目的。现在的问题只是搞铅字了。决定到尤里耶夫-波尔斯基城去一次，我认识那里的一个排字工人，想让他把手稿排印出来或者供应我们一些铅字。但商谈以后没有结果，因为印刷所小得很，少了铅字，立刻会被老板发觉。不过毕竟还是搞到了一块石印版，最后我们就决定用石印版来印刷《什么是“人民之友”……》。

我父亲在弗拉基米尔省彼烈亚斯拉夫县的“哥尔克”庄园被选为工作地点，庄园离莫斯科一百六十俄里，我和弗·尼·马斯连尼科夫搞来打字机、油墨、滚筒等等，好容易才搬到那里，但由于不会搞，石印工作并没有搞成。于是弗·尼·马斯连尼科夫到莫斯科去弄来了复印机、羊皮纸等物，这才开始印刷；工作进行得很慢：复印架只能印对开纸，做了个新的，才能印整张纸。到8月底我们只印出了一百本第一编，四开纸大小，用的是黑色油墨，想让人看起来是铅印的。从9月初起我们在莫斯科第一麦尚街扎伊策夫斯基大楼我父亲的住所继续工作，这时从彼得堡来了亚·列·马尔琴科，他把所有印好的东西和手稿都拿到彼得堡去了，在那里很快就用胶印版（用蓝色油墨）把手稿全部印了出来。根据我的记忆，阿·亚·瓦涅也夫也参加了这一版的印刷工作。大概是为了保密，也就是说要转移宪兵对彼得堡组织的注意，这一版上特地标注了“一个外省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小组印行”的字样。11月我从彼得堡给马斯连尼科夫兄弟和谢·伊·米茨凯维奇带去了几本这一版的样本。

在“哥尔克”和莫斯科，我同弗·尼·马斯连尼科夫只印了前面两编，即对米哈伊洛夫斯基和尤沙柯夫的答复。对克里文柯的答复没来得及印。论尤沙柯夫和克里文柯的手稿我是在卢布林诺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那里拿来的，1894年夏天他住在卢布林诺安·伊·叶利札罗娃的别墅里。漫长的二十九年过去了，我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库兹明基池塘边散步时谈话的情景至今记忆

犹新；当时已经感觉到，你面前的这个人才智过人，将来一定是一位伟大的人物。

再补充一点，我记得1893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从萨马拉到彼得堡来的时候，身边带着一部手稿，标题好象是：《瓦·沃·著作中民粹派的论据》；关于这部手稿的下落我一无所知。^①

载于《无产阶级革命》杂志
1923年第2期第73—74页

^① 作者提到的弗·伊·列宁的这部著作至今没有找到。——编者注

1898—1899年间弗·伊·列宁 就哲学问题写给我的几封信

弗·威·林格尼克

这些信，非常遗憾，在我从西伯利亚流放地回来后过流浪生活的时候全丢失了。^①我估计这些信是1901年萨马拉大搜查时从我那里搜走了……

在西伯利亚流放地我对哲学问题发生了兴趣，并且对休谟和康德的哲学也发生了兴趣。大概是休谟的怀疑主义同当时流放西伯利亚所处的绝望环境特别协调吧……至于康德的哲学，我早在儿童时代就在熟悉德国古典作家的同时熟悉它了，在这些古典作家中，特别是雪莱，大家都知道，是康德学说的一个热情的信仰者。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大概是从同志们那里知道了我的兴趣所在，于是我们便非常起劲地就哲学问题通起信来。我想使他转向我的信仰，向他讲述康德《实践理性批判》一书诗一般的美妙，有时还引证休谟和他的得意门生叔本华（在我苦闷的流放生活中他也引起了我的注意）的话，大谈其极端怀疑主义。我至今还记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回信中，总是以休谟怀疑主义、康德唯心主义的坚决反对者的身份，拿马克思、恩格斯朝气蓬勃的哲学同它们作比较，非常委婉但又十分明确地发表自己的见解。他热情地指出，

^① 弗·伊·列宁就哲学问题写给弗·威·林格尼克的这些信至今没有找到。

人类的认识是无止境的，认识应当不断向前发展，应当随着革命工人运动的开展，扬弃唯心主义的、资产阶级的糟粕，革命的工人运动不仅应当鉴定工人阶级本身的行为和世界观（它完全明确，十分乐观，并以自己纯朴的美引人入胜），而且应当鉴定自己的阶级敌人的行为和世界观，并迫使他们抛弃模糊不清、脱离现实的理论和幻想，用事实和街垒的炮火来说话……

读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几封信以后，我完全动摇了。我丢开了我的唯心主义哲学家们，集中思想学起马克思主义哲学来，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我原来迷恋的东西只能算作陈年往事了。《反杜林论》成了我案头的必读书，我得以终身免受唯心主义支配，完全应该感谢最亲爱、最尊敬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

载于《列宁文集》俄文第1卷
1924年第194—195页

在两个世纪交接的时期

潘·尼·勒柏辛斯基

我第一次见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是 1898 年底在米努辛斯克，那时许多流放者以共度新年为借口在那里聚会。

在这以前，当我同由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彼得堡组织的小组的组员们密切往来时（我是 1897 年同格·马·克尔日札诺夫斯基、瓦·瓦·斯塔尔科夫、尤·奥·策杰尔包姆、阿·亚·瓦涅也夫和扎波罗热茨一批人一起流放的），我经常听到对老头（即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高度赞扬，说他是一个才智过人的伟大的革命活动家，是一个学识渊博的马克思主义者，完全有资格担任俄国社会民主党的领袖。我在听到这种评价的时候，不知为什么总认为他是一个普通人不易接近的人。

我对伊里奇的这种全然不符合事实的偏见，在我接到我妻子的一封信以后受到了严峻的考验，我妻子比我先去流放地，她在信中叙述了她从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坐轮船沿叶尼塞河去米努辛斯克县的情形。她是跟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一起去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这次航行中对她和斯塔尔科夫的妻子安东尼娜·马克西米利安诺夫娜·斯塔尔科娃特别照顾。他给她留下了难忘的印象。这样和蔼可亲的人她从来还没遇到过。他好象只想到怎样给她和斯塔尔科娃服务，怎样给其他的旅客服务，这些人仅仅是他在这茫茫荒原长达六七天的旅程中认识的。当这只沿叶尼塞河行驶

的小轮船上发生了食物恐慌时，列宁自告奋勇要到邻近的小村落去向农民搞粮食，接着他就飞快地沿着陡峭的河岸向高山爬去。

我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米努辛斯克的第一次见面更是彻底消除了我把他当作“将军”的臆断。他彬彬有礼，平易近人，给人以非常深刻的印象。他决不让别人感到他出类拔萃，他很乐意同我们谈他的心思，他的情绪，他对刚读过的某本书的看法，谈各种政治新闻。不过只说他同我们分享他的精神财富是不够的，他平时还热情地希望我们自己也能充分掌握这些精神财富；他总是热情地、如饥似渴地从他所阅读、研究的书籍中寻求新东西，他要我们也象他一样，热情地、如饥似渴地把各种理论吸收到我们的世界观里去。

例如，我记得那时候他在攻读黑格尔的《逻辑学》。他常常对我们（他周围的同志）津津有味地谈论这一著作中所包含的博大精深的思想，大概他并没有发觉，我们当中的许多人还没有水平来理解黑格尔的哲学思想（至少我可以毫不避讳地说我就是这样）。

每一个因机缘和共同的革命事业同他联系在一起的同志，都是他无微不至关怀的对象。关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这一美德的感人事迹真是说也说不完。现在我从我的家庭生活中来举一个我们没齿难忘的事例。

1921年，我那从小就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和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所熟悉的女儿，突然健康大为恶化。可以推测是得了严重的结核病。忧愁的气氛笼罩着全家。痛苦的思绪在折磨人。本想全家都到高加索去过夏天，在那温暖宜人的气候里住几个月，但一想到这件事的困难，一想到手头不宽裕等等，我们就犹豫起来。

米·斯·奥里明斯基知道我们的情况后，没有征得我们的同意，就自作主张把我们的难处告诉了伊里奇。后来我们从奥里明

斯基嘴里知道，他刚向伊里奇提起我们当时的困难，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立即拿起笔，摊开纸，在上面写了几行字，然后把便笺交给了奥里明斯基。在这短短几行字中表现了整个伊里奇，以及他对老同志们的那种深切关怀。

列宁对同志们，特别是对观点完全一致的同志们是这样地关怀备至，但他对敌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在思想上同他格格不入的人并不如此。他们对他们很矜持，很冷淡，在斗争过程中甚至很严峻。

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刚认识时，首先看到的是，他热情奔放，他的动作异常多，他的神经系统经常处于紧张状态之中。假如他在读一本书，他的视觉器官和大脑活动速度之快，旁人看起来简直是奇迹。他读书的接受能力决非常人可比。

我的妻子同伊里奇一起坐轮船从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去米努辛斯克时，有机会看到过他读书的情景。她是这样来回忆这件事的。

她的床位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床位正好在一起。她看见他手上拿着一本正经书（好象还是外文书）。隔不了半分钟，他的手指就要翻过一页。她好奇地问他是一行一行地读呢，还是仅仅整页整页地过过目。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她的问题感到有点奇怪，笑着回答说：

“当然是一行一行读罗……并且读得非常认真，因为这本书需要这样读……”

“那您怎么来得及一页一页读得这样快呢？”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回答说，假如他读得慢一点，他就来不及读完他必需读的东西了。

现在我也来说一说我记得很清楚的几件事。记得有一次在日内瓦，他同我谈话时提到了一个观点，他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个观

点,从一本书里引证了一大段话。他一口气流畅地读了半页书,我听起来觉得语句非常妥帖通顺。当我想知道这是本什么书,坐到伊里奇身边去看一看时,我不禁大为惊讶,原来这不是一本俄文书,而是一本德文书。

休息或消遣对于列宁来说从来不是目的本身,不是脱离他整个工作制度的特殊部分。他生活的目的和宗旨,是为党,为无产阶级事业,为造福劳动人民对世界进行革命的改造而不倦地斗争。为了这一目的,他毫不吝惜自己的精力,健康,甚至生命。但有时疲倦的身体和失灵的神经系统也要求他不得不稍作休息,迫使他不得不丢开他的精力难以胜任的紧张工作。假如有些环境不以他的意志为转移(比如在流放地),与别的时候比较,使他有更多的空闲时间,那么他就千方百计把这种所谓超预算的休息时间变成增进健康的好时机,为将来的紧张战斗锻炼自己的体力。

在所有的体育运动项目中他最喜欢打猎。他打猎的结果——以打中鸟兽多少而论——通常是不出色的。但这种情况一点也没有使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灰心丧气。当他悄悄走近无忧无虑呆在树枝上的目标时,当他用“习惯的”眼光测量不幸的啄木鸟与枪口之间的距离,满心欢喜地预先享受因“准确的”一枪而获得的幸运结果时,他所固有的猎人的本能毕竟得到了满足,即使捱了“致命的一枪”注定要死的野禽不是翻身往下掉而是冲向蓝天往上飞也用不着特别难过。

我们这些被流放的社会民主党人,偶尔也事先说好,全都聚集到一个地方去,在亲密无间的同志式的大家庭中一起过几天。

通常是聚集在米努辛斯克,有时也聚集在舒沙^①,在好客的伊里奇那里,有两三次是在叶尔马科夫斯科耶村,住在那里的有我和

^① 舒沙是舒申斯克村的简称。——编者注

我的妻子，瓦涅也夫一家，西尔文一家，库尔纳托夫斯基，以及帕宁。

挤满了各地来客的屋子里，一片欢声笑语。大家都赶紧要谈个够，笑个够，争个够。伊里奇是这些人当中最好动，最活跃，最有朝气的一个人。最近几个星期以来他积累了很多问题，打算让大家议论一番。不应该忽视最近一期《俄罗斯思想》杂志，“青年派”在这上面说的许多机会主义的糊涂话已经说到了家。连考茨基的“反伯恩斯坦”也不是热烈谈论的最终话题了。还有那臭名远扬的新康德主义，关于它应该好好地谈一谈，特别要同弗里德里希·威廉莫维奇·林格尼克好好地谈一谈，他还没有识破这个邪说，竟准备去庇护新康德主义者……

一句话，命运之神（也就是米努辛斯克警察局长）所赐予的这两三天，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来说是一个幸福的时刻。

但也并不总是一个劲儿地辩论，一个劲儿地说话。假如是在夏天，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会同其他的猎手一起结伴去打猎。假如是在冬天，就正好可以沿着结冰的河道去滑冰，伊里奇是个无所畏惧的运动员，他滑冰滑得好极了。

在选择我们的声乐节目方面，他同斯塔尔科夫常常发生争执，斯塔尔科夫认为不妨使节目多样化一点。伊里奇却坚决反对改变我们的声乐传统，为了避免再争执下去，他赶紧拉开嗓门唱起来：

同志们，勇敢地前进！

斗争中百炼成钢……

当他觉得其他的演唱者把歌中精彩的旋律表达得不够慷慨激昂时，他就睁着两只激动的眼睛，挥动着双手，起劲地指挥起来，忍不住用脚踏着拍子，并提高自己的嗓门来强调他喜欢的地方，使瓦·瓦·斯塔尔科夫感到可怕的是，他常常会把主要的音符唱高半个音，甚至一个音：

友爱团结的劳动红旗，
将要插遍全世界！

伊里奇作为天生的运动员的本性在下棋方面表现得最明显。大家都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和李卜克内西都非常喜欢下棋，并且对于马克思来说输棋往往是大发雷霆的导火线。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下棋失利时从来不发火不骂人，但他喜欢下棋的程度不亚于马克思。

我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米努辛斯克第一次见面时，认识还不到半小时就在棋局上较量起来了。一直输棋给我的斯塔尔科夫和克尔日札诺夫斯基向来佩服我的棋艺，他们急不可耐地要两个“棋坛泰斗”“决一雌雄”。我也自认为下赢这个新对手是十拿九稳。但是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盘我一连输了四盘，这样一来我只好乖乖地承认对手比我高明，同意下让子棋，也就是他让我一只象或一只马，以增加我赢棋的机会。

不过我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通信下棋是我最值得怀念的事情之一。邮递员每次来，我都准时收到他的信，他在信中除了写明棋怎样走以外，总不忘记谈谈他的写作计划。这些信我总共保存了二十封左右，后来在一次搜查中被宪兵搜走了，结果一定是在保安机关里被毁掉了。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下棋这个爱好上也只肯花很少的时间。例如，我记得我是1917年11月底才到彼得格勒的。十月革命时我在外省（在奥尔沙城），我和一批同志在那里尽力截阻当地铁路枢纽站上的许多军用列车，这些军用列车是被推翻的资产阶级政府的追随者从西部前线开过来支援克伦斯基的。我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第二次出国侨居的时候起就没有见过他，因此可以想象我是多么迫不及待地想见到他，我得到了伊里奇的同意，允许我在斯莫尔尼宫同他会见十至十五分钟。

必须把无数的思想都塞进这十五分钟的谈话里；但又担心这么短的会见时间一眨眼就会过去，在这一点时间里什么有意义的话都来不及说。真的，嘴上只说了一些问候健康等等无关紧要的话，而眼睛倒是没有白费时间，一个劲儿地瞧着伊里奇亲切的面孔，那上面反映着他经受的不安，他度过的不眠之夜，他对“胆大妄为的”“逆天行道”事件的重大责任感，以及他所感到的革命的喜悦。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我开玩笑地问，“我们来下盘棋，怎么样？还记得从前吗？”

我的天啦，我的话竟引得伊里奇哈哈大笑起来！他的眼睛不再向远处望，而是习惯地露出调皮的眼神，紧瞅着我这个如此“及时地”想到下棋的怪人。

“不，”他笑了一阵，稍稍平静以后终于用严肃的口气说。“现在顾不上下棋了，大概再也下不成了。”

现在我再回过头来谈我们在米努辛斯克流放时的事情。

当时面临着一个同伙不知耻的“经济主义”作斗争的问题，“经济主义”是源出于国外伯恩斯坦主义的本国机会主义的变种。“工人思想派”一类的“经济主义者”（他们在党内的外号是“青年派”，自称是替换“老年派”，也就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领导的这一派的思想家）嚣张透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从姐姐安娜·伊里尼奇娜那里得到了一份“青年派”的纲领草稿，作者是臭名昭著的库斯柯娃（也可能是同普罗柯波维奇合写的）。库斯柯娃未得到同伙的正式委托就发表这种纲领，这无关紧要。但伊里奇得到的这个文件却极为充分并相当典型地表达了“经济主义者”在政治方面颇为无知的“信条”（这是安娜·伊里尼奇娜给这个文件定的名称）。

伊里奇立即写信同在米努辛斯克县流放的社会民主党人联系，并确定日期在叶尔马科夫斯科耶村聚会，以便集体拟定反对俄

国伯恩施坦主义者这一“信条”的抗议书。关于这次聚会的地点、时间和签署《抗议书》的“代表”人数，在许多回忆文章里已经叙述得相当清楚，我在这里就不提了。

我们的流放期终于快满了。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迫不及待，显得很高兴，很兴奋，抓紧每一天、每一个小时做好长途跋涉的准备工作，流放期刚满，在1900年2月，他就动身回俄国去了。

克尔日札诺夫斯基一家和斯塔尔科夫一家也同他一起走了。只有我同我妻子因为我们的小女儿生病没法走，我们怀着难过的心情送别了离去的同志，仍然留在原地。直到1900年夏天我们才回到欧俄。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委派”我在普斯科夫做未来的《火星报》的代办员，我从莫斯科出发去普斯科夫的路上绕道到波多尔斯克去看望伊里奇（这是1900年6月中旬的事），为的是从他那里得到确切的指示，以便去完成党交给我的新任务。

在这以后的三年时间里我都没有见过列宁，只是用通信的方式，用向《火星报》写通讯稿和汇报我们这些火星报“代办员”的工作的方式同他保持着联系。

直到1904年初我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才又一次见面，那时我不想到边远的亚库提亚的那些鬼地方再去呆六年，就从米努辛斯克（在对我作出判决以前，先把我送到了那里）逃到了日内瓦。

在日内瓦我只知道普列汉诺夫的地址，一到这个城市，我就从火车站直接上他那儿去了。他待我很客气，请我喝奶油咖啡，但是在谈话当中一下子把我弄懵了，真所谓是晴天霹雳。

“哎，老弟，你大概还不知道代表大会以后在我们这儿大干过一场吧，那两半人都快要把对方吃掉了，他们都快要只剩下尾巴了。”

原来是造化弄人，我到的不是自己人那儿，不是列宁那儿，而是敌人的营垒，因为普列汉诺夫虽然冠冕堂皇地扬言他不介入战斗，并且还给自己提出了拉开狂怒的“战斗者”的艰巨任务，但事实上他已经完完全全倒向“街垒的另一边”去了。

每一个到国外来的人都成了孟什维克“纠缠”和“引诱”的对象。唐恩和马尔托夫下最大的工夫要使我确信，代表大会上使党面临分裂危险的不幸事件是列宁引起的。这两个朋友抢着用代表大会期间生活方面的许多奇闻来“开导”我，争先恐后地（完全象果戈里的不朽名剧中的鲍勃钦斯基和多勃钦斯基那样）拚命要尽快把我“变成自己人”，使我的声音也加入孟什维克头头们的大合唱。

他们刚走，又有人来敲门了，原来是彼·阿·克拉西柯夫。他笑我一到这里就跌进了孟什维克的怀抱，接着便开始让我了解这场激烈斗争的来龙去脉。

“干吗还在这儿唠叨呀，现在就一起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那儿去。他很快就会使您搞清楚的。”彼得·阿纳尼也维奇终于醒悟过来。

这一来我又见到了伊里奇。他面容憔悴，显得疲惫不堪。

他问我近况如何，现在家在哪里，还问了其他几个问题。

最后还是克拉西柯夫说出了来意：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我把这个汉子带到您这儿来，是让您来给他消除疑团的。”

“这干什么呀？”列宁笑了笑。“让他自己去搞清楚好了。有印好的会议记录。让他仔细读了以后去作出自己的结论。”

他的建议是最明智不过的。

从此以后我一生都在布尔什维克的行列之中。

代表大会以来孟什维克们一直以无政府主义的行动来反对党

和它的代表大会的决议，这种极其恶劣的做法常常使列宁不得不报以苦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1904年2月初写成的《告全党书》中对孟什维克这种冒充内行、蛮不讲理、篡权夺位的行径有一段令人不快的叙述，主要谈到孟什维克的头头们经常提出最后通牒要把他们的追随者补选到党的所有中央机关里去，而这样做是完全违反第二次代表大会明确表达的意志的。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告全党书中写道：

“《火星报》提出补选中央委员的问题以后，这个希望（指缓和党内危机——潘·勒·注）也破灭了。我们认为重新再在我们感到厌恶的争夺席位的问题上讨价还价，已经不可能了。如果实在没有其他办法，而少数派又非是最高职务，就不能在党内工作，我们甚至宁愿把所有的指挥棒都交给他们。随着我们运动的这种新的使人厌恶的病症变成宿疾，随着这些细小得使人无法容忍的琐碎争吵变成持久的争吵，我们采取这种步骤的决心也就越来越大。

“但是，我们首先要知道全党比较肯定的意见，我们要考虑革命者特别是俄国革命者的舆论。”^①而这一点正是孟什维克的头头们最最害怕的。

关于召开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思想早在1904年初就在伊里奇的头脑中酝酿成熟了。所以他对1904年1月底召开的党总委员会的例会寄予很大的希望。并不是说他指望总委员会在起草决议时能顺顺当当，——他清楚地知道，三个孟什维克（普列汉诺夫、马尔托夫、阿克雪里罗得）在每一个问题上都要恶毒地欺压两个布尔什维克（列宁和林格尼克），布尔什维克的任何一个提案在总委员会里都不可能得到通过的机会。因此，列宁每次到总委员会去，总是使自己的神经早有准备，以便对付尖酸刻薄、刁钻古

^① 《列宁全集》第7卷第178页。——编者注

怪的马尔托夫和妄自尊大、目空一切的普列汉诺夫对他的种种嘲弄。对列宁来说，重要的是去取得书面材料，孟什维克的首领们在党总委员会里的发言，——取得这些材料是为了动员党内的舆论，是为了进行争取召开新的代表大会的宣传。

对于布尔什维克这一方来说，党总委员会的书记员问题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列宁和林格尼克坚决反对勃鲁缅菲尔德来当书记员，理由是他的保密观点差，又往往不能控制感情。

列宁和林格尼克提贝奇科夫为书记员候选人（我出国用的假护照上写的姓名是贝奇科夫，在国外有一段时间我就用了这个别名）。

普列汉诺夫表示可以同意贝奇科夫作为“你们方面”也就是总委员会布尔什维克成员方面的书记员，但他要代表编辑部提费·伊·古尔维奇（即唐恩）为候选人。列宁和林格尼克也反对唐恩，反对的理由是唐恩对中央委员会的态度令人不能容忍，布尔什维克一方正打算在总委员会里提出关于唐恩的行为的问题。

列宁在协商书记员问题时给普列汉诺夫写信说：“……我们也注意到总委员会的作用在于求得统一和一致（而不是散布分裂和争执），所以我们立即提议让一位从未参加过争执也不为另一方所反对的人来当书记。”^①

列宁在挑选书记员方面如此谨慎是什么道理呢？道理很简单：列宁把记录看成可以向全党说明真相的文件，因而总委员会内双方进行辩论时谁来作记录的问题，对他来说是个头等重要的问题。而对于普列汉诺夫和总委员会内坚决不让发表总委员会会议记录的另一名孟什维克成员来说，没有多大关系。他们说，记录反正放在党的档案里，书记员用自己的笔在记录上怎么记，无关紧要。

^① 《列宁全集》第34卷第223页。——编者注

我作为布尔什维克方面的书记员去作讨论记录的那几次总委员会会议(1904年1月15—17日(28—30日))的情况,我不准备谈了。我可以介绍对此有兴趣的读者去看一看发表在《列宁文集》第十卷(第一八一——二七七页)上的这份记录。记录跟速记下来的差不多,准确地反映了总委员会会议参加者的发言,我本人因此而感到很自豪。但对于那次疏忽我怎么也不能原谅自己,由于我的疏忽,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大为冒火,非常难过。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我把记录整理好,同孟什维克的书记员统一过意见以后,就把厚厚一本记录簿递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去过目和签字。

列宁在自己的发言记录上作了些修改和补充以后签了字。林格尼克也照此办理。剩下的事就是让普列汉诺夫、马尔托夫和阿克雪里罗得去签字了。列宁关照我跟这伙人打交道时要特别当心,眼睛不能离开珍贵的文件。

我去找马尔托夫说:

“尤利·奥西波维奇,这是总委员会的记录……是我同某某(孟什维克的书记员)一起搞的,对记录的客观性可以不必怀疑。请签字吧。”

“请把记录留给我,我看一看,明天还给您。”

“不,尤利·奥西波维奇,我非常希望您现在就看……我急于要办完这件事,卸掉责任……您签了字以后我还要去找普列汉诺夫签字哩。”

“我可以代您送给普列汉诺夫和阿克雪里罗得去签字。说实在的,有什么好使您为难呢?……”

“您要知道……记录只有一份……可能搞丢了……我作为书记员要对这个文件的命运负责……”

“怎么会搞丢了呢?!我又不是个好丢文件的马大哈。我跟您

说过,很快就把记录还给您……我可以向您保证,如果您需要的话……要不您还需要什么呢?……”

马尔托夫的保证使我动摇了立场。我交出了珍贵的文件。

我心情沉重地去向列宁汇报。

听说我把记录留在马尔托夫那里“留到明天”,他狂怒起来,在这以前和以后我都从来没有见他这样发过怒。他狠狠地训了我一顿。

“如果您这样孩子气十足,”他冲着我说,“那您干吗来搞严肃的政治工作呢?!”

“马尔托夫给了我保证的呀,”我畏畏缩缩,差一点要哭出来,用压低的声音为自己辩解说。

“啊,请您别说了!……真是天一真一无一邪!……”

亲爱的读者,你们认为怎么样,马尔托夫信守自己的“保证”了吗?不,当然没有。打这以后,他甚至不愿意就这件事跟我说清楚。

我这才弄明白,孟什维克原来是这样的货色,孟什维克的“保证”原来是一钱不值,狗屁不如……

1904年,布尔什维克日内瓦小组决定要把纪念巴黎公社的活动搞得特别隆重。要知道这是我们的节日呀,新火星报分子——孟什维克呢,对它居然没有插手,因为巴黎公社对他们来说算得了什么?!——历史上一个无关紧要的日子,一个微不足道的、一再向全世界证明公社社员本不该拿起武器的小事件。

我们选了一个很大的礼堂来开大会,开会的时候礼堂挤得水泄不通。我们小组责成我当主席来主持大会,根据事先拟定的会议程序,我宣布开会后应该作一个关于德国1848年革命的讲演。我是个蹩脚的讲演家;我只是象小学生一样,在两千听众面前复述马克思的思想。我记得在我讲到一个什么地方的时候,伊里奇突

然抬起眼睛看着我，我从他的眼神里看出我的话出了问题。显然，是我讲走了火，使伊里奇听起来很刺耳。我窘态毕露、灰心丧气地把讲演草草收了场，只听到几下少得可怜的掌声，接着我就赶紧请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发言。他这时正是心情舒畅，觉得能够全神贯注地谈谈巴黎公社的事迹，把日内瓦的纠纷，补选事件的争吵，马尔托夫的歇斯底里大发作，唐恩卑鄙齷齪的政客手腕，妄自尊大的自大狂托洛茨基的发狂，阿克雪里罗得的学究式的预言，把这一切哪怕忘掉一小时也是高兴的事。

大会结束后散场时，我亲耳听到几个普通的孟什维克对列宁的发言作出了这样的反应：

“是啊，这才是真正的领袖哩！唉，我们要有这样的领袖就好了！”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写完小册子《进一步，退两步》以后觉得非常需要休息，就立即同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一起背上背包，到山里去作徒步旅行了。

我们这些普通的布尔什维克本能地觉得，根据当时派别斗争的情况，用孟什维克拿手的“拳击”法去回敬孟什维克是合适的。他们可以在新《火星报》的版面上嘲弄我们，我们自然也可以用辛辣的玩笑、杂文、漫画去回敬他们！

《火星报》竟然骂国外的布尔什维克是白白取得党员称号的人。利亚多夫忍不住写了一封公开信给普列汉诺夫（说实在话，这封信是我们所有的人在一个咖啡馆里集体写的——就象列宾油画中的查坡洛什人给土耳其苏丹写信那样），这只被激怒了的狗熊便从熊窝里爬出来，用狂吼“吓唬人”：“我，下面署名的坦波夫贵族，格奥尔基·瓦连廷诺维奇·普列汉诺夫……”我们这帮人马上同声应和：“坦波夫的贵族万岁！快给坦波夫贵族让路！”

不过不知疲倦的杂文作者穷戏迷（奥里明斯基）对于孟什维克

来说才是最厉害、最受不了的讽刺家，所有研究我们党的历史的人都知道他当时在文坛上的地位。

在这场同孟什维克进行的笔战中，笔者也发现自己有一点特长可以利用。

在1904年6月1日《火星报》第六十七号的附刊上发表了尔·马·(马尔托夫)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前进还是后退?》，副题是《代悼词》。在这篇文章中马尔托夫赌输了装笑脸，硬说列宁的《进一步，退两步》是无的放矢(其实这本小册子的出版使新火星报分子怕得要死)。

我小时候喜欢给老师画漫画。现在我又重新拿起了画笔。马尔托夫妄想从政治上埋葬列宁的那篇《代悼词》使我想起了老鼠埋葬捆住爪子的猫。过了半小时，漫画《老鼠葬猫》的草图就画好了。收到了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效果。列宁看到画笑得前俯后仰，要我用石印版把我的《老鼠》印出来。

打这以后，我陆续画出来的画全都征求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意见，并得到他的批准，才用布尔什维克会计处的经费印出来，看来他是赞同我们用穷戏迷辛辣的讽刺文章和奥林-勒柏辛斯基的漫画等方式去同孟什维克进行斗争的，不过他要求我们不要超出政治抨击的界限，不要去庸俗地嘲讽对手的私事。例如，我记得，当他笑着欣赏我那张已经准备用石印版去复印的老鼠画时，突然收敛住笑容，皱起眉头对我说：

“奥林同志，‘给我喝点克非尔^①吧’这样的暗示有什么政治意义呀？这个地方一定要改一改。”

事情是这样的：在组画《老鼠葬猫》的第三部分，有一只面孔象阿克雪里罗得的老老鼠，被一跃而起的猫捉住，已是奄奄一息，我

^① 一种用发酵牛奶做的饮料。——译者注

在它的嘴边写了一句垂死挣扎的话：“给我喝点克非尔吧”，暗指巴维尔·波里索维奇·阿克雪里罗得在瑞士开设过一家赖以生存的克非尔饮料店。这个愚蠢的暗示使伊里奇听起来非常刺耳，因为它有失分寸又毫无政治意义。我窘得要命，赶紧改正了这个错误。

我们特别恨小册子《我们的政治任务》的作者托洛茨基，这个性急的叛徒在这本小册子里诋毁旧《火星报》，说它是为资产阶级激进派知识分子办的民主主义报纸，并且对列宁极尽造谣污蔑之能事。因此，我在我的政治漫画中特别喜欢画托洛茨基（他外号巴拉莱金^①和妄自尊大的自大狂），有时把他画成一只在即将复活的猫的尸体旁边弹着三角琴大跳康康舞的老鼠，有时把他画成一个根据“大人”（警察分局局长）的吩咐吊在电话机上的小警官，诸如此类。

《进一步，退两步》出版以后，列宁在日内瓦召开了一次有二十二个同志参加的会议，为的是在这次会议上制定一个以争取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为口号的布尔什维克行动纲领。^②

布尔什维克的事情进行得很顺利。他们筹办了自己的机关报，建立了自己的事实上的中央（多数派委员会常务局），把党内所有观点正确的同志团结在自己周围，为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作准备。与此同时，孟什维克却愈来愈败坏自己的名声，他们在策略问题上的机会主义谬论发展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

秋天，1904年11月，有一次，我们日内瓦的布尔什维克接到了某日在奥林饭店（一个充当我们党的俱乐部的地方）聚会的通知。饭店立刻热闹起来。日内瓦布尔什维克小组全体成员都来了。列宁也来了。

^① “巴拉莱金”在俄语中是“三角琴手”的意思。——译者注

^② 关于二十二个布尔什维克会议，请参看由弗·伊·列宁起草并在这次会议上通过的《告全党书》（《列宁全集》第7卷第447—454页）。——编者注

我们已经很久没有见到他这样笑逐颜开了。他有时高兴得搓搓手，有时格格格地笑几声，眼睛是从前的、真正伊里奇的眼睛，洋溢着快活的幽默，也闪烁着讥刺的光芒。他的模样活象一个追捕珍禽终于捕捉到手的幸运的猎手。

事实上也正是如此，这一次他在孟什维克发表非常典型的机会主义谬论时捉住了他们。《火星报》编辑部发表了仅供党员阅读的给各党组织的信，信中叙述了他们的著名的“宴会上的”地方自治派运动的计划。我不打算在这里复述这封信和列宁对这封信的答复《地方自治派的运动和〈火星报〉的计划》^①的内容。党完全可以确信，往后更是愈来愈有理由确信，孟什维克除了同党的多数派在组织问题上有分歧而外，还另有新的分歧——在策略问题上的分歧，关于这一点弗·伊·列宁立刻就加以揭露了。

载于《回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第1卷1956年莫斯科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版第141—149页

^① 《列宁全集》第7卷第488—507页。——编者注

关于伊里奇

罗·萨·捷姆利亚奇卡

要完整地谈论伊里奇，那是十分困难的，尤其是想通过他一生中的某些并不连贯的事件来谈论他则显得更难。他是由一整块钢铸成的坚韧不拔的人，在他身上有着整个无产阶级的统一意志和智慧。他的思维的钢铁般的逻辑性，他的一举一动所表现出来的意志的连贯性，这位伟人整个一生的协调性，都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

我对列宁最初的回忆，要追溯到我们党的《火星报》时期。1901年，我在敖德萨担任《火星报》代办员，曾被召去国外，不知是到苏黎世，还是到伯尔尼去汇报《火星报》在敖德萨开展工作的斗争情况。那时，最使我感到惊讶的是，伊里奇对一个新来的人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无微不至的关怀和体贴。他在考察您，却又使您感到他的独特的委婉和亲切。后来我又清楚地了解到，伊里奇是怎样窥测他思想上的论敌的；他不仅善于击退向他进攻的敌人，而且也善于摆脱一切萎靡不振、动摇不定以及在战斗的烽火中往往会比敌人造成的损失还要大的一切东西。

我回忆起在伊里奇家里喝茶和进餐的那间无比整洁的厨房。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一面忙着做家务，一面迫不及待地向我多方询问俄国的情况，仔细地了解斗争中的每一个细节。

我个人同列宁初次会面的情景，至今犹历历在目。当他提出

两三点意见后，组织问题上斗争的前景就在我眼前豁然开朗了，最模糊不清的斗争形式也变得具体了。那时我就认识到，伊里奇对工人运动了解得多么透彻；在这个基础上，他对革命斗争的伟大前景作了多么精辟的预言。

在第二次代表大会前夕，由于我在叶卡特林诺斯拉夫的工作遭到失败，不得不逃离那个地方，第二次来到列宁那里。这一次我和伊里奇在一起的时间不长，因为我和谢·伊·古谢夫被派往布鲁塞尔去做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了。但是，那几次会议（伊里奇在会上给我们阐述了代表大会工作的实质）清楚地表明了不可避免的分裂景象。由于我们明确地认识到代表大会对党的重要性，因此在这短短的时间内我们的生活显得十分紧张。那时，在我们未来的敌人中间正在酝酿着一条路线，这使伊里奇感到十分担忧。为了使我们的队伍能及时作好迎接即将面临的斗争的准备，他以特有的顽强的干劲去做组织工作，解释工作，说服工作。只有后来在政治舞台上出现了取消派和召回派的时候，我看到他又是那样的操心。

在那些日子里，伊里奇对我来说不仅是一个亲切、殷勤、和蔼的同志，而且他十分注意俄国的现实生活提出的问题。在代表大会前夕的那段时间里，伊里奇对一切萎靡不振、动摇不定的东西进行了严厉的抨击，以他那钢铁般的逻辑力量的大锤严加抨击，这样，使布尔什维克的观点和布尔什维克的始终如一和坚韧不拔的精神得到了锤炼。谁也不会象列宁那样善于无情地指出一切对革命有害的或者是不利的东西，同时又极为认真地、坚持不懈地去解释、证实和汲取一切有生命力的、为斗争所必需的东西。

我记得，伊里奇的演说曾经给我们的敌人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他们对伊里奇的驳斥所作的回答软弱无力，这说明伊里奇钢铁般的、无可批驳的逻辑力量使他们的思想都凝滞了。在第二次

代表大会上崩得分子和孟什维克对我说过，后来伊里奇的其他论敌也对我说过，在伊里奇作了简单明了的发言之后，他们需要有一段时间用来重新组织在他发言时被打乱的思路。

第二次代表大会原先是在布鲁塞尔举行的，但当局动用警察迫使我们迁移了。于是我们来到伦敦。我已记不清楚，是在去伦敦途中还是从伦敦去日内瓦途中，我们在海上遇到了风暴。轮船象一片叶子一样在海面上颠簸不定。我和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晕船晕得很厉害。伊里奇把他那顶常戴的帽子低低地压到前额，在甲板上踱来踱去，不时地向船舱内张望，想了解我们的身体状况。有一个同志说，伊里奇只不过是在硬撑着，实际上也是需要躺下的。他听了这话非常生气。不知是同一次还是在另一次旅途中，也是轮船在摇晃时，我看见他站立在甲板上。我们都按照英国人的习惯被拴在圈椅内，用方格毛毯裹着身子，而伊里奇则坚决拒绝这种做法。此刻在我眼前又出现列宁那结实的体形，他在同风浪搏斗，偶尔还向水手问些什么。

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前不久，党内分裂已成为不可避免的事实，就连广大党员群众亦已看得一清二楚。这一时期我退出了中央委员会，因为这届中央委员会在加尔佩林（小马）、约·费·杜勃洛文斯基（英诺森）和列·波·克拉辛的压力下，在维尔诺会议上采取了调和的立场。后来我被召到日内瓦去参加会议。我同党员群众保持着相当密切的联系，所以对严密的组织工作和果断的行动还是心中有底的，然而我到日内瓦去的时候多少有点为自己的行动感到胆怯，生怕伊里奇会批评我过于任性地擅自退出中央委员会。尽管伊里奇身在日内瓦，但他却能对远方的情况作出正确的判断。召开这次会议的目的完全是为了弄清楚自己的力量和打算成立多数派委员会常务局。伊里奇大大地鼓舞了我对胜利的信心。几天之后，我又满怀信心地回俄国去了。虽然在我回国之前

调和派分子已经到各地委员会去游说过，但这些委员会都相继表示同意二十二人的决议，这个决议是在日内瓦会议上通过的，它对俄国各组织的态度了如指掌。在日内瓦小组会议上打算成立的多数派委员会常务局终于付诸实现了。几个月之后，我们在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上获得全胜，这说明，群众是无条件地跟随布尔什维克走的。

1906年3月底，我们因莫斯科组织案被监禁在狱中的时候，得知伊里奇来到莫斯科的消息，大家万分高兴。因为我们知道，十二月起义之后有些同志悲观失望，列宁一定会鼓起这些同志的士气的。然而我们大家立即缄默起来，不走出牢房，相互间都不敢说我们每个人在内心深处多么为列宁担心。有一次会议被破坏了，列宁险遭逮捕，不记得是伊里奇安全地离开了开会地点，还是他还没有到达会场。要是他被捕，一定会使组织陷于绝望的境地。

我想谈一谈1907—1908年后的困难时期来结束对伊里奇在地下活动时期的回忆。那时是取消主义和召回主义时期，知识分子脱离党的时期，以及存在其他困难情况的时期。1909年末，我不得已离开巴库前往巴黎，当时巴库的工人群众在同灾难深重的年代进行殊死的斗争中已经找到了出路。伊里奇听我谈到巴库的情况，谈到巴拉汉内工人正在逐步明确如何肃清取消派分子，以及斯大林组织大家摧毁了孟什维克从而保证了布尔什维克的胜利。他听了非常高兴。然而我却从未见过伊里奇象当时那样的焦虑，那样的消瘦。孟什维克的诽谤，许多亲近者的离去，以及从俄国传来的坏消息使他过早地衰老了。我们这些十分接近他的人心疼地眼看这位巨人的背向前弯曲了，体力衰退了。巴黎的侨民对他进行诽谤，使他的周围只剩下为数不多的几个人。

列宁尽管体力减退了，但他仍然以同样坚定的信心和热情继续进行解释、证实和劝说，丝毫也没有动摇对工人阶级未来的胜利

所抱的信念。由于过度疲劳和心情沉重,我得了重病,于是准备回俄国去。那时我深深地体会到伊里奇对患病同志的关怀。十月起义胜利后,列宁成为苏维埃国家的领导人,许许多多的同志也都切身感受过这种无微不至的关怀。

当我动身回俄国的时候,伊里奇谆谆嘱咐我说,在今后的工作中应该万分重视同知识分子的联系。可是我痛苦地意识到,健康状况已不允许我做比较基层的工作了。不过,后来我认识到,这是党面临的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

我还想谈一谈伊里奇的一个非常突出的优点,那就是他对人有异乎寻常的鉴赏力。

1918年,伊里奇突然来到莫斯科河南岸区(在莫斯科)。各企业的党代表聚集在那里。他们绝大多数是工人,当时讨论了组织征粮队的问题。我在作报告的时候,觉察到大厅后边有人在走动,但并没有引起我的注意。忽然响起了一阵雷鸣般的掌声。伊里奇悄悄地走进会场,已在一个角落里坐下,但是人们还是把他认出来了。

当开始对报告交换意见的时候,出现了非常动人的场面。工人们感到有自己的亲人、无限敬爱的人在场,于是争先恐后地要在他面前倾诉自己的心里话。他们的发言非常有意思。然而知识分子(当时他们在莫斯科河南岸区相当多)却胆小怕事,他们的发言反而比平时大为逊色。为了一字不漏地听取工人们的发言,伊里奇往前坐近些,用手撑着一只耳朵;同时他还轻声地同我交流感想和看法,并要求我把他认为适合担任征粮队领导工作的工人的名字记下来。顺便提一下,伊里奇在那次会议上特别注意到一位做面包的老工人,这个工人有条有理地叙述了他对组织征粮队和跟农民的相互关系的看法。后来,这位同志在粮食战线上做了大量工作,最后以身殉职——在一个乡村里富农把他折磨死了。莫斯

科河南岸区的面包工人用这位丘奇科夫爷爷的名字来命名自己的一个工人俱乐部。

伊里奇离开会场的时候，感到特别满意。我送他出去时，他对我说，他已经很久没有感到这样心情舒畅了。

1918年末，我第一次从前线（北方战线）回来，迫切希望向伊里奇汇报一下对前线的感想，谈谈才组织起来的红军的情况和前沿地带的生活情况。伊里奇向我提了几个问题之后，就谈了他对前线形势的看法和对前景的估计；他谈得那么清楚，仿佛他曾经到过前线，而我一直呆在莫斯科似的。

载于1940年4月22日《真理报》

第112号第4版

弗·伊·列宁在伦敦

(1902—1903年)

尼·亚·阿列克谢也夫

1902年2月底或3月初，我收到了尤·奥·策杰尔包姆(马尔托夫)从当时出版《火星报》的慕尼黑寄来的一封信。信中说，由于某些缘故《火星报》继续在德国排印已不适宜，因此，如果有可能在英国社会民主联盟的印刷厂排印报纸，编辑部就打算迁往伦敦。他要求我就此事的可能性同英国社会民主联盟周刊《正义报》的编辑哈利·奎尔奇同志进行谈判。在他的信中还附了维·伊·查苏利奇给奎尔奇同志的一封信，这是为我进行谈判用的类似委托书这样的东西。第一次同奎尔奇同志会晤就有了结果：如果我们自己有排字工人，尽管《正义报》印刷厂的厂房狭窄，在那里排印《火星报》还是有可能的。

我当即把谈判结果告诉了尤·奥·策杰尔包姆，后来我接到通知，说火星报的人员在短时期内将陆续迁移到伦敦。弗·伊·乌里杨诺夫也给我写了一封同样内容的信(在这以前，我还没有直接认识他)。信中说，凡是寄给我并转雅科布·里希特的信件，都是写给他的。^①不久，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同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一起来到了伦敦。尤·奥·策杰尔包姆大约过了两个星期才

^① 作者提到的弗·伊·列宁的这封信至今未找到。——编者注

来，是在巴尔马晓夫暗杀内务部长西皮亚金的前几天到达的。有一天早晨，我顺便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那里把这一事件告诉了他，他说：“干得倒利索”。众所周知，这一事件成了《火星报》同社会革命党人就恐怖手段这个问题展开激烈论战的一个原因。

大约有一个多星期的时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和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住在一间所谓的“卧室”里，在伦敦有许多这样的“卧室”，都是由一些并不富裕的房东转租给别人的。后来他们在离市内铁道的金兹-克罗斯路车站不远的地方找到了两个不带家具的房间。为此，他们不得不买了一套最简单的家具（两张床，几张桌子，几把椅子和几个普通的书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和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就在这两个房间里一直住到《火星报》迁往瑞士为止（1903年春）。我记得，他们房间里过分简陋的摆设曾引起女房东的怀疑。特别使她感到不安的是窗户上不挂窗帘，于是她坚决要求他们一定要买几块窗帘，否则她跟房主之间就会发生不愉快的事，因为房主要求这幢房子的所有住户都得有一定的排场。使约女士（女房东姓约）感到更为不安的是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的手上没有订婚戒指。有人向她解释说，她的房客是一对完全合法的夫妻，如果她把没有戴戒指解释为不体面的行为，那么她就有为诽谤他人而受到法院制裁的危险，这样一来，她才不得不迁就了。向约女士作解释的并不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和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而是康·米·塔赫塔烈夫，他的妻子（即已故的阿·亚·雅库波娃）同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是好朋友。作了这番解释之后，约女士才放下心来，对房客的摆设也就不再疑神疑鬼了。

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自己料理简单的家务，如买食品，用火油炉做饭，洗地板等。过了一些时候她的母亲也来到伦敦，从此家务劳动有所减轻，然而老母亲却觉得住在异国很不自在。弗

拉基米尔·伊里奇来到伦敦之后就对我说，其他火星报的人员将过公社生活，而他根本无法在公社里生活，他不喜欢老是跟别人在一起。他估计，从俄国和国外来的同志们都将按俄国的习惯生活，而不考虑他的时间，因此他感到厌烦，要求尽可能让他避开一些过分频繁的来访。

那时，《火星报》编辑部由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尤·奥·策杰尔包姆、维·伊·查苏利奇、格·瓦·普列汉诺夫、巴·波·阿克雪里罗得、亚·尼·波特列索夫组成，但迁居伦敦的只有前面三个人。普列汉诺夫和波特列索夫只是来过一个时期。而阿克雪里罗得在《火星报》于伦敦出版期间则一次也没有来过。在离乌里杨诺夫夫妇住处不远的西德茅斯街上租了五个不大的房间，分布在两层楼里：一间作餐厅，另一间是为来客预备的，其余三间是维·伊·查苏利奇、尤·奥·策杰尔包姆和我住的。用煤气灶轮流做饭并不使我们感到特别麻烦。不过有时候我们也在格雷旅馆路上一家大众化的饭馆里填饱肚子。我们公社的陈设十分简朴。西德茅斯街是伦敦的一个贫民窟。我们的邻居都是英国社会的下层群众，尽管我们没有给他们带来丝毫麻烦，但是他们对待我们就象对待一般外国人那样，相当敌视。也许是经常有来到伦敦的同志们住在我们那里，这使他们感到很讨厌吧。英国的房租通常是按星期支付的，而房东却要求我们预付三个月的房租。在第二个三个月的中间他提出要我们腾出房间。公社就此垮了。不过在这以前公社成员对英国的生活情况已很熟悉，往后他们也能单独生活了。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和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在伦敦过着相当孤寂的生活。早在来伦敦之前，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已经仔细研究过伦敦市的地图，他使我这个在一定程度上可自称为老伦敦的人感到惊讶的是，每当我们一起步行到某个地方去的时候

候,他都善于选择最近的路线(从考虑经济出发,我们总是尽量避免使用马车和市内铁道)。未来伦敦之前,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英语已经很好了,但是他决定继续进修提高,为此还登载了一则启事(好象是刊登在《埃塔凯乌姆》周刊上),说“一位俄国法学博士和他的妻子愿意以教俄语的方式来交换学习英语”。启事登出之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和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的家里来了三个英国人,他们既是老师,又是学生。一个是雷蒙德先生,这是一位令人尊敬的老人,他的外貌象达尔文,是有名的“乔治-贝尔世家”出版商行的职员;另一个是公司职员威廉斯;第三个是工人约克。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所认识的英国人大概就只限于这三个人。他有时也到德国社会民主党人麦·贝尔那里去。麦·贝尔是社会民主党报纸的通讯员,后来他写了《英国社会主义史》和其他一些书籍。

当时长住在伦敦的俄国侨民有彼·克鲁泡特金、尼·瓦·柴可夫斯基、弗·沃尔霍夫斯基、切尔克佐夫、阿·尔·捷普洛夫、费·阿·罗特施坦和出版《崩得通报》的一些崩得分子,《崩得通报》是以刊载情报消息为主的经常出版的小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同这些人,特别是那些老侨民是几乎不见面的。不过有两次他不得不在怀特柴泊召开的俄国人大会上发表了演说,而且主要是为俄国籍的犹太工人讲的。第一次他作了批判社会革命党人的纲领和策略的专题报告;第二次是在1903年和其他演讲人(我记得其中有一个演讲人是波兰社会党党员瓦尔斯基)为纪念巴黎公社发表了演说,他的演说十分精彩,可惜没有留下记录。当时在伦敦有一个俄国人的演讲团体,它是在阿·亚·雅库波娃、康·米·塔赫塔烈夫和我的直接参加下组织起来的。在怀特柴泊每周都举行报告会,会上就各种社会问题展开热烈的辩论。无政府主义者、崩得分子、火星派和其他派别的社会民主党人都参加辩论。有一次,我们在

一家啤酒馆租了一个房间，举行了由尤·奥·策杰尔包姆主讲的报告会，题目已经记不得了。这次报告会非常成功，然而散会的时候，我们遭到了酒馆老板的一阵谩骂，他发觉我们这些人原来都不是喝酒的，所以就勃然大怒起来。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每天都因编辑工作和其他事务到公社来半小时至一小时。一些俄国人有时也上我们这儿来。火星报的人员来到伦敦后不久，彼·格·斯米多维奇常到我们这儿来（他曾协助公社安置家具）；他的妹妹印·格·列曼（迪姆卡）住了一个半月。她的丈夫米·尼·列曼一心想用赛璐珞版在俄国印刷《火星报》，并且在伦敦的一家印刷所里用制好的这种版进行了几次试验。常来的还有基辅人阿·普·塔拉谢维奇和弗·姆·萨佩日科。他们竭力主张除《火星报》外再出版一种在论述方面更为通俗的给工人群众看的报纸。普列汉诺夫赞成他们要出版这种报纸的理由，但是编辑部的其他成员都反对，特别是尤·奥·策杰尔包姆。他对普列汉诺夫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是这样说的：他自己反正是什么也不会写的。那时在基辅狱中有一批同志（尼·厄·鲍曼、维·尼·克罗赫马尔及其他一些人）进行了一次有名的越狱行动。这些同志的到来使火星报的人员的生活特别活跃起来。列·格·捷依奇住了相当长一段时间，曾多次向大家公开作过他对西伯利亚的回忆报告。在其他一些俄罗斯人中我还记得的有已故的克拉斯努哈博士和多勃罗沃尔斯基。

我不能不提一下另一个来访者，那就是巴·尼·米留可夫。他那时一心想把所有的俄国反对派都联合起来。我是在费·阿·罗特施坦家里见到他的。罗特施坦除了邀请我之外，还邀请了康·米·塔赫塔烈夫和几个崩得分子，其中我记得有亚历山大·克烈美尔。巴·尼·米留可夫从我那里打听到维·伊·查苏利奇和《火星报》编辑部的其他几个成员都在伦敦后，想同他们见见面，他

抱着这个目的就到我们公社来了。同他谈话的主要有尤·奥·策杰尔包姆和维·伊·查苏利奇。米留可夫指出马克思主义有极大的普遍意义，同时竭力斥责火星报的人员在巴尔马晓夫刺杀西皮亚金之后进行的反对恐怖手段的辩论，他要使我们相信，只要再有一两次成功的恐怖行动，那么我们就得到一部宪法……

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的经常工作是把国内来信解译出来，把寄往国内的信件译成密码。记得我从德文尺牍本里曾抄下来不止十来封信，好让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用密写墨水把密码写在行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经常在英国博物馆的阅览室或在自己家里工作。有时他们到郊外去或者参观伦敦的博物馆。位于南肯西格顿的富丽堂皇的自然科学博物馆并没有给他留下特别的印象，然而伦敦的动物园却使他很感兴趣，比起标本来，他对活生生的动物更感兴趣。有时候也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和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拉去参加英国人召开的会议，我记得他参加过一次爱尔兰的群众大会，当时爱尔兰的领袖约翰·雷德蒙特在会上发表了演说，他还在一个社会主义的半工人性质的俱乐部里参加过一次小型的会议。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是十分珍惜时间的，所以他对来到伦敦的那些不珍惜时间的俄罗斯人不大喜欢。记得他对已故的莱特伊仁(林多夫)每天到公社来非常恼火，莱特伊仁是从巴黎来的，常常到伊里奇那里去，伊里奇在公社里埋怨说：“怎么啦，我们这里过节吗？”

尽管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想方设法节省时间，然而却非常乐意地接受了给俄国侨民工人小组上课的建议，这个小组还是在火星报的人员未来伦敦以前，在我的直接参与下组织起来的。他多次同我一起到怀特柴泊去给小组讲解《火星报》编辑部制订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纲领。他逐字逐句地给工人小组念了这个纲领，详

细讲解每一个单词，对听众的所有疑问都一一解释清楚。这个工人小组按其组织成员来说是个小小的共产国际。参加者中间有俄国籍的英国人罗伯茨，他是一个青年钳工，出生在俄国，并在那里长大，曾在哈尔科夫的黑耳费里希-沙特机器制造厂工作，后来从哈尔科夫来到伦敦；有俄国籍的德国人席勒，他是从莫斯科来的装订工，在《火星报》当排字工人；有从敖德萨来的木雕工人塞加尔；有从彼得堡来的加工精密机械的钳工米哈伊洛夫以及其他一些人。后来几乎所有这些人都回到俄国去了，在党组织里工作。

有一次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谈话的时候，我嘲笑了伦敦《正义报》周刊上刊登的一篇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就要来临的文章（《正义报》不管适时与否总喜欢作类似的预言）。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我的讥讽很不满意。他坚定地说：“我倒希望能活到社会主义革命胜利那一天”，并且还对怀疑论者加了几个不好听的形容词。

自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小册子《怎么办？》问世以后，火星报的人员开始发生了分歧，后来就导致1903年第二次党代表大会上的分裂，不过这种分歧当时还没有超出编辑部的狭小范围。看来是由于编辑部的这些分歧而成为《火星报》在1903年春迁移到瑞士去的原因。当时格·瓦·普列汉诺夫和巴·波·阿克雪里罗得常住在那里，但他们很少在《火星报》上发表自己的文章。分裂以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从日内瓦给我来信，对瑞士的气氛很不满意，他说：“我一个人反对迁离伦敦是事出有因的。”

载于《无产阶级革命》杂志 1924 年
第 3 期第 148—154 页

回忆列宁

(片断)

尼·列·美舍利亚科夫

我是在1902年的春天认识列宁的。1901年夏末，我到国外去，想在比利时的一个大学里修完电气课程，并想先休息一番，因为在这以前我在工厂的工作很紧张，感到十分疲劳。为此我来到了瑞典。在什皮兹我遇见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姐姐安娜·伊里尼奇娜，通过她很快就同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取得了通信联系。我和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是九十年代的老朋友。我们在彼得堡因工作关系经常见面，尽管那时我们参加的是不同的革命阵营，她是热忱而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而我还在民意党组织里工作。我同她经常争论不休，然而也正是这些争论使我们彼此接近了。1901年，我参加了社会民主党国外同盟，在反对聚集在《工人事业》杂志周围的经济派的斗争中，列宁曾设法利用过这个组织。我就在比利时住了下来，并担任同盟在比利时的代表。

如同《火星报》的其他编委一样，那时列宁也住在慕尼黑。马尔托夫、维拉·查苏利奇和帕尔乌斯也都住在那里。他们都深信，德国南部的这个不大的城市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因为俄国人还从未在此地建立过革命组织。但在慕尼黑有许多俄国大学生，这一点却被忽略了。大学生知道市内住着几位大革命家，就对他们发生了兴趣，于是在火星派分子的后面总是尾随着大学生。每当

火星派分子到饭馆或者其他地方去，大学生就跟在他们后面。大学生的这些行动当然也引起了警察的注意。这样一来，火星派分子不得不放弃慕尼黑这个较小的城市；在那里每一个多少有点名气的人大家都会知道他，必须选择另一个地点，那里可以隐没在普通的居民中间，警察也比那个实行君主制度的德国较少地追踪他们。这个地点就选中了伦敦。1902年春，所有火星派分子都迁移到那里，在他们路过比利时的时候，就在我居住的那个城市暂作逗留。

在这以前，我不仅没有见过列宁，而且连他的相片也没见过。记得我初次遇见他的时候，曾感到大失所望，因为我所见到的远非是个理想的人物。他有一张最平常的俄罗斯人的脸庞，略带一点东方色调。在这张脸上唯一能使人感到惊讶的是他那双无所不见、洞察万物的眼睛。

这次在列日的会见一共有两天时间，然后我们同往布鲁塞尔。

我们到达布鲁塞尔的时候，正值那里发生小规模革命风暴。那是一种为争取普遍选举权的斗争，是国外的革命者所能进行的规模有限的斗争。来到布鲁塞尔之后，我陪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参观市容、工人党的机关以及那里一个有名的合作社等几处地方。我们从那个合作社出来的时候，突然看见一群一群的工人。他们是革命风暴的参加者。参加游行示威的群众队伍正在集合。他们遭到警察的驱赶后，就立即东奔西逃，因为工人党的领袖们千方百计地把工人限制在恰如其分和循规蹈矩的框框里。

举行了罢工，但它并未形成总罢工。列宁看到这群工人后立即活跃起来，流露出要参加游行的迫切心情。我几乎不得不一把抱住他的脖子来设法阻止他的行动。恰巧这时路旁出现了警察，他们把我们同人群分开了。列宁在布鲁塞尔耽搁不久后就到伦敦去了。

在这以前不久，普列汉诺夫也到过布鲁塞尔，我同他一起在比利时各地跑了一下。他酷爱美术作品。每当革命者的会议一结束，他就拖着我去参观画廊。记得他来到列日后就向我询问某个画家的一幅名画。虽然早先我在列日住过四年左右，但我既不认识那个画家，也不知道那幅名画。列宁对这些东西则不感兴趣，他把全副精力都倾注于工人运动之中。

当年根据保安机关保存的档案出版过《布尔什维克》一书的茨亚弗洛夫斯基告诉我，他在翻阅 1917 年保安机关保存的档案材料时，发现有关列宁的两份案卷。其中一份案卷里存有一个宪兵在边境上填写的列宁带往国外的书籍清单。从这张书单上可以看出，列宁只带了两本文艺书：涅克拉索夫的诗集和歌德的《浮士德》。其余都是一些有关经济方面的书籍。

* * *

1902年秋，我们在伦敦第二次会面。那时我已修业完毕，正要回俄国去。为了听取对今后革命工作的指示，我就前往伦敦。这次会面的时间很长。我就住在离列宁的住处只有几步路的地方。在两个星期中，我同他每天都见面，有时甚至一天见面几回呢。

众所周知，无论是在国外或者是在俄国，列宁的生活方式都很简单。他的生活异常俭朴。他爱整洁，他的办公室和房间总是很整洁。举例来说，马尔托夫的房间就绝然不同，那里总是乱七八糟，毫无秩序，烟头和烟灰到处乱扔，食糖和烟草混放一处，因而，每当马尔托夫请来访者喝茶，客人们取糖的时候往往难以下手。维拉·查苏利奇的住处也是同样的凌乱不堪。与此相反，列宁那里一切都井井有条，房间里的空气始终是新鲜的。虽然那时他还没有禁止别人抽烟，不过，要是有人在他房间里抽烟，他就皱起眉头，打开气窗，总要现出很不满意的神色。列宁在伦敦的生活非常单调。每天早晨起床后，他就到英国博物馆去看书，然后到小饭馆去

吃午饭，饭后同查苏利奇、马尔托夫、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一起商讨问题，尔后回家去，整个晚上又埋头于工作。

回国后，列宁仍然过着俭朴的生活。这是什么缘故呢？也许列宁生来是个禁欲者？不，按本性说他并不是这种人，也不可能是这样的人。无产阶级进行斗争是为了使生活更美好、更富裕、更充实，是为了使人们能够享受一切生活福利。具有广泛的爱好，那是列宁的一个特点。他把经济方面的书籍带往国外的同时，还把涅克拉索夫和歌德的作品也带去了。列宁爱好诗歌，他非常喜欢普希金，津津有味地阅读他的作品。他也非常爱好音乐。为了听音乐，为了能在一个小时内欣赏一下优秀音乐家的演奏，有时他甚至可以放下工作，他身边的人也就利用这一点来使他稍为休息一会儿也好。他爱好打猎，是个打猎迷。他爱大自然的一切，特别喜爱在瑞士山间远足。他是一个好棋手，下棋时甚至不看棋盘。我同他曾在哥尔克一起度过两个夏天。我们偶尔也玩击棒游戏。那时列宁是苏维埃人民委员会的主席，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领袖，甚至也爱玩这种普通的游戏。

布哈林总是同我们一起玩击棒游戏。列宁打得不怎么好，而布哈林是我们那里打得最好的一个，比起写作工作，他似乎更以此为荣。列宁总是挖苦地取笑他。常有这样的事：要是布哈林没有击中，他的木棒总是从左边飞过去；列宁就说，那是因为布哈林还没有抛弃左倾共产主义的缘故。

* * *

我在国外呆了一年之后回到俄国。不久，在莫斯科被捕，坐牢一年后又被流放到雅库茨克。那里没有什么重要的革命工作，因此也就没有跟当时担任《火星报》秘书的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恢复通信联系。

我在雅库茨克山村的时候，有一回收到一封国外来信。信末

的签名根本不熟悉。但我根据笔迹认出，是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的手迹。信的内容甚为平常，但经过化学显影后却是另一回事了。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在信中告诉我许多革命消息，并要我把这些消息转告那些暂时脱离革命工作的同志。我们又开始通信了。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一直使我并通过我使其他流放者了解当时的革命形势。我举上面的事例是为了说明，这两个人——列宁和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考虑得多么周到，他们对待同志始终是多么关怀啊！第二次，我被流放到叶尼塞斯克省的时候，又是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先找到我，然后我们又恢复通信联系。不抛弃流放的同志，那是列宁的一个特点。再举一个例子。伊·阿·泰奥多罗维奇同志被判处服苦役。他毫无生活来源，而且还有妻子和几个孩子。有一回，他收到一张大概是十卢布的汇款单，那是列宁寄给他的。在他没能自立之前，列宁一直断断续续地接济他。他很爱看书，于是列宁就一直为他提供书刊。

列宁当了苏维埃人民委员会主席之后，对所有的老同志也同样无微不至地关怀。戈尔登贝尔格（他是一个老布尔什维克，二月革命开始后曾脱离布尔什维克转向新生活报派，后来又回到我们一边）逝世之后，加涅茨基给我看过一封列宁的信，信中说：“戈尔登贝尔格同志曾在你们外交人民委员部工作，生活很困难。你们是否为他做了些什么？这是应该的。现在他已去世，你们是否想起他的妻子呢？他的妻子完全不会处理实际问题，必须尽力帮助她。”^①叶努基泽同志那里有一大包列宁写的各种各样的便条，在这些便条里列宁要求他给同志们各种微小的帮助：要给某个同志增加点营养，因为他饿坏了；要帮助另一个同志找一个房间，等等。

^① 关于这件事弗·伊·列宁还给列·波·加米涅夫写过信。（见《列宁文稿》第10卷第1—2页）——编者注

在这些事情上列宁从不发号施令，而只是提出要求。

我在家里发现一张对列宁来说极为典型的便条，在便条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要求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要不经他的同意就出版他的著作，据他说，那是因为他的讲话记录得很不好。我再说一遍，在所有便条里列宁从不发号施令，而只是提出要求。

应该说，有些人过分地利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助人为乐的特点，经常为一些小事去麻烦他。要在苏维埃人民委员会的食堂吃饭啦，要一个房间或者还要别的什么东西啦，为这些小事他们都去找列宁，但都从未遭到拒绝。涅夫斯基同志对我叙述了在饥荒时他怎样和列宁谈话的，谈话结束后，涅夫斯基同志一面同列宁告别，一面对他打断了列宁的工作表示歉意。列宁回答说：“没关系，这件事本来是应该谈一谈的，可是你瞧，接连不断的电话，电话……为各种琐碎的事情常有人来找我。”

* * * *

我再来回忆几次同列宁见面的情况。

1906年春，列宁来到莫斯科，准备和同志们一起讨论布尔什维克向斯德哥尔摩大会提出的提纲。那时我是莫斯科郊区委员会委员。虽然委员会和组织里的绝大多数人是站在布尔什维克一方的，但我们对孟什维克采取了过分软弱、过分妥协的策略，这一策略给参加第一届杜马的选举工作带来了极其恶劣的后果。在某些地方我们参加选举时遭到抵制，在另一些地方我们参加了第一级选举……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出席了莫斯科郊区委员会的一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我们对自己所犯的错误作了沉痛检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一旁细心静听，默不作声。有一个同志开玩笑地对他说：“最好您把我们骂一顿吧！”列宁回答说：“同志们，已经晚了，应该早一些把你们狠狠地骂一顿，可是看来谁也没有这样做，现在事情

已经糟到用任何骂人的话都无可挽回的地步了。目前应该考虑的是，今后如何来纠正你们的错误。”

在莫斯科讨论布尔什维克为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拟订的决议草案时，关于工人代表苏维埃的决议案引起了许多争论。这些争论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人对非工人分子参加苏维埃提心吊胆，害怕这些人的小资产阶级势力。我就是其中之一。现在来谈当时争论的情况，我担心会弄错。但我至少能够说，我离开会场时，深信列宁不仅把苏维埃看作是进行斗争的机构，而且也把它看作是权力机构。我认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关于苏维埃政府的思想当时已经在他的脑海里产生了……

* * *

列宁在莫斯科的那段生活是非常艰苦朴素的。他就住在克里姆林宫里和人民委员会毗邻的那幢房子里。共有五个房间，列宁为自己选择了其中最小的一间，面积三十六平方俄尺，是个穿堂间，而且房间里面的地板（如大家所说的）会吱吱作响的，因此，凡是有人走过，就会打断他工作。可是他既不同意搬家，也不同意修理。

记得大概是1919年，有一天晚上，我有事去找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我给哨兵看过通行证后就按电铃，门开了，是列宁亲自开的。他把我引到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那里，自己就去工作了。给我们上茶以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也来了。这时候我发现他们家的小调羹不够，四个人只有两把，因此只得在一只杯子里用过后再把小调羹移到另一只杯子里。喝茶的时候，除了黑面包和黄油，没别的食物。

再谈一个事例。有一次，一批农民前来找列宁。人民委员会里面很冷。一个农民在谈话结束后问列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你这儿怎么这样冷呀？”列宁回答说：“是啊，没有木柴，要节约。”过

了一些日子，莫斯科运到一车厢给列宁的木柴，那是农民托运给他的，另有一封信，信中说：“……我们给你运去一车厢木柴，请你把火炉生起来，要是没有砌炉匠，请写信来，我们可以派一个来，我们农村有人会砌。”

看，列宁同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是多么令人赞叹呀！

* * *

关于列宁的工作，我再补充几句。人民委员会规定作报告的人可以讲五分钟，而发言的人只能讲三分钟。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同志们，这里不是开群众大会，没有必要进行鼓动，只需要谈实质问题。”因此，列宁的左手总是拿着一块表。有个同志发生过这么一回事，他为了驳斥对方，从离题很远的地方讲起，先谈了对方的思想，可是把他的三分钟全用完了。列宁打断他说：“您的时间没有了。”“怎么，我才谈了对方的思想，我的想法还没来得及谈呢？”“毫无办法。”这句话引起一阵哄堂大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也随之哈哈大笑起来。这位同志不得不重新登记要求第二次发言，以便接下去谈谈自己对这件事的看法。

弗·伊·列宁在听取发言的同时，还浏览外国报纸或者校样。他有时也拿起一张纸，给某人写个便条，然后又看一些回复的便条。在整个这段时间里，他又能仔细地倾听每个人的发言。他在作总结时，能够把大家发言中最主要的东西出色地归纳起来，并且提出深思熟虑的决定性意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自己的发言也是非常严格的，他把自己的发言压缩到制度所规定的时间之内。

人民委员会里没有安置录音机，也没有配备速记员记录列宁的发言，这是一个极大的错误。只是他在一些大会上的长篇演说词才有记录，而那些三、五分钟的短篇发言也是非常精彩的，内容也极为丰富……如果他的全部发言都记录下来，我们就拥有一个异常丰富的宝库了。但这一切都已不存在，而要回忆这些

无数次的发言当然是根本不可能的事。他所写的大量便条也遭到同样的命运。这些便条有的按照秘密工作的老规矩当即被撕毁了，有的被塞进口袋，揉成一团，或者随便弄丢了。很大一部分便条已经遗失，这是十分可惜的。

* * *

在拟订需要花几百亿卢布的全俄电气化的庞大计划时，列宁对那些没有必要开支的地方是非常节俭的。你们一定还记得他关于在大街上悬挂供阅览的报纸以及为了节约铁钉（因为那时我们的铁很缺乏）这些报纸要用小木橛钉在木板上的方案吧。

还记得这么一回事。在哥尔克的公园里有几棵干枯的树木。有人决定把这几棵树都砍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认为有一棵树并没有完全干枯。为了这棵树他闹了一场误会。他让人把决定砍树的人找来，问他说：“你自己种过哪怕是一棵这样的树吗？”“没有。”“种这棵树花了多少心血？长了多少年了？让人把他逮捕起来。”最后好不容易才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服了，说是他弄错了，这棵树确实已经干枯。

列宁有时也痛斥别人的错误，然而他的话却并不使人感到委屈。

* * *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还有一个特点。他最不喜欢别人对他表示关心。1918年列宁遇刺后，为了预防他遭受袭击，设立了警卫。但他们简直不得不躲避开他。譬如说，列宁在哥尔克外出散步，肃反工作人员就跟随而出，但他们必须设法不让列宁看见。如果被他们看见，他一定会把他们打发回去。当列宁住在克里姆林宫的时候，他常在院子里散步。红军战士经常为一些私事找列宁，他总是非常乐意同他们交谈。

我始终感到奇怪的是，列宁在克里姆林宫办公，只能在群众大

会和代表大会上见到劳动群众，可是他却非常了解工人群众和农民群众的思想感情。列宁在和同志们的交谈中十分善于向他们了解群众的情绪。伊里奇在谈话一开始就向来自外省的交谈者提出一连串问题：这个地方的工人生活得怎样？有些什么想法？他们关心些什么？以上问题了解清楚后，他才去了解当地负责的工作人员的情况。始终同群众息息相关，那是列宁最典型、最了不起的特点之一。

载于《出版与革命》第2辑

1924年第1—14页

革命历史片断

策·萨·博勃罗夫斯卡娅(捷利克桑)

1903年10月，在日内瓦召开了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同盟代表大会。会议开得十分激烈。弗·伊·列宁（他有代表同盟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代表证）作过总结报告后，在布尔什维克同孟什维克之间立即展开了尖锐的斗争。

对一个不久前还因坐牢而脱离党的工作的新来的人来说，在这种情况下是难以立即分清是非的。但是，一旦参加过实际工作的人熟悉了大会的文件，他的注意力就被列宁写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记事》的手稿吸引住了。手稿中谈到，为有可能把做实际工作的人和说空话的人分开，防止组织上的混乱现象，必须缩小党员的概念。

讨论到党章第一条——谁能做党员——这一问题时，一个实际工作者就不可能不站到弗·伊·列宁一边。我们在各地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的“同情分子”发生过的麻烦和争执已经是够多了；从本质上讲，他们同党的纪律是格格不入的；他们害怕丢失自己的安逸生活和合法身份，因此，允许他们入党是不符合党的利益的。

那些追随孟什维克的人，尽管他们极力维护自己的立场，他们的论据却很少有说服力，而这些正是我倾向于布尔什维克的原因所在。那时我还没有直接认识弗·伊·列宁。但是，自从对我们

党内生活的整个体系起着组织作用的《火星报》诞生的那一天起，特别是在列宁的闻名的著作《怎么办？》问世之后，我的一切都同他的名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我在彼得堡被捕之前就是《火星报》的代办员，所以当我收到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用卡佳署名的密信时，我就知道，我是在列宁的直接指导下进行工作的。

我盼望能见到弗·伊·列宁的时刻终于来到了。一见到他，我就意识到，他同我想象的一模一样，既伟大又平凡。我第一次见到弗·伊·列宁是在兰多尔特咖啡馆。当时这个咖啡馆是弗·伊·列宁通常用来同临时耽搁在日内瓦的同志们会面的场所。这些同志中有的才开完代表大会，有的才从流放地逃跑出来或出狱不久。他们对这种临时性的侨居生活感到很苦恼，一心想回到俄国去开展秘密工作，但当时布尔什维克没有这笔派遣费。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后孟什维克控制了党的中央机关，他们还攫取了同各地、俄国的各党组织进行联系的所有技术条件。他们还掌握了印刷基地以及属于党的经费。

我是跟几个因党的工作而熟悉的火星派同志一起到兰多尔特去的，他们也是临时耽搁在日内瓦的。这些人是尼古拉·鲍曼（即白嘴鸦）、马克西姆·李维诺夫（即老大爷）、弗拉基米尔·博勃罗夫斯基（即叶弗烈姆），这三个人都是1902年从基辅监狱英勇越狱的参加者。此外，同我一起去的还有在《北方协会》一起工作的一个老同志，普梯洛夫工厂的工人，从彼得堡流放到科斯特罗马去的伊万·亚历山大罗夫（即马卡尔），后者患有严重的肺结核病，他是到日内瓦来养病的。

我的所有同伴早已作出抉择，正如当时常说的，已成为最坚定的列宁主义者，他们无比热爱伊里奇，而对孟什维克，特别是对背叛弗·伊·列宁的普列汉诺夫十分愤懑。

不言而喻，同这些同志交往极有助于我确定自己的立场，因此

在同弗·伊·列宁初次见面的那个晚上我就已经站到他一边了，尽管前几天孟什维克的首领还竭力使我相信他们呢。

在兰多尔特我们遇见了一些等候弗·伊·列宁的人。不一会儿，他在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克鲁普斯卡娅的陪同下快步走进咖啡馆，边走边向同志们问候，接着就同我们谈论跟党内形势有关的一些迫切问题。他说，孟什维克诽谤党，他们对出席代表大会的多数派散布种种谎言，败坏代表大会选出的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委员的名誉；党内的这种情况是同代表大会上讨论到党章第一条时所表现出来的思想动摇和知识分子的个人主义有密切联系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谈了对布尔什维克来说是极为严重的形势之后说道，然而他寄莫大的希望于把我们的人派回俄国去，其目的是让他们正确地向各地党组织汇报；但是由于当时布尔什维克手头的经费极其有限，因此暂时只能派遣少数人，其余的同志必须耐心地等待。

弗·伊·列宁讲话后，同志们把我介绍给他和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已经知道，孟什维克的首领拜访过我，所以就开玩笑地问我，我到这里来是否害怕，这里有个“可怕的列宁”啊。他听我说一点也不害怕，便邀请我有便到他家里去，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也附和着一起邀请我。当然，他们当时并没有再三邀请我。在弗·伊·列宁的寓所个别地同他交谈，那是我梦寐以求的事。似乎就在初次见面的第二天我就到日内瓦近郊的塞舍罗去了。在一幢不大的别墅里住着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和她的老母亲伊丽莎白·瓦西里也夫娜·克鲁普斯卡娅，无论在流放期间或是侨居国外期间她都从来没有同自己的女儿分离过。

别墅的底层是厨房，旁边是一个不大的房间，伊丽莎白·瓦西里也夫娜就住在那里，她总是为并不复杂的家务不停地操劳着。

有个木楼梯通向楼上两个比较宽敞的房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房间里有一张大桌子，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的房间里的桌子小一些，他们的家具就这些。每个房间里还有一张铺上毛毯的普通的铁床，几把椅子和几只钉得很粗糙的书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桌上堆满了剪报、手稿和各种各样的统计汇编、图表等物件。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身穿一件斜领衬衫，衣襟露在裤腰的外面，这副装束使他那矮壮的身材增添了某种特殊的“俄罗斯人”的神态。再说这里的整个陈设都同瑞士的循规蹈矩的生活方式不相协调。难怪爱说俏皮话的马卡尔第一次来到这里就感叹地说：“这里有俄罗斯的特征，这里笼罩着俄罗斯的气氛！”

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十分殷勤地接待我，然而这次会面的结果完全出乎我的意料。除了在兰多尔特咖啡馆听到的以外，我盘算着能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那里再听到些什么，而结果相反，倒是他更多地问我，甚至对俄国党的工作中的一些细节问题也感兴趣，同时对我们这些坐过牢的职业革命家如何在条件许可下充分利用这段时间进行学习的问题也很关心。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听我说，1901年我在哈尔科夫坐牢时曾设法搞到过一本《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这本书是公开出版的，署名为伊林。他听了显然很高兴。由于他想掩饰自己的高兴心情，所以对我开玩笑说：“您可真不走运，在牢房里只能啃我那些又长又枯燥的统计表。我真为您感到遗憾啊！”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又详细地向我询问特维尔组织的日常情况。我说，这个组织同农村有联系。他听了特别感兴趣。而当我谈到，他的小册子《给农村贫民》对我们巩固同农村的小组的关系起了很大作用时，他甚至并没有打算掩饰自己的高兴的心情。

我曾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当作笑话谈起一件小事。他就借此机会谈了深入了解所处环境的必要性。一个党的工作者应该对所有细节都要周密地考虑并随时保持警惕，这一点在地下活动的条件下显得尤其必要。

使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很感兴趣的这件小事发生在我快要离开特维尔的时候。我们派了一位有经验的老同志到农村去给一个小组讲课，但是第二天他就从农村回来了，并带回了一封给特维尔委员会的打印好的信。小组的组织员在信中私下要求再不要把这位宣传员派来，因为他“不是自己人”，“他是老爷”。证据是：他在一个农民家里过了一夜，清晨起来梳洗的时候，从口袋里不仅掏出了肥皂，而且还掏出一把牙刷，“刷起牙齿来，只有老爷才这样梳洗，我们农村可不知道有什么牙刷。”

这就是当时被称为沙俄的先进省份之一——特维尔省农村居民的文明程度。

我们经常想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家里去，就象到理所当然的中心去一样，因此我们中间几乎每天都有人到他的别墅去打扰他，不是一个人去，就是三五成群地去。尽管我们的访问占去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很多时间，然而他们家总是盛情地接待我们，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的母亲甚至还给我们做便饭吃。我们就在厨房进餐。晚上，每当我们几个人到来后，也在那里边喝茶边谈话。

1904年的新年前夕……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我们说，即将来临的新的一年将进一步使我国的革命运动走向高潮，新的一年将指引我们去进行决定性的战斗，因此，同志们，让我们尽情地欢度新年之夜吧。就这样，我们大家都上歌剧院看了《卡门》。散场后大家来到喜欢常去的兰多尔特咖啡馆，喝一杯啤酒或者一杯咖啡，然后到灯火辉煌的日内瓦大街上去游逛。这一夜，大街上到

处都在举行传统的新年狂欢。这是旧时瑞士的一种优良民主传统。所有的人都走上街头，很多人戴着假面具，在彩灯下不相识的人们愉快地互相交谈起来。音乐阵阵，年轻人翩翩起舞。我们在人民的节日里也感到万分愉快。

我们在普兰广场上遇到一群孟什维克，我们同这些人已经不打招呼了，他们中间有人对我们挖苦说：“铁石心肠的人走开！”我们紧接着对他们说：“软骨头让开！”。

在这新年之夜我们大家似乎感到特别高兴，因为有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同我们在一起……

随着1904年新的一年的到来，布尔什维克的工作也有了好转。出现了一些可以派遣我们的人回俄国去工作的机会。弗·伊·列宁首先把在创办《火星报》时期的亲密助手之一和在1902年8月火星派分子从基辅监狱英勇越狱的主要组织者尼古拉·厄内斯托维奇·鲍曼派回俄国去。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早在1896年就认识他了，当时他是彼得堡工人小组的组织员和宣传员。

鲍曼接受了一项任务：在莫斯科成立中央委员会俄国局，即布尔什维克中央，它应该把各地的情况报导加以汇总并协助把弗·伊·列宁的指示传达给各地党组织。

基辅越狱的第二个参加者李维诺夫被委派去做“边境上”的工作：组织运输，在走私者的协助下运送布尔什维克的书刊，向各地党组织正常地供应这些书刊，再就是组织我们的人秘密越境。

弗拉基米尔·博勃罗夫斯基被派往高加索受高加索联合委员会的领导。在高加索发生了大逮捕以后，高加索组织特别需要充实布尔什维克的力量，而那里的孟什维克仍然在活动，同他们的斗争是很艰难的。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委派马尔丁·利亚多夫长住柏林，要他负责跟德国社会民主党进行联系。

以上这些同志动身之后我焦急地等待着被派回俄国去。终于轮到我了，但是我暂时不回俄国，而要到柏林去，这一情况使我大失所望。我在柏林要担任日内瓦同我们的“边境人员”之间的联络员。沙皇政府不惜一切代价在国外豢养着一些密探。日内瓦是个不大的城市，我们被监视得很严，因而我们的人从日内瓦直接回俄国去从事秘密工作是不妥当的。在回俄国之前，他们必须在国外还要住一段时间，在大城市里隐匿起来，然后从那里悄悄地消失踪影。

为达到这一目的，柏林是一个合适的城市。那里有成千上万个俄国男女青年，他们已在那里居住多年，在大学里读书或者装成大学生的样子东游西荡。这些人已为警察局所熟悉，并不引起特别的怀疑。那时已在柏林的马尔克·利亚多夫是个显眼的人。很多德国社会民主党人都知道他是弗·伊·列宁的代表，警察局也可能知道他。因此，要走的人必须同我这个完全“不受怀疑的”、在那里谁也不熟悉的人打交道。

离开日内瓦到另一个新的侨居地去，那里没有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是令人难受的。动身以前，我总算有幸就一个使我十分苦恼的问题去请教他。当时我心里总是怀疑，我既没有扎实的理论知识，又没有特殊的鼓动能力，是否有权被称为一个职业革命家，一个布尔什维克中央的代表呢。要知道，当你作为从中央、从弗·伊·列宁那里派出的使者来到一个地方党组织的时候，人们会对你肃然起敬，对你抱有某种希望，等等。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仔细地听完了我的话，然后说，谁能舍己为公地忠于党和工人阶级，谁就有权被称为职业革命家。那些把个人的生命和党的生命融合在一起的人，应该享有这个权利。不应该把革命家组织的范围缩小到仅限于领导人的程度。需要有专职工作者，他们不辞劳苦，同群众保持着直接的联系。

我带着一张为我准备好的大学生身份证（这个女学生是乌拉尔一个叫哈利东诺夫的厂主的女儿），很不乐意地到柏林去了。至于这张身份证是真的还是“伪造的”，我并不了解。到达柏林后，我在俄国大学生通常安身的沙洛顿堡租了一个房间，把身份证交出去登记，似乎一切都很顺利。不过几天以后，我被叫到警察分局，他们向我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象我这样一个工厂主的女儿，竟然租用这样便宜的房间，而且穿着又如此朴素。我回答说，我爸爸虽然是个工厂主，但他反对我到柏林来学习，因此我不可能指望他的接济。我的回答合情合理，他们就不再找我麻烦了。

实际上我在柏林的工作并不多，空闲的时间不少。我就尽量利用这段时间参加各种类型的群众大会和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公开集会，特别是在柏林的工人中间享有盛誉的倍倍尔作讲演的那些集会我都参加了。克拉拉·蔡特金的讲演我多半是在妇女的集会上听到的。她的讲演在清晰明了方面较之倍倍尔的讲演更胜一筹。然而这一切都很少使我满足。我想回家，回俄国去，去参加真正的、更有成效的党的工作。因此当有人通知我说，我在柏林的使命已告结束，在最近几个星期内我将动身去高加索，这时我真感到喜出望外。

1904年夏，我回到了俄国，由设在梯弗利斯的高加索联合委员会安排我的工作。

载于策·萨·博勃罗夫斯卡娅（捷利克桑）：《革命历史片断（1903—1908年）》1955年莫斯科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版第9—16页

同列宁的会见

玛·莫·埃森

我最初见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是1902年在日内瓦。遥远的亚库提亚是我以前呆过的流放地，那时，《火星报》已经开始渐渐传到这个角落，这使我们的整个生活有了一点生机。当时，《火星报》上正在大力宣传建立一个真正革命的工人的社会主义政党的宏大计划。在《火星报》上进行着一场捍卫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反对机会主义者歪曲、践踏科学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的斗争。每一号《火星报》我们都如饥似渴地反复阅读，并展开热烈的讨论。马克思主义者都明白：《火星报》正在成为一支生气勃勃的组织力量，它将结束手工业方式，结束动摇、徬徨、涣散状态，从而建立一个统一、团结、强大的政党。

大家都希望早日参加一个火星派组织，成为这个组织中的一分子。长年累月地过着流放生活，消极地等待出头之日，实在受不了啦。于是我们就商量逃跑，并立即付诸行动。我终于逃出了流放地，经过一番颠沛流离，后来到了日内瓦。

那时候，我曾多次见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跟他的谈话使我懂得了《火星报》的整个工作计划，详细了解了它的任务和目的。列宁向我们这些职业革命家提出的基本任务是：到各地去建立火星派组织，跟工人建立牢固的联系，在工厂企业建立火星派支部。列宁曾多次谈到，应当吸收工人直接参加革命领导工作，应当把工

人吸收进委员会。列宁说：“我们应该有一批自己的倍倍尔。”

有些委员会把工作局限于几个宣传小组的狭隘圈子里，列宁认为这种做法不对。他说，使工人运动具有更广泛的规模的时机已经来到，政治罢工和游行能够把群众组织起来，因此，我们应该使工人们学会公开行动。

列宁提出的公开行动的口号得到了大家的拥护。从1902年起，这个口号就在许多大工业城市中得到极其广泛的响应。在各大城市的主要街道上开始举行五一游行示威。工人们擎着红旗，高唱革命歌曲，高呼革命口号走上街头，在与警察、宪兵的冲突中经受战斗的洗礼，从中学会以公开的方式来达到自己的要求。在进行宣传工作的同时，还广泛开展鼓动工作，印发传单、呼吁书，举行群众集会，涌现出一批自己的演说家。

同列宁的多次谈话，他对党员的无微不至的关怀，他那全面透彻地概括涉及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革命斗争实践问题的本领，使我们大受教益。对我们这些普通党员来说，这些谈话就是接受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象革命理论要与革命实践相结合这类问题，我们似乎早已懂得，但是在同列宁交往过程中，这一原理就变得充实、生动、更亲切更明了了。生活在火星派的队伍之中，我们感到自己确实是同一个政党内的紧密团结的成员，深深地认识到工作中始终如一和合理使用力量的意义，也懂得了应该怎样建设党、怎样组织斗争。

这段时期我几乎都是在一些小型会议上见到列宁的。那时我还不曾听到过列宁的长篇演说，对列宁的理论著作也很少知道。尽管这样，从初次见面时起，我就感到这是一位真正的领袖，是个智慧过人、学识渊博、意志坚强的人，也是个平易近人非常好的同志。

列宁交给我们的任务主要是以下几项：（1）在大工业中心建立、加强和巩固火星派委员会；（2）吸收先进工人参加党的领导机

构；（3）向工人灌输革命的科学马克思主义原理；（4）开展和加强对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派别，如“合法马克思主义”、“经济主义”以及其他小资产阶级思潮的斗争；（5）在工人群众中宣传进行公开行动、游行示威、罢工，及反对专制制度，反对统治阶级的其他革命斗争形式的必要性；（6）筹备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

列宁经常就意识形态、纲领和组织方面的问题，给我们作完整而又扼要的报告，这些报告往往总是转为热烈的交谈。列宁不喜欢沉默不言的听讲者，他比任何人都善于使听众活跃起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讲话时两眼闪耀着机智、探求和讥讽的神情；他以一针见血的插话，精确的评论和启发性的问题吸引在座的人开展讨论，他自己也参加讨论。为了要驳倒对方，证明自己论点的正确，同志们都尽了最大的努力。每次学习会都开得这样活跃，这样兴高采烈，使得每个参加的人都不想离开；各人都会产生新的想法，提出新的论据。同志们都说：“真的，这样学习不会感到枯燥无味，也不会打瞌睡。”列宁的这种生动积极的讲课方法，我们自己也都努力去效法和掌握。

列宁引导我们进行辩论，这样他不但有可能判断我们的修养水平，而且还可以了解每个人的特点，这些方面在分配工作时可供参考。在研究派人回俄国去的问题时，列宁同我们每个人都作了个别谈话，考虑每个同志的愿望和情绪，而不强加于人。他常说：“你考虑吧，你觉得哪一样工作更喜欢，做起来更有信心？你希望到什么地方去？工作多得很，人到处都需要”。

在这之前，我在萨拉托夫、敖德萨、基辅和乌拉尔等地工作过，那时我很想到彼得堡去。列宁看出了我的心思，就建议我到彼得堡去开展宣传工作。我很乐意地接受了。从1902年年底到1903年5月，我就在彼得堡的火星派委员会工作。后来，在一次讨论关于五一游行示威的会议上，我被捕了。直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

二次代表大会以后，我才获释。

出狱后，我前往基辅，当时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选出的几个中央委员（克尔日札诺夫斯基、林格尼克、诺斯科夫）就在那里。我去的目的是想熟悉一下代表大会的文件和接受工作。由于当时的工作规模非常大，中央委员会就增选克拉辛、古萨罗夫、捷姆利亚奇卡和我为中央委员。我接受了一项任务：视察各委员会，传达代表大会的决议和说明导致分裂的一些分歧。

孟什维克反对代表大会的决议，他们也到各委员会去进行游说。他们在自己的报告里歪曲事件的真相，批判代表大会的不合他们心意的决议，对阿克雪里罗得和查苏利奇没被选进中央机关报一事牢骚满腹，说是“欺侮老头子”。但是孟什维克的游说没有什么效果，几乎每到一处他们都遭到异口同声的反击。大多数俄国的社会民主党人都清楚，既然代表大会决定编委由三人组成比六人合适，那就应该服从这个决定。至于孟什维克避而不谈的策略和组织上的分歧问题，各个委员会认为：布尔什维克的路线，即列宁的路线是正确的。我们最终收集到赞成代表大会决议并承认中央委员会的二十个委员会作出的决议，而支持孟什维克路线的只有五个委员会。

视察各委员会结束后，决定让我去日内瓦向列宁汇报党组织如何对待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的情况。

听到国内党组织态度坚定的消息，列宁感到很高兴。当时列宁已经退出《火星报》编辑部。跟孟什维克的斗争已经日趋激化，因此列宁提出必须创办布尔什维克的机关报和筹备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

我们这儿会写文章的笔杆子相当缺乏。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逐个加以考虑，有哪些同志适宜从事写作工作。他首先提出的人选有波格丹诺夫和卢那察尔斯基。此外，参加《前进报》编辑部的

还有奥里明斯基和沃罗夫斯基两位同志。

波格丹诺夫、卢那察尔斯基和奥里明斯基当时侨居巴黎，中央委员会派我去那儿找他们，并就他们来日内瓦与列宁会见的时间进行洽商。

我记得临走前问过弗拉基米尔·伊里奇：

“巴黎有哪些地方值得去看看？”

“首先应该到拉雪兹神父墓地去瞻仰公社战士墙，还有1789年革命博物馆和格拉温腊像博物馆，后者据说就艺术造型而论价值不大，但它的内容倒是挺有意思的。”

“还有呢？”

“动物园一定得去。参观之后您会觉得仿佛作了一次环球旅行。”

当他发觉我还想知道些什么，于是又补充了一句：

“嗯，有关博物馆，展览会这些事您去找若尔日（普列汉诺夫）好啦，他对这方面很内行，一定会给您有益的指点。”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经常想到普列汉诺夫，可是普列汉诺夫那时却采取一种使人难以接近的姿态。有一件事颇能说明普列汉诺夫当时的思想情绪。1904年5月1日那天，我们决定在国际无产阶级面前采取统一行动，决定由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合印一份传单。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和马尔托夫各自写了一份草稿，最后列宁起草的传单获得通过^①，为了统一意见，我带着这份传单去找普列汉诺夫。

普列汉诺夫相当客气地接待了我，但他并不掩饰自己的优越感。我还记得他说的一句话，他说：“行啊，好极了，勉强维持的和睦总比真正吵起来好。”不消一刻，他的宽厚温和的腔调立即转为

^① 《列宁全集》第7卷第185—188页。——编者注

破口大骂中央委员会：“哼，这算什么中央委员会，连个耗子都逮不住。”

我反驳了他的话，强调说，在国外的富有经验的同志们的支持下，有希望把党的工作搞好。我对他讲了国内党组织的情绪，谈到差不多普遍获得通过的一些决议。对我所说的一番话，他的态度非常冷淡，很不信任。我还解释说，一个由象列宁这样出色的组织者和卓越的理论家领导的党，能保证我们有正确的领导，况且党已渡过了幼年时期，自己会解决党的建设问题。

同他谈话时我处处小心谨慎，心平气和，因为列宁叮嘱我不要触怒普列汉诺夫，而要使他对我们的工作发生兴趣。尽管如此，普列汉诺夫还是大发雷霆。党认为列宁是一个卓越的理论家，这一点最使他感到恼火。

诚然，我的外交手腕相当欠缺。再说也无须使用任何外交手腕。普列汉诺夫在党内向来唯我独尊，他根本不许别人与他平起平坐或者持有不同意见。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详尽地向我问起当时的情形，要我重复普列汉诺夫说过的话。

比较这两位举足轻重，才华出众的人物，你总会发觉他们性格上的差别。列宁身上没有一丝一毫的私心杂念和庸庸碌碌的东西。他爱戴和敬重普列汉诺夫，始终认为，为了党，需要保护普列汉诺夫。可是普列汉诺夫呢？他容不得旁人一起共事，生怕人家同他“竞争”。想要和他平等地谈话，那是办不到的。

普列汉诺夫曾经抱怨说，他对找上门来的故作聪明之辈感到厌烦。他认为这些人只会单调乏味，喋喋不休地大发空论，言谈陈腐不堪，一股契诃夫笔下人物的乡土气。这话固然刻薄，却也是事实，而这也是普列汉诺夫本人之过。本来，同志们是慕名来找普列汉诺夫的，但是一看到他那种爱理不理和盛气凌人的态度，即使

是相当聪明的人，也会心慌意乱，无所适从，为了显示自己对各种理论并非无知，于是便胡诌瞎扯起来。

有个同志讲了他来日内瓦见普列汉诺夫的经过。普列汉诺夫既客气又傲慢地接见了她，并问他国内对他普列汉诺夫有什么看法。来客脱口而出地说：“同志们认为您是个机会主义者。”普列汉诺夫一听，勃然大怒。他说：“回去转告您的同志们，就说当他们的爸爸还在追求他们的妈妈的时候，我普列汉诺夫就已经是个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了。”这并不是一桩笑话。

普列汉诺夫想装腔作势吓唬人吗？当然不是。但他这样待人接物就在自己和其他党员之间设下了一道鸿沟。他仿佛是在说：“我是《一元论历史观》的作者，还写过一系列学术著作和报告，你们只不过是些学生和听众。”当普列汉诺夫看到周围的人恭敬地听自己讲话的时候，他就会变得异常和蔼可亲、平易近人、侃侃而谈。我有几次就是在这样的场合下看到普列汉诺夫的。他那神采夺目、异常机敏、谈笑风生的风度简直无法言传。普列汉诺夫在小组里发言时的神情就象在大会上演说一般。他把那渊博的学识、横溢的才气、幽默感和演说的艺术在讲话时发挥得淋漓尽致。普列汉诺夫的博学令人惊叹。他对十八、十九世纪的历史非常熟悉。对百科全书派著作的研究尤为透辟。他对那一时期的哲学家、思想家的研究使他从中汲取了丰富的养料，得益非浅。其实普列汉诺夫这人，以他的风度和博学而言，是很有可能成为那一时代的光辉人物的。

列宁不是这样。他专心致志地投身于组织工人阶级的工作，他的人生目标是建立起真正能领导无产阶级战胜专制制度和资本主义的这样一个政党，为此，他一砖一瓦地建设着这样的党。列宁通过千万条线和党，和工人阶级联系在一起。他的待人接物和普列汉诺夫迥然不同。他象一个能干的当家人，留意选择一切适用

于事业的东西。有时我们感到惊讶的是，他对每个同志是何等的关怀和耐心呵。

和列宁在一起，谁也不想卖弄聪明，高谈阔论，自命不凡。列宁能看出每个人的心思，而同志们也都感到，和列宁谈话应该力求朴实，用不着故弄玄虚。

列宁和同志们谈话时，有好多回我也在场。列宁总是信任地仔细听着大家谈，这使我总是很受感动。鼓励工作人员，增强他们对自己力量的信心，激发他们的朝气和干劲，这样做正是伟人的谋略。列宁比任何人都善于以自己对待工作的毅力去鼓舞他人，使得和他接触过的人都会以百倍的热情投入工作，每个人都觉得仿佛身上添了一付翅膀。列宁所特有的威望和影响不正在于此吗？

任何一个演说家都难以与列宁媲美。我第一次看到列宁在讲台上演说是 1904 年在日内瓦，当时他正在作关于巴黎公社的报告。讲台上的列宁完全变了样。整个动作和谐协调，浑然一体。在他的声音里，在他炯炯有神的眼睛里，在他清晰而又铿锵有力的言语中，凝聚着全部的力量。

那时候，我也曾有机会听过一些十分著名的演说家的讲演。这些人演说似乎只是为了哗众取宠，卖弄华丽的词藻和俏皮的笑料。他们很会运用抑扬顿挫的语调，温文尔雅的手势和优美的姿态。普列汉诺夫、饶勒斯、王德威尔得这些世界闻名的演说家就是这样的。他们的演说虽然不乏动人之处，但我总摆脱不了矫揉造作的印象。

列宁不是这样。他的演说的魅力是难以言传的。他的演说表面上似乎并没有什么惊人之处，简单明了，通俗易懂。但是当你听着列宁讲话的时候，你就会忘掉周围的一切。列宁能抓住听众的整个心灵。列宁与普列汉诺夫在这方面的区别异常明显。

普列汉诺夫讲究词句优美，斟酌再三。他对自己的才干相当

自负，懂得随时注意声调的高低，他善于适时地穿插一些巧妙的俏皮话，用笑料驱走听众的倦意，吸引他们的注意力。不过，他的讲话人们听得很平静，他使听众激动是很有限度的。

列宁的演说没有这种表面的华丽，他并不雕字琢句。可是恰恰是对他，人们听得那样全神贯注、屏息静气，似乎他能揭示你内心深处的思想和梦寐以求的理想。其他人的演说虽然也有好的，但听众仿佛置身事外，而列宁却能号召人们行动起来。他的讲话能以热情和愿望促使人们行动起来。列宁的演说令人难忘，大家都觉得他说出了最重要、最需要的东西。

列宁在讲述巴黎公社时，我们都感觉到了公社的强有力的呼吸，它的激情，它的悲剧和它的世界意义。巴黎公社——这新生活的灿烂的曙光，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初次尝试，巍然屹立在眼前。我们想象到被围困的巴黎，统治阶级的怯懦和叛卖；也想象到背叛祖国，逃往凡尔赛的卖国政府；我们看到了英勇的工人阶级奋起保卫祖国，担负起重新建设国家的重任。列宁叙述了完成这些任务的重重困难，指出了公社的各种矛盾和错误，也谈到了它的失败。

我至今还记得这次演说和它所唤起的那种热情。列宁这番鼓舞人心、充满火热的战斗激情的讲话，使人们明白了：巴黎公社不仅是一次显示工人阶级强大威力的历史壮举，而且对我们来说，也是鼓舞人心的典范。

散会后，在回来的路上，我们几个人情绪兴奋激昂。我问列宁：

“难道我们能活到公社重新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的时候吗？”

列宁精神一振，问道：

“我的报告使您得出这样的结论吗？”

“是呀，不光是我，所有今天听您讲话的人都这样认为。”

听列宁在会议上发言；看到列宁埋头读书，伏案工作；或处理

政治问题；听他的关于击败敌人的计划，他的透彻的分析；这一切构成了列宁多方面活动的鲜明的画面。但是，谁要是不知道日常生活中的列宁，那么谁就算不上真正了解列宁。

我没有见过比列宁更朝气蓬勃、乐观开朗的人了。他能够因任何一个玩笑而哈哈大笑，他善于利用空余时间并找理由进行娱乐，他的这些本领也是无穷无尽的。

我常回忆起在列宁住处度过的那些夜晚。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有一副低沉悦耳的嗓子。他很喜欢和大家一起唱唱歌，也喜欢听人家唱。我们唱的歌是够多种多样的。通常总是先唱革命歌曲，象《国际歌》、《马赛曲》、《华沙革命歌》等。然后就唱《受尽苦难的折磨》、《在广阔草原古老的山岗上》。我们唱得很有感情。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很喜欢西伯利亚歌曲《暴风雨在呼啸》、《可爱的海、神圣的贝加尔》；以及歌颂斯切潘·拉辛的歌曲《伏尔加河畔有座悬崖》。其中有一段唱得特别清楚：

假如俄罗斯哪怕只有一个人，
但他绝不贪婪，毫无私心；
热爱自由，如同热爱母亲；
为了自由，不惜献出生命，——
那就让他去攀登，直达崖顶，
耳贴岩石，细心地倾听，
巨人悬崖会向这位勇士，
转述拉辛的衷情……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非常喜欢米·斯·奥里明斯基为《宝棍曲》续写的一段词：

我等待新歌儿传家乡，
不要泪水和悲伤，
要充满无产者的义愤，

号召起义的歌声响四方！

唱完喜爱的革命歌曲，大家累了，就开始听独唱节目。谢·伊·古谢夫唱得很出色。他的嗓子响亮动听，唱得很卖力。列宁特别欣赏柴可夫斯基的抒情曲《夜》、《喧腾的舞会中间》、《我们坐在沉睡的河边》以及达尔哥梅日斯基的《我们结婚不在教堂》和选自《卡门》中的斗牛士咏叹调。我们一起唱歌，这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来说是多好的休息和多大的享受啊！最后，我唱起了深沉的伏尔加歌曲和各种民间小调。有时候我们还跳舞呢。

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后来回忆这些夜晚时，风趣地写道：“从流放中逃脱出来的‘野兽’劲头十足，显得非常愉快，周围的人都受了她的感染。在她的身上找不到一点怀疑和不坚决的痕迹。她嘲笑那些垂头丧气的人，嘲笑那些因分裂而叹气的人。国外的争吵不知怎的没有影响到她。这时我们想了一个在我们的塞舍罗区^①每个星期组织一次‘茶话会’的主意，以便加强布尔什维克的联系。在这些‘茶话会’上也没有能进行‘真正的’谈话，不过却大大消除了因同孟什维克闹这场纠纷而引起的忧郁心情。听听‘野兽’豪爽地唱一首‘万卡’和高身材的秃头工人叶哥尔的帮腔，是叫人愉快的。叶哥尔很想去找普列汉诺夫谈心，他甚至为这还戴上了衬领，但他从普列汉诺夫那里回来的时候很失望，心情很沉重。‘不要灰心，叶哥尔，唱唱“万卡”吧，我们会胜利的。’——‘野兽’这样安慰他。伊里奇愉快起来了：这种豪迈气概，这种乐观精神驱散了他那沉闷的心情。”^②

有时候在晚会上我们朗诵涅克拉索夫、海涅、贝朗热的诗歌。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常常喜欢在散步或是晚上喝茶的时候，

① Sécheron (塞舍罗) 是日内瓦的一个工人住宅区。1903年4月弗·伊·列宁和娜·康·克鲁普斯卡娅离开伦敦到日内瓦后就住在这里。——玛·埃·注

② 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列宁回忆录》，见本书第1卷第340页。——译者注

谈论起文学和他喜爱的作家，如谢德林、涅克拉索夫、车尔尼雪夫斯基，尤其是谈论车尔尼雪夫斯基。列宁认为车尔尼雪夫斯基不仅是一位杰出的革命家，伟大的学者和进步的思想家，而且还是一位艺术大师，因为他塑造了拉赫美托夫式的勇敢无畏的战士、真正的革命者的无比高大的形象。

列宁评价说：“这才是真正的文学。这样的文学能教育、鼓舞和引导人们前进。我一个夏天就把《怎么办？》这部小说读了约五遍，而且每读一遍都从中发现发人深省的新思想。”

列宁把艺术作品的思想性放在首位，正因为如此，他才如此喜爱和推崇涅克拉索夫，他几乎背得出涅克拉索夫的所有作品。有一次他问我，能不能背出长诗《俄罗斯妇女》，我回答说，背是背得出的，只是从来没能朗读到底——眼泪哽住了嗓子。

“这就是艺术家的力量所在，”列宁说：“能激动人心。”

有时在音乐晚会结束后我们送客归来（那时我住在列宁家里），大家默然不语，显得疲劳，心情还有点忧郁。这些歌曲使我们思潮起伏！谁也不想讲话，各自在沉思。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正在结束《进一步，退两步》那本书，通常总要再在写字台旁坐上个把小时，写些什么或是修改些什么。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去睡了，而我和伊丽莎白·瓦西里也夫娜就坐在花园的长椅上，轻声交谈，免得影响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有时候列宁走下来同我们聊上几句，有时候就在楼上笑我们两个有谈不完的话，大声催我们去睡觉。

在同孟什维克作斗争、也即党的第二次和第三次代表大会之间这段时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显得特别乐观自信，斗志昂扬。这种心情在《进一步，退两步》这本书中有充分的反映。列宁坚信布尔什维克是正确的，他对孟什维克的机会主义作了无情的批判，揭露了他们思想上的贫乏、虚伪、矛盾和混乱。

列宁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心情激动，全神贯注。当我现在重新翻阅这本书的时候，列宁的全部神态、容貌和当时整个斗争的情景，都清晰地展现在眼前。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把他写得特别成功的篇章段落读给我们听的时候，似乎他的整个内心都在闪闪发光，他是那样的热情奔放、生气勃勃，神采奕奕。

列宁的最大特点是从不妄自尊大，盛气凌人。他尊重别人的意见，平等地对待每一个同志。所以，在列宁身旁大家都觉得很轻松、愉快，无拘无束。列宁善于仔细地倾听对方的谈话，吸引对方参加争论，促使他把话说完；如果他发觉对方自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这时他就对这个话说过头、弄得自己的思想逻辑混乱的辩论家，报以宽厚的微笑，把他引上正确的思路，而不伤害别人的自尊心，免得人家垂头丧气；要是换了普列汉诺夫的话，态度就不同了。普列汉诺夫有时把腼腆的同志搞得无地自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从来不问人家“你读些什么书？”“读过的东西掌握得怎么样？”等问题，而是就某些问题同人家随意交谈。通过交谈，他一下子就能看出对方的缺陷和不足之处，而且对方也会逐渐明白该在哪些方面再努一把力。

有列宁在一旁，思路就变得敏锐了，使人渴望更多地求知、思考、阅读和学习，而主要的是渴望工作。只要想到列宁了解你的工作，你就会增添无穷的力量。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那些跟党走同志，对那些为了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为了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为了社会主义而进行斗争的同志，总是关怀备至，而对自己的政敌则毫不留情，不屈不挠地捍卫自己的原则立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认为孟什维克对他的仇恨和攻击恰恰证明他做得对，证明他打中了敌人的要害。无怪乎列宁很喜欢引用涅克拉索夫的这几句诗：

不是在动听的赞扬声里，

而是在粗野的谩骂声中，
他听到了赞美之音。

写完了《进一步……》这本书，列宁就出发到山里去休息。回来以后，便以更饱满的热情、更充沛的精力着手重新建党，建立布尔什维克机关报和筹备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等工作。

伊丽莎白·瓦西里也夫娜对我讲了不少有关列宁和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经历的流放生活。关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我从安娜·伊里尼奇娜（我是在九十年代末搞地下工作时认识她的）那儿听到的更多。我记得有一件事使我十分惊奇并引得我哈哈大笑。她说当列宁在监牢里从探望他的人那里得知，他的案子马上就要结束的时候，他叫了起来：“太早啦！我还没来得及收集全部材料呢。”^①

1903年我结识了乌里杨诺夫一家人。这是一个多么令人赞叹的家庭啊！深厚的友爱、共同的情操把他们永远联结在一起，他们把整个生命和利益献给党，献给革命事业，这是一个真正的家庭，它向我们描绘了在遥远的将来家庭应当是什么样的。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家庭的爱和对母亲的体贴关心，使得这个家庭所特有的、贯穿于列宁整个一生从未间断过的联系更显得突出和牢不可破。当我第一次来到乌里杨诺夫家的时候，我就感到，这样的家庭是多么富于乐趣；这种相互之间的体贴关心、相互了解和互助友爱是多么幸福啊！

我们大家从第一次见面就喜欢上了乌里杨诺夫家的母亲——玛丽亚·亚历山大罗夫娜。直到今天她那和蔼可亲 and 清秀的面庞、青年人一样明亮、无比慈祥的双眸，依然浮现在我的眼前。在认识了玛丽亚·亚历山大罗夫娜之后，我才弄清楚弗拉基米尔·伊里

^① 1896年1月初，弗·伊·列宁在彼得堡监狱中（在看守所），开始准备写《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玛·埃·注

奇的魅力的奥妙所在。在玛丽亚·亚历山大罗夫娜身上，在乌里扬诺夫一家人身上，关心他人这一品格得到了最充分的反映。有多少苦难落到这位母亲的身上，而她又是以多么巨大的勇气经受了这一切啊！但是很难向她表示同情和安慰，因为她从不向人诉苦，从不说到她是多么的艰辛不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知道，大儿子亚历山大的被杀和女儿奥丽珈的天折，使她经受了多么大的痛苦和打击，其他几个子女屡遭逮捕又使她多么悲痛。她虽然痛苦不堪，但却从没有反对和阻挠过孩子们的行动。玛丽亚·亚历山大罗夫娜不仅仅以一般的母子关系去同情支持孩子们的意愿，她还是他们的同志和朋友，勇敢地为他们分担一切风险。

我是在安娜·伊里尼奇娜、玛丽亚·伊里尼奇娜和德米特里·伊里奇被捕后不久，到达日内瓦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详细地询问了他母亲的情况。当他提到母亲的孤独和操心时，眼神里充满着多少抑制着的痛苦和哀伤啊！安娜·伊里尼奇娜不止一次地说起，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坚持要有人经常留在母亲身边，而这个担子通常总落在她身上。

在动身离开基辅之前，我去探望了玛丽亚·亚历山大罗夫娜几次。她那时一心在为减轻子女们在监牢里的艰难生活而想方设法，整天整天地在卢基扬诺夫卡监狱大门前站着，为他们递送东西。当她离开监狱回到家里，她那饱受折磨的脸色、满含悲痛的双眼和疲惫不堪的神情叫人怎么也忘不了。

我想指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一个特点：对于参观博物馆和展览会这样的事情他是缺乏足够的耐心的。他喜欢活跃的人群，喜欢生动的交谈和唱歌，喜欢同群众在一起。

列宁在散步时从不知疲倦。有一次散步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那是在1904年春天的时候，我正准备回俄国去。临别之前，我们决定“乐一乐”——一起到山里去旅游。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娜

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和我三个人一起出发。我们乘轮船至蒙特勒。在阴森的施里奥恩堡——关过博尼瓦尔的监狱稍作逗留。拜伦对它曾有过出色的描写(施里奥恩飞波流水……)我们瞻仰了囚禁过博尼瓦尔的柱子和拜伦的题词。

一走出阴森的地下室,强烈的阳光刺得眼睛发花;喧闹、欢腾的大自然使人晕眩。真想活动活动啊!我们决定去攀登其中的一个雪山顶。刚开始登山时还觉得挺轻松、愉快,但后来越往上山路越难爬了,我们就叫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在旅馆等我们。

为了快点登上山顶,我们干脆弃路硬闯。一步比一步吃力了,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却步子轻快、精神饱满,他还笑我好胜性强,不甘落后。过了不一会儿,我已经四肢着地,两手抓住积雪在爬行了。雪在我手里融化,但是我依然紧跟着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没有落后。

终于,我们登上了山峰。山上的风景一眼望不到边,变幻无穷的瑰丽景色真是难以形容。不同地带、不同气温、种种景色都呈现在眼前。最上面,皑皑白雪,闪烁夺目;稍低处是一片北方植物;再往下则是绿油油的高山草地和郁郁葱葱的南国花卉。我激情满怀,准备朗诵莎士比亚和拜伦的诗句。我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望了一眼,见他坐在一旁默然沉思,突然出声喝道:“孟什维克真捣鬼!……”我们出来玩时曾讲定,为了“不煞风景”,不提孟什维克。所以一路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谈笑风生、心情愉快,显然,他已经把孟什维克、崩得分子都丢在脑后了。但是,此刻刚一坐定,他的脑子又回到平日的思路上去。

我还记得这次旅游中一个动人的插曲。我们碰上了一块开满鲜花的野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立刻兴高采烈地开始为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采花。他说:“娜久莎最喜欢花啦。”他摘花的动作就象一个少年一样敏捷,一眨眼功夫就采了整整一大抱鲜花。

最使我感动的是列宁对自己亲属的那种感人至深的关怀，尤其是对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和她的母亲，更是关怀备至。他同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的母亲有着深厚的友情。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和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两人生活的友爱和睦、趣味爱好的一致，为人间所罕见。起初，对他俩的居住条件我曾感到惊讶。当时在日内瓦大家都过着欧洲式的生活，住上等房间，睡弹簧床，因为日内瓦的房租和生活费用都比较低廉。但是列宁却住在一幢类似俄国小城镇中的那种房子里。楼下是厨房兼餐室，收拾得又干净又整洁，不过几乎没有什么家俱；靠厨房的一边有一间不大的房间，那是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的母亲住的；楼上是卧室，又兼作伊里奇的工作室。里面放着两张普通的小床，几把椅子，沿墙放着几只书架和一张堆满了书报的大桌子。开始我对这种陈设觉得有些单调，但是去过一两次后，我却舍不得离开了，因为在那里使人感到随和、舒适、毫不拘束。房间里这种简朴的布置特别使工人们感到亲切，大家都觉得象在自己家里一样。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并不是要过苦行僧的生活，他喜欢丰富多采的生活，至于衣、食和住房等条件在他的生活中却是无足轻重的。这倒不是由于条件不许可，或是有意克制，而纯粹是因为没有这种需要。我记不得有过什么时候，即使是在随便说笑的场合，谈论起什么美味佳肴和衣着服饰。他们当然也吃、喝、穿，但是生活的这个方面并没有引起谁的注意。

他们平日的生活是这样安排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坐着埋头工作，或是上图书馆去；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处理来往书简或把信件译成密码；母亲则张罗家务。家务虽不算复杂，但仍得花不少精力和劳动。提起这位可敬可爱的老妇人，就会使人联想到，她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和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的生

活带来多少方便和舒适。她一直没有和列宁夫妇分开过。她和他们一起度过流放生活，一起侨居国外，1905年和他们一起回到俄国，之后又再次一起侨居国外。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她十分体贴关怀。

我接受了筹备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任务。我为新的前景所鼓舞，休息后精力又充沛，于是就动身回国了。但不幸得很，我在边境上被捕了。在狱中我收到了列宁和克鲁普斯卡娅的几次来信，使我了解了党内情况和已经出现的高潮。

下面就是1904年12月24日的一封信：

“早准备给您写信，由于忙乱耽误了。现在我们情绪高涨，大家都拚命干。昨天发表了我们的《前进报》出版的广告。所有的多数派都空前的欢欣鼓舞。令人厌恶的无谓争吵终于被打断了，我们开始同那些愿意干事而不想胡闹的人齐心协力地工作。作家集团的人选很强，是一些新生力量；经费不够，不过很快就会解决。出卖我们的中央委员会完全丧失了信用，它自行选补了（卑鄙地、偷偷地）孟什维克分子，并忙于反对代表大会。多数派的委员会正在联合起来，已经选出了常务局，现在机关报将把它们完全联合在一起。乌拉！不要泄气，我们会越来越有生气。不管怎样，我们相信迟早一定会见到您的。来信谈谈您的健康情况，主要的是要振作精神；要知道，我们还不算老，还大有可为。

您的列宁。”^①

在收到这样一封信以后，身陷囹圄就更难于忍受了。我们强烈地渴望自由，渴望工作。形势的发展日新月异。消息传进监狱使我们更坐立不安，急不可耐。眼看着轰动一时的1905年1月的那些日子来临了，又过去了。我们彻夜不眠，期待着革命的发展，

^① 《列宁全集》第34卷第279页。——编者注

一心指望起义的人民来打开牢狱的大门，把我们解放出去。唉，有时牢门是打开了，只是又关进了新的难友。然而监牢里的制度倒是被打破了，监牢里骚动起来，我们了解到越来越鼓舞人心的消息。

我们的案子匆匆忙忙地进行审理。1905年5月我被判处流放阿尔汉格尔斯克省的北方边缘地区，刑期五年。路上我逃了出来，于9月间回到彼得堡并开始担任工作。

我象长了翅膀似地兼程赶往彼得堡，唯恐赶不上我想象中的准备武装起义、积极实现列宁提出的口号等重大事件的发展。但是我看到的却是另一番情景。波格丹诺夫、克拉辛和中央委员会其他几个委员认为这些口号提得过早，无法付诸实现，他们千方百计加以篡改。波格丹诺夫断言局势倒是对推行孟什维克的主张有利，而我们布尔什维克，据他说，只须努力保持思想的严整和团结一致就够了。同志们和彼得堡委员会的委员们委托我给列宁写信，向他汇报当前的局势和请示如何行动。他们要我转告列宁，彼得堡委员会完全站在他的路线一边，一致赞成《无产者报》的口号并谴责被篡改过的中央委员会的口号。我收到了列宁于10月26日写给我的回信。他写道：“关于党内的事情，我认为您有点过于悲观。我是根据这里的情况说的。在这里我经常听到‘基层组织’说，《无产者报》显然在走下坡路，事情进行得糟透了，报纸每况愈下等等。梦是可怕的，但上帝是仁慈的。面临着现在这样巨大的运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下党的中央委员会也不能满足千分之一的需要。而且我们的口号，《无产者报》的口号已不再是旷野的呼唤了，即使从一些合法报纸所报道的消息中（消息说一个大学里常举行一万至一万五千人的集会等等）我们也可以明显地看出这一点。我们俄国的革命真是好极了！我们希望赶快回去，看情况很快就可以如愿以偿。”在谈到武装起义的时间问题时列宁指出：“由谁来

确定呢？我个人希望把它拖到春天，拖到在满洲的军队回来的时候，在我看来，把时间拖一拖整个说来对我们是有利的。不过，反正不会有人来问我们的。要抓住目前大规模的罢工。”

信末是这样写的：

“……总的说来国外的作用现在正与时俱下，而且这是不可避免的。当然，在我们还不能把《无产者报》搬到彼得堡涅瓦大街出版以前，我们无论如何也不会抛掉它。不过现在对合法报纸也应当多加注意。国外已经不得不局部地收摊（宣传性书刊），很快就会全部收摊，到彼得堡去开市。

在准备武装起义方面，我劝你们马上到处进行最广泛的宣传，组织群众，建立几百个几千个很小的（三个人的）独立的战斗队伍，这些队伍要尽量用各种方式自己武装起来，并且在各方面做好准备。再重复一遍，我希望把起义的时间拖到春天，当然，我在千里之外判断事情是很困难的。

紧紧握手。

您的尼·列宁”。^①

布尔什维克的第一张合法报纸《新生活报》在11月9日，即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写了上述这封信以后过了两个星期，在彼得堡出版的。从上面所引的信和列宁在次日写给中央委员会的信来看，很明显，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已掌握了彼得堡的情况，他知道出版合法报纸之事早已准备就绪。

在我们书信往来之际，形势在继续发展。很多事情起了变化，我在信中所流露的种种焦虑的情绪也已不复存在。

我们非常焦急地等着列宁回来。他终于回来了，并在当天就出席了彼得堡委员会的会议。他立刻看出了我们的激情、革命的思想、准备战斗的心情，同时也马上发现了我们缺乏经验，不会把

^① 《列宁全集》第34卷第365—366页。——编者注

工作真正地组织起来。他批评我们尽在会议堆里瞎忙，还狠狠地责备我们竟让孟什维克窃据了工人代表苏维埃的领导权。列宁到来之后，我们为苏维埃而进行的斗争开展得更加积极主动了。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详细地询问了我们的工作、跟工人区的联系、工人们的要求以及我们跟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的斗争情况。具体地了解了武装工人、训练工人战斗队的进展情况。对于这项工作的种种细节和性质他不厌其详地逐一过问，唯恐遗漏了什么。他一面问，一面提出建议、指示。他问我们会不会打枪，进行不进行训练。列宁很关心用真正的武器去武装工人，他建议把所有军火库、枪枝店考虑进去。他还询问是否在制造炸弹和怎样制造。对于布尔什维克在军队里的工作列宁格外关心，他建议挑选经过锻炼的优秀同志去担任该项工作。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农民的工作也同样重视，专门成立了农村工作委员会。我们选派了鼓动员奔赴各地农村，跟农民建立联系。

我记得1905年11月13日（26日）列宁在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会议上的一次讲话。那天正好是政府宣布同盟歇业的日子，彼得堡有十万工人被赶出工厂。

托洛茨基、马尔托夫和其他孟什维克的首脑人物关于这一事件的演说是多么可悲可怜啊！巴拉莱金-托洛茨基装腔作势的讲话，内容十分空洞，显得张惶失措。空洞乏味的高调掩盖着他们的软弱无能，真是一付屈膝投降的狼狈相。托洛茨基建议去和军事部长、企业主们谈判复工的条件。

这时列宁发言了。整个大厅屏息静气地倾听他的演说。一种真正的革命气氛顿时充满会场，大厅紧锢的四壁仿佛被推开了，我们的面前展示出宏伟革命前程的广阔图景。会场里洋溢着公社的气息。

列宁揭露了政府企图通过同盟歇业来打击革命和工人阶级这

一手法的政治含义。列宁指出，政府想用饥饿的威胁来挫败工人
们的斗志，使他们屈服，或者立即挑起公开冲突，以进行武力镇压。
列宁号召不要退让，但也不要理睬政府的挑衅，不要在不利的条件
下仓促应战，要加紧把一切革命力量团结起来。列宁说，不应该去
请求和协商开工，而应提出开工的要求，如果遭到拒绝，就号召大
家进行总罢工和采取其它果断的斗争手段。列宁提出要为总进攻
积聚力量，到将来战斗对革命、对起义人民有利、对政府不利时才
投入战斗。为了使准备起义的计划能付诸实现，应该马上同其他
城市的工人、同铁路工人、邮电工人、农民以及其他团体，同陆军和
舰队取得联系。

列宁这一番充满革命热情的演说鼓舞了全体听众，当他把进
一步推动革命的行动纲领和清楚明了的计划讲给大家听时，会场
里响起一片赞扬之声，随即转为热烈的欢呼。

在经久不息、暴风雨般的掌声中，在与会者热烈的欢呼声中，
一致通过了列宁提出的决议案。

“对啊”，工人们在散会时谈论说，“只有这个人才懂得应该怎
么办，应该如何带领工人阶级。而那几个说大话的家伙，象赫鲁斯
塔廖夫、切尔诺夫、托洛茨基，他们光会耍嘴皮子，说漂亮话，对我
们毫无益处，只有害处。”

工人们在听列宁演说时的神情真令人难忘。欢乐的激情浮现
在人们的脸上，沁入每个人的心肺，把列宁同听众紧紧地联系在一
起。站在你身边的同志，本来神色忧郁，可一下子情绪起了变化，
脸上露出了欣喜的笑容，眼中闪烁着激情的光芒，那么精神、年轻，
使你都认不得他了。忧郁寡言的人突然变得非常健谈，向别人倾
诉自己喜悦的心情，显得激情满怀，似乎列宁的天才也有一部分传
导到了他的身上。

听过列宁演说的工人往往就会永远转向我们这一边。记得有

一个工人这样责备我：“嗨，你们呀，要是也能学会象列宁一样解释你们的纲领的话，孟什维克大概一个工人也骗不了啦！瞧他，把一切说得多有条理！”

学会象列宁一样讲话，做一个象列宁一样的人，这正是全体布尔什维克热切的愿望。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忙得应接不暇，因为每个布尔什维克都想见见他，听听他的讲话，跟他谈上几句，得到他的指示。

对于我们这些在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时期和代表大会后跟孟什维克作斗争时期就认识列宁的人来说，还是有机会多次见到他并跟他议论使我们感到不安的一些问题的。但是，要象在日内瓦的时候那样朝夕相见当然是不可能的了。不过无论怎么说，我们见到列宁的场合毕竟不止在会议上。常常早上到列宁那儿去一趟，比如说，去安排他作演说或是党的会议等事宜，我们当然就趁机跟列宁随意地谈一会儿。假如列宁不是十分繁忙的话，他也会很乐意地和我们随便聊天的。他的谈话总是给我们增添新的力量和热情。说实话，好多次我们滥用了跟列宁亲近的机会，有时在不十分必须的情况下也跑去找列宁。但我未觉得这使列宁厌烦，我也不记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有过任何不高兴的表情和举动，其实，这也用不着，因为列宁会不知不觉地沉思起来，停止谈话，这时对方立刻就会意识到该告辞了。

列宁常常会一下子中止谈话，沉思起来。显然，在开始对某个吸引他的思想进行分析研究之前，他先在心中默默地思考主要的内容。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在她的回忆录里曾提到过列宁在坐下来工作之前，总是先踱来踱去，轻声地叙述自己的想法。当着我们这些外人的面，他没有这样做，但他好象一下子就转到专心考虑的问题上去了，不再注意我们。用不着提醒，看一眼就知道该告别了。而在同客人辞别时，列宁已经有些漫不经心了，似乎没

有看见你一样。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知道列宁这个特点，有时候就问同志们，是否见怪。见怪！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我们热爱列宁，我们带着高兴的心情倾听他的每一句话。我们每个人都甘愿为了维护他而死。

尽管从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以来，我们跟孟什维克的分歧日趋严重，但是同他们统一的问题还是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不反对统一，虽然他比我们中间的任何人都清楚这种统一是多么靠不住。

地方上的统一在中央决定前就开始搞了。我记得有一天早上我们在“叔叔”（即莉迪娅·米哈伊洛夫娜·克尼波维奇，当时的彼得堡党委书记）的家里同列宁谈论统一的事。莉迪娅·米哈伊洛夫娜是个固执的布尔什维克，对于在没有代表大会决定的情况下搞统一这个问题，她是听也不愿听的。

“眼下铁路工人正在罢工，怎么开代表大会呢！”我对她大声叫道（她耳朵有点聋）。

“不管怎样，您没有权利这样做，等开代表大会时再说。”

“您想开什么代表大会？政府就要崩溃了！皇帝就要倒台啦！”我拚足力气大叫。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看着我们俩争得面红耳赤，就哈哈大笑起来。

列宁几乎一次也没有缺席过彼得堡委员会召开的会议。他要求我们每个人详细汇报所做的工作，对于任何疏忽或对党的决议理解不对的地方都给予批评。

有一次我抱怨说，工人们的妻子对我们的走访并不都很欢迎，有时公然表示讨厌。列宁听了很生气，追问道，我们走访工人家庭时是怎么对待工人的？我们只得承认，我们对工人的生活条件、家庭情况很少关心。而当孩子们在一旁吵闹，妨碍我们谈话时，又显

出不耐烦的样子。有时候她们对我们这些不期而至的客人嘀咕埋怨，工人们便弄得很窘迫，不好意思，要我们别理会婆娘们的蠢话。嘿，列宁把我们狠狠地批评了一顿……

“哼！要是换了我的话，我早就把你们轰出去了！妇女们的生活多么艰难啊，她们既要到厂里做工，还得担当家务，照料孩子，要是丈夫一旦被捕入狱，又得为丈夫的命运担忧，这一切你们为她们想过没有？这些妇女肩负着劳动和家庭的重担，生活困苦不堪，时刻为参加革命斗争的丈夫担惊受怕。应该切实地体会这些事情，用恰当的话和行动去争取她们，使她们产生好感。”

我们懂得了走访工人家庭时不应该以傲慢不逊或冷漠的态度对待他们，而应该体谅他们的生活，尊重他们的习惯；不是在口头上，而要在行动上表示准备对他们有所帮助。

列宁继续说道：“当你们看见她们又是喂孩子、又是洗衣服、又是张罗其他家务，忙得饭也顾不上吃、坐下歇一会都不行，在这种时候，你们是否想到去帮帮她们的忙呢？”

列宁的这些话使我们终身难忘。我们改变了自己的工作态度，找到了打开女工们心灵的办法。这样，不久之后，我们就已经和她们，还有她们的丈夫一起，高举着用她们灵巧勤劳的双手绣成的革命大旗，手挽着手，步伐一致地行进在游行队伍的行列之中了。

列宁在我们身上唤起的决非一般的善良的感情，而是一种政治觉悟，这是这样一种觉悟：缺少了它，政治活动就不可能取得成效。

1906年夏天，在第一届国家杜马解散以后，我被莫斯科委员会（我已经在莫斯科工作了）派去听取列宁的指示。当时列宁住在芬兰库沃卡拉车站的一所叫做“瓦沙”的别墅里，它的形状颇象狭长的顶棚。我向列宁详细汇报了十二月起义被镇压之后莫斯科一些

人的精神状态，讲了知识分子中间，甚至一部分工人中间的低落情绪。我还说，革命看来正在走向低潮，反动派神气了，开始了镇压，整个工作正在逐步收缩。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仔细地听我汇报，但是我觉得他似乎不很满意，好象持有异议。

“好吧，”他说，“即使事实果真如此，我也将是最后一个才下这样的断语。只要斗争还在进行，实际上也正是这样，不管你们说些什么，我认为不应该泄气，而应该行动。”

甚至在莫斯科的武装起义被镇压下去之后，列宁也不认为革命垮了。因为他看到无产阶级不愿放下武器，农民在继续斗争，军队和舰队里不安宁，而主要的是他坚信，席卷全国的革命风暴不会平息，也不可能平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精神抖擞，他酝酿着各种新的计划，筹备下一届党代会。暂时的失败并没有使他丧失信心。他提出为了今后的进攻，要从这次失败中汲取教训。

列宁对革命的工人阶级的创造力一直是深信不疑的。1911年我在日内瓦见到他。他做报告时那种昂扬的、可以说对未来充满希望的语气使我大为惊讶。虽然那时我们中有些人悲观失望，以为反动派会长长期得势下去。但列宁断言，新的高潮已临近，现在搞革命，工人阶级比1905年更成熟了。他认为，农民已经意识到自身行动的无组织和散漫性，认识到同无产阶级共同行动的必要性。他说，政府和统治阶级无力解决任何问题，革命的主观和客观的先决条件均已具备，革命不可避免，革命必定成功，因为党、工人阶级和农民不会重犯1905年的错误，而将从中汲取有益的教训。

列宁的讲话使我们深受震惊。他就象神话中的勇士，把耳朵贴在地面上，听见了革命在地下发出的轰鸣。每个人都感到，列宁这样说并不是为了鼓舞听众的情绪，而是因为他深信革命已经逼近，进行革命的一切先决条件都已具备，才这样说的。他在报告中列

举了许多事实来证明工人阶级正在进行斗争，参加罢工的人数逐年增长，而能显示工人阶级的力量和强大、表明工人阶级政治上的成熟和斗争决心的事件正在酝酿着。

在1912年，当连纳事件爆发以后，全国各地掀起了工人罢工、示威游行的浪潮的时候；当工人阶级中宣布要以团结一致、准备继续战斗来回答对连纳金矿工人的枪杀的时候，人们就更会想起列宁的这番话。这以后发生的事件充分证实了列宁的上述预见——工人阶级搞革命已经成熟，革命已经临近。

今天，当列宁的名字已经响彻全世界，当人们为了歌颂他传颂着各种传奇般的故事的时候，每个人都想深入地了解他的内心世界，探求其天才的洞察力、坚强的意志和巨大的力量的奥秘。

正象高尔基所写的：“他们来自印度的穷乡僻壤，翻过崇山峻岭，穿过林间小道；冒着生命危险，不畏路途遥远，偷偷地进入喀布尔，来到俄国代表团的住地。这些世代受英国官僚压榨的印度人反复问着一个问题：

“列宁是个什么样的人？”

在全苏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在讲话中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心“燃烧着对全体劳动人民、全体被压迫人民的强烈的爱。虽然他自己从没有说过这一点……”这些话概括了列宁的全部精神面貌。谁也没有听到列宁在什么时候讲过他怎样爱人民。但是每个人都知道，都感觉到这种强烈的爱；每个人都很清楚，列宁的心同千百万人民的心在一起搏动。

载于《回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
第1卷1956年莫斯科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版第284—304页

论 列 宁

(1924年1月28日在克里姆林军校学员晚会上的演说)

约·维·斯大林

同志们！我接到通知，说你们这里要举行回忆列宁的晚会，并邀请我也来做一个报告。我认为没有必要做一个关于列宁的生平事业的连贯性的报告。我想，倒不如只把一些表明列宁作为一个人和作为一个活动家的某些特点的事实告诉大家。这些事实相互间也许没有什么内在的联系，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得到一个关于列宁的总的概念。不管怎样，我这一次向你们讲的不可能比我刚才所答应的更多。

山 鹰

我最初和列宁认识是在1903年。固然，这次认识并不是经过亲自会面，而是经过互相通信。但是这次认识给我留下了一个不可磨灭的印象；我在党内工作的整个时期中，这个印象始终没有消失过。那时我正被流放在西伯利亚。当我知道列宁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末，特别是从1901年以后，在《火星报》出版以后的革命活动的时候，我就深信列宁是一个非凡的人物。当时在我看来，他不是我们党的一个普通的领导者，而是我们党的实际上的创建人，因为只有他一个人了解我们党的内部实质和迫切需要。当我拿列宁和

我们党的其他领导者比较的时候，我总觉得列宁的战友普列汉诺夫、马尔托夫、阿克雪里罗得等人都远不如列宁，列宁和他们比较起来不简单是一个领导者，而且是一个最高型的领导者，是一只山鹰，他在斗争中不知恐惧为何物，大胆地引导我们党沿着前人未曾走过的俄国革命运动的道路前进。这个印象竟这样深深地印入了我的心灵，使我感到必须写封信给一位侨居国外的好友，把这个印象告诉他，要他评论一下。过了不久，当我已经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的时候——这是1903年底——我收到了我那位朋友的热情的答复，以及列宁的一封简单而内容丰富的信，原来我的朋友把我那封信给列宁看过了。列宁的这封信虽然比较短，但是它对我们党的实际工作做了大胆无畏的批评，并对我们党在最近时期的全部工作计划做了非常明确扼要的说明。只有列宁才善于把最复杂的事情描写得这样简单和明确，这样扼要和大胆，——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是一颗子弹。这封简单而大胆的短信使我更加确信列宁是我们党的山鹰。可惜我按过去地下工作者的习惯，把列宁的这封信同其他许多信一样烧掉了，这是我不能宽恕自己的。

从那时起，我就和列宁认识了。

谦 逊

我第一次会见列宁是在1905年12月坦默福斯（在芬兰）布尔什维克代表会议上。我本来希望看见我们党的山鹰，看见一个伟人，这个人不仅在政治上是高大的，而且可以说在体格上也是高大的，因为当时列宁在我的想象中是一个身材匀称和仪表堂堂的巨人。当我看见他原来是一个和凡人毫无区别的、最平常的、身材比较矮小的人的时候，我是多么失望呵……

通常，“大人物”照例是开会迟到，让会场上的人望眼欲穿地等

着他出现；而且在“大人物”就要出现之前，会场上的人彼此告诫说：“嘘……静一点……他来了。”我当时觉得这一套并不是多余的，因为它能令人肃然起敬。当我知道列宁比代表们到得更早，躲在一个角落里朴实地同那些参加代表会议的最普通的代表们进行最普通的谈话的时候，我是多么失望呵。老实说，我当时觉得这未免有点违背某些必要的常规。

后来我才明白，列宁这样质朴谦逊、这样不愿表现自己、至少是不想惹人注目、不摆架子的特点，正是他的最大长处，正是他这种新群众的新式领袖，即人类最“下层”普通群众的新式领袖所具有的最大长处。

逻辑力量

列宁在这次代表会议上发表了两个精彩的演说：论目前形势和论土地问题。可惜这两篇演说词都没有保存下来。这是两个使人兴奋的、使代表会议全场欢欣鼓舞的演说。非凡的说服力，简单明了的论据，简短通俗的词句，没有矫揉造作，没有专为加深听众印象的令人头晕的手势和力求效果的词句，——这一切都使列宁的演说远胜于通常“议会”演说家的演说。

可是当时使我佩服的还不是列宁演说的这一方面。当时使我佩服的是列宁演说中那种不可战胜的逻辑力量，这种逻辑力量虽然有些枯燥，但是紧紧地抓住听众，一步一步地感动听众，然后把听众俘虏得一个不剩。我记得当时有很多代表说：“列宁演说中的逻辑好象许多万能的触手，从各方面把你钳住，使你无法脱身；你不是投降，就是完全失败。”

我认为列宁演说中的这个特点是他的演说艺术中最强有力的地方。

不 灰 心

我第二次会见列宁是在1906年我们党的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上。大家知道，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布尔什维克占了少数，遭到失败。当时我第一次看见列宁处于失败者的地位。他丝毫不象那些失败后就灰心丧气的领袖。恰恰相反，失败使列宁更加精神百倍，鼓舞自己的拥护者去作新的战斗，争取未来的胜利。我现在说的是列宁的失败。但这究竟是怎样的失败呢？必须看一看列宁的反对者，即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上的胜利者——普列汉诺夫、阿克雪里罗得和马尔托夫等人；他们很少象真正的胜利者，因为列宁用他对于孟什维主义的无情的批判把他们打得体无完肤了。我记得当时我们这些布尔什维克代表都聚集在一起，望着列宁，问他的意见。在某些代表的言论中流露出疲倦和气馁的情绪。我记得列宁对于这种言论用讽刺的蔑视的口气回答说：“同志们，不要灰心，我们一定会胜利，因为我们是正确的。”憎恨灰心失望的知识分子，相信自己的力量，相信胜利，——这就是列宁当时告诉我们的。当时令人感到布尔什维克的失败是暂时的，布尔什维克在最近的将来一定会胜利。

“不因失败而灰心”，——这就是列宁活动中的一个特点，这个特点使他能够把一支忠实到底和相信自己力量的军队团结在他的周围。

不 骄 傲

在下一次代表大会上，即在1907年伦敦代表大会上，布尔什维克成了胜利者。当时我第一次看见列宁处于胜利者的地位。通

常胜利总会使某些领袖冲昏头脑，使他们骄傲自大起来。在这种情形下，他们往往就夸耀胜利，高枕而卧。但是列宁丝毫不象这种领袖。恰恰相反，正是在胜利以后，列宁特别警惕和戒备起来。我记得当时列宁十分坚决地教导代表们说：“第一件事就是不要陶醉于胜利，不要骄傲；第二件事就是要巩固自己的胜利；第三件事就是要彻底击溃对手，因为对手只是被打败了，但是还远没有被彻底击溃。”他狠狠地嘲笑那些轻率地断言“孟什维克从此完蛋了”的代表。他毫不困难地证明：孟什维克在工人运动中还有基础，我们还必须善于和他们作斗争，竭力避免过高估计自己的力量，尤其要避免过低估计对手的力量。

“不因胜利而骄傲”，——这就是列宁性格中的一个特点，这个特点使他能够冷静地估计对手的力量，保证党不遭可能发生的意外。

原 则 性

党的领袖们不能不尊重党内多数的意见。多数，这是领袖们不能不重视的力量。列宁对这一点的了解并不亚于党内其他任何领导者。但是列宁从来没有做过多数的俘虏，尤其是当这个多数没有原则立场的时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有过党内多数的意见或党的眼前利益同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相抵触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列宁总是毫不犹豫地坚持原则，反对党的多数。而且，在这种情况下他不怕独自一人去反对全体，因为他认为——正如他自己常说的那样——“原则的政策是唯一正确的政策”。

下面两个事实可以特别明显地说明这一点。

第一个事实。在1909—1911年的时期，党被反革命势力打败，处于完全解体的状态。这是人们不相信党的时期；这是不仅知

识分子，而且一部分工人也纷纷退党的时期；这是人们否定地下活动的时期；这是取消主义的时期，瓦解的时期。当时不仅在孟什维克中，而且在布尔什维克中也有许多派别组织和派别思想，而且大部分都是脱离工人运动的。大家知道，正是在这个时期产生了要完全取消地下组织而把工人组织成为合法的自由主义的斯托雷平党的思想。当时只有列宁一人没有随波逐流，而高举着党性的旗帜，以惊人的耐心和非常的坚忍精神来收集党的零散残部，猛烈攻击工人运动中所有一切反党派别，以非常的勇气和空前的毅力来捍卫党性。

大家知道，在这个为党性而进行的争论中，后来列宁成了胜利者。

第二个事实。在1914—1917年帝国主义战争炽烈的时期，所有的或几乎所有的社会民主党和社会党都染上了流行的爱国主义狂热，替本国的帝国主义尽忠效劳。这是第二国际在资本面前放下自己的旗帜，连普列汉诺夫、考茨基和盖得等等一类人物都抵挡不住沙文主义浪潮的时期。当时只有列宁一人，或几乎只有列宁一人掀起了反对社会沙文主义和社会和平主义的坚决斗争，揭露盖得之流和考茨基之流的变节行为，痛斥骑墙派“革命家”的不彻底性。列宁明知跟随他走的只有很少的少数，但是他认为这没有决定的意义，因为他知道，彻底的国际主义政策是唯一正确的有前途的政策；因为他知道，原则的政策是唯一正确的政策。

大家知道，在这个为新国际而进行的争论中，列宁成了胜利者。

“原则的政策是唯一正确的政策”，——这就是列宁的公式，列宁用这个公式攻占了許多新的“不可攻占的”阵地，把无产阶级优秀分子争取到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方面来。

相信群众

有些政党的理论家们和领袖们虽然知道各族人民的历史，钻研过革命历史的始末，可是他们有时患着一种很不体面的病症。这种病症就叫做害怕群众，不相信群众的创造能力。在这个基础上，有时就产生了领袖对群众的某种贵族态度，而群众虽然不熟悉革命历史，却负有破坏旧制度和建立新制度的使命。怕自发势力汹涌澎湃，怕群众“破坏得太多”，想充当保姆的角色，竭力照书本去教导群众，而不愿意向群众学习，——这就是这种贵族态度的基础。

列宁和这样一些领袖完全相反。我不知道还有第二个革命者象列宁这样深信无产阶级的创造力，深信无产阶级的阶级本能适合于革命。我不知道还有第二个革命者象列宁这样善于无情地打击那些傲然批评“革命的混乱状态”和“群众的胡闹行为”的人。我记得在一次谈话中，有一位同志提出意见说“革命后必须建立正常的秩序”，列宁讽刺地回答说：“如果想做革命者的人竟忘记了革命秩序是历史上最正常的秩序，那就糟了。”

因此，列宁总是鄙弃那些瞧不起群众，想照书本去教导群众的人。因此，列宁总是不倦地教诲我们：要向群众学习，要理解群众的行动，要细心研究群众斗争的实际经验。

相信群众的创造力，——这就是列宁活动中的一个特点，这个特点使他能够理解自发势力，把自发运动引上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

革命天才

列宁是为革命而诞生的。他真正是组织革命爆发的天才和领

导革命的伟大能手。他在革命动荡时代觉得比任何时候都自在、愉快。我完全不是想以此说明，列宁对任何革命动荡都同样嘉许，或者他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条件下都主张革命爆发。完全不是。我只是想以此说明，列宁的英明远见在任何时候都不象在革命爆发时期那样充分和明显地表现出来。在革命的转折关头，他真是才华四溢，洞察一切，预见到各阶级的行动和革命进程的可能曲折，他对这些东西简直是了如指掌。难怪我们党内常说：“伊里奇在革命波浪里游泳，就象鱼在水里一样。”

因此，列宁的策略口号是“惊人的”**明确**，列宁的革命计划是“出奇的”**大胆**。

我记得有两个事实可以特别明显地说明列宁的这个特点。

第一个事实。在十月革命前夜的时期，为后方和前线的危机所激动的千百万工人、农民和士兵要求和平和自由；将军和资产阶级准备军事专政，以求“作战到底”；整个所谓“舆论界”，一切所谓“社会主义的政党”都反对布尔什维克，诬蔑他们是“德国间谍”；克伦斯基企图把布尔什维克党驱入（而且已经把一部分驱入）地下；还很强大的有纪律的德奥联军同我国疲惫的处于瓦解状态的军队对峙着，而西欧的“社会主义者”安然和本国政府结成联盟，以求“作战到完全胜利”……

在这样的关头举行起义是什么意思呢？在这样的情况下举行起义就是孤注一掷。但是列宁不怕冒险，因为他知道，因为他用洞察一切的目光看见：起义必不可免，起义一定会胜利，俄国的起义一定会准备好结束帝国主义战争的条件，俄国的起义一定会鼓舞西方受尽苦难的群众，俄国的起义一定会使帝国主义战争变为国内战争，起义的结果一定会成立苏维埃共和国，而苏维埃共和国一定会成为全世界革命运动的堡垒。

大家知道，列宁的这个革命预见后来空前准确地实现了。

第二个事实。在十月革命后的最初几天，人民委员会打算使叛乱的将军杜鹤宁总司令停止军事行动并开始同德军进行停战谈判。我记得当时列宁、克雷连柯（后来的总司令）和我前往彼得格勒总参谋部去用电报同杜鹤宁直接谈判。时机十分危急。杜鹤宁和大本营坚决拒绝执行人民委员会的命令。当时军队的指挥人员完全掌握在大本营手里。至于士兵，谁也不知道这一千四百万隶属于蓄意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所谓各集团军组织的军队会表示什么态度。大家知道，当时在彼得格勒正酝酿着士官生的暴动。此外，克伦斯基正向彼得格勒进军。我记得列宁在电报机旁沉默了一会，忽然容光焕发。他显然是打定主意了。他说：“我们到无线电台去吧，无线电台会帮助我们；我们下一道特别命令把杜鹤宁将军撤职，委任克雷连柯同志做总司令，越过指挥人员去号召士兵包围将军，停止军事行动，同德奥士兵联欢，把和平事业拿到自己手里。”

这真是“冒险的一跃”。但是列宁不怕这“一跃”，反而乐于进行这“一跃”，因为他知道军队希望和平，军队将扫除和平道路上所有一切障碍而争得和平；因为他知道用这种方法来奠定和平对德奥士兵不会没有影响，用这种方法一定会毫无例外地使所有战线上要求和平的趋向加强起来。

大家知道，列宁的这个革命预见后来也完全准确地实现了。

天才的远见，迅速抓住并看透即将发生的事变的内在意义的才能，——这就是列宁的一个特点，这个特点使他能够制定正确的战略和革命运动转折关头的明确的行动路线。

载于《回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
第2卷 1957年莫斯科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版第60—67页

侨居时期同弗拉基米尔· 伊里奇的会见记事

阿·瓦·卢那察尔斯基

流放期满后(那是在1904年底)我刚来到基辅,就接到多数派委员会常务局的书面通知,要我立即出国参加党的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工作。我动身到了国外。

在巴黎我呆了好几个月,多少是想把分歧的情况进一步弄清楚。可在巴黎我还是一下就当上了那里一个很小的布尔什维克小组的领头人,随即开始与孟什维克们干了起来。

列宁曾给我写过两封简信,要我赶紧上日内瓦去。最后,他亲自跑来了。

他的到来使我感到有点意外。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未作任何明确的解释,只是坚持要我马上去日内瓦。

到日内瓦去的事,我同意了。

就在那时候,列宁决定在巴黎就俄国革命和俄国农民的前途问题作一次长篇的专题报告。

在这次报告会上我第一次听到了他的演说。列宁在讲坛上变成了另一个人。他讲话时全神贯注,两眼凝望着听众;他的身子时而前倾,时而后仰,动作单一,但十分有力;言词滔滔不绝,意气风发,这一切给我的印象十分深刻。

我明白,作为一个演说家,这个人一定会以他的雄辩给人们留

下强烈的、不可磨灭的印象。我原先就知道，作为一个政论家，列宁是多么地有力量！他以异常明朗的风格见长，善于把各种思想，即使很复杂的思想，表达得惊人地简单，阐述得如此深入浅出，就连头脑最不开窍、很少思考政治的人听上去也都会觉得一清二楚。

那时候我就已经清楚地看到，他性格的主要特点，构成他面貌一半特征的，就是意志，极其明确，高度集中，能专心一意地致力于为聪睿的头脑所勾画的当前任务的意志，能把任何局部工作都看作是通向世界政治目标长链之一环的意志。

大约在报告会之后的第二天，记不得为了什么事情，我们去到雕塑家阿隆松那里，那时我同他相交颇为不恶。阿隆松一见列宁的头部便赞叹不已，于是就请求列宁允许他至少塑个头象浮雕。

他向我指出了列宁与苏格拉底的神似之处。其实应该说，列宁虽象苏格拉底，但比较起来却更象维尔连。那时卡尔里也尔的版画维尔连肖像刚问世不久，以后为日内瓦博物馆购进的著名的维尔连半身雕像也是在那个时候陈列出来的。

不过，有人指出过，维尔连跟苏格拉底也非常象。相象的主要点就在气度不凡的头形上。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颅骨的构造确实令人叹赏。需要仔细一点观察，方能对其力量以及那开阔而饱满的前额轮廓作出真正的估价，并且发现，我可以这样说，一种从它表面放射出来的照人的光彩。

雕塑家当然一下子就注意到了这一点。

除此之外，一对深邃的、不很大而目光专注的眼睛也是他跟维尔连和苏格拉底比较时更象维尔连的地方。但那位大诗人眼神忧郁，似乎黯淡无光（根据卡尔里也尔画的肖像），而列宁的眼睛却饱含着嘲弄和讥讽的意味，闪烁着智慧的光芒和一种特别兴奋的神采。列宁的眼睛是如此地富有表现力，如此炯炯有神，使我后来常

常对它们在无意之中流露的各种表情欣赏不已。

苏格拉底的眼睛从那些雕像来看象是鼓出来的。

脸的下半部又是颇为相象，特别当列宁多少留一点大胡子的时候。苏格拉底、维尔连和列宁的胡子长得一模一样，都有点凌乱和未加修饰的样子。

当我与列宁进一步熟识之后，就又看清楚了他的另一个乍一看并不起眼的优点，这就是他那惊人的活力。这股力量在他身上奔腾着、激荡着。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列宁该已经有五十岁了，但就他生活的紧张程度而言，那他就是现在也还完全是个年轻人，一个十足的小伙子。他笑起来多么有感染力，多么可爱，多么象孩子，逗他发笑是多么容易，他是多么喜欢笑——这种人战胜困难时的表情呵！在我们经历最危险的时刻，列宁照样保持着平静，而且还是那么喜欢开怀大笑。

他生起气来同样也是非常可爱。他总是克制着不让自己发怒，这样，他的忿怒几乎就象在闹着玩似的。这种雷霆之怒，“就象是连跑带跳地嬉戏玩耍，在蓝天里轰隆隆炸响”。^①我有许多次注意到这种表面上的爆发，这些气冲冲的话，这些尖刻的嘲讽；同时他眼里却微露笑意，而且这场怒火能在一刹那间整个地平息下来。仿佛这场气是由于列宁认为十分需要这才发作的。他的内心深处非但是平静的，甚至还乐着呢。

在个人生活中列宁最喜欢的也正是这种质朴、率直、单纯、充满旺盛精力的乐趣。他最宠爱的是孩子和小猫。有时他会同他（它）们一连玩上几个小时。

列宁把生活中这种有益的情趣也带到了他自己的工作之中。他下笔极快，笔触奔放，行文信手拈来，毫不费力，不加任何涂改。他不论什么时候都能写作，一般是在早晨；但也有在深夜，辛苦了

^① 此句引自俄国诗人费·丘特切夫《春雷》一诗。——译者注

一天回到家里的时候；或是别的任何时间……

列宁的工作极其勤奋。我真想说他简直是个不知疲倦的人；我现在如果不能这么说，那是因为我¹知道最近以来，他作出的超人的努力终于迫使他每到周末便感到体力有所不支而非休息不可。^①

但是列宁还是很会休息的。因此即便休息时间很短，列宁也能很快恢复疲劳，精神抖擞地投入新的战斗。

这涌泉般熠熠闪光的生命力，连同那博大而精深的智慧以及我在前面谈到的高度集中的意志，就是列宁的魅力所在。这魅力对于周围那些接近他的人来说是无比巨大的。对于那些能力大小和精神状态都迥然不同的人，从象高尔基那样反应机敏的才智超群的人物到来自奔萨省偏僻地区的某个举止笨拙的庄稼汉；从第一流的政治家到随时准备为“世界革命领袖——伊里奇”献身的某些陆海军士兵（昨天他们还是黑帮分子），这种魅力都起着同样的作用。

“伊里奇”这一亲昵的称呼流行很广，乃至连一些从未见过列宁的人也跟着这样唤他。

现在我再回过头来继续回忆有关列宁在大革命前的情况。

在日内瓦我同伊里奇先是在《前进报》，后来又在《无产者报》

^① 1923年3月列宁病重期间，我把这几行话重新看了一遍，我觉得应当承认的是，无论是他对自己，还是我们对他，都没有很好珍惜。不过我还是相信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强健的体质会使他战胜病魔，不久他便可重新回来领导俄共和俄国。不仅在3月份的时候，就是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逝世前一个星期，我们都还是这样期望着的呵。所有为他治病的医生无一例外地对他的家属和挚友们保证说，病情正在迅速好转。就这一点来说，1923年3月份我们对病情的估计反而比，譬如说，同年的12月份来得更为悲观一些。而就在同时，不治之症却继续在发展。医生们错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伟大的脑子，在病患已使它严重受损的情况下，竟还是那样刚毅地跟各种症候作斗争，以致有时使病情出现鼓舞人心的好转。正是这一点使医生们迷惑了。——阿·卢·注

的编辑部里一起工作。列宁是一位非常好的同行。他写东西，正如我已经说过的那样，又多又省力，对待自己同事们的工作也十分认真，常为他们改稿、作指示，对每一篇有才气、有说服力的文章他都感到由衷的高兴。

1905年1月以前，我们在日内瓦生活的第一阶段，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党内斗争上。这里使我感到震惊的是，列宁对论战双方的唇枪舌剑竟采取无动于衷的漠然态度；他并不以为争取多数站在孟什维克一边的国外听众的工作有多大意思。他从不在各种隆重的辩论场合露面，也不太赞成我去参加，他宁愿让我去做整篇整篇的专题大报告。

从他对待论敌的态度里觉察不到任何暴怒，然而，他却是一个十分严酷的政治上的对手，对于他们的每一次失策，他都加以利用；对于机会主义的每一个苗头，他都捉住不放。话说回来，在这一点上他是完全正确的，因为后来孟什维克们果然自己把他们那时候的火星统统吹成了十足的机会主义的火焰。我们跟孟什维克的关系搞得实在是够糟的，因此，政敌当中也就很少有人能在那时保持一点人与人之间的私交。孟什维克成了我们的敌人。使孟什维克同我们关系特别恶化的是唐恩。列宁一向很不喜欢唐恩这个人，对马尔托夫倒是喜欢的，但认为他政治上太优柔寡断了。

列宁在当时是个叱咤风云的人物。他以极大的热忱展示了进一步开展革命斗争的前景，并且热切地向往回到俄国去。

但我这时因健康欠佳和疲惫的缘故到意大利去了，跟列宁只保持书信往来，多数是属于政治事务性的，因为谈的都是有关报纸的事情。

载于阿·瓦·卢那察尔斯基：《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回忆和论文集）》1933年莫斯科党的出版社版第5—9页

同弗·伊·列宁在日内瓦 和巴黎的会见

莉·亚·福齐也娃

经过七个月的监禁之后，1904年初春，我从彼尔姆监狱获释了。跟我同时关押在那里的还有我的兄弟以及其他同志，罪名是我们加入了彼尔姆的社会民主主义组织。出狱后，我立即又投入了革命工作。然而才过一个月，就明摆着我难免再次被捕，于是彼尔姆的同志们便帮助我逃往国外。我从他们那里得到了去萨马拉秘密接头的暗号；到萨马拉之后，我拿到了一张前往边境小城苏瓦乌基的介绍信，在那里将替我作好出境的安排。

通过国境这件事简单得令人好笑，可也花了十五个卢布。据向导告诉我说，这笔钱相当大一部分是边防哨所长官得的，而国境边上的小兵就只分到二十戈比——买一瓶伏特加酒的钱。我越过一道不很宽的小河，只几分钟工夫就到了德国的领土上了。我的向导把我送到德国小城戈利达普，在那里我按照在苏瓦乌基时给我指定的地址找到一位当裁缝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在他家里宿了一夜。第二天，他帮我弄到了一张火车票，我就上柏林去了，随后从柏林到了日内瓦。

到日内瓦之后我没有马上同弗·伊·列宁见上面。我按照给我的地址来到卡鲁什街，在那里碰到弗·德·邦契-布鲁也维奇同志，我把他错当成列宁了；他作了自我介绍后对我说，弗拉基米

尔·伊里奇和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眼下并不在日内瓦，不过他们很快就会来的。

弗·德·邦契-布鲁也维奇非常亲切地接待了我，并建议让我到布尔什维克党的书刊发行部去工作，那个部是由他受中央委员会的委托主管的。发行部也设在卡鲁什街（我们称之为“卡鲁什卡”）。我在那里见到了维·米·韦利奇金娜（邦契-布鲁也维奇）、马·尼·利亚多夫和他的妻子莉·巴·曼德尔施塔姆、弗·弗·伊林、潘·尼·勒柏辛斯基和奥·波·勒柏辛斯卡娅以及许多党的工作人员——布尔什维克。这都是些非常好的同志，我同他们交往不仅很愉快，也很有益，因为有助于我认清政治侨民的纷繁复杂的生活环境。

来日内瓦之前，我对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之间分歧的实质和程度还没有清楚的认识。但就我们能了解的不很多的情况来看，我们是倾向于布尔什维克的。因此，我来到日内瓦以后，我的全部同情都在布尔什维克一边，而且立即加入到他们中间去了；也许，与其说这是根据充分的了解，还不如说是出于本能吧。只是当我在日内瓦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党的书刊，特别是列宁的《进一步，退两步》这部著作以及与老同志们交谈之后，我才对布尔什维克同孟什维克之间分歧的深度和不可调和性有了透彻的了解。

日内瓦政治侨民的情况非常紧张和复杂。布尔什维克为召开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与孟什维克展开了尖锐的斗争。孟什维克推行分裂政策。孟什维克立场在思想上的无原则性决定了他们无论在外国政治侨民中，还是在俄国国内所推行的行动路线。他们在书刊上和会议上千方百计地诽谤布尔什维克；指责列宁，说他搞专制，想把全部党权抓在自己手中，搞波拿巴主义，总之把一切不可饶恕的罪戾都加在列宁头上；欺骗国内的党组织；想方设法破坏布尔什维克在日内瓦组织的会议；一旦要开会通过什么决议案

时，他们就玩弄偷天换日的手法篡改表决结果。一言以蔽之，他们没完没了地制造无谓纠纷，吹毛求疵地搞派性争吵，闹得人有时无法容忍。孟什维克追逐每一个从俄国来的工作人员，企图把人家拉到自己一边来，为此甚至不惜使用蛊惑人心的手段。

1904年夏天，我一到日内瓦所面临的就是这种紧张而又艰难的侨民生活环境。

不久，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和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回到了日内瓦，我怀着激动的心情久久盼望的与列宁的第一次会见终于实现了。这次会见使我终生难忘。列宁的沉着坚毅和一贯的朝气蓬勃，他的意志力使我感到惊讶。列宁仿佛置身于那些纠纷之外，无限超然于它们之上。他以高度的原则性和对所捍卫的观点的坚定信念来对抗孟什维克的无原则性。他阐明了布尔什维克立场的实质，阐明孟什维克观点在意识形态上是站不住脚的，是机会主义的。

在日内瓦逗留期间，我差不多天天都在不同场合遇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他无论作为一位英明的领袖，还是作为一个极好的同志，或是他在那样复杂的环境里待人接物所持的恰如其分而又似乎特别温和的态度，总是使我叹赏不绝。

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同俄国国内的布尔什维克委员会以及其他布尔什维克组织进行秘密的通信。她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说，在争取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斗争时期，信件一个月多达三百封。她建议让我担任她这项工作的助手，我欣然同意了。

在同娜·康·克鲁普斯卡娅一块儿工作的过程中，我喜欢上了她。她一向沉稳、娴静、和蔼可亲、时时关怀并乐意帮助每一个同志。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具有渊博的理论知识和丰富的党的工作经验。侨居国外期间，她在列宁的直接指导下，每天同地下党组织通信，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贡献给了这一重要和艰巨

的工作。

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一面收到从俄国寄来给列宁的大量信件和通讯稿，一面便把我们地下组织的情况详细地报告列宁。她是列宁的好帮手，她对职业革命家当中的人才了如指掌，同志们名字以及他们的党内化名她都一一记得很清楚，她善于肯定每一个党的工作人员的长处。

跟俄国通信是一项繁重而辛勤的工作，它包括这样几个步骤：首先，收到的信件要分拣；每封信都要显影；信中用密码写的部分要解译出来并加以重抄。其次，寄到俄国去的信要拟好内容，把最机密的部分译成密码，再把全信用化学方法写在事先准备好的，内容不会引起保安局怀疑的，用普通墨水写的信件的行间。来信中的密码部分常常有错，这就需要动好多脑筋才能把它们解译出来。也有这样的情况，由于上一封信寄丢了或者组织遭到了破坏，来信换了一种新的、不熟悉的密码，要弄明白是什么意思则又是一件难事。有时，用化学方法写的信没有显出来，那时就得通过“信箱”要求重写一封寄来。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密切注视着同俄国的通信。那些信通常由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以列宁的名义执笔，或由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亲自动手写。其余的事务性工作，当我在日内瓦的时候，是由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和我两个人分担做的。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为党的各个委员会写的信件，意义非常重大。那些信团结和联合了这些委员会，起了总领导的作用，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地下工作者迫不及待地盼望这些信，怀着激动的心情阅读它们。

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还办理“信箱”这项工作。在秘密工作条件下设“信箱”是至关重要的。它以简洁的形式和只有收信人才懂的用语发指示、提建议、询问消息、

告知哪些信件收到,哪些信好久没有收到,某一封信解译不出来等等情况。在布尔什维克停办了自己的报纸的那个时期(1903年11月至1904年底),没有地方可以登载“信箱”,但一俟《前进报》问世后,差不多在每一号上又办起了“信箱”。有时“信箱”占的篇幅很大。例如,《前进报》第九号上,“信箱”就占了将近二十九行。下面就录一则内容不太多的、刊登在1905年4月21日《前进报》第十五号上的“信箱”内容作为例子:

“娜塔:信未显出来,溶液太稀…… **织针:**写有决议的信未显出来。**柯利亚:**捎来的信和地址均已收悉。**弗拉基米尔:**信收到,谢谢。**敖德萨,**‘地方机关某人’:您的来信饶有趣味,请继续写下去。**T-pe:**第1、2、3封及第4封信均收悉。第2、3封是双份。请重复一遍通信地址。**洛拉:**钱和信收到了吗?**安东:**来信收悉。**F.S.III:**地址完全正确。**致《火星报》的抗议书的作者:**我们表示感谢,但没有必要刊登,因为不能每逢人打一个喷嚏都祝一次健康。① **C.C.II:**信和决议均已收悉。**安东尼娜:**我们经常收到。”

我每天一早就去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那里,白天大部分时间都用于工作。“伊里奇一家”那时住在道维特街(我们称之为“道维特卡”)。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和她的母亲伊丽莎白·瓦西里也夫娜住在一套只有两个房间(每个房间仅一个窗户)、一个厨房的简朴的住所里。伊丽莎白·瓦西里也夫娜是一位十分讨人喜欢的老太太,她几乎从来不曾跟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分开过,直到去世都同她住在一起。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待她非常好,而她也格外地疼他。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一家的日常生活极其俭朴。全部家务——买菜、做饭、收拾房间都由伊丽莎白·瓦西里也夫娜一个人

① 俄谚,比喻旁人的闲话不必都放在心上的意思。——译者注

担当。她总是很安祥，从不手忙脚乱；对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非常体贴。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常抽空帮她的忙。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常对我说，做家务并不使她受累——这点儿算不了什么——而必须经常想着这件事反倒是个负担。

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和她母亲住一个房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住另一个房间。两个房间的陈设都很简单，跟普通工人家一样。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房里放着一张铁床，上面铺着棕垫，一张不很大的桌子和两三把椅子。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这里接见从俄国来的同志们，同他们进行谈话。他要看书写作的话就上公共图书馆或读书会去，那里有很好的工作条件。他一大早出去，回来吃了午饭以后又去，直到喝晚茶时才回家。我记得“伊里奇一家”吃午饭是在下午四点。偶尔我也接受他们的盛情邀请留下来吃饭，工作特别忙时甚至还留下喝晚茶。那些日子对我是特别珍贵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平时总是心情愉快，常开玩笑。他逗引伊丽莎白·瓦西里也夫娜，要她相信对一个重婚者最严厉的惩罚便是他有两个岳母。无论吃饭还是喝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一概不谈工作。他吃起来胃口挺不错，从不挑挑拣拣，看来他对吃些什么是满不在乎的。

我很欣赏这个家庭特有的和睦、协调的气氛。这种气氛是建立在高度的原则性、共同的精神情趣、相互信任和尊重的基础之上的。

我同多数俄国政治侨民一样，通常在勒柏辛斯基夫妇开的饭馆里就餐。这家饭馆从早到晚顾客盈门。事实上这里是布尔什维克的俱乐部。同志们在这里碰头，交谈新闻，争论一番，下下象棋，听听报告。从俄国来的同志首先第一个去处就是勒柏辛斯基夫妇开的饭馆。这里放着一架租来的钢琴。晚间我们常听谢·伊·古

谢夫演唱歌曲，听彼·阿·克拉西柯夫拉小提琴，我为他俩伴奏，有时也找个什么钢琴短曲弹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也常到这里来。古谢夫是最积极的布尔什维克之一、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天生一副动听的男中音嗓子，音乐天赋很高。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满意地听他演唱达尔哥梅日斯基、鲁宾斯坦、柴可夫斯基的抒情歌曲。

我演奏的钢琴曲中，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最喜欢贝多芬悲怆奏鸣曲第八首作品十三号（即所谓小热情奏鸣曲）。有一次，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听完这支曲子之后走到我跟前对我说：“您应该学习”。这话使我吃了一惊。“意思说，是可以的罗？！”——我心里想。在我刚刚踏入青春时代的时候，曾迷恋过皮萨列夫的著作。我背下了他这样的一段话：“艺术界里哪怕只有一个目不识丁的人，它就会象一个手上戴着金手镯的裸体野人”（这是我凭记忆摘引的）。这段话给我留下了异常深刻的印象，于是，我离开了我当时正在那里就学，并以优异成绩即将升入高年级的音乐学院而进了别斯图热夫学校。可是突然——竟是谁呵？！——列宁说：“您应该学习……”然而，一直到差不多十年之后我才得以回过头来搞音乐。

克拉西柯夫用小提琴演奏勃拉加的《小夜曲》和拉夫的《抒情曲》等一些不太复杂的曲子，是不错的。莫斯科大逮捕时，彼·阿·克拉西柯夫侥幸没有被抓去，这以后，在6月底他就到日内瓦来了。我见到他时，他刚从火车站来，跟潘·尼·勒柏辛斯基走在一起，手里提着一只小箱子和一把装在盒子里的小提琴。一位从密探和宪兵的魔掌下挣脱出来，手里带着一把提琴偷越过国境的职业革命家——这在我眼里显得有点非同寻常。克拉西柯夫是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他谈了会上的好多趣闻，谈了在俄国的工作以及他土生土长的西伯利亚的情况。在同孟什维克进行辩论时

他的发言总是很成功，善于钻对方的空子，抓住最薄弱的地方，准确地给予打击；他机警、灵活、尖刻而有分寸。正因为如此，孟什维克才这么不喜欢他，而他则在党内得了个雅号叫“簪子”。

有一次克拉西柯夫建议我组织一个三——四个同志的小组，由他来教我们怎样按指定的题目写普通的或秘密的传单。参加小组的除了我之外，有索尼娅·阿法纳西也娃——她是我关在基辅监狱时的难友；瓦利娅·卡萨特金娜，当时是日内瓦大学医疗系的学生，后来，到1905年，成为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维埃的秘书；以及还有一个什么人。我们当中谁也不想在内瓦长久地呆下去，而在俄国写传单是非常用得着的。于是我们欣然接受了克拉西柯夫的建议。但这个小组活动了不多久就没有再搞下去，因为这个主意出得有点不切实际。

晚上我们有时在“兰多尔特”咖啡馆消磨时间。那家咖啡馆专为俄国政治侨民设了不很大的一处雅座，有一个单独出口跟一条胡同相通。晚上我们在那里喝啤酒，边喝边谈边争论，或者下象棋玩。只有布尔什维克才上“兰多尔卡”^①去，至少，我在那里时就从来没有遇见过一个孟什维克。我下棋多半是跟古谢夫，而克拉西柯夫则在一旁观战助兴，还老是一个劲儿地打岔妨碍我们。有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也跑来杀一盘。有几次我曾同玛丽亚·伊里尼奇娜两个人一道在那里坐了一两个钟头。

玛丽亚·伊里尼奇娜·乌里杨诺娃是1904年9月下半月或10月初刚出狱不久来日内瓦的。我们相互认识以后，马上就成了好朋友，我们的友谊一直保持到她去世。1905年我在彼得堡因革命工作的需要经常同她见面。十月革命以后，玛丽亚·伊里尼奇娜随苏维埃政府迁往莫斯科，住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住所里。

^① 即“兰多尔特”咖啡馆。——译者注

她无限热爱列宁，是他的亲密的朋友。那几年我们天天见面。玛丽亚·伊里尼奇娜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如何关心她的事讲给我听。逢到潮湿天气，他就要查问她是否穿上了套鞋；看到她显出疲倦的样子，就问她是否“操劳过度”了。有一次，在克里姆林宫的院子里，我碰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和玛丽亚·伊里尼奇娜在散步。我同玛丽亚·伊里尼奇娜打起雪仗来。这场快活的游戏一直进行到我把雪球扔得玛丽亚·伊里尼奇娜满领子都是才罢手。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走到她跟前，关心地替她把雪掸干净，免得灌进她脖子里边去。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生病期间，玛丽亚·伊里尼奇娜同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始终都没有离开过他。她是一位无限忠于党、把全副精力和自己的整个生命都献给了革命的职业革命家，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1937年6月上旬玛丽亚·伊里尼奇娜突然患了重病，随后一直昏迷不醒，于6月13日去世。

我同玛丽亚·伊里尼奇娜(她的党内化名叫小狗熊)常骑自行车到日内瓦郊外去兜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有时跟我们一起。有一天傍晚，我们三个人骑车经过郊外一个什么地方，我们走的是一条田间小路，很窄，两旁都有一道不很深的沟。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骑在头里，我跟在他后面，玛丽亚·伊里尼奇娜在最后。小路微微向下倾斜。我是才学会骑自行车的，还不懂得可以使用后刹车，而前刹车又失灵了，这样，我的车就失去了控制，以越来越快的速度朝前面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冲过去。我嚷了起来：“我要撞上来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听到我的喊声回头一看，发现有危险，就朝沟里拐了过去。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及时地跳了车，但他的自行车掉到沟里摔坏了；车把歪了，不能再骑了。我未听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有丝毫责备或懊恼的表示，这就更加使我感到难堪，埋怨自己心慌意乱，竟没有想到应该赶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

前面把自己的车拐进沟去。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一面愉快地跟我开着玩笑，一面把我们领到不远的一座教堂附近的一条长椅旁边。教堂里传来了簧风琴的乐声。我们坐在长椅上听了一会儿音乐，然后，推着自行车步行回到了城里。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喜欢骑车作这样的郊游，他多半同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一起去。这些活动对他至少是一种休息，换一换那由于同孟什维克关系越来越紧张而变得令人焦躁和紧张的环境。

潘·尼·勒柏辛斯基那些著名的漫画使得令人不安的紧张状态一度得到了某种程度的缓和。6月份，孟什维克的《火星报》上出现了马尔托夫针对列宁《进一步，退两步》一书写的文章：《前进还是后退？》马尔托夫宣称列宁在政治上已经死了，于是就给文章加了个小标题：《代悼词》。潘·尼·勒柏辛斯基的漫画《老鼠葬猫》是对孟什维克《代悼词》的回击。这幅画是他画得最好的漫画之一。潘·尼·勒柏辛斯基笔下的老鼠画得活象马尔托夫、唐恩、波特列索夫等几个出名的孟什维克。说明词借用了茹可夫斯基的童话《老鼠和青蛙的战争》的结尾部分，配得很成功。这张漫画在日内瓦广为传播，人们交相传诵说明词里的某些句子。布尔什维克听了哈哈大笑，孟什维克听了则气得发狂。这幅漫画以笑这一致命的武器鞭挞了孟什维克，孟什维克对此是无招架的。

7月，布尔什维克侨民的情况变得更加困难了。几名中央委员被捕以后国内中央委员会成员起了变化。新的中央委员会采取了调和的立场并发表了坚持与孟什维克和解、坚决反对召开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反对争取召开这次代表大会的鼓动工作的声明（《宣言》）。列宁被解除了管理中央委员会国外事务的职务，而且，不经中央委员会会务委员会全体同意，不得出版他的任何著作。中央委员会不准布尔什维克的刊物运往俄国，而要求散发孟什维克

的刊物。这一切引起了俄国国内党的工作的混乱。冲突接二连三地发生。日内瓦布尔什维克小组的人全都对业已形成的局面感到十分难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心情更是特别地沉重，因为他比谁都清楚，这一切将使精力白白地浪费掉，使俄国党的工作遭到全面的破坏，而这一切又是发生在国内革命运动的发展要求我党最大限度地集中力量的时候。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以及他最亲密的同志们明白，对中央委员会分裂主义的《七月宣言》不能不予以反击。召集当时在日内瓦的布尔什维克开一次小组会议的想法就是这样产生的。这次会称作“二十二个布尔什维克会议”。会上讨论并通过了弗·伊·列宁写的《告全党书》^①。宣言从头至尾充满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所特有的对党的力量的坚定不移的信念，相信党有能力克服严重的危机，而且无论如何会走上正确的道路。

会议是在城外——日内瓦近郊的一个地方举行的。记不清是什么样的幢房子了，但开会是在二楼，一间相当宽敞的大厅里。我无法确切地记得所有出席会议的人的名字了。1904年夏天我在日内瓦遇见过许多布尔什维克地下工作人员。他们当中有卢那察尔斯基、波格丹诺夫、马利宁、沃罗夫斯基、卡尔宾斯基、伊林夫妇、彼尔武欣夫妇等。其中谁是会前就来了，因而也就参加了会议的；谁又是会后才来的，我说不准确了；但我清楚地记得出席会议的人当中有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弗·德·邦契-布鲁也维奇、维·米·韦利奇金娜、勒柏辛斯基夫妇、利亚多夫夫妇、彼尔武欣夫妇、彼·阿·克拉西柯夫、谢·伊·古谢夫、莉莎·克努尼扬茨。

《告全党书》对立即召开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必要性作了说

^① 见《列宁全集》第7卷第447—454页。——编者注

明，认为这是摆脱危机的唯一可行的出路，并号召党的各个组织为召开代表大会而斗争。它对俄国党的各个布尔什维克委员会的活动起了重大的作用，使它们手中有了战斗的武器——争取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斗争纲领。10月，在列宁的倡议下，在俄国成立了多数派委员会常务局，为召开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进行筹备工作。

没有报纸，这给布尔什维克组织在工作上造成了很大的困难，对领导国内党组织的工作影响特别大。

要办一份布尔什维克报纸的想法越来越吸引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和他最亲密的同志们。布尔什维克的出版社（“弗·邦契-布鲁也维奇和尼·列宁出版社”）出了一批寄往俄国的小册子，是由列宁、奥里明斯基、沃罗夫斯基、利亚多夫、波格丹诺夫和其他同志写的。但这些显然是不够的。需要有一份紧密联系党的各个组织、对俄国革命生活的种种事件反应迅速的报纸，一份指导性的、定期印行的机关报。

神经的极度疲劳迫使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和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离开日内瓦去休养。大约从7月中到9月中他们徒步在瑞士的山区旅游，住在布雷湖边的农村里。整个这段时间，特别是8月份，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同留在日内瓦的中央委员会国外代表弗·德·邦契-布鲁也维奇、马·尼·利亚多夫、潘·尼·勒柏辛斯基保持着密切的通信联系；他指导他们工作，通过他们收到来自俄国的信件。

这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出版布尔什维克报纸的计划看来已经完全成熟。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在她的回忆录里说，她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布雷湖畔的一个偏僻的小村子里同波格丹诺夫、奥里明斯基和彼尔武欣一起度过了8月。在那里他们同波格丹诺夫商议好了写作工作的计划，“计划在国外出版自己的

机关报，并在俄国开展召开代表大会的鼓动工作”。^①

我在8月底收到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和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的来信也间接地证明了上述情况。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要求“尽可能快地(最好是今天)”把信寄给“所有我们的在俄国的朋友”。下面就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亲笔写的那封应该寄往俄国的信的全文：“请立即收集所有各种通讯，并按我们的地址寄来，注明列宁收。我们也需款甚急。局势日益尖锐。少数派勾结部分中央委员，显然要准备变革。我们等待最坏的情况。详情不日再告”^②。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又重复了一遍说这封信必须马上发出。接着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亲手写了应该把信寄去的十个地址：“总之，按所有完全可以信得过的朋友们的地址寄”。看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收集通讯稿是作新的布尔什维克报纸的素材用的。出版报纸的拦路虎是缺乏经费。但是11月里弗·德·邦契-布鲁也维奇跟一家法国公司谈妥了报纸纸张和印刷的贷款问题，而马·尼·利亚多夫则弄到一定数目的款子作为最初的经费。此外，以后还可以通过在国外和俄国国内出售报纸弄到钱。

这一切使出版报纸的事情有了一个扎实的基础。因此1904年12月初在日内瓦举行了布尔什维克小组会议，最终解决了出版新机关报的问题，一致通过它的名称为《前进报》，通过了弗·伊·列宁提出的关于该报出版的通知的全文。此外，还解决了编辑方面的一些问题和确定了编辑部的成员为：列宁、沃罗夫斯基、奥里明斯基和卢那察尔斯基。这次会议上大家的情绪是高昂的。事情终于取得了进展而不再停留在原地不动了！开会时我也在场，我看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又高兴又激动，而且并非他一个人如此。

① 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列宁回忆录》，见本书第1卷第343页。——译者注

② 《列宁全集》第34卷第249页。——编者注

所有的人都有如释重负的感觉。

《前进报》继承了列宁旧《火星报》的路线。它在争取召开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斗争中以及在领导国内布尔什维克各地下组织、阐明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分歧的实质和原则方面都起了巨大的作用。1904年12月24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写信给玛·莫·埃森说：“现在我们情绪高涨，大家都拚命干。昨天发表了我们的《前进报》出版的广告。所有的多数派都空前的欢欣鼓舞。令人厌恶的无谓争吵终于被打断了，我们开始同那些愿意干事而不想胡闹的人齐心协力地工作”。^①

《告全党书》的通过使布尔什维克的情绪大为高涨，但并没有使局势得到缓和。凡布尔什维克举行报告会，孟什维克总要组织捣乱，没有一次不是这样。记得有一次布尔什维克举行专题报告会，双方就差一点儿没打起来。孟什维克起哄捣乱，企图夺现金。我们怀着极度的反感离开了会场，同克拉西柯夫、古谢夫以及另外几个同志在日内瓦的街道上一直徘徊到天亮，大家都义愤填膺，激动到了极点。

我在日内瓦听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最后一次演说是他的题为《地方自治派的运动和〈火星报〉的计划》的专题报告。这次报告会是在“兵营”咖啡馆举行的。入场券上印着下列字样：“‘兵营’咖啡馆。晚上八时半准时开始。入场券编号：十二。列宁同志专题报告会。讲题：《地方自治派的运动和〈火星报〉的计划》。凭券入场。票价二十生丁。多数派专题报告组织委员会。会议主席：弗拉·邦契-布鲁也维奇。日内瓦”。

列宁的专题报告是为批判1904年11月出版的《火星报》编辑部致各党组织的信（《仅供党员阅读》）而作的。在这封信里孟什维

^① 《列宁全集》第34卷第279页。——编者注

克提出了一套完整的政治运动计划，以便对为宪法说好话的自由资产阶级发生影响。孟什维克提出组织人数众多的工人示威游行使自由资产阶级增加勇气。他们提出用支持自由主义立宪运动来代替提出革命要求的工人示威游行。

列宁对当了资产阶级尾巴的孟什维克作了揭露，指出孟什维克竭力想使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表示屈从，甚至为了讨好资产阶级而要求“减少无产者的勇气”。对政府组织群众性的冲击，而不是同地方自治派签订协定——列宁这样规定了无产阶级斗争的最近期的目标。现实生活很快就证实了列宁路线的正确性。1905—1907年革命期间自由资产阶级暴露了他们自己是一股反革命势力的真面目。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作专题报告时热情奔放。他把孟什维克，就象我们常说的，狠狠地“剋”了一顿。孟什维克简直气疯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报告被印成小册子寄往俄国国内。

我们大家都异常振奋：1905年1月4日《前进报》创刊号终于出版了。我收到这份报纸时人已经到了巴黎。

1904年12月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派彼·阿·克拉西柯夫到巴黎去当俄国布尔什维克小组的书记以加强该组的工作。约两个星期之后我也到了巴黎。一开始的时候巴黎使我看得傻了眼。偌大的城市，车水马龙的街道，众多的历史纪念碑、博物馆、鲁佛尔宫①、卢森堡宫②，陈列馆里的雕塑和绘画展览……一切都很新奇，使人眼花缭乱。但不久，最初的印象就变得淡薄了，接着便开始觉得在这个人口集中的大城市里有点儿空虚和令人犯愁。俄国侨民人数并不很多。在巴黎居住了多年的老同志有菲拉托夫，年轻的有贝尔、英别尔、娜嘉·舍维林娜、拉希利·里夫林等同志。

这里没有日内瓦那种组织之间的紧张斗争，也较少碰到孟什

① 法国故宫。在巴黎市中心。1793年起辟为博物馆。——译者注

② 法国参议院所在地。——译者注

维克。但在日内瓦能摸到俄国革命生活的脉搏的跳动，而在这里就不行。为俄国国内党组织牵引提线的中心人物——列宁——也不在这里。

同日内瓦，即同国外中心的联系大都通过玛丽亚·伊里尼奇娜进行。所有党内的最新消息都由她告诉我们。同她的通信十分频繁。她的来信往往很长，谈到了从俄国得到的消息以及日内瓦发生的事情，还常寄书刊来，其中包括日内瓦布尔什维克的出版社出的一些小册子以及寄给巴黎小组和准备“装在信封里”寄到俄国去的《前进报》。常常有同志从日内瓦来，带着书刊和一幅幅绘画（复制品），里面巧妙地贴有布尔什维克的铅印出版物，交由我们邮寄到俄国去。所有那些出版物那时都印在一种很薄很薄，几乎可用来卷烟的纸上，这样，往俄国寄的时候就省事得多了。常来巴黎的有沃罗夫斯基、邦契-布鲁也维奇、卢那察尔斯基、埃森（男爵以及他的弟弟布尔）等。

1905年1月或是2月，玛丽亚·伊里尼奇娜由日内瓦寄到巴黎给我的信中，有一封信谈到了国内某些党组织情况不太妙的消息。她希望《前进报》能改变各地方组织的情形。玛丽亚·伊里尼奇娜写道，重要的是多派些人到俄国去，钱是有希望得到的，但暂时还没有。

“听说彼得堡有十七个孟什维克被抓。敖德萨的情形不赖，叔叔^①最近在那里。那里孟什维克陆续去了十四个人，戴夹鼻眼镜的小老鼠季^②也在内。那地方成立了一个八人宣传小组——四个孟什维克加上四个布尔什维克，但看上去发展的趋势多半将是，各地通过分裂的途径，分别成立孟什维克委员会和布尔什维克委

① 叔叔指莉·米·克尼波维奇。——莉·福·注

② 勒柏辛斯基在《老鼠葬猫》这幅漫画中画的印·格·斯米多维奇-列曼（季姆卡）就是这副样子。——莉·福·注

员会。

本地新闻有这么一些：马尔托夫在日内瓦做了一次关于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专题报告，内容空洞，索然无味，就象是对五年级中学生做的报告。报告对各种辩论，对新《火星报》的新计划竭力避而不谈，弄得本来打算发表意见的沃伊诺夫^①再怎么想说也只好作罢了，因为没什么好反驳的……我们的人组织了一系列的小组：组织组、鼓动组、宣传组、技术组。工作搞得很有生气，会议都作了记录。目前很有意思，也挺有成效，就不知以后会怎样……”

玛丽亚·伊里尼奇娜希望我们搞好把书刊装在信封内分寄到各地去的工作。“这项工作是十分重要的，况且，其他侨民区在这方面又搞得很糟糕。如我们对莱比锡也曾抱过很大的希望，从那里寄出去的却主要是《火星报》(!!)伦敦则一声不吭等等”。另外玛丽亚·伊里尼奇娜要求把从巴黎寄出的布尔什维克书刊的收件人地址统统告诉她，而且，如果有记录的话，那就把给什么人寄过什么东西也附上；她答应也把新地址寄来，“不过，重要的是利用这些地址……”^②

把书刊装在信封里或用印刷品挂号寄往各地时，即使在巴黎这样的大城市也只能采取每次寄一点点的办法，一天一两件，免得到了边境上发生问题。每天不断地把“信封”寄出去，换句话说，也就是俄国国内的党组织收到载有列宁的指导性文章的刚出版的报纸，现在当然很难想象这工作有什么意义。这条“小运输线”是我们在巴黎工作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是很认真地去完成它的。

我们应做的工作还包括在政治侨民中间散发布尔什维克的书

^① 阿·瓦·卢那察尔斯基。——莉·福·注

^② 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第25号全宗第34号目录第35394号保管单位。——编者注

刊,迎接和安排外来的(多半来自日内瓦)同志们,组织收费的、设有小吃部的晚会(晚会收益上缴给经费一向拮据的党的会计处)。

一月九日事件使整个侨民区动荡起来。我们急不可耐地等着从俄国传来的一件件新闻。成群结队、通宵达旦地徘徊在巴黎灯光如昼的“林荫大道”上。我们不时跑到各报社的编辑部去看看有没有来自俄国的最新电报。似乎是既离不开同志们,更无法安静地坐在家里或者去睡一觉。向往回国的心情更加强烈了。

一月九日事件几天之后,我们出席了特罗卡杰罗宫大厅的群众集会,会上饶勒斯就一月九日事件发表了演说。可以容纳一万人的大厅被挤得水泄不通。饶勒斯在台上几乎象跑一样迅速走着,他按照法国人演说的习惯,用的是一种慷慨激昂的、朗诵似地拖长了的声调。俄国听众对此是不习惯的,但炽烈的演说词深深地感染了与会者,所以,当饶勒斯讲完了的时候,全场激奋而有节奏地高呼起口号来,连续喊了有好几分钟之久:“刽子手一尼古拉!刽子手一尼古拉!”这番情景是十分动人的,但是当我们走出宫来时,看到入口处前面站着警察马队。在法国,无论怎样大声喧闹也好,发表革命言论也好,只要关起门来在室内搞,便是宪法所许可的,但是在街上举止必须循规蹈矩……上万个人镇静自若、不慌不忙地退到街上,各人分散干自己的事去了。

一连几天我们提着募捐箱在晚会和音乐会上向观众募捐“救援一月九日事件死难者”的款子。每天早晨我们都焦急地抢最新的报纸看,急于想知道彼得堡发生的事情。沙皇刽子手们枪杀赤手空拳的工人,造成大批伤亡的骇人听闻的罪行使我们大为震惊。我们的心时时向着日内瓦。很想知道日内瓦的同志是怎样对待俄国来的消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是如何评价俄国发生的事情的。这事件意味着什么?是开始革命了吗?

过了很久很久,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在她的回忆录里

作了如下的追述：“一月九日事件的消息是第二天早晨传到日内瓦的。我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往图书馆去，路上遇见了去找我们的卢那察尔斯基夫妇。我还记得卢那察尔斯基的妻子安娜·亚历山大罗夫娜的样子，她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只是无可奈何地摇晃着皮手笼。我们决定到勒柏辛斯基夫妇开的侨民饭馆去，凡是听到彼得堡事件的消息的布尔什维克都本能地纷纷赶到那里去。大家都希望聚在一起。聚在一起的人们彼此都不说话，那时大家都太激动了。人们唱起了：‘您为革命而牺牲……’。大家都是一脸全神贯注的表情。人们都意识到：革命已经开始了，对沙皇的信仰已经消失了，现在‘暴政即将垮台，……人民站起来’的时代迫近了。

我们也象那时住在日内瓦的一切侨民一样过起独特的生活来：一号一号地读着当地的报纸——《论坛报》。

伊里奇的全部思想都集中到俄国去了。”^①

几天之后，我们兴奋地看了《前进报》第四号的社论。列宁对彼得堡发生的事件的描述和分析读上去就象是革命的宣言。还有谁能写得象列宁那样好呢？谁也不能！

“工人阶级从国内战争中得到了巨大教训；无产阶级在一天中所受到的革命教育，是他们在暗淡的、平常的、受压制的生活中几个月几年都不能受到的…… 不管彼得堡本身目前的起义如何结束，它必定要成为走向更广泛、更自觉、更有准备的起义的第一步。”^②

社论号召全体公民立即武装起来，做好准备、组织和联合一切革命力量同专制制度进行斗争。

随着布尔什维克报纸《前进报》的出版和流传，国内布尔什维

^① 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列宁回忆录》，见本书第1卷第346—347页。——译者注

^② 《列宁全集》第8卷第77、79页。——编者注

克的阵地越来越巩固了。对各地方委员会来说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之间的思想分歧变得更加清楚、明白了。孟什维克企图用无原则的纷争、组织上的混乱和以虚伪的报道蒙蔽国内各委员会的手法来模糊这些思想分歧。但他们却一步步失去了他们的地盘。他们叫嚷说代表大会必然会导致分裂。

俄国的党组织越来越坚决地要求召开代表大会。鉴于这种情况，在国内的调和主义中央委员会于1905年3月12日（25日）与多数派委员会常务局商定共同发表《告全党书》，宣布他们已就共同组织召开代表大会达成了协议。这份协议书的最后一点指出：“中央委员会和多数派委员会常务局认为党总委员会在《火星报》第八十九号上公布的反对召开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定不能成为停止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的理由”。这是布尔什维克在道义上的彻底胜利，是党性对小组习气的胜利。

中央委员会和多数派委员会常务局的《告全党书》刊登在1905年4月5日《前进报》第十三号上，是印的单页。在玛丽亚·伊里尼奇娜的来信里可以看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和他最亲密的同志们对它的反应。

她写道：“你们认为第十三号的单页怎么样？真太出乎意料了，不是吗？这谁能料得到呢？中央委员会里剩下的两名委员自行增补了两个调和分子和两个（按国内一位同志的说法是十分‘卑鄙的’）孟什维克，尽管如此，‘总委员会在《火星报》第八十九号上公布的决定不能成为停止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的理由?!’这个消息使我们大家都大吃一惊。现在代表大会可能会产生最意想不到的结果，也许，国内所有的委员会都会去参加，连总委员会——想必如此——也会去参加。它还能有什么别的法子可想呢?! 它的论点蠢得令人难以置信，但不经过斗争，它未必就肯投降——大概首先该把它自己开除出党，因为它曾气势汹汹地这样威胁过所有胆

敢去参加代表大会的人。孟什维克垂头丧气，如同皮球泄了气一般，有的说：‘可不，你们胜利了’，有的则公开扬言：‘好吧，我们还会有办法的！’那些元老们暂时没有表态。

我们的人激动得了不得，当然也就什么工作也干不了啦，一个劲地只晓得议论将会发生什么事情。伊里奇完全‘发了狂’（引自勒柏辛斯基的漫画‘老鼠葬猫’的说明词。——莉·福·注）。起初成天只是哈哈地乐个没完——这使大家感到很不安——我很久没有见到他这副模样了。泥潭派委员会也许仍然占多数，许多问题将取决于代表的组成，我们将来会遇到些什么——天晓得……”^①

1905年的3月和4月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工作特别紧张，他正在加紧进行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他在日内瓦就筹备第三次代表大会问题发表演说；为《前进报》撰文；准备代表大会的决议案；就代表候选人的提名问题给国内党组织发信，建议既要邀请布尔什维克委员会，也要邀请孟什维克委员会出席代表大会；还要在日内瓦参加筹备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的组织委员会的各种会议。与此同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巷战的战术进行了研究和周密的思考，因为俄国正在开展人民革命。

4月5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写信给在巴黎的克拉西柯夫。克拉西柯夫将代表国外组织委员会参加代表大会，在动身之前，他应该先到列日去讲一讲代表大会的筹备情况。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劝他“买一张有效期四十五天的环行票，巴黎——列日等地——巴黎”并规定了对待代表的方针：“我们对待代表的方针应该是非常和平的方针，因为我们‘不会失去任何东西，而会赢得一切（在胜利的时候）’，我们的对手却相反”。^②

^① 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第25号全宗第12号目录第35407号保管单位。——编者注

^② 《列宁全集》第36卷第126页。——编者注

4月25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前往伦敦出席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持的是库尔斯克和敖德萨委员会有表决权的委托书^①；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作为有发言权的代表也去参加代表大会了。

1905年春，大概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和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在伦敦期间，玛丽亚·伊里尼奇娜来到了巴黎。我记不得那回玛丽亚·伊里尼奇娜是为什么事来的，在巴黎呆了多长时间。我只记得我们常常到拉雪兹神父墓地去，久久地坐在公社战士墙对面的小山岗上。1871年凡尔赛当局在这座墙附近枪杀了一千五百多名巴黎工人——巴黎公社最后的保卫者。我们俩促膝谈心，交流了将来工作的计划。玛丽亚·伊里尼奇娜讲了好多关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事情。

回到日内瓦之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有关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和孟什维克代表会议作了一次指导性的报告。

6月初，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来到巴黎。在来之前他先写了封信给我，内容如下：

“刚刚给您打了一个电报。为了以防万一，我要说明这是怎么回事。有人邀请我到巴黎办一件事情。我一定不能放过这次旅行的机会，只因为我要作专题报告。讲题是‘第三次代表大会及其决议’。内容是对我们的决议和孟什维克的决议作对比的分析，因为他们刚刚发表了他们的代表会议的通报，我也要对这个通报加以分析。我只能在星期二作专题报告（我星期一到达，晚上将有别的事情），并且一定要在一天之内结束。如果可能，请你租一个最

^① 库尔斯克委员会给弗·伊·列宁寄委托书是为了防止出现以下情况：库尔斯克派出的代表因某种不以其本人意志为转移的情况而无法出席大会。但库尔斯克的代表出席了代表大会，于是弗·伊·列宁就仅代表敖德萨委员会出席了第三次代表大会。——编者注

大的礼堂（就是我在那里作过驳斥司徒卢威的报告的地方，菲拉托夫和其他人都知道），请通知尽可能多的听众。如果还没有明确地给我回电，请你明天来一个电报，我好确切知道礼堂是不是已经租到了？也许还来得及给我写一封快信（至迟在星期日早晨要接到），如果有什么重要情况，务必打电报通知我。

今天我在这里也是作报告。

握手。

您的列宁

见反面！

万一不能作专题报告，也许我根本不去了，因此请你务必告知。”^①

礼堂租到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报告也作了。除了作关于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之外，我不知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来巴黎是否还有别的什么事情要办。他这次在巴黎呆了至少三天。有两个晚上他没事就上剧院看戏去了。第一次是菲拉托夫同志出的主意，他对巴黎非常熟悉。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到大歌剧院去听歌剧，但听后并不满意，感到乏味得很。第二天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去了“弗利·贝尔热”剧院，是我和克拉西柯夫同他一起去的。上演的是风格轻快的小戏。记得有一出戏名叫《巴黎的脚》。帷幕低垂到膝盖高度，从幕的下面可以看到不同职业、不同社会地位的人的一双双脚打台上经过：工人、制灯匠、女裁缝、神父、警察、小铺掌柜、巴黎花花公子等等。这些脚特别典型，因而决不会认不出那是怎么样人的脚，不知不觉就在头脑中勾画出了这个人物的全貌。那情景是非常荒谬可笑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不住地纵声大笑——只有他一个人会笑得那样富于感染力。这天晚上他得到了很好的休息。

^① 《列宁全集》第36卷第131—132页。——编者注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走后不久，克拉西柯夫被派到几个国外侨民区去巡回作有关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和孟什维克代表会议的报告；我回到了日内瓦，打算在近期内动身到俄国去。果然，过了没多久，我就在日内瓦搞到了一张家住尼古拉也夫城、名叫萨拉·尤特科夫娜·杰尔巴林吉盖尔的护照。护照已逾期五年，这样，到了边境上为这张护照恐怕就要付许多钱。但同志们给我出主意，让我到时候随口给报一个瞎编的地址，就说我住在尼古拉也夫某某地方，接下来就说要等到了目的地之后，登记换护照时再付钱。

1905年7月我带着一些秘密书刊动身经由柏林回俄国去了。经过边境时有一阵子感到有点紧张，提心吊胆的。“会出事吗？护照会不会露马脚？”但一切都很顺利，我重新又回到了祖国。我到普斯可夫跟家里人短暂地聚了聚，随后就来到了革命的彼得堡。

载于莉·亚·福齐也娃：《弗·伊·列宁的生活片断》1967年莫斯科政治书籍出版社版第5—31页

列宁做编辑工作

维·阿·卡尔宾斯基

1904年秋，我结识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我们是在一家瑞士啤酒馆的单间客厅里见面的。这家酒馆座落在日内瓦郊区的阿卡西亚斯街上。布尔什维克通常都在这家酒馆里聚会，不言而喻，我们当时没有自己的会议厅。我步入酒馆，照着同志们描绘的形象放眼寻找列宁……那就是他！列宁坐在角落里，他那宽大的前额给灯光照得闪闪发亮；他一只胳膊肘撑在桌子上，手掌托着额角，手里敲着一枝铅笔，微露笑意地不时看看前来聚会的人。正是这个形象永远铭刻在我心中。我要是一个画家，即使现在也能够把他描绘得栩栩如生。

同志们接连地走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身边，随便地打个招呼就交谈起来。过了不久，他就开始作报告了，那时候称之为作专题报告。报告的题目我不记得了。但是初次见面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这才真正是党的领袖，而且又是如此普通的同志，你可以去找他，向他倾吐心里的话！”我暗自说道。

当时由于普列汉诺夫的背叛，党内的破坏分子——孟什维克夺取了中央机关报（党的中央机关报）——《火星报》。结果形成了一个不可容忍的局面：党内的绝大多数是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布尔什维克，而中央机关报却成了机会主义的、孟什维克的报纸。

党总委员会也落到了孟什维克的手里，它连布尔什维克作家小组在自己的出版物里印上党的名称都要禁止。

1904年7月中央委员会的多数派同《火星报》编辑部，同党总委员会开始和解，并且要求列宁停止反对孟什维克的斗争，这时局势就更加恶化了。普列汉诺夫通过一些第三者“友好地”建议列宁“到美洲去躲避羞辱”。

但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不是这种人，他不会放弃他认为原则上是正确的立场。恰恰是在1904年夏天他才决定组织出版自己的布尔什维克的机关报。

在我们的报纸出版之前曾经有过这样一件事。

在1904年12月，有一天日内瓦的布尔什维克小组召集了会议，当时组里大约有二十五个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告诉我们将要出版一份报纸，并且逐一介绍了出席会议的几位编辑。他们之中有一个人我们是很熟悉的。在社会民主党的集会上同孟什维克展开激烈交锋的时候他总是代表布尔什维克的“穷戏迷”发言（我们称呼布尔什维克的“群众”为“穷戏迷”，以区别于党的上层人物，因为当时最著名的领袖几乎全部站到了孟什维克一边）。这个同志也就自称为：**穷戏迷**——一个不太为现在的党员所了解的名字。他就是老一辈的布尔什维克**米·斯·奥里明斯基**。其他几个编辑我们是初次见面。他们是列宁特地请到国外来的几位年轻的布尔什维克作家。

“施瓦尔茨同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介绍说。

话音刚落，一个带夹鼻眼镜的瘦长青年同志站了起来，引人发笑地向我们点头行礼，这是**瓦·瓦·沃罗夫斯基**。接着按同样的方式我们认识了**沃伊诺夫**，即**阿·瓦·卢那察尔斯基**和**列兵**，即**亚·波格丹诺夫**（**亚·亚·马林诺夫斯基**）。①

随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详细地谈了我们的铅印机关报的

计划,并建议取名《前进报》。

“这个报名好,”他说道。

然后宣读了报纸创刊号上要登的全部文章,并展开了讨论。全小组当然都热烈拥护出版自己的布尔什维克报纸。这个报名大家也都喜欢。

同志们展开了批评,提出了意见和希望。

说真的,这样的党内民主使我们这些“穷戏迷”产生了非常强烈的印象。

“瞧,他们多么看重我们!”我们想,“完全不是孟什维克的‘将军们’的那种态度。”

这种处事的态度确实说明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担任编辑工作的一个鲜明特点。他总是十分尊重党员群众的意见。列宁对于创办党的机关报的态度也直接反映在编辑部写的那篇关于出版《前进报》的通告里。通告里写道:

“具有指导性的机关报应该和党保持密切的联系,和无产阶级的运动保持不可分割的关系,走在前面,指明前进的道路,防止错误的做法。机关报只有作为党的集体创作成果时,它才能完成自己的使命。”^②

党的机关报是党的集体创作成果,这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编辑工作上的一条突出的基本原则。

报纸的编辑和组织工作由米·斯·奥里明斯基担负。经他介绍我也逐步参加了党报的工作。开始时我搞校对。我很重视这项

① 波格丹诺夫不久就回俄国去了,其实他不是编辑部的领导人员。关于他,后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曾经说过:不是他领导我们的报纸,而是我们的报纸领导他。——维·卡·注(关于这一点见《列宁全集》第16卷第45页。——编者注)

② 通告由卢那察尔斯基起草,肯定经列宁作了校订。《前进报》创刊号于1904年12月22日(1905年1月4日)出版。——维·卡·注

工作。每出版一号报纸都是党内生活中的一件大事。由于我担任校对，所以还在报纸出版之前就能够阅读和“欣赏”《前进报》的全部文章。而主要的还在于我能够经常见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

有一次在修改某篇文章的校样时，我发现文章里有一处写得不妥当，叙述得不对。我反复读了几遍；不行，这个地方肯定不行！我感到着急，又找同志们商量，最后，我拿定了主意：

“还是去找列宁说一下吧！”

我跑到列宁那儿，把文章给他看，向他解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看了看校样，思索了片刻，说：

“我们马上讨论一下。”

说完，他就走进了编辑办公室。

几分钟时间我都觉得很长。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很快就拿着校样走出来，说道：

“不用改，我们决定还是照原来的样子。”

说实话，这个决定简直叫我楞住了。本来我的批评意见被否定就够丢脸的了，可我原先还这样自以为是！我甚至没请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解释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转身就走了……

但抑郁的心情很快就过去了，完全被另外一种心情所代替：

“你说的话毕竟还是听了，你的意见也讨论了！”我满意地寻思。“一切都做得这样坦率、这样真诚！”

这种重视级别最低的报社工作人员的态度，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一个特点。在他的编辑工作中始终保持了这个特点。

* * *

我身为校对，后来又担任了中央机关报的排版负责人，有机会深入地了解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担任编辑工作的情况。我看到他

是多么热爱这项工作，多么高度地评价报刊在党为实现其目标而进行的斗争中所发挥的作用。大家知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后来在担任苏维埃国家的首脑时，他在填写履历表中职业一栏时写上了：“新闻工作者”、“著作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自己极其重视报刊上发表的文章，因此也要求别人这样做。

他首先要求作者用马克思主义深刻了解自己所阐述的问题，这是不用说的。对那种自以为样样精通的态度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是不能容忍的。

他的第二个要求是：应该善于用自己的话来表达思想！他从文章里，从通讯稿里寻找富有生气的、清新的思想；寻找生动的、明快的语言；寻找初露的才华和有意义的内容。如果这一切都具备了，那他就会不惜精力，不惜时间，对文章进行加工，同文章的作者进行谈话和通信。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是一个很严格的编辑，但决不是一个吹毛求疵的人。在校订文章的时候他只作最小限度的完全必要的修改。在这方面他为评论卢那察尔斯基的一本小册子而写的一封信很发人深思。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很喜欢那本小册子，虽然他在那里也发现了许多表达上疏忽而论敌会进行挑剔的地方。但是他对手稿不“修”不“改”。

他写信给卢那察尔斯基说：“……因为抹去您的特色，破坏一部写得很生动的作品，实在太可惜了。”^①

如果是必要的话，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要求对文章进行反复的修改。比如，上面提到的卢那察尔斯基有一篇文章就是这样。当时委托他写一篇关于出版《前进报》的通告。这是一篇纲领性的文章，文章里面不允许有哪怕是最细微的不确切的地方。作

^① 见《列宁文稿》第5卷第223页。——编者注

者根据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意见不得不对文章修改了三次。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报纸工作的种种细节从不掉以轻心。

“对每一号中央机关报，”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写道，“从最小的细节到最后一个字母都是经过周密考虑的。”

叙述明了、简洁、确切；标题鲜明、准确；选择字体，修改校样，按时出版报纸——对这一切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都十分重视，并亲自加以督促。任何一件“小事”都无法躲过他那锐利的目光。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手里拿着铅笔亲自计算：用什么规格的铅字来排印，每号报纸的印刷符号数就应该是多少。他时常因为缺少小号铅字而感到伤脑筋，他想尽量地节省版面，要求标题少占一些地方，要求把文章里的“废话”统统删去。

他自己是多么精心修改文章的呵！尽管他的笔迹又小又“细”，他所作的修改，添加的字句，校对的符号总是写得极其工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象尊重任何的劳动一样尊重排字工人、缮写员和校对员的劳动；在他看来把手稿里的某个词或某一行字“勾来勾去”，叫工作人员事后要花上几个小时去辨认的那种做法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我看见过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是多么专心致志地对待读者的来信。他通常总是先把来信非常快地看一遍，然后手按着信纸，眯缝起眼睛注视着前方，大约当他断定这是封有意义的、重要的来信之后，他又逐行逐行读起来。要知道，在那个时期读到的来信并不是用打字机打出来的，往往是工人用潦草的笔迹写的。

有的来信读了之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激动得站了起来，在房间里踱来踱去，好象自言自语地说道：

“了不起！这是多么好啊！”

这时他就会走近桌子跟前，将某几行字句重看一遍，最后才动

手修改起来。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尽量保持工人通讯员的独特的语言、写作的风格、处理问题的方法及其论证的独特性。

“他们写得朴素，写得好，他们多么会写呀！我们要是也能学会这样写作该多好！”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多次这样说过。“愈是接近于口语，愈好！作者能从这个方面来观察问题，运用我和你们都从来没有想到过的那些词句和论据，这是很不错的。只要实质上正确，那就更好！”

有时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会加上个把词儿，添进个把句子，写上一个短短的结尾，——这样一来全篇通讯立刻就“文采飞扬”，具有锐利的政治针对性和概括的思想性。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是如何进行写作的，关于这方面的文献保存了不少。平常在写一篇文章以前，照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说法，文章还在“墨水瓶”里的时候，总是先有一段酝酿的时间。他常常要拟一个大纲或者写作提要。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手稿里，有不少是连一处也没有涂改过。但是他也会花费整整几个星期时间对已经写好的手稿进行加工修改。我所指的这篇文章尽管是布尔什维克论帝国主义战争和社会主义的第一本小册子，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这本小册子特别重视。^①

1915年7月28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通知我说：

“小册子现已全部脱稿。”

在下一封来信里他又写道：

“我再重复一遍，小册子已完全脱稿，在我这里摆着。下星期三以前我就寄去，如能加速出版，那我马上就寄上，视您的电报

^① 指小册子《社会主义与战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对战争的态度）》（《列宁全集》第21卷第275—317页）。——编者注

而定。”

小册子虽已完全定稿，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还是把它留在自己那儿。为什么呢？他想利用点滴的时间再审阅一遍，反复周密地思考一番，对其中某些地方再进行修改。将近8月中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才给我寄来小册子开头的一部分。

“小册子中某些地方应该加以补充和修改，”他于8月16日来信说道。^①

他先后寄来三条增补，一条注解和三份附录。此外，他要求寄一份校样给自己进行修改。总之，他对小册子的事十分操心，竭力催促它的出版，而且亲自过问象章节小标题的字体这类细小事情。大体上我们是从7月21日到10月11日一直在为这本小册子忙碌，而在这期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这本小册子的事给我写来了十一封信。

* * *

我逐渐地从校对工作转而做修改通讯稿的工作（原先的工作并没有放弃），以后又做编辑简讯的工作，再就是自己写文章，为报刊撰稿。

想给我们的报纸写篇文章的念头日夜萦绕在我的心头。我曾让自己摆脱这个念头。“你确实写过传单，”我暗自说道，“可这是一张报纸，而且这是一张什么样的报纸啊！实际上，这是党的中央机关报，我们一些最优秀的著作家和列宁本人都在那上面发表文章！你真是想得出，疯了是吗？！”

但是我怎么也摆脱不开这一固执的念头。我开始写文章——不过只是写给自己看，而不是给报纸写，——写的是关于社会革命党人这个当时众目所归的题目，在文章里我尽力反映我们当时对

^① 参见《列宁文稿》第6卷第210、214页、《列宁全集》第36卷第336页。——编者注

这个党的斗争情形。我写了就撕掉，撕了又写，所以衣袋里经常放着写得密密麻麻的稿纸。

有一次，我实在忍不住了，就在会议开始之前，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悄悄地领到会议厅一个隔开的角落里，把我写的一篇关于社会革命党人的文章给他念了起来！

我念得富有热情，可说是慷慨激昂。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注意地听着。我一页接一页地翻过去……但是正在这个时候，出乎意外地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我突然感到自己的思想原先似乎是那么清楚，那么合乎逻辑，这时却完全不是那么清楚，那么合乎逻辑，使我产生了一些新的，还没有仔细考虑过的问题，这使我不知所措……我的热情开始逐渐低落下来，而且感到很窘，念不下去，生怕看到在耐心听我念文章的人会露出讽刺的讪笑。

“这是全文吗？”他沉默了一下，十分严肃地问道。

“不是……但是……您瞧……我有些地方还没有写好……”

“啊……那么您把题目好好地考虑考虑。写吧，写下去！您一定会成功！”

我象个被热水烫着的人，跳了起来，连会都不开就跑了出去。我既感到羞愧，因为我把自己的拙作硬塞给列宁；又感到无比兴奋，因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我的态度是严肃而带鼓励性的。

不久，《前进报》第三号上刊登了列宁论社会革命党纲领草案的文章。这篇文章给了我不少启发。我读了之后写了《社会革命党人在活动》一文，文章后来发表了。就这样我开始在《前进报》上撰稿了，以后也给《无产者报》（它是根据第三次党的代表大会决议出版的，用来取代《前进报》）撰稿。

我用“维·加里宁”这个笔名发表文章。每次弗拉基米尔·伊

里奇在编辑部里和我打招呼的时候，总是叫这个笔名，而不叫我的党内化名，而且是用特别的语气来强调：

“嗯，加里宁同志，写了点什么新的东西吗？”

说话的时候微露笑意地看着我，不知道他这是对我这个新撰稿人的小小的友好的逗趣，还是给我一种鼓励：努力干吧，他似乎在说，你也许会成功的！

* * *

从事写作后，我就有可能更进一步了解担任编辑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情况。应该坦率地说：我从来没有遇见过有谁对于编辑工作的全部细节是如此的注意，对于工作人员是如此的关心。

对于编辑部的每一个工作人员来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是一个很好的同志，他随时准备帮人出主意想办法。我忘不了这样一件事情。1917年3月底，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由苏黎世把他那著名的《远方来信》的几篇文章的副本寄到日内瓦给我，要求阅毕立即归还，他说“供传阅，参考”。

还有一桩令人惊讶的关于剪报的事情。遵照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请求，我把从日内瓦报纸上剪下来的罗曼·罗兰所写的几篇在当时引起轰动的文章寄给了他，请他一有可能就把它们寄还给我（那时我在写一篇文章，要用到它们）。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剪报久借不还。为此我就提醒了一句，后来我又懊悔这样做。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以为这些剪报已经丢失，觉得“异常不安”；他请求查一下会否有人当我不在的时候收到了这些剪报，并且他打算……你知道打算做什么吗？——给我购买相应的几号报纸，如果没有卖的话，就打算亲自到图书馆里替我抄一份！我不得不恳求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不要把自己宝贵的时间花在这种不相干的事情上面去。倘若这些惹事的剪报真的找不到的话，那不知道这

件事情会如何收场。关于这件事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赶紧写了如下一段话告诉我：

“现已找到，真使我高兴得要命。否则太对不起您了。”^①

* * *

1912年起革命运动的新高涨使党的机关报有了公开出版的某种可能。但是布尔什维克的报刊继续遭到沙皇政权的迫害。党的个别著作家开始利用左派激进知识分子的报刊（该刊乐意地表示同意刊登他们的文章）作为“合法的论坛”。应该指出，左派的刊物当时在社会上富有革命思想的一部分人中间，特别是在青年中间，获得很大的成功。其中，《同时代人》杂志就是一本极“左派”的“时髦”刊物，是进步知识分子的一面“旗帜”。

这样就产生了是否容许党员给左派资产阶级报刊撰稿的问题。我就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提出了这个问题。他这样回答我：

“您不赞同《同时代人》杂志，我非常高兴：这是取消派和民粹派这两帮恶棍混合办的害人事业，我们要严厉斥责。（斯坦凯维奇先生曾要我作该杂志的撰稿人；我已经回复：‘既然根本观点不同，当然不能接受。’）”^②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话不客气，这往往是在他极其气愤的时候，在要“制止”那种大为风行但又不正确的处事态度的时候。那是一本“进步的”，“革命的”杂志？是一面“旗帜”？或许是的，但是从什么观点来看呢？从党的观点来看，那它就什么样的旗帜都不是，而是一种“害人事业”！

问题的解决似乎只靠绝对消极的办法啦？不完全是那样。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接着说道：

① 《列宁全集》第36卷第350页、《列宁文稿》第6卷第233—234页。——编者注

② 《列宁全集》第36卷第276页。——编者注

“当然，为了搞点收入，有时我们是可以给资产阶级的刊物写点东西的！可是马尔托夫和唐恩两位先生竟举行‘游行’了！！普列汉诺夫也堕落到这样可耻的地步！”^①

这样，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于给左派资产阶级报刊撰稿所持的否定态度并不意味着笼统地一概禁止党员给这种报刊撰稿。撰稿是容许的，只不过要在采取的形式、涉及的范围和论述的问题等方面不具有无原则的、与其它政党联合的性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当时就是这样来解决这个问题的。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具有一种卓越的本领，他会采取一种他个人所固有的朴素的、同志般的方式而不带丝毫说教的味道来给人以原则性的指示。下面一件事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

1912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当时住在克拉科夫），我带着关于社会党人参加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代表大会的问题前去找他。当时在我们的文献里找不到我所需要的指示，而又要给公开的报刊写一篇文章论述当时在日内瓦举行的和平主义者代表大会。我要指出的是，在这以前我曾去过普列汉诺夫那里，他那时住在日内瓦，不和侨民来往，可说是处于一种“显贵”的地位。在我掀普列汉诺夫那所豪华的住宅的门铃时，我的感觉就象一些中学生不知为了什么上门去找班主任时所感受到的那种心情。有一个同志在自己的回忆文章里描写了他和普列汉诺夫谈话时甚至两膝颤抖。我不能讲自己在他面前没有这种情况。虽然普列汉诺夫对我热情相待，谈话滔滔不绝，但是，他那冗长、枯燥、有点“官腔”的谈话根本不能使我感到满意。我在他那里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于是我就去找弗拉基米尔·伊里奇。

不久，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写了封简短、坦率而又亲切的来

^① 《列宁全集》第36卷第276页。——编者注

信。他写道：

“亲爱的卡·！我没有注意最近几次的和平大会。听说社会党人参加了大会和他们的行动有机会主义的性质，不过只是听说而已”。^①

你们对于这样的开场白感到如何？我请你们细想一下。您，一个年轻的作家，发现自己知识上的空白点，您正想打主意去找一位最有学识，深孚众望的同志给自己以辅导。可是突然之间出现了什么情况呢？这位同志坦率地向您承认他对于人家所问的问题也一无所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这种情况下显示了自己是一个多么精细的心理学家和了不起的教育学家！

试问：勇于坦率地承认自己对某个问题的无知，这样的人在编辑当中是否很多呢？

就在这封短信里他继续写道：

“没有看到大会的报告，即便是某一次大会的报告，我就不能对这个问题发表最后的意见。问题是复杂的。”

多么有启发的一个例子！请先研读一下原始资料！好好下一番功夫，然后再拿起笔来写文章！

最后，这就是上述信里主要的几行话：

“在一些工人运动的大国（德国）里，机会主义的普遍增长和机会主义力量同革命社会民主派趋于‘均衡’也应当在这里表现出来。让倍倍尔同机会主义者打交道吧，——如果需要这样做（？？？）——我们不宜这样做。我暂时能说的就是这些。”^②

话说得多么简短，精练！同时这几句话又十分精确地说明了原则的立场，又作出了实际的指示。由于有这些指示可参照，只要

① 《列宁全集》第36卷第179页。——编者注

② 同上。

通过具体材料对问题进行仔细的研究。

就这样，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指导下我写出了不止一篇对党起了一定作用的文章。

载于《回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
第1卷 1956年莫斯科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版第321—330页

十八年来

弗·维·阿多拉茨基

一

自从1904年我第一次到国外时起，就常有机会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会面。1904年春，我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了解是从阅读他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记录开始的。他的发言立刻吸引了我的注意力，他发言中的逻辑性、明确性和彻底的革命性使我感到佩服。我第一次聆听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生动的演说是在一次纪念巴黎公社的大会上。这次大会是在1904年3月9日（22日）举行的，会场是在日内瓦的一个大厅里（好象是在帕拉依派勒司街的手工业大厅）。

记得勒柏辛斯基同志是这次会议的主席。我很喜欢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这样一位演说家，他的演说语言朴实，没有任何的矫揉造作。

就在1904年春天这段时间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领导着一个党章研究小组。我清楚地记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显然对当小组的领导感到乏味。1904年5月我去喀山，带了许多特制的画册和文件夹等东西，制作这些东西的纸板是用秘密书刊的许多薄薄的纸粘起来的。我回家的时候已经是一个布尔什维主义的坚定的拥护者了。

我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喀山委员会工作了八个月之后，于1905年3—4月间再次出国。在第二次出国期间我亲自认识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同他见过几次面，并进行过长谈。在初次同他交谈中我就立刻感到这是一个极不平凡，出类拔萃，简直是天才的人物。我平生还从未遇见过在智力上能及得上他的人。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亲身交往，即使是同他进行一次最简短的谈话，都会给人以一种新的，不平凡的东西，而这些东西通过其他途径是无法那么轻易，那么简单就可以获得的。

有些作家在自己的作品里写了他们基本上所能写的一切东西。即使亲自同这样一些作家交往，也绝不会再得到任何新的收获。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比他自己所写的著作更为渊博，尽管他那些著作的内容异常丰富和深刻。其次，必须指出的是，通过短短的谈话他能使对方受益非浅，这是他的非凡的才能。在谈话时他对我说，他认为自己退出《火星报》编辑部是错误的。当然，他讲这件事是为了使我和所有其他同志吸取他的经验教训，不要重犯他这种错误。

关于同普列汉诺夫的论战，他讲了一个同样具有实际意义的有趣的细节。普列汉诺夫在自己的论战文章里常常出言不逊，采取令人难堪的攻击手段，想以此来激怒论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笑着说他十分熟悉这套手法，其目的无非是使对方愤恨之余说话过了头，盛怒之下写出了蠢话。在论敌上了钩之后，就可以狠狠地给他一顿痛骂。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他决定暂时沉默。这是在1905年的春天。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战略计划就是要使孟什维克自己落进那个圈套里去。在潘·尼·勒柏辛斯基同志画的著名漫画和穷戏迷(米·斯·奥里明斯基)写的小册子的配合之下，他的这一招相当成功。

谈话中，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听说我毕业于喀山大学法律系时，他就详细问起 1887 年秋季始业他就读于喀山大学时，当时在那里授课的一些教授的情况。其中有几位教授到 1900 年时还在授课。^①

接着，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回忆起 1887 年底学潮中发生的一件事。他记得同来抓他的那个警察局长的一次谈话。那个警察局长用一辆马车押解他。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非常生动地叙述了这次谈话的情形，所以它也深深地印入了我的脑海里。警察局长根据年轻大学生的外貌来判断（那时他才不过十七岁），显然觉得这个年轻人是由于受了同学们的“不良”影响而偶然捲进风潮里去的。警察局长就说道：“小伙子，你为什么造反？要知道你的面前是一堵墙！”回答是出乎意料的：“是一堵墙，然而是一堵朽墙，只要一推就会塌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回答道。

谈话（当时我们谈得十分热烈）还涉及到一些当时我所感兴趣，而以前又弄不大清楚的理论问题。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所讲的几点意见就使我得益非浅。

如果说看了他的发言、文章和小册子《怎么办？》后使我立刻成了他的热诚的拥护者的话，那么这次亲自认识他之后，我就完全被他迷住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各个方面都显露出不平凡的渊博学识和非常广泛的兴趣。

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知道我曾按照贝德克尔旅行指南^②在瑞士徒步旅行之后，他对这件事深表同感。他说这种徒步旅游从未到过的地方曾使他感受一种莫大的满足。他对我讲起他住在萨马拉时曾进行过所谓的“环球旅行”的情景。就是坐着小船沿伏尔

① 记得，他回忆起尼·巴·扎戈斯金（俄国法学史教授），以及雷因哈德——律师兼喀山日报《伏尔加消息报》的编辑。——弗·阿·注

② 指卡尔·贝德克尔编著的瑞士旅行指南。——编者注

加河顺流而下，到萨马拉河套的终点，然后划入一条向北流去的小河，沿着这条小河再划到日古利山的发源地，这里是这条小河汇入伏尔加河的地方，然后仍然顺流而下返回萨马拉。

在我亲自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有了较为密切的交往之后，我发现他不仅是个可以大胆信赖，能进行正确领导的英明领袖，而且他成了我所敬爱的人，他始终使我感到亲近，为了他我愿意豁出一切而在所不惜。

稍后，1905年的夏天，我们，喀山党的工作者，在委员会全体委员都看过他的卓越的小册子《两种策略》之后，大家感到捍卫革命发展的利益没有谁能比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做得更正确、更彻底、更英明。他善于激发所有珍惜革命事业的人的热情。记得大概也是1905年夏天前后那段时间，有天晚上，几个同志在谈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能否成为一位取得胜利的革命领袖的问题。那时我们是这样说的：他能否成为罗伯斯比尔^①？当时参加谈话的还有格·英·克拉莫尔尼科夫。我记得占上风的意见是：当然能够，大概还会更出色地完成自己的任务。至少当时这是我的坚定的信念。

总之，我想指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个性对所有有幸亲自同他接触过的人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在1911年，我同索尔莫沃工厂的一个青年工人恩·同志一起到过巴黎的许多地方，他在波伦亚受训之后满脑子装的尽是波格丹诺夫的思想，而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却抱着几分怀疑态度。我是经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的介绍认识这个工人的，为的是让他跟我一起参观巴黎，游览巴黎的名胜古迹。他还要跟我一起去俄国，因为他不懂外语，而我恰巧要回俄国去。在我们交谈哲学问题和策略问题的时候，我设法向

^① 罗伯斯比尔(1758—1794年)，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雅各宾派政府的实际首脑。——译者注

他证明列宁是正确的，波格丹诺夫的观点是错误的，但他那时不大接受我的见解。

启程的日子终于来到了，我们约好在火车站见面，恩·同志将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那里直接上车站去，因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要同他谈一次话。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要检查一下他对所研究的材料掌握的程度究竟如何，此外还要给他作各种指示。

坐上火车以后，恩·同志兴奋地向我滔滔不绝地谈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临别赠言对他所产生的深刻印象。在一个小时左右的谈话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向恩·同志叙述了未来的远景，并且使他懂得了他在波伦亚学校整个学习期间也没有学到那样丰富的知识。恩·同志是这样亲口对我说的，这几乎全是他的原话。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具有这样强烈感染人的个性，他的影响就不单局限在思想方面。我后来遇见许多同志，他们仿佛连外表都渐渐变得象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看来是自然而然地学着他的手势，他的表情，他的语调，直至他的眼神。

二

后来我遇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已经是1908年在瑞士的日内瓦；从1906年起，我被驱逐出境后曾在那里居住过。1908年的春天，在日内瓦大学的英语讲师莫勃斯先生讲授莎士比亚课程时（我也在听讲，坐在后排的一个位子上），有一个人走进大厅，就在我身旁坐了下来。这个人就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但是我没有马上认出他来，因为他没有留胡子。讲课快结束的时候，我们才互相对视了一下，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同我攀谈起来。他提起了我们曾相识的情形。我对这次意外的见面有多么高兴，那就不用说了。我们一起走到大街上，我还把他送到了寓所。

我问他这次回俄国所做的一切事情中，回想起来哪件事使他最为满意。他告诉我，最满意的是一次大型的群众集会，在那次会议上他只作了一次发言，对他自己提出的决议案作了详细透彻的解释，使得这个决议案在讨论通过时为大家完全自觉地接受了。他对这次集会的情况介绍我至今记忆犹新。看来这是在帕宁娜伯爵夫人民众文化馆举行的一次群众大会。

我还记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讲过，他在涅瓦大街上曾经被四名暗探包围起来，眼看他们就要动手抓他了，但他还是设法脱身了。

对于我提出的问题：他对将来革命重新来临是怎么想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回答说，“庄稼汉舔手指”^①，就是说到了一定的时候，革命就会来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立宪民主党人感到非常愤恨，他们实质上是给了沙皇贷款，假如他们在法国坚决声明说，不经杜马同意签订的贷款，将得不到人民代表机关承认，那样的话，沙皇不通过杜马就不可能得到法国的贷款。

我不久就要回俄国去，因为我被驱逐出境的期限快满了。在离开以前我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那里去过几次。他要我写文章详细回忆1905年的革命，回忆十月事件，尤其是要回忆那些涉及工人武装，战斗小组，组织起义和夺取政权的一些经验教训问题。

一天晚上，我来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那里，他邀我上啤酒馆去。我们在桌旁坐下，要来了啤酒，就聊起来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很关心我的学习。我那时在孜孜不倦地阅读社会学和历史方面的书籍，想独自地摆脱法律思想的罗网。突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打断了谈话，说了句：“This man is suspicious”^②，并朝刚

① 俄语中有“熊舔掌”的说法，形容熊越冬时的一种状态。此处系借喻。——译者注

② “这个人可疑”。——编者注

坐到我们跟前来的那个家伙悄悄做了个手势，看来，这是个暗探。我们马上站了起来，就朝外走。

在准备离开日内瓦的时候，我清理了自己斗室里的全部用具。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同意我把一个书架放到他那里去，这使我十分高兴。大约在我动身离开日内瓦前的两天，我把书架送去了……

此后，直到1911年1月间我才有机会再次出国去。我带去了自己的论国家的著作初稿。在这本著作里我想竭力克服资产阶级的国家观点。我想征询对该著作的意见，弄清一些理论上的疑难问题。在柏林我找过考茨基，同他谈了话，可是对解决我的问题毫无帮助。来到巴黎之后，我打车站径直上玛丽·露丝街去找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非常亲热地接待了我，并指点我，附近什么地方可以找到住所。我在巴黎住了约一个星期。我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那里去了几次。有一天晚上我们谈得相当久。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把我的手稿看了一遍，对它很感兴趣。谈到法律家的问题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记起了倍倍尔的一句很恰当的话 «Juristen sind durchaus reaktionäre Leute»^①和马克思的一句话 «Juristisch——also falsch»。^②我不知道这些话。但我特别喜欢后面一句话，因为它完全证实了我得出的结论。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当时所做的那些事情仿佛是日常琐碎的工作，对于它们的巨大历史意义我那时候是不太了解的，确切些说，也就是我明白这些工作是非常需要的，但是我总觉得有些惋惜：象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这样一个理论界的泰斗，这样一个才华出众的人（我曾醉心于他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依

① “法律家是极端反动的人”。——编者注

② “法律就是虚伪”。——编者注

我看,这部著作可与《反杜林论》相媲美),这样一个学识渊博的思想家却要自己花精力和时间去解释那些无须特别费神即可轻而易举地正确理解的事物,就如:在反动时期不管有什么困难,秘密组织无论如何都要保全下来,而各种合法的机会则要极其细心地利用来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等等。有许多重大的理论问题还没有深入进行研究,正需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去从事研究。当我向他谈出自己对这个问题的想法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回答说:“也许您是对的。”但是我感觉到他又不可能不这样做,他现在所做的也是最重要的和最不可少的事。这到后来就特别看得清楚了。

在我动身前往伦敦之前,我简直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关怀人的态度所深深感动。他给我出了好些主意,一开头就告诉我,手提行李寄存处,英语是叫 cloakroom;从巴黎到伦敦最好是取道波隆-福克斯顿,到了伦敦要在查林-克罗斯车站下车,等等。他还把当时住在伦敦的李维诺夫(老大爷)同志的地址给了我。

从伦敦返回俄国的途中,我在巴黎又逗留了二三个星期。在这期间,我看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是多么关怀那些到国外来的工人,关心他们的学习,检查他们的知识。我前面已经谈到过一个索尔莫沃工人恩·的情况。

在我动身回俄国的时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给了我弗·德·邦契-布鲁也维奇在彼得堡的地址,以便让他帮我出版我那本论国家的著作。但在当时,这件事我却没有办成,直到1923年才由社会主义研究院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

在分手的时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顺便又给我出了个主意。当看到我的一些书在页边上都写满了字,有的还是一些英语句子(我那时候在下工夫学英语,力求掌握它),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狡黠地笑着说,这些句子有时可用其他的特殊写法。他劝我做各种记号以便记忆,用英语摘录一些决议和类似的不宜让宪兵看到的

材料,使它们看起来象是狄更斯、沙克莱的作品或圣经的引文。果然,宪兵没有去注意这些东西。

三

1911—1912年的冬天,我带着家眷(妻子和女儿)住在柏林。我到国外来的时候,总是把自己的地址告诉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这次我也这样做了。在这期间,我们中央委员会的一笔款子的事还悬而未决,那笔钱原来是在“保管人”——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手里,即在考茨基手里。而一般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特别是考茨基对俄国的事情是完全搞不清楚的,然而他们却自以为他们负有仲裁法官的使命。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写信对我说,必须让考茨基了解情况,并且提出要我来负责这件事。他写道,考茨基的消息是来源于各色各样的阴谋家,这些人本身虽然在政治上是微不足道的,但想竭力起作用,在进行种种阴谋活动。

我到考茨基那里去过两次,我在那里觉得很不自在。希法亭也常在那里,他的外表与其说象个革命家,倒不如说象个银行家。另外,我那时德语还掌握得不够好,比不上那些向考茨基提供消息的孟什维克。我认为自己不适宜担任这个任务,于是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写了信。

有一天,在我外出的时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来家找我。我的妻子给他开了门,起先没有认出是他。但是,当他坐下写留条给我时,她看见了“列宁”这一签名之后才一再请他留下来,并且说,要是我不能见到他的话,会感到十分失望的。那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笑着答应过一会儿一定再来。

没有过多久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真的又来了,这时我已经在家里了。原来,他是打算亲自同倍倍尔和考茨基谈一谈才来的。这

件事他当天没有办成，不得不在柏林过一夜。我坚决反对他上旅馆去住，于是他就答应在我们家里过夜。他详尽地询问了我的工作情况。记得他在翻阅我的书籍时，对韦冈德的两卷本《德语词典》挺感兴趣（这是一部非常好的德语词典，搜集了大量的文史方面的资料）。

晚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上莱茵加特剧院去看了一场戏，回来后就在我们的一张沙发上睡了一夜（伊里奇用一条毛毯蒙着头睡觉，靠近沙发放着一个木偶，它手中拿一把出鞘马刀，还会咔嚓咔嚓地响。这是我的小女儿放在那里的，她怕“列宁会觉得寂寞”）。

第二天早晨，喝完咖啡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去办事了，午后他约了维·斯卢茨卡娅来我家会面。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回来后，很生气地说，倍倍尔接见他的时候很不客气，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形容说“象猛兽般盯着看”。而考茨基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留下的印象也是不尊重人的；他愤慨地说，考茨基对俄国的事情绝对没有能力去弄清楚，却要“插手”去解决问题。事实上，考茨基由于根本不懂俄语，他无论是对俄国的，还是对俄国党内的情况就不可能了解清楚，所以他根本没有资格去“插手”解决问题。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离开柏林后，决定同考茨基打官司，通过法院向他追回这笔款子。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写信请我在斯图加特（考茨基编辑的《新时代》杂志出版的地点）找一个好律师。我在柏林除了考茨基本人外，并没有其他德国熟人。于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教了我一个方法：订阅一份《福斯报》（一家资产阶级报纸，类似从前的《俄罗斯新闻》）。这家报纸肯定有著名的律师当它的法律顾问；我作为一个订户就有权利前去请教这位顾问，他不会把我当作马路上初次遇见的人，并且会告诉我斯图加特的好律师的地址。

这一切我都照办了。我走访了《福斯报》的法律顾问，果然，同

他谈话后，就从他那里拿到了一个所需要的地址。我随即就把这个地址通知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他是否聘用了斯图加特的这个律师，我不记得了。我只记得他用德文写过一篇文章，印成单张的传单，详细阐述了关于这笔款子争端的全部情况。

当我在1912年春天又去俄国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交给我一个任务，一定要参加第四届国家杜马选举，并且利用喀山的立宪民主党人和黑帮分子的复选代表按人数几乎相等的情况，力争让工人代表当选。可是，我的努力遭到了失败。

四

1914年夏天，我到了国外后，又立即写信同当时住在波罗宁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联系。那时候，我对民族问题产生了兴趣。记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来信推荐我读潘涅库克和施特拉塞尔写的小册子。我很希望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那里去一趟，但是突然降临在我们头上的战争使我无法成行。我和妻子、女儿处于平民俘虏的地位，在德国足足呆了四年时间。

1918年8月间我才得以返回俄国，那是在我国代表团抵达德国以后的事。我当时曾立即写信给越飞，要求让我返回俄国去。我表示，如果有需要，我十分愿意在离开之前的一段时间里担任驻慕尼黑领事的职务。关于我的情况，我请他们去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了解。

在慕尼黑是否需要派领事的问题尚未弄清楚之前，我就获准搭乘第一班运载俄国平民俘虏的团体列车离开。8月上旬我已经回到了莫斯科。

到了莫斯科以后，我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找弗拉基米尔·伊里奇。

四点钟光景，我到了他那里。我写了张字条给他，很快我就被让进屋去见他。他站在办公室里的一幅俄国欧洲部分地图跟前的椅子上，正在细细地观察俄国的北方地区。我自1912年以后就没有见过他。依我看，他一点也没有变，还是原来那个乐观、和蔼可亲和平易近人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我们互吻了一下。他让我坐下，看到我极度虚弱的样子，他显然感到惊讶。他告诉我收到了关于能否委派我当驻慕尼黑领事的请示函件，他立即作了答复，表示同意，并把我作为他所了解的一个人而予以推荐，因此他以为我已经获得了这项任命。这时，雅·米·斯维尔德洛夫走了进来，1905年还在喀山一起工作的时候，我就认识他，当时我只知道他叫安德烈同志。话题转到了德国和未来的德国革命问题。我讲了那些我所知道的事实。德国当时的情绪不禁令人隐约地联想起1905年前夕俄国的情形。

在德国当俘虏的最后几年里，因为经常挨饿，我的健康受到了极大的损害。由于这个缘故，我除了坐坐办公室以外，就什么都不能干了。我能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见面的机会也就很少了。

1919—1920年的冬天我是在喀山度过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通过军事当局转递来信，他几次询问我的生活情况，问我是否需要什么，要我写信给他。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1920年4月6日的来信里写道：

“阿多拉茨基同志！

我已转告霍多罗夫斯基同志，请他帮您解决口粮和木柴等问题。

他已答应照办。

请来信告诉我，——信可托人带来（托军人最好）

（1）是否帮您解决了些问题？口粮？木柴？

（2）是否还需要别的東西？

(3)您能否为**国内战争史**和**苏维埃共和国史**收集些资料?

在喀山一般能否收集到这些资料?我能够帮忙吗?

有无全份的《**消息报**》和《**真理报**》?缺很多吗?

我可否帮忙弄到缺少的部分?

请写信给我,告诉我您的地址。

致衷心的敬礼!

您的列宁。”^①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担负着大量的工作,然而他竟还有时间想到我临去喀山前同他的那几次谈话,并且还考虑如何帮助一个同志,想着他是否需要些什么。

五

1920年8月间我被召回莫斯科去做十月革命史料搜集工作。我到了莫斯科。由于将近一年的时间没有见到过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我当然觉得自己应当去看他。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询问了我在喀山的工作和生活情况。我接着告诉他,1920年春天我非常满意地办了一期省党校,为时一个月左右;但是党校的这一期学员的水平比1919年办的那一期略微差一些,那一期我也曾讲过课。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听说学员的水平降低了,就感到不安,并请我通过省委书记弄清楚这事的原因。

接着我们谈起了马克思恩格斯的书信集。我至今没能把它全部读完,我对这些书信当然很感兴趣。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向我详细谈了工作计划。他认为,这项工作必须尽快进行。“倍倍尔和伯恩施坦,”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道,“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极为

^① 《列宁全集》第35卷第442页。——编者注

丰富的遗产埋藏在那厚厚的四大卷里，只有你我这样的书呆子才会去看它。”必须把最重要的选编出来，以适应广大工人群众的阅读水平，使他们能读到真正马克思的著作。这样一本不太厚的选集必须翻译成各种欧洲文字，因为西方对马克思的了解或许比起我们俄国来还要少。据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讲，《哥达纲领批判》，比如说，在法国还根本没有人知道。

我当然非常乐意从事向我推荐的这项工作。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连忙到自己的寓所去取来四卷书信集。另外，各种文献资料他也给了我一些，并且允许我利用他的图书室。他甚至想到把1913年他初次通读这四卷书信集时留下来的一些札记交给我，可是没有找到这个笔记簿。后来这个笔记簿还是找到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把它寄给我，这时候我已经读完了全部书信。但我还是把全部材料仔细地又重看了一遍。我吸收了他笔记簿里的许多评语。我抄下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全部评语之后，就把笔记簿^①还给了他。

起初，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和我都觉得全部工作很快就能搞完，大约花三个月时间就行了。可是在我们初次谈话后，一年过去了，我只准备好一些素材。虽则我摘录的全部材料都已经翻译好，但总的说来，还要进行认真的加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一直很关心我的工作，他迅速地把材料通读一遍之后，在1921年8月2日的来信里说道：

“书信我只能略读一下。当然，您还得大大压缩，找出彼此的联系，并加以编排整理。反复地考虑两三遍，然后简要地加以评述。看来工作要比原来想的重得多。

^① 弗·伊·列宁关于四卷本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集的材料的本子，由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于1959年出版了单行本，书名是《〈1844—1883年间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书信集〉选编》。——编者注

至于次序（您的想法大概不错），按年代排可能更便当一些。”^①

这次，1921—1922年的整个冬天时间我都花在反复推敲和写注释上。我无法加快这项工作，因为还忙着别的事情。

1922年4月我接到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一张便笺，他写道：

“我因病没有工作，而且还要有相当长的时间不能工作。
您的近况怎样，请写封短信告诉我。

特别请您谈谈马克思书信的编选情况。（我要离开好几个星期，如果加米涅夫同志同意的话，这件事或许让他去‘关照’？）这项工作必须向前推进，**并彻底完成。**

您的列宁”。^②

当我接到这张便笺时，我的心都收紧了，我感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病情很严重。在给他的复信里我说：马克思书信的编选工作我始终没有停下来，并且我无论如何要把这项工作做到底，但遗憾的是实际情况不允许我整个扑到这项工作上去。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复信时写道：

“您对书信要多多研究：这是一项重要的**国际事业**。要选**最重要的东西**。注释要简短、明了、准确（+把马克思的评语同**某些**‘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学者加以对比）。

敬礼！

您的列宁”。^③

4月底，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不知什么缘故把我找到他那儿去。他和衣躺在床上，并且还在看书。这是手术后不久的事。弗

① 《列宁全集》第35卷第516页。——编者注

② 《列宁文稿》第10卷第173页。——编者注

③ 同上，第181—182页。——编者注

拉基米尔·伊里奇开始询问我的工作情况，而且对一些最细小的事情都关心到了，问我的生活条件如何，我能否在家里工作，还是需要去图书室里工作，等等。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知道我已把我那本《马克思主义基本问题纲要》的手稿送去付印后，他没让我知道就已经去催促过了，因此书很快就印出来了。

我最后一次见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是在1922年底，当时他已经要恢复工作了，可是重又感到身体不好，遵照医生嘱咐他应该减轻自己工作的紧张程度。一天晚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打电话给我，叫我上他那儿去。他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我把已经印出来的那本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集的清样随身带去给他看。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看了看集子，因为在导论的末尾刊载了恩格斯写给马克思的一封信，信里恩格斯劝马克思喝点酒，这样可以保持旺盛的精力，他看后笑了起来。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看上去精神饱满，情绪很好，但他还是忧郁地对我说，他现在是个残废的人，已经不能全力以赴地工作了。但当时我不愿意去想，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了……

载于弗·维·阿多拉茨基：《关于列宁生平著述问题》1933年莫斯科版第61—75页

在第一次革命的烈火中

米·伊·瓦西里也夫-尤任

在日内瓦的生活。与列宁同志相识

瑞士海关和国境警备队没有找我什么麻烦。他们既没有盘问我的护照、姓名，也没有问我的国籍，只是好奇地问我随身带了卷烟或烟草没有。显然他们只是想到国库的收益。

就这样我来到了日内瓦^①，来到了已经建立起俄国工人政党第一个小组（“劳动解放社”）的日内瓦，在这里奠定了俄国马克思主义派的基础，爆发了“火星”^②，而这颗“火星”势必会在地主资产阶级横行霸道的那个大国里燃起燎原的革命烈火。我来到了日内瓦，普列汉诺夫正住在那里，这是个很敏锐，很有学问的人；还有一个不太熟识的人，但他却以其毅力、革命热情、惊人的智慧和工人阶级的无限信心奇妙而有力地吸引着人们，他就是列宁。

时间还不算晚，我就带着自己简便的行李由车站径直上加露葛街——有名的“加露日卡”去，这里以及这个地区集居的大多是俄国的政治侨民。我遇见的第一个俄国人——看外表、衣着和举止态度是不难认出他们来的——给我指点哪里能找到布尔什维克

① 米·瓦西里也夫-尤任在1905年3月底由俄国来到日内瓦。——编者注

② 这里是指《火星报》。——译者注

的餐厅和类似布尔什维克俱乐部的图书阅览室。我在那里受到了十分热情的接待，好象在当天我就认识了奥里明斯基，对于他用“穷戏迷”作笔名发表的那些抨击性的文章我是很熟悉的，并且给予高度评价；我还认识了邦契-布鲁也维奇同志和他那态度非常亲切的妻子维·韦利奇金娜同志；接着还认识了卢那察尔斯基、沃罗夫斯基、勃兰登堡斯基、伊林、克努尼扬茨（拉定）等同志。大家帮助我安顿下来，花费不大，但很妥贴。

次日，我就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那里去。大概象大多数人那样，我了解列宁也只是通过阅读他的著作、在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和辩论性的发言，我想象中的列宁的容貌与事实上的完全不一样。我原以为他一定是个高个儿的黑发男子，有一双灵活而又乌黑的眼睛和强壮的体魄。他那股力量和热情象电流一样传遍他所写的每一句每一行，传遍他所阐述的每一个思想，这一切不由地使我认为文章的作者一定也具有那种烈火般的、强有力的外表。令我感到吃惊的是我见到的却是一个身体结实、有着浅红头发的中等个儿的人，一张蒙古型的面孔，带着温和、微露讥讽的笑容，狡黠地眯缝着一双炯炯闪光的深褐色的眼睛。这双聪慧、灵活、敏锐的眼睛和那时已经秃顶的大而富有特征的头颅加上宽大的前额，立即把人们的注意力吸引住了，在那双眯缝着的眼睛里流露出的狡黠的嘲笑会同时使人振作和警惕起来。

“一个机智的人！”我不由地这么想。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以他那种通常的亲切、热情和同志般的朴实感情来迎接我。

他先询问我彼得堡的情况以及我是如何通过国境的。当我向他讲了自己经历的艰辛和奇遇时，尤其是告诉他我同德国宪兵的一次谈话时，他显然对我的感受抱有同感，于是就以他特有的“伊里奇式”的笑声，愉快地、富有感染力地哈哈大笑起来。

“应该把这一切写下来，寄给《前进报》^①，”他这么建议。

接着，他详细询问了巴库事件和高加索的总的形势。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听得很仔细，为了了解他特别感兴趣的材料，他还不时提出问题。他要获得明白而确切的回答，可能的话还要有数字。我们的谈话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好象就在这一次我还认识了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她那善良的容貌和关切的态度使人在同她第一次见面后就会注意到。

“好，”告别时伊里奇说，“您一定要在侨民区里作一个关于巴库事件的报告，先在这里作，以后还要到瑞士的其他城市里去作。可能我们还要安排到巴黎去。此外，还要请您给《前进报》^②写文章。题目先由您自己选，如果能定期地就俄国国内的罢工运动和革命运动写些评论就好了。俄国公开的报刊上目前提供了许多这方面的材料。”

离开列宁时我已经坚信，他确实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是一位真正的政治领袖。

我十分希望直接认识一下格·瓦·普列汉诺夫，同他讨论一下我所感兴趣的若干理论问题。虽然他在第二次党代会以后对布尔什维克采取了无礼的行为，我仍然十分爱戴和器重他这位具有非凡才干的马克思主义政论家、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而且把他当作自己的启蒙老师看待。但是这时候不知道什么原因他不在日内瓦。而日内瓦的同志们却竭力泼我的冷水，告诉我说普列汉诺夫时常对青年同志摆出一副显要的将军和老爷的架势，甚至给我讲了下面一件事，我以为这是个笑话，虽然他们要我相信确实有过这样的事。

不久以前从俄国来了个年轻的社会民主党人，是个爱说话的

① 指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译者注

② 指秘密的布尔什维克周报。——译者注

人。经人介绍他认识了普列汉诺夫。他在和普列汉诺夫交谈时不时地重复称呼：

“普列汉诺夫同志！普列汉诺夫同志！……”

普列汉诺夫听他讲了一会儿，随后突然地而且是嘲笑地打断了对方，说：

“年轻人，请您注意并记住这句话：部长的同志对部长来说是同志，而部长对部长的同志来说决不是同志！……”

如果这也是笑话，那是非常典型的；没有任何人对列宁会编造诸如此类的笑话，即便是最凶狠的孟什维克也不敢编造。

过了几天，我对人数众多的侨民和在日内瓦求学的俄国学生作了关于巴库事件^①的报告。报告中我涉及了布尔什维克同孟什维克在巴库的关系，我对孟什维克领袖们的行动，尤其对伊里亚·申德里科夫的行动，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孟什维克们发出了疯狂的叫嚣，一些人挥舞拳头朝我扑过来；总而言之，他们冲着我大吵大闹。闹得特别凶的是出名的孟什维克（以前的“经济派分子”），后来成了共产党员的那个马尔丁诺夫，以及后来我们一起在莫斯科联合苏维埃和工人代表苏维埃里很和睦地共事的伊苏夫。应该看到，那时布尔什维克正在筹备第三次党代会，从根本上说孟什维克是极端仇恨我们的。

十月革命以后，有一次我遇见以前的一个孟什维克，他曾积极地参与对我的捣乱活动。

他向我提到了在日内瓦同孟什维克发生的那次冲突。“其实你们当时是对的！伊里亚·申德里科夫真是同沙皇政府有勾结的坏蛋。”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听说孟什维克搞的这次捣乱活动之后，

^① 指1904年12月巴库工人的那次罢工。——编者注

以为我会感到十分不快，所以他第二天就赶来向我表示同情和遗憾，但当他见到我对这件事处之泰然，而且谈笑风生时，他就详细打听事情经过的细节，他自己也嘲笑起孟什维克的歇斯底里大发作。

后来我在苏黎世和伯尔尼又作了这个报告，在那里作报告时没有发生任何麻烦。

在我们的日内瓦图书馆里有相当多的书，我贪婪地钻进书堆读了起来。这些书很大部分那时在俄国几乎是没有什么可能搞到的。我日以继夜地读这些书，同时使我感到惊奇的是那些早就居住在日内瓦或是常住在那里的同志怎么会这样不珍惜他们拥有的如此宝贵的书籍。我很快就确信，不少侨居国外的同志，不仅一些大学生，而且还有一些侨民，对一些最基本的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都无知到了令人吃惊的地步。这是我在给一个由日内瓦的同志组成的小组讲课时，确信这一点的。

被选为出席第三次党代会的同志中有几个人顺路来到日内瓦。他们对时局的一些重要问题发生了热烈的争论。我那时认识了捷姆利亚奇卡(罗·萨·扎尔金德)和亚·亚·波格丹诺夫。被推选出席代表大会的为数不多的孟什维克没有去伦敦，而是留在日内瓦。在那里孟什维克举行了自己的代表会议，象小资产阶级革命者通常那样，爱唱高调，他们把这次会议称为“全俄党的工作者第一次代表会议”。

我第一次目睹“自由”庆祝“五一”节的情形。从早上起，街上就有工人的游行队伍，无数面红色的旗帜在队伍里飘扬。乐队在吹奏，人们至少用四种语言高唱《国际歌》，当时在俄国还很少有人知道这首颂歌。我们那时主要是唱工人马赛曲《我们要抛弃旧世界》等一些歌曲。日内瓦是个国际城市，那里不单有相当多的法国工人，而且也有意大利的和德国的工人；我已经说过，当时在日内

瓦俄国侨民的数量是很大的。我们当然也拿着自己的旗帜出来游行。用各种不同的语言高唱《国际歌》的情景给人以特别深刻的印象。可是在庆祝工人的战斗节日——检阅工人革命力量的日子时，那种循规蹈矩，几乎是不苟妄动的样子使我很不满意。游行队伍安静而又规矩地行进。换上了整齐的服装，阵容也确实稍有加强的警察和宪兵对着红旗举手行礼；而阳台上 and 开着的窗户旁站着脑满肠肥的资产者，他们看着工人的游行示威，时而得意洋洋地、悠闲地露出一丝笑容。

我脑海里浮现出在那里，遥远的俄国，庆祝这个日子的情景来……难道我们那里的资产者和官吏们有胆量如此无忧无虑地来观看工人的游行示威吗？不，他们会胆怯地把窗户关上，把大门二门也都关得严严实实的。哥萨克和宪兵会挥舞起出鞘的军刀，举着皮鞭从埋伏的地点跳出来；于是石块飞舞，枪声大作！血呵，热乎乎的工人的血呵，就如注地喷溅出来！……然而在自信的、不必为自己的安全担心的、厚颜无耻的阶级敌人面前，那种软弱的，显出自己无能为力的示威行动，比较起来，我们那里毕竟是要好得多、鲜明得多、有价值得多。

晚上，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在室内举行了隆重的集会。发表演说的有孟什维克、崩得派和布尔什维克的代表。我们的日内瓦组织委托我代表布尔什维克发表演说，因为伊里奇已经动身去伦敦出席党的代表大会。即使是共同的节日也并没有使我们停止争论，相安无事。

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各自分成小组。我思念起俄国来了，那里的斗争，同残暴的阶级敌人的真正斗争，无可阻挡地、蓬勃地在继续发展着。为了摆脱当地的无谓纠纷，我注意观察这场斗争的发展，并开始发表评论这场斗争的题为《工人与专制制度》、《工人阶级与它的敌人》等文章。起初是刊登在我们的《前进报》上，后

来，在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以后，刊登在《无产者报》上。当然这样做显然是不够的。我一心向往返回俄国去，想亲身投入火热的斗争，深入到生活和斗争中去。于是不止一次地请求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尽快地派我返回俄国去。急于回俄国去的还有其他一些同志，因为他们对于国外无谓的争吵、纠纷和空谈也反感到无法忍受的地步。

在我弄明白了第二次党代表大会上爆发的分歧的实质之后，就在1903年坚决地倒向布尔什维克派。但是只有在日内瓦，不仅通过列宁的著作和论战性文章，而且通过同他的生动的面对面的谈话，通过他在敌对的和友好的集会上的演说，通过他的生活，通过他的行动、他对敌人和朋友的态度、对工人阶级和对敌对的或是异己阶级的态度，深入地熟悉了他的学说、观点和策略之后，我才成了一个真正的坚强的布尔什维克，一个终身的布尔什维克。在当时，他已经是一位明智、热忱和具有惊人的逻辑头脑的重要人物。在他的身上有着刚强的意志，坚毅不拔和做任何事总是善始善终的精神。他当时对于工人阶级和工人阶级所肩负的历史使命已经充满了多么坚定的信念呵！

在第三次党代表大会和孟什维克的代表会议之后，在日内瓦举行了一次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联席会议，列宁在这次会议上作了一个报告，我至今记忆犹新。在日内瓦的孟什维克人数比起我们来要多得多。第一个作报告的是马尔托夫。孟什维克拚命鼓掌欢迎他，在他发言的时候也时常有人拍起手来，因为马尔托夫显然沉不住气了，他需要听众的支持。他驼着背，不停地抽着烟，对孟什维克代表会议通过的似乎是马克思主义的决议闷声闷气地用稍带嘶哑的嗓音进行辩护，而对第三次党代表大会通过的“雅各宾主义的”决议进行了批判。他的发言无精打彩而又冗长乏味。

我看了看伊里奇。他在台上，就坐在报告人背后的地方，他的

臂肘支在桌子上，手掌捂住自己宽大而富有特征的前额和眼睛。他神情镇定而又专注。只是时而在唇边掠过了一丝讥讽的笑容。

马尔托夫总算结束了自己冗长而沉闷的发言。孟什维克方面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手里拿着几页纸朝讲台走去。他在发言中把第三次党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跟孟什维克代表会议对相同的那些问题所通过的决议进行了比较。他详细地指出了党代表大会决议的鲜明性、准确性、一贯性和革命阶级的坚定性之后，就对孟什维克的模棱两可的、模糊不清的和怯懦的决议进行了透彻的评论，他辛辣地嘲笑了他们，使与会的孟什维克气得简直要抽搐和发疯了，而……同时他们不由地又对伊里奇论据的逻辑性和非凡的力量感到钦佩。有时，他们之中有几个人同我们一起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鼓掌。这是我第一回特别清楚地观察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那种众所周知的本领，即异常深入浅出地阐述最复杂的问题；他以强有力的逻辑性吸引听众，促使他们自己作出肯定的和明确的结论。

“这就是我曾经考虑过的问题，”每个听众最后都有这样的一种感觉……

俄国的革命事件依旧在发展。我难以抑制想要返回俄国去的心情。突然，我的妻子来到了日内瓦，因为巴库保安局死死地监视着她，使她不得安宁。她因为一门外语也不懂，所以好不容易才来到日内瓦。而我却过了大约两个星期就返回俄国去了。

“波将金”号装甲舰上的起义。我返回俄国

“波将金·塔夫利达”号装甲舰起义的消息在国外，特别是在侨民中间，引起了什么样的轰动，是不难想象的。起义的消息不言而喻是来得迟了点，许多情况被误传、弄错、歪曲和夸大，但是我们

知道并感到，确实是爆发了重大的武装起义，第一次真正的起义。

我们希望起义能获得成功，能获得正在挣脱世代桎梏、备受压迫的全俄国的支持，首先要能获得英勇的无产阶级的支持，因为它在斗争中已经表现出无限的忘我精神，已经受到过火与血的庄严洗礼。我又一次迫不及待地想要返回俄国去。在我们小组里回国的问题成了谈话的主要内容，每天都以不同的方式在进行议论。

我决定再找伊里奇本人，请求立即派我回俄国去，干任何工作都行。突然，有人转告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有件很重要、很紧急的事情正要亲自找我。我打算立刻去见他，但是他赶在我前面了。不过我记不确切，他是亲自来的，还是在路上遇见我的。谈话时间不长。

“根据中央委员会的决议，尤任同志，您应该尽快地，最好是明天，就动身去敖德萨，”伊里奇开口说。

我高兴得眉飞色舞，就说：

“哪怕是今天就走，我也愿意！有什么任务？”

“任务十分重大。您知道‘波将金’号装甲舰现在停泊在敖德萨。担心的是敖德萨的同志们不会好好地利用这次起义。您无论如何要设法上装甲舰去，说服水兵们行动要果断，要迅速。要设法让他们立刻登陆。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要轰击政府机关的建筑物。我们要把城市夺过来。然后立刻把工人武装起来，并且果断地在农民中间进行鼓动。您要把敖德萨组织现有的力量投入这项工作中去。你们要通过传单和口头宣传号召农民去夺取地主的土地，同工人联合起来进行共同的斗争。我认为工农联盟对于已经开始了的斗争具有巨大的、特殊的意义。”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显然激动了，据我当时的感觉，他沉浸在激情中。我以前从未见到过他这种神情。感到抱歉的是，他的下一步计划、打算和希望使我十分惊讶。

“接下去必须尽力把其余的舰队夺到我们手中来。我相信大部分舰艇会加入‘波将金’号行列里来的。只是行动要果断、勇敢和迅速。到时请即派一艘驱击舰来接我。我要去罗马尼亚。”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您真的认为这一切都能做得到吗？”我不由脱口而出问道。

“当然能！只是行动要果断、迅速。不过，一定要不失时机地行动，”他满怀信心，坚定地重复说道。

后来我才信服，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许多事情上是正确的，对形势的估计是对的。我在日内瓦时还缺乏这样的信心。在这之前我曾在敖德萨区住过三年左右时间，对那儿的条件和情况有所了解。在敖德萨这个做买卖的地方，真正的工人无产者是比较少的，而赫尔松的农民，尤其是敖德萨附近的农民，从革命态度上说远非可靠分子。我并不指望能轻易夺取黑海舰队。但是我完全赞同伊里奇的意见，行动要果断、勇敢和迅速。“波将金”号的起义必须尽量加以利用。我盘算要是不能夺取敖德萨的话，就随“波将金”号开赴高加索沿海一带去，首先去巴统地区。巴统的卫戍部队和要塞为我们的舆论宣传所牢牢控制。这点我是很清楚的。巴统工人不止一次出色地进行了英勇的斗争。还有，古里亚的农民（格鲁吉亚省）和其余邻近地区的农民的革命热情也非常高，他们是跟随社会民主党人的。不错，在那里活动的多半是孟什维克，但是格鲁吉亚的农民实际上在公爵的手中还处于农奴的从属地位，所以我认为他们是容易而且乐意支持起义的。我觉得巴统作为革命根据地来说在整个黑海沿岸一带是一个最可靠的地区。

我当然再次表示准备立即出发。第二天我就离开了。在动身前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又一次同我谈了话，并且再三强调，预先取得农民积极的支持尤为必要。

“让他们去夺取地主、教会及其它的土地。号召他们这样去

做，并且帮助他们。”

我完全同意对农民采取这种政策和策略，但还是提醒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注意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所通过的《对农民运动的态度》的决议。这个决议只讲到“社会民主党的任务是对农民所采取的能够改善他们的处境的一切革命措施，包括没收地主、官府、教堂、寺院和皇族的土地在内”^①，而只字未提号召用革命手段去夺取这些土地。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您的建议超出了这个决议。我完全同意您的建议，但它是否应成为在农民中进行鼓动时的总的指示精神？这是不是中央委员会的指示？”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没有马上回答。他考虑了片刻，然后较为慎重地说：

“不，中央委员会暂时还没有发出这样的总指示。一切取决于总的形势，也取决于每一个具体场合的条件和状况。敖德萨现在的形势是需要把革命力量全部发动起来，开展斗争。”

当然，我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这番谈话我现在不可能逐字逐句地转述，而只是大概的意思，但是对这个谈话的实质和内容我是可以负责的。委托我办的事情太重大了，所以我对随之而产生的一切情况一辈子都牢记不忘。我亲切地告别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我答应详细地按时向他报告事变的进程。我答应如果起义确实能取得胜利，就不单会派一艘驱击舰，甚至会派一艘巡洋舰或是一艘装甲舰到罗马尼亚去接他。

现在我们都非常明白友好的工农联盟在过去和现在对于无产阶级革命具有多么重大的，可以说是决定性的意义。在1905年革命期间里，这一点甚至对许多布尔什维克来说完全是不清楚的。

^①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1分册第92—93页。——编者注

西欧的社会民主党对农民则早就抱着一种十分怀疑的态度。俄国的社会民主党人在这个问题上一方面仿效自己的西欧同志，另一方面在同崇拜农民和赋予农民在社会主义革命中以主要作用的民粹派激烈论战时，对农民在政治上和革命方面的作用也估计不足。尽管遭受了残酷剥削和彻底破产的农民还在1901—1902年时就通过激烈的土地骚动事件受到人们的密切注意；后来在1903年召开的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通过了一项十分温和的（以免说得太刺耳）土地纲领，答应农民的只是要收回地主手中的“割地”（解放农奴时地主所夺取的农民的土地）。众所周知，社会革命党人极其蛊惑人心地利用了这个“割地”问题，并且以此靠损害社会民主党人利益的办法不单在农民中间，而且在还没有跟土地、农村断绝关系的人数众多的工人中间捞取了一大笔资本，使其名声大振。

现在我们知道，列宁同志还在1902年就提议在党纲的土地部分写进土地国有化的要求。遗憾的是他的提议没有获得通过。但是自1904年起他就愈来愈坚定地开始谈论和撰文提到俄国农民在行将到来的革命中应该起的巨大作用，而到了1905年他就已经把“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问题直截了当地提了出来。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主要是由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坚决要求，才作出了上述的《对农民运动的态度》的决议。当然，就连这个决议也还是不够坚决的。当时需要的不单是“支持”农民夺取全部土地的愿望，还要号召他们这样去做，就象我们后来在1917年采取的那种做法。但即使这样一个决议也已经是朝前迈出了重大的一步。在1905年底，列宁就提出进一步的打算，即修改我们的土地纲领，提出土地国有化的要求。而正是在无产阶级和农民专政的问题上在布尔什维克（主要是列宁）同孟什维克之间立即发生了一场激烈的论战。历史实际上已经证明谁是对的。

我继续讲下去。就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提出建议的第二

天，我乘特快列车途经奥地利回俄国去。为了安全起见给我弄到一张正式的出国护照，上面填写了某个将军儿子的名字（姓什么我忘了）。带着这张护照我就能放心地公开通过国境。就连登记在俄国居住的事好象也是与伊林一起用雷宾斯克市民米哈伊尔·安德烈也维奇·康金的名字搞了一个很简单的伪造证件。果然不错，边防宪兵很客气地向我举手致敬，显然是把我当作真正的将军的儿子；对我的行李的检查只是装装样子而已。

我又回到了俄国！我怀着喜悦和激动的心情坐上了开往敖德萨的火车。我小心谨慎地向同车的人询问敖德萨发生的事情。可是情况谁都不清楚。有人谈到一些枪杀和失火的事，谈到“波将金”号用大炮轰击城市的事。算了吧，我很快就能实地了解到全部确切的情况了。

我抵达敖德萨时，可惜已经是夜里了。根据给我的地址去寻找秘密住所既冒险又根本不可能。没办法，我不得不住旅馆。出示了伪造证件进行登记。城里已经实施戒严，但是我的伪造证件十分顺利地通过了；证件没有引起任何疑问就给登记好了，后来我把它当作居留证使用了相当长的时间。

第二天我跟我们的敖德萨组织联系上了。我清楚记得我是同叶梅利扬·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会面和谈话的。其余的敖德萨人我现在想不起来了。

原来，我来迟了。“波将金”号装甲舰已经离开敖德萨港了，在敖德萨没有发生起义，而是发生了一场残酷的暴行。

据人家告诉我（对于历史的准确性我无法保证），事情的经过大概是这样的。在黑海舰队里早已顺利地进行了宣传和鼓动工作。通过宣传被说服的水兵在“叶卡特林娜二世”装甲舰上尤其多，所以在酝酿起义中对该舰寄托了主要的希望。分舰队当时即将举行夏季演习。它装上了相当数量的弹药之后，就出航演习去

了。在出航之前，整个分舰队通常要集合在坚杰尔小岛附近。这一次首先驶向海岛的是“波将金”号装甲舰，余下的分舰队停泊在塞瓦斯托波尔。

“波将金”号舰上的水兵早就憎恨自己的指挥官哥利科夫和其他的军官，因为他们非常残忍地虐待全体舰员，肆无忌惮地对他们进行压榨。出航的第一天，水兵们吃的就是生了蛆的臭肉，他们开始表示不满，并提出了抗议。军官们就粗暴地辱骂他们，并且进行威胁；指挥官哥利科夫还开枪打死了有威望的抗议者瓦库林丘克，水兵们在马丘申柯和其他较有觉悟的同志的带领下拿起了枪，在几分钟之内就把军官们歼灭了并扔进了大海里。为了指挥起义的舰艇，选举了以马丘申柯为首的一个委员会。装甲舰起锚驶往敖德萨。

驶抵敖德萨之后，“波将金”号全体舰员发布了告《敖德萨诸君》书，阐述了装甲舰上所发生的事情，并号召敖德萨的居民支持他们；同时，还派出了一个代表团去要求地方当局不要阻挠埋葬一名被打死的水兵，并提出了警告：如果设置障碍或扣留代表团的话，装甲舰将立即炮击城市。确实，当警察局遵照市行政长官的命令企图扣留代表们的时候，装甲舰开了几炮。我亲眼看见了市中心的一幢房屋被打了个口子。可惜的是，显然由于发生障碍瞄准错了，所以炮弹击中的不是政府大楼。但是被扣留的代表立刻获释了。

后来为被打死的水兵瓦库林丘克举行了示威式的送葬仪式。水兵和当地革命组织的代表发表了演说。有演说，有辩论，过于多的演说和辩论，但是行动，果断的革命行动显然过于少了。然而需要的首先是采取行动，即用弗·伊·列宁指示的方法，用他给我指定的方法去采取行动。甚至关于其余的黑海舰队可能转向“波将金”方面来的问题，他也是正确的。

海军上将丘赫宁派出整个分舰队去对付“波将金”号。现在我不记得丘赫宁是否亲自率领了分舰队。获悉这个情况之后，“波将金”号勇敢地迎战追击它的舰队。在答复要它投降的时候，它升起了战斗的旗子，准备好了大炮，并继续朝前驶去。突然，“格奥尔基胜利号”装甲舰离开了分舰队，升起了红色的旗子之后，就加入“波将金”号的行列中去了！还有两艘不大的舰艇也效法它的行动。在分舰队的其他几艘舰艇上响起了一阵“乌拉”的喊声，表达了热情的敬意。海军上将给舰队发出了向后转的命令。如若起义了的装甲舰连忙去追赶正在退却的分舰队，用自己果断的行动去支持动摇之中的舰艇的话，连其余的舰艇，甚至整个分舰队都会加入起义的装甲舰行列中去，这是十分可能的事。“勇敢，勇敢，永远勇敢！”(De l'audace, encore de l'audace, toujours de l'audace！) 革命大师丹东曾经反复这样说过。

但是勇敢、坚决和机智的精神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波将金”号和“格奥尔基胜利号”让溃乱、发慌的分舰队安然后退，而自己却驶往倒霉的敖德萨港。然而，敖德萨的警察当局并没有打盹。它动员了敖德萨流浪者中间的败类，给他们灌得烂醉；在敖德萨这个做买卖的城市里这类人一直是很多的。于是在港口区里就发生了抢劫和暴行，末了港口燃起了一场大火。

我是在大火快烧尽时到达的。港口的建筑物还在冒烟。“波将金”号已经不在港口里了，只有“格奥尔基胜利号”停泊在那里。原来在这艘装甲舰上水兵只是把指挥官抓了起来，而没有把他们消灭。

水兵中许多人动摇了。起义的装甲舰行动犹豫不决，更确切些说，是它们的无所作为的表现；加上敖德萨港的一场火灾，使水兵的动摇加剧了。被抓起来的军官开始向水兵鼓动投降，答应请求当局完全赦免自愿投降的人。“格奥尔基胜利号”的水兵决定投

降了。于是“波将金”号就起锚驶向公海。

“它究竟开往哪儿呢？打算干什么呢？”我向敖德萨的同志们追问。

我得到的回答是装甲舰看来开赴高加索沿海一带去了，至于它的计划，那谁也说不清楚。我心中闪过一线希望，或许“波将金”号会想到可以到巴统去碰碰运气，那个地方是我曾打算一旦在敖德萨不能得手的话就打发它去的。我知道了登上装甲舰的口令，便赶乘第一班轮船去高加索。但是还在诺沃罗西斯克我已经获悉，“波将金”号往西开去，驶向罗马尼亚海岸。正如大家已经知道的，到了罗马尼亚后起义失败的装甲舰，这个“漂浮的共和国”的全体人员把舰艇交给罗马尼亚当局后就登岸了。1905年的这场第一次的武装起义就这样告终了。

我写信把我们遭受失败的事情告诉了弗·伊·列宁，自己就决定前往莫斯科，因为我认为莫斯科以及整个工业中心区定将成为革命运动的主要中心之一，我的看法并非没有根据。莫斯科的无产阶级现在对参加革命运动暂时还不太积极；不过，任何一个对无产阶级有所了解的革命者不会怀疑它最终会振作起来，万众一心行动起来。

我的估计和希望果然是对的。莫斯科发生了1905年的十月罢工，在莫斯科组织了1905年最大规模的武装起义——具有历史意义的十二月起义。

载于《无产阶级革命》杂志 1926 年
第 4 期第 216—231 页

列宁在1905年

(回忆片断)

阿·瓦·卢那察尔斯基

每当有人要求我讲点回忆列宁的事迹时，我总会感到一种折磨人的苦恼。我不能原谅自己当时不知怎的没有以某种方式，哪怕是最秘密的方式（因为在那时写见闻录不是没有危险的）记些日记，作一点简短的记载也好，而这些材料是能够帮助我日后进行回忆的。

大量极有意义的私人交谈，各种会议、集体工作（在这些场合我能十分清楚地观察列宁）和各种事件（我们总是经常一起参加的）都使我能看到列宁完成他的历史任务的情况。但是这一切都过去了，给我留下的只是一些很淡漠的印象，有时甚至连事情发生的年代都无法肯定。

我现在尽量简要地给读者讲讲我还记得的那些关于列宁参加1905年事变的最重大的事情，——这些不是文献所提供的大家已经知道的事情，而是我耳闻目睹的事实。

1905年的几件大事中，我经历了一月九日事件，那时我在国外同列宁过往甚密。不久前我已经写了一篇短文，论述了伟大的1905年^①，在这篇文章里我比较详细地描写了一月九日事件对《前

^① 指发表在1927年1月22日《红色日报》第18号上的阿·瓦·卢那察尔斯基的《一月九日事件和列宁的侨居生活》一文。——编者注

进报》编辑部及其周围的布尔什维克所产生的印象，叙述了列宁对这些波澜壮阔的事件的反应和加邦由鲁滕贝尔格陪同去拜访列宁和《前进报》全体编辑人员的情形。

这些我就不再讲了。同样，关于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我也不作赘述了。我同列宁之间频繁的私人交往后来曾中断了相当长一段时间。从伦敦开完代表大会返回日内瓦之后不久，我征得编辑部的同意后，就到意大利去了，因为筹备代表大会时我担负了大量的政治工作，走遍了所有的侨民区，举行了各种报告会和辩论会，我感到极度的疲劳，加之健康状况总的说来不佳。我在佛罗伦萨住了下来，只同编辑部保持着通信，有时也收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写来的私人信件或是约稿的信件，但多半是收到编辑部其他人员，尤其是沃罗夫斯基的来信。

秋天的那几件暴风雨般的事件爆发时，我已经在佛罗伦萨了。在10月底或是11月初，我收到列宁从彼得堡拍来的一封语气坚决的电报，要我立即返回俄国，返回彼得堡，要我在那里担任《新生活报》这一重要报纸的编辑部的编辑。大家知道，《新生活报》是由明斯基和高尔基编辑出版，并由布尔什维克中央主管。

当然我立刻就出发了，并且在回到彼得堡的当天我就上编辑部去了。

最初，我同列宁经常直接见面几乎主要是由于报社工作紧张促成的。总的说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那时非常兴奋，精神饱满，斗志昂扬。但是，他对处境之危险和已经取得的胜利还很不巩固的状况自然并没有忽视。

列宁没有直接参加当时的彼得堡苏维埃的工作，但是对当时参加了苏维埃的布尔什维克——波斯托洛夫斯基，克努尼扬茨和波格丹诺夫的工作进行了指导，并且同他们保持着经常的接触。

当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那时做的工作是多方面的，非常紧

张的，因为无论是彼得堡和莫斯科，也无论是许多外省城市，都是处在革命动荡和后来的反动时期之间，过着极其紧张的生活，经常发生流血事件和黑帮暴行造成的火灾，在令人胆颤心惊的气氛中流传着关于远东军命运的谣言；当时，政府力图消灭这支军队，使它正在潮水般溃退下来的人马不能同汹涌澎湃的工人革命和农民暴动的浪潮汇合起来。

我个人当时有许多工作，既要从事写作，又要搞宣传，但是就列宁当时范围广阔的活动来说，我——再重复说一遍，最初仅是在办报工作中同他有所接触。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很重视《新生活报》。有必要提醒一句，这份重要的公开报纸曾经发行了五万多份。在这以前，布尔什维克还从未发行过这样大数量的报纸。起初这份报纸的人员编制是异常奇特的。在编辑部里同我们布尔什维克一起工作的大多数是与明斯基直接交往的朋友——他们是带有颓废派气质的诗人，咖啡馆里来的无政府主义者以及各种各样生活浪漫的艺术家的，他们自命为“非凡的极左派”，并且认为同布尔什维克合作是件耸人听闻的事情。

不过，编辑部里的布尔什维克很快就完全清楚地认识到把一匹“布尔什维克的马”和半颓废的“胆怯的扁角鹿”一起套在一辆马车上是无论如何“不行的”。结果就发生了一系列的冲突。

我应该指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待明斯基，甚至对待任何一个来给《新生活报》工作的知识分子中较为渺小的人物，所持的态度是非常有分寸，有礼貌的。同时，对个别编辑人员那些使我们感到很不寻常的狂妄行动，他也会乐得哈哈大笑，并且常常反复说道：

“这真是历史上的天大笑话！”

可是，恰恰在我们结束了《新生活报》内部的整顿之后，这份拥

有大量订户和读者，并且不单在彼得堡，而且在国内都已经起了很大作用的报纸，不久却被封闭了。

随即我们的工作到了没落的地步。后来，我们因为不希望落得没有一份机关报，于是就另办一份报纸^①代替它，确切些说，只是更换了一个报名，而且作为我们公开的中央机关报报名，这些名称使用的时间都不长。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一直担任主编并依然极其关心其它各个专栏的工作。无论是在《新生活报》里，还是在那些经常更换名称出版的小报里，我长期负责报刊评论栏的工作。我写的很短小的简讯或是辑录文章，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没有一篇不是亲自看过的。大多数场合下，全部材料，除了电报和新闻之外，都在列宁主持的编辑部会议上宣读过。而他也把自己写的文章念给我们听，并且非常乐意听取各种意见和建议。

总之，列宁是真正名副其实非常喜欢集体工作的，喜欢在某人草稿的基础上经过许多人直接参与修改，并定稿。

同时，报纸编辑部当然也是大量的各种各样消息的汇集处，从这里去观察舌战的动静是最方便了。

当然，在整个这段时间里，列宁是这些报纸的大脑和心脏，所以象从前在《前进报》和《无产者报》里一样，我们非常紧张地齐心协力地工作时，从列宁这位始终富有朝气、机智和热情的领导身上，感受到一种巨大的喜悦。那种善于把一些看来完全不同的、彼此相差很远的事实迅即加以对比的本领，确定方向时的惊人速度和措词的确切——这就是我们的领袖使我们惊奇的地方。这是对付敌人（对付所有敌人，而他们为数甚多，而且是各式各样的）又一

^① 《新生活报》于1905年12月3日（16日）被封；1906年彼得堡的第一份布尔什维克报纸《浪潮报》，自4月26日（5月9日）出版至5月24日（6月6日）停刊；代替《浪潮报》的是《前进报》，从5月26日（6月8日）出版至6月14日（27日）停刊；后来的《回声报》是自6月22日（7月5日）出版至7月7日（20日）停刊。——编者注

无法形容而令人莫测的机智手段。

我已说过，初时我同列宁的接触仅限于报纸方面的工作。但这只是在最初的时候。以后发生了几起事件，这使我同列宁在其它方面也有了工作上的接触。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整个 1905 年期间，主要是出于保密的缘故而避免在大庭广众发表演说，但这并不妨碍他仍然经常地在不公开的党内会议上发表演说，尽管出席这种会议的人数也是相当多的。他唯一的一次在大庭广众面前发表的演说，是在 1906 年 5 月 9 日（22 日）他化名卡尔波夫在帕宁娜伯爵夫人民众文化馆举行的群众大会上所作的那个很有份量的政治演说。我没有参加这次大会，所以我就根据出席大会的同志们的口述来讲这件事。他们说，当时大厅里象闪电般迅速地传开了这样的消息：这位谁也不知道的卡尔波夫不是别人而正是大名鼎鼎的列宁。于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受到了一阵经久不息的热烈欢呼。他的演说不断地为雷鸣般的掌声所打断，而后他也是在这种不断的欢呼声中离去。

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他们手中所掌握的公开的报纸就象一个庞大的共振器，使这种影响不断得到扩大。但是坦白地说，工人阶级在这个时候并没有怎么严密地组织起来，虽然在彼得堡和许多省已经建立了苏维埃。同样，党的机构也还非常脆弱。因此，事变的发展出现严重的自流状态，这种状况，比如说，不能同十月革命的准备阶段比，更不能同十月革命之后的情况比，因为十月革命时已经清楚看到党的机构是领导机构，看到巨大的革命的自发势力愈到后来就愈加听从领导。

然而，事变的发展迅猛异常。列宁屡次向我们指出：革命正处于极端的危险之中。正如听过他的公开演说和看过他的文章的任何一个人所了解的那样，列宁在当时就已经十分重视吸收乡村的农民群众和军队的士兵，特别是当时在溃散中的远东军的士兵参

加革命。

布尔什维克采取的路线是使工农结成牢固的联盟并实现当时列宁所提出的口号：“工人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

12月3日（16日）彼得堡苏维埃的首届委员全部被捕了。这次逮捕事件使大家特别感到震动，列宁自然也不例外。我现在还记得列宁当时忧心忡忡的神态和他的令人忧虑不安的讲话。

大家知道，受到孟什维克（比如，普列汉诺夫）指摘的十二月起义，得到了布尔什维克和他们的领袖的最充分的支持。列宁认为面对政府的进攻把运动引向更高的形式，这种尝试是完全合理，完全正常的。我至今还记得那些令人无限忧虑和暗淡无光的日子。那时，莫斯科方面的消息不能经常及时得到。列宁总是贪婪地阅读送来的每一字每一句的报道，迫不及待地听取从莫斯科来的同志们所作的一字一句的汇报。

彼得堡的布尔什维克机关，在列宁领导下，全力以赴地帮助莫斯科的起义，至少是协助切断彼得堡同莫斯科之间的交通联系。当时这样做对许多事情是有影响的。

我没有直接参加布尔什维克派出的那些小组的工作。这些小组必须全力去组织尼古拉也夫铁路的罢工，或者想尽办法拆毁路轨。铁路上的工潮闹得很大，路轨被拆毁了，但是我们的力量却不足。谢苗诺夫团开进了莫斯科，并且预先就决定要歼灭英勇的红色普列斯尼亚的工人。

在《新生活报》和《开端报》被封闭以后，曾经试图创办一份共同的社会民主党报，名为《北方呼声报》。与此同时，布尔什维克中央和孟什维克中央之间就统一问题开始了长期的谈判。

就在那个时候我开始经常遇见列宁，并在我们党的这个发展阶段里我观察了他——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部斗争的一位策略家和战略家。我清楚地记得这些会议。通常会议是在私人寓所里举

行的。参加会议的大约有二十五至三十人。孟什维克犹豫不决，害怕作出确实的承诺，力求保持尽可能充分的独立性。我记得马尔丁诺夫同志总让我们听他那异常冗长的发言。而他的发言罗罗唆唆，时常把一些最简单的问题弄得复杂化。

这些会议多半由我担任主席，但是我们党在会上的路线几乎完全是由列宁来执行的。他只是偶尔委托某个人（多半是委托彼·彼·鲁勉采夫）去发个言或发表个声明。同孟什维克的斗争主要是由他来进行的。

会议一个接一个地开，而事情却久久没有进展。会后，我们常聚在一个小餐馆里讨论既成的局面。我们几个人（其中包括鲁勉采夫和我）由于认为尽快达成协议是十分重要的，就准备作出某些让步。但是列宁对于预先确定的可能达成协议的范围无论如何不愿意作出丝毫的改变。此外，他要求孟什维克必须在一些小文件（他亲自起草的小纸片）上签字。比起那些由孟什维克向我们提出来的完全按照规矩起草的附带种种保留条件的冗长的决议，这些文件的起草就显得仓促了。

简短而明确的措辞使孟什维克必须作出抉择：要么中断谈判，暴露出掩饰得并不高明的机会主义者的嘴脸，要么跟着布尔什维克走。

我清楚地记得，尽管局势普遍严重（因为这一切都是在十二月起义的局势下发生的），尽管这些谈判进行得十分紧张，列宁始终都是精神饱满。那时，我常见到兰塞姆^①后来曾加以描绘的他的那种欢笑，——我认为那是出于坚定的信心，深信自己对事件分析的正确，深信胜利一定会到来而发出的欢笑。由于对当时情况有真知灼见，由于看到面前的远大前程，列宁当然认为孟什维克和他

^① 指兰塞姆，阿瑟（Ransome, Arthur, 生于1884年），英国资产阶级作家。——译者注

的那些缺乏远见的同时代人的一切徬徨和错误是可笑的。在这些会议上，我们没有作出明确的结论，仅是为达成协议准备了材料。后来，这些材料在分别举行的布尔什维克的坦默福斯代表会议和孟什维克的彼得堡代表会议上进行了讨论。

正如大家所知道的，结果产生了统一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统一的编辑部。列宁把我同巴扎罗夫和沃罗夫斯基一起派往那个编辑部去工作。

几乎是紧接在这以后，十二月起义的失败又再次使政治形势发生了变化。起初，布尔什维克中央（首先是列宁本人）并不以为政府在莫斯科的胜利是如此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件，以致要改变党和无产阶级的基本策略。相反，列宁所主张的观点是必须坚持我们斗争的战斗性质。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在瓦西里岛上举行了一次规模很大的布尔什维克党的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列宁第一次在演说中谈到了必须以游击战来对付政府；谈到组织英勇的五人小组和十人小组，去破坏国家的生命；并且以这种方式通过分散的组织去发动广泛的后卫战，以此来架设作为通向革命新高涨的一座桥梁。他的这个演说使到会的人产生了强烈的印象。我记得，我恰好是跟巴扎罗夫和沃罗夫斯基一起开了会回来的。领袖对于革命无论如何要继续下去的坚定信念和他要使党的全盘工作大部分转向武装道路的意向，使我们感到十分钦佩。

自然，孟什维克对列宁的这个演说也有所闻。他们断然对它进行指摘。他们认为这是转向布朗基主义，这是被打败的但却是顽固的革命者的绝望之举。

以后，随着反动势力的加强，经常出现这种情况：满腔革命热情而又为必须退却弄得非常懊丧的工人和老革命家，在各种会议上要在旧策略与新方针之间作出抉择时，几乎要分成势均力敌的两派。旧策略，前不久还为列宁亲自所倡导，而新方针则是他现在

开始逐步采取的。这个新方针的目的，是要保存一个秘密的党，使它完全不受损害，而同时又必须利用一切合法的机会、杜马讲坛上的残余自由等等，来准备一次新的进攻，新的革命。

我们中间有一部分人，由于继续受到革命事变的影响，由于不能及时理解从根本上改变策略的必要性（策略要从根本上改变，这是事变所要求的，是列宁所确定的），因而走上了一条错误的路线。这条路线，后来导致了我们中有些人脱离了党，而有些人后来不得不表示悔悟而又回到了党内来，并且承认列宁的策略是无比英明的。

至于孟什维克，他们却变节了，他们对自己一度的革命热情表示后悔，对革命的可能性失去了信心。他们中间已经开始显出象鼠疫斑点那样的背叛行为的色彩来，后来他们的取消派就是用这种色彩涂饰起来，逐渐地使整个孟什维克党也沾染上了极端的机会主义，以至连普列汉诺夫也不得不从孟什维克组织里挣脱出来……

本文的内容不包括被称为党的统一代表大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因为它超出了1905年这段时间的范围，但是会前的选举运动则是代表大会的过渡阶段。

在这次选举运动期间，我经常伴随着列宁。想来，不下十次之多我随他一起出席会议，发表演说。在大多数的场合下，我是根据预先确定的提纲来阐述我们的基本立场的。我们同孟什维克的较量是很严峻的。虽然代表大会应该是“统一的”，但是每个人都明白，在这次代表大会上“统一的”党的面貌如何，将取决于投票数量的多少。

当时，列宁含蓄地笑着对我说：

“如果我们在中央或中央机关报拥有多数的话，我们将要求有最牢固的纪律。我们将坚决要求孟什维克一切服从党的统一。如

果他们的小资产阶级本质使他们不能跟我们一起前进，那就更糟了。党的统一是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才取得的，让他们去承担破坏这个统一的罪名吧。当然，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从这个‘统一的’党里所能带走的工人要比他们带到这个党里来的工人少得多。”

我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问道：

“如果我们最后还是处于少数，那该怎么办呢？我们是否准备统一呢？”

列宁带着几分神秘的微笑，说道：

“看情况而定。无论如何我们是不会为了统一而让人束缚我们的手脚，也绝对不会让孟什维克用锁链牵着我们走的。”

由此可见，辩论进行得多么的艰难。正是在彼得堡（后来它成了列宁格勒）每多添一票都是非常重要的。当然，到处都进行着这样的斗争。大家知道，后来，尤其是高加索在这方面给了我们一次打击。我们就尽力设法用乌拉尔来回敬一下孟什维克。

在选举大会上，我曾采取了相应的立场，清算了孟什维主义以往的一切罪孽和错误，指出他们目前纲领中明显的动摇性。记得马尔托夫的弟弟在这方面屡次成为我的论敌。

列宁利用孟什维克在会上的一切漏洞，在作总结发言的时候每次总给论敌以有力的嘲笑。

对于当年炽热的革命环境里进行的战斗，我至今回忆起来还感到万分的神往。甚至那种对于革命浪潮开始低落共同感受也没有影响我们因掌握了真正革命的、真正马克思主义的策略而感到幸运。

我认为，尽管我当年同波格丹诺夫保持着亲密的友谊，假使不是环境迫使我自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回来以后几乎就马上出国侨居的话，我以后也未必会犯错误。那时有人对我提出非常严厉的控告，而当时党的委员会介绍给我的律师切盖鲁尔-库斯也得到了

一个微妙的暗示，说我最好出国去。那时沃罗夫斯基同志受托同我一起查明这个问题。同他商量之后，就作出了协助我尽快地取道芬兰出国的决定。否则，我无疑会遭受多年监禁的危险。

这件事使得我同党的中央之间产生了一些隔阂，当然，这是极不愉快并会引起各种后果的事情。好在我以后在“左的”错误方面徘徊过后，新的波澜壮阔的革命浪潮的到来，又使我回到正确的道路上来了，这时我受到了列宁的亲切接待。

应该说，在这巨大的革命高涨的间歇时期，我还曾同列宁在斯图加特和哥本哈根的国际会议上有过密切的工作接触，尽管我们的分歧已经开始了，而且后来还大大地发展了。但是这一点当然不属于本文叙述的范围之内了。

阿·瓦·卢那察尔斯基：《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回忆和论文集）》1933年莫斯科党的出版社版第13—23页

同列宁的几次会见

米·格·茨哈卡雅

伟大列宁的感召力，他的天才的感召力十分巨大。每当在艰难的时刻，只要想起列宁，就能使人增添新的力量，产生热情，心情乐观；没有一个真正的布尔什维克，不具备这种感情。

我第一次亲眼见到伊里奇是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期间。这是在1905年4—5月间。大会开幕前，列宁向我谈了我们工作的前景；他说，如果组织委员会要我宣布大会开幕，则不要拒绝。我们组成了以伊里奇为首的大会主席团。他在大会上作了主要的政治报告。

我是第一次听他作报告。他一开始就讲得很朴实。列宁愤怒地指出了发表在孟什维克的《火星报》上的机会主义论点，他把坚定的革命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同孟什维克的卑鄙思想作了对照。他用国际工运史上的事实，特别是用1905年最初几个月里俄国工人革命斗争的事实，详细地阐明了自己的思想。在他的报告将结束时，全体代表都肃静地站着听他讲话，因为这位理论家、政论家和革命组织者的钢铁般的逻辑力量吸引了全体代表。^①

伊里奇讲完后，掌声和欢呼声经久不息。站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位伟大的革命家、理论家和政论家。

^① 指《关于社会民主党参加临时革命政府的报告》（见《列宁全集》第8卷第352—366页）。——编者注

在大会以后的那些日子里，我得以进一步熟悉伊里奇，我切身感到他对周围的同志十分关怀。我永远不会忘记，在离开伦敦的前夕，伊里奇带领我们去游览动物园和参观英国历史博物馆的情景。在巴黎时他也是这样，带领我去参观了艾菲尔铁塔，罗浮宫的世界画展和拉雪兹神父墓地的公社战士墙。这些地方他自己已看过多次，他是专门为了向我介绍才去的。

我们还去凭吊了在伦敦的卡尔·马克思墓。墓地的经理戴着高高的大礼帽等在大门口。这个墓地象个大公园，里面有几条狭长的林荫道，有很多值钱的名贵墓碑，甚至还有某勋爵或者某贵妇人心爱的狗的浮雕。但是，十九世纪的伟大思想家、科学共产主义的创始人、第一国际奠基人的墓，如果没有墓地石匠的指点是找不到的。当他们知道我们是从俄国来的，他们马上就猜到，我们一定是在找卡尔·马克思的墓，于是就指给我们看了。我们在墓前站立了很久，然后坐下来，不急于离去。伊里奇带着讽刺的口吻提起这位经理（大概他看见我们在一个他所不熟悉的人的坟墓旁边呆了很久而感到不安）说：

“这个可怜的资产阶级分子不会想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切不朽的、永生的东西我们都继承下来了；这些东西甚至在落后的沙皇俄国我们都要使之实现，这使各国资产阶级都怕得要命。”

大会闭幕以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和我从伦敦经巴黎回到日内瓦。在法国的边境城市布伦发生了一件在当时说来是很平常的事。法国警察当局应沙皇特务的请求，决定对我们进行检查，名义上是检查我们的箱子里是否有走私的烟草（我们在箱子里放着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各种记录）。这种预先策划的检查是当着俄国奸细的面进行的。伊里奇坚定沉着的态度解了围，他没有让他们打开装有大会记录的文件夹，他坚定地说：

“那里没有什么烟草。我们都不会吸烟，又不是商人。里面只有文稿和手稿。”

他们没有抄到什么，所以没能找我们什么麻烦。

* * *

在回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这样一位不平凡的人物时，当然无法一下子把他的天才的各个方面，把他的高度的人性，钢铁般的意志，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毅力和热爱劳动的精神等等毫无遗漏地都谈到。

我回忆起这样一件事：1908年，伊里奇正抓紧完成《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的写作，他需要参考十九世纪英国的几位物理学家和哲学家的某些著作。但是瑞士的图书馆里没有这些书。伊里奇就专程从日内瓦来到伦敦，到英国博物馆去寻找参考资料。只有一丝不苟的人，只有力图用马列主义理论这一锐利武器来武装党的伟大的革命科学家才会这样做。

1916年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我住在日内瓦。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从苏黎世来信对我说：“伊里奇现在在洛桑，明后天将去日内瓦作国际形势报告。他非常非常希望能见到您……”

虽然我当时身体不适，但我还是赶到他作报告的地点。象通常那样，听众很多。伊里奇一向十分准时，晚上八时正他来了。他从不迟到。在走上讲台之前，他看到了我。我们就约定在当晚报告后再见面。象通常那样，由于碰上了来自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方面的不可调和的敌人，他的报告被拖长了，变成了名副其实的政治大辩论（伊里奇经常碰到这样的事）。伊里奇听完了几个反驳者的发言后，在结束语中他以特有的无与伦比的艺术天才，彻底驳倒了论敌的全部观点，消除了动摇分子的一切疑虑，使绝大多数听众受到了巨大鼓舞。列宁的演说的力量在于他的表达简单明了，他

非常善于揭露马克思主义的假追随者，善于突出主要问题，最后甚至把最明显的反对者都说服了……①

报告结束后我们在街上见面了。他在河堤上徘徊了很久。同我们在一起的还有一位侨居国外的青年同志乔治。那天晚上月亮分外皎洁，周围一片寂静。列宁谈到了使我们感到亲切和激动的俄国形势，谈到战争给地下工作带来的困难。伊里奇同我并排坐在一张长凳上。乔治同志用臂肘支撑着河堤的栏杆，站在我们面前。

我问伊里奇：

“伊里奇，我和您是否等得到下一次俄国革命？”

显然，我的问题打断了伊里奇的思路，他用奇怪的目光看了看我，没有直接回答，而是首先问：

“米哈同志，您多大岁数？”

我回答说：

“五十岁多一点。您呢？”

他说：“同您相差不多，四十五岁多一点。那又怎么样呢？如果我们等不到革命，那么他总等得到的。”伊里奇指着乔治说，“不管怎样，我们总是要把革命工作继续下去的，如果我们来不及，那么他们——我们的青年一代——会把它继续下去的。”

我回答说：

“亲爱的伊里奇！我还是认为，我同您这些人也能见到革命，革命可能很快就要来到了，我们就会见到的。”

他哈哈大笑起来，不待我讲完就接着说：

“米哈同志，我很高兴，在目前的条件下您能这样自信。这是一种健康的、正确的乐观主义……”

在齐美尔瓦尔德会议和昆塔尔会议以后，伊里奇已经在考虑

① 指1916年5月20日（6月2日）列宁在日内瓦所作的题为《国际工人运动中的两种流派》的报告。——编者注

召开俄国布尔什维克代表大会或者代表会议的事了。我问他要有多少代表才能宣布召开代表大会或者代表会议？他回答我说：

“即使十个，甚至七个、五个都行，但是一定要是群众的真正代表，是真正的革命者，是布尔什维克，是地下工作者。即使从彼得格勒、莫斯科、高加索、乌拉尔、顿巴斯、西伯利亚各派一名代表，差不多也就够了。我们将把我们的大会宣布为真正的全俄代表大会，并将作出符合我们时代要求的决议。”他又补充说道：“战时就按战时的办法，如果我们符合劳动群众的革命运动的要求，正确地解决了战争和革命的全部问题，那么代表的数量就不会起多大作用，因为这样的大会的代表，即使每一个人只代表十个真正的布尔什维克，或者甚至代表不到十个，那他要比几十个，甚至其他时期的其他大会的几百个代表还要宝贵”。

这天夜里，伊里奇还详细谈到，如果不可能同国内建立更加广泛的联系，那么就要抓紧时间，对准目标，就在这里，在西欧，好好地开展革命工作，帮助德国人、法国人以及其他人民，使这些国家的群众做好开展革命斗争的准备。在目前的这场战争中，危机不仅可能发生，而且是不可避免的。而1907年的第二国际斯图加特代表大会的决议似乎要我们向战争真正宣战，以加速资本主义的危机，使资本主义早日崩溃。

伊里奇的这些话的意思是：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和在任何条件下，都要顽强地、不倦地为革命而进行工作……

我们分手时天色已经微明。我们拥抱并紧紧握手后才告别。希望不出一年我们能再见面，并一起到俄国去。

他又补充了一句：“到革命的俄国去……”

导师和朋友

叶·德·斯塔索娃

我是通过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克鲁普斯卡娅认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我和克鲁普斯卡娅都曾是星期日学校的教师，后来又一起在教师自己举办的教学资料流动陈列馆里工作。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流放期满后出国去了，后来，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也去了。于是我们就开始通信。到1905年为止，我们之间围绕着党的工作问题一直保持着频繁的书信来往。

记得在党的第二次与第三次代表大会之间的一段时期内，由于我们对吸收新生力量这项工作做得不够积极，受到了列宁的批评。应该承认，我们挑选工作人员的确十分谨慎，生怕敌对分子钻进我们的队伍。当工作遭到挫折时，我们往往会埋怨人手不够。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一封信里是这样写的：

“需要青年的力量。我真想建议把那些敢说没有人材的人当场枪决。俄国的人材多得很，只是必须更广泛和更大胆地、更大胆和更广泛地、再更广泛和再更大胆地把青年组织起来，**不要对青年存戒心……** 抛掉一切因循守旧、循规蹈矩之类的旧习气吧。到青年中去建立**数以百计**的前进派小组并鼓励它们竭尽全力来工作吧。”^①

^① 《列宁全集》第8卷第123页。——编者注

列宁在这段十分精辟的话里流露出他对俄国无产阶级的雄厚革命力量怀有坚定的信念和热切的期望。

1904年我因中央北方局的案件被捕。那时，林格尼克、克努尼扬茨、鲍曼等同志，还有其他一些布尔什维克都关在塔甘监狱。

1904年11月，经过绝食斗争以后，我被交保释放。但还有一部分因我们的案件被捕的同志依然关押着。

根据新的刑法典我们的案件应该由高等审判厅公开审讯，而不是象以前那样通过行政系统由宪兵局处理。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在法庭上应该采取什么态度，遵循什么策略？我受同志们的委托带着这些问题去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请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在回信（《给绝对者的信》）中提出了如他所说的所谓“一些不成熟的想法”。这封信的附言充满了巨大的关怀和对我们的热情鼓舞。他说：

“向库尔茨、鲁卞、鲍曼和全体朋友们致以崇高的敬意，不要灰心！我们的事业现在进行得很顺利。我们终于和破坏分子分手了。我们和退却的策略也割断了关系。现在我们正在进攻……祝你们身体健康精神饱满！！”^①

1905年9月，我被派往日内瓦去负责中央委员会的事务工作。到日内瓦后，我马上去“伊里奇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同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以及她的母亲伊丽莎白·瓦西里也夫娜住在一起。

我到他家时，只碰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他马上把我领到公用房间里去，这是一间既当厨房又作餐室的房间。他向我提了好多问题：彼得堡、俄国、彼得堡委员会、中央委员会的情况怎样？后来他突然站起来说：“等一下！”我以为我有什么事情做得不对。

^① 《列宁全集》第8卷第51页。——编者注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走到餐具橱跟前，从里面拿出一只茶壶，灌上水，把煤气灶点着，铺好桌子，做好喝茶的一切准备，然后才同我继续谈话。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常常自己料理家务。他们家里有这么一个习惯：谁有空，就谁做家务。

列宁的一家人相处十分和睦。我回忆起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克鲁普斯卡娅去世前不久对我谈起过的事。她谈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彼得堡坐牢时的情况。在那些日子里，党有时安排一些假的未婚夫和未婚妻去同政治犯取得联系。通过这些“未婚夫”和“未婚妻”同犯人保持接触，因此这些犯人没有脱离政治生活。

有一次，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通过自己姐姐告诉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说，要“未婚妻”到他那儿去一次。

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说：“我真不知道，该我去，还是叫另一个什么人去？结果我去了，原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确实是要我去。”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的评价很高，说她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一般说来，他所发表的文章没有哪一篇不同她商量的。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听取汇报和向人家提问的风度是很独特的：在提问时，他把对方的思路纳入他所需要的轨道上去，使对方的回答触及他感兴趣的问题。我们在日内瓦第一次谈话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是用这种办法向我了解我所能汇报的一切重要情况的。

恰好在1905年的春天和夏天，召开了医生、教师、律师等其他各类知识分子的代表大会，成立了各种协会，组成了联合会。我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汇报了我们在这些代表大会上和协会里是怎样同自由派作斗争的情形。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听完了我的汇报

后说：

“您该给这里的俄国侨民^①作个报告，讲讲这些情况。”

我感到有点紧张，因为我从来没有作过报告。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还是说服了我，说这个报告很需要。在准备报告的过程中，我看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是一位多么出色的导师和同志啊。他耐心地向我指出报告的提纲和提要里的不足之处。报告会由他主持，在报告会将要结束的时候，他又扼要地指出了我报告中的错误。

1905年10月20日（11月2日），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会议上，我第一次听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作报告。列宁讲的是俄国的政治事件。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报告里什么使我感到惊奇呢？出席报告会的不但有布尔什维克，而且有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但是在整个报告过程中没有人提出反驳，也没有叫嚷声。报告结束后，主持会议的人问大家有没有问题。一个问题也没有提出来。怎么回事呢？难道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真的完全同意报告的全部观点吗？当然不是！但列宁所作的报告的严密的逻辑性使他们都折服了。只是到了第二天，孟什维克才恍然大悟，对伊里奇在报告中所提出的观点进行疯狂的反驳。

就外观而言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讲得很朴实。作报告时他常常踱来踱去；有时把两个大姆指插在腋下背心里，有时把伸着食指的右手向前一伸。后来在听普列汉诺夫作报告时，我不禁把他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作了一番比较。普列汉诺夫是个出色的演说家，他口才很好，声调抑扬顿挫，象演员那样手势很多，但他没有列宁那种逻辑性和说服力。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同志总是非常关心。我讲一件我个人生活中的事。那是在1905年10月底。当时我住在日内瓦的一个

^①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把在日内瓦各高等学校学习的俄国人和侨居在日内瓦的俄国人都称作俄国侨民。——叶·斯·注

供膳旅馆里。有一次，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到我那儿去，问起我们在莫斯科同鲍曼一起工作与一起坐牢的情况。我对他说，鲍曼那时被关在隔离牢房里，我们在监牢里想尽办法同他取得联系，使他了解各种事情。在高等审判厅拒绝审理我们的案件以后，我们就到处设法让鲍曼取保释放，但没有成功。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听我讲完后就说：

“而娜嘉^①倒设法使尼古拉·厄内斯托维奇获释了，但这不是什么喜事，因为他获释后不久便被黑帮分子杀害了。”

在讲了这番话以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才把一份载有鲍曼遇害的消息的英国报纸交给了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知道我同鲍曼的友谊，所以 he 不想让我从报上了解到鲍曼的死讯。

我在日内瓦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一起工作的时间很短，因为俄国发生了革命，列宁在国外坐不住了。一有机会他就经芬兰回到了俄国。他到彼得堡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到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基地去凭吊流血星期日的牺牲者。这说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认为1905年一月九日事件具有多么重大的意义。

直到1906年1月我才重新见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因为在他动身回俄国时，他交代我处理在日内瓦的所有具体事务。

在1906年这段时间内，我记得特别清楚的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开完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归来的情景。列宁离开斯德哥尔摩后中途在汉科停了一些时候，他在那里写一篇论立宪民主党人的文章。

那时我负责运送代表大会的代表出国，并把他们接回俄国，也负责把从南方来的同志经过瑞典送往国外去购买武器，因为当时俄国南部的布尔什维克还在准备武装起义。

^① 指尼·厄·鲍曼的妻子卡皮托利娜·波利卡尔波夫娜·梅德维捷娃，她的外号叫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库兹米娜。——叶·斯·注

顺便说一下，在从南高加索来的同志中间有一位格鲁吉亚人。他给我讲了立宪民主党人在梯弗利斯活动的情况。听他讲完后，我想这个材料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写文章会有用处，于是我就叫这位同志到列宁那儿去，但没有告诉他去见谁。过了些时候，这位同志回来对我说：

“为什么你不告诉我，派我去见的是列宁？”

我回答说：

“如果你知道我叫你去见列宁，那你就要准备自己的汇报，这样你就不会讲得简单明了了。”

我回忆起党的代表会议的情形，这次会议先是在彼得堡的城外大街开的，后来转到捷里奥基去开了。在捷里奥基的会议上发言的有布尔什维克，也有孟什维克。^①我还记得费多尔·唐恩的发言。他对听众发表演说，好象旧时沙皇的将军对士兵讲话一样：常常要走到他们中间去。在他讲完以后，接着便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讲话。他讲得既清楚又形象。他讲完后同志们从四周把他围了起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不但是我们的领导人，同时又是我们最亲近的朋友，我们可以向他倾诉自己的各种遭遇；向他提各种疑难的问题，不仅可以提政治方面的问题，也可以提个人的问题。

1906年国家杜马进行选举。彼得堡委员会同中央委员会一样已经统一起来。我们开展了抵制维特杜马的鼓动工作。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也是我掌握的鼓动员名单上的一员。我记得当时孟什维克因为他们在彼得堡没有这样的演说家而感到懊恼。

应该说一下弗·伊·列宁高度的纪律性。我有时约他到接头地点（当时我们都处于地下），通知他到什么地方去作报告或发表

^① 因为在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以后，所有的组织都统一了。——叶·斯·注

演说，他从不失约，也从不迟到。第二天列宁总是很精确地告诉我：有多少人听了他的报告，提了哪些问题，在他去作报告的那个组织里有什么缺点等。

我再举一个其他时期的例子来说明列宁的组织性。那是1918年的事，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从彼得堡迁来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后不久。

在通往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住所的走廊里，克里姆林宫的警卫队长派了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附属学校的学员在那里站岗。这个学校的不少青年学生没有亲眼见过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警卫队长下了一道命令：没有通行证任何人不准进入列宁的住所。有一次，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到人民委员会自己的办公室里去时，把长期通行证遗忘在家里了。午间，他有事要回住所去一下，于是他就去了。当他走近站岗的学员时，那个学员向他要通行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指着他的住所的门说：

“这就是我的住所的门……”

学员回答说：

“我不知道。上级有命令：没有通行证谁都不准进去。”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折回警卫办公室，领了一张临时通行证后才回到了家。

一昼夜的值班时间过去了。值班人员回到自己的班里向指挥官汇报了有个人没有通行证的事。这个指挥官已经知道这件事了。他听了汇报后就问这位学员：

“你知道你阻拦的人是谁吗？”

“我不知道。”

“是人民委员会主席列宁。”

这个学员就抱着头奔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那里道歉去了。

可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却说：

“不，您用不着道歉。警卫队长的指示或命令在克里姆林宫的范围内就是法律。我作为人民委员会的主席怎能不执行呢？这是我的过错，您是做得对的。”

我们这些对列宁比较熟悉的人，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超人的工作精神十分钦佩。我回忆起1917—1920年这段时期的几件事。那时我担任党中央书记，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或者玛丽亚·伊里尼奇娜有时跑来对我说或打电话告诉我：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工作十分紧张，已经失眠了，应该采取措施。”

于是我就打电话给各个中央委员，作出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休假的决定。决定通过后，我就用电话通知他：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中央决定，要您休假若干天。”

这时，一个十分生气的声音在电话里回答说：

“您命令我什么时候开始休假？”

如果中央作了相应的决定，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是不讨价还价的。有了假期后，他就去打猎，采蘑菇，钓鱼。他严格执行党中央的决定，决不工作。总的说来，列宁对待中央的决定是十分认真的。

列宁关心同志们健康的事是很令人感动的。例如，他很关心亚·德·瞿鲁巴。瞿鲁巴同志不注意自己的健康，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这一点是不能容忍的。他说，共产党员是国家的财富，浪费国家财富是不能容许的。起初，列宁写信给瞿鲁巴委婉地说，瞿鲁巴“对国家财富的态度越来越不可取了。”当这种劝告不起作用时，伊里奇就写了一份严厉的指令：

“由于亚·德·瞿鲁巴对待国家的财富采取不爱护的态度（曾两次发作），对他进行第一次警告，命令他立即回家……

列 宁”。①

当弗·伊·列宁了解到费·埃·捷尔任斯基累得吐血还不肯休息时，他就打电话给我，建议中央作出决定，要捷尔任斯基到纳罗佛明斯克休假两星期。那时在纳罗佛明斯克有一个莫斯科郊区最好的国营农场，这样，捷尔任斯基可以在那里吃得很好。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把细节都想得很周到，他甚至考虑到在这个国营农场里没有电话，所以捷尔任斯基就不能打电话到莫斯科来，这样他就有可能好好休息。

人民委员会的各个地方是否都放上了给来访者用的水瓶和杯子，弗·伊·列宁连这件事也考虑到了。

那时，中央委员会书记不但要管政治事务，而且还要管供应。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常常打电话给我，要我给某某同志一顶帽子，给某某同志一双靴子，又给某某同志什么东西。第二天他必定要检查是否照他的指示去办了。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异常谦虚。我想举几个例子来说明。

履历表上有一栏：“懂哪几种语言？”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是这样填的：“懂英语、德语、法语（懂得不多）、意大利语（懂得很少）”。

1920年，在第二次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发言时批评了德共领导的错误和意大利人塞拉蒂的路线。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谈到德共的问题时用德语讲；后来谈到塞拉蒂的错误时，他马上就用法语讲。我那时也出席了这次在克里姆林宫安德烈也夫大厅里举行的会议。我现在还能回忆起当时会场上发出的惊讶声。外国人简直不能想象，一个俄国人，刚刚讲的一口漂亮的德国话，还熟练地掌握法语。这就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所说的外语“懂得不多”的真相！

还有一个说明列宁谦虚的例子。他非常爱好音乐。他的母亲

① 《列宁文集》俄文版第21卷第280—281页。——编者注

玛丽亚·亚历山大罗夫娜钢琴弹得很好，孩子们经常听她弹钢琴。1919年或1920年，有一次在亚·德·瞿鲁巴那里举办音乐晚会。一位钢琴家弹了一首列宁很熟悉很喜爱的贝多芬的《热情奏鸣曲》。我走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跟前问他，对这位钢琴家的演奏是否满意。

他回答说：“干吗要问我！我的意见有什么作用？我不过是一个音乐爱好者罢了。”

反对机关中的文牍主义和滥发文件的现象是列宁工作作风的一个特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发了一个指示：凡是可以用电话解决的问题不要用发文件的办法来解决。他自己就身体力行，只要有可能，就直接用电话下达指示。

列宁十分重视接见来访者的工作，他要求每一个工作人员都要关心来访接待工作。如果他与某某同志约好了接见时间，早晨他知道在约定的时间不能接见，那他就亲自（而不是通过秘书）给那位同志打电话，说明在预定的时间他不能接见，重新再约定他可以接见的的时间。如果接见某某同志的时间到了，而紧急事务（那时紧急事务很多）不可能让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去接见来访者，那他就派他的秘书到接待室对来访者说：“不要等了，不用坐着白白地浪费时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无法接见您。”然后秘书还必定同来访者约好什么时候这位同志再来，并把他的电话号码记下，以便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给他打电话。

我还记得一件也是在1919—1920年间的有典型意义的事，这件事同记者有关。那时纸张非常缺乏。《真理报》只出两个版面，用的是棕色包装纸。而编辑部收到的材料和信件却很多。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下达了一个指示，要求登在《真理报》上的每一篇文章要尽可能地写得简短些。记者们开始发牢骚了，但事实上是可以写得简练一些的。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非常重视时间因素。党中央的会议一般定在上午十时召开。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宣布开会不迟于十点一刻。发言的时间是严格规定好的，一般只给两分钟。发言时列宁看着表计算时间。开会时随意交谈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是不允许的。有人刚要开始说话，他马上就伸出手指，发出嘘嘘声，并示意要人家“写下来”。如果您想要告诉别人什么事，那就写下来，不要说话，以免影响别人。所以开会时交换意见的小纸条很多。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一面主持会议，一面为自己做总结作必要的笔记，有时还写小纸条同与会者交换意见。开会时不允许吸烟，离开会场那就更不允许了。那时很多吸烟的人象小学生一样坐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办公室里的一只荷兰式大炉子旁边，对着通风口吸烟。当要进行表决的时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俏皮地眯缝起眼睛，幽默地说：

“烧炉子的老师傅们有什么意见？”

我知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农村的情况是非常关心的，如果从农村来的同志告诉了我什么有意义的事情，我就叫他们去见列宁，从我这儿转去的人往往能提供一些新的材料，对这一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已经习以为常了。他的秘书常常打电话对我说：

“某某同志要求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请您接待一下，同他谈谈。如果您认为他能提供什么新的情况，那就叫他来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如果没有什么新的情况，那就由您替他解决困难。”

其实，尽量减轻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负担是我们的责任。

应该指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是个很快乐又很直爽的人。在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上常常可以听到阵阵笑声，因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笑声常常会引起所有其他人的愉快的情绪。

有一段时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病了，我有些日子没有见到他。后来，在一次例会上我见到了列宁，就问他：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您的身体怎样？不过，不用问，看得出来健康情况良好，因为眼睛挺机灵。”

他愉快地大笑起来。

“你们听斯塔索娃在说什么！她说我的眼睛挺机灵……”

我记不清是在1919年还是1920年的时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把我叫去，给了我一个重要的政治任务。我推辞说，我不过是一个组织员，要完成这一任务在理论水平上我感到不够。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俏皮地眯缝着眼睛问我：

“您同‘工人思想派’斗争过吗？”

“斗争过。”

“同‘经济派’斗争过吗？”

“斗争过。”

“同孟什维克呢？”

“也斗过。”

“同取消派呢？”

“也斗过。”

“那您就去执行这个任务吧！”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提出这些问题是要告诉我，学习不仅靠书本，而且要在实际生活中学习。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不倦地教导我们：要深入地研究生活，密切联系人民，熟悉劳动人民的利益和要求，掌握群众的丰富经验。

弗·伊·列宁五十寿辰那天，我病了，没能见到他。但是我想送一件能使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感到高兴的礼物。我翻找了的东西，找到了著名漫画家卡里克的一幅漫画，——民粹派米哈伊洛夫斯基的庆寿图。在一张铺着绒布的桌子旁边站着十分激动的米哈伊洛夫斯基，他一只手里拿着摘下的夹鼻眼镜，另一只手里拿着

刚刚用来擦眼泪的手帕。米哈伊洛夫斯基周围站着尤沙柯夫、米雅柯金、司徒卢威、亚·米·卡尔梅柯娃；在桌子前面则站着两个小孩：一个穿着水兵上衣的小男孩；另一个是差不多年龄的小女孩，她的小辫子象条老鼠尾巴。这是“小马克思主义者”向民粹派祝贺来了。我给列宁写了一封信，说米哈伊洛夫斯基庆寿时，我们还在幼年时期，而现在我们已经是个大党了，这一切都得归功于您的工作和您的天才的领导。列宁很喜欢这幅漫画。

同志们告诉我（因为我没有参加莫斯科委员会举行的大会），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这个由俄共（布）莫斯科委员会组织的祝贺他五十寿辰的大会上发表演说时，把这幅漫画给到会的人看了。他在讲话时讽刺了人们在他生日里对他的歌功颂德，他扼要地回顾了我党走过的历程，讲到我们党面临的困难，号召大家不要陶醉于已经取得的成就，切忌骄傲。这次演说也象他的全部活动一样，生动地表明了他所具有的特点：无比的谦虚，对形势有清醒的估计，对歌功颂德和空话连篇的作风嫉恶如仇。

载于《回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第1卷 1956年莫斯科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版第364—373页

列宁同志

米·斯·奥里明斯基

我们的党与弗·伊·列宁是不可分的，同样，列宁与党也是不可分的。因此，了解、研究弗·伊·列宁这样一位著作家和政治家，就意味着在一个人身上了解、研究宏大的革命无产阶级集体。

对我们来说，了解弗·伊·列宁就是了解我们自己。因此，我们对列宁这样一个人物非常关心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我们对他研究得愈深刻，就能对我们党的历史了解得愈深入，就更能理解我们取得成绩和遭受挫折的原因，就更能理解我们所采取的正确步骤和产生错误的根源。

弗·伊·列宁是我们这个集体理所当然的成员，这样就把他同我们——同普通党员溶合在一起了。同时他又是个具有鲜明个性的人，在党内找不出第二个象列宁这样的人。因此在研究这位政治家和著作家的时候，应该时刻注意区别一方面他同集体所共有的特征；另一方面他的个性特点。

即使是一个从旁观察弗·伊·列宁的活动的人也一眼就可以看到，他的第一个特点就是具有非凡的工作精力。这个人似乎从来都不知道休息，也不需要休息。可以说，他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站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不间断地一直在工作，有时全神贯注地看书，有时握笔书写，有时参加会议，讨论当前新的政治形势。

除了惊人的工作精力外，弗·伊·列宁还能终生不渝地把自己的注意力贯注在一项事业上，即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事业上。不妨留心看一下他的写作活动，他所写的大量文章、小册子和书籍，都毫无例外地围绕一个问题，即指出无产阶级革命的最正确最直接的道路。即使他写的是整整一本哲学著作，您也能马上发现，这本书是为了解决当时革命斗争所提出的问题而写的，并以排除无产阶级胜利道路上的各种障碍为唯一的目的。

这些智慧和性格的特点，即他的惊人的工作精力和把毕生的全部注意力贯注在一项伟大的任务上，乃是当今时代一个人在自己的事业中能站在前列的必要前提。但是，要成为一个伟大的人物，要在一定的活动范围内真正名列首位，能给整个时代的生活打上自己的烙印，仅仅具有这些特点当然是不够的。还必须具有非凡的智慧，具有与他为之服务的目的相称的非凡才能。

关于弗·伊·列宁的非凡的、罕见的聪明才智，这是尽人皆知、无可争辩的。但是他的分析研究能力，揭示现象涵义的才能，这一天赋的智慧特点是值得一提的。他的这一才能最明显不过地表现在那些被称为辩论性著作中。

仔细看一下弗·伊·列宁的《土地问题》和《十二年来》这两个文集^①，这里几乎全是辩论文章。这些文章的风格几乎完全一样：作者从论敌的文章中摘出引文，然后仔细地加以分析。如果引文摘自自称为马克思主义作家的文章，那末，看了引文，一开始您可能认为是无可指责的。但是，随着弗·伊·列宁的论点步步深入，您就会看到您自己没能发现的东西——难于察觉的背离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使引文的作者或必将使引文的作者显然会得出非马克思

^① 指弗·伊·列宁的著作《土地问题》第1卷（1908年在彼得堡用弗拉·伊林的笔名出版）和《十二年来·文集第1卷·俄国马克思主义和俄国社会民主主义中的两种流派》（1907年在彼得堡用弗拉·伊林的笔名出版）。——编者注

主义的结论。这种锋利明快的分析不止一次地揭露了一些假马克思主义者的真面目（只要回忆一下彼·司徒卢威和亚·波特列索夫的情况就够了），在这些假马克思主义者的面目暴露以前很久就已经被揭露了……

1904—1905年是反对专制制度的政治斗争方兴未艾的年代。具有头等重要意义的政治事件接二连三地出现。那时，弗·伊·列宁还在国外，他积极参加政治斗争，已经成了布尔什维克党的领袖。俄国与国外中心的联系日益密切，差不多每天都有革命同志从俄国来到日内瓦。弗·伊·列宁仔细地询问每一个来到的人，详细了解各地工人生活的具体细节。他常常要求回到俄国去的人特别注意动员工人给编辑部写信，反映工厂的情况。对每一个从俄国来的地方工作人员他都要提这样的问题：你们的委员会里有没有工人？如果没有，又问，那是什么原因？

有一次，从敖德萨来了两位年轻的委员，他们回答列宁说：“我们作过努力要吸收些工人参加委员会，但没能吸收到。”

“那是什么原因？”

“因为他们马上就提出要求散发有关某些工厂的工资和各种生活琐事的传单。”

当时大家看到，伊里奇对这两个委员发了多么大的脾气，他狠狠地批评了他们一通，向他们解释道，敖德萨工人的这个要求，再好不过地证明了吸收工人参加委员会的好处和必要性。

“红色的”1905年过去了，革命运动被镇压后的低潮年代也过去了，在彼得堡出现了第一张每天出版的工人报纸《真理报》。《真理报》的工作人员虽然远离伊里奇几千俄里，而且还隔着国境线，但是他们都不能不感到伊里奇对新时期工人运动新形式的关注。伊里奇那时对待自己写作的态度使我这个文字工作者深受感动。

他经常大量写作。邮局不送伊里奇的文章来的日子是很少

的①……

除了经常观察工人的生活之外，避免各种资产阶级的影响，这对弗·伊·列宁也很有帮助：他从来都不结交任何资产阶级朋友，从不涉足任何资产阶级“社会”。他们有时来找他，但他从不迁就他们。他除了在自己的房间里有一大堆书籍外，全部日常生活都是无产阶级式的。1917年，弗·伊·列宁在《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吗？》这一小册子中顺便讲到自己时说：

“关于面包，我这个没挨过饿的人还没想到过。面包对我来讲自然就象是写作的副产品一样。”

这种说法只能使了解伊里奇生活情况的人发笑。说他从来没有想过面包，从来没有想过物质利益，这是对的。但“没挨过饿”这几个字换成“没吃饱过”倒是挺合适的。由于弗·伊·列宁摆脱了资产阶级腐蚀的影响，所以他就同别的理论家不一样，不受资产阶级观点的迷惑。

就在同一本小册子的同一页上我们可以看到，无产阶级的“生活”（弗·伊·列宁是十分重视这种生活的）对他的政治觉悟，对他采取的种种政治路线所起的作用。弗·伊·列宁说道：

“七月事变后……我不得不转入地下。当然是工人把我们隐藏起来的。有一次，在离彼得格勒市区很远的工人区的一所小小的工人住宅里，正在准备开午饭。女主人拿出面包来，男主人说：‘你看，多么好的面包。“他们”现在大概不敢给坏面包。我们早就不去想，在彼得格勒能给好面包。’”

弗·伊·列宁接着说：“给七月事变作的这个阶级评价使我感到惊奇。我常常思索这次事变的政治意义，衡量这次事变在整个

① 指弗·伊·列宁把为《明星报》、《真理报》和《启蒙》杂志写的文章从国外寄到俄国。在1911—1914年间，米·斯·奥里明斯基在这些报刊的编辑部里工作。——编者注

形势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分析从什么形势中产生了历史的这种曲折的道路，它又将造成什么局势，想到我们应该如何改变我们的口号和我们党的机关，以便适应改变了的形势……要运用极其复杂的方法，通过政治分析，思想才会接近最根本的问题，接近争取面包的阶级斗争。

而被压迫阶级的代表……都是一下子就抓住问题的关键，单纯直率得惊人，信心坚定不移，观点极为明确，这是我们知识分子望尘莫及的。整个世界被分成两个阵营：‘我们’劳动者和‘他们’剥削者。对已经发生过的事情丝毫不感到不安：这只是劳动跟资本的长期斗争中的一次战役。要砍木头就别怕木头屑飞开。

‘革命的这种“非常复杂的环境”真令人难以忍受！’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是这样想和这样感觉的。

‘我们把“他们”逼迫了一下，“他们”已经不敢象先前那样耍无赖了。我们再逼迫一下，就可以完全把他们打倒了。’工人是这样想和这样感觉的。”^①

弗·伊·列宁的这番论述把我们引进了他的思想宝库。他用“知识分子”的方法，即用复杂的理论方法来分析“简单明了”的事物，来确定复杂事件的含义，把分析的结果综合成必须“坚决”贯彻的口号。在那些很难解决的矛盾中，其他知识分子理论家很容易被迷惑的问题，我们的领袖能够运用无产阶级的观点加以解决。由于列宁自己十分重视观察无产阶级的生活，同时注意身体力行，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注意克服资产阶级的影响，避免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所以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就成了列宁这个“知识分子”的第二本性。

当然，选择口号的问题在这里是不能用工人关于面包的话来

^① 《列宁选集》第3卷第324—325页。——编者注

解决的；口号要用理论分析的结果来确定。但工人的这段话是有作用的，它的作用相当于传说中牛顿看到苹果从树上掉下来而发现万有引力定律那样。有谁能把从枝叶茂盛、永远硕果累累的无产阶级思想之树上掉在伊里奇面前的全部苹果数清楚，从而使最复杂的政治问题得到简单明了的答案呢？对无产阶级的心理状态特别敏感，加上能对复杂的理论问题象谈家常一样进行解释的本领，这就是弗·伊·列宁的政治活动的基础。

在此基础上再加上彻底的坚定性和实现既定目标的顽强性。由于这一切，弗·伊·列宁的巨大影响您就会感到是理所当然的了。这种影响起先表现在俄国无产阶级政党内部，后来在全世界战斗的无产阶级内部也发生了作用。随着这种影响的日益明显，它不可避免地将在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载于《无产阶级革命》杂志 1924 年
第 3 期第 24—33 页

列宁和高尔基

玛·费·安德烈也娃

马克西姆·高尔基每当去彼得堡，通常都住在出版商康斯坦丁·皮亚特尼茨基的住宅里，在那里高尔基自己有两个不算大的房间。他在彼得堡逗留的日子里，皮亚特尼茨基这幢宽敞的住宅从早到晚都挤满了各式各样的人物：有文学家、艺术家、戏剧演员、歌剧演员、大学生和工人等等。这样一来，这幢住宅自然就成了沙皇警察当局公开监视的目标。

1905年11月，我们最后决定动身到彼得堡去。阿列克塞·马克西莫维奇在火车上就对我说，我们先去《新生活报》编辑部，然后从那里到皮亚特尼茨基家去，这样可以不惊动监视住宅的人，也不致于让他们把我们盯上了。我们的行李由前来迎接我们的亲友拿着，我同高尔基就到离车站不远的座落在涅瓦大街上的编辑部去了。

高尔基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就是在这里第一次见面和相识的。

我记得列宁从里边的房间走出来，向我们迎面走来，他快步走到阿列克塞·马克西莫维奇跟前。他俩久久地握着手。列宁高兴地笑着，而高尔基在这种场合总是显得十分腼腆，他竭力用庄重而低沉的声音不断地重复说：

“啊，您是这样的…… 好啊，好啊！我真高兴，真高兴！”

我们到了皮亚特尼茨基那里以后，阿列克塞·马克西莫维奇过了很久才对我说：

“是啊！……你看，我们碰上了多么好的事啊……多好的人啊，是不是？”

当然，我马上就猜到，他指的是谁；我却故意逗着他问道：

“你说的是谁呀？”

“是谁？嗯，当然是列宁啊！多好的人啊！……你可别吹，说你早就这样认为，你比我早认识他。”他完全孩子气地这样说。

他常常象个大孩子似的。

* * *

我记得1907年高尔基在伦敦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时遇见列宁的情景。

列宁把我们带到离英国博物馆不远的“金币”旅馆。这家旅馆规模很大，而房间却潮湿而又简陋，但不知为什么没能找到别的住宿地方。

记得当时列宁很为高尔基担心，他说：

“我们会使他感冒的！要知道，他是习惯于温和的气候和舒适的生活条件的……”

的确，房间不大，而且潮湿、昏暗，一张大床占了半间屋子，一扇大窗正对着墙壁，使用劈柴的煤气壁炉散发的热量很小。那时已是五月的天气了，但气候潮湿、寒冷。

列宁走到床前，摸了摸被褥。他知道高尔基是不喜欢别人为他的健康操心的，所以他对我轻声说道：

“被子很潮湿，该烘一烘，哪怕就在这个不象样子的壁炉旁边烘一会也好。阿列克塞·马克西莫维奇要是在我们这儿咳嗽起来可不好啊！”

这种体贴入微的关怀使我深受感动。以后我曾多次确切地看

到，列宁是多么善于关心别人，特别是关心同志啊！他是多么善于观察一切，注意一切，并且什么都不会遗忘。

列宁离开后，高尔基在这间简陋的房间的窗和门之间，在煤气壁炉旁边，久久来回踱步，时而用手捻捻胡须，时而习惯地咬咬胡子梢，然后他若有所思地轻声说道：

“真是个不寻常的人！”

阿列克塞·马克西莫维奇收到参加代表大会的邀请，而且还有发言权，这使他非常激动和兴奋。参加这次大会使他同来自俄国的工人同志更加接近了。他非常怀念被迫远离的祖国，虽然他甚至对很熟悉的人也竭力隐瞒这一点，而且还竭力使自己相信，似乎他并不想回俄国去。

在大会的各次会议上，阿列克塞·马克西莫维奇仔细地听取代表们的发言，甚至他们的每句话。每见到列宁一次，都使高尔基更进一步地热爱他。

格·瓦·普列汉诺夫给他留下的印象却不好。

“老爷！”这是高尔基对他的尖锐的评价。

当波格丹诺夫、斯特罗也夫、甚至列宁同阿列克塞·马克西莫维奇谈到普列汉诺夫的重要功绩和聪明才智时，高尔基就进行激烈的争辩，虽然普列汉诺夫对党的作用他自己是十分了解的。

阿列克塞·马克西莫维奇非常瞧不起李伯尔和唐恩。总的说来高尔基十分憎恨孟什维克，只有马尔托夫是例外。他把马尔托夫称为“迷途的人”。还有一个例外是弗拉斯·姆格拉泽，平时大家叫他“特里亚泽”。阿列克塞·马克西莫维奇很喜欢他的倔强的性格和魁伟的外表。后来，这位弗拉斯·“特里亚泽”到喀普里后在我们那里住了很长一段时间，那时阿列克塞·马克西莫维奇对他完全失望了。我记得有一次，他深深地叹了口气说道：

“不行，一个陷得很深的孟什维克，尽管他是一个很好的青年，

我们也是不能容忍的！”

为了让我们的同志的伙食能有所改善（他们多半都处于半饥半饱的状态），我们组织一些人往正在召开代表大会的那个教堂送去了几筐夹肉面包和啤酒。

大会的代表们在休息时对高尔基的《母亲》谈得很多。工人们喜欢这本小说，但有些工人认为，这里描绘的一切要比现实生活美好些。这一意见使高尔基很伤心。虽然人家的批评他向来是很珍视的，而且常常征求多方面的意见，但这一次他同人家展开了激烈的争辩。他认为表现人同生活中不正确的现象进行斗争是高尚的，因此应该是美好的。

列宁对《母亲》的评价很高，他认为《母亲》的问世是一个重大事件，而这本小说的缺点，他认为主要是把革命知识分子理想化了。

有一次高尔基对列宁讲述了德国的社会民主党人留给他的印象。在柏林的时候，高尔基见过倍倍尔、考茨基、卡尔·李卜克内西、罗莎·卢森堡等人。高尔基只对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抱有好感。至于倍倍尔，高尔基有一次到他的住所去，看见那里有许多垫子、餐巾、布幔、养着金丝雀的小笼子和其他一些德国小市民家里惯有的摆设。高尔基一见到这些东西，马上就生气了，因此他对倍倍尔就相当冷淡。

当他看见坐在倍倍尔旁边的路易莎·考茨卡娅不知为什么突然吻了一下倍倍尔的手时，从他那蓝色的眼睛里可以看到令人惊异的怒意。

大家围着一张大饭桌吃晚饭时，高尔基的对面坐着倍倍尔的年老的妻子。她正兴致勃勃地给胖胖的、表情淡漠的辛格尔在谈什么。

高尔基问我她在讲什么。这时倍倍尔的妻子正在对辛格尔

说，现在小鸡的价钱很贵，而她的奥古斯特除了小鸡之外什么都不能吃，今天她很走运，买到了两只很好的小鸡，价钱又便宜。

高尔基了解到他们的话题后，甚至惊讶得发出了啧啧声，还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把倍倍尔这个老头儿吓了一跳。

高尔基介绍的关于1905年的事件，关于莫斯科的革命，没有引起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的注意。他们听的时候倒是彬彬有礼，但是却抱着怀疑的态度。高尔基马上就感觉到了这一点，于是就不再往下讲了。晚饭后他就立刻告别，匆匆离开，这使在场的人都感到奇怪。

当高尔基用诙谐的口吻（只有他一个人善于这样讲述）向列宁介绍拜访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的情景时，列宁哈哈大笑，笑得流出眼泪来了，并且一再询问具体细节。

列宁对高尔基同英国作家的几次会见很感兴趣。高尔基认识肖伯纳，见过赫·威尔斯（还是在美国的时候见过的），还会见过其他一些不太知名的作家。但他不大愿意谈论这些会见的事，因为他的全部注意力被代表大会以及与俄国同志的会见吸引住了。

* * *

在伦敦时列宁曾答应过高尔基，在代表大会的事情结束后到喀普里去。列宁履行了自己的诺言。

高尔基见到列宁时激动得象个孩子。他非常希望列宁肯留在他那儿休息一段时间，恢复一下疲劳。

他们两人每天在海上钓鱼，谁都不晕船；他们可以毫不拘束地畅谈，因为同他们一起在船上的只有几个喀普里渔夫和我。

高尔基向列宁介绍了下新城、伏尔加河，讲述了自己的童年和外祖母阿库琳娜·伊万诺夫娜，还谈到了自己的少年时代和流浪生活。他还回忆了自己的父亲。关于外祖父的事讲得很多。

列宁聚精会神地听着高尔基讲，他那习惯于眯缝的眼睛里闪

烁着兴奋的神情，有一次他对高尔基说：

“老朋友，最好把这一切都写下来！这一切都是非常有教益的，非常有教益……”

高尔基马上中断了叙述，沉默起来，不好意思地清了清嗓子，忧郁地说：

“我以后要写的……”

高尔基兴致勃勃地向列宁介绍庞培，介绍那不勒斯博物馆（高尔基对这些地方的每一个角落都非常熟悉）。他们一起到维苏威火山去，一起游览那不勒斯郊区。

高尔基讲得非常引人入胜。他能用很少几句话描绘景色，讲述事件，介绍人物。他的这一特点列宁十分赞赏。另一方面，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思想敏锐，才智过人，善于开诚布公地、真诚地、异常明确地对待人和事，这也使高尔基十分钦佩。

我感到，就是从那时起列宁就十分喜爱高尔基。我不记得列宁什么时候生过高尔基的气。高尔基对列宁也是无限敬爱，异常钦佩。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动身去巴黎的时候，明确地答应下次同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一起再到喀普里来。遗憾的是，这一诺言未能全部实现。他第二次是到喀普里来了，但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却没有来，而且他在喀普里呆的时间也很短。

那时阿·瓦·卢那察尔斯基、亚·亚·波格丹诺夫和弗·亚·巴扎罗夫都住在喀普里。我们的同志、老朋友伊·巴·拉德日尼柯夫因出版事务也从柏林来到这里。

还在我们从缆索铁道到我们那时住的贝杜斯别墅去的路上，阿列克塞·马克西莫维奇就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谈起波格丹诺夫对列宁怀有热烈的友好感情，谈到卢那察尔斯基和巴扎罗夫是有异常才能和绝顶聪明的人……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从侧面看了看阿列克塞·马克西莫维奇，眯缝起眼睛，毫不客气地打断了他的话，说道：

“阿列克塞·马克西莫维奇，别说了，不会有什么结果的。”

波格丹诺夫、巴扎罗夫和卢那察尔斯基不止一次地想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和好，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清楚地知道，在哲学问题上他们之间目前所存在的分歧是任何辩论都解决不了的，所以尽管大家（包括阿列克塞·马克西莫维奇在内）想要引到谈论哲学上去，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总是回避这个问题。而高尔基却非常想要了解他们之间分歧的实质。同志之间的尖锐的分歧使他感到极端不安。

这次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来喀普里期间，阿列克塞·马克西莫维奇很少有机会同他单独谈谈，因为常常有其他人在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喀普里总共只呆了几天，他离开后，高尔基感到苦闷，并且过了很久心情也没有好起来。

载于1946年6月16日《莫斯科布尔什维克报》第141号第2版

我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 第一次会见

克·叶·伏罗希洛夫

1906年春，我带着参加即将开幕的党代表大会（例会）的证书从卢甘斯克来到彼得堡。这是我第一次到首都来。

我从车站直接到接头地点（这是中央委员会的接头地点）；需要进行登记，并了解有关代表大会的规定和情况。在接头地点接待代表的是中央委员扎哥尔斯基（克罗赫马尔），他是一个狂热的孟什维克。当他了解到我是从卢甘斯克来的时候，他就露出不愉快的神情。他一边看着登记册，一边以傲慢的态度结结巴巴地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来：“肯一定一是一布一尔什维克罗”。我回答说：“是的”……扎哥尔斯基就建议我到“自己人”那里去。

我并不需要他的什么建议。我知道到哪里去找自己人，但是我想了解一下（这是外省人的一种幼稚心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是否在彼得堡，他是否碰巧也在这个接头地点。我就问扎哥尔斯基：列宁同志在这里吗？这个外表文雅、满头蓬发、有律师风度的绅士瞪着眼睛向我冲来，他想骂我，想对我说粗鲁话，但他已经气得一句话也讲不出来了。我倒并不是个胆小怕事的人，但是我看到这样一位大发脾气的中央委员，由于我的“过失”竟急得骂不出口来，我倒也有点胆怯了，于是我觉得还是走为上策。

等我走到外边清醒一下以后，我忍不住笑了起来。我想，正象

我们乌克兰人说的那样，列宁显然是触动了他们的神经。我沿着涅瓦大街走去，情绪低落。我要去找我们布尔什维克的“前进”出版社，这是我的接头地点，我还要把朋友的私人信件送到那里去。

我是第一次到彼得堡。这里的商店和街道五光十色，成千上万的人无所事事；他们衣冠楚楚，个个吃得肥头胖耳；他们熙熙攘攘，举止令人惊愕。我好容易才找到了“前进”出版社。见到了我要见的人，我才知道我来得早了，虽然代表们已经陆续来到，但是到的还不多。另外，这里的人还对我说，我该到“工艺学院”去见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邦契-布鲁也维奇告诉我说，列宁同志今天不会到“前进”出版社来。

我是一个十足的乡下佬，一直住在顿巴斯，除了工厂、矿山和监狱之外，什么都没有见过。在这样一个大城市里，特别是受到了中央委员克罗赫马尔的这样一番“官僚式”的接待后，我的情绪稍微有点低落。但是，当我一到“前进”出版社自己人那里，我的情绪一下就恢复了，我怀着愉快的心情向“工艺学院”走去。

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和颜悦色地向我详细询问了组织情况和工作人员的情况，问了工人的情绪等等。她把所有的情况都记录在一个小小的笔记本上。她把必须和可以告诉我的有关代表大会的事都详细地告诉了我。我实在忍不住了，于是我就问：我能不能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见到列宁同志？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笑着说，我可以不止一次地见到他和听到他讲话。

从此我就同布尔什维克中央取得了紧密的联系。现在一切都办妥了。到国外去的日期还没有决定，也没有通知我们到哪里去。我们就只好等着。

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提醒我们行动要谨慎，她说：“在彼得堡密探多如牛毛”。我们都不知道还要在彼得堡呆多长时间。

我走出“工艺学院”去找熟人。过去由中央委员会派去卢甘

斯克的德·伊·列慎科现在住在彼得堡。我很快就找到了他的住所，并在他家见了面。他问我对彼得堡的印象怎样。我说一切都好，就是想尽早见到列宁同志。他对我还没有见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表示奇怪。列慎科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现在几乎每天都到“前进”出版社去，他在逐个地“熟悉”前来开会的代表。

第二天一早我就到“前进”出版社去了。如果需要的话，我打算在那里坐它一整天，以免错过碰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机会。不久，那时负责出版社工作的邦契-布鲁也维奇了解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一定会来，因为他要同部分已经到来的大会代表“开一次会”。

我耐着性子等着。过了不久，一位代表（好象是西伯利亚人）叫我跟他去。我没有问什么事就跟着这位同志去了。我们穿过几道门，经过了几条走廊，很快来到一个小小的套间里（是在二楼还是三楼，我记不清了）。我们走进一间很小的房间。里面坐着十至十二个人。我们挤了进去，为了不影响会场的秩序，随便找了个地方坐了下来。会议已经开始，我们来迟了。一位代表正在发言。他讲的是关于第一届国家杜马选举后的工人群众的情绪问题。发言人的眼睛一直盯着坐在开会的同志中间的一个人——他带着特别的神情，间或眯缝着眼睛，一会儿看看发言的人，一会儿看看坐在这个房间里的别的什么人。

我想，这就是他——列宁。不知什么原因，我似乎感到曾经在什么地方见到过他，似乎感到我认识他。我就仔细地注视他的面部、体格和他的一举一动。他是我日夜思念、十分想见的人。我想尽快地把他的一切牢牢地印入脑海。我在考虑，回去以后我如何给自己的无产阶级弟兄们描绘我们的列宁的形象。我知道他们会要求我“详细地”讲述“全部情况”。我将不止一次地要在各种会议上，在工厂的工间休息时，向大家汇报。

那个发言的人讲完了，另一个人开始发言。我估计这是各地的同志在作简短的汇报。于是我有点发慌了。再有两个人汇报，下面就要轮到我了。我要直接向列宁汇报，心里马上感到有点紧张，甚至感到身上一阵热。列宁一直静静地听着，有时脸上露出笑容，在一张纸上迅速地作记录。

终于轮到我汇报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目光投向我这一边。他问了我的名字和我代表的组织。我记得他面带笑容，说了几句赞许的话。我受到了鼓舞，心情也安定了下来。我很简短地报告了组织情况、工人的情绪、国家杜马的选举等问题。

汇报结束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概括地谈了总的形势，马上就同代表们交谈起来。

这次会议完全是非正式的预备会性质。为了掌握情况，为了其他的“列宁的”策略和战略目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需要召开这样的会议。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交谈中说了很多笑话，同时又向代表们提出许多各种各样的，常常是些意料不到的问题。他对所有的情况全都感兴趣。他以同样的兴致听取各种汇报：国家杜马的选举，孟什维克的阴谋，立宪民主党人问题，我们的战斗队，对战斗队的训练与装备，卢甘斯克附近的市镇上的哥萨克以及夺取了地主土地的农民的情况等等，等等。

符合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思想、证实他的设想的某些汇报受到他热情赞许的情景，至今还历历在目，我幸运地两次受到伊里奇的赞扬。这对我来说是真正的幸福。我自己觉得好象长得高大了，变得有力量了，更有信心了。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离开前谈到了代表大会，谈到了我们布尔什维克的前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不相信这次代表大会能完成统一的使命，他在设法统计我们的力量。代表们还在陆续到

达,我们估计,我们可以获得多数。但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那时就估计到孟什维克有可能在代表大会上获得多数,我们将要同他们进行一场激烈的斗争。

我们听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讲话,大家都感到在他身上有一股巨大的力量,有了这种力量,孟什维克的任何“多数”,任何阴谋诡计(到会的人对他们的阴谋诡计讲得很多)对我们来说都没有什么可怕的。现在我们已经亲眼看到了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真正的创建者、保卫者和领袖,并且听到了他的讲话。

我们感到,我们的列宁确切地知道保卫革命和保卫革命的社会民主党(这个党要担负起领导伟大的俄国解放运动的重任)的道路和方法。我们大家相信,革命的浪潮在继续高涨,日后定将掀起九级巨浪。在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下,几乎各地都在抵制第一届国家杜马,这也证实了我们的估计。

参加这次小会的人怀着兴奋的心情相互告别离去。

我的情绪特别好,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给我留下了异常深刻的印象。我感到他的一切都是不寻常的:他讲话的神态,他的平易近人,而印象最深刻的是他那双炯炯有神、能洞察人们心灵的眼睛。

我暂时把暗探和其他令人讨厌的事情置之脑后,怀着兴奋和愉快的心情,沿着那时还属于别人的圣彼得堡的街道信步走去。

载于《回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
第1卷1956年莫斯科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
社版第379—382页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

对党的武装工作的领导

(我党军事组织和武装组织史实片断)

叶·米·雅罗斯拉夫斯基

1906年秋，在我们这些军事组织的工作人员面前尖锐地提出了今后的工作形式这个问题。当时我们感到，在有些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里存在着取消这一工作的倾向。他们说什么反正不会有任何结果。而另一方面，在陆军和海军里，自发的革命情绪却有了很大的发展。当时存在着这样一种危险：革命的热情和风暴会发展成为混乱的、徒劳的、消耗力量的革命骚动和暴乱。其实，当时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形成了这样的局面。不管怎样，在军事组织的工作人员内部必须认识一致；还必须同我党的领导机关一起研究，以便确定联系和统一整个这一工作的形式；也必须使建立武装组织的意图十分明确（我们在各地都看到有这种意图）。

武装起义的各种问题在我们面前已经尖锐地提出来了。孟什维克当时提出了“用不着拿起武器”的口号，布尔什维克针锋相对地提出了另一个口号：“把新的起义准备得比以前好”。在一些城市里建立战斗队的巨大工作已经开始进行。这些战斗队由最勇敢、最革命、奋勇战斗、准备经受最坚决的斗争的工人所组成。但是他们想干实际工作，希望直接参加斗争。在不少地方——在乌拉尔、波罗的海沿岸地区、高加索、各个大城市里，战斗队队员都在开展

活动。他们袭击警察局，进行某些恐怖活动，夺取武器，没收财产。在这方面也要把战斗队等战斗组织的任务加以明确规定。

各个战斗组织的工人们自然就产生一个想法：必须把起义的全部准备工作联系在一起；把各个战斗组织和军事组织的活动联系起来。许多同志努力学习军事，学习爆破技术，学习有关炸药的化学知识（已经去世的巴维尔·卡尔洛维奇·施特恩贝尔格同志——他那时好象是天文学教授——在这方面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在某些城市里，如在莫斯科，于1906年下半年就出现了象军事技术局这类联合中心。

同时，在各类同志中间产生了召开全俄军事组织和武装组织代表会议的想法。我们开了几次会，在一次会议以后，我们决定于1906年底在芬兰的坦默福斯召开军事组织和武装组织代表会议。

大家知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这次代表会议的工作作了多么肯定的评价，他是多么重视这次会议提出的各种问题。

在动身去参加这次会议以前，我想去见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工艺学院的食堂里，好象是波格丹诺娃同志告诉我，什么时候和如何去见列宁。我采取了许多预防措施后来到了芬兰，在那里我见到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他向我提出了一大堆问题。我立刻感到，在我面前的这位同志对我们的全部工作了如指掌，对我们的工作非常关心。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并不满足于我的一般性的回答，他想了解各种细节，了解我们整个工作的组织状况，我们今后的计划和我们的各种关系。他对我们创办军事指导员学校的经验颇感兴趣，在这个学校里我们训练自己的战斗队员，让他们学会使用爆破弹，制造爆破弹，学会使用机枪和其他武器，掌握爆破技术，学习巷战战术等。总而言之，我们为未来的革命培养战斗队的未来的指挥人员。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最担心的是我们去搞什么冒险行动。他非常仔细地问我，我们是否有什么行动打算。他提醒我们

说，采取任何重大步骤必须事前征得布尔什维克中央的同意。他又详细地询问了这次代表会议的组织状况，是否有通过孟什维克的决议的危险（因为我们估计，也有些孟什维克要参加这次会议）。

我一再请求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出席这次会议。后来我们甚至还用这次会议的军事组织和武装组织主席团的名义写信去邀请他。他给我们写了回信，可惜这封信没有保存下来；但信的内容直到现在我还记得很清楚。他对我们的邀请表示感谢，对召开这次会议表示赞许，认为会议十分重要；他同意会议的议程，同时他非常谨慎地一再提醒我们，不要通过与我们布尔什维克的原则路线相抵触的任何决议。为了帮助我们在意外的情况下扭转会议的方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后来还是派了一位同志来参加会议，就是已故的柳比奇（萨美尔）同志，但他未能对我们的决议作出什么实质性的改变。

我这次同列宁的会见，改变了我去见他前的那种思想情绪。我和其他许多同志原来以为，我们这些战斗队员和军事人员所做的事情，党认为是不太重要的，是第二位的，所以对它不太重视。这是由于我们当时处在地下状态而引起的。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一席谈话使我相信，我们做的工作是党所需要的，对党来说是重要的。我离开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时候感到精神振奋。我们当时就知道中央委员会（孟什维克的）将会想尽办法阻挠这次会议的召开；他们想破坏这次会议，因为我们的工作不合他们的心意。在得到伊里奇的支持以后，我们感到意志坚定，信心百倍。同时我们知道，我们的决议将会得到布尔什维克的支持。在去出席代表会议时，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想法：一定要使我们的全部工作符合我们布尔什维克的整个路线。

弗·伊·列宁

阿·马·高尔基

弗拉基米尔·列宁逝世了。

甚至他的敌人阵营里也有些人坦白地承认：列宁逝世后，世界上失掉了一个“在他同时代的一切伟大人物中间最有天才”的人物。

德国资产阶级报纸《布拉格日报》刊载了一篇有关列宁的文章，对这位巨人充满着崇敬的惊奇心情，文章结尾写道：

“列宁就是在死后也显得伟大、无比崇高和令人畏惧。”

从这篇文章的语调可以清楚地看到：写这篇东西的动机，并不是象“敌人的尸体总是香的”这句玩世不恭的格言所说的那样，出于生理上的满足，也不是出于人们在一个极不安分的人离开他们的时候所感到的那种愉快，——不，在这篇文章里洋溢着以人为荣的人类的自豪感。

一些资产阶级报纸在评价这个生活意志和坚强理性的最伟大的体现者的时候，尚且表示了敬意，而俄国侨民的报纸则既没有魄力，也不知分寸，它们对列宁的逝世就连这样的敬意也没有表示。

要给他画像是困难的。从表面上来说，听到列宁的话就知道他整个的人，正如看见鳞就知道是鱼一样。他是朴素和率直的，就象他说的话一样。

他的英雄主义几乎完全没有表面的光华，他的英雄主义是一种在俄国常见的、坚信世上能够实现社会正义的正直的俄国革命

知识分子的谦逊刻苦的献身精神，是一个摈弃世界上一切享乐而为人类幸福从事艰苦工作的人的英雄主义。

我在他逝世后不久所写的关于他的文章，是在沉痛的心情下写成的，既潦草，又蹩脚。^①为了“有分寸”的原故，有一些话我当时不能写出来，我希望能得到充分的谅解。列宁这个人具有锐利的眼力和伟大的智慧，然而“巨大的智慧包含着巨大的悲痛”。

他是高瞻远瞩的，他在1919—1921年间考察、评论人们的时候，常常正确地预测到他们在几年以后将成为怎样的人。我并不总是愿意相信他的预见，这些预见也往往令人沮丧，可是遗憾的是，有不少的人却证实了他的怀疑的判断是正确的。我以前所写的关于列宁的回忆录，除了写得不好以外，还写得前后不连贯，而且有一些令人遗憾的疏漏。我应当从伦敦代表大会那些日子写起，那时候我看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被一些人怀疑和猜忌，同时被另一些人公开地敌视，甚至憎恨。

我迄今还能清楚地回想起伦敦郊外那座简陋得可笑的木头修造的教堂的光秃秃的墙壁，那类似穷学校教室的又小又窄的厅堂的箭形的窗户。这座建筑仅仅在外表上象一个教堂，里头却根本没有做礼拜用的东西，甚至传教士的矮小的讲台也没有安置在前面，厅堂的深处，而是放在进口的地方，在两道门之间。

在这一年之前，我没有见过列宁，^②也没有好好地多读他的著

① 阿·马·高尔基指的是他于1924年1月底至2月初所写的特写《弗·伊·列宁》一文的初稿。——编者注

② 阿·马·高尔基在后来写给联共(布)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的信中指出，他写的回忆文章中有一个地方不确切(见《十月》杂志1941年第6期第22页)。阿·马·高尔基同弗·伊·列宁第一次见面是在1905年11月27日(12月10日)在彼得堡，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会议上；有关阿·马·高尔基与弗·伊·列宁第一次见面的情形，还可参见玛·费·安德烈也娃写的回忆文章(本卷第271—272页)。弗·伊·列宁进一步熟悉阿·马·高尔基是在1907年党的伦敦代表大会上。——编者注

作。但是我读过的东西，特别是那些直接认识他的同志的热情的叙述，都使他以巨大的力量吸引着我。当有人介绍我们认识的时候，他紧紧地握着我的手，用锐利的目光审视着我，以老相识的口吻诙谐地说：

“您来了，这好极啦！您不是喜欢打架吗？这里将要大干一场。”

我所预料的列宁并不是这样。我觉得他缺少什么东西。他说话时字母“P”“Л”发音不清，两手交叉地插在腋下，很洒脱地站着。总之，这个人的一切都太朴实了，在他身上感觉不到有丝毫“领袖”的气派。我是一个文学工作者。这个职业逼着我注意琐细的事情，这个职务已经变成习惯了，有时简直令人感到厌烦。

当我被“引见”给格·瓦·普列汉诺夫的时候，他双手交叉在胸前挺立着，严厉地看着我，有点厌烦，好象一个教书教厌了的教师又看到了一个新学生一样。他向我说了一句极其普通的应酬话：

“我很敬仰您的才能。”

除此以外，他不曾说过一句能印在我脑海中的话。在整个代表大会期间，无论是他，还是我，谁都不想“推心置腹”地交谈。

但是这个秃头的、说话时字母“P”“Л”发音不清的、结实的、强壮的人，一只手摸着那苏格拉底式的前额，另一只手握着我的手，亲切地闪动着他那双灵活得惊人的眼睛，立刻就谈到《母亲》这本书的缺点，原来他已经从伊·巴·拉德日尼柯夫那里把手稿拿去读过了。我说这本书是很匆忙地写出来的，但是还没有来得及说明为什么匆忙，列宁就肯定地点点头，自己把这个原因说明了。他说我能赶写出来就很好，这是一本必需的书，很多工人不自觉地、自发地参加了革命运动，现在他们读一读《母亲》，对自己会有很大的益处。

“一本非常及时的书。”这是他唯一的赞语，然而对我却极其珍贵。接着他郑重其事地问我：《母亲》是否译成外文，俄国和美国的检查机关把这本书删改了多少。等到他知道作者受到通缉的时候，他先是皱皱眉头，接着仰起头来，闭上眼睛，异乎寻常地大笑起来。他的笑声吸引了工人们，好象是托马斯·乌拉尔斯基和其他两三个人走了过来。

我当时真是兴高采烈，我置身于三百名优秀党员之中，知道他们是被十五万有组织的工人派来参加代表大会的，我亲眼看见了党的所有的领袖、老革命家普列汉诺夫、阿克雪里罗德、捷依奇。我兴高采烈的心情是毫不足怪的，而且也会被读者所理解，只要他们知道在侨居国外的两年中我的情绪总是十分低落的话。

我的情绪低落是从柏林开始的，在那里我差不多会见了社会民主党所有最重要的领袖，我在奥古斯特·倍倍尔家里吃过饭，坐在肥胖的辛格尔旁边，周围还有其他一些也是非常重要的人物。

我们吃饭的地方是一所宽敞而又舒适的住宅，几个画眉鸟笼雅致地披着绣花的罩布，安乐椅靠背上也盖着绣花的罩布，以免坐在椅子上的人用颈背弄脏了椅套。这里的一切东西都很结实、牢固，大家一本正经地吃着饭，而且一本正经地互相说道：

“马尔采特^①。”

这个词我不明白，但是我知道法文“马尔”就是俄文的“糟糕”，德文的“采特”就是俄文的“时代”，这样一来，就是“糟糕的时代”。

辛格尔两次把考茨基称作“我的浪漫主义者”。倍倍尔长着一个鹰钩鼻子，我觉得他有些自满。我们喝莱茵酒和啤酒，莱茵酒味酸而柔和，啤酒清香可口；谈到俄国的革命和社会民主党，他们也是酸溜溜的、不以为然的，然而谈到自己的德国的党——那可是太

^① “请吧”（德语）。——编者注

好啦！总之，一切都是很自满的，好象那些椅子也由于能够承受领袖们如此尊贵的躯体而心满意足似的。

我和德国党之间有过一件“微妙”的事情：该党的一名重要党员，就是以后大名鼎鼎的帕尔乌斯，从知识社得到一份委托书去各个剧院收集《在底层》的上演税。他是在1902年秘密到塞瓦斯托波尔的时候在火车站上得到这份委托书的。他收集到的钱将这样分配：他得总数百分之二十，其余的再作如下分配：四分之一归我，四分之三充作社会民主党的经费。当然，这个条件帕尔乌斯是知道的，甚至他还非常高兴。在四年中间，这个剧本在德国所有的剧院轮流上演，只在柏林一个地方就上演了不下五百场，帕尔乌斯收集到的大概有十万马克。但是，他不把款项给知识社寄去，却寄给该社的康·彼·皮亚特尼茨基一封信，在信里老实地通知说：他同一位小姐到意大利旅行了一趟，把所有这些钱都花光了。因为这次想必是十分愉快的旅行，跟我个人有关的只是这笔钱的四分之一，所以我认为有权向德国党中央提出关于其余的四分之三的问题。我是通过伊·巴·拉德日尼柯夫提出的。但是该党中央对于帕尔乌斯的旅行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以后我听说帕尔乌斯被撤销了在党内的某些职位——说良心话，我倒是希望人家揪他的耳朵。后来，在巴黎有人指给我看一位非常漂亮的姑娘或太太，说帕尔乌斯就是同她一起旅行的。

“我的宝贝！”我这样想，“宝贝。”

我在柏林看见了一些文学家、美术家、文艺鉴赏家和其他的人，他们彼此间的区别只是自满和自我欣赏的程度有所不同而已。

在美国，我时常看见一心想作纽约的市长或州长的莫里斯·希尔奎特，还有孤独而疲惫地咒骂一切人和一切事的德布兹老头子（他刚刚出狱），我看到很多的人和很多的事，但是没有遇见过一个了解俄国革命的全部深刻意义的人，我到处都觉得大家把俄国

革命看作“欧洲生活中的偶然事件”和这个国家里的普通现象，照一个“同情社会主义”的“漂亮女士”的说法，在这个国家里，“通常不是霍乱就是革命”。

到美国去为布尔什维克筹集经费的这个想法，是列·波·克拉辛提出来的；瓦·瓦·沃罗夫斯基本来要作为秘书和演讲会的组织者同我一道去，他精通英文，但是党给了他什么别的任务，于是尼·叶·布勒宁（布尔什维克党中央直属的战斗小组组员）就同我一起去了；他是“哑巴”，在路上才开始学英文，到了美国还在学。社会革命党人知道我此行的目的，就对这次旅行发生了年青人那样强烈的兴趣；还在芬兰的时候，柴可夫斯基就同日特洛夫斯基一起来看我，劝我不要为布尔什维克而要“一般地为革命”募款。我拒绝了“一般地为革命”募款。于是他们派遣“老太太”^①到那里去，这样一来，在美国人面前就出现了两批人，他们各不相干，互不见面，而且显然是为着两个不同的革命开始募起款来；至于哪一个革命更好，更可靠，——美国人当然是既没有工夫，也没有兴致去考虑的。看来他们早就知道“老太太”了，她的美国朋友们为她作了很好的宣传，而沙皇的大使馆却给我们安排了一场侮辱^②。美国的同志们也认为俄国革命是“偶然的和不成功的事情”，所以在处理我从群众大会上募集来的款项时采取了一些“自由主义”的态度。我只募集到很少的钱，还不到一万美元。我决定在报纸上“赚几文钱”，但是在美国也有帕尔乌斯这样的人。总之，这一次旅行是失败了，但是我在那里写成了《母亲》，这也是造成这本书里的若

^① 指社会革命党人叶·康·布列什柯—布列什柯夫斯卡娅（1844—1934年）。——编者注

^② 1906年4月间，高尔基抵达纽约。沙皇政府驻美大使馆收买美国黄色报纸诋毁高尔基，说玛·费·安德烈也娃不是他的“合法”妻子，结果，他们被赶出旅馆。——译者注

干“疏漏”、缺点的原因。

以后我到意大利去，住在喀普里，埋头阅读俄国的报纸和书籍，——这也使我的情绪大为低落。如果一颗从牙床上拔下来的牙齿能有感觉的话，那它大概会感到自己象我一样孤独。一些熟人从这个“立场”跳到另一个“立场”上去的那种小丑似的敏捷和灵巧，实在令人惊讶。

从俄国跑来了一些投机的革命家，他们吃了败仗，惊慌失措，咒骂自己和那些把他们拖进“绝望的事业”中去的人们。

“一切都完了，”他们说，“一切都被打垮了，扑灭了，放逐了，关进监狱里了！”

有很多可笑的事，但是没有一件愉快的事。从俄国来了一位客人——一位文学家，而且是有才华的文学家，他说我仿佛扮演着《在底层》里的鲁卡这个角色：向青年们讲了一大堆安慰的话，他们相信了我，结果碰了钉子，而我却跑掉了。另一位客人硬说我被“潮流”吞没了，说我是一个“毫无出息的人”，说我否认芭蕾舞的重要性仅仅因为它是“皇家的”。总之，有非常多可笑的、愚蠢的事情，常常使我觉得从俄国刮来了一股腐朽的尘土。

突然之间，象在童话里似的，我参加了俄国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大会。这当然令人兴高采烈啦！

但是我的兴高采烈只到第一次会议为止，只到“议事日程”问题的争论为止。这些争论的激烈一下子就把我的热情弄得冰冷了，这倒不是因为我发现党内如此尖锐地分裂成为改良派和革命派，——这一点我在1903年就知道了，而是因为改良派对于弗·伊·列宁怀着敌意。这种敌意从他们的演说里泄漏和喷射出来，好象水在高压之下从一条旧的“水龙带”里泄漏和喷射出来一样。

说些什么，往往并不重要，重要的往往是怎么说。格·瓦·普列汉诺夫穿着礼服，扣上所有的钮扣，象一个新教的牧师。会议开

幕时，他讲话好象一个传教士，坚信他的意见是无可争辩的，每一个字眼都是极有价值的，就是字句间的每一停顿也是极有价值的。他很巧妙地向代表们头上的上空里播出流利而又漂亮的词句，而当布尔什维克的座位上有人动一动嘴唇，跟同志交头接耳的时候，这位尊贵的演说家便稍稍地停顿一下，眼光就象钉子一样向那个人盯去。

礼服上有一个钮扣是普列汉诺夫最喜爱的，他的一个手指温存地不停地抚摩它，并且在讲话停顿的时候象按电铃似地按它一下，——可以说，正是这一按才使他那滔滔不绝的演讲停顿一下。在一次会议上，当普列汉诺夫准备答复某人的问题时，他把双手交叉在胸前，提高嗓门，轻蔑地哼出了一声：

“咳！”

这引起了布尔什维克工人们哄然大笑，普列汉诺夫竖起眉毛，半边脸也发白了；我说半边脸，是因为我坐在讲台旁边，只能看见演说家的侧面。

当格·瓦·普列汉诺夫在第一次会议上演说的时候，布尔什维克的座位上最不安的要算是列宁了，——他时而蜷缩着身子，仿佛怕冷似的，时而伸开四肢，好象怕热一样；一会儿他把手指插到腋下，一会儿摇晃着光亮的脑袋摸一摸下巴，悄悄地在米·巴·托姆斯基耳边讲些什么。当普列汉诺夫宣称“党内没有修正主义者”的时候，列宁就弯下身去，秃顶也发红了，肩膀也因为忍俊不禁而颤动着，坐在他旁边和后面的工人们也微笑起来，可是在大厅的最后头却有人阴沉地大声问道：

“在那一边——坐的是些什么人呀？”

矮小的费多尔·唐恩说话的口气就象真理是他亲生的女儿似的，他生了它，养育了它，并且至今还养育着它。至于他本人，费多尔·唐恩，则完全是卡尔·马克思的化身，而布尔什维克却是浅学

之辈，是顽皮的孩子，这特别明显地表现在他们对孟什维克的态度上，而在孟什维克当中，按照他的说法，有着“一切出类拔萃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你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轻蔑地说，“不，你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那黄色的拳头向右边空中一挥。工人中间有谁问他：

“什么时候你再去同自由派喝茶啊？”

我不记得马尔托夫在第一次会议上是否发过言。这个非常讨人喜欢的人讲起话来象青年一样慷慨激昂，好象他特别深切地感到分裂的悲惨和冲突的痛苦似的。

他浑身战栗着，摆动着，痉挛地解开浆洗得硬梆梆的衬衫领子，两手挥舞着；衬衫的袖头从上衣袖子下面吊出来，盖住了他的手背，他就高高地举起手来，摇了一摇，把袖头固定在适当的地方。我觉得马尔托夫并不是在论证，而是在恳请、央求：一定要避免破裂，党太弱了，不能分裂成两个，工人首先需要的是“自由”，必须支持他们的愿望。他的前一部分演说有时候听起来近乎歇斯底里，过多的词句令人费解，而演说者本人也使人有一种不快之感。在演说的末尾，他叫喊起来，反对武装起义的工人战斗队，而且根本反对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这些话似乎已经离开了他演讲的主题，但他依然使用“好战的”语调，依然那么慷慨激昂。我清楚地记得，在布尔什维克座位中间，有人惊叫着：

“真没有想到！”

好象是米·巴·托姆斯基问道：

“为了让马尔托夫同志安心，难道我们连手臂都要砍掉吗？”

再说一遍，我不能肯定马尔托夫在第一次会议上讲过话，我之所以提到他，只是为了说明人们是怎样讲话罢了。

在他演说以后，工人们在会议厅前面的房间里闷闷不乐地议论着：

“你看，这就是马尔托夫！还是‘火星派’呢！”

“知识分子同志们开始褪色啦。”

罗莎·卢森堡讲得漂亮、热情而尖锐，她出色地掌握了讽刺这个武器。接着，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匆匆地登上讲台，用喉音喊了一声“同志们”。我觉得他不会讲话，但是过了一分钟，我也象所有的人一样，被他的演说给“吞没”了。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能把极其复杂的政治问题讲得如此简单明了。他并不想编造漂亮的词句，他把每个字眼都明白地说出来，毫不费力地表达出其精确的含义。要描述他所唤起的不寻常的印象，是很困难的。

他的一只手伸向前面，稍微往上抬起，手掌好象是在衡量每一个字眼，驳倒对手的空话，而用一些重要的原理去代替它们，证明工人阶级有权利和义务走自己的道路，而不是落在自由资产阶级后面，甚至也不要跟自由资产阶级并肩同行，——所有这一切都是不同凡响的，而且从列宁口里说出来时就象不是出于他自己，而确实是出于历史的意志。他的演说的和谐、完整、明快和强劲，他站在讲台上的整个形象——简直就象一件古典艺术作品：什么都有，然而没有丝毫多余，没有任何装饰，即使有的话，也看不出来，正如脸上的两只眼睛、手上的五个指头那样天生必不可少似的。

就时间计算，他比在他以前发言的演说家们都讲得少，但就印象来说，却强烈得多；不仅我一个人有此感觉，坐在我背后的人们也兴奋地私语着：

“讲的很充实……”

确是这样，他的每个论证都是自然而然地发展的，都是凭着它本身所包含的力量发展的。

孟什维克们肆无忌惮地宣称，他们讨厌列宁的演说，尤其讨厌他本人。他论述党必须提高到革命理论的高度，才能全面地检验实践；他说得愈有说服力，他们就愈是凶狠地打断他的演说。

“代表大会不是讲哲学的地方！”

“不要教训我们，我们不是中学生！”

吵得特别有劲的是一个高个儿、大胡子、象小店老板模样的人，他从座位上跳了起来，结结巴巴地大叫道：

“阴——阴谋……他在玩弄阴——阴谋呀！布——布朗基主义者！”

罗莎·卢森堡一再点头赞许列宁的演说，在以后的一次会议上，她对孟什维克说得非常好：

“你们不是站在马克思主义上面，而是坐在、甚至躺在它上面。”^①

愤怒、讽刺、憎恨象一阵狂暴的热风，在大厅里激荡，几百只眼睛射出形形色色的光芒集中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身上。简直看不出这些充满敌意的抨击使他激动不安，他讲得热情，却又有力量而镇定。过了几天我才知道，这种外表的镇定使他付出了多么大的代价。他认为，党只有从理论的高度才能看清党内分歧的原因。但是他这个理所当然的见解，却引起了人们对他的敌视；看到这种情况，真令人十分奇怪和难过。我得出这样的印象：在会议期间，每一天都给予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越来越新的力量，使得他更加朝气蓬勃，信心十足，他的演说听起来一天比一天更加坚定，而且代表大会的全体布尔什维克也变得更加坚决，更加严峻。除了他的演说以外，几乎同样令我激动的，是罗莎·卢森堡反对孟什维克的出色而又尖锐的演说。

凡是空闲下来的一分钟、一小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都消磨在工人中间，询问他们的最细微的生活琐事。

“嗯，女人们怎么样？家务把她们缠住了吧？她们仍旧在学

^① 对孟什维克说的这句话，是波兰社会民主党代表利·梯什卡讲过的。——编者注

习、读书吗？”

在海德公园，几个第一次见到列宁的工人谈论他在代表大会上的行动。其中有一个说得很生动：

“我不知道，也许在这里，在欧洲，工人中间还有另外一个同样精明的人，——倍倍尔，或者其他的人。但是，要说还有另外什么人能使我一见就爱，就象爱列宁一样，——我却不相信！”

另一个工人微笑着补充道：

“他是我们的人！”

有人反对说：

“普列汉诺夫也是我们的人。”

我听见了一个中肯的回答：

“普列汉诺夫是我们的师尊、我们的老爷，而列宁是我们的领袖和同志。”

一个青年小伙子幽默地说：

“普列汉诺夫的礼服绷得太紧了。”

有过这样一件事：在去饭馆的路上，一个孟什维克工人拦住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询问什么事情。伊里奇放慢了脚步，他的同伴们走到前面去了。过了五分钟光景，他走进饭馆，皱着眉头说道：

“奇怪，这么一个幼稚的小伙子竟然跑到党的代表大会上来了！他问我：分歧的真正原因究竟在哪里呢？是这样，我说，你们的同志们希望参加议会，我们却坚信工人阶级应该准备战斗。他好象是明白了……”

我们几个人总是在一家便宜的小饭馆里一起吃饭。我看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吃得很少：两三个煎鸡蛋，一小片火腿，喝一杯浓浓的黑啤酒。从各方面都看得出，他对待自己很马虎，而对工人们却异常关心，这令我很吃惊。玛·费·安德烈也娃管理他们的伙食，他不止一次地问她：

“您觉得怎样，同志们不会挨饿吗？唔，唔……可以添一些火腿面包吗？”

他来到了我所住的旅馆，我看见他很关心地摸一摸我的床铺。

“您这是干什么？”

“我看看被褥潮湿不潮湿。”

我没能立刻明白，为什么他要了解伦敦的被褥呢？他看出了我的疑惑，就解释道：

“您应当留意自己的健康。”

1918年秋天，我问索尔莫沃的工人德米特里·巴甫洛夫：在他看来，列宁最显著的特点是什么呢？

“朴素。象真理一样朴素。”

他说出这个意见，象是经过深思熟虑、早已决定了似的。

谁都知道，一个人的最严厉的批评者是他的手下人。但是列宁的汽车司机吉尔，一个很有经验的人，却说：

“列宁是很特别的。没见过象他这样的人。我开车送他，经过米亚斯尼茨大街，街上非常拥挤，我们几乎走不动，我怕弄坏汽车，就按喇叭，急得不得了。他打开车门，不顾有被撞倒的危险，沿着踏板费力地走近我身旁，劝我道：‘请不要着急，吉尔，象大家一样开过去吧。’我是一个老司机，我知道谁也不会这样做的。”

要表达、描绘他一贯给人的印象是怎样地自然和机敏，这是很困难的。

他的思想，象罗盘的指针一样，总是指向劳动人民的阶级利益。在伦敦，有一个空闲的晚间，我们几个人到“音乐厅”——一个大众化的小剧院去。看见小丑和打诨者，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快乐而带传染性地笑了起来；他没精打采地看其余的一切东西，却特别注意地看英属哥伦比亚^①的工人们砍伐树木。小小的布景是

^① 加拿大西部的省名，滨临太平洋，包括温哥华岛。——译者注

森林里的帐篷，在帐篷前的地面上，两个健康的年青人在一分钟内砍倒了约有一公尺粗的一棵树。

“唔，这当然是给观众看的，事实上他们不能用这样的速度工作。”伊里奇说，“但是，很明显，他们在那里也是用斧头干活的，把整块的木头变成无用的碎片。这就是文明的英国人呀！”

他谈到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谈到浪费掉的原料的巨大百分比，最后很遗憾地谈到直到现在还没有人想到以这个题目来写一本书。我不太理解这个想法，但是我还没有来得及问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他已经兴致勃勃地谈到“插科打诨”是戏剧艺术的一种特殊形式了。

“这是对大家承认的东西抱着讽刺或怀疑的态度，要把它们的真相揭露出来，稍稍加以歪曲，指出日常习俗的不合理。多少要费一点思索，但是很有趣味！”

过了两年光景，在喀普里，在和亚·亚·波格丹诺夫-马林诺夫斯基谈论空想主义小说的时候，他说：

“要是您为工人们写一本小说，描写资本主义的强盗们怎样掠夺土地，浪费一切石油、钢铁、木材、煤炭，那末，这将是一本很有益处的书，马赫主义者先生！”

在伦敦分别的时候，他告诉我他一定要到喀普里去休息。

但是在他预备动身以前，我已经在巴黎的一所有两个房间的学生寓所里看见他了^①，——说是学生寓所，仅是根据屋子的面积，而不是根据屋子里的清洁和整齐。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给我们准备好茶以后，就出去了，只剩下我们两个人。这时候知

^① 阿·马·高尔基在巴黎与弗·伊·列宁见面，是在1911年和1912年，也就是在弗·伊·列宁于1908年4月和1910年7月两次去喀普里看望阿·马·高尔基之后。——编者注

识社已经垮了，我来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商谈成立一个新的出版社，尽可能地把我们所有的著作家联合起来。我建议由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瓦·瓦·沃罗夫斯基和另外一个什么人主持国外的编辑部，而让瓦·阿·杰斯尼茨基-斯特罗也夫在俄国作他们的代表。

我觉得应该写一些关于西方文学史和俄罗斯文学的书，一些关于文化史的书，以便为工人们自修和进行宣传提供丰富的事实材料。

但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反对这个计划，他指出有检查制度存在，把自己的人组织起来也有困难；大多数同志都忙于党的实际工作，没有时间来写作。但是他的最主要和最能说服我的论据大概是这样：出版大部头的书还不是时候，而且只有知识分子才啃得动大部头的书，然而很明显，知识分子正离开社会主义而走向自由主义，我们又无法从他们选定了的道路上把他们拉回来。我们需要的是报纸、小册子，最好是恢复《知识丛书》，但这是不可能的，在俄国是由于有检查制度，在这里是由于运输条件：我们要向群众散发成千上万的传单，可是不能把这一大堆东西秘密运去。等到时机好转，我们再来谈出版社吧。

他以一种惊人的、一向特有的生动和明快，开始谈到杜马，谈到那些“耻于作十月党人”的立宪民主党人^①，谈到“在他们面前只有向右的一条路”，接着就举出很多证据来说明战争快要到来，而且“不仅是一次战争，而是一连串的战斗”——他的这个预见很快就在巴尔干^②被证实了。

他站起身来，以他特有的姿态把手指插在腋下的背心里，在狭

^① “立宪民主党”是俄国主要的资产阶级政党。“十月党人”是十月党（或称“十月十七日同盟”）党员，该党是拥护1905年10月17日（30日）沙皇宣言的反动地主资产阶级政党。——译者注

^② 指欧洲南部的巴尔干半岛，第一次世界大战从这里开始。——译者注

窄的房间里慢慢地踱着，眯缝着他那闪闪发光的眼睛。

“战争快要来了。这是不可避免的。资本主义世界已经到了腐烂的地步，现在人们已经开始遭受沙文主义、民族主义的毒害了。我想，我们还会看见一场全欧洲的大战。无产阶级吗？无产阶级未必有力量防止这场流血的纷争。怎样才能防止呢？整个欧洲的工人罢工吗？他们还没有充分地组织起来和觉悟起来。这样的罢工一定是国内战争的开始，我们是现实的政治家，不能指望这个。”

他停住脚步，用鞋底磨擦着地板，忧郁地说：

“无产阶级当然会大受苦难，它的命运暂时只有这样。但是它的敌人将互相削弱自己的力量。这也是不可避免的。”

他走到我面前，好象很惊异似的，用了很大力气，然而并不大声地说：

“不，您想一想，吃饱了的人硬要赶着饿肚子的人去互相厮杀，这究竟是为了什么呢？您能说出比这更愚蠢、更可憎的罪行吗？工人们将为此付出非常重大的代价，但是最后他们是会胜利的。这是历史的意志。”

他时常谈到历史，但是在他的话里，我从来没有感到他盲目崇拜历史的意志和力量。

谈话使他激动起来，他在桌子面前坐下，擦干汗涔涔的前额，喝了一点冷茶，突然问道：

“您在美国闹了什么乱子？从报纸上我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但这是怎么发生的呢？”

我简略地向他叙述了我的奇遇。

我从来没有遇见过一个能象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这样笑得带有感染性的人。看见这样一个严峻的现实主义者，一个对于巨大的社会悲剧的必然性看得如此清楚和感觉得如此深刻，同资本主义世界誓不两立、不共戴天的人，居然会象小孩似地笑得喘不过气

而且流出眼泪来，这简直使人感到奇怪。只有具有伟大、坚强而健康的心灵的人才能这样笑。

“啊，您真是一个幽默家！”他笑着说，“简直没有想到。鬼知道有多么可笑……”

他揩去笑出来的眼泪，接着就带着善良而又柔和的微笑，严肃地说：

“您能够用幽默去对付失败，这倒不错。幽默是一种优美的、健康的品质。我很懂得幽默，然而不善于幽默。生活中可笑的东西大概不比可悲的东西少，的确不少。”

我们约定过一天我去看他，但是天气很坏，晚上我开始大吐血，于是第二天就走了。

在巴黎分手以后，我们又在喀普里见面了。我有个非常奇怪的印象：仿佛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到过喀普里两次，但却怀着两种截然不同的心情。

有一个伊里奇，当我在码头上刚一碰见的时候，他就立刻坚决地向我声明：

“我知道，阿列克塞·马克西莫维奇，您始终希望我和马赫主义者有和解的可能，虽然我在信中已经预先告诉过您：这是不可能的。所以您就不要再费心了。”

在去我寓所的路上和到达那里之后，我一直试着向他说明他并不是完全正确的，因为我从来不曾而且现在也没有打算调和哲学上的争论，何况这些争论我又并不十分了解。此外，从青年时代起，我就染上了一种不相信任何哲学的习惯，我之所以不相信哲学，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是由于哲学同我个人的“主观”经验有矛盾：在我看来，世界刚刚开始，“正在形成之中”，而哲学却在它头上打了一巴掌，完全不适当而又不适时地问道：

“你往哪里去？干什么去？为什么——你想了吗？”

有些哲学家简单而严厉地命令道：

“站住！”

此外，我已经知道，哲学好象一个女人，也许很不漂亮，甚至于丑陋，但是打扮得十分巧妙而动人，使人可以把她当作一个美人。这惹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大笑起来。

“嗯，这是幽默的讲法，”他说，“至于世界刚刚开始，正在形成，——这说得很好！对于这一点您要认真地想一想，从这里您将走到您早就应该走到的地方。”

接着我对他说，亚·亚·波格丹诺夫、阿·瓦·卢那察尔斯基、弗·亚·巴扎罗夫——在我的心目中都是一些大人物，受过良好的全面教育，在党内我没有见过能同他们相比的人。

“就假定是这样吧。唔，由此得出什么结论来呢？”

“归根到底，我认为他们是和我们目的相同的人，既然大家都深刻地认识和领悟到目的一致，那就应该抹掉、消灭在哲学上的种种矛盾……”

“这是说仍旧存在着和解的希望吗？这是没有用的，”他说，“把这个希望抛开吧，而且尽量抛开得远些吧，我恳切地劝告您！依您看来，普列汉诺夫也是和我们目的相同的人罗，但是——这话只能在我们之间说——我认为他的目的和我们的完全不同，虽然他也是一个唯物主义者，而不是一个形而上学者。”

我们的谈话就此结束。我想用不着声明：我重述这次谈话的时候并未精确地使用当时原有的词句。但是意思确切，——这是我毫不怀疑的。

我亲眼看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比在伦敦代表大会上更坚定、更刚强。但是在那里，他很激动，而且有时候使人明显地感到党内的分裂使他经历了一些非常痛苦的时刻。

而在这里，他镇定、冷静而诙谐，严厉地拒绝讨论哲学问题，总之，他是很谨慎的。亚·亚·波格丹诺夫是个非常可爱而又温和的人，他深爱列宁，但有点自以为是，他不得不倾听这些极其尖锐和使人难堪的话：

“叔本华^①说：‘谁的思想清楚，他就说得清楚。’我认为他再没有讲过比这更好的话了。波格丹诺夫同志，您说得不清楚。您能用三言两语向我解释清楚：您的‘代换说’^②将给予工人阶级一些什么，马赫主义为什么比马克思主义更革命些吗？”

波格丹诺夫试着解释，但是他的确说得不清楚，而且很罗嗦。

“得了吧，”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劝告道，“有一个人，大概是饶勒斯吧，曾经说过：‘说句老实话，强似当部长’，我可以补充一句：强似当马赫主义者。”

接着他十分起劲地同波格丹诺夫下棋，下输了，就生气，甚至懊丧起来，好象一个小孩似的。值得注意的是，甚至这种小孩似的懊丧，也象他的惊人的大笑一样，并不破坏他的性格的完整。

在喀普里还有另一个列宁，——一个极好的同志，一个愉快的人，对于世界上的一切怀着强烈的无穷无尽的兴趣，对于人们抱着异常温和的态度。

有一个夜晚，大家都出去散步了，列宁同我和玛·费·安德烈也娃谈话——他不愉快地、深深惋惜地说：

“一些聪明的、有才能的人，曾经为党做了不少事情，本来还可以多做十倍，但是他们不同我们一道走了！他们不行了。成十成百的这样的人都被这个万恶的制度毁坏了，摧残了。”

另一次，他说：

① 叔本华(1788—1860年)，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译者注

② 波格丹诺夫鼓吹唯心主义的“代换说”，认为物理的东西是心理的东西的代换。——译者注

“卢那察尔斯基会回到党里来的，他的个人主义没有那两个多。他真是个罕有的聪明人。我对他有些‘偏爱’，——见鬼，多么愚蠢的话：偏爱。您知道，我的确喜欢他，是个优秀的同志！他有一种法国式的光彩。他的轻率也是法国式的，他的轻率来自他的唯美主义。”

他详细地询问喀普里渔民的生活、他们的收入、教士们的影响、学校的情况——他的兴趣的广泛不能不令我吃惊。当人们告诉他有一个牧师是贫农的儿子的时候，他就立刻要求给他查询明白：是不是农民们常常送儿子进教会学校，是不是农民们的儿子回到自己的乡村作牧师？

“您懂吗？如果这不是偶然的现象，那就是说，这是梵蒂冈的政策，一种狡猾的政策！”

我想象不出还会有另外的人能这样超群出众，不受虚荣心的蛊惑，对于“普通人”始终表示深切的关怀。

他有一种磁力吸引着劳动人民的心灵和同情。他不会讲意大利话，但是曾经见过夏里亚宾和其他不少俄国著名人物的喀普里渔民，却出自某种本能，一下子就对列宁特别看待。他的笑是富有魅力的，这是一位善于洞察人间的愚蠢丑恶和阴谋诡计，又能在“心地单纯的人们”的孩子似的天真中找到欢乐的人的“诚挚的”笑。

老渔夫乔凡尼·斯巴达洛谈到他说：

“只有正直的人才能这样笑。”

在犹如晴空一般碧蓝而又澄清的水波上划船的时候，列宁学习“用手指”钓鱼——只用一根钓丝，不用钓竿。渔民们向他解释道：当手指觉得线在摆动的时候，就要扯一扯钓丝：

“这样：叮铃—叮铃。懂得吗？”

他立刻钓到了一条鱼，把鱼拉起，大叫起来，象小孩一样欢喜，

象猎人一样兴奋：

“哈哈！叮铃—叮铃！”

渔民们也象小孩一样快乐地哄笑起来，并且称呼这个钓鱼人道：

“叮铃—叮铃先生。”

他走了以后，他们还常常问起：

“叮铃—叮铃先生好吗？他不会被沙皇抓住吧，不会吧？”

我记不清是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之前或者之后，格·瓦·普列汉诺夫到过喀普里。

几个住在喀普里的侨民——文学家尼·奥利格尔，因在索契组织暴动被判处死刑的洛仑兹-梅特涅，巴维尔·维格多尔契克，另外好象还有两个人——想同普列汉诺夫谈话。他拒绝了。这是他的权力，他是一个病人，是来这里休养的。但是奥利格尔和洛仑兹告诉我，他拒绝的方式太使他们难堪了。神经质的奥利格尔一口咬定格·瓦·说过这样的话：“对于许许多多只爱说话而不能做事的人，我真厌烦极了。”他在我这里的时候，的确不愿意会见侨居当地的任何人，——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却会见了所有的人。普列汉诺夫简直不询问什么，他已经知道一切，而且自动向你说出来。他具有俄国式的广博的才能，受过欧洲式的教育，喜欢卖弄漂亮的俏皮话，而且好象正是为了说俏皮话他才激烈地强调外国的和俄国的同志们的缺点。我觉得他的俏皮并非都很恰当，在我的记忆里只留下了一些不恰当的例子：“做事有分寸的梅林^①没有了分寸。”“骗子恩利科·费利身上既没有铁，也没有金”——这个双关语建立在“费利”（意思是铁）这个字眼上。全都是这一类的

^① 梅林（1846—1919年），德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他的姓氏的俄文译音 Меринг 与 мера（分寸）同一词根。——译者注

玩意儿。总之，他对待人们是采取居高临下的态度，当然不完全象一尊天神，但多少有些相似。作为最有才能的著作家，党的创始者，他在我心里引起深深的敬意，然而不是好感。他身上的“贵族气”太多了。也许，我的判断是错误的。我并不特别喜欢犯错误，但是象众人一样，我也会犯错误的。然而事实总是事实：我很少遇见过象格·瓦·普列汉诺夫和弗·伊·列宁这样两个如此大不相同的人。这倒是很自然的：一个尚未完成他的破坏旧世界的工作，另一个却已经开始创造新世界了。

生活是安排得这样出奇的巧妙，不能恨就不能真挚地爱。必须把心灵分成两半，一定要透过恨才能爱，仅仅这种彻底使人畸形化的要求，就注定现代的生活条件必将毁灭。

在俄罗斯这样一个鼓吹唯有受苦才是“拯救灵魂”的万灵丹的国家里，我没有遇见过，也不知道有什么人象列宁这样深刻而强烈地憎恨、厌恶和蔑视人们的不幸、痛苦和灾难。

在我的心目中，这些感情，这种对生活悲剧的憎恨，使弗拉基米尔·列宁特别出类拔萃，因为在他的国家里，最有才华的福音书都是歌颂和赞美受难的，青年们正开始按照千篇一律的、实际上描写琐细的日常悲剧的书本来生活。俄国的文学是欧洲最悲观的文学；我们所有的作品写的都是同一个主题：我们怎样受苦，——在青年和中年时代，由于缺乏理性，由于专制压迫，由于女人，由于对亲人的爱，由于宇宙构造的缺陷而受苦；在老年时代，由于认识了生活的错误，由于牙齿脱落，由于消化不良，由于无法避免死亡而受苦。

每个俄国人，只要为着“政治”而被囚禁了一个月或流放了一年，就认为献给俄国一本他受苦的回忆录是他的神圣的义务。直到今天，还没有人想到写一本叙述他一生的快乐的书。既然俄国

人习惯于想象自己未来的生活，而不善于把它付诸实现，那末十分可能，一本描写幸福生活的书就会教给他们应当怎样想象这样的生活。

在我看来，列宁之所以特别伟大，正是在于他对人类不幸的这种不可调和、永无休止的敌视，在于他明确地相信：不幸并不是不可消灭的生活基础，而是人们应当并且能够铲除的可恶的东西。

我想把他的性格的这个基本特点称作唯物主义者的战斗的乐观主义。正是这个特点使这个人——大写的人对我的心灵发生了特殊的吸引力。

1917—1918年间，我和列宁的关系远非我所愿意看见的那样，但是又不能不如此。

他是一个政治家。他完全具有巨大而沉重的海船的舵手所必需的那种英明果断，这里所谓的海船，就是灾难深重的农民的俄罗斯。

我对于政治有着一种生理上的厌恶，我一般不相信群众的理性，特别是农民群众的理性。没有被一种主义组织起来的理性，还不是生活中具有创造性的力量。当群众还没有认识到他们个人利益的共同性的时候，他们的理性中是没有主义的。

几千年来，群众努力追求美好的生活，但是追求的结果，却从群众中间产生了一些强盗，这些强盗奴役群众，用群众的血汗养活自己；而且这种情况还将继续下去，直到群众认识到世界上能够使他们摆脱强盗的奴役的只有一种力量——列宁的真理的力量。

当1917年列宁回到俄国，发表了他的提纲^①的时候，我还以为他是用这个提纲把数量微小而品质优秀的受过政治教育的整个

^① 指列宁著名的《四月提纲》，在这个纲领中制定了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革命路线和具体计划。——译者注

工人队伍和所有正直的革命知识分子作为俄国农民的牺牲品。俄国的这个唯一积极的力量，将象一把盐一样被投入农村的淡水塘里，溶解和消失得无影无踪，丝毫也改变不了俄国人民的精神、生活和历史。

在我看来，科学家、技术家，总之，具有专门本领的知识分子，在本质上是革命的；我以为，他们跟工人的、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在一起，是俄国所积蓄的最宝贵的力量，——至于能够夺取政权和组织农村的另一种力量，我在1917年的俄国还没有看到。但是，这些数量微小而且被矛盾所分裂的力量，只有在最牢固的内部团结的条件下才能发挥自己的作用。它们面前摆着一项巨大的工作：制止农村中的无政府状态，培植农民的意志，教导他们合理地工作，改造他们的经济，而且用这一切推动国家迅速前进；要实现这一切，只有使农村的本能服从城市的有组织的理性。我以为革命的首要任务就是创造能够促使国家的文化力量发展的各种条件。为了这个目的，我曾经建议在喀普里创办工人学校，而且在1907—1913年的反动时期，我曾经尽力用种种方法使工人们朝气蓬勃。

为着这个目的，就在二月革命以后，于1917年春天组织了“发展和普及实验科学自由联合会”，这个机构的任务，一方面是在俄国设立各种科学研究所，另一方面是在工人中间广泛地不断传播科学技术知识。领导这个联合会的是一些卓越的科学家、俄国科学院院士们，如弗·安·斯切克洛夫、列·亚·丘加也夫、费尔斯曼院士、谢·巴·科斯蒂切夫、阿·阿·彼得罗夫斯基以及其他许多人。人们积极地筹集经费；谢·巴·科斯蒂切夫已经着手寻找地址来建立动植物研究所了。

为着更明确起见，我还要说，蒙昧无知的农村同城市相比居压倒的优势，农民的动物式的个人主义，以及他们几乎毫无社会

感情，——这一切使我苦闷了一生。在我看来，有政治觉悟的工人与科学技术知识分子结成紧密联盟而建立的专政，才是能使我们摆脱被那使农村更加混乱的战争弄得格外复杂的困境的唯一出路。

我和共产党人意见分歧的地方，是在如何评价知识分子在俄国革命中的作用这个问题上。准备俄国革命的正是这些知识分子，其中包括所有以社会英雄气概和崇高智慧教育了成百工人的“布尔什维克”。俄国的知识分子（科学家和工人知识分子）过去是，现在依然是，在今后长时期内也还是拖拉俄国历史这辆载重大车的唯一驮马。尽管经历了一切震动和刺激，人民群众的理性依然是一种需要从外面加以领导的力量。

十三年以前我是这样想的，也就这样错了。我的这一页回忆本来应该删掉。但是，“用笔写下来的，用斧头也砍不掉。”此外，“让我们从错误中学习吧。”——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常常反复地说。就让读者知道我的这个错误吧。如果它可以作为那些爱凭自己的观察匆忙下结论的人的一个教训，那就很好了。

当然，在连续发生了一部分专家卑鄙的破坏行为^①之后，我就不得不改变——而且已经改变了——我对科学技术人员的态度。这样的改变是相当费力的，特别是到了老年。

人民的忠诚领袖担负的职责，真是艰苦得非凡人所能胜任。但是要知道，列宁领导下的革命所遭到的反抗是组织得更为广泛和强大的。此外，还必须注意，随着“文明”的发达，人的生命的价值显然降低了，现代欧洲杀人技术的发达和对这种事情的浓厚兴趣就无可辩驳地证实了这点。

^① 1928年，在苏联顿巴斯矿区的沙赫特区破获一个庞大的资产阶级专家的反革命破坏组织。——译者注

但是请凭良心说吧，那些“道德家”，在四年可耻的欧洲大战中间，不但不怜惜数百万被屠杀的人们，而且用一切方法煽动这场可恶的战争“直到彻底胜利”，在此以后他们却大谈俄国革命的凶残，这种伪善难道不是极其讨厌和令人作呕的吗？现在那些“文明国家”被打败了，弄得精疲力尽了，变得粗野起来，而全人类的市侩的愚蠢却得到了胜利：它那勒紧了的绞索迄今还使人们透不过气。

关于列宁的残酷，人们写过很多，也谈过很多。当然，我不会笨拙可笑地袒护他避开谣言和污蔑。我知道污蔑和造谣是市侩的合法的政治手腕，是他们跟敌人斗争时常用的手段。在这个世界上的伟大人物中间，未必找得出一个不曾有人企图在他脸上抹黑的。这是众所周知的。

此外，人人都有这么一种愿望：不仅把一个杰出的人物贬低到他们能够理解的程度，而且企图把他推进自己脚下那种被他们创造性地称之为“平凡生活”的有毒的粘泥中。

有一件事情我想起来就感到厌恶：1919年在彼得堡举行“贫农”代表大会^①，从俄国北方各省来了几千个农民，有几百个住在罗曼诺夫王朝的冬宫里。当代表大会结束，这些人走了以后，才发现不仅冬宫里所有的浴盆，就连大批珍贵的色佛尔^②的、萨克森^③的和东方的花瓶都被他们当作溺器用了，弄得肮脏不堪。他们这样作，并不是由于需要，——宫里的厕所是完好的，水管也是通畅的。不，这种流氓行为是毁损、糟蹋美好东西的欲望的一种表现。在两次革命和一次大战时期，我几百次地看到过人们这种想要破坏、丑化、嘲笑、诽谤优美的东西的愚昧的报复的愿望。

① 看来，这是指1918年11月在彼得格勒举行的北方区域贫农委员会代表大会。——编者注

② 法国出产瓷器的地方。——译者注

③ 德国出产瓷器的地方。——译者注

不应该认为，我强调“贫农”的这种行为是由于我对农民抱着怀疑态度，不，我知道，就连一些知识分子集团，譬如那些显然以为俄国没有他们就不会干出什么好事来的侨民们，也有糟蹋优美东西的病态的欲望。

污损特别美好的东西的这种恶劣的愿望，与诽谤极其非凡的人物的那种可憎的愿望，具有同一根源。一切非凡的东西都妨碍人们按照自己的心愿过活。人们所渴望的——如果他们渴望的话——完全不是根本改变他们自己的社会习惯，而仅仅是将其扩大而已。大多数人主要的牢骚和感叹是：

“不要妨碍我们按照自己的习惯过活呀！”

弗拉基米尔·列宁就是妨碍人们过他们习惯了的生活的人物，这在他以前是谁也不能办到的。

世界资产阶级对他的憎恨表示得既露骨，又可恶，到处都鲜明地闪耀着这种发青的鼠疫症似的憎恨的斑点。这种憎恨本身是十分可恶的，但是它向我们说明，在世界资产阶级的心目中，弗拉基米尔·列宁——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鼓舞者和领导者——是多么伟大和可畏。他的肉体已经不存在了，可是他的声音在地球上劳动群众听来却更加响亮，更加充满胜利的信心，而且地球上已经没有一个角落听不到这个声音在激励劳动人民的意志，号召他们去进行革命，创造新生活，建立人类平等的世界。列宁的学生们，他的力量的继承者们，正日益自信地、坚强地、顺利地从事这个伟大的事业。

在他的身上鲜明地表现出来的生活的意志和对生活中丑恶现象的深恶痛绝，使我为之神往。我赞赏他不论做什么都全神贯注的那种青年人的热忱。他的超人的工作能力很令我吃惊。他的动作轻巧、敏捷，他的毫不夸张但非常有力的手势跟他的谈话却十分协调，他的谈话也是语句简单而思想丰富的。在他的蒙古型的脸

上，燃烧着、活跃着那为反对生活的虚伪和痛苦而不倦斗争的战士的锐利的眼睛，它们燃烧着，时而眯缝起来，时而使眼色，时而讽刺地微笑，时而闪出愤怒的火焰。这一对眼睛的光芒使得他的谈话更加炽烈而明快。

有时候，好象他灵魂里的不可制服的力量从眼睛里迸出火花，一些充满力量的语句在空中闪耀。他的谈话总是使人们似乎在肉体上也能感触到那不可抗拒的真理。

看到列宁在哥尔克村的公园里散步，那是不同寻常而又奇怪的，——因为人们一看见他，就会想到一个人坐在长桌的一端，微微地笑着，闪着舵手般锐利的眼睛，熟练地、敏捷地领导着同志们讨论，或者是站在讲台上，仰着头，把明确而清晰的语句投掷到静悄悄的人群中，投掷到渴求真理的人们的贪婪的眼睛里。

这些语句总是令我想起那铁屑的寒冷的光辉。

从这些语句里异常朴素地显出了那十分完美的真理的塑像。

热情是他的本性，但这不是赌徒的贪婪的狂热，它显示出列宁的一种非凡的魄力，只有对自己的使命抱着不可动摇的信念的人，只有全面而深刻地感到自己和世界的联系，并完全了解自己在这个混乱的世界中的任务——制服这种混乱——的人，才能够具有这种魄力。他能以同样的热情下棋，看《服装史》，一连几个钟头跟同志们争论，钓鱼，在被南方的太阳晒烫了的喀普里的石头小道上散步，欣赏金黄的金雀花和渔民们的肮脏的孩子。晚上，在倾听有关俄国和农村的故事时，他往往羡慕地感叹道：

“我对俄国的了解太少了。辛比尔斯克城，喀山，彼得堡，流放，这几乎就是一切！”

他喜欢可笑的东西，而且笑起来全身震动，的确是笑得“前仰后合”，有时竟会笑出眼泪。他能用短促的、特有的感叹词“唔—

唔”来表达无数不同的语气，从刻薄的讽刺到谨慎的怀疑，而且在这“唔一唔”中间，常常流露出一种只有眼光犀利、深知生活中的那些荒谬绝伦的现象的人才具有的辛辣的幽默。

他的身材又矮又壮，体格结实，长着苏格拉底式的前额和一双洞察万物的眼睛，时常作出一种奇怪而且有几分滑稽的姿势——头向后仰，又偏到肩上，手指插在两腋下的背心里面。这个姿势有着一一种非常亲切而又可笑的表情，一种象打了胜仗的公鸡似的表情，而且在这一瞬间，他全身闪耀着快乐的光辉。他是这个可恶的世界的伟大儿子，是一个为了实现爱的事业而不得不使自己成为敌意和憎恨的牺牲品的优秀人物。

1918年以前，在那最卑劣丑恶的暗杀列宁的企图付诸实行以前，我在俄国没有会见过列宁，甚至也没有从远处瞧见过他。我去看他的时候，他的手还不能运用自如，他的被射穿的脖子，也只能勉强地移动。就象人们谈论令人生厌的事情那样，他很不乐意地回答了我的愤慨：

“打架。有什么办法呢？每个人都是按照自己的本事行动的。”

我们的会见是很友好的，但是毫无疑问，亲爱的伊里奇明察秋毫的锐利的眼睛，是带着明显的惋惜神情注视着我这个“迷路的人”。

过了几分钟，列宁热情地说：

“谁不同我们一起，谁就是反对我们。超然于历史之外的人——只是一种幻想。就算以前有过这样的人，可现在没有了，不可能有了。谁也不需要这样的人。所有的人，没有一个例外，都被卷进前所未有的错综复杂的现实的漩涡里了。您说，我把生活看得过于简单了吗？这种简单化有毁灭文化的危险吗？”

接着是他那讽刺的、特有的表示：

“唔—唔……”

锐利的目光变得更加锐利，列宁用低沉的声音继续说道：

“嗯，依您看来，几百万拿着枪杆的农民岂不是对文化的一种威胁吗？您以为立宪会议会克服他们的无政府状态吗？您经常叫嚷农村的无政府状态，应当比别人更了解我们的工作。必须给俄国群众指出一种很简单的、容易为他们的理性接受的东西。苏维埃和共产主义就是很简单的。”

“工人和知识分子的联盟，是吗？这不坏，不坏。告诉知识分子，让他们到我们这里来好了。依您看，他们是真心诚意地为正义的利益服务的吗？这是怎么一回事呢？请他们到我们这边来吧：正是我们负起了唤起人民行动、向世界说明生活的全部真理这一巨大任务，我们给各民族指出了一条通向人类生活的康庄大道，一条摆脱奴役、贫困和耻辱的道路。”

他笑了起来，和颜悦色地说：

“我还为此吃了知识分子的一粒子弹。”

当谈话的温度接近常态的时候，他懊恼而痛心地说道：

“难道我说过知识分子不是我们所必需的吗？可是您看到他们是怎样充满了敌意，是怎样不懂得目前的要求吗？他们也没有看出：没有我们，他们就没有力量，就不会被群众了解。要是我们把坛坛罐罐打碎得太多，那将是他们的过错。”

我们每次见面几乎都要谈到这个问题。虽然在口头上他对知识分子依旧是不信任的、有敌意的，但是实际上他总是正确地估计了理性的力量在革命过程中的意义，而且好象是同意这一点：实质上，革命正是那在过时的和狭隘的条件下找不到正常发展机会的精力爆发。

记得有一次我同科学院的三位院士到他那里去。谈的是彼得

堡的一个高等学术机构必须改组的问题。列宁送走了这三位学者之后，满意地说：

“我了解这些人。他们是聪明人。在他们那里，一切都很简单，一切都说得十分明确，一下子就看得出这些人清楚地知道他们需要什么。跟这些人在一起工作，真是一大快事。我尤其喜欢那一位……”

他说出了俄国科学界的一位大人物，过了一天，他就打电话给我说：

“请问一问斯·，他愿意同我们一起工作吗？”

当斯·接受了这个建议的时候，列宁真是高兴极了，他搓着两手，开玩笑说：

“就是这样，我们要把所有俄国的和欧洲的阿基米得一个一个都拉过来，那时候，不管世界是否愿意，它都得翻个身！”

在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尼·伊·布哈林曾顺便提到：

“民族就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在一起。承认某一卑鄙的资产阶级的自决权，这是毫无根据的。”

“不对，请原谅，”列宁反驳道，“这是有根据的。你借口民族内部在发生分化，即无产阶级在和资产阶级分离开来。但是，我们且来看看这种分化是怎样的。”

然后，他以德国为例，指出这个分化过程发展得如何迟缓而困难，还提到“共产主义是不能用暴力来移植的”，——他就这样说明了知识分子在工业、军队和合作社中的重要性问题。现将《消息报》刊登的关于代表大会上讨论情况的报告摘引如下：

“这个问题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必须十分明确地加以解决。我们只有利用资产阶级的科学和技术来把共产主义变成群众更容易接受的东西时，才能建成共产主义。”

“因此，我们就必须把机构从资产阶级手里夺来，必须吸收所有这些专家参加工作。没有资产阶级的专家，就不能提高生产力。必须用同志合作的气氛、工人政治委员和共产党支部来包围他们，必须建立使他们无法挣脱的种种条件，但应当使他们有比资本主义制度下更好的工作条件，因为不如此，这个由资产阶级培养出来的阶层就不会工作。想用棍子强迫整个阶层工作是不行的。资产阶级专家习惯于文化工作，他们在资产阶级制度范围内推进了文化工作，就是说，他们使资产阶级获得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使无产阶级的所得微不足道。但他们毕竟推进了文化，这是他们的职业。当他们看到工人阶级不仅重视文化，而且在群众中帮助推行文化工作时，他们就会改变对我们的态度。那时他们就会在精神上完全折服，而不仅在政治上和资产阶级割断关系。必须吸收他们到我们机构中来，为了这点，有时必须做些牺牲。对于这些专家，我们不应当采取吹毛求疵的政策。我们应当尽可能地使他们有较好的生活条件。这将是顶好的政策。如果说我们昨天谈小资产阶级政党的合法化，今天就逮捕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那末，在这种变动中贯彻着一条最坚决的路线：消灭反革命，利用资产阶级文化机构。”^①

这位伟大政治家的这些卓绝的言论，比那些市侩式的、无力的、实质上是伪善的“人道主义”的感叹具有更生动得多、真实得多的意义。可惜得很，有许多应当了解和重视这个同工人阶级一起从事诚实劳动的号召的人，却并不了解和重视这个号召。他们宁愿鬼鬼祟祟地从事破坏活动与叛变勾当。

在农奴制废除以后，有许多“家仆”、天生的奴才，也是依然留在主子惯常用鞭子抽打他们的马厩里为他们的主子效劳。

^① 摘自列宁在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参阅《列宁选集》第3卷第776—787页。——译者注

我常常同列宁谈到革命的策略和生活的残酷性。

“您想要怎么样？”他惊异而且恼怒地问道，“在这样空前猛烈的战斗中还能讲人道吗？哪儿还有仁慈和宽大的位置呢？欧洲封锁我们，我们失去了早就期待着欧洲无产阶级的援助，反革命象熊一样从四面八方向我们袭来，而我们——怎么办呢？难道我们不应该而且也没有权利斗争和抵抗吗？呃，对不住，我们不是傻瓜。我们知道，我们所要的东西，除了我们以外，谁也不能办到。难道您认为，如果我对被反对的东西深信不疑，我还会坐在这里吗？”

“在打架的时候，您用什么标准来判断哪一拳是必要的，而哪一拳又是多余的呢？”在一次热烈的交谈之后，他这样问我。对于这个简单的问题，我只能含糊地回答。我想再没有别的答案了。

我常常拿各种各样的请求去麻烦他，有时候我感到由于我老是替人说情而引起了列宁对我的怜惜。他问：

“您不觉得您在干一些荒唐的、毫无意义的事情吗？”

但是，我继续做我认为必要的事情，而这位了解无产阶级敌人的打算的人的愤怒的斜视，并没有使我退却。他伤心地摇头说：

“您这是在同志们和工人们的面前糟蹋自己的名誉呢。”

可是我指出：同志们，工人们，“在激动和忿怒之下”，往往把有价值的人的自由和生命看得太轻、太“简单”；依我看来，这不仅是以过分的、有时是毫无意义的残酷来糟蹋正当而又艰苦的革命事业的名誉，而且在客观上对这个事业是有害的，因为这排斥了不少重要的人物，使他们不能参加这个事业。

“唔一唔，”列宁怀疑地哼了几声，向我指出知识分子叛变工人事业的许多事实。

“在我们当中，”他说，“有许多人之所以叛变革命，出卖革命，

不仅是由于胆怯，而且是由于虚荣，由于怕丢脸，由于害怕他们心爱的理论在实践中碰壁时会吃亏。我们是不怕这个的。理论，假说，在我们看来，并不是‘神圣的’东西，在我们看来，这只是工具而已。”

尽管如此，但我却记不得有哪一次伊里奇拒绝过我的请求。如果碰到我的请求没有实现的话，这并不是他的过错，而大概是由于俄罗斯国家组织这台笨拙的机器经常有很多“机械上的缺点”。也可能有人心怀恶意，不愿改善有价值的人的命运，不愿拯救他们的性命。可能这里也有“破坏行为”，敌人的无耻并不亚于他们的狡诈。报复和仇恨常常是不自觉地起作用的。当然，也有一些心理不健全的小人，抱着一种病态的渴望，对于亲人的痛苦采取幸灾乐祸的态度。

有一次，他微笑着，拿出一份电报给我看：

“又被捕请下令释放。”

签名是：伊万·沃尔纳。

“我读过他的著作，——我很喜欢。从电报上的这几个字我就立刻感到这个人懂得错误是不可避免的，而且不生气，并不因为个人受到侮辱而勃然动怒。他被捕好象是第三次了。您不如劝劝他离开乡下，不然也许会杀掉他的。那里的人显然都不喜欢他。劝一劝吧。打个电报去。”

列宁愿意帮助被他认为是敌人的那些人，不仅是愿意帮助，而且还关心他们的未来，这往往使我大为惊异。例如，曾有一个将军、学者、化学家受到死刑的威胁。

“唔一唔，”列宁注意地听完了我的叙述之后说，“那末，依您看来，他不知道他的儿子们把武器藏在他的实验室里吗？这是一种奇怪的想法。但是，应该让捷尔任斯基来调查这件事情，他对事物的真相有敏锐的辨别能力。”

过了几天，他打电话到彼得格勒告诉我：

“您的那位将军——我们可以释放，好象已经释放了。他想干什么呢？”

“制造乳剂。”

“是的，是的，——制造一种石炭酸。好，让他去煮石炭酸吧。您告诉我，他需要什么……”

列宁往往用讽刺来掩饰因救了人的性命而产生的那种怪难为情的喜悦。

过了几天，他又问：

“怎么样——那位将军？安顿好了吗？”

1919年，在彼得堡的一些厨房里出现了一个十分漂亮的女人，她严厉地要求道：

“我是契·公爵夫人，给我一块骨头喂我的狗吧！”

据说，她因为忍受不了耻辱和饥饿，曾决心投涅瓦河自尽，但是她的四条狗仿佛觉察出女主人这个狠心的计划，就跟着她跑，狂蹦乱跳地哀号不已，使她不得不放弃了自杀的念头。

我向列宁讲述了这个故事，他斜着眼从下到上打量着我，总是眯着眼睛，最后又完全闭上，闷闷不乐地说：

“如果这是捏造出来的，那也捏造得不坏。这是革命中的笑话。”

沉默了一会儿，他站起身来，一面翻看桌上的文件，一面若有所思地说：

“是的，这些人可要吃苦头啦，历史是一个严厉的老婆子，报复的时候是毫不留情的。有什么可说的呢？这些人是不会好受的。他们中间的聪明人当然了解：他们是被连根拔掉了，再不会在地上生长了。而移居，迁往欧洲，又不会使这些聪明人满意。他们在那

里会过不惯的，您以为怎么样？”

“我以为他们会过不惯。”

“那就是说——或者跟我们一起走，或者又去图谋捣乱。”

我曾经问过他：他是真正地怜惜人们，还是这仅是我的感觉呢？

“聪明人——我是爱惜的。聪明人在我们这里是很少的。我们俄国人大半是有才能的，然而懒得动脑筋。”

他想起了几个已经根除了阶级的自私心理而和“布尔什维克”一道工作的同志，就非常亲切地谈起他们来了。

列宁，一个意志非常坚强的人，具有充分的优秀革命知识分子所特有的品质——自我克制，往往达到自我折磨和自我糟蹋的地步，达到拉赫美托夫^①式睡钉板的地步，达到否认艺术的地步，达到遵循列·安德烈也夫笔下一个主人公的逻辑的地步：

“人们的生活很苦，因此我也应当过苦日子。”

在困难的、饥馑的 1919 年，列宁羞于吃同志们、战士们和农民们从内地寄给他的食物。当包裹送到他简陋的寓所里的时候，他就皱着眉头，局促不安，匆忙把面粉、糖、牛油分送给害病的或由于食物不足而变得虚弱的同志们。有一次，他邀请我到他那里去吃饭，说：

“我请您吃熏鱼——从阿斯特拉罕寄来的。”

他紧皱着苏格拉底式的前额，洞察万物的眼睛斜视着一边，补充道：

“他们寄东西来就象送给贵族老爷似的！怎样阻止得住呢？拒绝吧，不接受吧——那他们会见怪的。但是周围的人都在挨

^①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小说《怎么办？》中的人物。——译者注

饿。”

他生活俭朴，没有烟酒的嗜好，从早到晚忙于复杂而又困难的工作，完全不善于关心自己，可是却仔细注意同志们的生活。他坐在自己办公室的桌子面前，很快地写着，不让笔尖离开纸面，就说：

“您好，健康怎样？我马上就完了。有一个同志，在内地，寂寞得很，显然是疲倦了。必须给他打打气。情绪并不是一件小事情呀！”

有一次，在莫斯科，我到 he 那里去，他问：

“吃过饭了吗？”

“吃过了。”

“没有扯谎吗？”

“有人证明——我是在克里姆林宫食堂里吃的。”

“我听说——那里伙食很坏。”

“不是很坏，不过还可以搞得更好些。”

他立刻就详细地盘问起来：为什么不好，怎么才可以弄得更好些？

他开始气冲冲地唠叨着：

“他们怎么搞的，难道找不到一个能干的厨师吗？人们工作得简直到了晕倒的地步，一定要拿好吃的东西给他们吃，使他们能多吃一些。我知道，食物很少而又很坏，——这就需要有一个高明的厨师。”于是他引了某卫生学家关于美味的佐料在营养和消化过程中的作用的一段议论。

我问：

“您怎么有功夫想到这些东西呢？”

他也问：

“想到合理的营养吗？”

他的语调使我明白了我的问题是不恰当的。

我的一个老相识巴·阿·斯科洛霍多夫，也是索尔莫沃人，心肠很软，总是埋怨在“肃反委员会”里工作繁重。

我对他说：

“依我看来，这不是您干的事，这不适合您的性格。”

他忧郁地表示同意：

“完全不适合我的性格。”

但是，想了一下，他又说：

“可是，您要记得，伊里奇大概也常常不得不硬起心肠，——我真对自己的软弱感到惭愧。”

我过去和现在都知道有不少的工人，他们过去和现在都不得不咬紧牙关，“硬起心肠”——为了他们所致力的事业的胜利，克服自己所特有的“社会理想主义”。

列宁本人也不得不“硬起心肠”吗？

他太不注意自己，因而绝少向别人谈到自己，他比任何人更善于掩饰他心灵中隐秘的激动。但是有一次，在哥尔克，当他抚摸着谁家的孩子们的时候，他说：

“这些孩子将来一定会比我们生活得好些；我们经历过的许多事情，他们不会再经历了。他们的生活不会是那样艰辛了。”

他望着远处有村庄蜷伏着的小山，若有所思地补充道：

“可是我并不羡慕他们。我们这一代已经完成了一桩在历史上具有惊人意义的事业。我们生活的严峻是由种种条件逼成的，将来一定会被理解，并被证实是正确的。一切都会被理解的，一切！”

他用一种特别轻巧而又温柔的手势，小心翼翼地抚摸着孩子们。

有一次我到 he 那里去，看见桌上摆着一本《战争与和平》。

“是的，托尔斯泰！我想读一读打猎的那个场面，可是我想起必须给一个同志写信。读书——完全没有时间。直到昨天夜里我才读完了您那本关于托尔斯泰的书。”

他微笑着，眯起眼睛，快活地把身体靠在椅子上伸直，然后压低声音，迅速地继续说：

“真是一个大师呀，噢？多么伟大的一个人物呵！老兄，这才是一个艺术家呢……您知道更令人惊异的是什么呢？在这位伯爵之前，文学里就没有一个真正的农民。”

接着，他用那双眯起的眼睛看着我，问道：

“在欧洲有谁能够同他相提并论呢？”

他自己回答道：

“没有。”

于是他搓着两手，满意地笑了起来。

我常常看到他的一个特点，就是夸耀俄罗斯、俄国人民和俄国艺术。有时候我觉得这个特点对于列宁是异常不相称的，甚至是幼稚的，但是以后我才感到它表现了一种深深隐藏着、愉快的、对劳动人民的热爱。

在喀普里，看见渔民们怎样小心地整理被鲨鱼撞破和弄乱了网的网，他说：

“我们的渔民干得更巧些。”

当我对这一点表示怀疑的时候，他不无懊恼地说：

“唔——唔，您住在这个小地方，没有忘掉俄罗斯吗？”

瓦·阿·杰斯尼茨基-斯特罗也夫曾经告诉我：有一次他同列宁在瑞典旅行，在车厢里，读着一本论度勒^①的德文专著。

^① 度勒(1471—1528年)，德国的画家和雕刻家。——译者注

几个坐在同一车厢包间里的德国人问他这是一本什么书。后来才知道他们对于自己的这位伟大艺术家毫无所知。这几乎使列宁欣喜欲狂，他曾两次自豪地对杰斯尼茨基说：

“他们不知道自己人，而我们却知道。”

有一个晚上，在莫斯科，在叶·彼·彼什科娃的住宅里，列宁在听伊萨亚·杜勃洛文演奏贝多芬的几支奏鸣曲时说：

“我不知道还有比《热情奏鸣曲》更好的东西，我愿每天都听一听。这是绝妙的、人间所没有的音乐。我总带着也许是幼稚的骄傲想：人们能够创造怎样的奇迹啊！”

于是他眯起眼睛，露出微笑，不大快乐地补充道：

“但是我不能常常听音乐，它会刺激神经，使我想说一些漂亮的蠢话，抚摸人们的脑袋，因为他们住在肮脏的地狱里，却能创造出这样美丽的东西来。但是现在却不能抚摸任何人的脑袋，——手会被咬掉的，而是要敲脑袋，毫不留情地敲，虽然按理想来说，我们是不赞成对人们用任何暴力的。唔一唔，——任务艰巨得厉害！”

他自己几乎已经病了，非常疲乏了，但在1921年8月9日还写信给我：

“阿列克塞·马克西莫维奇：

我把您的信转给了列·波·加米涅夫。

我累得精疲力尽。

您在咯血，可您还不走！！这实在太过分，太不合理了。

您到欧洲一个好的疗养院去，既可以疗养，又可以**多做两倍的事**。

的确如此。

在我们这儿，您既没有条件疗养，又干不了工作——只是一味

奔忙，徒劳无益地奔忙。

去疗养吧。我请求您别固执了。

您的列宁”①

他在一年多时间里非常固执地坚持要我离开俄国，可是我觉得很奇怪，他全神贯注在工作上，怎会记得有人在什么地方害病，需要休养呢？

象上面那样的信，他给各种各样的人都写过，大概总有几十封吧。

我已经讲过他对同志们的态度是十分特别的，他对他们关怀备至，甚至他们生活中的一些不愉快的小事也逃不过他的眼睛。但是在他的这种情感里我从来没有觉察到有什么利己之心——一个聪明的主人有时会对他的诚实而又能干的仆人流露出来的那种利己之心。

不，这正是真挚的同志出自衷心的关怀，正是平等的人们相互热爱的情感。我知道，在弗拉基米尔·列宁同他党内哪怕是最卓越的人们之间也是不能划等号的，但是他自己仿佛不知道这点，更确切些说，不愿意知道这点。在跟人们争论的时候他是严厉的，他无情地讽刺，有时甚至恶毒地嘲笑，——总是这样。

但是，有好多次，在他评论他昨天所指责和“叱骂”的人们的时候，我十分清楚地听到一种真挚的惊奇的声调，对这些人的才能和精神坚定感到惊奇，对他们能在1918—1921年地狱般的环境下顽强而艰苦地工作感到惊奇，这种工作是在一切国家和政党的暗探的包围中进行的，是在那些象腐臭的脓包一样遍布在被战争弄得民穷财尽的国家的躯体上的阴谋诡计之中进行的。他们不停手

① 《列宁文稿》第9卷第281—282页。——编者注

地工作，吃得又少又坏，生活在不断的动乱中。

但是列宁自己却仿佛不曾经历过这些艰苦的环境，不曾经历过这种连最深的基础都被内战的腥风血雨所震撼了的动乱生活。只有一次，在他和玛·费·安德烈也娃的谈话中，按照她的说法，吐露了一些类似诉苦的话：

“有什么办法呢，亲爱的玛丽亚·费多罗夫娜？一定要斗争。非这样不可！我们艰苦吗？当然！您以为我不觉得困难吗？觉得的——而且很困难！但是——看一看捷尔任斯基吧，——他变成什么样子了！简直没有办法！让我们苦就苦些吧，只要能战胜。”

我本人只听见他诉过一次苦：

“可惜马尔托夫不同我们一起，可惜得很！他是一个多么出色的同志，一个多么真诚的人！”

我记得他是多么快活地哈哈大笑了很久，当他在什么地方读到了马尔托夫的这句话：

“俄国只有两个共产党人：列宁和柯伦泰。”

他笑完以后，叹息着说：

“多么聪明的人！唉……”

他从办公室里送走了一位“经济工作人员”同志以后，尊敬而惊奇地说：

“您早就认识他了吧？他很可以当任何一个欧洲国家的内阁总理。”

他搓着两手，笑了笑，补充道：

“欧洲有才能的人比我们少。”

我曾向他提议去炮兵总署，参观一个当过炮兵的布尔什维克所发明的一台指挥射击飞机的机器。

“在这方面我懂得什么呢？”他问，但他还是去了。在一间阴暗的屋子里，在那摆着机器的桌子四周，聚集了七名皱眉蹙额的将

军，他们都是白发长髯的老人、博学之士。在他们中间，列宁的朴素的、穿着普通衣服的身影好象消失了，变得看不见了。发明家^①开始解释机器的构造。列宁倾听了两三分钟，就赞许地说：

“唔一唔！”他开始询问发明家，口气非常从容，好象在考他政治问题似的：

“您怎样能够使机械同时从两方面去确定射击目标呢？是不是可以把炮筒的准星跟机械的标尺自动地联结起来呢？”

他询问了射程的远近和别的什么，——发明家和将军们都很高兴地向他作了解释，第二天发明家对我说：

“我告诉了我的将军们，说您和一个同志要到这里来，但是没有说这个同志是谁。他们不认识伊里奇，是的，大概他们也想不到他出现的时候竟然不声不响，没有排场，没有卫队。他们问：‘这是一名技师、一位教授吗？列宁？’他们大吃一惊：‘什么？一点不象！——对不起——他从哪里知道我们这些深奥道理的呢？他提出问题，竟象一个精通技术的人！多么神秘！’看起来他们真的不相信那是列宁……”

在从炮兵总署回家的路上，列宁兴奋地大笑起来，而且谈到那个发明家：

“您瞧，在评价一个人的时候是多么容易犯错误呀！我以前知道他是一位忠实的老同志，但却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不料他刚好在这点上非常有用。呱呱叫！不，当我对这台机器的实际价值表示怀疑的时候，那些将军是多么生气地回答我呀！我是故意这样做的，——想知道他们是怎样评价这个巧妙的东西的。”

他大声笑了起来，接着就问：

“您说，伊·还有发明吗？怎么一回事呢？一定不要让他担任什

^① 指苏联发明家亚历山大·伊格纳切夫（1879—1936年）。——译者注

么别的工作。啊，如果我们能把所有这些技术家都安排在理想的工作环境里，那末，二十五年以后，俄国一定会成为世界上的先进国家！”

是的，我时常听见他称赞同志们。甚至在谈论那些据说是他不为他所同情的人们时，他也给予他们的能力以应有的评价。

他对列·达·托洛茨基的组织才能评价很高，这使我很惊奇，——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看出了我的惊奇。

“是的，我知道，关于我同他的关系，多少有一些谣言。但是，有就有，没有就没有，这我也知道。您瞧，他是善于组织军事专家的。”

沉默了一下，他不愉快地低声补充道：

“他毕竟不是我们的人！虽然同我们一起，却不是我们的人。他野心勃勃。他还有一些……不好的东西，来自拉萨尔……”

“虽然同我们一起，却不是我们的人”，——这句话我听见他说过两次，第二次说的也是一位大人物。他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死后不久就死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一定是很能识别人们的。有一次，我走进他的办公室，碰见一个人一面背朝着门向后退，一面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鞠躬，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没有睬他，依然写着什么。

“您认识这个人吗？”他指着门问；我说，为了《世界文学》的事情我去找过他一两次。

“那末——怎么样？”

“我可以说：一个浅薄而又粗野的人。”

“唔——唔……一个拍马屁的家伙。大概还是一个骗子。不过，我是第一次看见他，也许我错了。”

不，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并没有错；过了几个月，这个人完全证实了列宁的鉴定是正确的。

他对人们想得很多，用他的话说，他感到不安的是：

“我们的机构太杂乱了，十月革命以后，很多异己分子爬进来了。这都是那些笃信宗教并为您所喜爱的知识分子的罪过，都是他们卑鄙怠工的结果。的确如此！”

这几句话，是他同我在哥尔克散步的时候说的。我不记得我是怎么谈起了阿列克辛斯基，好象他当时干了一桩坏事。

“您可以想象得到，从第一次会见起，我对他就产生了一种纯粹生理上的厌恶，一种不可克制的厌恶。从来也没有什么人使我产生过这样的感觉。不得不在一起工作，千方百计抑制自己，真是难受得很，但是我觉得，我现在忍受不了这个败类啦！”

接着他惊奇地耸一耸肩膀说：

“我没能把马林诺夫斯基这个坏蛋看透。这是一桩令人十分纳闷的事情，马林诺夫斯基……”

他对我的态度是一个严厉的教师和一个和善的“体贴入微的朋友”的态度。

“您是一个莫名其妙的人，”他开玩笑地向我说，“在文学上好象是一个优秀的现实主义者，而在对人的态度上却是一个浪漫主义者。您以为所有的人都是历史的牺牲品吗？我们了解历史，我们对那些牺牲品说：推翻祭坛，拆毁庙宇，打倒神灵！可是您想说服我，说什么工人阶级的战斗的党必须首先把知识分子安置得舒舒服服的。”

也许我错了，但是我觉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是喜欢同我谈话的。他几乎总是提议道：

“到这里来吧——打个电话，我们就可以见面。”

有一次他说：

“同您谈话总是很有趣的，您的见闻很广。”

他常常询问知识分子的情绪，尤其关心学者们，——那时候我和阿·巴·哈拉托夫一起在“学者生活改善委员会”工作。他对无产阶级文学很有兴趣：

“您对它有什么期望呢？”

我说我的期望很多，但我认为十分必要的是成立一个文学研究所，设立各种讲座：语言学、外国语（西方的和东方的）、民间文学、世界文学史以及俄罗斯文学史。

“唔一唔，”他说，眯起眼睛，哈哈大笑起来，“真是规模宏大而且光彩夺目！规模宏大——我并不反对，但是光彩夺目，会这样吗？我们在这方面没有自己的教授，而资产阶级教授们所教的又是那样的历史……不，目前我们不要提这个。还得等三五年。”

接着他诉起苦来：

“根本没有时间读书！”

他不止一次特别地强调杰米扬·别德内依作品的鼓动作用，但是他说：

“有点儿粗俗。他走在读者后面，可是他应该多少走在前面些。”

他对马雅可夫斯基是不信任的，甚至是气忿的：

“乱叫乱嚷，捏造一些离奇古怪的字眼，并且他写的全是不需要的，在我看来，——不需要而又难懂。一切都是不连贯的，难读得很。有才能吗？甚至有很大才能吗？唔一唔，我们瞧一瞧吧！您没有发现人们写了很多很多的诗吗？杂志上整页整页的都是诗，而且差不多每天都有诗集出版。”

我说，青年们醉心于诗歌，在这样的时候是很自然的，并且——依我看来——写平凡的诗比写优美的散文要容易些，而且写诗需要的时间要少些；除此之外，在写诗的技巧方面，我们有许许多多优秀教师。

“呃，诗比散文容易些，——我不相信！我不能想象。即使剥掉我的皮，我也写不出两行诗来。”他蹙着额头说，“应该把所有过去的革命文学推广到群众中去。不管是我们的还是欧洲的。”

他是一个长期住在外国的俄国人，他细心地注视着自己的国家，——从远处看来，这个国家显得更加绚丽多彩。他正确地估计了这个国家的潜力，即人民的特殊才能，这种才能表现得很微弱，还没有被艰辛而又沉闷的历史激发出来，但是在神奇的俄国生活的黑暗背景上却到处闪耀着金星般的光辉。

弗拉基米尔·列宁，这个世界的一位伟大的、真正的人物逝世了。他的去世对于那些知道他的人的心灵是一个非常沉重的打击，非常沉重啊！

但是死亡的黑影在全世界的眼睛里只是更加鲜明地强调了他的意义——作为世界劳动人民的领袖的意义。

即使憎恶他的乌云，围在他名字四周的造谣和诬蔑的乌云更加浓密，——那也是一样：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扑灭列宁在这个疯狂世界的令人窒息的黑暗里所擎起的火炬。

从来没有一个人象他一样真正值得全世界永久纪念。

弗拉基米尔·列宁逝世了。但他的理性和意志的继承者们却还活着。他们活着，而且正卓有成效地工作着，世界上还没有任何人在任何时候与任何地方象他们这样卓有成效地工作过。

载于《马·高尔基三十卷集》第17卷 1952年
莫斯科国家文学出版社版第5—46页

难忘的形象

尼·亚·谢马什柯

我第一次（然而只是短暂的一次）见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是1895年在莫斯科。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年头。与民粹派的斗争异常激烈。但那时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武装还很不够。就在这一年的年初，在莫斯科秘密出版了胶印版的《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一书，在这里列宁揭露了民粹派的真实面目——他们是人民的假朋友。这一年的年中，别尔托夫（即普列汉诺夫）的《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公开出版，这本书使整整一代的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受到了教育。

1895年秋天的一个傍晚，我被邀请去参加一次民粹派同马克思主义者的辩论会，“一位从彼得堡来的优秀的马克思主义者”将参加这次辩论。

我采取了通常的预防措施去参加这次秘密会议。会议是在一所豪华阔绰的住宅里进行的，在一个面积很大的会议室里摆着贵重的家具，旁边有几间稍小一点的书房。象通常在战斗开始前那样，在等待交锋（也在等这位“优秀的马克思主义者”到会）时前哨战已在进行。民粹派向我们进攻了。他们得到一位当时负有盛名的出色的激进派年轻律师马克拉柯夫（未来的立宪民主党首领）的大力支持。

“别尔托夫的著作不过是诽谤别人的攻击性小册子”，马克拉

柯夫激动地说。

我们一面等待着领袖的到来，一面进行自卫。

“优秀的马克思主义者”终于来了。但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没有应战。我看见他在旁边的一间书房里同站在他身旁的人们轻声交谈。显然，他到这里来不是为了同爱说漂亮话的自由主义者进行论战，而是想利用这一有利的秘密环境找他需要的人商谈十分重要的任务。

辩论会因此没有开成。

我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进一步熟悉是在1908年侨居日内瓦的时候。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

1907年初我侨居国外。日内瓦在当时对政治侨民来说算是最安全的地方，所以我也到那里去了。在不受监视的情况下我积极从事党的工作。但是，在一个倒霉的日子里，我突然被捕了。把我同干下流事的有流氓行为的刑事犯一起关在一个大牢房里。给我们吃的是漂着抹布线头的劣等饮料（称之为“汤”）和柞实茶（称之为“咖啡”）。我坐了一两个月的牢，还是不明白：我在俄国犯的政治“罪”，日内瓦当局何必要逮捕我。我没有触犯瑞士的法律，干吗要我坐牢呢？

到了第三个月，突然从狱外给我送来了三只桔子。这使我非常纳闷：难道没有别的好东西可送了吗！由于经常吃监牢里的这种“汤”和“咖啡”，我消瘦得厉害。应该给我送点面包、香肠来才是呀！现在却送来了三只桔子！怎么办呢，我就把这桔子吃了吧。当我把桔子掰开，从里面掉出一小块蜡纸来的时候，我是感到多么的惊奇啊！在桔子蒂部的皮里有个洞，皮很容易剥开，里面塞了一张纸条，然后仍旧把皮盖好。我把纸条摊开，上面写着：“别害怕，列宁来了，他来处理你的案件了。”

后来才弄清楚是这么一回事情。这以前，在传奇式的高加索

革命者卡莫的领导下在梯弗利斯对沙皇政府的钱财进行了大规模的剥夺。由于这次剥夺事件，在国外逮捕了一些革命者。有一个被捕的女同志是从日内瓦去的，她被关在慕尼黑。为了让同志们知道这件事，她决定在慕尼黑的监牢里给日内瓦写一封信。但是写给谁呢？看来，我的地址最可靠。信被截获了，所以把我关了起来。

当然，日内瓦的警察当局是清楚的，我同这次剥夺事件没有任何关系，因为我从来没有去过梯弗利斯。根据警察当局的记载，整整这一年我都在日内瓦。但是沙皇政府显然想抓住这个机会，要求把我引渡回国。由于我领导了1905年的下新城起义和索尔莫沃起义，还有以前的一些案件，当局想趁机同我算总账。而瑞士政府是很乐意把“剥夺者”交给沙皇政府的，因为瑞士资产阶级担心，“今天他们抢了沙皇和俄国资产阶级，明天就会轮到自己头上了。”很清楚，我有被引渡到沙皇政府的魔爪中去的危险，随后就是“根据各种罪行”判处绞刑。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进行了不寻常的活动，请了一位很有名望的瑞士律师（这位律师当时被提名为共和国总统的候选人）。他密切注意案情的发展。果然，没几天就提审我了。最后调查清楚，我没有参与梯弗利斯的剥夺活动，这样我就被释放了。

出狱的那天晚上，我得悉我们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小组会议正在进行，我就去参加。第一个鼓掌欢迎我的就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

列宁同志就这样救了我的命。

以后我曾不止一次地看到列宁对人们的这种关怀。对工人阶级的敌人来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是不可调和的敌人，但他对战友和共事的同志却异常关心和爱护。

侨居国外的绝大多数人生活十分艰苦，吃了上顿不知道下顿

吃什么。我们有一个互助储蓄会。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千方百计地给予资助。有时请他出去做报告，他把报告的收入捐给困难的同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工作十分繁重：要编辑报纸，要写文章，要在各种会议上发言，要与俄国通信，但他从不拒绝给广大听众作报告，而且报告的内容丰富，准备充分。如果发觉某个同志有了困难，他马上就去帮助，给他找工作。他曾多次这样帮助过我。

当他成了占地球上六分之一面积的国家的首脑后，这种对人的关怀就更加广泛地表现出来了。在国外干涉、饥馑、破坏时期，列宁在考虑“是否能打败敌人？”“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是否能坚持下去？”等重大问题时，他还是经常注意同志们的困难，及时给予帮助。他不仅帮助亲近的同志，而且帮助偶然碰到的普通劳动者和一般工作人员。

那些令人赞叹的事例一次又一次地在我的脑海中浮现。

歉收年景使农村经济遭到了损害。富农暗中破坏夺取丰收的斗争。粮食不足的状况严重地影响到整个国家的生活。当时的农民报纸《贫农报》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报告说，来了一位上了年纪的农民实验员切库诺夫，他一定要同“列宁本人”谈谈。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接见了切库诺夫。在谈到农业这样一个有关国家命运的最重要的问题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了解到来访者的眼镜坏了。在接见结束后，他便马上写了一张纸条给我（当时我是卫生人民委员），纸条上说：

“伊万·阿法纳西也维奇·切库诺夫同志正在我这里，他是一个很有风趣的劳动农民，他用自己的方式来宣传共产主义原理。

他把眼镜丢了，花一万五千卢布买了一副破烂货！能不能帮他弄到好眼镜？

务必请帮忙，并请您的秘书告诉我，是否办到了。”^①

这张纸条的内容和风格都有很大的教育意义：内容——说明列宁对平生第一次见面的劳动农民的关心；风格——“请您的秘书”……

1918年8月30日，这是个不幸的日子：社会革命党人谋刺了列宁。社会革命党的一个女党员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恶毒地打了几枪，一颗弹头留在他的颈部。子弹从后面打进去，离开颈部致命的血管和神经仅一两毫米，只是由于大血管（动脉和静脉）管壁的弹性才免于受到危害。但是敌人的子弹在血管旁边穿过后没有穿出皮肤，留在锁骨上面离表皮不太深的地方。

在1922年决定把这颗弹头取出来。先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作X光透视。具有典型意义的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别人是那样的关心，但很少考虑自己。那时，最好的透视设备在彼·彼·拉扎烈夫院士当所长的那个研究所里。大家决定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送到那儿去透视。

那时，彼·彼·拉扎烈夫正在从事库尔斯克地磁异常的研究，他很希望列宁能了解他的这项工作。大家知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本人也很重视这件事。

事前已经讲好，为了不使当时已经十分虚弱的列宁过分疲劳，拉扎烈夫的汇报不超过二十分钟。在墙上的一张标有钻探地点及各种记号的地图前面，拉扎烈夫院士开始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汇报了，但是他兴致勃勃，一下子讲了二十多分钟，还看不出他什么时候才能讲完。我给他打了个威吓性的手势，并使了个责难的脸色，但他还是继续往下讲。

那时我就想法打断他的汇报，但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仍然目不转睛地继续在听。等汇报完了，他还向拉扎烈夫院士提出了很

① 《列宁文稿》第8卷第450页。——编者注

多问题。他还要求每天把工作的进展和有什么需要等简况告诉他。从此以后，这项工作的进度就大大加快了。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是在波特金医院动手术取弹头的。事前对护理人员讲好，不要提出任何要求去打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护理人员自己当然也完全懂得这一点。然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不但在劳动人民提出请求的时候帮助他们，而且在隐瞒困难的时候也给予帮助。例如，他设法了解到护理他的女医士格烈什诺娃遭到了很大的不幸：她的女孩子生了结核病，但她不放心让病孩一个人去治疗，想要同孩子一起去。按照一般规定，是不允许父母留在儿童疗养院里的。于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给我写了条子要求给予格烈什诺娃帮助。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周围的工作人员常常得到他亲切的关怀。他们对他们的困难有深入的了解，要求他们爱护自己，注意休息和治疗。在那紧张的岁月里，不少同志不但不听医生的劝告，甚至也不执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指示。如果这样，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来个干脆：几天以后有关同志就收到一份中央委员会的决定——党的纪律谁都应当服从。

我想起这样一件事。有一次见面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我说：

“人家埋怨说，契切林（当时任外交人民委员）常在夜里十二点以后召开会议，一直开到四五点钟。您去同他谈谈，为什么他这样折磨自己，又折磨别人？”

我到契切林那儿，想让他明白一个简单的道理：夜里应该睡觉，工作白天干。但契切林是个与众不同的人，他力图证明，正是夜里，没有人妨碍的时候该工作，而白天则睡觉。他甚至援引了当时刚出版的关于鸡啼的新书，从科学上来加以论证。由于我有翻阅各种新出版的生物学著作的责任，所以这本书我不久前也看到

过。尽管我向契切林证明说，公鸡是按公鸡的生理习惯睡觉的，它在夜里两点“最兴奋”，但他还是坚持自己的意见。在下一次见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时我对他说：

“叫我对契切林怎么办呢？他在这件事情上显然有点神经失常。”

过了几天，我收到中央委员会的一份决定：送契切林，抄送我。禁止契切林在夜里一点以后召开部务会议。

费·亚·格蒂耶博士在那时是一位素负盛名的医生。他常给同志们看病。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一直到临终都是他治疗的。格蒂耶有工作职务，所以生活似乎是有保障的。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知道经常有人去麻烦这个老头儿，所以他在给我的一个纸条上写道：“关于格蒂耶本人。他不要钱。可是现在什么都得花钱。他在给很多人看病。是否可由中央委员会或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给他规定工资，每月多给一些？请以我的名义向中央委员会提出建议，并给我写封简短的回信。”^①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孩子特别关心和爱护，我甚至认为他相当疼爱。大家知道，根据列宁本人的倡议，颁布了一系列保护儿童的法令。特别是在饥荒的那几年里，颁布了保护儿童的重要法令。列宁批准了组织教育家和医生参加的特别法庭来审理儿童犯罪案件的法令，等等。

我还想起了侨居巴黎郊区时的许多日常生活情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常常骑自行车到我这儿来。那时我有两个孩子：男孩十岁，女孩十三岁。有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来的时候我不在家，他就等我。我回来时常看到这样的景象：男孩坐在他的一条腿上，女孩坐在他的另一条腿上，他们抱住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睁大了眼睛听他讲故事。我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能用这样简单明

^① 《列宁文稿》第9卷第735页。——编者注

了的语言，象朋友和老师一样给孩子们讲故事，感到惊讶。有时，在谈完了正经事以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对我的儿子说：“谢尔盖，来吧，把袖子卷起，我们来打一架。”于是我这个恬静的孩子真的卷起袖子，认真地摆开架势，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开起拳击来了。

还记得有这样一件事。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休息的日子里喜欢骑车外出呼吸新鲜空气。有一次在巴黎郊外，我们一起骑车外出。因为那天晚上他和我都有事，所以我们不打算骑得很远，只想骑十五——二十公里，到风景优美的“高堤”上去，从那里可以看到引人入胜的巴黎全貌。我的女孩子知道我们不远出，就一再要求把她带上。我担心会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带来麻烦，就不同意。女孩大哭起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则袒护她，尽管我多次反对，她还是跟我们一起去了。

论距离，这条路不算长，但一会儿上坡，一会儿下坡，走起来很费劲。

由于天气炎热，小女孩感到疲乏了。这使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很不安。尽管我再三安慰他说：“这孩子身体很棒，是个运动员，疲倦了休息一下就会好的。”但他还是一直照顾她。当时的情况是这样：尽管他热得浑身是汗，但他仍然不让女孩自己走上山去。他一只手推着自己的自行车，另一只手扶着她的自行车，汗水从脸上淌下来，他低下头来，在扶着两辆自行车的两只手的袖子上擦汗。当时我笑着要他别这样，他生气地回答说：“象你这样的父母，应该取消有孩子的资格。”

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一直对孩子们十分爱护。大家知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逝世前不久，在哥尔克他的家里还为农民的孩子们举办了松树晚会。那时候松树晚会还很少见。农民的孩子自然还是第一次见到这种点缀着各种闪闪发光

的小灯和礼物的松树，他们都高兴得蹦跳起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吩咐把他扶到大厅里（那时他已不能走动）。淘气的孩子们爬到他的膝上同他纠缠起来。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和玛丽亚·伊里尼奇娜虽然自己也是很喜欢孩子的，但还是想办法把孩子们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身边赶开。列宁虽然身患重病，头痛病不时地折磨着他，但他不让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和玛丽亚·伊里尼奇娜赶孩子，反而要孩子们更靠近他。

人民委员会的会议室是一间不大的狭长房间，这里有一只缩在墙里边的荷兰式炉子，天花板很低，根本不象是管理着占世界六分之一面积的大国的政府机关会议室。但是这种朴素的陈设同这个政府及其首脑——列宁同志的品格是极为相称的。

六时正（人民委员会的会议通常就在这开始时），主席坐的普通木圈椅后面的一扇门打开了，列宁同志从自己的办公室走了进来。全体人民委员也都已到齐——列宁是严格遵守工作纪律的。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把整个会议室环视一下，看看人民委员是否都已到齐；窗子、气窗或通风设备是否都已打开。他坐到会议桌旁边的圈椅上，低着头看文件，好象是用自己苏格拉底式的头顶的反射镜在剖析到会的每一个人的工作……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掌握会议的方法是值得大家学习的。

他注意会议的气氛，力求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他经常注意空气是否新鲜，会场是否肃静，讨论问题是否按程序进行，发言是否扼要具体。夏天开会时，他有时会坐在面向克里姆林宫大院的窗台上，以便呼吸新鲜空气。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坚决反对吸烟，开会的时候严禁吸烟。为了不使有些烟瘾大的人民委员经常跑出会议室去，允许他们在角落里的炉子旁边抽烟，让烟经过通风管排出室外。有时，两三个吸烟的人在角落里悄悄地谈起话来。

“炉边的蟑螂们，静一些！”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开着玩笑向他

们提出意见。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反对吸烟的态度在我的生活中引起了一桩笑话。有一次，他见到我时对我说：

“为什么您不开展反对吸烟的斗争呢？我支持您。”

我也是反对吸烟的，受到了列宁的这种鼓励，就发起进攻了。我采取的措施有：（1）文化教育方面——在报刊上开展反对吸烟的宣传，发动共青团和妇女部，禁止在公共场所吸烟等等；（2）国民经济方面——限制烟草的种植，削减烟叶的生产，减少烟叶的贸易额。最有意思的是被我叫来开会的经济部门（最高国民经济会议，农业人民委员部，商业人民委员部等）的代表吓得在我提出的全部提案上都签了字。但到了人民委员会的会议上大家都竭力反对我。各个经济部门的人民委员都攻击我。我看到经济部门的负责同志都不同意我的提案，于是我向列宁投出求助的目光。但他越发低下了头，俏皮地微笑着。就这样我的提案被经济部门的负责人否决了（其实是应该被否决的）。只有文化教育方面的法令得到了通过。后来我就埋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

“您为什么不支持我？”

“我的老弟，您做得太过火了！”他回答道。

人民委员会开会讨论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很少第一个发言（除非他是报告人）。显然，他不愿用自己的威信来压服大家。他总是等待别人发言。如果没有什么人想发言，他甚至点同志们的名：“某某同志对这一问题有什么想法？”而在总结的时候他令人信服地把争论的问题进行归纳，提出决议案。一般说来，这些决议案总是被一致通过或得到极大多数同志的赞同。

总的说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逻辑性是惊人的，反对他的论据是很难站得住脚的，因为他的道理异常简单明了，所以是无法驳倒的。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简单明了的逻辑性总是给听众以无法抗拒的影响。我记得1910年在巴黎时曾同无政府主义者进行过一次大辩论。主要的报告是我作的。我详细地分析了克鲁泡特金以及当时著名的西方无政府主义者的学说。在辩论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作了简短的发言。他明确而简要地指出，无政府主义者的“无政府论”是十分愚蠢、十分有害的胡言，资产阶级正是需要这种谬论，这样就可以镇压处于“无政府状态”中的工人，就可以扑灭他们的一切反抗；他还指出，工人则相反，需要把政权牢牢地夺到自己的手中，建立钢铁般的专政来镇压资产阶级的反抗，建设社会主义。我从听众的眼神里看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这些话是多么容易被人接受呀！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具有强烈的革命气质，他思路清晰，有一般人所没有的善于集中精力、聚精会神的本领。在一部电影里，他被描绘成办事有些忙乱的人。这不仅不符合事实，而且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强加了他最最讨厌的那些性格特点。

列宁在领导党和政府的工作中，象他的整个一生一样，最令人钦佩的是他的原则性。他在共青团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给道德下的定义，对他是非常合适的，他说：“我们的道德完全服从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利益。”^①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一生的每一个行动都完全服从社会主义的利益。

关于列宁关心人的问题我已经讲了。但这种对劳动人民的关心是同对无产阶级的敌人的异常憎恨密切联系的。

列宁十分尊重普列汉诺夫。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在回忆文章中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同普列汉诺夫最初几次谈话以后，几个晚上都没有睡着。我是普列汉诺夫的外甥，有一段时间

^① 《列宁全集》第31卷第258页。——编者注

我常到他那儿去(后来我们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就完全不见面了),我每次到他那儿去以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总要详细地问我,他讲些什么,他的身体怎样等等。同样,也是出于“完全服从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利益”,在普列汉诺夫背叛了工人阶级的事业以后,列宁抨击他,同他进行了殊死的斗争,把他从思想上消灭了。

列宁对待无产阶级的一切敌人都是这样。

我这里保存着列宁于1910年10月4日写的一封信。这是一张写给我的明信片。我不知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是否注意到了,明信片上所印的画面是有象征意义的。上面画的是罗纳河流入地下的地方;这条巨大的河流一下子全都流入地下而消失了,在地面上完全看不见,然后又喷着泡沫冲上地面,在水流经过的地方把一切都一扫而光,最后又平静地流入宽阔的河床。难道这不是我们党的象征吗?它于1905年以后被迫转入地下,过了十年后又冲出地面,在前进的道路上清除了沙皇制度和资本主义,它正迈着雄健的步伐向共产主义挺进!

列宁的身体是很结实的。他那矮壮的身材,结实的肩膀,短而有力的双臂,这一切都显示出他具有过人的力量。在可能范围内列宁是善于注意自己的健康的。这里所说的在可能范围之内是指他的十分繁重的工作允许的范围之内。他不喝酒,也不抽烟。他是个名副其实的体育家,他喜欢而且珍惜新鲜空气,喜爱散步、滑冰、骑自行车,他游泳游得很好。列宁在彼得堡监狱坐牢期间,每天做体操,经常在囚室里来回走动。侨居国外期间,在空闲的日子里,我们大家一起骑自行车到城外郊游。在苏维埃时期,他常坐汽车外出调剂精神。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如果没有钢铁般的强健身体就经不起由于社会革命党人行刺而受到的重伤。

伤势十分严重。子弹穿过胸膛,把大血管打坏了,胸腔里充满

了血液。打进颈部的弹头紧靠着致命的器官(颈动脉和静脉),所以在头几天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咳嗽时会喷出血来。可是只过了几天,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好转了,情绪也乐观起来。尽管医生一再提出必须暂停工作,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还是很早就开始工作了。对医生的责怪他笑着回答说:“顾虑过分了……”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最后一次发病是从微不足道的症状开始的:他起床时感到头昏,必须扶住旁边的一口橱才行。马上把医生找来了,起初他们没有重视这个症候。找来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看病的著名神经科医生达尔克舍维奇教授认为这是很普通的病(“过度疲劳”),他竟然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诉起苦来,说科学家的生活太艰苦,要自己把劈柴拖上楼去等等。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情绪变得忧郁和沉闷了。他预感到不幸即将发生,所以他对人家的安慰回答说:“不,这是预备铃”。

使全人类感到十分不幸的是,预感证实了。

随后就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生命缓慢地消逝的可怕日子。他的坚强的机体同严重的疾病展开了顽强的斗争。这场坚强的大脑同侵蚀它的动脉硬化症之间的斗争,在疾病史上是罕见的。

1923年1—2月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健康状况在向好的方面不稳定地发展。当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还能口授自己著名的政治著作。但到了3月9日,右半边的身体发生严重的麻痹症状,说话受到严重影响,这种症状立刻变为持久性的了。

5月中,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迁往哥尔克,他在那里一直呆到逝世。在7月里,他的病情又有好转。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一直保持着多吸新鲜空气的习惯。他常坐在推车里出去散步,还很乐意去采蘑菇。渐渐地,在旁人的扶助下他能够行走了。8月初起,他开始练习已经丧失的说话能力。到了10月份,他已能够借助手杖在房间里独立走动了。说话的能力

也在逐渐恢复。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那时还翻阅报纸，要别人把他指定的文章读给他听，并且很关心这些文章的内容。他用左手缓慢而艰难地写起字来。我上面已经提到，冬天列宁还参加了松树晚会。

坚强的机体在进行斗争。大家都希望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健康能不断恢复。

突然在1月21日晚上六时不幸降临了：疾病的恶性发作几乎持续了整整一个小时，他完全失去了知觉，全身肌肉极度紧张。体温达到四十二度三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没有再恢复知觉，溘然长逝了。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尸体解剖结果证明，他的脑血管早已硬化。死后的诊断书说，由于过度紧张的工作而引起血管硬化。值得注意的是心脏血管和其他部位的血管没有发现显著硬化的现象。就只是脑子，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思想器官由于过度疲劳而硬化了。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脑血管已经硬化到钙化的严重程度了：在解剖时用金属镊子敲击血管时好象敲在石头上一样。很多血管的管壁增厚了，血管完全栓塞，连一根头发也通不过。这样，新鲜血液就送不到大脑的各个部位，大脑一直缺乏营养。

所有参加解剖的医生都对眼前这种从未见过的现象感到惊奇：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大脑的这些重要部位发生了这样严重的病变，他怎么还能思考，还能口授含义深刻的出色的文章，还能关心政治。就连大脑的少数没有发生病变的部位也能产生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天才思想。

载于尼·谢马什柯：《难忘的形象》
1959年莫斯科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版

在捷里奥基和巴黎

塔·费·柳德文斯卡娅

1907年6月3日，即第二届国家杜马在彼得堡被解散、杜马内的社会民主党党团成员遭到逮捕的那一天，在我的工作地点敖德萨正在召开全市党的代表会议。党代会议的代表（包括我在内）全部被捕，并被遣送去流放。不久我回到了敖德萨，由于我不能在那里继续呆下去，所以敖德萨委员会就交给了我一个去彼得堡的接头地点。我的高兴的心情是很容易理解的，因为我将要在我们革命的工人阶级的先进队伍里工作了，也许我在那里还能见到列宁！

为了遵守地下工作的纪律，我到了彼得堡后，先到粮食出版社的一家书店去，这家书店座落在涅瓦大街上。书店给了我到利齐尧大街的一个私人诊所去的接头地点。^①同别的同志一样，我领到了去那里的证件以后，就装作病人到接头地点去了。我被领进办公室，那里坐着两位不认识的妇女。其中一位便同我攀谈起来。我向她讲了接头暗号，原来她就是布尔什维克维拉·鲁道佛夫娜·明仁斯卡娅。她接连向我提了几个问题。这时，另一个原来坐在靠窗的那个妇女向我走了过来，向我问好后就同我们一起攀谈起来。她就是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克鲁普斯卡娅。她详细

^① 把接头地点安排在医生那里，或在商店、工厂、诊疗所等地方是最保险的，因为去那里的人很多，不大会引起警察的注意。——塔·柳·注

询问了我的党的工作后，就告诉我哪里可以找到彼得堡布尔什维克委员会当时的书记叶甫盖尼·波波夫。

就在这一天，我领到了一张“可靠的证件”（写的不是我的姓名）和一本叫做《关于抵制第三届杜马》的小册子，上面载有弗·伊·列宁的《反对抵制》一文。我被委派为莫斯科区的组织员（当时区委书记叫组织员）。我奉命去跟纳尔瓦区党组织的一位领导人亚历山大·布伊科取得联系，同他一起进行第三届国家杜马选举期间的工作。

我第一次见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并聆听他讲话是1907年10月27日（11月9日）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圣彼得堡组织的代表会议上。会议地点在芬兰的一个小城镇捷里奥基。

我们是在白天到达捷里奥基的。那天秋寒袭人，细雨绵绵。同志们在离车站不远的地方等我们，他们根据约定的暗号辨认来开会的代表。我们每一个人在口袋里都带着一块有花边的蓝色餐巾，不时地拿出来当手帕用。来迎接的人向我们走来，我们就交换暗语，然后他们就谨慎地把我们送进要开会的那幢房子里去。这幢房子的光线不大好，象是间棚子。院子有两个进口（当然也是出口），警察出现时就用得上。

代表们是陆续到达的。他们有的在同熟人谈话，有的刚刚才相互认识。这里的气氛相当热烈。

我站在角落里同一位代表在谈话，这时有一个不认识的人向我们走来，他的身材不高，但体格健壮肩膀宽阔，穿着一件相当陈旧的深色大衣，给人的第一个印象是他是一位工人出身的职业革命家。他的目光锐利敏捷，这说明他是一个十分聪明、意志坚强的人。他的脸部表情严肃而又威武，使人不由自主地听从他的话。

这位陌生人同我攀谈后便向我提出一大堆问题。不一会儿他的个性特点立即对我产生了吸引力。锐利的目光，对我们所谈问

题的深切关心，待人真诚——这一切都说明他是可以信赖的。他问我在哪个区工作，我遇见的那些工人的思想情绪怎样，他们对国家杜马的态度如何，区里的选举运动搞得好不好，等等。突然，我脑海里产生了一个疑问：“同我谈话的人是谁？”

我不露声色地问道：

“您在哪里工作？”

我的交谈者没有直接回答，只是笑着说：

“就在这里。”

我问他列宁是否会来。他说：

“不知道。”他向我表示谢意后就去同别人攀谈了。

我心里有些惴惴不安起来，我责备自己：“第一次见面，什么情况都不了解，一下子就无保留地讲了这么多！”

时间在消逝，其他代表陆续到达了。我遇见了捷姆利亚奇卡同志，又同曾在—一个区工作过的维拉·斯卢茨卡娅谈了一阵，我力图通过与人交谈使自己安下心来，但是并不能如愿。我一想到“失言”的情况，做什么事都心神不定。

突然，会场上一阵骚动。代表们在轻声地相互转告：“离开这里”。警察当局已经获悉有关代表会议的情报，他们随时都有上门的可能。

在几乎是漆黑的夜晚，我们相继穿过陌生的树林，走进了一幢外表漂亮，但还没有全部建成，几乎完全没有屋顶的房子。寒风透过四周的隙缝向我们袭来。我们占用了两间相通的房间。—间坐着代表，另一间坐着主席团，里面放着一只高—高的小柜子当讲台。

会议开始了。主席宣布列宁同志作关于第三届国家杜马问题的报告。—股令人兴奋的暖流在会场上荡漾。

我激动地站了起来——马上要见到列宁了！我又坐下来后，看见同我在房间的角落里畅谈的那位不知姓名的同志向讲台走

去。这就是列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1907年秋天的社会政治形势作了明确的分析。伊里奇自问自答道：“为什么布尔什维克党要参加杜马？仅仅是为了使党团在杜马中高举社会民主党的旗帜，仅仅是为了使党团在杜马中同形形色色的反革命分子——从同盟者直到立宪民主党人——进行不调和的斗争，但绝对不是使党团支持‘左派’十月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①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大会上还作了关于社会民主党参加资产阶级报刊问题的报告。^②

除了这两个报告以外，列宁还就准备召开全俄代表会议的问题以及会议日程上的其他问题发了言。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报告和发言给我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语言淳朴、逻辑严密、条理清晰、信念坚定，这一切使人们感到十分钦佩。他的讲话感人肺腑，深入人心。他在讲话时，每一个人都感到好象是在对自己说话一样。

在休息的时候，我走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跟前对他说，在没有看到他作报告以前，我感到非常不安。当他听我解释不安的原因后，他高兴地笑着说：

“原来您是这样一个地下工作者！您怎么同一个陌生人谈起来了呢？”

“感觉给了我启示，我感觉到您是自己人。”

“噢哟哟！感觉到！您大概不知道，感觉会骗人的，不能凭感觉估计一个人。”他温厚地笑笑，责备我说。

* * *

1911年春，在坐牢和流放期满后，我来到了巴黎。过了几天，我

① 参见《列宁全集》第13卷第120页。——编者注

② 这两个报告的内容不久就在布尔什维克的《无产者报》上发表了（见《列宁全集》第13卷第123—126页）。——塔·柳·注

到玛丽·露丝街四号住宅去。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同他的忠实的生活伴侣、战友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克鲁普斯卡娅以及她的母亲伊丽莎白·瓦西里也夫娜一起住在这里的一个小套间里。

这个小家庭的生活对巴黎的小市民来说是个谜。生活极其简朴，家里十分清洁。尽管来访的客人很多，但一点也不显得吵闹、忙乱。

房间的面积很小，但由于室内的东西摆得十分整齐，所以并不显得很挤。普通的小铁床上铺着雪白的床单，在没有上过漆的桌子上整齐地放着几叠书，书的数量不少。舒适、清洁的厨房同时又用作餐室和会客室。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就在这里接待我，她给我开了门，看到我是从俄国来的布尔什维克，非常高兴。

过了一会儿，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从图书馆回来了。他问了我很多关于俄国的问题，要求我非常详细地讲述一切细节。

列宁有使每一个人都能畅所欲言的非凡本领。所以几分钟以后，我原先的那种胆怯和腼腆的心情完全消失了，我被他的纯朴的性格和对俄国的一切都有浓厚的兴趣吸引住了。我好象觉得我谈的有关彼得堡的新闻已经过时。虽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俄国发生的事件和各地党组织的工作比我们了解得更清楚，但是，我所谈的关于1908—1909年间彼得堡党组织的工作情况，不但使他很感兴趣，甚至引起他的激动。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想要了解一切，甚至想了解具体细节，如果这些细节有助于再现党的工作的情景，在那残酷的斯托雷平反动时期进行党的工作是特别困难的。他说：“没有无用的具体情况，这些情况都有作用”，他要我毫不遗漏地详细介绍。

他兴致勃勃地听我介绍：人们是怎样对待他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一书的，现在这一著作大家都知道，千百万人在学习

这部著作。当时，在这本书首次出版时，好象给敌人掷了一颗炸弹。这本书的问世推动了党内广大群众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础理论。

这本书一出版，布尔什维克地下党的积极分子和先进工人就如饥似渴地进行学习，他们中间有些人学得很好，敢于对马赫主义者进行有效的反击。列宁了解到这些情况后非常高兴。我提到了一些人的姓名：党的职业革命家、原普梯洛夫工厂工人亚历山大·布伊科，谢米扬尼科夫造船厂（现名列宁造船厂）的布尔什维克布勃列也夫，帕尔工厂的女工波丽娅和托伦顿工厂的女工克秀莎。在辩论哲学问题时，有些同志有时把那些持修正主义观点的知识分子驳得拿不出正当的论据来，于是这些知识分子只好采取粗鲁的欺骗手段。有一次，一个持孟什维克观点的工艺学院学生大声地说，现在被“指责”为马赫主义者的那些人在1905年革命时期曾发表过哲学言论；他说，当时“列宁本人”并没有同他们争论，而现在却反对起他们来了。我讲到这里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哈哈大笑地说：

“在革命紧张的时刻谁有时间同这些知识分子去辩论，去注意他们的哲学怪论呢！”

接着列宁就向我解释，为什么现在在这个政治思想反动的时期，同背离马克思主义的人和力图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搞唯心主义和各种宗教迷信的人进行坚决的不调和的斗争特别重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不能对工人的上层受反动思潮影响的危险性估计不足，必须打垮所有修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人。尔后，列宁的话题又回到了刚才讲的那件事上来，他满意地继续说道：

“这也能证明：在这样复杂的问题上工人能够明辨是非！他们凭着无产阶级的嗅觉懂得什么是打着‘纯科学’的幌子贩卖奴隶主思想的私货。”

我汇报了这几年彼得堡的党组织是怎样活动和怎样开展工作的，钻进党的领导机关的奸细怎样使一部分地下组织遭到了破坏，一些胆小鬼和不坚定分子是如何脱离党组织的。列宁对彼得堡党组织反对取消派和召回派的斗争特别注意。

为了确保涅瓦关卡外和全市各区的统一战线，在1908—1909年间成立了一个四人小组来领导这项工作。四人小组中两个是布尔什维克的代表，两个是孟什维克“护党派”（普列汉诺夫分子）的代表。四人小组的任务是：使动摇的工人脱离孟什维克取消派，在基层建立统一战线，利用合法组织争取工人群众。把盘踞在合法组织里的孟什维克取消派驱逐出去是四人小组的一项最重要的任务。我们布尔什维克用撤掉取消派职务的口号使他们陷于孤立，使合法组织成为联系地下党的纽带。

关于布尔什维克如何把瓦西里岛区的五金工会理事会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把孟什维克取消派撤换成布尔什维克；彼得堡失业工人工会如何开展社会工作，开办食堂，在物质上帮助工人，组织工人发表政治性演说，等等情况，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都听得十分仔细。当我汇报到孟什维克不接受我们的邀请，拒绝参加人民大学代表大会的我们工人代表团的的活动，而在投票时却同立宪民主党人搞在一起时，列宁说：“看他们堕落到何等地步！”列宁的这句话使我永世不忘。

召开全俄（第五次）党代表会议的准备工作的准备工作是在彼得堡的地下党组织很艰难的时刻进行的，那时彼得堡各区与取消派和召回派的斗争十分激烈。在涅瓦区召回派很多。尽管这样，在选举出席1908年12月举行的代表会议的代表时召回派只获得了少数。布尔什维克列宁派选出了布伊科同志为代表参加十二月全俄代表会议。

我关于彼得堡委员会的工作情况的汇报得到了列宁的赞扬，

他说，委员会在困难而复杂的条件下工作搞得不错。

我记得，在那些年里彼得堡的党组织一直是布尔什维克的起带头作用的组织之一。而布尔什维克党，正象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后来所说的那样：“就能以另一种不同的方式侵入敌人的堡垒，每日地、‘合法地’开始了从内部炸毁万恶的沙皇地主专制制度的工作。又稍过几年，布尔什维主义所组织的无产阶级革命就胜利了。”^①

在汇报完了彼得堡组织的情况后，我问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他是否听到过塔里诺耶糖厂罢工的事。

“没有，没有，”他马上回答说，“讲吧，请讲得详细点。”

在基辅省乌曼县的塔里诺耶这个地方，有个将近五百工人的糖厂，这是当地唯一的大企业。那个地方其余的工人是些缝衣匠、皮匠、木匠，他们在属于小业主所有的手工工场里干活。这些工人遭受特别残酷的剥削。

我们成功地组织了两次罢工。第一次罢工几乎所有的手工工场的工人都参加了。后来，糖厂的工人也参加了罢工的行列，从而形成了总罢工。工人的要求是：改善劳动条件，提高工资，缩短星期六的劳动时间。经过了十天的斗争，我们的罢工取得了胜利。

列宁先是坐着听我讲的，到后来就站了起来，在房间内很快地踱来踱去。

“这很好，这很好，”他重复说了好几次。

甚至偏僻地方的工人也举行了罢工，这再一次证明了列宁提出的这个时期的特点是正确的。大家知道，他早在1910年10月就写道：反动势力开始走下坡路，新的革命高涨时期到来了。

我们的谈话要结束了，离别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看着我俏

^① 《列宁全集》第33卷第312页。——编者注

皮地说道：“您说巴黎使您感到惊奇？而我却认为您使巴黎感到惊奇！”他善意地笑着对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说：“请看看我们这位巴黎妇女！”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这样不知不觉地给我上了一堂秘密工作课。由于缺乏经验，我并没有注意自己的外表，我当时的打扮对一个不想引起沙皇密探（在巴黎他们到处都有）注意的人来说是完全不相称的。我穿着又长又大的连衫裙，袖子的样子很豪华（而那时流行的是短小的紧身短袖连衫裙），还带了一顶过时的宽边帽子，而且还有两条长辫子，这是一般巴黎妇女无论如何也不会留的。

我到巴黎后马上就同党组织——布尔什维克巴黎支部取得了联系。那时我们这个支部就是在弗·伊·列宁的直接领导下进行工作的。

在我到达巴黎后不久，在一次支部会议上举行了支部委员会的选举。列宁出席了这次会议。他对党的领导机构的选举十分重视。在候选人提名前他讲了话，他说，在选举委员会时主要应考虑选举那些同国内的实际工作有联系的同志，要选举在这一工作中有经验的同志，选举那些了解国内工人状况，能给支部的工作带来生气，而不是准备长期侨居国外的人。

我们的一切活动都由列宁领导，他在巴黎的条件下培养我们，使我们熟悉国内的地下工作，如他经常所说的那样，要为新的革命作好准备，为迎接胜利作好准备。

在巴黎支部中也象在国内一样，有些人实际上是在为取消派和召回派辩护。调和派分子认为，同取消派作斗争似乎不必把他们从党内驱逐出去。而列宁的坚定不移的方针是把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者全部清除出党。他认为，我们巴黎支部也绝对必须把他们清除出去。

我记得在哥白林大街的图书馆里开过一次支部会议，讨论取消派和调和派的问题。列宁在向具有调和派倾向的支部成员作说服工作时说道：

“取消派要取消党。我们则要取消取消派。你们是拥护党还是想同取消派站在一起反对党？是拥护斯托雷平制度，拥护专制制度，还是反对它们？要么站在党一边，要么站在取消派一边，第三种可能是没有的，搞调和折中是不可能的。不应根据个人好恶，而应按照原则来解决问题。”

列宁这样提出问题使调和派分子无地自容。根据这一讲话的精神列宁提出了决议案。在提交决议案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大声说道：

“这是一个谁都不会投反对票的决议案！愿意站在党一边打击专制制度的人不可能不赞成这一决议案。这就是我建议的团结的基础。谁不同我们站在一起，谁就是反对党。”

列宁的目的很明确：分化调和派。这个目的是达到了。原来属于这一派的几个工人脱离了调和派，回到了列宁的立场上来。经过激烈的争论，列宁提出的决议案被通过了。死硬的不可救药的调和派分子从巴黎支部中被开除出去了。支部的人数明显地减少了。

列宁对机会主义者采取的这种果断的不调和的措施使某些同志感到不安。有一位同志对列宁说：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您干吗把他们都从支部中赶出去？我们以后同谁一起工作？”

列宁笑着回答说：

“我们用不着混乱，就算我们现在人少了，但我们的行动可以一致了，有觉悟的工人就会支持我们，因为我们的道路是正确的。”

但应该说，列宁的严格的不调和态度却从来都没有使这些同

志产生委屈情绪。当敌对的思想要造成错误的时候，当对问题缺乏认识要酿成错误的时候，他总是能预见到。于是他就耐心地向这些同志解释他们的错误和糊涂观念。他知道经过这样的“批评”以后需要对他们说些鼓励的话，以促使他们进一步搞好工作。他总是能找到恰当的鼓励的话对他们说，什么事情做得很好，值得赞扬。他带着笑容进行的表扬使我们很受鼓舞，使我们获得新的力量。

列宁对敌人冷酷无情，对同志和朋友关怀备至。他的全部思想集中在一个目标上：在俄国开展政治工作，造就一代在斗争中坚定不移，对马克思主义的敌人和形形色色的不坚定思想毫不妥协的工人领袖人物。列宁教导我们，对同志的所作所为要坚持原则，要开诚布公。如果有人背叛了共同的事业，列宁就毫不犹豫地同他决裂。

1909—1912年在巴黎期间，列宁一方面时刻关注着俄国，另一方面又在认真地研究法国的工人运动。他也要求我们巴黎支部的成员积极参与法国的政治生活。所以我们支部的成员都学习法语，研究法国和其他西欧国家的革命运动史，出席工人的会议，参加工会活动，对巴黎工人组织的各种政治措施给以支持。我们支部的成员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印涅萨·阿尔曼德、绥·伊·霍普纳尔等人都在法国的男女工人中间积极开展工作。

为了印刷书刊，我们迫切需要资金。我们用组织讲演、报告，发售彩票，举办晚会等办法筹措款项。曾经委派我组织过一次这样性质的晚会。我去找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商量。我们一起研究晚会的节目单。当我们在房间里正谈得起劲的时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走了进来。他听我们谈了一会儿，当我们对是否要设立茶点部这个问题（带有筹集资金的性质）发生争论时，他笑着说：

“计划不但应该考虑到商业方面，而且还应该考虑到思想性方面。节目单应该包含宣传鼓动的成分。把蒙台居斯请来，他就会把听众吸引过来，他就可以进行宣传鼓动工作。”

他的建议再好也没有了。蒙台居斯是个巴黎公社战士的儿子，一段时期以来，他忠于自己家庭的革命传统。他轻而易举地编写了歌词，选择了合适的乐曲，这个乐曲也可能是他自己创作的。他常在大众化的剧场里演唱自己的歌曲，有时还在工人住宅区的小酒馆里演出。法国有句谚语说：“笑声能感染人。”贫苦的人民在蒙台居斯的风趣的歌声中找到了精神上的安慰，他们把这种歌声当作对饱食终日的剥削者的一种未来的报复。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总是怀着愉快的心情欣赏蒙台居斯的演唱。

我们的晚会在拉丁区丹顿纳街八号住宅里的一个大厅里举行。我们常在这里会面。列宁曾在这里作过关于列甫·托尔斯泰的著名报告。1911年10月，就在这个大厅里他还作了《斯托雷平和革命》的报告。在音乐晚会上，蒙台居斯在演唱的时候，列宁有时轻轻地和着他一起唱。

晚会结束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没有马上离开。我看见他坐在桌子旁，兴致勃勃地在同蒙台居斯谈话。他向蒙台居斯描绘了一幅即将到来的世界革命的图景。我们的同志围在他俩身旁。我从来没有见到过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象那天晚上这样谈吐幽默、心情愉快、情绪活跃。

载于《回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第1卷1956年莫斯科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版第465—474页

弗·伊·列宁在巴黎

绥·伊·霍普纳尔

1910年夏末，在敖德萨和叶卡特林诺斯拉夫遭到重大“挫折”以后，在作了无数次的努力，以求在俄国继续开展党的地下工作以后，我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离开俄国。我智胜了警察当局，取得了出国护照。9月间，我来到了巴黎。

我摆脱了警察当局的压力和沙皇保安机关的“千里眼”，刚刚感到由此产生的一点轻松愉快，但马上又惘然若失了。早在国内的时候，我就听说侨居生活是很艰难的，这一说法又在我脑海中出现了。使我感到不安的是：在这里谁需要我？我能做些什么？能够找到谋生的工作吗？

在1905—1907年革命失败后的那几年，巴黎是俄国政治侨民的最大集中地之一。逃避审判和监狱的革命者以及从沙皇的劳役地和流放地逃离的革命者大量来到这里。大部分侨民的生活十分困难。

那几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也住在巴黎。我很想去见他，但又感到列宁对我的拜访是不会感兴趣的，再说我似乎并没有什么新闻可以告诉他。

我到巴黎后的第二天，在街上碰到一位同志，他打消了我的顾虑。他对我的犹豫感到生气，他说：“娜塔莎（这是我的党内化名），您怎么不明白，伊里奇是多么渴望会见每一个刚从俄国来的人

啊！”事实的确如此，很快我就相信了，对列宁来说，会见刚从俄国到来的人是获得祖国的新闻来源之一。列宁虽然远离祖国，但他在思想上和政治上依然领导着我们俄国的地下党，他经常大量阅读俄国的报刊杂志，与党内同志保持着频繁的通信联系。

我从街上碰见的那位同志那里，了解到布尔什维克巴黎小组最近一次会议的地点、日期和时间。这次会议是在一家咖啡馆的楼上小房间里召开的，在那里我马上就见到了列宁。他坐在角落里，低着头在下棋。我不是根据画像认出他的，当时由于秘密工作的条件，列宁的画像什么地方都见不着。我之所以能把他认出来，因为1907年在芬兰我曾见过他，听过他的演说。见过他一次，第二次就不会认不出来。我们每一个人的智慧、心情和注意力都同我们天才的导师和领袖紧紧地联结在一起，他的与众不同的特点永远铭印在我们的心头。

会上讨论了几个一般性的时事问题。列宁发了言，他的讲话不超过五——八分钟时间。那是四十五年以前的事，非常遗憾，他的发言内容我已经记不得了。但使我永远不能忘怀的是，他的发言使我当时的自我感觉起了根本的变化。我精神上和肉体上的疲劳一下子完全消失了，似乎有大病初愈的感觉。

会议结束的时候，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克鲁普斯卡娅走到我跟前，用友善的责备口吻对我说：“您就是那位不愿意到我们那里去的娜塔莎！伊里奇却要我无论如何把您请去。明天晚上八点钟请您到我们那里去。”

在约定的时间，我走近了玛丽·露丝街四号住宅。记得我当时非常激动，甚至那时还不知道我能告诉列宁哪些党内新闻。

我被直接带到“会客室”，这是一间小小的厨房，在煤气灶的对面，靠近墙壁的地方，放着一张不大的长桌，上面铺着漆布。这个“会客室”同时又是“餐室”。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娜捷施达·康

斯坦丁诺夫娜和她年老的母亲就请我在这里喝晚茶和吃便饭。

当时我还是不知道该从哪里讲起。但是，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讲了几句话以后，当他刚提了几个问题以后，我对近几个月来在俄国经历的事一下子就有了新的看法。我自己对向列宁汇报的内容也产生了新的兴趣，深深地感到我的汇报是有益的。产生这一变化的原因是由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十分注意地听取我的汇报。列宁用不多的，很谨慎的问题使我不知不觉地继续讲下去，不让我草草结束汇报。我越讲越起劲，我汇报了1909年和1910年在敖德萨、尼古拉也夫和叶卡特林诺斯拉夫等地发生的许多事情：在敖德萨试办党的机关刊物，警察袭击印刷所，在叶卡特林诺斯拉夫也试办类似的刊物，地下小组的工作，打入保安机关暗探小组的情况，几次逮捕的情形，以及布尔什维克敖德萨委员会目前的诉讼案等等。

这天晚上，我第一次感到在列宁身上有一种能博得人们信任的力量。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不少同时代人在他们的回忆录里都特别讲到善于听取别人汇报的这一特点。列宁十分注意地听取汇报和提出为数不多的问题，这就能使汇报人受到鼓舞和感到兴奋。列宁的这一特点成了布尔什维克的一个优良传统。善于听取他人的汇报，这不仅是更好地了解各种问题的手段，而且也是了解人的最好的方法，是教育他们的良好的辅助手段，能使他们在政治思想上得到提高，同时使他们在党的工作中更好地发挥作用。

谈话结束时，我深深地感到：即使在这里，在侨居中，我对党还是有用的。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建议把我的汇报内容为党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当时这份报纸在巴黎出版，秘密运往俄国）写一篇简短的通讯时，我特别感到鼓舞。我的这篇通讯写好后刊登在《工人报》第一号上。

在这次会见中，我看到列宁是随时随地严格执行计划的典范。

开初，我问列宁他能会见我多少时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回答说：“时间有的是，可以把谈话的时间和喝茶的时间合在一起，我们可以有一至一个半小时。”可是我越讲越起劲，简直忘记了时间。列宁突然看了一下表；显然，预定的时间过去了。我匆匆忙忙地结束了我的汇报。列宁听完了我的汇报，很快地从桌上拿起没有喝完的茶，再一次提醒我写一篇通讯，然后和蔼地同我告别，回到自己的工作室里去了。有人在回忆录里把这个工作室称作“办公室”，其实它根本不象办公室。靠墙放着几只没有上漆的书架，工作室的中间放着一张长长的桌子，也没有上漆，上面铺着纸，桌上堆满了报纸。还有二三只旧的很不值钱的椅子。这就是他的“办公室”的全部摆设。

过了许多年以后，在《列宁全集》出版以后，我们才真正知道，在那些年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理论上、政治上和组织上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就在那时，在巴黎的时候，我们大家都已经知道列宁非常珍惜时间，不能白白浪费他一分钟。

但是当同志有困难需要帮助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总是能挤出时间来的。有一天，我深夜回来的时候，看到一张便条，上面说，昨天晚上有人在列宁那儿谈起了生病的库尔纳托夫斯基同志的困难处境，说决定把他从原来的医院转到另一家医院去。条子上说要我代表列宁去找我的一个熟人——一位有名的法国外科医生，请他帮忙设法办理转院事宜。便条上最后还说，列宁要我告诉他，我什么时候去找以及商谈的结果。同这位外科医生通了电话以后，我告诉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已同医生约好在第二天中午十二点见面。就在这天晚上，有人给我送来便条说，列宁想同我一起去，他将于上午十一时到我这里来。

我知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是很准时的，所以在预定的时间我留心注意门铃声。突然，我听到楼梯上有声音，我马上就去开

门。是列宁来了。他一步跨两级地很快登上六楼，还轻声地哼着一个什么曲子。那时他已四十岁了，但还是那样朝气蓬勃，精力充沛。

我还记得那次会见的另一个细节。在我家的墙上挂着一张艺术明信片，这是巡回展览派艺术家作品的复制品，列宁专心地欣赏了这幅画，然后轻轻地说：“巡回展览派艺术家们的这些画把俄罗斯的生活反映得多么逼真啊……”就是由于列宁的这句话，我才把这张明信片珍藏起来。这是艺术家波格丹诺夫的名画《战友们》的复制品。

我们简单地商量了一下同外科医生商谈的主要内容后，就乘地铁到巴黎城的另一端去。路上往返连同与医生商谈一共花了两个小时。两个小时对列宁来说意味着什么，这只有直接了解他的工作的人才能理解。

列宁对同志关怀备至而又严格要求，但他更是严于律己。列宁自己的表率作用，他的严格要求和巨大影响保护了在国外的布尔什维克干部免受白色侨民的腐朽影响。我们的大多数同志对被迫的失业和极端困难的物质条件都能沉着地应付。我们布尔什维克的成员都满腔热情地完成党交给的各项任务，包括最小的最繁琐的事务性工作。为了给党的机关刊物筹措经费，我们常组织晚会，有时还组织演出。列宁自己虽然没有出席晚会，但他对这件事是赞同的，因为它能为党筹集经费。但是在同我们这些组织者交谈时，他强调指出，我们必须负责使晚会的娱乐活动符合文明的要求，决不允许损害我们党员的尊严。有一次我们把高尔基的剧本《怪人》搬上舞台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也来观看演出了。

记得我刚从外面走进“休息室”，看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同我党的老同志德·科特利亚连科手拉着手在观众中出现时，我感到十分惊喜。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向我祝贺，他对我们演出高尔

基的剧本表示高兴和赞同，他说，要沿着这条路继续走下去，把文化工作与为党筹措经费结合起来，虽然他也知道，排演一个象样的剧本我们要克服多大的困难。

布尔什维克侨民不想加重侨民互助储金会的负担（顺便说一下，这个储金会经常是没有钱的），他们努力寻找工作，不管什么工作他们都做：教课，翻译，打字，搬运家具，洗刷汽车等。甚至连掌握扎实的专业知识的一些同志生活也十分困难。例如，我们的同志中有两位是国内很有名的医生，这两家的生活就很困难。这里说的是已经去世的老布尔什维克尼·亚·谢马什柯和米·费·弗拉基米尔斯基。后者有一个时期靠每天早晨五点钟起分送牛奶来维持生活（俄国的医生文凭在法国得不到承认）。布尔什维克中的熟练工人可以找到工作，但是他们往往因为不懂法语而受影响。

列宁在巴黎常同大家接触，这对生活在艰苦条件下的同志们能保持布尔什维克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起了巨大的作用。这就是为什么在1912年夏天当我们听说列宁要离开巴黎的消息后大家都感到闷闷不乐的原因，但是当我们知道列宁迁往离俄国边境更近的地方时，大家还是很高兴的。

布尔什维克小组的健康的政治道德面貌与巴黎的其他侨民团体有着明显的区别。有一次，社会革命党的一位知名党员对我说：“为什么你们布尔什维克与其他所有党派不同？碰到你们的时候，就会使人感到，你们有一种特别的内在的东西，你们特别团结，你们有一个特殊的世界。”

是呀，我们有一个特殊的世界。这是布尔什维克党的世界。我们在准备新的革命。尽管革命的地下工作条件很艰苦，但党在俄国已形成一支强大的力量，未来是属于它的。布尔什维克的“特殊的世界”就是我党为新的革命而进行的从未停止过的斗争生活。

布尔什维克深信革命不可避免，深信革命即将来临，这就是布尔什维克与其他所有侨民团体的区别。

* * *

列宁具有高度的乐观主义精神，他对即将来临的新的俄国革命怀有不可动摇的信念，这一切在我们第一次见面时（当时新的革命高潮还没有明显的迹象）就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在交谈中，我列举了一些有关反动势力猖獗、警察当局加强恐怖的事实。但列宁认为这并不说明他们有力量，而认为这是反动势力在工人的积极斗争面前，在我们的地下党面前虚弱和恐惧的表现。关于这些，列宁只在我汇报时简单地插了二三句，但是这些插话证明，他坚信：反动统治是不稳固的，反动派的失败已为期不远了。

在这次见面后不久，马上就召开了巴黎布尔什维克的党组织会议，讨论列宁关于《工人报》的报告，这份报纸的创刊号在两星期后就出版了。

列宁在报告中谈到，总的形势是出现了工人运动和社会民主党的严重危机。他反对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主义的其他敌对分子对党内危机的庸俗解释，号召大家研究党内斗争的阶级根源。面对严酷的现实列宁毫不畏惧。他介绍了一些党组织瓦解的情况，并强调指出，思想上的动摇不仅在布尔什维克的队伍以外存在，在某些布尔什维克身上也存在；他还认为，甚至在某些先进工人中间也出现了消极冷淡和灰心丧气的现象。

与此同时，列宁的报告充满着深刻的乐观主义和策略上的现实主义相结合的革命精神。整个报告贯串着两个思想：（1）使国家和劳动群众摆脱困境的唯一办法，是走革命的道路，而不能象孟什维克和其他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所鼓吹的那样走“立宪”的道路；（2）新出现的形势是，工人阶级队伍中已开始出现自己的能干的领袖，他们将担负起恢复党的团结的任务。列宁认为，只要把

在两条战线上——反对取消派（从右的方面）和反对召回派（从左的方面）——进行不调和的斗争的一切人们团结起来，党的危机就能克服。普列汉诺夫及其追随者当时也把开展反对取消派和召回派的斗争当作首要任务，列宁对布尔什维克同他们开始接近表示满意。

会议开得很激烈。两个调和派分子叫嚷说，布尔什维克和普列汉诺夫分子创办了新的报纸，没有让孟什维克取消派和召回派参加，似乎这就会加深分裂。他们还反对由于布尔什维克的代表退出了托洛茨基的报纸的编辑部而造成的与托洛茨基决裂的局面。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第二次发言时又一次尖锐地批判了无原则的联合，他称之为“调和主义的胡说”。他说，工人会理解我们的，现在我们人是少一些，但是如果我们把自已的彻底的马克思主义革命立场坚持到底，以后人会多的。

会议开始按照列宁的思想继续进行。

我想讲一下列宁给党的巴黎布尔什维克小组成员的一封信的事（可惜这封信至今没有找到），来说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高度原则性和待人的深厚感情。

就在我同列宁在巴黎几次见面的那段时间里，我们同孟什维克的决裂已到了如此彻底的地步，以致我们布尔什维克已经不跟孟什维克参加同一个会议了。然而，我们在中央委员会国外局里的代表还得与孟什维克代表就全党的资金和党的其他财产的分配问题进行谈判。由于孟什维克突然提出了一个协议条件：要求布尔什维克同意参加共同辩论党内情况的另一次会议，几乎已经达成的协议遭到了破坏。孟什维克还坚持要求列宁本人参加辩论会。由于布尔什维克代表希望尽早达成协议，在没有取得列宁同意的情况下，就草率地答应了这一要求。

这个问题提到布尔什维克巴黎小组召开的紧急会议上研究。列宁反对在侨居国外的情况下与孟什维克举行任何新的辩论，并坚决表示拒绝出席这样的会议，理由是这种辩论是无用的，甚至是有害的。

在赞成参加辩论的人发言以后，列宁再次表示拒绝参加这种辩论，接着就退席了。

他的退席使参加会议的人感到十分窘迫。我们不知道怎么办。一部分人离开了会场。留下来的人决定派两位同志到列宁家里去商量解决办法。

当从娜·康·克鲁普斯卡娅那儿了解到列宁并没有回家，同志们感到有些担心了，但想到列宁在思考问题时常常习惯于一个人散步，于是我们就在他住的玛丽·露丝街上等他。不久，列宁以敏捷的步伐向自己的住宅走来。他很激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突然看到同志们，感到很高兴，虽然已经很晚了，但他还是把同志们请到家里，于是就开始讨论起形势来了。列宁再次重申他的理由，同志们的疑虑终于打消了。

但是列宁并不认为问题已经全部解决。他想把巴黎小组中相当一部分人之间争论所产生的痕迹全部消除掉。为此，列宁给小组成员写了一封信，详细解释他自己的观点。

这一点充分说明了列宁对待集体，对待党内同志们的态度。巴黎小组的成员中虽然有一定数量的第一次俄国革命的参加者，但这个小组毕竟是布尔什维克的一个地方组织。即使对待这样一个地方组织，列宁也不认为可以无视它的部分成员的思想情绪。他亲自拟定了一张名单，根据他的意见，他的信应该让名单上的同志们传阅。

我把他的信看了两三遍，把信的内容几乎逐字逐句地牢牢记在脑海里。

列宁在信的一开头就指出，任何破坏纪律的行为都是破坏党的滔天罪行，不允许不按大多数人的意志办事。但是他不得不坚持自己的意见，因为他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坚信自己是正确的。列宁清楚地回忆了在侨民中进行毫无成效的辩论的历史，这种辩论同在俄国国内工人中辩论是有区别的。在国内，特别是在工厂里，在吸烟室里和其他僻静的角落里，很多非党工人都很仔细地倾听布尔什维克同孟什维克之间的辩论。这种辩论有助于他们在政治上得到提高，帮助他们确定自己的立场，走上革命的道路。而在国外，参加会议的一般是各派的人，他们对争论的问题早已了如指掌，他们的立场早已确定，在这里你不可能说服任何人。至于原则性的争论我们可在党的刊物上进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指出，我们不能把精力浪费在空谈上。必须爱惜精力，积累知识，研究历史教训，准备迎接新的革命高潮。革命即将到来，它要求我们更加善于斗争，避免过去的错误。

列宁的这封信影响非常大。引起这一事件的问题不必再讨论了。我们大家都更加深刻地懂得列宁是完全正确的，我们擦亮了眼睛，认清了现实，也看清了我们在这种现实面前所处的地位。由于这封信的影响，我们大家都感到心情舒畅。

1910年12月，由于夏季罢工，由于托尔斯泰逝世举行了游行，为此列宁指出：“俄国人民正在苏醒过来投入新的斗争，迎接新的革命。”^①

从1905年革命开始的头几天起，特别是在革命遭到失败以后，列宁一直仔细研究这次革命的经验，总结它的教训，他在法国和瑞士等大城市的群众大会上发表演说时，就革命的一些最重要的问题作出了自己的结论。由这些地方的布尔什维克组织举办的

^① 《列宁全集》第16卷第356—357页。——编者注

报告会，吸引了许多侨居国外的属于革命政党的和反对派政党的听众。

同对新的革命丧失了一切信心的人相反，列宁满怀信心地指出，新的革命不仅一定会到来，而且它很快就会到来。工人和农民在第一次革命时期提出的问题，包括土地问题，八小时工作日问题，民主共和国问题等，一个也没有得到解决。因此爆发第一次革命的重要因素没有消除，它们还在继续起作用，这些因素不能不导致新的革命。必须为迎接新的革命做好准备。列宁还认为，第二次革命并不是第一次革命的简单重复，而是在新的急剧变化了的条件下的进一步发展。

在这些年里，列宁积极投身于国际范围内的工人运动。他不仅研究俄国的形势，而且研究世界形势。国际上革命派对俄国第一次革命的反响，特别是在土耳其、波斯和中国发生的革命，列宁都给予密切的注意，这些反响和革命事件都是他所提出的新的革命即将来临的天才论断的依据。这些论点，他在保尔·拉法格和劳拉·拉法格的葬礼上发表的演说词中发挥得特别明显。

从列宁的著作中以及从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写的回忆文章中，我们知道列宁对拉法格是十分尊敬的。列宁当时对法国社会党人的首领们采取了批判的态度，在这样的背景下，这种尊敬就显得特别突出。虽然在战前时期还很难预见到法国社会党的首领们将普遍地转向社会沙文主义的立场，当时列宁还没有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那样把他们斥之为叛徒，但列宁同这些首领之间的关系疏远是一眼就能看出来的。

有一次，列宁在侨民图书馆（在戈别连大街）举行的会议上做完报告后，我问他是不是常与法国社会党的领导人见面。列宁说：“不，我和他们没有共同的语言。”我问他是否参加他们的理论辩论会，列宁回答说：“社会科学应该在德国研究，在法国得到高度发展

的是自然科学。”

保尔·拉法格和劳拉·拉法格的自杀，以及拉法格的诚挚的遗书^①，给一切信仰社会主义的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不知是两位还是三位同志专门就这一自杀事件与列宁谈了一次，在拉法格夫妇的葬礼以后，他们给我们转述了谈话的情况。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同我们的同志谈话时讲了这样的想法：一个社会党人不是属于自己的，而是属于党的。如果他还能能为工人阶级做哪怕一点点有益的事，哪怕是写一篇文章或一份呼吁书，他就没有权利自杀。列宁又说，不要忘记，在写作力量方面工人阶级的政党要比资产阶级政党弱得多。

葬礼前的一天，《人道报》登了一个通告说，准备在拉法格夫妇的葬礼上发表演说的各党派组织的代表，必须在前一天向《人道报》编辑部提出。晚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亲自到《人道报》编辑部去，但是直到深夜，而且还费了很大的劲才走到那里提出了申请，因为编辑部前面的大街上挤满了人群。

送葬的那一天，数万名法国无产者高举红旗尾随两口棺木，向拉雪兹神父墓地进发。火葬场的大厅里无法容纳全体人群，追悼会只得就在殡仪大楼前面的露天广场上举行。

在几位代表发言以后，列宁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驻国际社会党执行局代表的身份发表演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是用法语讲的。他的讲话很短，但内容极其深刻。他开头对拉法格讲的几句话，表达了俄国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向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最有天才、最渊博的宣传家之一拉法格的敬意。

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讲到，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旗帜下“俄国工人的先进队伍团结起来了，用自己的有组织的群众斗争打击

^① 这封遗书刊登在布尔什维克的《明星报》12月份的某一号上。——绥·霍·注

了专制制度，不顾自由资产阶级的动摇背叛，过去坚持了现在也坚持着社会主义事业、革命事业、民主主义事业。”^①这段话表达了一个伟大的革命者、一个炽热的爱国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的心声。列宁在讲这段话时，甚至引人注目地挺直了身子，他的整个体态表示了他为俄国工人阶级而感到鼓舞和骄傲。

列宁的那段话就好象是昨天说的，他说，俄国革命“揭开了全亚洲的民主主义革命的时代，现在有八亿人参加了整个文明世界的民主主义运动。”^②

列宁的演说没有送葬时通常有的那种消沉情绪，而是充满着伟大的战斗即将来临的朝气蓬勃的预言。

这些历史性的战斗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高潮的这一变化了的形势下发生的。第二次俄国革命的战斗开始了，在最黑暗的反动年代里，是列宁预见到它的到来。

在1910—1912年间，列宁的全部期望，他的全副饱满的精力都用来迎接第二次俄国革命这一最近的目标。列宁把1917年2月的胜利只看作第一步。从这一胜利的第一天起，他的全部智慧，他的非凡的力量都用来迎接他所领导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那时他的名字在全世界工人中已经尽人皆知了。现在，当我们伟大的党在十月革命开辟的崭新的强大的基础上满怀信心地走向共产主义的时候，我们都感觉到，都知道，列宁同我们在一起。

载于《回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第1卷 1956年莫斯科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版第486—496页

① 《列宁全集》第17卷第286页。——编者注

② 同上，第287页。——编者注

在布拉格代表会议上

尼·亚·谢马什柯

1912年1月召开的布拉格代表会议，堪称是我们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转折点。从此以后，各地的布尔什维克组织同孟什维克彻底断绝了关系，形成了统一的布尔什维克党。

布尔什维克取得这一胜利是很不容易的。那时必须同孟什维克取消派作斗争，因为他们力图消灭（“取消”）无产阶级的秘密政党，而代之以合法的，即迎合当时的沙皇刽子手斯托雷平心意的政党。必须同来自左的方面的取消派，即“召回派”作斗争，因为他们不懂得必须在秘密党的领导下，利用合法的条件（国家杜马的讲坛、合作社、工会等等）去组织工人阶级。最后，还必须同布尔什维克内部的调和派作斗争，因为他们被取消派牵着鼻子走。布尔什维克反对工人运动内部的敌对派的全部斗争，是在沙皇当局对布尔什维克进行残酷镇压、大肆进行间谍破坏活动和横加迫害的条件下进行的。

布拉格代表会议是在严格遵守地下工作的一切规定的情况下召开的。会议地点选在布拉格这样一个安宁、和平的捷克城市（当时属于奥匈帝国）。那时候，在巴黎间谍多如牛毛，要在那儿召开会议是件冒险的事。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非常周密地考虑了组织会议的一切细节。他显然非常焦虑，因为会议的成败会直接影响到党的团结。

代表会议能否取得成功，并不是由国外的一些团体来决定的，

而是决定于在俄国国内的各个组织。这些组织是否具有充分的代表性，对于这一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尤其感到关切。每当他听到来自俄国的消息时，他是何等的高兴啊！

在俄国筹备布拉格代表会议方面起了重大作用的是谢尔哥·奥尔忠尼启泽，筹备布拉格代表会议的俄国组织委员会就是在他的领导下进行工作的。

我们这些侨居国外的布尔什维克，在巴黎近郊的龙寿姆党校里就很了解谢尔哥。在这所学校的当时的学生中，消瘦的、身材匀称而又漂亮的格鲁吉亚人谢尔哥非常突出。他以自己的求知欲和办事认真而出众。一些初次见到象巴黎这样世界闻名的大城市的学生，往往热衷于参观游览而放松学习。但谢尔哥总是极力反对他们这样消磨学习时间。他说：“党派我们来是学习的，而不是让我们来玩乐的。”谢尔哥认真听课，积极参加同学们没有弄懂的问题的讨论。他没有念完这所学校就被派回俄国去筹备代表会议了。大家知道，谢尔哥出色地完成了交给他的任务，他所做的筹备工作报告得到代表会议很高的评价。

召开布拉格代表会议所遇到的困难是相当多的。代表们从俄国到布拉格为了不致于落到宪兵的手中，就需要采取种种令人难以置信的预防措施。有些人在途中被捕了，就这样他们没能参加会议。甚至象我们这些当时侨居国外的人去参加会议也是非常小心谨慎的，生怕让巴黎的特务给盯上了梢。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绝对禁止我们一起走，他要我们或者分乘不同的车厢，或者不要睡在同一个卧席包厢里。在布拉格车站上，捷克同志前来迎接我们，让我们分别住在工人的家里。集合地点和会议地点在民众文化馆。我记得，我们是带着多么羡慕的心情走进民众文化馆的大礼堂的，在这里捷克工人可以自由地谈论自己的需求，或者喝着啤酒看报消遣。同在沙皇俄国的地下状态

的生活相比较,捷克工人的生活对我们说来就象是天堂。

但是,根据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指示,为了避免引起不良分子对我们的注意,我们不能在这个“天堂”里停留,必须迅速登上二楼去参加会议。这是一个不大的房间,我记得有三扇窗户,从窗口望去,可以看到盖着瓦片的城市建筑物,眼前展现出一幅宗法式古城的美丽图景。在这个房间的一端,放着一张“供主席团用的”小长桌,两边放着长凳。在主席台的前面,放着供会议主席团成员坐的长凳和椅子。两旁的长凳跟前,放着一捆捆用绳子扎牢的秘密书刊,这些送到代表会议上来的秘密书刊是在巴黎出版的。

我是关于工人保险问题的报告人。我在巴黎就拟好的决议草案是经过列宁仔细审阅的。决议草案在文字上稍经修改后就在代表会议上通过了。

列宁做了关于当前形势和党的任务的报告。这是决定代表会议的面貌、决定党的建设和党的任务的根本问题。不用说,这是一个非常出色的报告。虽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象通常那样,没有掩饰分歧,恰恰相反,他充分地揭露了这些分歧;这个报告是这样有力和无懈可击,甚至连那些动摇分子都无法反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所提出的论据。

代表会议以后,列宁给高尔基写信说:

“亲爱的阿·马·!”

代表会议的决议很快就可以寄给您。不管取消派混蛋们怎样捣乱,我们终于把党和它的中央委员会恢复起来了。我想您会和我们共同为这件事情高兴的。”^①

载于《回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第1卷1956年莫斯科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版第497—499页

^① 《列宁全集》第35卷第1页。——编者注

永远同我们在一起

叶·彼·奥努弗里也夫

具有历史意义的布拉格代表会议召开前的那几天，我碰上了一件大喜事：我被选为出席全俄代表会议的代表。

到布拉格去是件相当复杂的事情。保安机关的密探对我们每一个人都进行严密的监视，大规模的逮捕时有发生。

……眼看陡峭的群山向着两旁逝去。在伏尔塔瓦河畔的丘陵上，已经现出布拉格的内城、宫殿、公园，以及布拉格古城的大教堂。联络员来迎接我们了，把我们带到事先安排好的“贝尔韦德宫”旅馆。我们洗过脸，吃完饭之后，就在一张低矮的小棋桌旁坐了下来，两个人对弈，两个人观战。突然，耳边响起了熟悉的家乡声音：

“喔唷，白棋完蛋了…… 该走王后。”

我们马上站了起来，围住了进来的那个人。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

列宁同我们热烈握手，并向我们提出了许多问题：关于各人的家庭、工资情况，工人的思想情绪，以及他们对代表会议有些什么期望等等。伊里奇具有他自己特有的听取意见和了解情况的独特风格。他只是提了一些当时极想知道的问题。列宁心情愉快，精神饱满，朝气蓬勃，他很快就同我们搞熟了，似乎我们已认识多年了。列宁善于了解最主要的、最根本的问题。我们很快就被列宁的异常朴实、和蔼可亲的态度折服了。我们同伊里奇在一起就象同最亲近的

同志在一起一样,丝毫不感到拘束。他提醒我们说,布拉格到处都有奥地利和俄国的暗探,他要我们特别谨慎,彼此称呼只能用化名。

列宁走了,但是过了一个小时,他带着一张写满了小字的纸条又来了。

“同志们,我给你们介绍一下代表会议的主要议程。”

我们听着,感到列宁似乎走遍了整个俄国,访问了各个工厂、农舍,他是多么深刻地了解人民内心的期望和要求啊。有一阵子,大家都不作声。列宁架着腿坐着,用一枝铅笔轻轻地敲着桌子,审视地瞧着我们。有一个代表胆怯地说,其中有一点不太清楚。列宁扬起眉毛,迅速地看了一下手中的纸条。

他说:“您说得对。如果您不喜欢,那我就把它删掉。”

伊里奇沉默了一会儿又说:“嗯,捷克的同志很关心我们,在他们自己人那里给我们准备了安全的住所……有一位代表将同我住在一起……”

谁能有这样的幸运呢?于是大家激烈地争辩起来。有人提议抽签。伊里奇并不介入我们的争论,而只是俏皮地用眼睛斜视我们。

“该是我碰上了吧。”一位代表说道。

列宁看了他一眼,笑着说:

“哦,您是一个重要的无政府主义者……我们可合不来……还是让斯切潘(这是我新的党内化名)跟我去吧。”

我们住在一个捷克工人的家里。这个工人自己同全家住在一个小房间里,而把我们安顿在一个大房间里。这个房间里放着两张床,还有五斗橱和几把椅子,显得十分整齐、清洁。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列宁在家庭场合中的情形。他非常温厚,彬彬有礼。不仅仅是我,而是每一个代表都感受到他的特有的关怀。在短短的几天会议时间里,列宁记熟了每一个代表,并且用不同的方法去接近每一个与会的代表。

伊里奇经常比我回来得晚。他总是蹑手蹑脚地轻轻走进房间，然后悄悄地脱掉衣服躺下。有时他回来得早一点，他就喝杯茶，吃一点夹奶酪和黄油的面包，休息十分钟或十五分钟。这时候他通常喜欢把两只手的大拇指插在两腋下的背心里面，在房间里踱来踱去。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非常珍惜每一分钟时间。我的耳边仿佛现在还响着列宁对我说的话：

“斯切潘，您看一会儿书吧，我再工作一会儿。”

于是他就立即坐到摆满各种杂志、手稿、剪报的桌旁。他看书的速度很快，同时还在页边作批注。每当列宁拿起笔书写时，他脸部的表情显得多么兴奋啊！

有一次，我刚从面包铺回来，我在谈话中顺便提到有一个人把隔壁一幢房子拍了照。列宁马上放下手中的文件，警惕地站了起来。

“在哪里？”他急着问道，然后走到窗跟前……“明摆着的事。从今天起，斯切潘，您不要同我一起走了。如果人家把我一个人拍下来，再把照片登在报上，那还不是很糟。如果把我们俩都拍下来，那就坏事了。警察是不会放过我们的。至少得搬家……”

列宁在同沙皇警察当局的斗争中，已经养成了保持警惕的习惯。他也教育干革命工作的同志们具备这种宝贵的品质。他是多么关心人，在他身上可以看到高尚的人道主义和高度的洞察力等优秀品质。

在短促的休息时间里，列宁常常喜欢回忆那遥远的慈母般的伏尔加河。他深深地怀念俄罗斯的冬天。有一天他对我说：

“斯切潘，我到外边去散一会儿步……”

伊里奇回来时已经很晚。第二天他开始咳嗽了。我把这一情况告诉了谢马什柯同志。经过仔细检查以后，他说：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您发烧了，您不能去参加代表会

议……”

“不，不，我去，”——列宁坚持说——“您别拦我。”

过了不多久，列宁承认说，那天晚上他忍不住向体育场借了一双滑冰鞋，只穿着一件外衣痛快地滑冰玩了一阵。

对待房东家的那个小女孩列宁是多么疼爱啊！他常常抚摸着女孩的头，让她坐在自己的膝头，微微地摇晃，同她闹着玩，自己开心地笑着。

甚至在这次历史性的代表会议上，列宁也同样是一个纯朴的、最有人道主义精神的普通的人。会议是在海伯尼街七号那幢长形的灰色房子里召开的。这儿的民众文化馆当时是社会民主党的机关刊物《人民权利报》的印刷厂和行政管理机关的所在地。代表会议是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仅仅只有几个经过审查的招待人员知道在开会，而且就连他们也一概不知道代表的姓名和会议的性质。要进入会议室，必须经过一个四面由石头房子围住的院子。

穿过边门，我们走进会议室。室内的陈设很简朴：几张普通的桌子，一个铁制立式衣架，一个书橱，上面放着卡尔·马克思的半身像。伊里奇坐在会议桌旁，桌上放着墨水瓶、吸墨水器……

会议总是准时开始。列宁的热情洋溢的讲话，使人永远难忘。他满怀信心地坚持自己的每一个论点。他如果发现某人的发言中有不正确的观点或离了题，就马上进行争论并加以纠正。他在会议休息时间也深入到代表中间去，同他们长时间地交谈，向他们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询问每一件细小的事情。

当各地的代表开始汇报时，伊里奇把手掌紧贴着耳边，唯恐漏掉了代表发言中的哪一句话。他始终全神贯注地听取我们每个人的发言。记得轮到我发言的时候，我非常激动。我在发言时详细地讲述了我所熟悉的涅瓦区的情况。我谈到我们散发了一些胶印

传单，这些传单的内容大多是有关经济斗争的；还谈到在夏天曾举行过群众集会（我们通常称它为“飞行集会”），讨论与行政当局发生的冲突；我们还组织了“知识就是光明”教育协会。有人想打断我的发言。伊里奇果断地说：

“同志们，让斯切潘把话讲完！”

当讨论到开除取消派出党的问题时，列宁特别慷慨激昂。他愤怒地指出托洛茨基的两面派手段和背叛行径，在嘲弄普列汉诺夫的立场时，他强调指出普列汉诺夫对布尔什维克的态度必然会使自己最终与取消派为伍。在批判考茨基时，他论证说，对工人运动来讲，中派要比伯恩施坦主义更加危险，因为考茨基的机会主义被一些“美丽的”词藻掩盖着，但是考茨基最终必然要滑到伯恩施坦的道路上去。

布拉格党代表会议是在1912年1月5—17日（18—30日）召开的。在我们党的历史上，这次会议的作用是非常巨大，无法估量的。就是在这次会议上，列宁和列宁主义者同孟什维克完全划清了界限，把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队伍牢固地团结了起来。

代表们离开布拉格以前，举行了告别晚会。一位捷克同志也参加了这次晚会。列宁给我们当了翻译。当这位捷克同志开玩笑说“俄国人的会议很多”时，列宁的眼里刹时间射出了光芒，他把跷起大拇指的右手指着那位说话的同志道：

“不对！……不，不！……俄国人讲得很少！……但是我们的条件就是这样，所以我们难得举行集会。可是我们又有多少问题亟待去解决啊！……”

……列宁永远同我们在一起。他所点燃的火炬将永远在我们的心中燃烧，任何人，任何时候都将无法把它熄灭！

弗·伊·列宁在克拉科夫 和波罗宁

谢·尤·巴哥茨基

1910年我服满了四年劳役后，被送往巴拉干县定居。不久，我从那里逃往国外，住在克拉科夫，离俄国的国境线不远的地方。我懂得一点波兰语，可以在克拉科夫大学医学系继续因服劳役而中断的学业。

在我来到克拉科夫的那个时候，这里还没有俄国的政治侨民，因此我感到自己同俄国的政治生活隔绝了。

1912年6月初的一天，我从实习医院回来，看见在我的桌子上放着一封柳德米拉·尼古拉也夫娜·斯塔尔从巴黎寄来的信，在援助政治劳役犯的事务中我同她有通信往来。那时我是克拉科夫援助政治犯联合会的书记，而柳德米拉·尼古拉也夫娜是巴黎声援政治犯委员会的负责人。柳·尼·斯塔尔通知我说，乌里杨诺夫同志同他的妻子很快就要来到克拉科夫，要我在初期协助他在这个陌生的城市里安顿下来。

会见约定在市中心的普梁蒂环城花园里，在大学主楼的对面。

在乌里杨诺夫夫妇到达的那一天，我提前来到约定地点，坐在正对大学红楼的一张长凳上。这是一个晴朗的夏天。孩子们在周围玩耍。大学生三三两两地从学校里走出来。我紧张地注视着来

往的行人，想从中认出列宁来。我从未见过他，但是不知为什么，在我的想象中，他是一个留着黑胡子的身材魁梧的男人。

约定的时间大约已经过了半个小时。我周围的长凳上已坐满了人。在离我最近的一张长凳上坐着一对不太年轻的夫妇——男的戴着圆顶礼帽，留着小胡子；女的穿著很朴素。但是我没有去注意他们。我开始焦急起来，不安地走来走去。

突然，那位妇女站了起来，带着探问的口气问道：

“请问，您好象是在等谁吧？您是不是巴哥茨基？”

“这么说，你们就是乌里杨诺夫夫妇罗！”我惊叫了起来。“我们几乎是坐在一起相互等候了很久。”

大家都笑了起来，互相握了握手。

这是我最初认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情景。他同我想象中的那个列宁完全不一样。在我面前的是一个中等身材的男人，脸型有点象蒙古人，蓄着略带棕黄色的小胡子。他的眯缝着的眼睛炯炯有神，他的愉快的笑容以及真诚待人的态度马上就赢得了人们的好感。

乌里杨诺夫夫妇把行李等物存放在火车站上了，必须从那儿把它取来，还要考虑他们在找到住房之前的几天内的住宿问题。我们沿着普梁蒂大街向火车站方向走去。

一路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问了我一些有关我在克拉科夫的生活情况。然后，话题就转到克拉科夫的一般政治问题上去了。列宁特别询问了当地政府对待政治侨民的态度。

属于奥匈帝国的加里西亚不同于被德国和沙皇俄国所占领的波兰的各个地方，这里有着相对的政治自由。由于这里有相当数量的波兰政治侨民和左派知识分子，这就给克拉科夫的一般的社会生活方式带来了一种特殊的痕迹。在数量很多的俱乐部和各种组织里，经常举行一般政治题材的报告，在米哈利克、比赞斯和德

罗勃涅尔等大众咖啡馆里进行的生动的讨论和辩论，把当地的舆论界人士的兴趣都吸引到政治和革命方面来了。这一点也影响到报界和行政当局。克拉科夫的舆论界期望波兰独立，憎恨沙皇的统治，所以对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所有革命战士都怀有好感。在克拉科夫有革命政党的公开的出版社。比如，这里出版有波兰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的机关刊物《评论》和《红旗》等，波兰一些革命政党的中央委员会的不少委员比较经常地住在这里。

我们在谈论这些问题的时候，走到了弗洛里安梵天，这是克拉科夫要塞围墙的大门，我们又折向弗洛里安大街。在这条大街的一条胡同里，有一家“健康”学生素食铺。乌里杨诺夫夫妇很乐意在这里吃午饭。在白天这个时候，素食铺里人很少，因此我们能够很自由地继续我们的谈话。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问道：“当地的警察局对政治侨民的态度怎样？”

我回答说，这方面不用担心。在克拉科夫人们对沙皇专制制度充满着敌对情绪，这使当地的警察机关对政治侨民的态度比在欧洲的其他任何城市要“客气”得多。

我举了企图暗杀华沙总督斯卡隆的克拉赫利斯卡娅的例子。在暗杀未遂以后，克拉赫利斯卡娅逃到加里西亚，居住在克拉科夫的近郊。奥匈帝国政府在收到沙皇政府关于引渡克拉赫利斯卡娅的照会后，倾向于满足沙皇政府的要求。但是，克拉科夫的舆论界很快就想出了一个办法：把克拉赫利斯卡娅“嫁给”一个奥地利籍的波兰大学生。结婚是假的，然而克拉赫利斯卡娅却获得了奥地利国籍。根据奥地利的法律，她是不能被引渡的。而且，为了表面上满足沙皇当局的要求，克拉赫利斯卡娅曾受到弗兹多维茨法院（在克拉科夫附近）的审讯。审判结果宣告克拉赫利斯卡娅无罪。法庭上出席旁听的广大群众热烈欢呼法庭作出的这一判决。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接着问，由于克拉科夫离俄国国境很近，沙皇保安当局是否更便于监视住在这里的政治侨民。

当然，靠近国境线对政治侨民的监视是容易些。在克拉科夫毫无疑问有保安机关的密探，但是他们得不到支持，所以是比较安全的。有时，在个别情况下，克拉科夫警察局的官员甚至还告诉政治侨民，说有人在监视他们。

后来，莫斯科的一位工人舒姆金有一次来找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要把秘密书刊运过国境线去。舒姆金的外貌和他的极端诡秘的行动引起了克拉科夫警察局对他的注意。因此，警官来找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问他是否了解舒姆金，政治上是否可靠。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警察局就没有去干涉舒姆金。几天以后，舒姆金顺利地把书刊运过国境线去了。

从素食铺出来以后，我们就到火车站去。在车站附近的一家旅馆里我们找了一间面向普梁蒂大街的房间，就把行李搬了进去。我们约好明天去找住房。第二天一早我就到乌里杨诺夫那儿去了。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还未准备好，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提议趁这个时候到普梁蒂大街上去走走。他很快就谈到他特别关心的问题，即是否有可能同俄国取得秘密联系的问题，首先要把一些同志秘密送过国境线去，这些同志就要到这儿来了。

我经过考虑以后，提出了下面这样一个计划。在克拉科夫附近有一条离边界三十公里的所谓边境地带。根据奥地利政府同沙皇政府的协议，住在这一地带的居民可以凭不贴照片的“边境证”出入国境。这种“边境证”通常是到市场上去出售农产品的农民用的，住在国境线这一边而要到另一边去上班的工人也使用这种证件。当地边境上的检查是很松的。可以利用我同援助政治犯联合会中的克拉科夫工人的关系搞到“边境证”。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这一计划很满意。

乌里杨诺夫夫妇希望住在靠近树林和河流的地方，住所要简朴些和便宜些。克拉科夫近郊的兹韦日涅茨符合这些要求，那里的居民基本上是工人。那儿离沃尔斯克树林不远，离维斯瓦河很近。我们就到那里去了。那里的住宅非常简陋，房屋年久失修；最后我们终于物色到了有两个房间和一个厨房的合适的套间，房屋保护得还比较好。乌里杨诺夫夫妇就在这里住了下来。需要购置家具，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决定凭她在幼年时听到的波兰话自己去办理。

第三天我上他们家去了。家具已经买到，并已布置停当：两张小铁床，两只普通的桌子，一只书架和几只椅子，在厨房里还有一只小桌子和几只凳子。书籍和报纸已被打开，放在桌子和窗台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写着什么。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请我在他们家一起喝早茶。

为了不影响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工作，我不打算再去拜访他们了。但过了几天，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自己骑了自行车来找我，邀我到树林里去散步，并顺便去洗个澡。

* * *

8月初，我前往离克拉科夫大约四十公里的马可夫村，准备在那儿渡过大学暑假的后一半时间。动身前，我告诉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马可夫村就在巴比亚山脚下，那里可以看到塔特雷山脉的全景。同我告别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我说：

“我要来看您的，我们一起去登巴比亚山的顶峰。”

大约过了两个星期，我看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正向我的住所走来。他是骑自行车来马可夫村的。他风尘仆仆，一面朝屋里走，一面抱怨加里西亚的道路实在太糟糕。

上巴比亚山要在傍晚的时候，可以住宿在半山腰专门为旅游者修建的茅舍里，当地人把这种茅舍叫做“避雨棚”。喝完茶以后，

我们就到离我家不远的小丘上去，在那里躺了下来，让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休息一下，以恢复旅途的疲劳。晚上六点左右，我们吃完晚饭，就骑自行车向邻近的扎沃亚村进发，这个村庄紧靠着巴比亚山麓。我们把自行车寄放在一家小饭店里，然后就沿着一条坡度不大的小路走去。不久，我们就走进了树林。天开始黑了。可惜我们把提灯忘在自行车上了。小路弯弯曲曲。为了抄近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建议笔直向上走。我们走得很快，有时穿过小路。但我们突然发现再也碰不上小路了。估计路在我们的左边，我们就转向左去，还是没有小路。于是我们就朝不同的方向去找。结果也没有找到。现在没有别的办法了，只好笔直向上走。天色已经很暗，我们前进得很慢，有时碰上灌木林，有时撞在树墩上。看来有在树林里露宿的危险。突然，一丝亮光闪烁了一下，我急忙走去。唉！原来是腐烂了的树木发出的磷光。我们又继续向前走去，远处又有什么东西在发光。不久，这亮光越来越清楚了。开始看得清有两扇光亮的窗户。我们找到了门，走进了宽敞的房间，房间里有一只不小的炉灶，上面放着一把大茶壶，水正在沸腾，灶上还放着各种旅行用的餐具。在桌旁和板床上有十来个人。地板上堆放着各种打开着的旅行背囊。我们到了“避雨棚”。吃过晚饭，我们就在板床上躺下。由于旅途的疲劳，我们很快就入睡了。在睡觉以前，我们对看门人说，要他在清晨四点钟时把我们叫醒。

早晨，在梦中我听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声音：

“已经七点钟了，怎么不叫醒我们！错过了看日出的机会。”

我们把看门人找了来。

他笑着说：“先生，你们看窗外，雾这么大，两步以外就什么都看不见。所以我想还是让你们多睡一会儿好。”

确实，外边正下着大雨。除了白茫茫的大雾以外，什么都看不清。登山已经没意思了。我们问看门人，天气有没有好转的希望。

望。他的回答令人失望：明天以前天气不会好转。

就这样，我们的计划碰壁了。不能等到明天，因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必须在今天晚上回到克拉科夫。

我们冒着倾盆大雨向山下走去。在扎沃亚村取回了自行车，沿着被大雨冲坏了的道路十分吃力地向马可夫村骑去。挫折并没有使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垂头丧气。

“下一次休息日我还要来。”他在告别时这样说。

的确如此，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回到马可夫村还不到两个星期，他又来了（这次他是乘火车来的）。我们步行到扎沃亚，然后从那里顺利地到达“避雨棚”。由于随身带了提灯，一路上就方便不少。

看门人象对待老朋友似地接待了我们，并且保证不管什么天气都要把我们叫醒。清晨四时，又是大雾，但是并不象上次那样浓。据看门人说，山顶上天气可能非常晴朗。

按照刻在石头上的红色路标，我们往上走去。终于到达了山顶。然而雾并未消散，只能看见几公尺之内的景物。我们决定等一会儿，先进早餐。过了半个小时，雾开始淡薄了，在我们面前展现出一片壮观的景色。远处，被明亮的阳光照耀着的长长的塔特雷山脉，仿佛悬挂在空中似的。下面笼罩着一片云雾，就象翻腾的浪花。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容光焕发，他说道：

“您看，我们的力气没有白费啊！”

* * *

乌里杨诺夫夫妇在兹韦日涅茨街的住所并不方便。那里离车站很远，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每天要到车站去寄信（为了使他给《真理报》写的文章不致于迟到，他总是利用夜车把信寄出去）。

乌里杨诺夫夫妇在离车站不远的卢博米尔谢戈街的一幢新房子找到了住所。这条街只在一边造了房子。从乌里杨诺夫家的

窗口可以看到沿着国境线伸展的一片广阔的田野。

这个住所很快就具有一种特别舒适的外貌。使人感到有一种从事脑力劳动的气氛。在桌子和窗台上放着一大堆书籍、报纸和手稿。乍看起来，似乎是随便乱放着的，而事实上，是按照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所熟悉的顺序而分放在各处的，因此他总是能够一下子就找到他所需要的书籍或文章。

自从乌里杨诺夫夫妇搬到卢博米尔谢戈街以后，我们就成了邻居。我们见面的机会更多了。这就使我能够了解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日常生活情况。如果我以前只知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是个伟大的理论家，那末，在这段时间内我才了解到他是具有多么杰出的组织才能啊，对政治局势的高度敏感使他能够根据别人不注意的琐事对政治形势和群众的思想情绪作出估计。

乌里杨诺夫一家的生活非常俭朴。写作是他们收入的主要来源。但这是不固定的。由于沙皇俄国书刊检查机关的条件相当苛刻，这使得弗·伊·列宁的著作在那里出版相当困难。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总是推故不要母亲给他的经济援助（她依靠领取丈夫的抚恤金生活）。亲属给他寄来哪怕是很少一点的食物，他都会感到不痛快，他通常总是再三对他们说，“现在并不需要……”。只有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他才同意临时从党的经费中领取一点工作报酬。

工人革命运动在俄国的高涨促使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迅速扩大同国内主要工业中心的革命小组的联系。起先，同俄国的通信为数不多，后来就迅速增加了，每月达几百封信。来往的信件由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处理。为了处理信件，她有时不得不坐到深夜。从俄国来的信件中，只有少数是直接寄到克拉科夫的乌里杨诺夫家里的。大部分信件寄到其他国家给政治上持中立态度的人，他们多半是外国人，然后再从他们那儿转寄到克拉科夫。

信是用暗语写的。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懂得如何解释。保密的问题则用化学墨水写在信的行间，表面上看不出什么问题来。特别重要的一些情况则用密码书写。

不久我们找到了一个把信件寄往俄国的方便办法，这个办法可使从国外寄去的信件避免严格的检查。通过几个同我有关系的当地工人，找到了几个可靠的农民，他们经常要从俄国那边来到克拉科夫赶集。给予少量的报酬（他们常常是不收的），他们就同意把信件带过国境线，投寄到俄国的信箱里去，在那儿这些信件就作为国内邮件，就不必经过特别的检查了。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从清晨工作到深夜，但工作并不使他感到疲劳。工作越多，他越是感到兴奋，越是感到内心的满足。在时间的安排上，他每天都能留出一两个小时来休息。他是非常热爱大自然的，常在休息时间内骑自行车出去游玩，或者在克拉科夫近郊散步。如果时间允许，他还作长途旅行。

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最经常的旅伴。但由于健康状况的缘故，她不可能经常陪伴他。在为数不多的俄国侨民中，不是所有的人都有兴趣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到城外去游玩的。当时分成几派。喜欢郊游的人被戏称为“郊游派”，喜欢看电影的人被戏称为“电影派”。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是个“热衷的郊游派”，这是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有一次给他的母亲写信时这样说的。

我是属于“郊游派”，因此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常常来找我结伴同行。但是在准备国家考试期间，我有时想偷懒不去。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态度十分坚决，他常劝我说，郊游可以清醒头脑，郊游用去的时间很快就能得到补偿。我们常常到沃尔斯克树林或附近的小村子去。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很注意考察当地居民的生活情况。他说，波兰的农村较之西欧农村与俄国的农村更相

似，他对波兰农村感到更加亲近。他看到波兰农民的贫困后，深信波兰农民将会比西欧的农民更快地接受社会主义思想。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作息时间安排得很严格。每天八点左右起床，无论什么天气早晨都要散一会儿步。早饭后就开始工作。十点钟左右第一次邮班来了，这是他最感兴趣的一班，因为在这班邮件中有俄国来的报纸。这些报纸的内容在很大程度上要决定他当天的工作：报纸会提出他给《真理报》写稿的题目。在这个时候常常有同志们来找他，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同他们一起讨论各种迫切的问题，并分配写作任务。信件由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负责处理，对一些最紧急的信件她就马上给予答复。这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在这以后的几个小时内，他谁都不接见。

只有在有同志从俄国来的时候才是例外，这时日程才会被打乱。同来客的交谈，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认为是最重要的。

两点左右是休息和吃午饭的时间。家务事由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管。由于她还有其他更加重要的工作，所以她的烹调技术得不到充分的发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并不苛求，有时他只是开玩笑地说，他不得不经常吃“烤肉”（指肉烧糊了）。

午饭后继续工作。五点钟左右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开始休息，他常常骑自行车或步行到城外去游玩。冬天则以滑冰代替郊游。无论谁见到这位象青年一样兴致勃勃的滑冰者在冰上表演各种复杂的动作时，都不会想到，面前的这个人竟是一位革命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和理论家。

在晚班邮件来到之前，七点钟左右，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回到家里，再继续工作到深夜。到夜里十一点钟，开往俄国的快车开车的时候，他亲自把所有的稿件送到车站，以便尽快运往彼得堡交到《真理报》编辑部。

晚上有时有一些同志聚集在乌里杨诺夫家里。大家围坐在饭桌旁边，一面喝茶，一面热烈地谈论当前的各种问题。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总是积极地参加讨论。他具有引导谈话的卓越才能，能使交谈者感到，是他们自己得出了某种结论，虽然有时候他们在事前想的完全不是这样。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这样不知不觉地把他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传给了周围的同志。他的朴实、谦虚和同志式的亲切态度带来了平等的气氛。他从来不让交谈者感觉到他在智力上比人优越。

* * *

1912年秋，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注意力集中在第四届国家杜马的选举问题上。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选举应当起到把工人团结在党的基本口号周围的组织作用。”

他的全副精力都贯注在选举问题上。甚至在散步的时候也常常提到这一问题，虽然通常在这种时刻他是不谈日常工作的。

反动的杜马选举法给工人选民制造了很多障碍。行政当局的实际措施使这些障碍几乎无法克服。除了实行等级选举制和三级选举法以外，又逮捕了一些在合法的选举大会上发表演说的进步工人。同那些乱提许愿口号的孟什维克取消派、社会革命党人以及劳动团分子^①的关系也很复杂。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认为布尔什维克应该提出尖锐的口号，拒绝同孟什维克取消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劳动团分子达成任何协议。根据他的意见，必须抛弃追求委任状的任何想法。

他说：“根据现行的选举法，我们反正不可能指望为工人争得相当数量的代表席位。重要得多的是投票选举布尔什维克党候选

^① 指1906—1917年俄国小资产阶级民粹派的政治集团分子。——译者注

人的工人票数。这表示我们对无产阶级的影响。”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选举结果基本上是满意的。他感到高兴的是，有一百多万工人投票选举布尔什维克，而投票选举孟什维克取消派的总共只有二十万左右。

选举以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认为必须同刚刚选进第四届杜马的那些布尔什维克代表取得联系。

旧历 12 月底，在克拉科夫召开了中央委员会和党的工作者会议，考虑到保密的需要，把这次会议称作“二月会议”。除了列宁、斯大林和克鲁普斯卡娅以外，参加这次会议的还有布尔什维克杜马代表彼得罗夫斯基、沙果夫、穆拉诺夫、巴达也夫、马林诺夫斯基以及特罗雅诺夫斯基、罗兹米罗维奇等人。

大多数代表都是第一次行使自己的代表权利，带着合法的出国护照到来的。只有穆拉诺夫同志没有使用自己的杜马代表人身不受侵犯的权利，仍旧用老的“可靠的”，即秘密越境的办法到来的。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知道这一情况后，马上就当众批评了有点腼腆的穆拉诺夫。他说：

“您想一想，假使您在边境上出了事怎么办！您会使我们整个党团处于何种境地！”

但是，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语气和笑容上可以看出，他非常理解穆拉诺夫对这一所谓的代表人身不受侵犯权的怀疑。后来，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布尔什维克党团的全体代表都被流放到西伯利亚，这就充分证实了这一点。

“二月会议”是在卢博米尔谢戈街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住所里举行的。参加的同志特别多，挤满了几个小小的房间。

大会的中心议题是当时最重要的一些问题，例如：俄国革命的高涨，罢工运动的加剧，布尔什维克杜马党团的策略，加强党的秘密组织，对取消派的态度，以及“民族的”社会民主党组织等。

党的许多活动家从俄国来到这里，这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来说是件大喜事。他感到自己是在最如意的环境里，他非常兴奋，非常高兴；在大会休息的时间里，同外来的同志们进行长时间的个别畅谈，仔细了解他们的情况。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善于用简短的问题，把谈话的内容纳入他所希望的轨道，从而弄清楚他感兴趣的问题的实质。

考虑到保密的需要，决定把外来的同志尽可能地分散安顿在私人住所里。只有少数同志住在旅馆里。大多数人都住在当地工人的家里。克拉科夫的工人大多都具有国际主义精神，他们乐于帮助俄国同志，顺便说一下，加里西亚的社会民主党领袖们是根本不能同他们相比的。

* * *

同志们离开以后，我们的侨民生活又开始沉寂了。一切都恢复了原来的样子。晚上的会面和交谈又重新开始。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埋头于日常工作。他非常注意布尔什维克杜马党团的活动，常常给党团的成员撰写演说提纲。但他的主要注意力仍然放在《真理报》上。

有的时候，一向乐观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也会陷入沉思。他在房间里默默地踱来踱去，时而在窗前停下来，久久凝视着野外的俄国国境线。原来，他的思想已经飞越国境，回到了他在当时不可能回去的祖国。

随着春天的来临，我们在克拉科夫近郊的散步也变得更加经常了。我们很想到塔特雷山脉去玩几天，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怎么也抽不出时间来。他的工作非常多，有时在晚上，其他几个侨民都聚集在厨房里，而他独自留在自己的房间里工作。

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的健康越来越差了：心动过速，还出现凸眼性甲状腺肿病的症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也着急起来。

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不愿意找医生看病。最后经过大家的努力，终于说服了她，她去找了克拉科夫最好的一位神经科医生，医生劝她到山区去休养几个月。

到哪里去呢？这个问题讨论了很久。最后决定到位于塔特雷山麓的小村子波罗宁去。在气候方面，波罗宁这个地方对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治病是适宜的。除此以外，在那里还有安静的工作条件。还有一个优点，就是生活费用较低。

使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感到不安的是，搬到波罗宁后会不会影响同彼得堡的联系。因此，他要求我把邮寄方面的一切问题打听清楚。最后弄清楚了，信件只要早几个小时寄出，使它赶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从克拉科夫寄信的那趟火车就行了。这使他十分满意。

波罗宁实际上是疗养胜地扎科帕奈的郊区，这个疗养区是波兰知识界、青年大学生和政治侨民在夏天喜欢去的地方。住在那里的熟人有：维吉列夫同志（后来任苏联驻波兰领事），勃热津斯基博士（前民意党人），德卢斯基博士（结核病疗养院院长），还有作家谢罗舍夫斯基（我同他是1905年在华沙监狱里认识的）。白天，大部分旅游者都进山去了，扎科帕奈就显得很寂静。到了晚上，一切都活跃起来。许多咖啡馆挤满了各种身份的人。在这里对各种政治问题和文艺问题进行着没完没了的争论。

当地居民是所谓的古拉尔人。这是波兰的一种特殊山民。他们的体形瘦长，穿着白色粗制土布做的绣花纹的漂亮服装，裤子紧裹着两腿，用同样的料子做成的上衣搭在一只肩上，很象骠骑兵的斗篷。不少古拉尔人是职业导游。他们把导游以外的时间都消耗在咖啡馆里，同旅游者聊天，他们把家务和田间工作都留给妻子去做。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这种败坏山民风尚的人（他称之为“咖

啡馆兄弟”)很看不惯。他自己对“咖啡馆”的生活也不感兴趣,只有在进山时才顺道来扎科帕奈。

塔特雷山脉的景色跟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熟悉的瑞士阿尔卑斯山的景色不同。这里没有阿尔卑斯山上的海拔两千米的过渡性草地。在塔特雷山脉的一千米高处开始有一段不太宽的矮小的针叶林带,然后没有过渡地带便一下子就是完全光秃秃的岩石了。山的坡度在有些地方非常陡峭,只有有经验的旅游者穿着钉鞋(鞋钉能嵌入岩石缝)才能攀登上去。

同瑞士的阿尔卑斯山不一样,在塔特雷山脉可以在一两天之内登上任何一个山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这一点很欣赏。那时,在塔特雷山脉既没有旅馆,也没有缆索铁道,也没有出售那种异常乏味、庸俗得出奇的纪念品的售货亭。在一些山谷里筑有极其简陋的供旅游者休息的茅舍(避雨棚),里面放着木板和草垫子,常常连看门的人都没有,旅游者可以在这里自己料理生活,使用木柴等等。只有在海眼湖的山谷里有一条公路,那里开设了山里唯一的一家旅馆。

在瑞士的阿尔卑斯山可以靠缆索铁道攀登很多山峰,这种设施并没有吸引住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他认为克服登山时所遇到的一切困难,以及登山过程中所得到的各种各样的印象,才是登山旅游最主要的乐趣。

乌里杨诺夫夫妇在波罗宁和邻村恰尔内-杜纳耶茨交界的地方租了一处有凉台和阁楼的农舍。女房东捷列扎·斯库平住在稍远一点的另外一间小屋里。乌里杨诺夫夫妇租用的房子座落在离公路约两百米的林中空地上,在小山脚下。楼下有两个大房间。一间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和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的卧室,同时也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工作室。另一间是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的母亲伊丽莎白·瓦西里也夫娜的房间,她是1913

年从俄国到他们这里来的。沿着房屋有一条不太宽的走廊通向大厨房，这里也是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的工作室和会客室，住在波罗宁的同志们晚上经常聚集在这里。搁楼后来就给从西伯利亚逃出来的吉霍米罗夫同志住了。

我的住所离火车站不远，距离乌里杨诺夫家大概只有半公里。往扎科帕奈的方向走去，便是波罗宁的中心，那里有邮局和各种店铺，在杜奈耶茨河的对岸住着我们的其他几个侨民。

在波罗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每天七点钟起床，然后到杜奈耶茨河去洗澡。这条水流湍急的山间溪流一般说来是很浅的，但是我们在斯库平家附近找到了一处相当深的地方，在那里甚至可以游泳。岸边丛生的灌木林把洗澡的人隐蔽起来，使路上来往的行人看不见他们。

早饭以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坐下来开始工作，一直到晚上七点钟，中间吃午饭时稍稍休息一下。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坐在自己房间里的大桌子旁工作。桌子放在两扇窗户中间。天气好的时候，他有时到屋子附近的小山岗上去工作，在那里可以远眺塔特雷山脉的开阔的全景。

“这种景色不仅不会分散注意力，而且还有助于注意力的集中。”他这样说。

那个时候在波罗宁还没有电灯。在小小的煤油灯下工作是很吃力的。因此，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尽量在天黑以前结束工作。将近七点钟时，他把信件送到火车站，然后就步行或骑自行车去玩一会儿。他通常沿着伸向山谷的小山岗散步。波罗宁，恰尔内-杜纳耶茨以及公路旁的一些小村庄都座落在这个山谷里，这条公路通往本县的中心——新塔尔格城。骑自行车可以向新塔尔格、扎科帕奈的方向驰去，或者沿着同塔特雷山脉平行的、通往布科维纳村的乡间小道骑去。

我们少数几个人常常在晚上聚集在乌里杨诺夫家里，热烈地讨论当时人们所关心的一些政治问题。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不是经常参加我们的讨论：她有时坐在一旁赶写当天的信件。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通常很活跃，爱说俏皮话，有时候找一些伊丽莎白·瓦西里也夫娜“老太太”会反驳的问题，善意地同她开玩笑。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令人非常感动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很尊重她，对她的某些弱点是很体谅的。伊丽莎白·瓦西里也夫娜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感到骄傲，但这并不妨碍她有时要“责怪”他“不会照料自己”。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常常要跟在场的什么人下象棋。他下棋时非常专心，很少放过对方的失着；如果他的棋局危急，他就变得严肃起来，不再开玩笑；经过反复思考，他常常能找到摆脱困境的办法。旁观者从他脸上的笑容可以看出他已经扭转了战局。他输了棋，就坦率地承认自己的失败，并且说明他主要失着在什么地方，同时给对方的高着以应有的评价。我的棋艺比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差，当我有时能够赢的时候，我感到十分高兴。我们当中大多数人都很少懂得象棋的理论，这就使我们的棋局更加五花八门和独具一格了。

* * *

出乎意料的是，山区的空气并没能使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的健康有所好转。心动过速的现象重新出现。凸眼性甲状腺肿病的症状又严重了。她已经完全不能同我们一起出去散步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多次同我们商量这件事。最后大家的意见是：最好的办法是去找当时闻名的甲状腺病专家科赫尔教授。为此必须到瑞士的伯尔尼去。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不想让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一个人出远门，所以决定陪她一起去。这样就要牺牲一些宝贵的时间，而且从经济方面考虑也有困难。但是弗拉基

米尔·伊里奇还是决定这么办。他决定在外出期间去访问国外的各个党支部以加强他们的工作，用这种办法来弥补外出给工作带来的损失。同时他还准备在维也纳和瑞士的其他城市作报告，这也能部分地解决经济问题。

伊丽莎白·瓦西里也夫娜那时已经是七十岁的人了，年老体弱，把她一个人留在那里乌里杨诺夫夫妇不放心。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要求我在他们离开期间暂时住到他们家里去。我当然同意了。

过了一个半月，乌里杨诺夫夫妇回到了波罗宁，他们对这次出门的效果感到满意。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的健康状况经过手术以后已有很大好转，心动过速的症状消失了，体力也得到了恢复。科赫尔叮嘱在初期要注意保养身体，但她不顾医嘱，立即全力投入了工作。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劝告也不起作用。他几次想求助于我这个做“医生”的威信，但也不顶用。最后，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生气了；她说，她已完全恢复健康，不需要医生的任何劝告。她作出的唯一让步，就是同意不到高山上去游览。

* * *

只要工作情况允许，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总要挤出一两天时间到山上去游览。他是个很能吃苦的旅游者。我比他年轻十岁，但有的时候要跟上他，我也感到很费劲。而我们波罗宁侨民团体里的其他人登山就更困难，他们不愿参加艰苦的旅游活动。

使我印象特别深的是登雷斯山之游，这是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从瑞士回来后不久的事。在一个晴朗的早晨，我们几个人一起向扎科帕奈进发。

没有费多大的劲我们就来到了风景如画的哈尔-冈谢尼佐夫山谷。山谷里有一块小小的盆地，四周耸壁环绕，这里有个游客最多的著名黑湖。离此不远就有个“避雨棚”，这里整天都生着炉子，

壶里的水在沸腾。

我们在离“避雨棚”不远的峭壁上停下来休息，把茶水拿到那里。我们中间有几个人躺在山石上抽烟。我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不会抽烟，就跑到湖边去。由于峭壁的倒映，远看起来湖水似乎是黑色的，事实上水明如镜。湖底深处的一块块石头和水生植物都看得一清二楚。

休息了个把小时以后，我们就向扎夫拉特隘口进发。很快就走到了山间小路的尽头。必须攀登峭壁。在最陡的地方，岩石上钉了些铁钉，以便游客攀登。于是我们就借助这些铁钉小心谨慎地往上爬。

从隘口上看到的风景使我们艰辛的攀登得到了报偿。在这里一方面可以欣赏哈尔-冈谢尼佐夫山谷和黑湖的全景，另一方面可以看到迷人的长形山谷，还能远眺塔特雷山脉的蜿蜒曲折的崇山峻岭。在山谷里有五处小小的湖泊象珍珠一样闪闪发光。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我们爬上来是值得的！”

从隘口上往下走比较容易。很快我们就走上了小路，这是一条规则的弯曲小路，斜斜地通下山去。在山谷里我们走近了五个湖泊中的第一个湖泊，冰冷的湖水使我们精神为之一爽，我们又继续向前赶路。

山谷里还有一个“避雨棚”。我们没有在那里停留，因为想尽早到达今天游览的目的地——海眼。我们穿过山谷，第二个不太高的隘口就出现在我们的面前，有一条平坦的小路通往这个隘口。不久我们就到了那里。在这个隘口上，我们看到另一个更加引人入胜的山谷。在这个山谷的深处，在峭壁环抱中有一个湖泊，它给人的印象的确象只深深地嵌在眼窝里的眼珠。

早晨，我们同伴中有些人听说攀登雷斯山很艰难，就主张回去。我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则决定把原定的计划坚持到底。

其实，爬山并不如想象的那样困难，不过很累人，也很单调。山间小路在陡壁上蜿蜒曲折向前伸展。回过头去，我们可以看到连绵不断的山脉全景，向下看，——海眼湖显得十分渺小。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几次停下来仔细察看那些从波罗宁看起来完全是另一个样子的山顶。

几乎接近山顶了。还要经历一段不长的、但是最艰难的路程。我们似乎已经完全离开了雷斯山脉。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几米以外的地方有一条通向山顶的小路。但是要走上这条小路，必须翻过一个险要的马鞍形山岭。这个山岭两旁的峭壁几乎是垂直的，下面就是无底的深渊。我回头一看，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山岭中间停了下来，但他马上又移动脚步，向我走来。原来他不该在这时候向下面看了一下，所以感到有些晕眩。但是这种感觉很快就消失了。

我们登上了山顶。在我们面前展现出一幅开阔的山景。

我们在那里呆了个把小时，休息了一下，把随身带的食品吃了，于是就准备下山。

我怕再碰上那个山岭上的复杂处境，就提议走别的路下山，借口说那边可以看到另一番景色。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马上就猜到了我的动机，他斩钉截铁地说：

“不要回避困难！要善于克服困难！”说完了这几句话他就下山了，不久就顺利地翻过了山岭。

我们没有发生任何意外，回到了山谷，大家对这次游览感到很满意。

* * *

1913年9月底(旧历)，波罗宁显得特别热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和党的工作者会议在这里举行。

在波罗宁召开会议要比在克拉科夫简单得多。常常有旅游者

到这里来玩几天，所以对陌生人谁都不会注意。大多数外来的同志住在古特旅社（现在这里是列宁博物馆）。会议是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住所（捷列扎·斯库平家里）举行的。为了使沙皇的保安局造成错觉，对外正式称为“夏季会议”。虽然采取了这一预防性措施，但是保安局还是得到了会议的确切情报，因为在会议的参加者中有两个人后来被揭发出来是奸细，他们是马林诺夫斯基和洛博夫。

10月底，乌里杨诺夫夫妇从波罗宁迁来克拉科夫。他们仍旧住在去年住过的卢博米尔谢戈街上，但是在另一幢房子里。原来的生活方式又恢复了。

1914年3月8日（14日），由进步的大学生团体“联合会”举办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报告会是这一时期克拉科夫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报告引起了各个党派人士的注意。“联合会”的宽大的会议厅挤得水泄不通。

我第一次看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这么多人参加的大会上发表演说，所以他的这次报告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用平时在家谈话的那种平稳的语调开始作报告。他没有提高嗓子，他没有玩弄演说家的手腕，但他马上就使听众领会了他的报告内容的实质。在分析了俄国的政治经济条件的基础上，他指出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不可避免的，同时工人运动也会因此而日益高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以他特有的简练而清晰的表达思想的方法，描述了无产阶级在一般的革命运动中，特别是在俄国的条件下所起的作用。接着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强调指出，在专制制度统治下的各族无产阶级必须同心协力进行斗争。在谈到民族问题的时候，他进一步发挥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所有民族都有权自决，甚至可以由他们自己建立民族的国家。

听众聚精会神地听了两个小时的报告。他的这些基本观点对

大多数听众来说完全是新的。大家对这些观点提出了许多问题，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言简意赅地一一作了答复。

接连三个晚上进行了热烈的辩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基本观点遭到了波兰社会党的所谓革命派以及波兰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党员的反对。

辩论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后来在乌里杨诺夫家里曾多次在晚上讨论过。在议论这些问题的时候，弗·伊·列宁向我解释了与任何民族主义的思想迥然不同的工人运动国际主义的基本原则，分析了民族主义的各种表现形式。他特别严厉地斥责了反犹太主义的各种表现。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即使是极小的反犹太主义色彩，也足以证明有这种色彩的团体或个人是反动的。”

另一方面，他对崩得分子把犹太工人运动同其他民族的工人斗争分割开来的企图进行了严厉的斥责。他认为不仅从必须维护工人运动团结的观点来看，而且从思想上来看，崩得分子的立场都是有害的。

他说：“应该把这些倾向从工人运动中扫除干净，因为这些倾向从根本上同工人团结的思想是相矛盾的。”

* * *

1914年5月，我们这些侨民又全部来到了波罗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确信在波罗宁可以比在克拉科夫更便于工作，更便于召集会议。

有很多同志从俄国来到波罗宁找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他怀着十分兴奋和乐观的心情同这些同志一起在波罗宁郊外一边游逛，一边听取有关各地情况的汇报，同时作出各种指示。

召开例行的党代表大会的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但是这个大会没能开成，因为爆发了帝国主义世界大战。战争不能不影响到我

们的处境，因为我们现在是居住在“敌国”领土上的俄国公民。但对这一点我们中间没有人多加考虑。我们正忙于考虑另外的问题。

同俄国的联系中断了。有一次我走进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房间时，他正在那里默默地踱来踱去。同志们都来了。他突然停下步来说道：

“无论如何要在战争的条件下找到继续工作的新办法。首先必须通过在瑞士和瑞典的同志尽快同俄国取得联系。我们今天就给他们写信。无论如何要恢复同彼得堡的经常联系。”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清楚地预见到事态的发展进程。他向我们解释道：

“既然同日本人在远东打的那场规模比较小的战争在群众中引起了这样的震动，那么现在这场战争的情况就要严重得多。它离开俄国的至关重要的中心地区较近，这就不可能不导致革命。”

他接着说：

“对日战争以来，俄国的军队没有发生任何变化。还是那些没有文化的军官，还是当时的将军，军事状况还是老样子，军备水平依然很低。尽管俄国的士兵英勇顽强，但在这样的条件下他们是无能为力的。”

可以感到，一方面战争使革命日益逼近；但另一方面至少在目前这段时间内，战争中断了列宁的革命实践活动。虽然形势发生了变化，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还是在继续自己的理论工作。他在为格拉纳特百科辞典撰写《卡尔·马克思》这一词条，在研究有关土地问题的材料，撰写有关战争题材的新著作。

每天两次，在报纸到来的时候，大家聚集在邮局附近，议论各种新闻。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不是那种认为战争在几星期内就可结束

的乐观派。

他说：“战争将是持久的，双方都有很多战争资源和人力资源。资本家将迫使自己的政府把战争进行到使一方完全衰竭为止。”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特别注意有关各交战国工人的思想情绪的报道。他怀着异常焦急的心情等待着德国国会开会的消息，因为这次会议要讨论军事预算。在会议上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立场将明朗起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他们要比对法国社会党人信任些，德国社会民主党毕竟曾在国际社会党巴塞尔代表大会上非常肯定地表示过反对战争。

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一致赞同德国政府提出的军事预算，这一消息传来的日子使我永远不能忘却。8月5日早晨，我到车站去等候早班火车，这班火车将把克拉科夫的报纸运到波罗宁来。报纸上应该有德国国会昨天开会的消息。我拿到报纸，看见上面写着：“军事预算被国会一致通过”。我立刻就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那儿去，很激动地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他。

他大声嚷了起来：“不可能！你大概把波兰语电文的意思理解错了。”

我把刊载有简短的、不会引起歧义的电文的报纸给他看。这也不能使他信服。我们就把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找来。列宁对她的波兰语水平比较信任。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证实了我的翻译是正确的。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马上就估计到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首领们对国际工人运动的这种背叛行为所产生的历史影响。

“这是第二国际的末日，”他说，接着他又补充道：“从今天起我不再是社会民主党的党员了，我是一个共产党员”。

我们当时对他脱口而出的这句话没有引起重视。到后来才明白，当时弗·伊·列宁就已经在酝酿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的问

题了。

在那几天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不出大门一步。显然他在集中思考问题。他知道必须采取重大的步骤。他以特有的、在重大的原则问题上毫不动摇的坚定意志去反对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公认的权威，他向各交战国的工人发出革命的号召，要他们去同自己的政府进行无情的斗争，把帝国主义战争变为国内战争。

* * *

生活在与俄国作战的奥匈帝国的领土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没有可能开展工作来团结各交战国的无产阶级的各个革命阶层。必须迁居到某个中立国家去，以便从那儿同俄国和其他国家的工人组织取得联系。这是一件异常复杂的事，因为各交战国的政府不允许敌对国的公民离开本国。

意想不到的情况帮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忙。

发生了一件异常荒谬的事情。战争的狂热一直传到偏僻的加里西亚农村波罗宁。在当地的一个天主教教士的挑拨下，农民开始对这批“俄国佬”进行监视。一个愚昧的农妇发现了一起“惊人的事件”：一个“俄国佬”跑到山上，在那边写着什么——显然是在绘制波罗宁的战略地图。这个农妇向当地的宪兵报告了，于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家就遭到了搜查。他们除了搜到一些他们不懂的数字表格和一枝破旧的手枪外，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东西。宪兵要求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第二天同他一起到附近的新塔尔克城去。

宪兵走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骑了自行车到我家里来。显然，可能会出现很糟糕的情况。必须立即设法取得当地那些了解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活动的有影响的人士的帮助。于是我们就商量物色合适的人选，我们商定去找扎科帕奈大疗养院院长德卢斯基博士，我同他很熟悉。他曾经参加过波兰革命运动，他从所阅

读的书刊上不会不知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这个人。

我们没多考虑，就骑上自行车到离扎科帕奈四五公里的疗养院去。德卢斯基很客气地接待了我们，他对能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认识感到很高兴。德卢斯基毫不犹疑地同意在新塔尔克县长面前给予担保，只要这件事还没有转给军事当局，他认为是有希望很快解决的。

我们一起顺利地回到波罗宁后就分手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到同志们那儿去，把已经发生的事情告诉他们，并同他们讨论下一步的对策。我就去找作家卡斯普罗维奇，以期也能取得他的帮助。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这件事使他感到非常不安。他说，他当然愿意去找县长谈谈，但他不能去找军法机关，因为他的妻子是俄国人，又是将军的女儿，所以现在军事当局对他全家都有怀疑。

第二天，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到新塔尔克去，在那里他被捕了，因为案件已经转给了军事当局。

我们在扎科帕奈的熟人现在已无法帮助我们了。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和其他同志给国会的社会党议员拍了好多电报，其中有给克拉科夫的马列克，给利沃夫的迪阿曼德，给维也纳的维克多·阿德勒等人。这个办法起了作用。过了十天左右，维也纳下达了释放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命令。后来在维也纳还有阿德勒同奥地利总理谈话的传闻。总理问他：

“您是否确信列宁的确是俄国沙皇的敌人？”

阿德勒回答说：

“阁下，这是肯定的。同您比较起来，他是沙皇更加不可调和的敌人。”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获准去克拉科夫，从那儿他再转往维也纳。在维也纳他获得了离境去瑞士的许可。

过了几个星期，我也离开了波罗宁，这个地方现在对我们已经

变得不友好了。我同弗·雅·柯恩全家一起到了维也纳。在国会议员埃伦博根和维克多·阿德勒的帮助下，我也获准从那里离开奥地利。在12月间我来到苏黎世。

那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住在伯尔尼。他是在1914年8月23日(9月5日)偕同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到那里去的。过了一天，我们就在城外的树林里召开了当地的布尔什维克小组会议。会议听取了弗·伊·列宁的报告，并且通过了他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关于战争的提纲》^①。

载于《回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第1卷1956年莫斯科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版第504—526页

^① 见《列宁全集》第21卷第1—4页。——编者注

列宁在帝国主义大战前夕

雅·斯·加涅茨基

1912年1月布尔什维克布拉格代表会议以后，列宁决定从巴黎迁往加里西亚的克拉科夫城，这个城市离俄国国境线仅一个半小时的路程。当时的情况需要离俄国近些，离《真理报》近些，使信件往来能够快些，能够把各种指示尽快地送到各个党组织手里。

列宁把这一决定通知了我（那时我住在克拉科夫），他要我弄清楚，他是否有落到沙皇的宪兵手中去的危险。当时，奥匈帝国在德国的积极参与下正加紧准备发动对俄战争。所以奥地利当局并不想帮助沙皇政府进行对俄国革命者的斗争。考虑到这一点，我相信列宁可以放心地迁来克拉科夫。同当地的一些政治活动家（他们了解当局的情况）谈话以后，我确信了自己的估计，于是就把这一情况写信告诉列宁。

1912年6月19日（7月2日），列宁来到克拉科夫。他先在旅馆里住了一两天，后来搬进了兹韦日涅茨街二百一十八号住宅。

列宁靠了一张克拉科夫城（连同郊区）的地图和一本俄波词典，很快就熟悉了环境。列宁到了克拉科夫一个半月以后，有一次在同我谈话时讲到郊区的情况，讲到附近农村农民的情况。他们对他们的生活状况，风俗习惯，思想情绪讲得很多。他还讲到农民对过多的捐税和飞涨的物价怨声载道。

他对克拉科夫农民的特点了解得十分准确，对克拉科夫郊区

的情况描绘得有声有色，这使我感到惊讶。

我说：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您来到这里还不久，您是怎么来得及把这里郊区的情况了解得那么清楚的呢？更主要的，您怎么会这样准确地了解农民的特点？”

伊里奇开着玩笑回答说：

“这是我的秘密……您一直闷坐在家里，而我在假日里总要骑上自行车到郊区去游逛，与农民交朋友。这里的郊区很美丽，很吸引人。”

他马上就描绘起克拉科夫的郊区来，并讲述他同农民谈话的情形。

我感到更加惊奇了，我问道：

“怎么可能呢？您怎样同他们交谈的呢？您不是不会说波兰话吗？”

“谁对您说的？我有词典，我已经掌握了不少波兰语词汇了，依靠词典我能看波兰报纸。到郊外去闲逛的时候，我随身带上词典，靠词典帮忙。我走进农舍，向他们问好，向他们买一点牛奶，于是就交谈起来。我用波兰话讲。如果有些波兰话不知道，就用德语代替，因为他们中间有不少人当过兵，就是说，他们学过一点德语。在交谈时常常还不得不用手势来传意……总之，我们的谈话进行得很顺利，大家能相互了解……这里的农民是很有意思的，是相当不错的。可惜，这里的社会民主党没有重视他们，没有在他们中间开展工作。而没有农民，我们是什么事情都办不成的……”

列宁是在工作之余出去闲逛的。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主要目的，是与俄国的党组织取得更加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很快就建立起来了。先是克拉科夫，夏天以后波罗宁都成了我们布尔什维克大军的真正的统帅部。我

们各部门的一些高级指挥官常常到这里来。到这里来的还有我们杜马党团的成员，党中央和地方党委的代表，工运工作人员，保险基金会的工作人员等。他们在这里进行讨论，召开代表会议。为了与无产阶级的敌人进行当前的和未来的战斗，大家在这里作战斗准备。

同自己领袖的密切联系产生了出色的效果。到这里来的同志弄清了某些极端重要的问题，取得了必要的指示，丰富了自己的知识，以更大的干劲，更坚定的信念回去开展工作。不少同志在这里呆上一个月，甚至更长一些时间，在领袖的指导下，弥补了自己在理论方面的缺陷。

司令部的工作十分紧张。从这里把各种指示和指令发往各级组织，把各种文章发往报馆，杜马代表的有关原则性问题的发言在这里进行加工。列宁在《真理报》上发表的每一篇文章，我们的代表在杜马会议上的每一次发言，都是对地主资产阶级堡垒的猛烈冲击。

工人群众在布尔什维克的旗帜下日益团结起来，他们越来越感到自己是有力量的。在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下，他们团结一致，开展有组织的进攻，他们在同自己的论敌的日常辩论中，在罢工斗争中，不断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任何镇压措施，暗探机关的任何阴谋诡计，都不能制止日益高涨的革命浪潮。

1914年各工业中心的工人群众的思想情绪同1905年前夕的情况有相似的地方。默默无闻的年代过去了，工人开始向资产阶级发动猛烈的进攻。人们感到，新的决战日益迫近。如果没有这次强盗式的帝国主义大战，谁能说工人的这场决战不会发生呢？

老实说，就连国际的“领袖”王德威尔得先生也不得不承认这种思想情绪。他在1914年曾到过彼得堡，出席过很多工人会议，访问过各种工人组织，他不可能不看到那里的情绪十分高涨。工

人的这种思想情绪使这位“革命者”感到十分焦急。特别是布尔什维克在工人群众中的几乎是占绝对优势的影响使他感到十分不安。关于这一点，同他在思想上一致的朋友，即日益丧失群众基础的孟什维克取消派也同样感到焦急不安。

怎么办？怎样使工人脱离布尔什维克？我们的孟什维克再三思索，终于想出了办法：必须迫使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统一起来。他们进行了活动，于是为了促使大家统一，第二国际便召开了俄国各组织的代表会议^①……孟什维克胜利了。国际这个最高当局要迫使列宁服从。

伊里奇恼火得很。他的工作本来就已经十分繁重，而现在又不得不应付这种蠢事。他丝毫也不怀疑，代表会议是不会取得任何结果的。布尔什维克决不放弃自己的革命策略，而孟什维克和王德威尔得先生就是想达到使布尔什维克放弃自己革命策略的目的。

这就要派个代表团去。但派代表团不是为了屈服，而是为了在政治上再给孟什维克一记耳光。伊里奇决定派个代表团去，但他自己无论如何都不愿去。

记得我曾想说服他亲自去参加会议；我说，他的威信有很大作用，可以影响孟什维克改变策略。但伊里奇针对我的这种天真的想法笑着说：“如果孟什维克打算跟我们走的话，那他们就没有必要召开这次会议了。他们是想当着国际的面骂我。我是不想满足他们的这个要求。再说，时间也很宝贵，与其胡扯一通，倒不如干点事情……”

不久我就相信了伊里奇的看法是正确的。会议开起来了，代表们不断来到。布尔什维克的代表印涅萨·阿尔曼德、弗拉基米

^① 指1914年7月3—5日（16—18日）召开的布鲁塞尔“统一”会议。——编者注

尔斯基、波波夫也陆续到了。他们采取了非常左的态度，几乎被孤立了，但情绪却很饱满。我当时参加的是波兰“分离派”代表团。

国际的要人王德威尔得、胡斯曼、考茨基都来了。普列汉诺夫、罗莎·卢森堡也到了。大家都注意着布尔什维克那边：列宁还没有来，显然是迟到了，明天一定会来的……王德威尔得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表示对革命的俄国无产阶级的敬意；他说，决定性的时刻即将到来，他号召大家联合起来。他说联合才有力量……孟什维克支持他的讲话，并抱怨布尔什维克不遵守纪律。他们郑重表示准备接受国际提出的实现统一这一要求。大家的发言几乎都是这个调子……布尔什维克破坏了这种洋洋得意的气氛。他们“敢于”同王德威尔得展开争论。**力量在于正确的、革命的阶级策略，在于正确的路线，而不在于把各种相互矛盾的路线联合起来。**我们不反对同孟什维克统一，但条件是：他们要无条件地承认我们的策略，服从我们的决议……我们的对手没有预料到我们的这种“无礼的态度”。他们大声叫嚷说：“你们都不是负责人，你们不知道你们讲的是什么！列宁在哪里？他什么时候来？到头来他得当着国际的面听取斥责……”

当布尔什维克的代表们若无其事地说，列宁正忙着呢，他没空来参加会议，这时，第二国际的先生们的脸部表情是很难描绘的。因为就是这些布尔什维克代表着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在发言。

会上提出了企图抹杀布尔什维克同孟什维克之间的根本分歧的决议案，他们企图用这种办法把俄国的工人引入歧途。布尔什维克的代表们宣布拒绝投票表决这类决议案。

第二国际的“领袖”王德威尔得妄图恫吓布尔什维克党的这些坚定的代表，他说：

“那些拒绝表决所提出的决议案的人，是否意识到自己的行为

是怎么回事？决议案并不说明什么问题。它的内在意义是统一的愿望。中央委员会的代表们是否知道他们在干什么？他们将要受到两个审判员的审判：维也纳代表会议^①和俄国无产阶级。他们是否知道将受到什么处分？对决议案可以表示赞成，也可以表示反对，但拒绝参加表决这就意味着嘲弄……”

王德威尔得有一点说对了：布尔什维克的代表们并不讳言要嘲弄到会的全体机会主义者。“领袖”的恫吓并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布尔什维克中央的代表们自始至终拒绝参加表决……

这是布尔什维克与第二国际的最后一次接触……不久就爆发了战争。全体正直的革命者都看清了这个可敬的机构的全部腐朽性和它可耻的背叛行径。

人们对这场战争虽然早就在议论纷纷了，但是战争的爆发对伊里奇的震动依然很大。他消瘦了，变得沉默寡言了，他老是在思考问题。他在对新出现的形势进行分析，作出相应的结论。在他的脑海中产生了新的行动计划。显然，战争将是持久的，将给各国劳动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资产阶级在社会主义叛徒的支持下，到处兜售团结国内一切力量抵抗共同的外敌的口号。必须全面揭穿这种“公民和睦”的全部卑鄙实质。必须向各交战国的工人解释目前进行的战争的真正含义。必须使他们相信，他们应该为反对这场战争而斗争。同资产阶级谈不上任何联合，而要联合起来反对资产阶级。不要因为战争而同资产阶级休战，而要用战争来反对战争。

伊里奇对全部情况都很清楚，他拟订了新的计划。

他象笼中猛兽，辗转不安。在奥地利的波罗宁，在这样一个交战国家，他无法进行工作，没有用武之地。不久他由于荒谬的间谍

^① 1914年预定在维也纳召开国际社会主义代表会议。——雅·加·注

嫌疑罪被捕。伊里奇在监牢里呆了十一天，获释后就到瑞士去了。

他固有的钢铁般的毅力在这里开始发挥作用了。同俄国的联系又恢复了。明确的指示和新形势下的工作计划分送到各地。同其他各国的忠于工人阶级的革命社会民主党人（他们剩下已为数不多）取得了联系。建立新的，第三国际的基础正在成熟。第三国际的拥护者的数量暂时虽然还不多，这并不使伊里奇担心，**主要是他们的质量**。伊里奇始终坚持“宁肯少些，但要好些”这一准则。

不久以后，即到了1914年10月19日（11月1日），在伊里奇的强有力的领导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在瑞士复刊了。

《社会民主党人报》宣称它将“反潮流”，它立即同工人阶级的叛徒——社会沙文主义者展开了无情的斗争。考茨基、普列汉诺夫以及其他一些人都受到了批判。第二国际的垮台已经确凿无疑了，必须建立起新的国际。

载于雅·加涅茨基：《忆列宁·回忆片断》

1933年莫斯科党的出版社版第8—12页

列宁与国家杜马布尔什维克党团

阿·叶·巴达也夫

布尔什维克党团在最反动的第四届国家杜马里好象是被死硬的黑帮分子的汪洋大海包围着的小小孤岛。俄国的整个工人阶级通过布尔什维克的代表们向沙皇政府提出自己的各种要求，揭露沙皇制度的血腥统治。我们的代表在杜马讲台上的发言，在唤起革命精神方面具有重大意义。在警察当局对每一个革命工作者都进行残酷迫害的情况下，我们党团由于拥有相对的“合法”身份，自然应当成为俄国国内党的工作的中心。党的一切联系都集中到党团这里，这种联系一方面来自俄国最遥远的边区，另一方面来自在国外的党的领导机构。布尔什维克的代表们与工人群众保持着经常的联系，他们经常出入工厂，建立党的支部，组织书刊的印刷和出版等等。整个党团由六个布尔什维克组成，他们都是工人：彼得罗夫斯基、穆拉诺夫、马林诺夫斯基（后来发现他是奸细）、萨莫伊洛夫、沙果夫和本文作者。我们这些工人都是由我们所在的工厂直接选举出来参加杜马的。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认为，我们党团的工作对党和整个革命运动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所以无论在党团形成过程中，还是在选举的时候，他对我们党团特别关心，花了不少精力来指导我们的工作。列宁同志十分仔细地了解工人在选举时的各种思想情绪，留心观察各种秘密的工人选举会议（由于要避开警察当局的视线，这

种会议我们不得不在森林的“大自然怀抱里”召开),发出各种指令和指示,指导《真理报》的竞选运动,等等。

选举以后,当工人代表们集中到彼得堡的时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马上就把注意力放到组织党团的工作上。他对每一个代表的情况都分别作了了解,他对竞选运动的结果作了总结,他弄清了选举是在什么情况下进行的,代表们带来的是什么样的委托书。从克拉科夫寄来了供工人选民团选出的代表填写的特别调查表。这种表格包括十九个详细的项目:参加选举的工人比率,选举会议的过程,选举前散发材料的情况,提出名单的方法,会上发生的争论,初选代表的组成,其他政党的发言,选举时所受到的镇压,等等。此外,调查表还要求回答有关党的工作的一些问题。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认为不应该只局限于形式主义的回答,而要求每一个代表连贯地汇报他们看到的自己省内的选举情况。列宁对代表们的汇报十分重视,因为从这里可以了解到工人阶级的思想情绪的概貌……

我们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建立了牢固的联系,随着党团工作的开展,这种联系也随之日益密切。在我们杜马内和杜马外的工作中,在所有的一个重要问题上,我们都经常得到伊里奇的帮助。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不但指导整个党团工作,而且对每一个代表的工作都给予帮助。在伊里奇本人的指示和他所写的信件中,总要明确而肯定地提出一些问题,这些指示和信件,是加强和提高我们整个工作的取之不尽的力量源泉。

我们充分利用了杜马的各种会议来进行群众性的革命宣传鼓动工作。但有时我们感到这一切还不够。

我们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在大臣和黑帮分子登上讲台的时候,我们就向他们示威。这当然好,但还不够。工人会问:你们在杜马中提出了哪些实际提案?你们制订的法律在哪里?”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象通常那样大笑起来，他说：

“黑帮分子的杜马是永远不会通过改善工人状况的法律的。工人代表的任务是利用杜马的讲台，每天向黑帮分子表明：工人阶级是有力量的，是强大的；革命高潮重新到来的日子已经为期不远了；这个革命将把整个黑帮，连同他们的大臣和政府一起扫除干净。当然，也可以对预算提出修正案，甚至还可以提出某种法律草案，但所有这些行动应该为了一个目的：痛斥沙皇制度，揭露政府的全部骇人听闻的专制罪行，宣传工人阶级的无权状态和遭受残酷剥削的事实。这就是工人期待自己的代表去做的事情。”

秋末以后，我们在国家杜马内组成了独立的布尔什维克党团。我们在报纸上和在一些专门的告俄国工人阶级书中，说明了同孟什维克分裂的原因，号召工人群众支持自己的代表。党团和《真理报》开始不断地收到要同布尔什维克团结一致的大量决议，这种决议首先来自彼得堡，后来也来自其他的工人中心，最后连俄国最遥远的边区也寄来了这类决议。工人们寄来了决议，抗议孟什维克的所作所为。我们的布尔什维克党团受到了欢迎。

当六个人组成了独立的党团以后，我们面临的任务就比以前更加重大了。我们在杜马内发表演说更加频繁，同时演说的内容也更加激烈，更加具有革命性。布尔什维克党团进行了大量的工作。党团的秘密工作也有了加强。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竭力帮助我们进行工作。每当我们就特别重要的问题发表演说以后，总要收到他的来信，他在信中或者赞扬我们的演说，或者指出我们发言中的不足之处。我们把杜马日常工作中的问题的各种资料寄给伊里奇。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仔细研究这些资料后，常常把它们整理成提纲寄回来，供我们发表演说用。遇到某些特别重要的问题，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甚至写好发言稿寄给我们。遗憾的是，由于当时秘密工作条件的限制，列宁

写的这些发言稿原件未能保存下来。但是根据各次杜马会议的速记记录,几乎可以把这些发言全部整理出来。^①

1914年春,列宁提出了进一步加强党的工作的问题,他对地下工作特别注意。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指示我们党团说,应该加强各地下支部的工作,应在工厂建立工人小组,以便通过这些小组把上面提出的各种口号及时地传达下去;以便加强党的纪律,有了纪律我们才能不断取得胜利。为了这一目的,他还提出要加强俄国国内的中央领导机构,要帮助斯大林和斯维尔德洛夫逃离流放地,还要吸收一批其他的同志参加工作。我曾收到伊里奇给我的一封信,他通知说,我已成为党的中央委员会成员。在中央委员会里,我的党内化名叫彼得。

那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把组织工作的重心放在筹备例行的党代表大会上,这次大会预定在1914年8月召开。列宁认为召开这次代表大会意义重大,大会将巩固党已经占领的阵地,彻底清除取消派以及杜马中的孟什维克“七人团”的各种影响。我们杜马党团承担了在俄国国内召开代表大会的全部筹备工作。列宁为我们提出了明确的计划,作出了具体的指示,他告诉我们如何进行大会的筹备工作。我们每一个人去巡视一个地区,在那里分头开展有关代表大会的组织工作和宣传鼓动工作。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甚至还亲自给代表分配地区,我负责的地区在伏尔加河流域和高加索地区。当然,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必须严格保密,因此必须用也将在那个时候召开的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的名义来作“掩护”。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写信给我们说,为了筹备这次大会,我们必须全力以赴,必要时甚至可以暂时放弃我们在杜马中的部分工

^① 列宁为第四届国家杜马布尔什维克代表写的部分发言稿(或提纲)被保存下来了(见《列宁全集》第19卷第124—134、171—187页;第20卷第211—219页)。——编者注

作。

对我们党团的日常工作，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不断地给我们发出各种详尽的指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特别指示我们，必须尽可能广泛地组织好“五一”演说，准备提出八小时工作日的法案，帮助工人刊物提高技术水平，等等。

但是，我们党团全力进行的召开党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由于宣战而告中断，这次战争使党代表大会无法按期召开了。同时由于宣战，我们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联系变得困难了。伊里奇同我们的通信也越来越少了。临近1914年秋天时，沙皇政府解散了我们整个党团，我们遭到逮捕、审讯，并被流放到西伯利亚。

我们的工作自始至终都是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领导下进行的。杜马中的布尔什维克党团之所以能在俄国革命运动中发挥重要的作用，这全要归功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领导。

载于1928年1月21日《列宁格勒
真理报》第18号第2版

我们的英明领袖

格·伊·彼得罗夫斯基

我是在 1912 年底认识弗·伊·列宁的，那时我和第四届国家杜马的其他几位布尔什维克代表，出席了有党的工作人员参加的党中央委员会在克拉科夫举行的会议（大家知道，出于保密的考虑，这次会议称为“二月”会议）。弗·伊·列宁当选为这次会议的主席。

我们这些工人代表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谦逊和简朴都感到惊讶。会议是在他的住所召开的，我们也在他那儿吃午饭（午饭由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准备的，参加会议的女同志帮她的忙）。使我们惊讶的是，弗·伊·列宁虽然长期侨居国外，但他却那么清楚地了解俄国工人的情绪，那么深切地关注着所有与工人运动有关的问题，那么深刻地概括各种个别现象，并指导我们这些担任实际工作的革命者也这样做。

这里有一个典型的例子。会议结束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同每位杜马代表都单独地谈了话，详细地询问他们在选区的工作情况。他在同我谈话时，要我把 1912 年南方工人运动的情况与 1897—1900 年巴布什金在叶卡特林诺斯拉夫工作时的情况作一比较。我回答说，那时各个工厂里觉悟的工人是屈指可数的，而现在，每个工厂都有几十个，有的厂甚至有几百个觉悟工人。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问道：“那么现在，经过反动年代之后，工

人们对要求建立民主共和国的态度是怎样的？他们大概胆怯、害怕、退缩吧？”

我感到奇怪，列宁是从哪里知道这些现象的呢？我证实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跟我说的话。事实确是如此，当我几次在工人集会上做报告，讲到“应该为建立民主共和国而奋斗”时，工人们总有点儿害怕。列宁解释说，这是反动年代和迫害所造成的后果，这是孟什维克向工人灌输恐惧与胆怯情绪，进行瓦解工作的结果。

接着我向弗·伊·列宁报告关于《真理报》的发行情况。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问我：要是《真理报》出版《顿巴斯矿工》、《乌拉尔工人》这样的副刊，您看怎么样？

在那几年里，弗·伊·列宁领导着布尔什维克党的工作，他极为清醒地预见到日益逼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他高瞻远瞩，预言无产阶级革命必不可免。下面列举的几件事可以证明这一点。

事情发生在1914年的5—6月间，第二国际主席王德威尔得在这个时候来到了彼得堡。他以必须实现工人阶级的统一为借口，企图“消除”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的分裂，从而把俄国革命的工人运动置于孟什维克的控制之下。

当时布尔什维克党的合法的中心，除《真理报》外，还有第四届国家杜马布尔什维克党团。在杜马中除了工人选民团选举的布尔什维克“六人团”之外，还有小资产阶级的选民投票选出来的七个孟什维克代表。王德威尔得宣称，他的任务就是研究俄国无产阶级的大多数究竟是跟哪个党团走的。实际上他打算把布尔什维克工人代表同孟什维克代表联合起来，一旦发生帝国主义战争，就可以使已经联合起来的社会民主党党团在杜马投票支持帝国主义战争，赞成军事预算。

弗·伊·列宁预见到第二国际首领们的这一政治伎俩，他虽

然身在国外，却领导着第四届国家杜马布尔什维克党团的活动。弗·伊·列宁得知王德威尔得到达彼得堡后，就建议我们布尔什维克代表接待王德威尔得，并让他看看首都和全俄国的工人阶级究竟是跟谁走的。我受委托邀请王德威尔得访问《真理报》编辑部。在这里布尔什维克代表们在第二国际主席面前首先发了言。他们在讲话中介绍了俄国工人运动的真实情况。前来《真理报》报社的还有各个工会理事会的主席和书记，他们向王德威尔得介绍了工会的情况、工会的人数、经费等等。工会代表们说，工人群众和工会本身都站在《真理报》的立场上，也就是说都站在布尔什维克的立场上。

在国家杜马的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代表举行的联席会议上，我们主张以《真理报》所阐明的原则作基础，实现工人运动的统一。我们指出，由于与孟什维克存在着原则性的分歧，同他们的统一是不可能的。在这次会后王德威尔得走访了几个工会理事会。他在事实面前不得不承认，在俄国工人运动中布尔什维克有着主要的影响。结果王德威尔得一无所获地走了。

选举出席预定在维也纳举行的第二国际代表会议代表的事实表明，工人群众是跟布尔什维克走的。出席代表会议的委托书，大部分是“真理报”派得到的。孟什维克普列汉诺夫分子连一份委托书也没有得到。他们要求我们布尔什维克哪怕让出一份委托书给普列汉诺夫也是好的。我们回答说，如果普列汉诺夫准备维护我们党的纲领，那就把委托书给他。不久，彼得堡委员会和布尔什维克代表们委托我去国外见列宁，以便解决党的工作中的一系列重要问题，特别是向他报告王德威尔得在彼得堡逗留的情况。我把有关说明工会和其他工人群众组织立场的材料带给了列宁。弗·伊·列宁那时住在波罗宁，在一个农民家里租了一所小房子。我们所有的会议都是在这个农民家里的凉台上开的。

我向列宁汇报了我们接待王德威尔得的情形。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称赞我们接待王德威尔得的一切做法，并说我来得正是时候。原来这时第二国际执行局召开的布鲁塞尔会议正在进行，这次会议讨论了布尔什维克同孟什维克统一的问题。孟什维克散布流言说，列宁也在布鲁塞尔，但他不愿意出席会议。

出席1914年7月16—18日（新历）召开的布鲁塞尔会议的代表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布尔什维克）、组织委员会（孟什维克）、普列汉诺夫的“统一”派和其他一些人。代表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出席会议的是米·费·弗拉基米尔斯基、印涅萨·阿尔曼德和伊·费·波波夫。第二国际的首领们对我们同志的态度极不友好，因此我们的代表团把这种对自己不利的境况报告给了列宁。

第二国际的首领们借口“调解”布尔什维克和取消派之间的分歧，借口确立党内“和平”，要求布尔什维克停止批判取消派的妥协政策，并同它联合。布尔什维克没有对孟什维克让步，并拒绝了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者干涉党内生活的企图。列宁从波罗宁领导着布尔什维克代表团的工作。他写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报告，此报告由印涅萨·阿尔曼德在会上（用法语）作了宣读。列宁同时还为参加会议的党中央委员会的代表们写了指示。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听完我的汇报后，提议把我从彼得堡带来的材料和报纸全部寄往布鲁塞尔，给我们的代表团使用。我们就这样做了。由列宁和我署名给国际社会党执行局拍去一份电报，告知给他们寄去有关王德威尔得彼得堡之行的各种材料。同时给我们的代表团寄去了这份电报的副本。我们的材料在会上产生了很深刻的印象，对揭露孟什维克的流言蜚语起了很大的作用。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根据布鲁塞尔会议的情况，对当时的事

件，对第二国际首领们力求通过使布尔什维克同孟什维克统一的决议，从而破坏布尔什维克在工人运动中影响的政策，作了评价。弗·伊·列宁指出，要使国际工人运动的状况得到改变，要使忠实于工人阶级和无产阶级革命的人来领导社会主义国际，还必须做很多工作。列宁深信俄国革命和世界革命一定会胜利。

这时候，革命的火光已经在俄国闪耀。工人罢工的浪潮已席卷整个俄国。顿巴斯正在进行大规模的罢工。彼得堡的罢工运动已发展成同警察和哥萨克的公开冲突。维堡区已出现了街垒。革命的浪潮越来越有力地冲击着沙皇制度的基础。弗·伊·列宁在谈到革命正在接近胜利这一看法时，要我尽快结束国外的工作，回到俄国去，因为正象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所说的，布尔什维克代表应当站在自己的岗位上。于是我带了大量秘密书刊从波罗宁动身返回俄国，当我到达彼得堡时，还看到了维堡区的街垒。

十月革命以后，弗·伊·列宁成了苏维埃政府的首脑，他的名字已为全世界劳动人民所熟知，但他仍然是一个谦虚的、关心人的、异常重视其他工作人员意见的同志。列宁制定了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并以身作则地遵守这些原则。

这里有一个刻划弗·伊·列宁形象的鲜明例子。1920年4月5日，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们因列宁的五十寿辰即将来临，特向他表示祝贺。两个代表讲话之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这已经足够了，并且提议谈谈党和苏维埃建设中的迫切问题。然而大会的代表们不同意：他们切望表达自己的感情，表达自己对弗·伊·列宁的热爱。于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走开了。他不喜欢人们颂扬他，这是他的一个十分明显的特点。轮到我担任会议主席的时候，有人告诉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来电话找我，他问现在大会上在作些什么，我回答说：“祝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五十寿辰的讲话仍在继续”。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坚决要求我

这个当主席的阻止这些讲话。但是无法办到这一点。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教导我们共产党人要谦虚，教导我们要把我们为之服务的党和工人阶级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载于《回忆弗·伊·列宁》1954年莫斯科
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版第93—98页

在 1914 年

费·尼·萨莫伊洛夫

我于 1914 年 1 月回到彼得堡以后，又感觉到健康状况很不好。那时一边工作，一边进行治疗，但没有奏效。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得知这一情况后，叫我去克拉科夫，于是我在同年的 1 月下半月取道华沙，到了那里。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住的房子座落在城市东区边缘的卢博米尔谢戈街上。他的住所共有两个不大的房间，里面放着两张简朴的床、两张普通的木制桌子和几只木制椅子和凳子。

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克鲁普斯卡娅亲切地接待了我。她告诉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正离家在外，要过几天才能回来。

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对那时俄国国内发生的一切自然十分关切，但是她听我谈论这些消息时，不时打断说：不要急，您不能多说话，还会有时间的，您可以再详细谈。

当晚我宿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住所里，第二天我被安置到亚历山大·安东诺维奇·特罗雅诺夫斯基的住所里居住。

在等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回来的日子里，我尽量仔细地考虑了我应向他汇报的内容，即我所知道的关于国内我们党的情况、关于杜马党团的工作和《真理报》的情况等等。

在那以前，我从来没有见到过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即将同我

们党的领袖的首次会见使我感到有点胆怯。但是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一回来，我同他见面之后，我立刻发觉站在我面前的是一位普通的俄国人。他的外表、所穿的服装、说话时的手势——他身上的一切都很平常。唯独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一双眼睛熠熠闪光，显得与众不同，有时我觉得这双眼睛能洞察我的心灵。

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详细地询问了我的健康状况之后，我正想开始叙述俄国国内我们党的工作状况，但是他也象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一样，马上就阻止我说：您连续讲许多话是有害的，以后慢慢再讲，不用急。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竭力鼓励我说：我们无论如何要想办法把您的病治好，不过您千万别灰心。

第二天，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通过当时在那里的谢·尤·巴哥茨基同志，介绍我去找那时克拉科夫的一位著名医生、大学副教授兰道大夫。大夫替我作了检查，并劝我到瑞士去治疗。

后来我在克拉科夫还逗留了一些时候，因此有机会每天见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并就他与我都感兴趣的许多问题进行了交谈。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全力以赴地从事党的工作：大量阅读和写作，并且每天晚上十一时左右亲自到火车站去寄自己发往俄国的邮件（为我们布尔什维克的报刊撰写的文章、供布尔什维克代表用的发言稿、有关党的工作指示和其他材料）。

不久我动身去瑞士。在送我去火车站的路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再三叮嘱，要我写信告诉他治疗过程。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还给住在伯尔尼的一些俄国布尔什维克侨民写了信，要他们尽快地妥善安排我的治疗。

我在瑞士逗留得相当久，这期间经常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通信。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来信中询问我的健康状况，劝我少

考虑工作，多注意治疗，有时他也告知一些政治方面的消息。这样的信我收到相当多，可是1914年11月我们在彼得格勒被捕的时候，这些信件全部销毁了（这些信件连同其他材料都被我们付之一炬）。

6月末我已经痊愈了，身子也结实了，于是我打算返回俄国去，但是突然爆发的帝国主义战争，使我未能成行。

德国与奥地利的边境已经封锁，因此，在走之前需要花很长时间来打听，还有哪些路线可以去俄国。这时我住在莱兹根别墅村。

有一天，我收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从奥地利发来的电报，要我如有可能给他寄一些钱去。在这之前，我曾收到从彼得堡寄给我的杜马代表薪金，我就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电汇寄去五百法郎。在这以后，几个与我有联系的俄国政治侨民突然遭到瑞士警察的逮捕；第二天，当我在一位被捕的俄国政治侨民家里，坐在别墅的小台阶上时，忽然出现了几个骑自行车的、我从未见过的家伙。他们一再驶近小台阶，并且极为放肆地、粗野地盯着我看。这一情况十分可疑，但是我没能想到这些人会是密探。我没有这样去猜疑，因为我当时认为瑞士是一个最“民主的”国家。

许多政治侨民毫无道理地遭到逮捕，这使我觉得十分意外。那时我不相信，在瑞士会出现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暴戾行动，尤其是“不经宣布原因”就实行逮捕的恶劣行径。

但是事实毕竟是事实。“父母之邦”的俄国的专横暴虐的景象在我眼前浮现。从那时起，“世界上最自由的瑞士民主”的声望在我眼里已经一落千丈了。

第二天被捕的人获释了，这之后盯我梢的暗探也不再出现了。后来打听到，确实有人不折不扣地怀疑我们从事替俄国效劳的间谍活动，原来我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通信成了这一事件的因头。那时担任伯尔尼警察局局长的社会民主党人斯格拉根在使被

捕者获释上起了作用，他向瑞士警察当局解释说，对政治侨民的上述控告完全是荒谬的。

后来得知，原来还准备逮捕我，但由于我有代表头衔，怕引起“外交上的纠纷”，才没有下手（他们没有想到，我所属的党是沙皇制度的不共戴天的敌人，因此不会因逮捕我而发生任何“外交上的纠纷”的）。

稍晚一些时候才得悉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没有收到我寄的钱。只是通知他说，“有一笔汇款是寄给他的，但是不能发给他，因为他是与奥地利交战的国家的国民”。

与此同时，事态迅速发展。各交战国的社会党的领袖们背叛了社会主义国际，这在旅居瑞士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中间引起了很大的混乱，并在它中间形成了两种极为明显的针锋相对的观点。普列汉诺夫、阿列克辛斯基和其他一些人采取了护国主义和沙文主义的立场，而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则坚定地站到了反对战争和反对沙皇政府的斗争立场上。

这时我又住在伯尔尼，当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也在那儿。他作为与奥地利交战的国家的国民，遭到奥地利当局的逮捕，获释后刚从奥地利来到伯尔尼。抵达伯尔尼后的第二天，即8月24日（旧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当地一个布尔什维克小组举行的会议上作了关于对待战争的态度报告。会议是在城外的森林里举行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一切关于保卫祖国的言论都是沙文主义，在战争中对沙皇政府的任何援助都是对工人阶级的背叛；因此我们必须利用沙皇政府在军事上的一切困难来跟它作最坚决的斗争。接着他说，必须在世界各地进行宣传，以便把帝国主义战争转变为国内战争；所有交战国的工人应当掉转枪口去反对本国的资产阶级和本国政府。

这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所作的以我们党对待那时已经开始

的帝国主义战争的态度为题的首次演说。这次演说为我们党在当时这个重要问题上提出了基本的策略方针，这一方针为稍晚一些时候发表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第三十三号上的党中央委员会的宣言《战争和俄国社会民主党》奠定了基础。

载于费·尼·萨莫伊洛夫：《过去的足迹》1954年莫斯科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版第260—264页

往事片断

维·阿·卡尔宾斯基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我正住在日内瓦。瑞士周围炮声隆隆。

那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住在加里西亚的波罗宁诺村。有很长一段时间得不到他的一点消息。终于在1914年8月24日（9月6日）收到了他从伯尔尼寄来的一张明信片。

原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作为俄国国民被无端怀疑从事间谍活动而遭到逮捕。

1914年8月6日（19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被释放。尔后，他获准前往瑞士。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在抵达瑞士的第二天，便开始进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和反对“新型的民族主义者”——社会党人、资产阶级祖国的爱国主义者——的斗争。列宁在从伯尔尼寄来的信中，毫不留情地抨击社会民主党领袖们的叛卖行径：“……自哈阿兹到王德威尔得和盖得——所有这些人尽干下流的事情！”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还问到，在日内瓦是否有俄文印刷所？能不能印反对战争和社会爱国主义者的传单？

列宁在托人捎来的一封信中，在谈到考虑印刷传单一事时提醒我说，自从宣战以来，备受赞扬的瑞士民主已经变得异乎寻常了。他写道：

“有一切根据可以预料，瑞士警察局和军事当局（只要俄国或者法国以及其他国家的大使一打手势）就会以破坏中立等罪名实行军事审判或驱逐出境。”^①

所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建议销毁全部往来的信件，行事要千万注意保密，书信往来要用“化学”方法写，并使用约定的标记等等。例如象约定把打算出版的宣言称为“资本主义的发展”。

在我们的书刊出版工作中，最大的困难在于我们没有自己的印刷所，说得确切一点，就是没有自己的拥有一套俄文铅字的排字房。

在日内瓦有一所小型的备有俄文铅字的私人排字房，它的业主就是年老的乌克兰侨民、绰号叫“库兹马”的很出名的利亚霍茨基（从俄国给他寄来的信上写的地址是：瑞士。库兹马。）倘若没有这位老库兹马和他的那套俄文旧铅字，那末我们大概只好采用油印的办法，关于这个办法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自己的一封信中也曾提到过。

不管排印什么，也不管为谁排印，库兹马总是无例外地干。所有的订户他都友善地称之为“著作家”，并且尽可能地满足他们的要求。在他的排字房的架子上摆着一套套经他排印的俄国侨民各个时期和各种派别所出版的刊物，其中还有最早期的刊物。

工作的人只有库兹马一个。可是倒霉的是，这时他的妻子来了（不知她是从哪儿来的），她就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信中不止一次提到过的库兹米哈。这个爱唠叨的红鼻子老太婆不时地责骂可怜的库兹马，怪他不到瑞士的印刷所去寻个固定的工作，而同各种“胡作妄为”的订户打交道。

“著作家”成了库兹米哈的私敌。她特别仇视我们这些布尔什

^① 《列宁全集》第35卷第140页。——编者注

维克。我们的每一号报纸到时能否出版有时要看库兹米哈是否赏脸。

难怪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要求我经常向他作题为“库兹米哈的情绪和获得成功的希望”的报告了。

我们同库兹马合作共事，一开始就预示不会有什么好的结果。请看摘自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来信中的下面几段话：

“排字工人真是误了大事！！原答应星期一把宣言排好，而今天已经星期五了。真糟糕！

难道老是这样下去吗??”^①

唉！情况总是如此。

我们的报纸终于发排了。但是这些报纸真是多灾多难呀！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写道：

“第四十四号的情况怎样？难道库兹米哈坚决同我们翻脸了？为了第四十四号，我曾经大忙了一阵，来不及修改论文，也没有看校样——可是突然都停顿下来。”^②

“难道说排字工人又‘喝起酒来了’？或者他又干别人的活了??现在极为重要的是**毫不拖延地**出版…… 看在上帝的面上，快些回信”。^③

社会爱国主义者制造的每个新的事件，他们每次所干的新的卑鄙勾当，使列宁付出了更为巨大的精力。他真想每天向群众发表革命的言论，揭露邪恶，唤起民众，号召他们投入战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给我寄来了许多文章、书信和便条，拍来了许多电报。这里他把自己丰富多采的“书写技术”全都用上了：使用了令人最“可怕的”引号、最“严厉的”感叹号和问号（不惜多次使用这

① 《列宁全集》第36卷第300页。——编者注

② 同上，第336页。——编者注

③ 《列宁文稿》第6卷第170页。——编者注

些符号),对有些话标上两个、三个甚至七个之多的着重号,有的字母写成粗体,或在字母中间加空。他要求我争取党小组的帮助,他写道:

“召集您的小组,齐心协力采取一切措施**彻底**安排好中央机关报的正常出版工作。”^①

然而我们的小组又能做什么呢?为了“讨好”库兹马,我们把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积攒起来的一笔钱作为预付款塞给他,并同意按照瑞士的印刷所的日工资数付给他报酬,目的是要他在紧急的情况下为我们工作……

我们终于幸运地在伯尔尼附近的比姆普利茨的一位瑞士印刷厂主那儿找到一套俄文铅字,于是有几号中央机关报就开始在那里出版。

* * *

在出版布尔什维克刊物的工作中,最大的困难是经常性的缺钱。

战争初期,当我们准备印刷第一份传单时,我们的全部“基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是这样幽默地称呼它的——为一百六十法郎(六十卢布)。稍晚,在1915年10月,那时我们虽然已经同俄国恢复了联系,我们的国外小组,用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的话来说,“也为弄钱而辗转奔走”,可是我们的现金总共也只有二百五十七法郎七十一生丁(九十六卢布多一点)。况且当时小册子《社会主义与战争》和《社会民主党人报》合刊号的出版费还没有付清。1915年10月6日(19日)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忧伤地写道:每文钱都需要算着用。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本人十分精明地“算着用钱”。弗拉基米

^① 《列宁文稿》第6卷第170—171页。——编者注

尔·伊里奇手里拿着铅笔计算着，一号报纸可容纳多少最小的小号字母，如果用小号字不能把全部稿件都排下的话，他就感到很苦恼。页边通常留得很小，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还亲自过问，使标题尽量少占篇幅。由于这些巧妙的办法，才得以在一号报纸内勉强容纳下近四万个印刷符号。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拟订出版计划方面总是精打细算的，嗨，他是多么会精打细算呀！他就出版反战宣言一事写道：

“出版份数不宜过多（二百至三百份就够了）……出版的东西我们将寄往巴黎和俄国：一百份寄国外，二百份寄俄国。”^①

三百份秘密传单！打算散发的布尔什维克出版物的数量多么“微小”啊！但这种出版物的力量是巨大的，由于它的传播，使沙皇制度和俄国的资产阶级吃足了苦头。

中央机关报也只打算印……五百份嘛！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解释说：“印数不多，因为要贯彻我们的方针，就不能指望一般居民订阅……”^②

那时我们的中央机关报总共只有两个版面，售价十生丁（约合四戈比）。我们竭尽全力想使机关报至少每周出版一次，但是由于缺乏资金和没有自己的排字房，使我们未能实现这个目标。《社会民主党人报》出版得很不正常，有时隔两天出版一次，有时隔五个月才出版一次。

我们曾想为广大群众出版一份通俗的报纸，这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梦寐以求的事，但同样由于上述的原因，不得不放弃这个念头。

可是，《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印数大大超过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悲观估计。1914年11月1日第三十三号出版了。但两周之

^① 《列宁全集》第36卷第287页。——编者注

^② 同上，第143页。——编者注

后,当下一号的稿件“还未动笔”的时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吩咐将第三十三号报纸增印一千份。以后几号中央机关报的印数都不少于二千份。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为我们每种出版物的出版都花了不少的劳动和心血。因而当每一号中央机关报,或者一期杂志、一本小册子终于问世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是多么兴高采烈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问及组织委员会(孟什维克中央)、崩得、社会革命党和其他组织的出版物情况时,得意洋洋地补充说:

“《共产党人》**第一、二两期的合刊出版了。这是事实。**”^①(这句话里用了七个着重号!)

但是我们印刷的刊物能否从偏僻的瑞士地下环境传到俄国广大群众的手里呢?

1914年11月14日,战争开始后出版的第一号(即第三十三号)《社会民主党人报》问世后刚过两星期,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写信给我说:

“我可以告诉您一个令人愉快的消息。中央机关报已送到离国境线不远的的一个地点,看来不久即将转运过去。我表示祝贺!”^②

尔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1915年出版的小册子《社会主义与战争》里已经告知了这样的消息:《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刊登的文章正在彼得堡翻印并发往俄国各地!

伊里奇的革命言论越过战线和铁丝网,通过协约国的国境线和关卡哨所,传到群众的心坎上!

载于《星火》杂志 1955 年
第 17 期第 9 页

① 《列宁全集》第 36 卷第 350 页。——编者注

② 《列宁文稿》第 6 卷第 152 页。——编者注

弗·伊·列宁在布尔什维克 苏黎世支部 (1913—1917年3月)

拉·波·哈利东诺娃

弗·伊·列宁在自己多年的国外侨居时期，常常在欧洲的各个城市为俄国侨民作报告或专题报告。他也曾不止一次地来过苏黎世。

每一次他的到来，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苏黎世支部来说都是一件不寻常的事情。全体支部成员事先得到消息，知道列宁将要作报告或专题报告，都作了欢迎他的准备。我们知道弗·伊·列宁除了在俄国政治侨民举行的会议上做报告之外，他还将在小范围内同我们这些布尔什维克交谈。

列宁在苏黎世的演说总是在相当广泛的政治侨民和俄国大学生中引起很大的兴趣。其他政党的领袖们的讲演和报告从来没有象列宁的演说那样吸引这么多的听众和使他们对听讲产生如此的积极性。

1913年夏季^①列宁在苏黎世的“菩提树”饭店的大厅里作了关于民族问题的专题报告。大厅里挤得水泄不通。由于战争日益迫近以及所有国家中的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的滋长，我们同孟什维克——取消派分子以及崩得分子在民族问题上的争论和冲突显得

^① 这是在1913年6月26日（7月9日）。——编者注

格外尖锐起来。象许多苏黎世的布尔什维克一样，对我们感到困难的民族问题，我还缺乏足够的明确认识。崩得分子在演说中提出了给俄国的少数民族以“民族文化自治”的观点；波兰社会党要求将波兰从俄国完全分离出去，但波兰社会民主党人却反对这一点。而我们在民族问题上所持的民族自决权的观点却引起了很大的争论，这种争论在这几年中变得更加激烈了。应当对这个问题有一个全面的明确的认识，因此我聆听列宁的讲话时注意力非常集中。我一向感到如此复杂而又被搞糊涂了的民族问题，通过列宁的阐述就变得明白易懂了。弗·伊·列宁强调指出：“对一个民族来说，最为不幸的事情，莫过于去征服别的民族”。他激动地、热情洋溢地谈到要反对压迫弱小民族，并且热情地捍卫民族自决，直至分离的权利。

在这个专题报告之后，布尔什维克会见了弗·伊·列宁，并进行了交谈。苏黎世支部的大部分成员都是工人。我们许多人由于与瑞士工人在工厂长期共事，因此同他们的关系很融洽，并且加入了瑞士的工会。但是我们并没有积极地参加瑞士的工人运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十分关心瑞士工人的情绪，他们的工资收入和物质状况以及他们的日常生活条件。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了解到我们没有参加瑞士社会民主党的工作，他就责备我们，说我们虽然同瑞士工人肩并肩地在车床旁边工作，但是却站在他们党内所进行的斗争之外。他指示说，我们应当估计到当前局势的各种特点，日益迫近战争毫无异议地会引起所有各个国家中的有觉悟的和有组织的一部分无产阶级的强烈反抗，对此应该有所准备并帮助瑞士工人在反对战争的斗争中坚持革命立场。弗·伊·列宁详细地说明了瑞士工人运动的任务和我们在这一运动中的作用。这次同弗·伊·列宁的会晤激励了我们支部的成员，我们每个人仿佛得到了新的活力，以便为列宁召唤我们去做的事业而奋斗。

之后，我们全体人员都参加了地方工人组织的活动。

1914年10月末，弗·伊·列宁从伯尔尼来苏黎世作关于战争和革命社会民主党对战争的态度专题报告。这一报告在苏黎世整个侨民区引起了极大的兴趣。这时，由于战争的爆发，所有与瑞士毗邻的交战国的政治侨民纷纷来到苏黎世和瑞士的其他城市。孟什维克、其它政党和党的派别集团的领袖们巴·波·阿克雪里罗得、拉·阿·阿布拉莫维奇、瓦列茨基、费·雅·柯恩、亚·萨·马尔丁诺夫、列·达·托洛茨基和谢·尤·谢姆柯夫斯基，当时都住在苏黎世。

所有的人都赶来听弗·伊·列宁的专题报告，其中有因战争缘故流浪到苏黎世来的与革命运动毫不相干的一些俄国老百姓。海报通知在报告之后要举行讨论，所以所有的理论家、孟什维主义和其他政治派别的领袖们都来参加了。他们中有许多人于9月28日（10月11日）在洛桑曾听过格·瓦·普列汉诺夫的报告，他是以护国派分子的身份发表演说的。他们也听到了弗·伊·列宁针对普列汉诺夫的毫不留情的言论。他们知道列宁在战争问题上的立场，跑来听他在苏黎世的专题报告，目的是趁机反驳。

弗·伊·列宁所持的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鲜明的国际主义立场，他对第二国际社会变节分子，尤其是着重提出的对思想家卡·考茨基的社会变节行为的批判，以及他提出的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反对统治阶级的国内战争，使本国政府在这场帝国主义战争中失败以及号召成立第三国际的布尔什维克口号，象雷雨来临前黑沉沉的天空中发出的耀眼的闪电，使与会者受到震惊。

当弗·伊·列宁的报告一结束，大厅里就大声地喧哗起来。反对者急忙地向讲台奔去。接着宣布开始讨论，这场讨论延长到当夜戒严开始之前，还把第二天的整个晚上都用上了。托洛茨基是第一个起来发言的主要的反对者，他一开口就替考茨基辩护。

他攻击列宁把考茨基称做工人阶级事业的叛徒！他还声色俱厉地反对“使本国政府失败”的口号。其他孟什维克讲的东西同他讲的如出一辙。在讨论中发言的人恫吓我们说，倘若俄国一旦失败，那它就会彻底崩溃，工业发展就将停滞，无产阶级要遭到灭亡，这样一来反对沙皇制度的革命就没有人来实行了。他们提出了一个口号：“先胜利，后革命”。

报告后的第二天，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来参加我们布尔什维克支部的会议。在同志式的交谈中，他又重新回到了必须同沙文主义和护国主义开展不调和的斗争的话题上，耐心地帮助我们理解“使本国政府失败”这一口号的意义。他说，使沙皇制度失败无疑对工人阶级有利，这一点不但要向工人宣讲，而且还要向士兵讲明，号召他们为了工人阶级的事业，为了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应掉转枪口去反对专制制度。此时有人问道：“这个口号不是意味着我们将去帮助德国人并促使他们胜利吗？”弗·伊·列宁向这位同志解释说，这一工作在德国、法国和所有其他的国家中都要进行，在军队中做这项工作要坚定不移、耐心细致、遇到困难决不退却，只有这样做了，欧洲所有的国家——包括交战国和中立国——的无产阶级在未来的国内战争中的胜利才能得到保证。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问：

“关于战争，工人有些什么说法？他们的情绪怎么样？”

我们详细地介绍了我们所在的企业的情况。我说，苏黎世的缝纫工厂日益扩大，因为德国的市场已经转到了瑞士，在这里做工的有各种民族的妇女，她们中间有许多意大利的、德国的、法国的、波兰的、俄国的妇女和其他的一些人。她们的情绪都是反对战争的，这是因为丈夫服军役不在身边，使她们已深感痛苦。弗·伊·列宁劝我们进一步加强同积极的、最有觉悟的无产者的联系，同他们建立私人关系并且系统地向他们解释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

争这一口号的实质。

他接着说：“要让他们明白，这是劳动人民从资本主义使之陷入的痛苦之境况中解放出来的唯一道路。只有实现这一点，所有国家的劳动人民才会从战争中获得出路”。

弗·伊·列宁的专题报告以及同他的几次谈话帮助我们在瑞士工人的政治斗争中找到了自己的岗位。我们开始更加积极地参加苏黎世工人组织举行的活动和青年工人的运动。战争开始时许多具有反战情绪的外国青年汇集到瑞士来。他们使青年组织的工作活跃起来。领导苏黎世青年运动的威廉·明岑贝尔格同俄国革命者保持了密切的联系。他特别积极地吸收我们布尔什维克在青年中进行工作。后来，威廉·明岑贝尔格成了拥护齐美尔瓦尔德左派^①思想的积极战士并受到了弗·伊·列宁的极大的重视。

1916年2月8日弗·伊·列宁偕同娜·康·克鲁普斯卡娅来到苏黎世，准备作较长时间的逗留。^②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一口谢绝在我们家里居住时，我和丈夫都感到挺尴尬。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大致讲了以下一段话：

“你们让给我们的房间很好，房间敞亮而又舒适。你们这儿清静、安宁。但是这房间对我们来说是不合适的。首先，我们应当住得离市中心、图书馆近一些，我同娜嘉可以在那儿工作；其次我们想住到瑞士工人的家庭中去，以便更直接地看到这里的工人是怎样生活的。此外，请考虑一下，我们有大量的信件，邮递员势必一日数次地上你们这四层楼来。而且来找我们的人又很多。那样，你们会感到不安宁的。”

^① 弗·伊·列宁于1915年在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上建立的革命的国际主义者的国际联合组织。——编者注

^② 弗·伊·列宁和娜·康·克鲁普斯卡娅于1916年1月28日或29日（2月10日或11日）自伯尔尼迁至苏黎世。——编者注

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不时点着头，表示同意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所说的理由，一边瞧着我，看我因他们的谢绝而发窘的神态，挺同情地微笑着。虽然我很理解这些理由是毋庸置疑的，但我实在感到窘极了。还有一件事，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考虑也是很周到的：他得到瑞士政府的特别许可，以政治侨民的身份从奥地利来到瑞士；他从一个州迁到另一个州去需要得到州当局的特别许可。由于受到瑞士警察严格的监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认为自己最好住在瑞士工人的家庭里，而不是住在俄国政治侨民家里。

他们住进明镜巷十四号，这条巷座落在苏黎世最古老的、中世纪式的城区里；那里狭窄的、曲曲弯弯的小街陋巷里排满了两、三层楼的房子，这些房子最上面的楼房低垂在街道的上空，因此这些街道即使在大白天也是半明不暗的。“伊里奇夫妇”的房间虽说有两扇窗子，但是里边的光线仍是相当昏暗的。楼梯是螺旋形的，拐角多，既窄又陡，连白天也点着一盏小煤油灯借以照明，但仍然黑咕隆冬的，要登上这个楼梯是十分费力的。

但是藏书十分丰富的中央图书馆倒是近在咫尺，这儿的民众文化馆内有一个理想的阅览厅，白天的任何时候以及每天晚上，可以在这里翻阅用各种文字出版的报刊杂志。在这个人口稠密的市区里的每个拐角上都开设着规模不大的饭馆，在那儿可以吃上一顿便宜的午餐，并且同需要碰头的人会面。早晨、中午和晚上，街上挤满了工人，周围是一片操着各种语言的说话声。列宁和克鲁普斯卡娅对这个环境称心如意。列宁对住的房间和自己的房东——鞋匠卡梅雷的一家都感到十分满意。

弗·伊·列宁和娜·康·克鲁普斯卡娅打算在苏黎世只逗留两、三个星期，以便在图书馆里工作。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那时正在写《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①。他急着要结束这

^① 见《列宁全集》第22卷第179—297页。——编者注

项工作，因为他知道当帝国主义战争正在激烈进行的时候是多么需要这本书啊。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一边紧张地写书，一边抽出许多时间来积聚和团结国际革命力量。他长时间地同到瑞士来的各国左派社会党人谈话，向他们讲解国际无产阶级真正的革命立场的实质。我记得有一回，一个荷兰工人在访问布尔什维克支部后未同他本人见面就离开了，列宁得知此事后是多么生气啊！他执拗地向支部书记莫·马·哈利东诺夫询问这个工人的情况，并且对没有领这个工人到他那儿去谈谈话表示十分不满。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的写作时间拖长了。弗·伊·列宁和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喜欢苏黎世这个地方，因此他们决定留在苏黎世，并准备“长期居住”。有十至十二人组成的布尔什维克支部增添了两名党员——弗·伊·列宁和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加入了这个支部。

弗·伊·列宁和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同作为各种政治集团聚集场所的俄国侨民区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他们不去侨民俱乐部，也不去那儿的阅览室。我们从未见他们在侨民俱乐部里举行的会议上、娱乐晚会上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活动中露面。但是他们总是出席一般每月召开一次的布尔什维克支部会议。

我们在苏黎世有一个“工人自修小组”，参加的人是政治侨民——来自俄国的工人——，不论他们属于哪个政治组织。这个小组的每个成员都被认为是瑞士社会民主党的党员，并据此享有该党党员应享的一切权利和义务。

在本文所述及的时期内，这个小组约有三十人左右。所有的布尔什维克都加入了这个小组。当弗·伊·列宁和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在苏黎世定居后，他们也参加了这个小组。小组除布尔什维克之外还有几个孟什维克、崩得分子、普列汉诺夫分子和一些

拉脱维亚和波兰的社会民主党人。

布尔什维克成了小组的核心，这是一个既团结又积极的核心。小组主要是进行政治教育工作：举办讲座、组织专题报告或报告，随后展开热烈的讨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认为小组的工作有重要的意义。他做了关于帝国主义的报告，举了许多国际的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内的鲜明事例来说明帝国主义，同时还宣读了《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的手稿中的若干章节。我们大家听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报告简直入了迷。每个有幸即使只听过列宁一次讲话的人也知道，他那热情奔放的、真实的、通俗易懂的和深入浅出的话语对听讲人所起的作用。在这里，在这个小组里的情况也是如此，列宁坐在我们中间，面对着每个人，注视着每个人的眼睛，仿佛想知道：他讲的话是否听懂了，他讲的意思是否听清楚了。

弗·伊·列宁关于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的叛卖行径的一些话极大地激怒了出席这次会议的孟什维克。伊丽莎白·彼得罗夫娜·斯米多维奇(迪姆卡)怒气冲冲地攻击列宁，为孟什维克辩护，而达·梁赞诺夫则歇斯底里大发作，一边用拳头敲打桌子，一边叫嚷：“没有考茨基参加，不准成立第三国际！”

“但是要知道第三国际已经在建立了，而您，梁赞诺夫，对此视而不见，”列宁带着嘲笑的口吻回答他说，“在每个国家里已经有了自己的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而您却没有发觉结集在齐美尔瓦尔德左派周围的力量正在增长。”

1916年末，弗·伊·列宁更加积极地参加瑞士工人运动。他不仅出席苏黎世工人的会议，而且还越来越频繁地亲自在工人和革命青年举行的大会或群众大会上发表演说。弗·伊·列宁精力充沛地参加筹备与召开社会民主党州的代表大会和瑞士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就在那个时候，他写了提纲《瑞士社会民主党齐美尔

瓦尔德左派的任务》^①，他在这个提纲中指出了反对战争的道路。

瑞士工人中间的革命运动增长了。瑞士工人群众的各种反战行动变得更加经常和自觉了。随着瑞士齐美尔瓦尔德左派的拥护者队伍的成長和它的积极性的提高，已有必要建立一个组织来领导这个运动。不久便建立了这样的一个组织，它取了一个无可指摘的名称——“九柱球俱乐部”。瑞士社会民主党书记弗里茨·普拉廷和苏黎世的报纸《民权报》编辑诺勃斯加入了这个组织。以威廉·明岑贝尔格为首的青年联盟的一个很大的领导小组是这个组织的骨干力量。俄国的政治侨民弗·伊·列宁、娜·康·克鲁普斯卡娅、美·亨·勃朗斯基、莫·马·哈利东诺夫以及另外几个人参加了这个小组。

列宁认为这个组织具有很大的意义。他力图将其培养成为未来第三国际的一个坚强和团结的基层组织。

1917年1月来临了——1月9日纪念日临近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同意在民众文化馆举行的青年群众大会上作以纪念1905年革命为题的报告。对弗·伊·列宁来说，用德文作报告并没有很大的困难——他通晓这一语言。他用德文写了一份报告并要求我先听他讲一遍。

在民众文化馆举行报告的头天晚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同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来到我们家里。我事前已经仔细地看了列宁写的一叠数量不多的讲稿，形状略小于练习簿大小，每一页纸的正面都写得满满的，上面的字体较小，有点不大清楚，但是写得奔放有力。

当我为他们俩开了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笑着对我说：“您好！瞧，报告人现在来了。”

^① 见《列宁全集》第23卷第136—147页。——编者注

他一边走，一边继续说：

“怎么，现在就开始吧。已经八点了，而您是很早就要起床去上班的。”

我们毫不拖延地就在桌旁坐下来。我把手稿交还给他。他翻阅稿子后便把自己的大怀表从表链上摘下来，放到自己面前的桌子上。我为了看他的稿子比较方便一点，便坐在左面。列宁记下表上的时间后便开始读报告，一边注意控制他惯常的很快的语速，不致读得过快。报告内容我已经了解，但前一天我读这份报告时，按照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我的要求，我的注意力集中在语言方面，在语句的结构上，而这一回，我注意的是报告所表达的思想内容。

1917年1月9日（22日）在民众文化馆大厅所作的报告受到大批工人和青年听众的热烈欢迎。列宁在报告中谈到的关于近期欧洲革命运动前景的一部分话^①给大家留下了尤为深刻的印象。

* * *

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克鲁普斯卡娅在回忆弗·伊·列宁的文章中，常常谈到列宁紧张地工作和他为工作倾注了许多精力的情况，同时还谈到列宁有时候感到疲倦以及需要休息的情形。他们俩人酷爱大自然，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总是努力地替他在工作中安排间歇的时间并去野外休息。

他们闲暇时常去的一个最喜欢的地方是苏黎世山——城外的一座不高的树木葱茏的山。沿着缆索铁道或者徒步从一条坡度不大的蜿蜒小路可以登上这座山。有时星期天，我和丈夫加入他们的行列同去散步。“伊里奇夫妇”通常乘坐电车来我们这儿。登山是从我们这儿出发的，先经过位于山坡上的几幢式样美观的房屋，

^① 见《列宁全集》第23卷第242—259页。——编者注

然后走上一条光秃秃的山路，越往前走，这条路就变成了一条又窄又弯曲的羊肠小道了。路两旁延伸着宽阔的草地，上面绿草如茵，野花遍地，令人心旷神怡。我们往上走的时候不时停下来，饱吸花儿的馨香和山间的新鲜空气。

我们登上山顶后通常到一家不卖酒的饭馆里转一转，在那儿喝水解渴，买点巧克力糖，然后在树林里各自散开，以便在树荫下慢慢地蹒跚一会或者稍事憩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和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上自己喜欢去的地方，而我们尽量不去打扰他们的安宁。

记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和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于1917年1月30日(2月12日)我女儿的命名日那天来我家作客。女孩满两周岁了。我们请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和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在星期天下午四时光景来。他们高兴地接受了我们的邀请。但是他们来晚了一些。玛丽亚·米里延戈夫和伊里亚·米里延戈夫早已来了，格里沙·乌西也维奇和其他一些同志也来了，但“伊里奇夫妇”还没有来。当我们的楼梯上响起脚步声时，我们一窝蜂似地向门口奔去，没等门铃响就开了门。看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因什么意外的事耽搁了。大家感到有些失望。突然响起了急促的铃声，这一定是他们！我们向走廊奔去，而门外已传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愉快的笑声。我们打开了门，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和手里拿着一包东西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笑容满面地走了进来。他们俩不知怎么地都显得非常快活。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手里拎着纸包，跟所有的同志们一一问好，然后开始解绳子，打开包扎的纸。他显得有点匆促；他急不可耐地想快点让大家看看他买来的称心的东西。这时他一边笑着，一边说道：

“在玩具店里我们看得眼花缭乱。我们一瞧：货架上和柜台上

各种各样的玩具多不胜数，我们有点不知所措，吃不准挑选哪个好。娜嘉说：“瞧，我们就买那个漂亮的布娃娃。”我回答说：“不，这个不合适，我们不买布娃娃，再找找有趣一点的东西。”售货员不断地给我们拿来很多玩具：兔子呀、家兔呀、小猫呀、皮球呀等等。我说：“不，这些都不要。”我一个个货架看过去，突然在最上面一层架子上看见了这一只小狗。它的一只小耳朵向上竖着，项颈上系着一条红色带子，上面挂了个小铃铛，它的嘴脸显得挺机灵，看神态，一副狡猾的、革命的样子。我对娜嘉说：“我们就要这只小狗吧！”嗨，这只狗怎么样？喜欢它吗？”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到这里便爽朗地笑了，把玩具掉过来转过去，让大家左右前后看个够，自己也爱不释手，这一来，使我们大家都乐不可支了。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瞧着伊里奇，脸上一团高兴，因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紧张工作之余得到了休息，而正是这一点才使她感到高兴。去玩具商店无疑是她的主意，而她为两岁的小女孩买个布娃娃的建议自然是十分恰当的！但这个建议并不合伊里奇的心意。他想找个与他的情绪合拍的玩具。结果他选择了项颈上系有红带子的一只小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带给小女孩的不仅是他喜欢的玩具，而且还带来了喜悦——这是他买了一件称心的玩具所感受到的心情。

快活地笑着的叔叔一直逗着小主人公玩耍，他那炯炯有神的眼睛瞧着她，递给她那个讨人喜欢，颈上系着小铃铛的小狗。她双手一把抓住玩具就扑到我身上。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知道小女孩整个星期住在托儿所里，只是逢星期天才呆在家里，而且她只会讲德语。几分钟之后小女孩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膝盖上随着他唱的德文歌曲的节拍蹦跳着，一边快活地大声笑着。最后他们由于这样的“蹦跳”都累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跑到门边，在门后面躲起来，小孩尖声叫着向他

奔去，抓住他上衣的下摆。

在这值得纪念的一天里，我们大家都很高兴，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从逗孩子玩的当中得到了很大的乐趣。只有胸襟开阔的人们才会这样愉快欢乐。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漫长的岁月已经消逝，我们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和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送的礼物作为家庭宝贵的纪念品珍藏着。1960年我把这个玩具献给了革命博物馆。

* * *

1917年4月初，弗·伊·列宁在自己被迫流亡生活的最后几天中，为与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革命的祖国分隔两地而苦恼不已。不知怎样才能回俄国去的痛苦终于消除了。弗里茨·普拉廷发来通知说，俄国政治侨民自瑞士取道德国返回俄国的协议已经达成。弗·伊·列宁向我们宣布应立即准备回国。要处理的事情很多，要通知分散在瑞士许多城市里的所有布尔什维克支部帮助那些身无分文的同志们动身，安排回国事项，安顿好留下来的家庭。弗·伊·列宁认为尽量使更多的政治侨民回去有很大的意义，并为此花了不少的精力。临行前，在午饭时间要走的政治侨民和继续留在瑞士的政治侨民在齐林格大厦饭店举行了告别会。参加这次聚会的人很多，也很热闹。弗·伊·列宁讲话后，宣读了回国人员签署的一个文件，他们在文件中声明：不管米留可夫的把取道德国回国的人员提交法院定罪的威胁，他们要返回祖国去。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苏黎世逗留的最后一天亲手将他一个尚余下五个法郎和五个生丁的存折交给了我，要求我将这些钱“取出”，收作他自己和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4月份应缴的党费。“请原谅，这一委托给您增添了麻烦，可是自己没时间办这件事。”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抱歉地微笑着说，并与我握手告别。

这使我惊愕不已。在这令人激动的时刻，弗·伊·列宁居然考虑到交四月份党费的事情。动身走的同志中间谁也没有想起这件事。而我作为布尔什维克苏黎世支部的司库也未向他们提醒此事，因为我考虑到他们不出四月就将到达彼得格勒。

我未将弗·乌里杨诺夫的存折交给银行，决定把它保存起来，以纪念在政治流亡时期与列宁和克鲁普斯卡娅的会见。我回祖国时把它随身带了回来。后来我把这一存折交给了党史委员会。现在它保存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的档案馆里。^①

弗·伊·列宁和一批政治侨民离开后，过了短短的一段时间，资产阶级报刊开展了一场疯狂的诽谤性的运动，把矛头指向布尔什维克，并指名道姓地攻击列宁。报纸连篇累牍地发表捏造的文章，说什么列宁从德国政府那儿得到二百万法郎，说什么“早先的侨民乌里杨诺夫及其同伙”在彼得格勒占据了芭蕾舞女演员克舍

① 弗·伊·列宁的存折的由来是：弗·伊·列宁和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在瑞士居住同所有其他的政治侨民不一样，是附带着一些特殊条件的，后者可以自由地从一州或市迁移至另一州或市，这样做不必得到警察当局的特别许可，也不需要交纳保证金。

当帝国主义战争爆发后，弗·伊·列宁和娜·康·克鲁普斯卡娅离开奥地利，根据瑞士社会民主党提出的申请，他们获准在瑞士避难并得到在瑞士首都伯尔尼居住至1917年1月12日(25日)的权利。当弗·伊·列宁决定于1916年1月前往苏黎世时，他为此需要得到苏黎世警察局的特别许可。1916年4月5日(18日)弗·伊·列宁在他给苏黎世警察局的申请书中，要求免于办理专门的证明文件，准他在从事写书的一段时间里居住在苏黎世，以便有可能利用苏黎世的图书馆。申请得到了满意的答复。1916年末，弗·伊·列宁不得不再次向苏黎世警察局提出申请，因为1917年1月12日(25日)在瑞士居住的期限就将届满。他在1916年12月15日(28日)的申请书中，请求将在苏黎世居住的期限延长至1917年12月31日。同时他通知：1916年12月28日他已向苏黎世州银行交纳了规定的一百法郎的保证金，所开存折号码为611361。

这就是弗·伊·列宁在他即将离开瑞士前亲手交给我的那个存折。1917年4月3日(新历)弗·伊·列宁因准备离开瑞士回国，从银行提取了九十五法郎。他交给我的这一尚有五个法郎和五个生丁保证金余额的存折是为了缴纳1917年4月份党费的。——拉·哈·注

辛斯卡娅的宫，并在里面过着奢华的生活。

这时我决定向存有五个法郎和五个生丁的苏黎世州银行出示弗·乌里杨诺夫的存折。我找到总出纳并向他出示弗·乌里杨诺夫的存折。他用手向我指一指旁边的一个窗口，那儿坐着一个银行初级办事员。

“请看一看这个存折，您知道这个存款人吗？”我问总出纳，再次把存折递给他。他从我手上拿了存折，开始仔细地瞧着。

“弗·乌里杨诺夫。怎么回事？这就是以政治侨民身份在我们苏黎世住过，而现在在俄国已成了著名人物的那个乌里杨诺夫？这就是所有报纸都提到的那个乌里杨诺夫？！”他激动地说。

“是的，”我尽量心平气和地说，“这就是弗·乌里杨诺夫，政治侨民，在苏黎世老城明镜巷十四号鞋匠卡梅雷那儿居住过。他在多年被迫流亡之后，现在已经回到俄国，以便与人民在一起，为自己祖国争取自由和幸福的生活”。

银行职员们一个接一个地走到总出纳窗口。大家对“著名的存款人”发生了兴趣。存折从一个人的手中传到了另一个人手上，所有的人带着惊讶的表情仔细地看存折上面的记载：

姓名：弗拉基米尔·乌里杨诺夫。

出生年月：1870年。

出生地点：俄国辛比尔斯克。

居住地址：苏黎世 I，明镜巷十四号。

看得出来，他们对存款的区区数额，以及列宁曾在贫民（主要是工人）栖身之地的苏黎世老城住过的事实，感到不胜惊讶。

“那么，”最后总出纳对我说，一边把存折递还给我，“您可以把账结掉并提走存款。”

“不，谢谢您，”我回答说，“我不是为了要得到五个法郎的存款来找您的，也不是为了这个而出示乌里杨诺夫的存折。这个存折

我将随身带回祖国——俄国去，而存款让它留在瑞士银行里。存款数额不大，但是存这笔款子的人是伟大的。我只想使你们了解这一点，这就是我来银行的目的。”

我告别后向出口处走去，我回头一瞥，看见了那些神色惊愕的办事员，他们依然在总出纳的窗口旁边站着哩。

载于《关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回忆录1900—1922年）》
1963年莫斯科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版第147—158页

《帝国主义论》^①是怎样产生的

米·尼·波克罗夫斯基

关于列宁是一位伟大的领袖，是马克思逝世后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这不必多说了，因为这一点就象乘法口诀那样是人所共知的。我们这些人多亏列宁才得以在舒适的条件下工作，而对出现在他的道路上的艰难险阻，就连百分之一也不了解，而且我们还时常进退失据；现在由我们来回忆下述几点是有裨益的：列宁是人间最有耐心的人，列宁善于在最恶劣的、最令人难以忍受的条件下实行自己的政治路线，从不慌张，也从不张皇失措，始终不渝地执行这条路线。

我的面前放着一叠瑞士明信片。这些明信片一点也不陈旧——其中最后的一张明信片距今相隔只有十年。这一信件与十月革命相隔不到一年！过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列宁就成了人民委员会的主席。但在那个时候，他同我们大家一样，是帝国主义战争的囚徒，于是象囚徒该作的那样，“捎寄”信件全部用明信片，认为这是向帝国主义分子进行经济制裁的一种巧妙方法。你们不是要检查全体公民的全部信件吗？好极啦，那末就请检查吧！可是我何必多付冤枉钱，又何必使你们白费劳动徒增开拆信封的麻烦呢？而列宁以其细小整齐的书法和令人惊叹的文体，即使在一张明信

^① 指弗·伊·列宁的著作：《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全集》第22卷第179—297页）。——编者注

片上也可以写出比别人写四页还多的东西。

但为了使读者明了起见，首先要谈谈这些书信的由来。1916年春天，我在巴黎收到马·高尔基的一封信，建议我组织国外的著作家编写一套题目为《战前和战时的欧洲》的丛书。这套丛书应当让“最广泛的各个阶层”（读作：工人）了解，在这场战争中，谁是我们的同盟者，谁是敌人。当然，在这封经军事书刊检查机关检查的信中没有谈到这场战争本身的含义，但是从整个内容来看，这层意思是显而易见的。

我对这封信的印象至今记忆犹新，仿佛这件事发生在昨天一样。在这之前，我仅仅通过名为“爱国主义刊物”这一秽气四溢的臭水沟来呼吸俄国的空气。爱国主义的乌烟瘴气使一切都窒息了。有时收到一些令人沮丧的，用伊索语言写得很婉转的信件，这些信件断言整个世界已经变成了一大堆垃圾。在从著作家同志们以及出版者那里寄来的信中，讲的都是一个调门：“除了……什么都不刊印”。唉，这就是说，我们简直什么都不能刊印了。但突然间，情形变成这样，不仅可以刊印，而且可以刊印我们的宣传品了。因为毋庸置疑的是，这封信提到的国外著作家无论如何不可能指普列汉诺夫和阿列克辛斯基；不然的话，在这种情况下给我写这样的信那是荒谬透顶的。不，这是邀请我们这些“失败主义者”来写稿和出版东西了。我重复说一句，这是毋庸置疑的。在祖国那个地方事情已有进展，已经动起来了……两年来第一次沁入肺腑的是新鲜空气，而不是乌烟瘴气了。

我们劲头十足地研究了具体的题目——对每个国家作单独的评述。阿·瓦·卢那察尔斯基写意大利，季诺维也夫写奥匈帝国，我同洛佐夫斯基写法国；打算让费·阿·罗特施坦写英国，但是他拒绝了，结果赫拉斯科夫（我差点没说“已故的”）写了这一小册子。那时他是一位十分坚强的布尔什维克，而现在是《现代纪事》杂志

的撰稿人…… 在那封来信中指定拉林同志负责写德国，但是要同他联系上实在很困难，一直到二月革命前夕，我们才最后通信商定此事，而二月革命自然就取消了这套丛书。现在可以和必须写的已经不是这些了，而且也不是这么写了……

不过这些小册子还是出版了，（同时一起出版的还有巴甫洛维奇同志撰写的关于欧洲以外的国家的小册子），并且以后已由苏维埃的出版社再版了。

但立刻产生了一个问题：要写一个总的绪论——一本阐明全套丛书的宗旨的绪论性的小册子，即一本关于帝国主义的小册子。事实明摆着，除了列宁，没有人能写这一小册子。我这儿没有保存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同意由他担任这项工作的明信片，可能根本就没有这样一张明信片，因为在战争时期我同《社会民主党人报》的联系是通过季诺维也夫进行的。不管怎样，我的这束信中，注明写于1916年6月8日的第一张明信片已经谈到延期的事情。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写道：“我正加紧工作，然而由于材料复杂，加之有病，恐怕要耽误一些时候。我很担心，在限期前来不及完成”^①（指到7月中）。

不用说，列宁在限期以前便完成了，比其他的人都早。7月2日的明信片已经告知，《帝国主义论》一书手稿按挂号印刷品与明信片同时寄出。在这之前，我曾写信给伊里奇，提到出版社对小册子原定的规模感到吃惊，遽然建议将它的五印张的篇幅缩减至三印张。我的这封信，显然使伊里奇非常为难。列宁写道：“全部材料、提纲和作品的大部分已按原定计划写成了五印张（二百页手稿），所以再要压缩到三印张是绝对不可能的了。要是不给出版，那简直太遗憾了！到那时能否请求就在这个出版者的杂志上发

^① 《列宁文稿》第6卷第309页。——译者注

表？”^①“至于作者的署名，当然，我想还是用我平常的笔名好些。假使不太方便的话，可以换个新的：尼·列尼夫岑。或者随便您另取一个名字也可以。至于附注，请您千万保留；您从注一百零一中可以看出，它们对我极为重要^②；而且要知道，俄国的大学生等，也要阅读，指出参考书目对他们**是必需的**。我特意采取了最经济（指地方、纸张而言）的方式。七页手稿用小号铅字排印也不过两页。附注千万要保留，或向出版者请求把它保留下来。如果觉得现在的标题不大妥当^③，如果认为最好避免用帝国主义这个字眼，那就用：《现代资本主义的基本特点》。（《通俗的论述》这一小标题是绝对必要的，因为许多重要材料就是按这类作品的性质而阐述的。）第一页是目录，其中有些章节的标题，从严格的限制说来也许不十分妥当，现在把目录寄给您，如果方便和安全的话，就留在您那儿，别再寄给别人了。”信末还写了附言：“我尽了最大力量使文章符合‘严格的限制’；而这对我来说是极困难的，我觉得，缺点因而会很多。可是也没有有什么办法！”^④

我特意将这封信几乎全部抄录了下来，这是因为：第一，从信中可以看到，列宁在一张明信片上能写如此多的内容；第二，他以那预示出他将是未来的人民委员会主席的细致态度，极为准确地考虑到包括纸张和铅字在内的全部事务性细节；第三，我们时代的最伟大的革命者，在他取得完全胜利之前的一年稍多一些时间里是在怎样的条件下工作的。“向出版者请求……”可是一年之后，

① 指马·高尔基出版的《年鉴》杂志。——米·波·注

② 在注一百零一中列宁提到了卡·考茨基的小册子《社会主义与殖民政策》（1907年柏林版）的书名，并且指出：“这本书是考茨基在很早很早以前，当他还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时候写的”（《列宁全集》第22卷第276页）。——编者注

③ 即《帝国主义论》。书刊检查机关不喜欢人们毫无礼貌地对陛下称名道姓。——米·波·注

④ 《列宁全集》第35卷第212—213页。——编者注

出版者自己倒成了替人求情的人了。

当然列宁对出版者，确切一点说对“出版社”的担心是正确的，因为除了阿列克塞·马克西莫维奇之外还有别的人。正是在附注一百零一上出了问题——难怪伊里奇对这条附注这样关注。如果说整个小册子是著名的《帝国主义论》一书的原型的话，那末这条附注就是那同样著名的小册子《叛徒考茨基》一书的雏型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左翼从前的思想家的立场在这里的十行文字中间，首次被刻画得入木三分。因此，这条附注当然就完全不能为出版社所接受。这里的问题不在书刊检查机关，——书刊检查机关倒允许骂德国人考茨基的，要骂多少就骂多少。不客气地说，问题在于“舆论”，在于未来的孟什维克《新生活报》的舆论。怎么“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一点不中用了?! 怎么和平主义者考茨基成了“叛徒”了?! 亲爱的读者，请别忘记，在1927年，在苏联，“和平主义者”这个词确乎是一个骂人的字眼，但是在战争时期，在俄国，对不喊“乌拉”或者虽然喊了，但却是低声地，并且用手半捂着嘴的人是受到尊敬的。不行，“礼数周到的”出版社不能刊印这个东西。于是过了两个月，在同彼得格勒通信磋商后（那时做这件事须要不少的时间），我不得不通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附注虽然编写得简明扼要，但小册子付印时将予以删除。

在这期间，当通信双方以为《帝国主义论》一书的手稿已丢失的时候，都感到非常不安，而这种不安在那个“战时的”环境中却是司空见惯的。法国书刊检查机关把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抄得密密麻麻的手稿检查了很久，而我在收到明信片之后，约摸过了三个星期才收到这包印刷品。就在那一段时期里，有过几次明信片往来，甚至还拍过电报询问：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寄的？最后是否收到了？那末去邮局询问一下，等等，等等。我不能不引用这个动荡不安的时期中收到的一张明信片上的一段话，作为一个例

子，来说明伊里奇是何等幽默。“丢失手稿，令人十分难过。这个消息迫使他——您所熟悉的具有普列汉诺夫特点的作品作者，采取格·季·的办法^①（咳！这些德国人！丢失手稿其实是他们的过错！就是法国人也比他们强！）”^②。读者也能猜到，“具有普列汉诺夫特点的作品”就是指《帝国主义论》这本小册子。

只是到12月8日（21日）我才收到回音——这是对我的关于“附注”命运吞吞吐吐的通知的答复——这个答复的语气比我原来预料的要温和些。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责备我以编辑身份决定同意删削（“请求出版者们：亲爱的先生们，请你们干脆在书上注明：我们出版社删去了对考茨基的批判。这样做不是更好吗？真的，应当这样做……”），在信的结尾他还说：“您来信说，‘您不会打屁股吧？’，就是说，我会因为您同意删掉这一批判打您屁股？？唉，唉，我们是生活在文明世纪，解决问题并不这么简单……”

笑话丢开，但这的确令人可悲，简直岂有此理…… 好吧，我要在另外的地方跟考茨基算账”^③。

我没有见到《帝国主义论》一书的首次刊印的俄文本，但看来，这本书未经大的改动就出版了的，因为这已经是二月革命之后的事情了，而且要是我没有弄错的话，这件事甚至同“出版社”没有什么关系。^④ 那时我已经不在那儿了，因为我是在1917年9月初才

① 指用贴上法文书籍封面的办法寄手稿。——编者注

② 《列宁文稿》第6卷第333页。——编者注

③ 《列宁全集》第35卷第251—252页。——编者注

④ 弗·伊·列宁的这本小册子于1917年年中第一次出版，帆船出版社刊印了这本书，但未标明该出版社的商标。小册子被书刊检查机关作了很大删改。在出版社办事的孟什维克分子删去了小册子中对考茨基和俄国孟什维克（马尔托夫等）的机会主义理论的尖锐批判，把列宁原用的词“发展成为”（资本主义发展成为资本帝国主义）改为“变成”，“反动性”（“超帝国主义”论的反动性）改为“落后性”等等。真正按列宁的手稿刊印的小册子全文载《列宁全集》第22卷第179—297页。——编者注

回到俄国的。我留下的只是以下的回忆：我平生曾一度当过伊里奇著作的编辑，正如读者所看到的那样，我这个编辑当得并不是很成功的……

载于米·尼·波克罗夫斯基：《忆列宁。
（文章和回忆录汇编）》1933年莫斯科
党的出版社版第23—28页

从二月到十月

雅·斯·加涅茨基

二月革命爆发的时候，我住在斯德哥尔摩（瑞典）。那时许多居住在外国的党员同党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警觉地注视着俄国发生的一切，并且高兴地看到在工农中间以及在穿上了士兵大衣的工农当中掀起的愈来愈高涨的革命浪潮。

我们感到风暴正在到来。但是谁也没有料到这次风暴会来得这样突然，并将给沙皇制度以如此的致命打击。平地一声春雷，2月传来了有关革命的最初的消息。象通常碰到的这类情况一样，这次传来的一些消息也是不确切的、含糊不清的、自相矛盾的。

政权到底掌握在什么人手里？今后真的不会再有尼古拉了？真的再不会有沙皇了？是谁逮捕了沙皇的部长们？怎样逮捕的？临时政府同工人代表苏维埃之间的相互关系又是怎样的呢？

我们关心所有上述这些问题并不是因这一轰动的消息而引起的。我们对1905年革命的教训记忆犹新，因而为这次新的革命的命运感到担心与不安。党的机关被迫处于极为秘密的状态当中，还缺乏足够的力量来全面掌握所发生的这一具有极为重大意义的事件。数百名优秀的久经考验和坚强的布尔什维克尚在流放和服苦役中受折磨，他们只是刚开始陆续返回彼得格勒或其他的城市。同时毋庸置疑的是，资产阶级将会竭尽全力来夺取政权，把它掌握到自己手中，并在适当的时候用“自由派的”、“共和制的”专制来替

代沙皇的压迫。

最初的消息传出后的二、三天之后，我在斯德哥尔摩（瑞典）收到了住在克利斯提阿纳（挪威）的皮达可夫和柯伦泰两同志发来的电报，要我立即上他们那儿去讨论当前的局势。我们议论了很长的时间，决定让他们立即去俄国，而我留下来，以便跟居住在瑞士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进行“联系”。我们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拍去了一份详细的电报，我们对局势作了分析，请他发表意见，末了结论性的意见是，认为他有必要立即回俄国去，要不然他可以暂时住在芬兰。

我们这封电报是幼稚可笑的。我们的“劝告”是多余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自己对回俄国的问题是已经够操心的了。但是怎样实现去俄国的愿望却是最主要的问题。开始认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可以和所有的侨民一样取道英国回去。因为已颁布大赦令，政治案件撤销了，侨民可以自由回国，服苦役的人员也正在回去……

对许多人来说是清楚的事情，并不总使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感到满意。为了回复我们的电报以及彼得格勒的同志们给他发来的类似的电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于3月30日从苏黎世往斯德哥尔摩给我拍来了下述电报：

“英国决不会让我过境，而会拘留我。米留可夫想骗人。唯一的希望是：派人去彼得格勒，设法通过工人代表苏维埃用被拘留的德国人进行交换。请电告。

乌里杨诺夫”。^①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发出这份电报的同时，还寄给我一封长信。这是一份历史性的文件，它可说明全世界的伟大领袖的英

^① 《列宁全集》第36卷第441页。——编者注

明和洞察力。

他在告知发出上述电报一事后写道：

“很明显，为了阻挠国际主义者回到俄国，英法帝国主义资本的走狗和俄国帝国主义者米留可夫（和米留可夫之流）会干出一切卑鄙勾当，会进行欺骗，进行叛卖，总之什么都干得出来。在这方面，哪怕对米留可夫和克伦斯基（空谈家，按其客观作用来说是俄国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代理人）采取一点点轻信的态度，都是直接有害于工人运动和有害于我们党的，都是近于背叛国际主义的行为……您可以想象到，在这样的时候呆在这里，对我们大家来说是一种怎样的折磨。”

列宁从战争一开始就论证这是一场帝国主义性质的战争，并无情地揭露各交战国的那些企图把这场战争说成是“自卫性的”战争的撒谎者，他在信中接着写道：

“……外国报纸上登载的最新的消息愈来愈明显地指出：在克伦斯基的直接帮助下，并且由于齐赫泽的不可原谅的（客气点说）动摇，政府正在欺骗工人，而且正在有效地欺骗工人，把帝国主义战争冒充为‘自卫性的’战争。根据圣彼得堡通讯社1917年3月30日发出的电讯来看，齐赫泽完全受了这个口号的骗，而且（如果相信这个消息的话，当然它一般来说是不可靠的）连工人代表苏维埃也接受了这个口号。无论如何，即使这个消息不真实，这种欺骗的危险性无疑仍然是很大的。党应当集中全力同这种欺骗作斗争。我们党如果容忍这种欺骗，就会永远丢脸，就会在政治上自杀。”

彼得格勒苏维埃成员的成份极为复杂，其中占优势的是社会爱国主义者，这一点使他感到不安，因此他在信中分析了形势并作了明确和果断的指示：

“毫无疑问，在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中，下面两种人是很多的，看来甚至占优势，即（1）克伦斯基的拥护者——克伦斯基是

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最危险的代理人，他实行帝国主义，用无穷尽的花言巧语和空头支票作掩护，来捍卫俄国方面所进行的掠夺性的侵略战争，并替它辩护；（2）齐赫泽的拥护者——齐赫泽厚颜无耻地倒向社会爱国主义，他赞同考茨基主义的全部卑鄙行为和整套荒谬见解。我们党必须同这两个流派进行最顽强、最有原则、最坚韧、最无情的斗争。我个人会一秒钟也不犹豫地声明，而且在报刊上公开声明：我甚至宁愿立即同我们党内的任何一个人分裂，也不愿向克伦斯基之流的社会爱国主义或者齐赫泽之流的社会和平主义与考茨基主义让步。”^①

他的关于战争是帝国主义性质的论断以及关于无产阶级任务的论述是同样精辟的。在这里，民族问题的纲领也得到了明确的发挥：

“从俄国方面来说，战争不会改变而且不能改变它的帝国主义性质，即：（1）如果掌握政权的是地主和资本家，是资产阶级的阶级代表；（2）如果掌握政权的是这个资产阶级的直接代理人和奴仆，如克伦斯基和其他社会爱国主义者；（3）如果沙皇政府同英法帝国主义者缔结的条约仍然生效（古契柯夫-米留可夫政府在国外——我不知道，它在俄国是否这样做了，——曾直截了当地宣布：它要忠实于这些条约）；这些条约是掠夺性的，其中谈到占领加里西亚、亚美尼亚、君士坦丁堡等等，等等；（4）如果这些条约没有公布出来而且没有废除；（5）如果俄国同英法资产阶级帝国主义政府所结成的整个同盟关系没有完全决裂；（6）如果俄国的国家政权没有从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手中（空洞的许诺与‘和平主义的’声明，不管愚蠢的考茨基、齐赫泽之流怎样相信它们，但它们总不能把资产阶级变成非资产阶级）转到无产阶级手中；只有无产阶级

^① 《列宁全集》第35卷第303—305页。——编者注

能够在最贫穷的那部分农民支持下**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实际上**同资本的**利益和帝国主义的政策一刀两断**，同其他国家的掠夺行为**一刀两断**，把受大俄罗斯人压迫的民族**完全解放出来**，**立即**从亚美尼亚和加里西亚撤军，等等；（7）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如果摆脱了本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影响，就能赢得**一切**交战国无产者的**真正信任**，就能**同他们**进行和平谈判……”

弗·伊·列宁关于应当如何向工人宣讲复杂的政治问题的指示对我们以及对我们的国外的兄弟党来说都是极为宝贵的。他写道：

“应当对工人们讲**真话**。应当告诉他们：古契柯夫-米留可夫之流的政府是帝国主义的政府，工人和农民应当**首先**（是现在还是在选举立宪会议以后，即使政府不用立宪会议来欺骗人民，不把选举拖到战后，从这里并不能解决时机问题），应当首先使**全部**国家政权转到工人阶级——资本的敌人、帝国主义战争的敌人——手中，只有到那时，他们才**有权**号召推翻**一切**国王和**一切**资产阶级政府。”①

上面引用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信和他的著名的《远方来信》都由我妥善地寄到彼得格勒。列宁还在瑞士的时候，就对无产阶级能够夺取政权这一点已经毫不怀疑，并在革命开头的日子里就向党指出通向未来的十月的道路。

毫无疑问，临时政府从革命伊始就处心积虑地企图平息汹涌澎湃的浪潮，并在事实上是要消灭革命。但是它是仓促拼凑起来的，由于还不够巩固，不敢贸然就对自己的宿敌——布尔什维克实行镇压。我们彼得格勒的同志们不失时机地利用了这一点。业已开始的通过我经斯德哥尔摩同列宁进行的电报和信件往来已不能

① 《列宁全集》第35卷第305—307页。——编者注

使他们感到满足。用这种办法不十分可靠，不能一切都讲到。于是他们安排了一个自己的布尔什维克的“外交信使”，通过他来跟列宁保持联系，他把材料直接给我们送到斯德哥尔摩。

二月革命起初的影响使居住在国外各个城市的俄国资产阶级欣喜若狂。他们到处欢呼，频繁地举行各种宴会，在宴会上呼酒痛饮，高谈阔论。他们乐意向为返回俄国的政治侨民提供援助的侨民委员会捐款。

在斯德哥尔摩也没有这样的委员会，参加这个委员会的成员有各个革命政党和组织的代表。我并不十分信赖这个委员会。我在许多事情上有必要对它保密。我对列宁准备回国的计划一直守口如瓶，因为我怀疑，米留可夫会通过这个委员会得到这方面的情报。临时政府在各地还保留了原先的沙皇的大使，对他们自然一点也不能信任。而我们斯德哥尔摩的委员会同大使的关系却很密切……

那么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回国一事该怎么办呢？他的计划要实行并不是轻而易举的。要说服尊敬的临时政府“帮助”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回国并非容易，何况还要取道德国，关于这件事，尊贵的协约国又将会说些什么呢？

时间一天天过去，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还苦恼地呆在瑞士。他委实是苦恼地呆着，可是这种难堪的处境却使他想出了一个别出心裁的回国计划。

我突然收到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拍来的一份电报，告知已经给我寄来一封重要的信，他要我收到此信后即回个电报。两、三天之后我收到一本从瑞士寄来的书。我猜想在书的封面里会夹有伊里奇的信。事情果然是这样。我找到了伊里奇写的一张小便条……以及他的一张照片。便条的大致内容是：不能再等下去了，合法地回国的一切希望都已落空。无论如何要立即动身回俄国

去，而唯一可行的计划是请找一个跟我长相一样的瑞典人。但我不懂瑞典语，因此这个瑞典人应当是一个聋哑人。给您寄上我的一张照片备用。

我读完便条，感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真是够苦闷的，但是说真的，我对这个异想天开的计划曾为之捧腹大笑。只有在绝望的时候才能设想出这种计划……干吗还要照片？自1903年起，我就认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我们见面的次数非常多，而战争前的两年，我们同住在一个城市——克拉科夫……但是寄来的这张照片当即被用上了。两天后它便十分醒目地被刊登在瑞典左派社会民主党人的日报《政治报》上，在照片下面是一篇沃罗夫斯基写的社论，题目是：《俄国革命的领袖》^①……

当时在瑞士的侨民中间就能否取道德国，需要哪些条件等问题进行热烈的讨论。4月5日我收到从彼得格勒拍来的电报，内容如下：

“乌里杨诺夫必须立即回去。所有的侨民可以自由回去。乌里杨诺夫已领有特别许可证。”

第二天（6日）我收到了另一份电报：

“别催促弗拉基米尔回来。切勿冒险”。

当要求临时政府协助取道英国回国的全部希望落空以后，瑞士的侨胞们决定着手同德国政府进行谈判。瑞士的普拉廷同志负责进行这次谈判。全体侨民提出的条件德国政府都同意了。

这些条件是：

1) 全体侨民不论其对战争的观点如何都可以走；

2) 侨民乘坐的车厢享有治外法权，未经普拉廷同志的许可，任何人无权进入车厢，护照或行李均不受检查；

^① 1917年4月6日《政治报》第80号。——编者注

3) 回国人员有义务在俄国进行宣传, 以被放行的侨民交换同等数量的奥德被拘人员。

虽然有了这些条件, 尽管孟什维克自己也同意这些条件, 但是他们还是不准备走。他们还一直等着代表苏维埃对回国的许可。

4月6日我接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发自伯尔尼的电报, 其内容是:

“我们现被耽搁, 原因不明。孟什维克要求由工人代表苏维埃批准。请立即派人往芬兰或彼得格勒同齐赫泽商定, 这是否可能办到。别列宁意见如何, 切望见告。回电伯尔尼民众文化馆。

乌里杨诺夫”。^①

但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没有等到答复就于4月7日给我拍来了一份急电, 其内容为:

“明天有二十个人走, 务请林德哈根和斯特勒姆^②在特雷勒堡^③等候……

乌里杨诺夫”。^④

关于这份电报在侨民委员会面前我是保密的。关于列宁动身回国一事可以在他进入瑞典境内之后再告知。

我决定到马尔默走一趟(从那儿到特雷勒堡港口, 搭车要一小时)。

整整一天我怀着激动的心情在马尔默徘徊。“会来吗? 德国人在路上会不会干出卑鄙勾当害他们?”这些想法使我深感不安。最后在傍晚的时候, 我同一个当地的同志一起前往特雷勒堡。轮船靠岸了……但多失望啊: 伊里奇和其他的人都没来。

① 《列宁全集》第36卷第444页。——编者注

② 此两人均是瑞典社会民主党人, 议会议员。——雅·格·注

③ 是瑞典的一个港口, 对岸是德国的扎斯尼次。——雅·格·注

④ 《列宁文稿》第6卷第437页。——编者注

是我把抵达的日子算错了，还是他在路上发生了什么事情？一时无法弄清楚，只好等第二天了。

我们回到了马尔默。夜过得真慢，第二天白天的时光过得更慢……我又赶去特雷勒堡……但我们要接的旅客还是没有搭这班轮船来。

我返回马尔默。整夜考虑着各种方案，以便弄清情况。上午给在斯德哥尔摩的妻子通了电话，可是那边没有一点消息。往瑞士拍了急电，但没有任何答复。我让那位瑞典同志留在马尔默，要他在那里等我的电话，而自己第三次到特雷勒堡去。

我提出拍一个电报去扎斯尼次，对我这个建议，站长解释说，轮船已经从那儿开走了……

“能否往轮船上拍一个电报？”我问。

“可以的，但只办理公务性的电报”。

我发现站里贴有一张沙皇红十字会的布告，我便向站长解释说，我是红十字会派来接待一批侨民的，因而要求您向船长询问一下，这批人是否乘这班船，男、女、孩子的人数各有多少，以便我预订车厢的座位。我说服了站长，于是他给船长拍了电报：

“加涅茨基先生询问，乌里杨诺夫先生是否乘这班船，同他一起的男、女、孩子各有多少”。

约摸过了二十分钟就得到了如下的答复：

“乌里杨诺夫先生向加涅茨基先生问好，并请他预订车票”。

回电还告知了男女人数。

我顿时精神百倍。站长并不了解我的这一内心变化。首先我跑去打电话，通知在马尔默等候的那位同志，说人已经来了，并请他落实预先订好的开往斯德哥尔摩的车厢，还请他在靠近火车站的饭店里订好晚餐。还给妻子挂了电话，要她按照事先留下的计划行事，订好旅馆等等。妻子告知收到了一份列宁于4月12日从

扎斯尼次拍来的电报，内容是：

“我们将于今天六时到达特雷勒堡。”^①

我订了到马尔默的车票，并通知海关当局，有一批侨民即将到达。我的心情异常激动，我向海关人员宣传，要他们协助我们的革命，讲了这一革命的意义和列宁在这个革命中的作用。官员们听得很仔细，答应不检查行李，只要求……让他们看看列宁。

轮船渐渐驶近了。这当儿的几分钟时间我感到好象无限的长。船终于靠岸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和许多熟识的同志的身影陆续映入我的眼帘……

接着便是热烈的相互问好，问长问短，一时间乱哄哄的，还夹杂着孩子们的喊声。我高兴得热泪盈眶。一分钟也不能多耽搁，因为去马尔默的火车一刻钟之后就要开动。海关人员没有检查行李，只要求履行诺言，让他们看看革命的领袖……

我们已经坐在车厢里了，这时我才知道，他们在轮船上是在怎样的情况下收到我的电报的。

原来战争期间瑞典人规定所有进入瑞典的人都要填写一种极繁琐和最乏味的调查表。他们把这种表格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送到船舱里来了。伊里奇和同志们商谈了一下，而这时所有的人的手上都已拿着调查表了。这一情况说明什么呢？这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得出结论，认为这是德国人在耍花招：他们自己放过了我们，但是却通知瑞典警察局，而后者现在开始行动了……当即召开了“军事会议”，怎么办呢？伊里奇填写真名实姓，还是用假名呢？船长忽然来了，他手中拿着一张小纸条，问：他们当中谁是乌里杨诺夫先生……伊里奇以为他的猜想证实了，现在就是来抓他的了。隐瞒已无必要，海上也无处可逃。弗拉基米尔·伊里奇

^① 《列宁文稿》第6卷第441页。——编者注

说了自己的姓名。船长这就转达了我拍去的电报……

我们到了马尔默。那位瑞典同志正等候我们…… 在车站附近的一家饭店里已准备了丰盛的晚餐。四天旅行弄得疲劳不堪，加上饥肠辘辘，侨胞兄弟们便大吃大嚼起瑞典食品来。一位同志说：“现在我相信，既然如此款待侨民，那俄国国内一定已经发生革命了……”

预订的车厢已经调来了。十五分钟之后，我们就驶向斯德哥尔摩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和几位亲近的同志单独坐在一个包间里。谈话一直延续到深夜。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老是问起最近俄国的消息。他指出，无产阶级面临着艰巨的斗争，提到正在发展中的革命的前景以及这一革命应当采取的形式。他指出克伦斯基可能带来的危险，虽然后者在那时还未起到特别的作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指出有必要在国外保留党的支部，以便使俄国的党保持同外界的联系，或者为了别的什么“不时之需”。计划建立由沃罗夫斯基、拉狄克和我参加的党中央委员会国外局…… 直至凌晨四点钟，我们才说服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稍睡一会儿。

早晨八时，我们尚未到达斯德哥尔摩时，在一个车站上有一批斯德哥尔摩的记者涌进了车厢，因为他们收到了自己的同事从马尔默发来的关于列宁抵达的电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没有接见他们，只回答他们，到斯德哥尔摩后会向报界提供消息的。

九点钟时我们已经到了斯德哥尔摩。车站上正在拍摄电影，因此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怎么也无法不惹人注目地通过那个地方了。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整整一天连一分钟也没有休息。劝他在斯德哥尔摩哪怕歇上一天也好，这些话，他连听都不想听。对他来说每一分钟都是宝贵的。到达的人（他们分属于各个党派：中间有

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崩得分子和无政府主义者)举行了会议,拟订了一份关于这次回国的详细纪要,全体人员都在上面签了字…… 国外局的筹建工作正在进行中。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给我们留下了详细的指示。他急着去购买最近出版的新书并且还挑选了一些党内材料。

转瞬间我们又该去赶火车了。又是火车站,这儿一派熙熙攘攘的景象,嘈嚷声、喧嚣声、加上孩子们的哭叫声响成一片。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关心所有的人,不时问同志们是否都安顿好了,对孩子们更是关怀备至。火车开动了…… 我们激动地向伟大领袖致以临别祝愿,我们想:“他一定会把革命引上正确的轨道……”

载于雅·加涅茨基:《忆列宁。
回忆片断》1933年莫斯科党的出版社版第53--61页

回到祖国

米·格·茨哈卡雅

1915年秋季的一天，俄国政治侨民在日内瓦举行了纪念第一次俄国革命(1905年)十周年的盛大集会。那时居住在伯尔尼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被邀参加这次会议，但是他未能前往日内瓦。我受委托主持开会并发表了简短的开幕词，阐述了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战争最终将导致什么样的结局的观点。最后我以对当时的条件来说是十分乐观的调子结束了发言。

我说：“残酷的战争最终将在某个地方，可能在小小的葡萄牙或者在疆土辽阔的俄国冲开一个缺口。我们的愿望是，这‘星星之火’不论在什么地方点燃，它将会变成世界革命的熊熊烈火，燃遍全球……”

* * *

当俄国二月一三月革命的消息传到瑞士的时候，我们布尔什维克侨民的情绪是可想而知的。这以后不久，我收到伊里奇寄来的一张明信片，上面写道：“……我祝贺俄国的革命。您的乐观的言论这么快就得到了证实。我正准备启程，在整理箱子。您在做些什么？”

当天我给他回了一封表示祝贺的信，并告诉他，“我的箱子在去年就已经收拾好了”，准备带着它回俄国去，什么时候都行。

一方面由于英国帝国主义者对我们设置种种障碍，另一方面

由于俄国临时政府和彼得格勒苏维埃中间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对我们采取了漫不经心，甚至是公开的敌视态度，所以我们回国的组织工作拖延了不少日子。但回国的事终于安排妥当了。一天，我收到伊里奇拍来的电报，邀我前去伯尔尼，以便取道德国回俄国去。这封电报我是在火车站附近的一个地方接到的，火车又快要开动了，由于这个缘故我竟把“在去年就已收拾好的箱子”遗忘了，随身没带一点东西就乘车上伊里奇那儿去了。

大部分侨民对我们这次取道德国回国都不以为然。轻信的人们希望，协约国方面自己会主动送我们回去。难道不该这样吗？要知道俄国是协约国的成员国啊！然而协约国送走的只是那些赞成进行战争的侨民，即护国派，这些人对它来说是有用处的。伊里奇在当时的瑞士社会民主党书记的帮助下，之所以要同其他布尔什维克一起着手安排取道德国回去事宜，并要求在通过德国时能享有治外法权，其原因就在于此。最后这件事终于办成功了，于是我们这批人——其中许多人带着家眷和孩子——离开了瑞士。

我们在国外侨居时期曾居留多年的小资产阶级的瑞士，为了检查行李物件竟把我们阻留在与德国交界的边境线上好几个小时，很显然，它是怕我们会带走它的“财宝”。

根据我们的建议，一个瑞士国际主义社会党人同德国政府签订了协议，根据这项协议，有三十个侨民乘坐的车厢在经德国到波罗的海海岸这段路程上享有治外法权。这一治外法权的含义是，我们不得离开车厢走到德国的土地上去，而德国当局也不得进入我们的车厢并同我们进行接触。我们完全遵守了这个条件：在到达海岸——那边有一只租赁的轮船在等着我们——之前，我们没有走出过车厢，在我们到了港埠后马上就上了船。

在德国境内确实有人企图跟我们见面。谢德曼之流的德国“护国派分子”及其同伙尤其起劲地想这样做。他们在我们的车厢

需要停靠的各个车站上，死乞白赖地要求来访问我们，但是我们在伊里奇率领之下，坚决地、断然地拒绝与他们会面。

当船从德国驶向瑞典的时候，我同伊里奇几乎一直呆在甲板上。途中，大副或者是船长本人——现在我记不清了——从驾驶台上走下来，走到我们跟前，问：“这里谁是乌里杨诺夫？”我同伊里奇会心地交换了一个眼色，因为在当时任何麻烦的事情都可能碰上的。伊里奇当即回答说：“您有什么事？我就是”。于是这位海员就转告说，俄国的同志已聚集在瑞典海岸等候，他们拍来电报表示敬意：“愿很快见面”。

果真是这样。当轮船一靠岸，迎候的同志们如俗话说的那样简直是从船上把我们拉到自己的怀里，接着就领我们去吃午饭。我们在这里逗留了一小时左右，随后即乘下一趟车前往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

在瑞典我们受到了亲切和殷勤的接待。这儿有许多俄国侨民。当地的瑞典同志对待我们也很好。1917年春季在斯德哥尔摩担任市长的是一位左派社会民主党人，他十分同情我们布尔什维克，对伊里奇尤为尊敬。正因为这些缘故，所以当第二天火车抵达斯德哥尔摩时，我们受到了热情的欢迎，并把我们带到第一流的旅馆去休息。可是休息未成，因为伊里奇急着要赶回俄国去。他打算当天晚上动身去芬兰。为了让我们穿戴得体面一些，他们把我和伊里奇领到商店去走了走，因为我意识到，我们侨居国外，境况窘迫，外表的修饰是不大讲究的。我们更换衣着之后，便被邀出席有以斯德哥尔摩市市长为首的一些瑞典同志参加的宴会。由于我们可能遭到驻扎在芬兰国境线上的英国机构的各种盘诘和刁难，所以就在宴会上我们拟订了一份说明我们这次旅行全部情况的正式证明书。我们把全部旧的侨民证件和信件都留在斯德哥尔摩的当地的俄国老侨友那里。然后伊里奇给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

维埃拍了电报，告知我们即将回到俄国。

当天晚上我们离开了斯德哥尔摩，两天之后到了同芬兰接壤的一个边境车站。

我们在芬兰边界上这个革命的大门口意外地迅速出现，使协约国的爪牙们惊惶不安。英国宪兵毫不掩饰自己的凶恶面目，但又不敢当即扣留我们，为了出口气就在单个房间里对我们进行侮辱性的搜查。

伊里奇镇定自若。当看到宪兵们什么也没有发现而不得不放我们过去的失望表情时，伊里奇高兴得哈哈大笑起来。他抱住我说：

“米哈同志，我们的考验结束了。我们踏上了自己的土地，我们要让他们知道”，说到这里他握起拳头，“我们是未来的名副其实的主人”。

在列车穿越芬兰途中，伊里奇在挤满了士兵的列车里举行了一次独特的群众大会。在伊里奇讲话之后，我讲了话，我讲我们是什么人、从哪儿来以及我们高举的旗帜将会带给他们什么。接着许多士兵起来发言，他们对战争作了狠狠的批判。伊里奇非常认真地倾听了士兵的发言。

在白岛，伊里奇受到彼得格勒和谢斯特罗列茨克工厂工人代表团的欢迎。他们兴高采烈地欢迎自己的朋友和导师。我们同他们一起前往彼得格勒。1917年4月3日（16日），在彼得格勒的芬兰火车站上举行了令人难忘的欢迎伊里奇的群众集会。

载于1940年4月22日《红星报》
第93号第2版

在白岛火车站的会见

亚·米·阿法纳西也夫

还在1905年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首次会见之前，我和我的同志们——彼得堡的工人布尔什维克——已经听到过许多有关他的情况。尽管列宁远离我们，侨居国外，但是我们把他看作是无产阶级群众的领袖。我们怀着这样的信念度过了反动年代和帝国主义战争的岁月。1917年，在等候伊里奇返回已经从专制制度下获得解放的俄国时，我们怀着多么迫切的心情，这是不言而喻的。当我们阅读刊登在《真理报》上列宁写的《远方来信》时，我们感到这些信里充满了对革命、对工人炽烈的信念，因而我们十分希望伊里奇回到国内来，同我们在一起，热切地希望他在当地领导革命。

盼望已久的日子终于到来了。

那时我在谢斯特罗列茨克工厂工作。我们决定在我国国境上的第一个车站——白岛火车站——迎接伊里奇。聚集在这里的有：由谢斯特罗列茨克工厂一百名左右工人组成的代表团和来自彼得格勒的党的工作者代表团。大家的情绪十分高昂。晚上十一点钟左右，远处出现了机车的灯光。我们当时激动的心情委实难以用语言来形容。伟大的革命领袖回国了。

列车驶近站台，停下了。可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乘的是哪个车厢？列车长指给我们看列宁乘坐的车厢。我朝窗内张望了一下，想看个究竟，但窗子上一片模糊，什么也看不清。

当身着灰色服装，外面披着一件夹大衣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车厢平台上出现时，由于车站上灯光昏暗，我没有马上认出他来。但这就是他，我们的亲人伊里奇。我不记得当时我做了些什么，我兴奋异常，就激动地叫了起来：

“列宁！列宁！”

我们涌向车厢平台，用手把伊里奇托起来，高高地举在我们的头上。伊里奇没有预料到这样热情奔放的欢迎，激动地对我们说：

“同志们，安静一些，你们这是怎么啦，同志们！”

我们用手托着伊里奇进了车站大楼。工人们在伊里奇的四周紧紧地围成一个圈子，不让站台上的无关人员靠近我们敬爱的领袖。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受到这样的欢迎，显得十分激动。有一位工人以各个代表团的名义向列宁致欢迎词。伊里奇一字一句都听得很仔细。随后他发表了简短的答词。他讲话的全部内容我已经记不清了，但记得他讲到了今后的斗争和必须结束帝国主义的屠杀。我们站在周围，高兴得象孩子一样。每一个人都感到自己增添了新的精神力量。要知道，伊里奇，我们的伊里奇——布尔什维克党的久经考验和坚韧不拔的领袖和导师，又同我们在一起了！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和从国外一起回来的其他人员，走进了一个检查护照的房间，那个地方没有放我们进去。

随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和陪同他的同志们又登上了车厢。我们聚集在车厢的旁边，高呼“乌拉！”，不停地挥动着帽子。列车开动了。车厢里唱起了《国际歌》。站在月台上的工人也跟着唱起来，一直唱到列车在眼帘中消失时才停止。我们怀着兴奋和幸福的心情返回原地。

在车站上一群衣冠楚楚的人谈论着列宁的到来，谈话口气非常凶狠。我们警惕起来。我们每个人又一次体会到列宁关于将要

发生严重斗争的一番话的无比正确。但是我们已作好了斗争的准备，准备在列宁的旗帜下，在他的领导下，把所有反对革命的敌人统统消灭光。

载于 1937 年 4 月 16 日《共青团
真理报》第 87 号第 2 版

1917年4月弗·伊·列宁 回到彼得格勒

费·尼·萨莫伊洛夫

4月3日弗·伊·列宁结束侨居生活回到彼得格勒。我同彼得格勒的布尔什维克一起在芬兰车站欢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车站广场上站满了工人、士兵和水兵。广场上停着一辆装甲车。所有紧挨车站的各条街道也都挤满了人，这是前来欢迎自己领袖的工人游行队伍。人们兴高采烈，情绪昂扬。革命歌声响彻各条街道。虽然时间已经很晚（已经是深夜了），但来的人还是络绎不绝。探照灯的光束划破夜空，照亮了车站广场。夜幕中，在一片人海的上空晃动着无数的火光，这是游行者手擎的燃烧着的火炬。到处能看见飘拂的红旗和上面写着“向列宁致敬”的横幅。等候的时间已经很久了，真有点令人心焦。列车被出来欢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工人游行队伍所阻而误了点。但是列车终于驶进了站台。四周的人们都在欢呼雀跃，这种情景难以用言语来形容。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刚刚走下车厢的阶梯，人们立刻把他举起来，穿过人群，向车站走去。

过了一会儿，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来到车站广场上，站在装甲车旁边，面向着人群。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已经准备讲话了，但水兵和士兵们把他拥上装甲车。伊里奇高高地站着，下面一片人群，他身上的大衣敞开着，塞在口袋里的一顶便帽露在外边，他的一只

手高举着——这些情景至今历历在目。他对工人、士兵、水兵们讲的开头的几句话，就是号召他们为社会主义革命进行斗争。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第一次演说以一种极其鲜明的观点唤醒了人们的觉悟。

在整个人群的簇拥下，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乘装甲车从芬兰车站前往当时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和彼得格勒委员会所在地——克舍辛斯卡娅宫。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从阳台上向聚集在宫前的广大群众重复了自己的演说，列宁再次高呼“社会主义革命万岁！”这一口号宣告革命将进入高级阶段。

我记得，那时革命的敌人已看出列宁是工人阶级公认的领袖，因此把他看作是自己最危险的敌人，并千方百计地诽谤、中伤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立宪民主党人的《言语报》和社会革命党人的《人民事业报》重复了黑帮分子的最卑鄙的谎言，率先在报刊上开展了一场反对列宁的诽谤运动。但是这些下流、懦怯的歹徒们无法料到的是，世界上没有一种力量能使群众离开列宁或者使列宁离开群众。

工人和士兵作出大量的决议表示愤怒抗议，尔后在列宁到达的那一天，以游行示威来表示同自己领袖的团结一致——这就是对诽谤者的回答。

4月4日早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出席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会议的布尔什维克代表举行的会议上，作了关于战争与革命的报告。我也出席了这次会议。在通向二楼——会议将在那里的一个大房间里举行——的楼梯上我碰见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立刻认出了我，并把我叫住，问了我许多问题：流放是怎样熬过来的？健康情况怎样？是否在治疗，在谁那儿治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象1914年在克拉科夫首次见面时一样，用关切的、热情的眼光亲切地端详着我，似乎在我的脸上寻找昔日遭受苦难的

痕迹。

我回答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流放熬过来了，还不错，觉得身体尚可以，现在准备着手工作。但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没等我讲完，就说：

“不，不，您还应该认真地治疗一下。我劝您去找教授们。他们是专家，一生研究专业，注重科学，他们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当然应给他们一笔较好的报酬，但这是小事。他们会对您有帮助的”。

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谈话使我感动不已，受到了鼓舞，我怀着这样的心情和其他的同志们一道登上了二楼。参加这次会议的人很多。

轮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讲话了。布尔什维克热烈欢呼，表示对自己的领袖的欢迎。我们屏息凝神地聆听列宁讲的每一句话。

列宁的这个演说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四月提纲》，它给了我们莫大的启示。我们这些布尔什维克地下工作者在列宁的领导下，经历了为工人阶级事业而进行斗争的良好考验，因而在二月革命后，对形势的认识基本上是正确的；我们极大多数人在对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和帝国主义战争问题上迅速采取了不调和的态度，并且认为革命还远未结束。但是我们对未来斗争的前景的具体情况却是不甚了了。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自己的报告中坚定地宣告革命的第一阶段（二月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应过渡到第二阶段——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应当使政权转到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阶层手中。

列宁提出，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一条关于议会制共和国是过渡到社会主义阶段最好的国家形式这一原理已经过时，应该加以更换。他提出，由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时期，苏维埃共和国是最完备和最恰当的社会政治组织形式。

接着，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谈到了正在进行的战争的掠夺性质，谈到不推翻资产阶级，就不能缔结真正的民主和约来结束这次战争。列宁提出要求说：“不给临时政府任何的支持！”——并号召布尔什维克在群众中进行耐心的、经常的和坚持不懈的解释工作。

在列宁做报告的时候，楼下有几位同志来到我们会场上，要求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杜马会议厅把自己的报告再作一次，因为那里正聚集着出席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会议的代表。在代表中有布尔什维克，也有孟什维克。弗·伊·列宁同意了。当列宁在这个新的会议上讲话时，从孟什维克那儿传来了响亮的插话声，有时还夹杂着恶狠狠的叫嚷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片刻也不中断自己的报告，有时顺便对孟什维克的叫嚷进行了驳斥，这样一来，几个叫嚷的孟什维克立刻不作声了，泄了气，被列宁的一针见血的、合乎逻辑的言词所慑服了。

我记得，当列宁谈到必须把我们党的原来的名称——社会民主党——改为共产党，谈到社会民主党这个名称已被卑鄙地背叛了社会主义的那些自称为社会民主党人的孟什维克和所有的西欧社会沙文主义者所玷污了的时候，孟什维克叫嚷得特别凶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现在已经是丢掉“肮脏的衬衫”的时候了。当列宁作完报告之后，孟什维克的首领策烈铁里和唐恩起来发言，反驳列宁。策烈铁里伪善地喋喋不休地说要维护“统一”，说他不同意列宁提出的全部原则性论点，但是他对他们孟什维克会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找到“共同语言”这一点“未失去希望”。接着发言的唐恩吹毛求疵地说，他不同意列宁的讲话，并声称他们同列宁走的不是一条路，他们已经分道扬镳。

策烈铁里和唐恩的这两个发言——一个是伪善的、令人厌恶的；另一个则是赤裸裸恬不知耻的——都再次证明：孟什维克党所走的道路早已经是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道路了。

所有地方党组织在自己的会议和代表会议上都赞成列宁的提纲,并把这个提纲作为自己实际活动的基石。

只有个别的,诸如加米涅夫、李可夫、皮达可夫这些在党内得不到任何支持的、同党离心离德的人在继续鼓噪,说他们“不同意”列宁,从而陷入了孟什维主义的泥潭。

列宁的《四月提纲》团结并组织了彼得格勒和各地的布尔什维克为继续开展革命而进行斗争。

载于费·尼·萨莫伊洛夫:《过去的足迹》
1954年莫斯科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版
第376—379页

难忘的日子

绥·伊·霍普纳尔

1917年4月24—29日(5月7—12日)举行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七次全国代表会议(四月代表会议),这次代表会议对准备伟大的十月革命起了极大的作用。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代表会议的某些细节我依然记得十分清楚。

在代表会议开幕前的预备会议上磋商了这次会议的议程草案。这次预备会议向当时身陷囹圄备受折磨的卡尔·李卜克内西表示敬意。当弗·伊·列宁来到会议厅时,我们代表会议的全体代表都感到有说不出的高兴。预备会议热烈欢迎我们党的领袖、革命的领袖列宁。这种用暴风雨般的掌声来表示欢迎的做法,那时在党的习惯上还是很新鲜的事情。

大家的情绪十分高涨,充满了节日般的喜悦。在经过数十年的不合法的活动之后,这次党的代表会议破天荒第一次不是在国外,也不是在极度的秘密状态中举行,而是在俄国、在自由的条件下举行。但是由于反革命势力对布尔什维克的迫害,使我们不得不在某些方面仍旧遵守保密规定。代表会议的地点未在报刊上报道,而且在举行了开头的几次会议后,开会地点便从克舍辛斯卡娅宫移到了女子医学院,尔后再移至姆·阿·洛赫维茨卡娅-斯卡隆高等女子学校。^①

大部分代表是这样一些人:有的刚刚从流放地、监狱里出来;

有的不久前还在服苦役；有的是结束侨居生活才从国外回来；但是他们对上两个月的革命已经是深有体会了。在第一次俄国革命的年代里，由于共同斗争而息息相关，但后来由于受到警察当局的迫害而分手多年的同志们会面了。但是在那个时刻，大家的思想不是停留在往事上，而是关注着未来，预感到即将发生的重大战斗。

代表会议的议程反映出党为使工人阶级夺取政权和使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而斗争的伟大历史任务。列入会议议程的有以下具有极其重大意义的问题：关于战争、关于对待临时政府的态度、关于苏维埃、土地问题和民族问题、关于国际的状况和其他一些问题。

代表会议各项工作的内容生动地表明了列宁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天才的领袖的作用。在那些日子里，使人不胜惊讶的是，列宁在科学地分析当前各种事件中表现出极高的水平，同时他作为一个革命的领导者，从不“凭空幻想”，具有大无畏的思想和才能，这一切在他身上是融合在一起的。

列宁在代表会议开幕时所作的简短的开幕词中，指明了革命的广阔前景和它所具有的国际意义。弗·伊·列宁在指出俄国无产阶级的运动和革命仅仅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一部分后，强调说：“只有从这个角度来看问题，我们才能确定自己的任务”^②。列宁的这个讲话（他在后来的几次讲演中把这一讲话的主要内容作了进一步的发挥）立即使党理解到估计新的世界形势的必要性，他的讲话着重说明俄国无产阶级应负的国际义务，告诫党

① 在1979年莫斯科政治书籍出版社出版的本卷第2版上，编者在这里加了一个注，对在三个地点先后开会的次序作了如下更正：第七次全国代表会议（四月代表会议）先是在女子医学院举行的，后来移至高等女子学校继续举行。代表会议的闭幕式是在克舍辛斯卡娅宫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和彼得格勒委员会大楼举行的。——译者注

② 《列宁全集》第24卷第197页。——编者注

不要机械地去重复那些已经过时的口号，并且防止民族的狭隘偏见。代表会议上的辩论表明，列宁提出的这些告诫是无比及时的。

众所周知，在代表会议上反对派的立场同弗·伊·列宁的《四月提纲》、同他的把革命过渡到第二阶段、为使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而斗争的计划是相对立的，反对派抬出加米涅夫作为补充报告人，而此人奉行机会主义，这是党已经知道的。在代表会议上抛出补充报告并非突然。这次代表会议前不久，加米涅夫在《真理报》发表文章反对列宁的《四月提纲》。我们知道，彼得格勒市党代表会议上围绕列宁的提纲开展的讨论的结果表明，这次会议是拥护列宁的。大家也知道，在一些地方组织中出现过反对列宁提纲的言论，比如以尤·皮达可夫为首的基辅委员会曾通过决议反对这一提纲。但委员会作出的这一反对列宁的决议被赞同列宁的《四月提纲》的基辅组织全体会议撤销了。

列宁同加米涅夫反对派之间的争论，对无产阶级革命来说是一场生死攸关的争论。问题是这样摆着：是否坚持弗·伊·列宁提出的使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方针；是准备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并使政权转到工人阶级即苏维埃的手中，还是依照加米涅夫提出的俄国还没有成熟到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程度的这类话去做，而把党的任务局限在巩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上？是列宁提出的“不给临时政府任何支持！”和“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正确，还是加米涅夫提出的由工人代表苏维埃对临时政府施加压力并对其实行监督的政策对？

四月代表会议尚未开幕，就突然爆发了几桩对辩论有影响的事件：临时政府发生了危机，首都的工人和士兵举行了群众性的示威游行，反对米留可夫给英、法政府的关于临时政府希望继续进行战争的那份臭名昭著的照会。米留可夫的照会暴露了临时政府政策的帝国主义性质，证明列宁的“不给临时政府任何支持！”的口号

是正确的。加米涅夫集团受到这一打击后，想利用擅自号召工人立即推翻临时政府的党的彼得堡委员会书记巴格达季也夫的这一错误立场进行报复。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采取措施纠正了这一错误，因此加米涅夫利用这一错误为自己的立场辩护的企图未能如愿以偿。

列宁和支持他的代表会议在两个方面开展了斗争，既反对右的投降主义者（加米涅夫的追随者），又反对“左”的主张进行暴动的分子（巴格达季也夫等人）；提出要在社会主义革命和为苏维埃政权而斗争的旗帜下，对群众进行广泛的教育工作，从而保证了党在那一个阶段有一条唯一正确的路线。

代表会议辩论的结果，列宁的观点取得了完全的胜利。反对派在每项决议上所得的票数为七至十一票不等，而且大多数情况是反对派不投反对票而是弃权。这生动表明他们的队伍在动摇，他们在怀疑自己的正确性。

列宁在这些日子里所表现的积极性、工作干劲和充沛的精力是使人难以想象的——他事事操心，处处奔忙。列宁是会议议程上几个最重要的问题的报告人，他参加辩论，执笔起草代表会议的几乎所有的决议草案。他领导代表会议的工作，参加会议的各个委员会的工作，经常从一个委员会转到另一个委员会。列宁在代表会议上的发言超过了二十次。4月20—24日（5月3—7日）之间他在《真理报》上每天发表三至六篇各种题材的文章（或者决议草案）。在会议休息时间内总有一批批的代表来找他，希望跟他谈谈。谁也不知道他在什么时候休息过。

当代表会议刚刚开幕的时候，许多人都知道列宁将把党团结起来，任何反对派的使代表会议脱离列宁指出的道路的企图是不能得逞的。但连一个问题都未进行过投票表决的时候，是难于断定反对派的力量到底有多大的。第一次投票表决的结果表明，代

表会议上跟随反对派的人寥寥无几，说明它在会议上占的份量是很小的。从这时起，列宁在对待反对派的代表的做法上有了明显的改变。他不再在会议休息时间里去同个别的反对派分子争论，而只在代表会议举行的会议上继续进行辩论。这一事实生动地表明，这是列宁作为一位现实主义政治家所具有的一个显著特点。

弗·伊·列宁对各个地方组织的报告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开头，这些报告在议程上是被列在最后的，但是在就一般性问题进行辩论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宣读这些报告了。以后，辩论与地方组织的报告就交叉进行。而在讨论对工兵代表苏维埃的态度问题时，各地苏维埃的活动经验受到了特别充分的注意。列宁总是全神贯注地听地方组织的报告，常常坐到靠近发言人的地方，并且不时地提出问题。我记得他给我提了一个问题。我在关于对苏维埃的态度发言中，谈到了我们为使工人代表苏维埃同士兵代表苏维埃合并而作的斗争。虽然我们叶卡特林诺斯拉夫人为这一合并而进行斗争，并且认为合并具有重大的意义，但是我说，我们担心在合并之后，苏维埃将会受到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的控制，这种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在士兵代表苏维埃中是特别强的。革命开始的头几天，军队代表投票反对八小时工作制的事实就说明了这一点。这时我突然听到在离我很近的地方列宁在问：“为什么要担心呢？”不知怎么地，这短短的一句话一下子就让我明白了我的错处，因为我们所谈的不是把各种集团合并到党内来，而是在谈论苏维埃：进入苏维埃的有各种各样的政治派别的代表，苏维埃是我们反对各种小资产阶级政党，巩固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联盟，并为实现工人阶级在这一联盟中的领导作用而斗争的场所。

地方组织的各项报告为反对加米涅夫反对派提供了丰富的材料。这些报告表明，各地苏维埃发挥出来的革命主动性有时比首都的苏维埃要大。在许多工业中心，苏维埃根据实际情况行使国

家职能(比如,组织跟饥荒作斗争,武装工人,通过把企业交给工人的方法与同盟歇业作斗争,与盗匪活动作斗争等等)。地方苏维埃活动的这些特点证明党奉行的将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使政权转到苏维埃手中这一列宁的方针的正确性。

关于对工兵代表苏维埃的态度问题,列宁在自己的发言中说:“同志们提供的关于苏维埃活动的材料,虽然并不完整,但非常有趣。也许这是代表会议所提供的材料中最重要的材料,它使我们有可能以生活的实际进程来检验我们的口号。材料中所谈到的情况使我们得出乐观的结论。”^①众所周知,后来革命的发展证实了列宁的乐观言论。

虽然弗·伊·列宁的工作极繁忙,但是他依旧同我们以前所熟知的那样体贴人、关心人。代表会议开幕前他来到会场,与大家一一握手,问长问短,他提出的这些问题,说明他对某人在何时何地被捕,以及某些同志的工作状况与健康状况是了解的。

我还记得一个感人的场面:一次在会议休息的时候,我们来到食堂,看见代表们手里拿着小茶缸,排成一行长队,正在等候热茶。我们发现,这行长队在一个地方又岔出两行另外的队伍。我们走近时发现,这多出来的两行队伍是排在列宁的左右两侧的,原来这是代表们渴望当面与列宁谈谈,才排成了这样的队。列宁自己手上也拿着这样的小茶缸,时而侧向右面,时而侧向左面,与人说话,在等着轮到自己取茶。我们走到列宁跟前,劝他在小桌子旁坐下来,由我们给他把茶端到桌上,他坐着和同志们谈话就可以方便多了。列宁断然谢绝了我们的这番好意。同往常一样,他从不愿意突出自己,也不愿意使自己处于某种特别优待的地位。

1917年的四月代表会议是我们党的生活中一件极其重要的大

^① 《列宁文稿》第2卷第331页。——编者注

事。代表会议在所有主要的问题上采取了鲜明的立场，表示一致拥护弗·伊·列宁。四月代表会议通过的决议，以准备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纲领武装了全党。代表会议结束后，代表们离去时，他们在理论上和政治上的知识是更为扎实了。党迈出坚定的、满怀信心的步伐，朝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方向前进。

载于1957年5月7日《真理报》

第127号第2版

在奥布霍夫工厂

谢·雅·阿利路也夫

关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最初我是从卓越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维·康·库尔纳托夫斯基那里听到的，他在叶尼塞斯克的流放地呆过，并在那儿会见过当时也在流放的列宁。库尔纳托夫斯基流放期满之后，于1900年来到梯弗利斯。1903年在巴库时，我从瓦·安·舍尔古诺夫那里了解到有关列宁的许多情况。我第一次见到列宁则是在彼得格勒，这是在1917年4月，那时他刚回到俄国，在芬兰火车站举行的一次群众大会上，站在装甲车上发表演说。

彼得格勒的无产阶级、满怀革命激情的水兵和士兵兴高采烈地欢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他向参加集会的人们作了令人难忘的讲话。列宁号召城乡劳动人民团结一致，号召工人们起来跟世敌——资产阶级开展斗争，他还告诫大家，要准备经受巨大的考验。

不久，在奥布霍夫工厂，我第二次聆听了列宁的讲话。形形色色的妥协派分子在这个工厂的某些车间的工人中间，特别在大炮制造车间起劲地进行宣传鼓动。他们无中生有地大肆污蔑布尔什维克和列宁，煽动工人上街去向布尔什维主义示威。

列宁为了在工人群众面前揭露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叛卖政策，来到了工厂。他在预定的时间以前就到了大炮制造车间。

日班的工作还未结束，因此开始时到的人很少。

在这个车间的一个角落里搭着一个不大的、围着栏杆的讲台。奥布霍夫工厂一些工人聚集在列宁的周围。列宁在讲台旁的台阶上坐下来，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个用报纸裹着的小包，里边原来是一块抹上黄油的黑面包。列宁一边与几个交谈者攀谈，一边大口嚼面包，喝着我们的一位同志给他端来的一杯茶，就着把面包咽下去。

不一会儿，其他车间的工人络绎不绝地向敞开着的大门涌来，宽广的大炮制造车间被挤得水泄不通。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登上讲台，刚刚开始讲话，立刻就有人大声地、怀有敌意地叫嚷起来。在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掀起的这股企图干扰列宁讲话的喧嚷声中，我们什么都听不清楚。

弗·伊·列宁冷静地等待这阵骚动平静下来。孟什维克继续歇斯底里地大吵大嚷，于是工人们把几个嗓门特别大的起哄的人撵出了车间。大部分工人越来越显得急不可耐了。他们多么想快一点听到列宁的讲话呀！起哄的人被警告说：“谁再吵嚷，就把他扔到街上去”。

终于安静下来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这时才开始讲话。他讲话时从容不迫的声调和质朴易懂、具有说服力的言词给听众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弗·伊·列宁在这个被认为是机会主义分子的堡垒的奥布霍夫工厂的演说，对群众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在奥布霍夫厂工人中间的影响明显地开始消失。工人们开始逐渐离开妥协派分子，愈来愈多地听从号召他们去跟资产阶级作斗争的布尔什维克了。

载于《回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第1卷1956年莫斯科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版第572—573页

在普梯洛夫工厂工人中间

瓦·瓦·瓦西里也夫

1917年4月3日(16日)，列宁回到彼得格勒的这个日子以及他同彼得格勒无产阶级的会见成了历史性的事件。甚至在经过将近四十年之后的今天，我还清楚地记得那天发生的事情，这是毫不奇怪的。

晚上，两千左右的普梯洛夫工厂的工人扛着旗帜，擎着火把，向芬兰火车站进发。同时几千名其他工厂的工人、士兵和水兵也向那个地方走去，他们象我们一样也是赶去迎接列宁的。

当时钟刚过十一点，列宁在火车站的大门口出现的时候，广场上立即响起了雷鸣般的欢呼声——“乌拉”。在两架探照灯的照耀下，列宁登上了装甲车，他向前伸出右手，接着开始讲话。顷刻间广场便安静下来。我不准备叙述他的讲话内容，因为这个讲话是众所周知的。我只说一点，那就是列宁的这次演说使我象所有出席听讲的人们一样，受到深深的感动。

载着伊里奇的装甲车在人们的簇拥下，缓慢地向彼得格勒区，向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和彼得格勒委员会当时的所在地——克舍辛斯卡娅宫驶去。

过了一个月多一点时间我又见到了列宁：他于5月12日(25日)来我们这儿参加工厂的群众大会。普梯洛夫工厂的工人刚刚把社会革命党人切尔诺夫赶下讲台，厂里就传遍了一个消息：“列

宁来了！”轧钢车间（现在这里已设置了纪念牌）前面的广场上很快就挤满了人，聚集了大约二万五千人，甚至在车间的屋顶上也坐着人。

大家如饥似渴地聆听着列宁讲话，唯恐听漏了一个字。那时是困难时期。战争还在继续，工厂因没有燃料而停工，粮食短缺。我们工人对许多问题都期望有个明确的答复。正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向我们作了回答。他论证说，只有苏维埃政权才能够制止帝国主义的屠杀，才能够给人民以和平、面包和工作。经过列宁这次在我们厂讲话之后，社会革命党的组织和孟什维克的组织很快开始销声匿迹，相反，布尔什维克的组织开始发展起来。

临时政府倒台了，政权转到了苏维埃手里。10月底爆发了克拉斯诺夫—克伦斯基的反苏维埃叛乱。弗·伊·列宁把一批普梯洛夫工厂的工人召到斯莫尔尼宫，要求他们回答：为了跟反革命作斗争，工厂能够支援什么？普梯洛夫工厂的工人汇报说，他们将支援几个用装甲列车装备的炮兵连。

10月29日（11月11日）凌晨，伊里奇来厂检查工作。他来到工厂委员会，在同工人交谈后他深信这批预订的武器将按期完成。后来弗拉基米尔准备走了，但工人们建议他同他们一起吃晚饭。我们有烤土豆和开水。伊里奇同工人们一起分享这顿简便的晚餐。

不论岁月的流逝或世事的变迁都不能抹掉我对上述往事的亲切回忆。列宁过去同我们在一起并将永远同我们在一起。

载于《回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第1卷 1956年莫斯科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版第574—575页

在全俄农民代表 第一次代表大会上

安·巴·库奇金

这是在推翻沙皇制度两个月以后的事情。我当时是维亚特卡省和彼尔姆省的卫戍部队选派出席全俄农民代表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代表。

我是一个来自偏僻省份的人，从未见过大城市，因而感到彼得格勒这座城市真是一个庞然大物。汽车、电车、大车、四轮马车以及各种手推车奔驰不息……路上行人络绎不绝……大家都匆匆地走着。我挤上电车，吊在它的踏板上，来到准备举行代表大会的民众文化馆。通过层层岗哨，穿过沿着走廊和楼梯进进出出，上上下下川流不息的人群，我走到了一个小房间的前面，房间的门上写着：“社会民主党布尔什维克党团设此”。

还在代表大会开幕之前，这次大会的政治倾向已经清楚了。在乱糟糟地出售或散发书刊的会场旁边的休息室里正在争吵不休。最高纲领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同社会革命党人吵嘴，而劳动派分子则同立宪民主党人吵吵嚷嚷。布尔什维克同这些人进行辩论，农民们围着他们，贪婪地听着辩论，他们想弄明白，布尔什维克到底是些什么人。农民们十分乐意研究布尔什维克的传单、报纸和小册子，经常可以看到他们的手里拿着《真理报》和《士兵真理报》，在《士兵真理报》上刊有弗·伊·列宁在1917年5月7日

(20日)写的,经他签署于5月11日(24日)发表的《给全俄农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公开信》。^①

代表大会上有不少知识分子代表,其中多数是合作社工作人员、军人,还有许多军官。

社会革命党是占统治地位的政治派别,它还有各种各样的派别:右派、左派、左派中心和正义中心。在一千多名代表中间布尔什维克总共只有二十出头一点人数。

5月4日(17日)——代表大会开幕的日子来临了。大清早起,大厅里就坐满了代表。在等候开会的时间内,大家都专心致志地读着刚出版的、还散发着油墨味的各种报纸。每位代表的手里都拿着一叠各种党派出版的报纸。

等候开会的时间很长。主持代表大会的头头们在主席团的位子上出现了,他们低声交谈了几句,随后便走开了。代表大会终于开幕了。大会主席团的头头是社会革命党人阿夫克森齐也夫,他留着大主教式的胡子,看上去俨然是个部族的首领。他的讲话冗长无味。使人感到,在讲台上讲话的仿佛是一个熟读经卷的旧教徒。

社会革命党人事前已对大多数代表作了宣传说服工作,要他们支持联合的临时政府。天真淳朴的代表们认为,如果政府里有几位这样所谓的“社会党人”,那么政权差不多就等于掌握在农民自己的手里。他们并不知道,这些“社会党人”其实是资产阶级的走卒。发表讲话的部长们(“社会党人”)受到了热烈的欢呼。

社会革命党的首领们感到很满意,因为他们看到农民代表大会是一支同工兵代表苏维埃唱对台戏的力量。

战争问题是代表大会的一个尤为紧要的问题。社会革命党人

^① 见《列宁全集》第24卷第338—342页。——编者注

主张将战争继续进行“到最后胜利”。农民，特别是士兵已经异常厌恶战争。他们衷心拥护布尔什维克提出的“打倒战争!”、“立即通过交战国政府首脑缔结和约!”的口号，但是遭到社会革命党人如此辱骂的布尔什维克究竟是些什么样的人——大多数代表是不清楚的。而且事不凑巧，正在这时来了外国的“社会党人”托马、王德威尔得和其他一些人，并向大会致了祝贺词。他们“代表无产阶级”讲了话。他们竭力使代表大会相信，似乎英国、法国和比利时的工人和农民希望战争，以便打败德国人，从而赢得“持久和平”。于是，代表大会通过了社会革命党人提出的将战争进行“到最后胜利”的决议。

使农民特别关注的是土地问题。社会革命党人派出了他们最好的演说家来规劝农民不要响应布尔什维克提出的立即夺取地主土地的号召，因为这种号召据说会导致农民内讧和发生流血事件的危险，还说什么反革命就会利用这一点来复辟旧制度。各地的土地委员会是需要的，这是没有疑问的。但应把更多的“内行的人”补进这些委员会去——这是首先要做到的一点。其次，土地委员会应当登记全部土地并将其置于自己的监督之下。只有这样做才行。在任何情况下不准侵犯地主土地占有制!以后时机成熟，“俄国土地的主人”——立宪会议就将召开，那时土地问题将会得到解决。

我们布尔什维克党团人数不多，处境相当困难。我不记得是否作了党团会议的记录。但是那种象样的会议也没有举行过。人碰头了，一边走一边交换意见。党团成员的理论水平比较低，然而许多事情同党团在代表大会上的行动是息息相关的。列宁热忱地关心党团工作，并几次来到我们这里。十月革命之后我看到列宁时，他脸上总露着笑容，但那时却没有看到这种笑容。他的脸上总是显露出关切、练达和匆忙的神情。他总是匆匆忙忙的，总要求我

们不要使他耽搁过久。

有一次党团邀请列宁来给我们解答问题。这些问题是在代表大会进行过程中产生的，同时与列宁的《公开信》有关。我们把所有使我们困惑不解的问题扼要地归纳起来，写在一张纸上。当弗·伊·列宁来的时候，我们就把这一张列有问题的纸递给他。

“你们自己逐个念问题，我来回答”，他说着把这张纸还给我们，并在椅子上坐了下来。

列宁的回答是多么简洁明了，通俗易懂，这使我们大家感到高兴和惊讶。他只用了五分钟就把纸上的问题都解答完了。没说一句废话！他回答后就站起来，向大家点头告别，接着便走了。我们感到难为情的是，这些简单的道理我们以前怎么不懂呢？为了这些小事情却要去惊动领袖！

5月22日（6月4日）弗·伊·列宁代表我们党团在代表大会上作了关于土地问题的发言。当主席宣布该谁发言时，大厅里的嘈杂声立即消失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从主席团后面的一个地方走到台前来。他从衣袋里掏出表来，用左手握着，以便掌握时间，不多说一分钟。

刚刚响起那略带喉音、卷舌音柔和，但悦耳有力的列宁讲话声时，大厅右面就有人叫喊起来：

“凭什么让列宁讲话？他又不是代表大会的代表！不许他讲话！”

大厅里喧哗起来，还夹杂着抱怨的声音。主席向那些有意找碴的人解释说，列宁代表布尔什维克党团发言，并说党团有权提出代表以外的人为报告人。

嘈杂声静下来了，列宁继续发言。

开始时从右边的几排座位上还传来插话声，但过后就听不到了。代表们，尤其是农民代表们全神贯注地注视着列宁的脸和他

的手势。列宁在台上走动，有时向前，有时往后，他的声音铿锵有力，他说的话清楚明白，大家都听得懂。

列宁讲话一结束，代表大会的大部分代表一齐欢呼起来。甚至对许多鼓掌的人来说这也是出乎意外的：他们都被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讲话吸引住了。

载于《回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第1卷 1956年莫斯科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版第587—590页

在1917年七月事变的日子

谢·雅·阿利路也夫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于1917年从国外返回彼得格勒之后，就去看望波列塔也夫同志，后者自1907年起就认识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当时波列塔也夫是第三届国家杜马代表和布尔什维克党团成员。

我是在波列塔也夫的寓所里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见面并认识的。这是1917年5月初的事情。过了两个月，使我万分高兴的是，亲爱的伊里奇在我那简陋的寓所（在罗日杰斯特沃区十号街十七号住宅五楼）里隐藏了一个星期。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我当时在1886年股份公司的环形运河发电站即现在的第一水电站工作。我身为工厂委员会委员，所以大部分时间都呆在电站的工厂委员会里。由于必须保障电站的正常运转，工厂委员会全体委员日夜都守在工作岗位上。因此，对彼得格勒当时发生的情况我们没有一点确实可靠的消息。

1917年7月5日（18日）晚上五时许，我决定抽空回家一趟，向熟悉的同志打听一下最近的消息。我在家里碰见了妻子，她刚从波列塔也夫那里回来。在波列塔也夫的寓所里她遇见了列宁。有人告诉她需要替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找一个安全的住处。于是就提出住到我家去。

要接待贵客，我和妻子都感到有说不出的高兴。把事情都商量好之后，我上班去了；妻子又到波列塔也夫那里去了。

7月7日(20日)晨，我回到家里见到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镇定自若。当他知道我家里有一间房间空着，就决定在动身去谢斯特罗列茨克之前住在我这儿。他住进了那个小房间，房间里有一扇窗户对着隔壁的院子。

看过住的房间之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开始商量他如何跟个别同志以及党组织进行联系，以便掌握整个事态的发展。

就在同一天，我的大女儿从列瓦肖夫回来了。她把自己在芬兰铁路的火车上所听到的那些担惊受怕的当地人和各色各样的鼓动员的谈话内容告诉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那些当地人争着讲“暴动的罪魁祸首”和“威廉的秘密代理人”不知是坐驱逐舰还是坐潜水艇跑到德国去了。他们都称“消息来源可靠”。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听了这些话笑得要命。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那间小房间里一直住到1917年7月11日(24日)^①。这段时间里他一直在思考许多事情，思考得很久；他写信鼓励同志们，对惊慌失措和意志消沉的人给予安慰和鼓舞。斯大林同志不止一次地来探望过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每次见面，他们都要促膝长谈。

彼得格勒的局势当时异常紧张。我们对敬爱领袖的安全都极为担心。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显然摸到了我们的心思。就在搬来的第二天，他问我能否另外找一个更安全的住处。我回答说：“有必要的話，我试试”。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再三说明了自己的要求并且补充说需要搞些衣服来，如果要出门的话，就可以化装。他还

^① 弗·伊·列宁于1917年7月9日(22日)夜里从谢·雅·阿利路也夫家前往住在拉兹里夫车站的尼·亚·叶梅利扬诺夫那里。——编者注

要求弄一张彼得格勒的地图。

为了完成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要求办的事，我当天就去找我的熟人克·德·萨夫琴科。萨夫琴科在反动势力猖獗、沙皇的帮凶横行的艰难年月里，当他还是一个管院子人的时候，就曾在自己家里掩护过我们的许多地下工作同志或者把他们安顿在安全的地方。米·伊·加里宁和约·维·斯大林有一个时期就秘密住在他那里。萨夫琴科让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住在近卫重骑兵团驻扎的楼里（似乎是最“危险的地方”），住在他的兄弟库兹马那里。斯大林同志从流放地逃出来以后就曾在那里平平安安地休息过。萨夫琴科给了我化装要用的东西，并为伊里奇准备了住处。

7月9日(22日)早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问我找房间的事进展怎样，并问我是否已经搞到了彼得格勒的地图。他想确定一条万一要转移到别处去住时可走的捷径，同时还想确定到滨海车站去的最方便和最安全的路线。

彼得格勒的地图还没有搞到，我就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讲，我对去滨海车站的路了如指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回答说，他愿意信任我，但是没有地图对他个人很不方便。他想亲自研究一下路线，因此需要一张地图。

说罢，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立即抓住我的膀子，捏得紧紧地，同时凝视着我，问我能否今天晚上就同他到另外一个住处去，我是否确实知道那里的主人完全可靠。我作了肯定的回答，并且说哪怕要我立刻带他去都行，但是我认为这样做暂时还不是时候，因为彼得格勒的街上不安全。另外，我还告诉他：党组织委托一些同志尽快找到一个更靠近芬兰的最安全的地方，以便伺机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送去。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同意了我的意见，以后他就再也没有提这个要求。

当天晚上，我弄到了一张彼得格勒的地图，于是我们就坐下来

研究起地图来了。

当伊里奇住在我家的时候，我只是抽空回过几趟家，所以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生活和工作情况也不是亲眼目睹。大女儿告诉我，这些天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常常同我们说笑，讲一些风趣的话。他大部分时间都在房间里。在他被迫呆在“避难所”的全部时间里，他同外界的联系，同党组织的联系，同同志们的联系，遵照我们党中央委员会的委托，通过派来的专人进行的。通常，每当派来的专人前来探望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同他扼要地商谈了事务之后，就带着他的指示和任务立即离开。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亲友也来过几回，他的妻子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和妹妹玛丽亚·伊里尼奇娜也来过一两回。

资产阶级报刊的造谣中伤与日俱增。密探四处跟踪。局势变得十分危险。列宁被迫转入地下。我和约·维·斯大林只得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送去滨海车站，列宁从那里转往拉兹里夫。

我就这样熟识了一位伟大的革命家、领袖、学者和伟人。

载于1940年4月22日《苏联贸易》

第55号第2版

关于伊里奇

(回忆片断)

叶·德·斯塔索娃

1917年我在芬兰车站迎接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当时他取道德国和瑞典返回俄国。记得那天晚上，我们聚集在克舍辛斯卡娅宫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军事组织”办公的地方唱《马赛曲》的时候，他生气了，他提出要我们唱《国际歌》。大部分同志都不熟悉《国际歌》，结果唱得很不好。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我们会唱资产阶级革命的《马赛曲》，而不会唱工人自己的歌，他这句话使我们感到羞愧。第二天，伊里奇在塔夫利达宫作了报告，就是著名的四月提纲。这个提纲内容深刻，同时又明白易懂，所以很自然它就象真理一样获得了通过。那些抱怀疑态度的人问我是否在标榜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这种问题听起来实在令人费解。中央委员会俄国局确实已经收到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两封来信，这些来信使我们对这个提纲在思想上已经有所准备，因为信里阐述的就是这个提纲的内容^①。

整个春天和7月以前，我几乎每天都有机会见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有两件事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第一件事情是，中央委员会里为一位老党员的事所出现的一场争论。有人对这位

^① 见《列宁全集》第23卷第304—327页。——编者注

老党员提出了控告。我记得伊里奇发表了尖锐、严厉的反驳意见，他猛烈地抨击了控告人，要求他们不要发表一些空洞的议论，而要拿出具体的事实来。可是他们却拿不出事实来，只是在那里捕风捉影。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指出，对于一个老同志的名誉问题，处理过于轻率；不能那样随意地往一个有功劳的工作人员的脸上抹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终于使问题得到了解决：大家都认为控告缺乏事实根据，于是给那位同志恢复了名誉。

第二件事情是，6月底，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留在宽街自己的住所里有危险的时候，他搬到我家来住。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是那样朴素、谦虚，他竭力设法少给别人添麻烦。可是，他住在我家这件事显然还是被人知道了，因为1917年7月7日士官生在我父母的住所里进行搜查的时候，对当时也在场的住宅代表说，他们是来搜查“列宁的秘书”的家的；他们估计大概在我家里至少能搜出一颗炸弹来。

载于《关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回忆录（1900—1922年）》1963年莫斯科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版第224—225页

在最后一次地下活动中

尼·亚·叶梅利扬诺夫

4月2日(15日)谢斯特罗列茨克工厂的工人获悉：列宁将从芬兰返回俄国。3日(16日)我们争取到了几辆平车由我们使用。我们乘上平车，就开往白岛车站去迎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前往迎接列宁的还有彼得格勒的工人代表团。

旅客列车徐徐地靠站了。车厢出口处的平台上站着一些人。虽然认识列宁的人不多，但当他走出车厢时，人们立刻认出了他。

这时响起了一片“乌拉”声。一顶顶帽子抛向空中。听见人群里有人在喊：“伊里奇！我们的伊里奇！”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被人们举在手上，送进了车站大厅。他在那里发表了演说。他说得简短，明了；他说推翻沙皇以后，掌权的是资产阶级，工人必须把政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再次响起了一片“乌拉”声。

列车开动了。我那时根本不可能想到，不久以后我自己会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亲切地会见，甚至要同他一起生活一段时间。

七月事变以后，列宁被临时政府宣布为不受法律保护的人。克伦斯基重金悬赏缉拿列宁。在这些日子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被迫隐藏在工人家里。他以前的住处被反复地搜查了好几次。

留在彼得格勒，对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来说越来越危险了。党中央决定把列宁隐藏到更加可靠的地方去，无论如何必须保护

好弗拉基米尔·伊里奇。

我住在拉兹里夫车站附近的一间单独的小屋子里。一位中央委员会的代表(我同他很熟悉,过去同在谢斯特罗列茨克工厂工作过)来找我。他说:

“叶梅利扬诺夫同志,中央委员会委托你把列宁隐藏起来。”

“我很乐意,”我答道。可是出于一种要保护好列宁的责任感,我立即又感到担忧。我说:

“我来隐藏,但现在还不知道该怎么办。”

“请你先好好考虑考虑。”

他走了。我就同妻子商量开了。她也是党员。要是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藏在家里,那是危险的,因为周围都是一些住别墅的人。但我们几乎同时想到:拉兹里夫的居民时常雇一些芬兰人在湖对岸刈草。于是我们也决定让列宁扮成一个被雇用的刈草人,住到湖对岸的一个窝棚里去。

次日,中央委员会的代表来了。我向他汇报了我的计划。

“想得真妙!”他也同意了。

不久,他又上我家来告诉我,中央委员会赞成我的办法。但有个问题:如何更安全地把列宁从彼得格勒送到拉兹里夫。

“最好是乘夜里两点钟的那班列车,”我提议道。“乘坐那班列车的通常是些玩得很晚的各种身分的人,所以那班车又称‘醉汉列车’,乘这趟车是最安全的。”

我们还商量了其他一些细节问题。7月11日(24日)晚^①我动身前往彼得格勒。当时滨海铁路在彼得格勒的终点站是在新乡。我预先买好三张票。候车室里和月台上有许多逃兵,他们可能会引起搜捕。我决定领列宁打运货的大门走。虽说我们要从停

^① 这是1917年7月9日(22日)夜里的事。——编者注

在路轨上的货运列车底下钻过去，然而走这条路去乘车是最安全的。

在约定的时间里，我在大涅夫卡那边接到了列宁和陪同他前来的约·维·斯大林和谢·雅·阿利路也夫。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低声对我说：

“请您朝前走，给我们带路。”

我沿着事先选好的路线把他们领到列车跟前。同志们只能用眼神同列宁告别，列车不久就开动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在车厢的踏板上坐了下来。

“这样可要摔下去的嘛。”

“我是故意这样坐的，”他答道。“要是发生什么情况，我就能跳下去！”

从拉兹里夫车站步行五分钟就到我的家。路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问我，妻子叫什么名字。

“娜捷施达·康德拉提也夫娜。”

转眼就到家了。我们进了门。列宁同我的妻子问好之后，就说：

“娜捷施达·康德拉提也夫娜，关于我的事请您不要告诉任何人。绝对不要向任何人谈！谈话中不要为我辩护，也不要争论有关我的事情……”

我妻子向列宁保证说，秘密工作的规定她是知道的，孩子们也知道。列宁问我有几个孩子。

“七个。”

他问了他们叫什么名字，就跟他们见了面。

从厨房到干草房要经过一个台阶。我在干草房里摆了一张桌子、一把椅子。我们就直接在散发草味的干草上面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搭了个铺。列宁对这个住所倒也挺喜欢，但是环境不安宁。

住别墅的人，还有那些邻居，都是些好奇的人。正如俗语所说的，小心没大错，应当赶紧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送到湖对岸去，但是须要租一块割草的地，搭一个窝棚，把一切必需品运到那里去——总而言之，准备工作必须做得万无一失。为这件事，我花了几天气。中央委员们前来看过列宁。第一次，妻子不肯放他们去见列宁（我那时在湖对岸），因为她不认得来的两个同志。后来他们对上了暗号。

湖对岸的一切准备就绪之后，我们就用小船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送到对岸去，让他住进窝棚。那是个用树枝搭成的十分普通的建筑物，上面盖了草（看上去十分简陋），当年搭棚的那个地方现在用花岗石造了一个列宁的“窝棚”纪念碑。画家有时候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画成是坐在窝棚边的树墩上面。其实是有些出入的。我在窝棚附近的茂密的灌木林里给列宁清理出一小块办公的地方，用新砍的灌木搭了一个亭子。那里没有树墩，而是放着一段圆木当凳子。靠近窝棚砌了个炉灶，木架子上面吊着一口小锅。

蚊虫尤其到了夜间把人咬得很不好受，躲也躲不开。但是也只好忍受着。食品和报纸由妻子或儿子用小船给送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收到的报纸很多，凡是那时出版的报纸他都有。为了不致因为购买太多的报纸而引起怀疑，孩子们分了工，哪些报纸由谁负责去买。

记得，在报纸上看见过一些描写列宁是如何躲到国外去的短文：有说坐潜水艇的，又有说乘飞机的。只有一点是对的：走水路，但不是坐潜水艇，而是坐一只普普通通的双桨划子出去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读到这类短文时就放声大笑，他称那些资产阶级文痞为“胡闹的小丑”。

列宁的工作很多——要看书又要写作。同志们时常来找他。斯大林来过两次，奥尔忠尼启泽来过几次。捷尔任斯基和斯维尔

德洛夫也来探望过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拉兹里夫湖畔的简陋的窝棚成了名副其实的革命指挥部。

时间一天天过去，秋天渐渐来临。下雨天愈来愈多了。

天气逐渐变冷了。妻子从家里把御寒的衣服几乎全部都送来了，但仍然无济于事，我们还是免不了要受寒冷和潮湿的折磨。再加上那时谣传纷纷，说列宁装扮成钳工躲进了谢斯特罗列茨克工厂啦；说列宁到疗养地隐藏起来啦，等等。

该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另外寻找一个更可靠更安全的地方。中央委员会决定送列宁到芬兰去。

居住在拉伊沃拉的谢斯特罗列茨克工厂的工人们有边境通行证。当时我在搞技术革新工作，又是苏维埃代表和工长，可以出入厂长德米特里也夫斯基的办公室。在他的办公桌上，我看见有他签署的通行证。我稍稍来得早一点。门卫同我是很熟悉的。我从厂长的办公桌上取了五张通行证，拿给了列宁。他选了一张具名伊万诺夫的通行证。我们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化了装，戴上了假发。德·伊·列慎科来替他照了像。一个熟悉的雕刻师在照片上面画了一个逼真的印鉴^①。

我们把通行证给了列宁。他看了又看，找不出一点破绽来。

“嗯，好极了！你们真行！”

现在只须从森林里走到芬兰铁路，再乘火车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上彼得格勒，在那里把他打扮成司炉送到芬兰去。这件事托付给了芬兰的布尔什维克去完成。

^① 保存在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里的尼·亚·叶梅利扬诺夫写的《伊里奇在拉兹里夫》这篇回忆录的手稿里，这件事是另外一种说法。“按照伊里奇的意见，——尼古拉·亚历山大罗维奇回忆道，——我找到了一个熟悉的钳工，他那时在军事委员部里做事，给抓来的人送饭。经过长时间的劝说以后，他撬开了上司的办公桌，取出了印章。我们拿它在照片上盖了印。这样，通行证上面的手续就完备了。”——编者注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动身去彼得格勒的那天，我们在等候中央委员会派来的一个同志。灌木林后面出现了一个人。

“谁在那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问道。

“邻居。”

“他来做什么？”

“大概来雇您去割草。因为您这里已堆起了一个相当大的草垛。”

邻居走近跟前打了个招呼。

“这是谁替你割的草？”

“一个芬兰人。”

“他会说俄国话吗？”

“不会。”

“他肯上我那里去割草吗？”

“不会去的，你也不必喊他。”

“可惜。我自己又在害病，儿子又不能干。我须要找一个割草的人……”

邻居走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站起身来，以惯常的戏谑口吻说道：

“尼古拉·亚历山大罗维奇，谢谢你没有让我去当雇工！”

晚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我以及来接他的同志徒步穿过森林，朝芬兰铁路走去。天色一片漆黑。我们出了森林，来到了迪布纳车站，在一张长椅上坐了下来。列宁一向严格遵守秘密活动的规定，即使在这里他也是信守不渝的。他立刻站起来说道：

“我们全坐在这里可不行。应该有两个人到灌木林去隐蔽起来。”

这个预防措施绝非多余。列宁和拉希亚同志刚隐藏起来，从车站的房子里就走出一个人来，腰里挂着把军刀。他环视了一下

月台，就朝我们走来，他说：

“你们的证件呢？”

我们那位同志拿出了一张芬兰铁路职工的证件。

“你有证明吗？”他问我。

“只有谢斯特罗列茨克工厂的工号。”

“那么晚你在这里干什么？”

“难道不可以吗？”

我已猜测到，这是一个反间谍机关的军官；知道列宁正面临着严重的危险。“预先没有察看一下车站，这是我的过错，是我的疏忽”，我意识到这一点，于是决心千方百计地把军官的注意力吸引开去，使他不注意将要开往彼得格勒的列车。

“跟我走！”军官下令道。

“为什么要跟你走？”

“走！”他抓住我的手。

房间里有许多非军人和拿步枪的中学生。

军官在桌旁坐了下来。我也懒洋洋地随便一坐。

“交代，你是什么人？”

“我是谢斯特罗列茨克工厂的工人。”

“工人？瞧你这副样子！站起来！搜身！”

列宁在路上把一个彼得格勒同志的代表证交给了我，要我转交给这个同志。这张代表证我没来得及扔掉。

“你还是个布尔什维克啊！”

“这张代表证不是我的。我在谢斯特罗列茨克工作，也住在那儿。”

“莫明其妙……你做工几年啦？”

“四十年。”

“那么说所有的上司你应该都认识罗。你把他们的姓名都给

讲出来。”

我一一都说了，甚至连当官的也说了；但表上的时针走得慢腾腾的。我已打定主意要揍这个军官一顿，这样好大闹一场，惹出点麻烦，以争取时间。但是一件偶然的事给我解了围。

军官突然问道：

“谁是工厂的主治医生？”

“格烈琴，哎哟，他可是个捞外快的人呢！”

军官暴跳了起来。

“混蛋，你竟敢侮辱我的叔叔！”

列车靠站了。有人来向这个军官报告了，可是他并不介意。他坐下动手写起东西来，并且朝着我低声咒骂：“我要枪毙你！”

房门被启开了一点，从门缝里我认出了那个同志的脸孔。这意味着，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大概已经上车了。

当军官还在写东西的时候，从彼得格勒开来的第二趟列车靠站了。我被人用手枪逼着押出月台，关进了车厢。我决定不在中途跳车。我抱着一个希望：谢斯特罗列茨克的同志们会帮我解围的。

在白岛车站，斯米尔诺夫军士——我挺要好的一个熟人，登上了车厢。他是我们谢斯特罗列茨克苏维埃的成员。

“叶梅利扬诺夫同志，你怎么会到这儿来的。”

“是您的上司把我抓来的。”

他打开车厢门，说：

“快跑吧！”

我悄悄地跑回家之后，马上就躺下睡觉了。这一番折腾弄得我筋疲力尽。一阵叫喊声把我吵醒了。我睁眼一看，妻子在哭泣：“您干的好事，您干的好事！”

原来，我们的一个女联络员来了。她没有发现我在睡觉，于是

就谈起了我的事情：

“他被捕了，但好象逃跑了。”

妻子一想事关列宁，不由得就哭泣起来。我从床上跳了起来，——事情这才算弄清楚了。

后来传来了令人振奋的消息：列宁平安到达了芬兰！

不久，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到我们拉兹里夫来了。她要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为此就要弄到一张去芬兰的边境通行证。我在拉伊沃拉认识的一个抄写员弄到了一张这样的通行证，拿给上司签了字，自己又盖了印。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装扮成一个谢斯特罗列茨克的女工，一个名叫阿加菲娅·阿塔玛诺娃^①的在拉伊沃拉出生的人，这样她也顺利地越过了国境。

载于1955年4月20日《列宁格勒
真理报》第93号第3版

^① 在《伊里奇在拉兹里夫》这篇回忆录的手稿里关于给娜·康·克鲁普斯卡娅领取通行证的经过是这样写的：“不在工厂里工作，但是居住在拉伊沃拉的人的通行证是由乡长发给的。娜捷施达·康特拉提也夫娜（她认识乡长的妻子）通过乡长的妻子在乡长那里取得一张通行证。通行证是用我的姨母阿加菲娅·阿塔玛诺娃的名义领取的，顺便提一句，我的姨母是在这之前的一个月就在拉伊沃拉去世了。娜捷施达·康德拉提也夫娜给乡长解释说，我的姨母是因为去办理家事需要一张通行证。”——编者注

伊里奇在七月事变的日子

格·康·奥尔忠尼启泽

在1917年7月3—4日(16—17日)这两天里，为了消灭克伦斯基—捷烈申柯—切尔诺夫—策烈铁里联合政府的政权，进行了初次重大的尝试，但是失败了。我们的党和我们的领袖因而开始遭到疯狂的迫害。列宁同志被宣布为德国间谍，同时政府下令逮捕他。

士官生们四出搜索，寻找列宁，但是他已经不在住所里了。那时众说纷纭：“他跑到威廉那里去了”，“能找到他？想得倒美”。

塔夫利达宫。这里尽是在议论着昨天的事，议论着我们的行动，说我们的组织里并非事事顺利。这样议论的有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甚至还有一些相当著名的布尔什维克。在工人区里也出现过短时间的惶惑不安，不过很快就过去了。在巴甫洛夫分子和伊斯马依洛夫分子中间听到有人很明确地讲：“我们上当了，我们不知道布尔什维克竟是德国的间谍”。士官生们在寻找列宁，但是找不到。我们有些同志提出意见，说列宁不应该隐藏起来，他必须露面。“否则，在广大的群众面前党就无法证实自己是正确的。”“既然党的领袖受到了严重的控告，他就应该到法庭上去证实自己和党是无辜的。”很多著名的布尔什维克也都这样议论着。

我和斯大林一起赶到伊里奇那里去。季诺维也夫、娜·康·克鲁普斯卡娅、诺根和瓦·雅柯夫列夫已经先到了。于是我们就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该不该露面，该不该让他们逮捕的问题议论开了。对应该露面，应该在公开的法庭上进行战斗的主张，诺根吞吞吐吐表示赞同。当时，相当多的莫斯科的同志也抱着这样的观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态度十分明确，他证明不会进行任何的公开审理。斯大林坚决反对让列宁出面同当局辩理。他说：“士官生不等把人送到监狱里，就会在路上把人杀害的。”当时，伊里奇显然也是反对这样做的，但是诺根的话使他感到有点困惑。恰巧这时候叶·斯塔索娃来了。她讲了塔夫利达宫里又流传开的谣言，说根据警察司的档案资料记载，列宁好象是个内奸。这句话对伊里奇刺激之强烈是难以想象的。一阵痉挛的颤抖使他的面部肌肉抽搐起来。他以斩钉截铁的口吻声明，他应该去坐牢。

我同诺根被派到塔夫利达宫去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及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团委员阿尼西莫夫谈判把伊里奇羁押在狱的条件。我们要他保证：伊里奇不会受到残暴的士官生们的折磨。我们还要求他们把伊里奇羁押在彼得—保罗要塞（那里的卫戍部队是我们的人），或者，伊里奇如果被羁押在“十字”监狱的话，那么我们也要求绝对保证他不致被杀害并进行公开审理。如果阿尼西莫夫能作出肯定的答复，那么傍晚就要把伊里奇送进监狱去。不用说，假如真的做出这种极其愚蠢的犯罪的事情来，伊里奇就会在监狱里断送性命。

阿尼西莫夫不同意把伊里奇羁押在彼得—保罗要塞。至于羁押在“十字”监狱里的保证，他说当然要尽力而为。我坚决要求得到绝对的保证（当然，谁也不能够作出这种保证）；我吓唬说，要是出了什么岔子的话，我们就要他们所有人的命。阿尼西莫夫本来是顿巴斯的一个工人，我似乎觉得，他自己也由于这事情责任之重大而吓懵了。又等了几分钟，我就对他讲：“我们不把伊里奇交给你们啦。”诺根也同意我这样处理。

我正赶紧要回去，出门的时候遇见了卢那察尔斯基同志。他托我转告列宁，要他无论如何不能去坐牢，因为当时政权只是形式上掌握在联合政府手里，实际上，政权操在科尔尼洛夫分子手里；而一到明天也许就更加名存实亡了。

我把同阿尼西莫夫的谈话情况和卢那察尔斯基的意见转告给列宁和在他那里的斯大林，并且补充说，阿尼西莫夫不知道他自己明天将受谁的管。我们认为继续谈判是无济于事的。于是，伊里奇同佐夫同志（现任海军军事委员）以及谢斯特罗列茨克工厂的一个工人一起安全地出了城。

过了几天，斯大林建议我到列宁那里去一趟，一方面为了向列宁报告消息，另一方面可以听取他的指示。斯大林给了我叶梅利扬诺夫同志（他住在谢斯特罗列茨克工厂附近）的地址和接头暗语。这件事我做得非常谨慎，生怕被密探跟踪，从而暴露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住处。

夜间，我抵达车站。没有走多少路我就找到了叶梅利扬诺夫同志住的那幢房子。叶梅利扬诺夫同志本人不在家，他的妻子叫了自己一个十来岁的孩子来给我领路。我们朝湖边走去，坐上小船，划到对岸之后，我们就沿着灌木林走去。我以为列宁同志一定是住在一个别墅里。突然，我们在一个刈草场附近停下，那里堆着不大的一垛干草。男孩喊了声一个人的名字，随后就有个人走出来。他就是这个孩子的父亲。我同他打了招呼，向他讲明了来意，我以为他接着就会领我到列宁那里去。

这时候，有个刮过脸，不留胡须的人朝我走来。他走到跟前，向我问了好。我淡淡地答应了一声。那时他拍着我的肩，说道：“怎么，谢尔哥同志，没认出来吗？”原来这就是列宁同志。我惊喜地握了握他的手，于是就谈起来了。过了一会，伊里奇请我同他们一道吃晚饭，我们吃的是黑面包和鲱鱼，再没有别的什么可吃了。

这顿“晚餐”吃完之后，我们就换个地方，到列宁和季诺维也夫的“住宅”里去谈话。这个“住宅”就是刚才提到过的那一垛干草。我们往那里面一钻。新鲜的干草散发出十分好闻的气味，并使人觉得暖和。我讲了很久，叙述了他们离开后城里所发生的事情，工人和士兵的情绪，我们的组织、彼得格勒苏维埃和孟什维克中央执行委员会里所发生的事情，等等。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听我讲完后，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他说道：

“一些孟什维克苏维埃已经威信扫地。两个星期以前他们无需特别地费劲就能取得政权。而现在他们已不成其为政权机关了。他们的政权已被夺走了。现在只有通过武装起义才能够夺取政权，而起义已是迫在眉睫了。起义将不会迟于9月到10月。我们必须把重心移到工厂委员会。工厂委员会应该成为起义的机关。”

那时我全神贯注地倾听他每一句话，我感到十分惊讶，我们刚刚遭受打击不久，而他现在就预言着大约两个月之后的胜利起义。

有个同志说至迟在8月到9月间政权就要转到布尔什维克手里，而列宁将要当政府主席。我把这些话讲给伊里奇听的时候，他十分严肃地回答说：“是的，事情必将如此。”接着，伊里奇作了一系列的指示。他指示如何开展工作；如何在目前公开的中央存在的同时立即成立这个中央的秘密支部；如何在公开的印刷机关存在的同时立即成立一个秘密的印刷所，以便在秘密的报纸上充分发表公开报刊上不让发表的言论。

由于我疲倦得很，不知不觉睡着了，谈话也就中断了。早晨我不是在六点钟而是在十一点钟才醒过来。在这时间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已经写好了几篇短文和给斯大林及其他同志们的信件。我带上了这些东西就告辞走了。

不久以后，我又一次到伊里奇那里去了：送绍特曼同志去见伊里奇，因为他要安排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去芬兰。之后，直到10月24日（11月6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第一次在斯莫尔尼宫大厅里露面以前，我就再也没有见到过他。^①

当我走进大厅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会议上的演讲快结束了，他高呼：

“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万岁！”

大厅里响起一片欢呼声。

晚报上登载了这样一条消息：列宁进入斯莫尔尼宫，开始亲自领导起义。

是的，记者们的报道没有错。

列宁钢铁般的双手把握了十月起义的组织活动，把起义引向最终的胜利。

载于1924年3月28日《真理报》
第71号第4版

^① 弗·伊·列宁在斯莫尔尼宫大厅里向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做报告是在1917年10月25日（11月7日）。——编者注

列宁在地下活动时期

(1917年7—10月)

亚·瓦·绍特曼

1917年夏天，克伦斯基政府在统治了四个月以后自己感到肯定要完蛋了，于是就把仇恨一古脑儿都集中到工人和农民的伟大领袖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的身上。列宁在二月革命后回到俄国的当天，就号召推翻资产阶级孟什维克政府和整个资本主义制度。

资产阶级及其走狗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控制着权力，妄图以消灭列宁来挽救自己。他们不敢贸然逮捕列宁或杀害他，感到那样做他们一定要遭殃，因为那时候绝大多数的工人和士兵已经坚定地追随着自己的领袖。为了摆脱列宁，须要采取另外的办法。他们采取了资产阶级惯用的老办法——造谣诽谤。

工人和士兵看清了妥协派政府危害广大群众的两面政策，终于对它丧失了信心；他们在7月3日（16日）拿起武器，走上了街头，要求停止战争，把土地交给农民，把工厂交给工人。他们提出的这些口号也就是列宁在回国后最初的日子里就向广大群众提出来的那些口号。资产阶级认为这是打击日益高涨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最适当的时机。

当时物色到了一个“失宠的人”，即第二届国家杜马里的原彼得堡工人代表格·阿列克辛斯基来干这一桩下流的勾当。这个坏

蛋伙同“社会党人”司法部长彼列维尔泽夫以及一个俄国间谍，一起伪造了一个文件，说列宁是德国间谍。这一诬陷令人感到毫无道理，荒诞之极，甚至连当时的孟什维克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也禁止各报刊登这个“文件”。但是有一家黑帮的下流小报不顾禁令，还是刊登了这个“文件”，其它一些“大”报也就沉不住气，开始步其后尘了。

应该给资产阶级讲句公道的话，它选择的时机是成功的。三天来，彼得格勒街上的枪声使大家的神经极度紧张，这就为这种在正常情况之下简直难以置信、毫无道理的谣言提供了一个有利的基础。听信谣言的不单有居民，而且还有一部分备受折磨、政治上无知的士兵。

资产阶级利用了这个机会，他们同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一起对革命的工人和士兵发动了进攻。军官和士官生公开出动了，他们首先捣毁了我们的印刷所和《真理报》编辑部，在《真理报》印刷所附近打死了从印刷所里拿着传单出来的工人沃伊诺夫。

当时四周笼罩着一片暴乱的气氛。在那些日子里，如果公开承认自己是布尔什维克，那就注定要遭到那些野兽般的狂人的杀戮。城里的一些党委会被捣毁，许多同志被捕，谣传说他们将被枪杀。

我们的党中央委员会考虑到这种局势，就派遣了许多党的工作者到外省去，对所发生的事件进行解释。我那时则被派往芬兰赫尔辛福斯市。无耻的诽谤也传到了那里。波罗的海舰队的军官们企图在水兵中间散布这些谣言，可是毫无成效。当我向枢密院广场上的一万二千名水兵做报告，讲到七月事变的时候，从后排响起了“打倒德国间谍！”的叫喊声……但是参加会议的绝大部分群众用“布尔什维克万岁！乌拉！……”的口号声压倒了这些叫喊声。

7月10日（23日）或是12日（25日）我返回了彼得格勒，在塔夫

利达官我遇见了几位党中央委员，其中一个奥尔忠尼启泽，他把中央委员会要我把列宁和季诺维也夫送往安全地方的决议转交给我。

在这以前我同其他许多党的工作者一样，也不知道列宁和季诺维也夫在哪里，尽管大家焦急不安地彼此在打听这件事情，尤其当我们知道加米涅夫、托洛茨基、拉斯科尔尼科夫、卢那察尔斯基、柯伦泰等许多人被捕以后。

我接受了责任如此重大的委托以后，当天就动身前往指定的地点。奥尔忠尼启泽派我去找佐夫（现任共和国海军人民委员）。^①由佐夫领我同一个小年轻工人见面，这个工人再送我到列宁和季诺维也夫隐蔽的住处去。傍晚，我和这个年轻的工人出发到新乡去，在那里我们乘上了开往谢斯特罗列茨克的列车。当我们到达谢斯特罗列茨克附近的拉兹里夫车站时，天色已经开始黑了。离车站不远，在一条偏僻的街道上，在住满了来自彼得堡的避暑人的别墅之间，他给我指点了谢斯特罗列茨克工厂的工人叶梅利扬诺夫住的那所小房子，于是我们就分手了。这是一所小平房，有三扇窗户面对着街道。

我走进屋去，向女主人对了暗号之后，就提出要见康斯坦丁·彼得罗维奇（列宁当时带在身边的身份证上就用这个名字）。我坐下来，看了看四周。这所小房子一共才有两个房间，挤满了孩子。女主人是个有七个孩子的妈妈。她知道康斯坦丁·彼得罗维奇就是列宁，为了掩护列宁和季诺维也夫，尽管要冒极大的风险，但她没有流露出丝毫的不安；我问列宁和季诺维也夫的健康情况如何，她愉快地说，他们俩都挺好，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只抱怨一件事：报纸不能按时送到。

^① 回忆录写于1924年。——编者注

在进一步谈话以后，我了解到为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和季诺维也夫的安全，不得不让他们住到树林里去，因为在这里他们很可能让密探给碰上，因为据她知道，密探就在周围追踪活动。由于在当天我无论如何要见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女主人就叫自己的儿子领我去。尽管时间很晚了（约摸是晚上十一点钟），这个十二、三岁光景的男孩一口就答应了。我们沿着偏僻的小路走到了一个河湾的岸边，把船下水去，我划桨，男孩把舵，在月光下面我们穿过芦苇丛，划向列宁的住地。

我们在河湾里划了近半个小时，后来又在沼泽地的灌木林中步行了十分钟之后，来到了堆放在林间空地上的一个大草垛面前。

男孩子发出了一个信号之后，有两个人朝我们走过来。天已经黑了，只有微弱的月光照射着身上裹着冬大衣的人，我好不容易才认出来，他们就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和季诺维也夫。一阵热烈的问候之后，我们就在干草垛边上坐了下来，他们向我问了许多问题。

在到列宁这里来之前，我曾到当时设在维堡区的布尔什维克彼得堡委员会去了一趟。那里在议论革命进一步发展的问題，拉舍维奇当时说：“你们看吧，列宁在9月里就要当总理！”

我坐在草垛边给列宁讲彼得堡的消息时，也把拉舍维奇讲的话告诉了列宁，他听了以后很平静地回答说：“这没有什么奇怪的。”听到这个回答，说实在的，我有点茫然，所以很惊讶地朝他望了一眼。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察觉到我的惊讶的表情之后，就开始详细地给我讲解俄国革命的发展前途。十分可惜，那时候我没有把他有关革命前途的话都记录下来。但是，我现在回忆起那次坐在河旁草垛边上的谈话时，我深信十月革命后所发生的许多事情列宁还在那个时候就已经预见到了……

我回忆起一件有趣的事情，就是列宁那本匆匆忙忙印出来的

《论口号》的小册子。我把手稿送到城里去印，过了几天我把印好的一本小册子送去给他看。我坐在车厢里把小册子看了一遍。在其中一个地方我读到这样一个句子：“目前，在俄国没有一个党是始终不渝地保卫工人阶级利益的”（凭记忆引证。——亚·绍·注）。我来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那里之后，把这句话指给他看，并问他：“那么布尔什维克党怎么样呢？”他先是捧住脑袋，后来笑了起来，说：“好吧，我们再版时改正。”

在我第一次来的时候，我们坐在干草垛边谈了很久。尽管是在7月里，但是沼泽地夜间散发出来的寒气袭人。我穿着夏装，刺骨的寒气冻得我发抖。我们就睡在草垛里，这是叶梅利扬诺夫亲手细心地把这个草垛堆成卧室的样子。虽然身上盖着一件冬天的大衣，但好长时间我冷得睡不着。

这以后，在两个多星期里我每隔一两天就从彼得格勒到列宁这里来一次，送来食物、报纸和其它东西；就在这个时候为了能够比较安稳舒适地长期隐藏下来，我在准备一个可靠的隐蔽地方。就我所知，从城里送食物、衣服和其它东西来的，除了我以外只有彼得堡的一个女工阿·恩·托卡烈娃。

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们就决定转移到芬兰去，希望在那里依靠芬兰同志的帮助能比较安全而又方便地安顿下来。但困难在于选择什么方法穿越国境线，因为那时候国境线上戒备森严。

尽管列宁转入地下已近一个月了，但是报纸上还在一个劲地对他造谣中伤，无论是黑帮的，还是自由派的办报人都唾沫横飞地狂叫无论如何要逮捕列宁和季诺维也夫。因此不仅动用了克伦斯基的反间谍机关和刑事侦探手段，而且连警犬，包括有名的侦探警犬特列弗在内，都被动员起来搜捕尚未抓到的列宁和季诺维也夫。除了暗探和警犬之外，为了搜捕列宁还派出了数百名资产阶级庸人中那些自告奋勇当密探的人。有一天，报上登了一条简讯，说有

五十名“突击队”的军官发誓：要么抓到列宁，要么以死殉职。

当暗探和警犬忙于搜捕列宁的时候，我正在寻找可靠的越境办法。列宁自己这个时候正忙于布尔什维克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工作，他从自己那异常不便的隐藏地领导了这次大会。当担任大会主席的已故的雅·米·斯维尔德洛夫把弗·伊·列宁亲手写的决议案提交表决时，他一时疏忽说道：虽然列宁不能亲自出席大会，但是他在无形之中也参加了大会，甚至领导了大会的工作。这时候所有的报纸就大肆叫嚣，拿出加倍的劲头要求立即逮捕列宁。大会代表受到的监视加强了，而我作为大会的一个代表不得不十分谨慎行事，去谢斯特罗列茨克时要采取特别的预防措施，以免被密探盯上。

同时，转移到芬兰去的事情必须抓紧办，因为继续住在沼泽地那边有危险。有时来到隐藏地附近的猎人会偶然碰上匿藏在这里的人；而成天呆在窝棚里，只有到了夜里才能走出来，那也是令人难受的。由于逮捕、报纸的造谣中伤和阴险的谣言，在城里所造成的总的局势和气氛已经使我们不能再指望到以前同情过革命的知识分子（他们有舒适的住宅）家里去找一个隐藏地。大部分积极的、久经考验的党的工作者或是被捕了，或是遵照党中央的决议分散到外省去了。留在彼得格勒而没有被捕的那些同志也受到了严密的监视。在选择必要的助手、住所、转移方法等一些事情上务必特别谨慎，因为稍有疏忽就会招致逮捕。当时对于列宁来说，逮捕就等于被克伦斯基的野兽般的走狗杀害。这一切使得我的任务变得非常困难，因而使转移推迟了。

当时拟定了几种过境的方案。每种方案都经过仔细的讨论和核对。最后决定扮成谢斯特罗列茨克工厂的工人（谢斯特罗列茨克工厂的许多工人住在芬兰境内，他们过境时用的是简化的护照）通过芬兰边境。当时是委托叶梅利扬诺夫到自己工厂的同事那里去

搞护照的。护照搞到了，只要把那上面的像片换一换就行了。但是在给列宁寻找假发的时候突然遇到了困难。一心想逮捕列宁和季诺维也夫的克伦斯基的保安机关禁止理发师向任何一个没有出示身份证的人出租和出售假发。为了避免发生任何麻烦，我弄了维堡区芬兰铁路员工戏剧组的一张证明，在巴谢伊纳亚街的一个理发馆里顺利地买到了两个假发。

列宁剃掉胡须，戴上假发之后几乎使人认不出来了。列慎科带来了照像机给列宁照了一张“乔装”的像片。

在过境之前，我受托去察看边防哨检查证件究竟有多严格。为了这个目的，我必须通过克伦斯基的参谋部给自己弄一张能自由进出芬兰边境的许可证；我是一个芬兰公民，要求发一张这样的许可证是不会有特别的困难的。为了把情况了解得更确切些，我决定带一个助手。我请无限忠于革命的芬兰工人，后来成为芬兰红色近卫军著名的政委埃诺·拉希亚当助手。他也想办法在参谋部给自己弄到了一张同我一样的证件。于是我们就出发去“察看边境”。我们在白岛车站往南与谢斯特罗列茨克之间的几个地方徒步通过边境之后，确信走这条路靠不住，因为每次通过的时候边防哨几乎要用放大镜来查看我们的证件，他们非常仔细地把我们同贴在证件上的像片进行核对。后来向列宁和季诺维也夫报告侦察结果后，这个过境办法放弃了，最后采用我和拉希亚一起提出来的办法。

还在“察看边境”之前，我们就制定了这样一个计划以防万一：列宁充当司炉，坐火车的机车去芬兰；而季诺维也夫同志留在彼得格勒，在离芬兰铁路线上的乌迭利纳亚车站不远的列斯诺伊，在一个椴梓苗圃工人埃米尔·卡尔斯科的住所里已经替季诺维也夫准备好了一个房间。

我们决定先从沼泽地搬到卡尔斯科家去，在那里过一夜，晚上

再从那里去乌迭利纳亚车站，列宁在那里坐上机车，而我和拉希亚也将乘坐这趟列车，陪同列宁到芬兰境内的捷里奥基车站。在离这个车站几俄里的地方已经准备好了一个安全可靠的住所。答应让列宁坐上机车的司机胡·雅拉瓦是我童年时就很熟悉的朋友。当我对他说他要冒很大的风险时，他显示出一个真正的芬兰人的镇定，他笑着要我们相信“一切都会非常顺利的”。

当全部准备工作做完之后，我同拉希亚就前往谢斯特罗列茨克，以便当天就把列宁和季诺维也夫送出沼泽地。叶梅利扬诺夫带着儿子已候在草垛边，他把三个星期来住在这里时堆放在草垛里的报纸、大衣、被褥等东西装进小船里。

根据我们的计划，到卡尔斯科家我和拉希亚主张这样走：从谢斯特罗列茨克铁路乘车到奥捷尔基车站，而后从那里沿着维堡公路或芬兰铁路的路基步行到住地（大约六俄里路）。叶梅利扬诺夫主张走另外一条路：步行到列瓦舍沃车站，而后从那里乘上芬兰铁路的火车到乌迭利纳亚车站（从乌迭利纳亚车站到住地有一俄里光景的路程）。考虑了“赞成”与“反对”的意见之后，经过短时间的讨论，大多数人赞成采纳叶梅利扬诺夫的主张。

最后，东西都放好了，孩子坐了船就回家去了。我们五个人沿着河湾，穿过灌木林，朝芬兰铁路慢慢走去。我们要走大约十至十二俄里的路。那时候已将近晚上九点半钟，天早已经黑了。我们默默地鱼贯而行，叶梅利扬诺夫走在前面，因为他认识路。在走上乡间大道之后，我们的心情就愉快了些，路开始好走了，一路上也没有碰到一个人。我们跟着叶梅利扬诺夫拐入一条小路。因为天黑，我们在一个地方迷了路，遇上了一条小河，为了蹚过河去只好把衣服脱掉。后来我们在找路的时候又走进了一个沼泽地，为了绕过这个地方，我们又不知不觉地碰上了着火的泥炭地。我们给隐隐燃烧着的灌木林包围着，加上烟又呛人，所以每分钟我们都有

跌倒在自己脚下的正在燃烧着的泥炭里去的危险。我们找了好长时间才找到了一条小路，终于跑出了这个燃烧的树林。我们觉得完全迷了路。在一片漆黑之中，我们由叶梅利扬诺夫带领摸索着前进。叶梅利扬诺夫安慰我们说，他在这里是第一次迷路。

终于听到了在什么地方响起了一阵火车的汽笛声。叶梅利扬诺夫和拉希亚走去侦察，我们就坐在树底下等他们回来。我衣袋里放着三条新鲜的黄瓜，可没有想到带点面包和盐。我们把黄瓜就这样吃了。约摸过了十至十五分钟，我们中去侦察的人回来报告说，我们好象是走到列瓦舍沃车站附近来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十分恼火地责备我们没有做好组织工作，应该讲这样的责备是公道的。他认为要有一本三俄里为一英寸比例的地图，还问为什么预先没有研究好路线等事项。“侦察”的事也挨了批评：为什么说是“好象”而不是确切地去打听清楚是什么车站？我们百般地为自己辩解，同时就朝车站慢慢地走去。这个车站原来不是列瓦舍沃，而是离芬兰边境总共才七俄里的迪布纳车站。情况并不令人乐观。在树林里我们随时都会碰上边境警卫队的搜索而被当作可疑分子给逮捕起来，因为正派的人是不会在夜里一点钟离开有人居住的地方，来到边境附近闲逛的。我们从铁路上的看守人那里打听到：往彼得格勒的末班车将在夜里一点三十分开。我们要等候十五分钟。候车的时候，我们坐在面对车站的月台的尽头，为了防备万一，我们派了拉希亚到车站上去看看有无可疑的迹象。他从车站回来时神色阴郁，说那里有一支由十名全副武装的士官生组成的巡逻队。事情不妙。他们会走过来盘问：突然出现在万籁俱寂的月台上的的是些什么人。我建议列宁、季诺维也夫和拉希亚躲到堤坡下面的黑暗处去，而我自己和叶梅利扬诺夫仍坐在原地。他们刚走下去，一个拿步枪的士官生就朝我们走来，问叶梅利扬诺夫在这里做什么。叶梅利扬诺夫对这个问题没有思想准备，他的回

答看来并不能叫士官生满意。在听了叶梅利扬诺夫的离奇的解释之后，士官生就把他带走了。因为我的一身打扮比较讲究，看来没有引起士官生的怀疑，他十分有礼貌地问我是不是居住在本地别墅里的人，是不是在等候火车上彼得格勒去。对他的问话我也十分有礼貌地作了肯定的回答。而后他神气十足地将马刺碰得卡嚓响，转过身就把被捕的叶梅利扬诺夫带走了。我还没来得及回过神来，火车已驶近了。“我该怎么办？”我考虑之后决定留下来，明天好带他们到乌迭利纳亚去。今天夜里和明天白天就躲在树林里。我刚作出这个决定，一个身背步枪的人就来到我跟前，但这一回是个身穿实科学学校学生装的人，他彬彬有礼，然而口气坚决地说：“这是末班车，今天不会再有车来了。您要乘这趟车吗？”我只好上车，再没其他法子可想了。我上了车。这一切都发生得那么突然，我简直是惊呆了，以致还没有到乌迭利纳亚站我就跳下了火车。我本想在乌迭利纳亚站下车，把发生的事情通知卡尔斯科，可是少乘了六俄里路，在奥捷尔基站就下了车。等火车开走了，我才发现自己弄错了。快到早晨三点钟我好不容易才走到了卡尔斯科的家。当我走进他的房间时，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列宁、季诺维也夫和拉希亚睡在地铺上，他们看见我那副慌张的神色，都哈哈地笑了。原来，他们坐在堤坡下面看见叶梅利扬诺夫被捕，看见我被那个实科学学校学生几乎是用刺刀押着走进车厢里去的。他们和我同乘这一列车，因为不象我那样惊慌失措，所以就安心地乘到乌迭利纳亚站。我从奥捷尔基徒步走去时，他们已经吃完了晚饭。当我走到的时候，他们几乎快要睡着了。

现在需要尽快地通知叶梅利扬诺夫的妻子，她的丈夫被捕了（不过，第二天早晨他就被人放了），好让她把列宁和季诺维也夫在拉兹里夫居住过的痕迹掩盖起来。因为不能再浪费时间了，我随便吃了点东西就去找波卢扬，她认得叶梅利扬诺夫的家。等我走到

她家时已经是五点多钟了。我向她交代了要办的事情之后，就急忙赶去维堡区，去找要送列宁去芬兰的那个火车司机雅拉瓦。

到了晚上，我们让季诺维也夫留在卡尔斯科家里，其余三人就一同前往车站。我们在月台旁焦急地等候火车。火车终于靠站了。机车上一个熟悉的司机的身影闪动了一下，我们握住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手，就朝机车走去。列宁剃了胡须，戴着假发，很象一个道地的芬兰人。他跳上机车，卷起衣袖，捡起一块又一块的劈柴，就往炉膛里扔。一切都很顺利。每停一站，我和拉希亚就跳下车去，留心观察机车上的动静，我们的心情都很紧张。列车快到白岛车站了，在那里要停二十分钟，还要仔细检查证件，有时候甚至要进行搜查。列车刚一停，机智的雅拉瓦就把自己的机车脱钩，开到车站外面的一个很暗的地方……去加水。我们几乎要鼓起掌来。宪兵检查证件的时候，雅拉瓦在“加水”。直到第三遍铃响以前，机车才鸣着汽笛开回来，这样，大约过了十五分钟我们就十分安全地到了芬兰境内。我和拉希亚赶忙朝机车跑去，愉快地握了握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手。在捷里奥基车站旁已备好了马车，而在离车站十四俄里的地方准备好了住处。

我让拉希亚照顾列宁，自己就乘下一班列车去赫尔辛福斯准备住处，好让列宁以后坐火车去赫尔辛福斯。第二天^①，从赫尔辛福斯派了两个芬兰同志去捷里奥基接列宁到离赫尔辛福斯一百三十俄里的小市镇拉提去。在芬兰国会的一名议员的协助下，我给列宁安排了以后的一段旅程。最后，我在赫尔辛福斯的……赫尔辛福斯警察局局长的住处迎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

还在资产阶级政府当权的年代里，社会民主党在市政选举中取得多数票以后任命了社会民主党人古斯塔夫·罗维奥为警察局

^① 据埃·拉希亚的妻子勒·普·帕尔维艾年提供的材料说，弗·伊·列宁曾在她父亲所在的亚尔卡拉村里住了几天。——编者注

局长。他是我的老朋友，彼得堡工人，如今是芬兰共产党员，后来在红色政府掌权的时候他被任命为赫尔辛福斯市民警局长。再也想不出更可靠的住处来了。

让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住进这么可靠的地方之后，我认为自己的使命完成了。返回彼得格勒后，我又奉中央的派遣去乌拉尔。从乌拉尔回来之后，我碰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时，他已经是在维堡了，后来9月底在彼得格勒又碰见过一次^①。从9月到10月24日（11月6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直接领导了十月革命的准备工作的。

当最后决定由工人来管理国家政权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于10月24日（11月6日）从列斯诺伊迁入斯莫尔尼宫。第二天，即1917年10月25日（11月7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重新获得了合法地位，但这一次他已经是人民委员会的主席了。

载于亚·绍特曼：《列宁在地下活动时期》1924年列宁格勒国家出版社版

^① 遗憾的是没有文献直接证实弗·伊·列宁从维堡来到彼得格勒的确切日期。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同时代人对这个问题的回忆说法不一致。有些人断定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是在9月底到彼得格勒的，甚至讲出到达的日子是9月22日或29日（10月5日或12日），另一些人认为列宁是在10月初到的（见本卷第532、533、550、556页）。现在只有一份正式的文献，即党中央10月3日（16日）的决议，建议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返回彼得格勒，“以便能保持经常和密切的联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会议纪录。1917年8月—1918年2月》1958年第74页）——编者注

第二百九十三号机车的“司炉”

胡·埃·雅拉瓦

1917年七月事变以后，大家知道俄国的反革命势力进行了反扑。列宁被迫再次转入地下。

8月底的夜晚已经有寒意了。一天晚上，有几个同志突然来找我。他们坐下聊了一阵之后，就问道：

“怎么样，你这个秘密活动老手，能负责送一个老头过河去吗？我们预先告诉你，这件工作责任重大，还要担风险。你办得到吗？”

我自然没有二话。接着我们立刻周密、详细地订出了一份护送伊里奇通过边境的计划。

1917年8月22日（9月4日）按照行车时刻表七十一次近郊列车驶出了彼得格勒。这次列车驶向拉伊沃拉。机车准时发出；车身上标明第二百九十三号。当列车驶近离彼得格勒十俄里的乌迭利纳亚车站的时候，我开始朝暗处仔细观察；突然见到一个中等个儿，身体健壮的人快步朝机车走来。这个人头上戴顶便帽，身穿一套西服，这是彼得格勒工人的普通打扮，脸刮得光光的。他跑近机车，一声不吭，紧紧抓住扶手，就登上了机车的驾驶室。

列宁——他就是列宁——亲切地招呼了一声，便脱下了大衣。他本想同我的副手说说笑话，但是看到他一句俄国话都听不懂，就开心地大笑起来；后来，他跳上了煤水车，友好地拍了一下我的副

手的肩膀，意思是告诉他可以安心地坐在自己位置上抽烟。要说到劈柴，那末瞧……伊里奇轻快地爬上了柴垛，非常熟练而又灵巧地开始把劈柴照十字交叉形状整整齐齐地垛起来。

当时我要送伊里奇到捷里奥基车站。在边境的白岛车站总是要仔细检查所有旅客的证件。机车组的证件也可能要受到检查。

列车在白岛车站停靠了二十分钟。在这里机车规定应当加水。水龙头在站旁的一个地方。进站后，我发现这一次月台上来往巡逻的警察和士官生特别多，就迅速把机车同车厢脱钩，朝水龙头开去，并停在那里，打算等到快开车的时候再开回车厢那里去。

第三遍铃声一响，我就把机车同车厢挂上钩，汽笛一声长鸣，列车就开动了。几分钟之后我们已经到了边境线芬兰一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同我活跃地交谈起来了。他详细地问了芬兰工人的思想情绪，芬兰的形势，谈到芬兰革命的前途。

在离俄国国境四十多公里的捷里奥基车站列宁下了车。下车前，伊里奇亲切地同我握了手。在月台上伊里奇再一次朝机车方向亲切地挥了挥手，然后才同前来迎接的同志们一起前往亚尔卡拉村。到赫尔辛福斯去之前他一直住在那里。

1917年10月7日（20日）我又开车送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一次。这一次是从芬兰送到彼得格勒。他在拉伊沃拉站搭上我的机车。

后来，那已经是在苏维埃政权的年代了，我到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去探望过列宁，每次我总是受到他亲切而又热忱的接待。

载于《回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第1卷1956年莫斯科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版第613—614页

回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

埃·阿·拉希亚

1917年9月，彼得格勒的形势已经显得紧张了。工人们开始果断地行动。群众的积极性高涨起来了。人们感到重大的事变就在眼前。

通过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我收到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从维堡市写来的一张便条，当时他住在维堡市的芬兰人拉图卡同志的家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要我去他那里，为他安排一条安全返回彼得格勒的路线。

我完成了任务，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顺利地回到了彼得格勒。

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得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同意，在维堡公路兰斯卡亚车站附近的电车场的一个职员家里找了一个住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在那里住下。那儿的主人我不认识。为了保密我自然没有去打听他们是谁。对我来说，只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认识他们就足够了。好几次我都见到一个满头白发的妇人，她听到我约定的敲门声就来开门；当我问她康斯坦丁·彼得罗维奇（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家吗，她就让我进屋。

后来，我因为太忙，压根儿忘了再去打听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从芬兰返回彼得格勒时为他提供住宿的那些人是谁。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回到彼得格勒后，就开始紧张地工作。他给《真理报》写了大量的文章，接见了一些同志，而同斯大林同志进行谈话的次数就更多了。他出席了几次由他提议召开的会议。开了几次中央委员的会议。我记得10月16日（29日）在列斯诺伊的区杜马所在地召开的那一次会议，出席会议的除了中央委员以外，还有许多负责同志。在这些会议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坚决地提出了夺取政权的问题。

我作为“卫士”和“护送者”跟随着他参加了全部会议。

事变酝酿成熟得特别快。我在10月23日（旧历）送出了一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写的预定到各区散发的信件。在维堡区我把信转交给了任尼亚·叶哥罗娃，她用打字机把它打印出来，再散发到各个区去。^①

有时我感到特别难受，由于交通工具落后要完成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所委托的各项任务是相当困难的，然而又是必须完成的，否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要批评我，虽则批评是很客气的，但也是有份量的。

按照他确定的任务我要下工厂，参加会议，从那里了解工人们的情绪，给他带回通过的决议副本。有时我还到兵营去，目的也是一样；到了晚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详细地询问我一天的见闻。

终于在10月24日（11月6日）我得到了一个消息：克伦斯基政府打算把涅瓦河上所有的桥都拉起来。城里加强了巡逻，桥都

^① 在这封信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坚持要党采取果断的行动，他写道：“拖延发动就等于死亡。”原信曾保存在我身边，可是在我居住芬兰期间丢失了。——埃·拉·注（看来作者在这里把日期记错了，这里指的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夺取政权之前，在1917年10月24日（11月6日）写给中央委员们的最后一封信。（见《列宁全集》第26卷第214—215页）——编者注）。

由一队队士兵把守着。

我决定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住处去。

到了他那里之后，我向他报告即将发生的事变，说如果克伦斯基的军队真的把桥拉起来，那么每个区孤军作战，就会被击溃。只有在维堡区政权确实掌握在赤卫队手里。虽然赤卫队的武装不是特别好，但毕竟是有武装的，而且它相当团结，甚至有一个指挥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听我讲完后就说：“是的，今天就应该动手了。”我们喝了点茶，吃了些东西。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房间里从一个角落到另一个角落来回踱步，他在进行思索。

突然他对我说必须找到斯大林同志，而且要尽量快一点。我回答他说这不可能，因为我没有把握是否能在《真理报》编辑部碰上他。可能他在斯莫尔尼宫。徒步往返斯莫尔尼宫一次需要花几个小时，因为电车大概已停驶了。只能步行。我计算了一下，斯大林同志午夜以前是到不了的。

听我这么一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提出：“那么我们到斯莫尔尼宫去吧。”我劝他放弃这个计划，千方百计地说明如果有谁认出了他的话，那他将要冒多大的风险。我那时并不明白：如果劝阻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去斯莫尔尼宫的话，我就是对革命犯罪。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不同意我的理由，他坚决地表示：“我们上斯莫尔尼宫去。”

出于安全的考虑，我们决定还是化装。我们设法给他换了衣服，拿了条相当脏的绷带替他把面颊包扎起来，头上给他戴了一顶搁着不用的鸭舌帽。我还在衣袋里放了两张斯莫尔尼宫的通行证，以防万一。这两张通行证伪造得非常蹩脚：原来的签名用橡皮擦去了，后来签的是一个伪造的彼得格勒苏维埃委员的姓名，而且墨水都化开来了，所以一眼就可以看出这是伪造的证件。因为没有更好的证件，只好决定用现有的伪造通行证进去。

当我们走出门，朝萨姆普桑大街方向走去的时候，已经快晚上八点钟了。

大约过了十分钟光景，一辆进厂的电车就在车站附近赶上了我们。电车里几乎是空的。我们登上了拖车车厢的平台，顺利到达鲍特金大街的拐弯处，电车在那里拐弯后继续往厂里开去。我们就下车步行。在维堡区的利齐尧大桥附近有相当多的赤卫队战士在守卫。我们通过了警卫队。我们没有受到盘问。只是当走到大桥中间，才发现桥的另一端有克伦斯基的士兵——也是警卫队，他们要过路人出示通行证。我们当然没有通行证。

工人们围着士兵，同他们展开激烈的争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看到这些没有被放过桥去的工人之后，仍然决定要试试能否过去。我们走近正在争论的人群。原来士兵们要求出示通行证，而大多数人同我们一样没有这种通行证。据士兵们说，通行证要到司令部去办理。工人们很气愤，拚命骂这些士兵。趁着工人同士兵争吵的当口我们悄悄地从岗哨身边迅速走过，朝利齐尧大街走去，然后转向什帕列拉街，朝斯莫尔尼宫走去。

我们沿什帕列拉街已经走了相当长的一段路。这时候迎面出现了两个骑马的士官生。他们赶了上来，走到我们身边大声命令道：“站住！通行证！”我低声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您走，我一个人来对付他们。”我口袋里带了两枝手枪。我粗暴地同他们拌起嘴来，我说谁也不知道要使用通行证，因此我们没能及时拿到这样的通行证。这时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悄悄地离开我们走远了。士官生拿马鞭威胁我，要我跟他们走。我坚决加以拒绝。大概他们认为我们是流浪汉，最后决定不理我们了。我们的一身打扮确实是典型的流浪汉。士官生骑马走掉了。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已经顺利地走出相当长一段路，我赶上他了，一起继续往前走。

我们走近了斯莫尔尼宫。大门附近聚集着人群。原来，彼得格勒苏维埃委员早些时候使用的通行证是白色的，现在换成红色的了。这样一来就够糟的了，再说在等候的人群里面我们的同志一个也没有。由于不能进入斯莫尔尼宫，那些等候的人感到恼火。我比谁都更恼火，比谁都嚷得更响，同时怒气冲冲地挥动着自已“伪造的”通行证，大叫为什么连我这个全权的彼得格勒苏维埃委员也不让进去。我对站在前面的那些同志嚷道，要他们别去理睬检查的人，先进去，到了斯莫尔尼宫里面我们再把事情弄清楚。我学扒手的样子去挤去轧。结果，那些检查证件的人果然被推开了，我们进了斯莫尔尼宫，登上二楼。在走廊尽头，在靠近大礼堂的一扇窗户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停了下来，派我去找斯大林同志。我找到了斯大林同志，就一起回到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身边。

在走廊里谈话不方便，于是我们走进大礼堂旁边的一个房间。房间正中摆着一张台子，台子四周放着几把椅子。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台子一端的一张椅子上坐了下来，脸朝着礼堂大门；斯大林同志和我在左边坐下。斯大林同志把发生的事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作了报告。

谈话之际，有三个人——孟什维克的骨干，他们党的领袖唐恩和李伯尔，还有一个好象是郭茨（社会革命党人）也同他们在一起——从正在举行苏维埃会议的大礼堂里出来，进了我们的房间。其中一个人（不记得究竟是谁）从挂在这里的大衣里取出一包东西，请一起进来的两个人吃，他说他有奶油面包、香肠和干酪。他们谈话时根本不注意我们。从大衣口袋里取出来的那包东西他们就摆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坐的台子的另一端。那个正打开纸包的人抬起头来，那时他才认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虽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脸上缠着绑带。他觉得怪不好意思的，赶忙收起自己

的食物，三个人一起狼狈地走出房间，回到大礼堂去了。这件事使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心情变得愉快了些，他纵声哈哈大笑起来。

我们也走了出来，到斯莫尔尼宫的一个房间里去。不久，党领导核心里的许多同志就到我们这里来了，于是我们就立即开始讨论当时的局势问题。

城里这时候在进行战斗。机枪的射击声清晰可闻。

礼堂里的会开完了，孟什维克涌向出口处，他们意识到自己的计划失败了。

午夜时分，决定召开彼得格勒苏维埃会议。^①彼得格勒苏维埃委员没有散去。会议一开始由主席发言，他在一片肃静的气氛中宣布：“克伦斯基的政权被推翻了。一部分部长被逮捕，尚未逮捕的也即将逮捕。”这些话迎来了一阵掌声。

讲完话之后，会议主席宣布：“现在请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讲话。”会场上迸发出来的那种喜悦和狂热的情景，我是无法形容的。总之，机枪的射击声听不见了，它被掌声所淹没。掌声持续了几分钟，使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一直无法讲话。

会议结束后，我们就朝底楼走去。那里除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之外，还有斯大林、诺根、米柳亭等同志，我也跟着他们一起去履行自己保护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职责。

所有的人都在桌边的椅子上坐下，我没有椅子坐，就坐到门边角落的地板上，两脚一缩，用膝盖顶住下巴坐着。

那时同志们在谈论组织政府的事情，提出了关于称呼的问题：部长——这个称呼大家认为不适当；有人建议采用“委员”，“人民

^① 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紧急会议于10月25日(11月7日)下午2点35分开幕。——编者注

委员”的称呼。结果就这样决定下来了。然后就分别委派职务。

那时我一直坐在角落里听着。

我的事情结束了，因此我也就成了一个“失业者”。

载于《列宁在苏维埃政权的最初几个月里》。（论文和回忆文集）1933年莫斯科党的出版社版第33—36页

列宁隐藏在赫尔辛福斯 “警察局长”家的经过

古·谢·罗维奥

绍特曼来了，他极其神秘地对我说：

“党中央委托我安排列宁和季诺维也夫到芬兰来，还要替他们在这里找一个住处。”

“有一个姑娘为这件事到这里来过，我同她已经谈妥了，”我答道。

“她做得不对，现在委托我把同志们安顿在赫尔辛福斯，但不能让任何人知道这件事。你没有权利把这件事告诉任何人，”绍特曼对我说。

“好。我愿意尽力协助。当然，谁也不会从我这里知道这件事，”我回答说。

绍特曼急着要送列宁来，我们就决定由他把列宁直接送到我家里，然后再替列宁找一个更合适的住处。

1917年4月初，工人组织选我当赫尔辛福斯的民警局长。后来，总督和枢密院根据各项法律批准我为“赫尔辛福斯警察局长高级助理”，警察局长是一个名叫冯·什拉德尔的中尉。由于阶级斗争的激化，什拉德尔受不了资产阶级及其报刊天天对警察局（它几乎全由社会民主党的工人组成）的诬蔑和攻击，因而辞职了。于是，我当了代理警察局长，一直到1918年1月工人革命开始。

我在哈格涅斯卡雅广场（一号住宅第二十二号）有一个住处（一个房间和厨房）。当时没有谁上我的家来，我的妻子那时候又在农村，所以我们认为先让列宁住在我那里是最方便、最安全的。绍特曼甚至开玩笑说：

“等我回到彼得格勒告诉我们的人，说我让列宁住到了赫尔辛福斯警察局长的家里，他们知道后大概真的会感到惊讶和发笑的。我敢说哪一个克伦斯基的鬼侦探也不会想到要上你家去查看一下。”

我同绍特曼约定：他先送列宁到拉提市，从那里打电话到赫尔辛福斯警察局找我。他们将从拉提到议员维克的住处去，因为他并不住在赫尔辛福斯市内，而是住在一个别墅区里，靠近马耳姆车站。在这一切都经过周密考虑和再三斟酌之后，绍特曼就十分满意和高兴地离开了。

过了两天，我的电话铃响了。绍特曼从拉提市打电话对我说：“一切顺利。明天晚上我能到你那里。”

第二天，维克给我来电话，要求在晚上会面，因为有一个同志想见我。我把会面的时间定在晚上十一点钟，在哈格涅斯基市场附近的人行道上。

我先到约定的地点等候。过了几分钟，有两个讲着法国话的人走到我跟前来。其中一个为维克，我跟他打了招呼。

“是罗维奥同志吗？”另外一个同志向我伸过手来，用俄国话平静地问道。这是列宁，我头一回在这里见到他。我作了肯定的答复并握了握他的手。我们一起朝我的住所走去。这是在7月底还是8月上旬，我现在记不准了。我们先看了一下周围的动静，没有发现街上有什么人影，就登上五楼走进我的住所。

我觉得心情稍许有点紧张，因为突然间我成了列宁的房东。当然，我那时候不会料到四个月之后列宁将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的

领导人，但是由于每天看俄国资产阶级和妥协派的报纸，看到它们是多么注意列宁的“间谍活动”，所以我完全理解绍特曼的秘密活动，因此不能不感到有些紧张。何况由于职务上的关系，我几乎每天都要同克伦斯基的反间谍机关打交道，有时候还要同芬兰的总督，十月党人姆·姆·斯塔霍维奇来往呢。

我沏好茶请我的“房客”喝。维克走了。列宁便问起如何能买到俄国报纸。我解释说：最牢靠的办法是每天晚上六七点钟到车站上去等从彼得格勒来的火车，这样就可以买到俄国报纸。

“您要每天上火车站去给我买各种俄国报纸。以后您还要通过自己的邮路安排信件传递，我们对官方的邮局信不过，”列宁开始给我下达指示。

这些事我都答应准确无误地去完成。我告诉列宁我有一个完全可靠的同志，是铁路列车上的邮递员，他往来于赫尔辛福斯和彼得格勒之间，在他的协助下我能够安排好秘密邮件的传递工作，只要告诉我把信件送到彼得格勒的什么地方去。

当列宁问明白了开展工作所必须了解的全部情况之后，就要我去睡觉，而他还要继续工作一会儿。虽然时间已经很晚了，而且又刚刚来到一个陌生的住处，但是列宁还是安心地在桌边坐下，拿起俄国报纸翻阅起来，接着又开始写东西。我不知道他写了多久，因为我睡着了。早晨，我大约在九点钟起身。我望了望桌子，上面放着一本写着《国家与革命》这个标题的簿子。列宁还在睡觉，我就上班去了。我在下午四点钟左右回到家里的时候，列宁对我说：

“我看了您的书橱。您有许多好书，我正用得着。”

后来他要我替他买鸡蛋、黄油等东西。我提出到我日常用餐的合作食堂里去买午餐回来，但是他坚决不要，说他会先在煤气灶上烧开水沏茶和煮鸡蛋，别的就不必了，对他来说这就足够了。

“对我来说要紧的是报纸。所以报纸请您不要忘记，”他对我说。

我到火车站买回了一叠报纸。我们就是这样安排的：每天晚上我在火车站等候邮车，买回各种报纸带给列宁。他很快地读完这些报纸，然后就动手写文章，直至深夜。第二天，把文章交给我转送到彼得格勒。白天他自己做饭吃。

列宁在我家住了一个半星期左右，后来维克替他在乌塞尼乌斯同志那里另外找到了一个住处。深夜，我们把列宁送到那里去。可是过了几天我不得不又把他接回我家来住，因为列宁住的那个寓所的主人突然回来了，所以他不能再住那里了。

当列宁在我家又住了大约一个星期之后，我们在捷列附近的一个没有子女的工人布·^①的家里另外找了一个住处。我不想讲出这个同志的真实姓名，因为他在芬兰革命遭到镇压以后被捕并被判处枪决，至今我不知道他是否已被杀害。这个同志让出一间房间给列宁使用，他的妻子做饭烧菜，总之千方百计照顾列宁，使他一切感到方便。列宁对自己的住处，对自己的房东感到十分满意。

我每天晚上到他那里去，把报纸送去，把要发出的信件带回来。我还充当列宁和房东的翻译。房东因为不能同列宁直接交谈而感到十分遗憾。列宁不会讲芬兰话、瑞典话，所以也感到遗憾。他还说现在学芬兰话对于他已经太晚了。在这里，列宁度过了他在赫尔辛福斯余下的全部时间，大概住了一个月或者一个月多一点时间，到9月底或10月初他才返回维堡。^②

时间过去了五年，现在再来回忆列宁在赫尔辛福斯地下活动时期的工作和生活的详细情形，有许多事情我已经忘记了。至今还能记得的仅仅是我们日常见面时的一些不连贯的，但印象最深的

^① 弗·伊·列宁住在火车司机阿尔杜·布鲁姆克维斯特家里。——编者注

^② 弗·伊·列宁在9月17日(30日)返回维堡。——编者注

情景和事情。

列宁恰恰是在工人组织通过决议邀请他来参加他们的节日的时刻，生活在芬兰工人阶级中间。事情是这样的：在8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天，各工人组织在芬兰各地举办传统的劳动节活动，而活动的纯收入上缴芬兰中央工会组织。

那时在赫尔辛福斯有一个举办节日活动的委员会，还在七月事变以前就决定邀请列宁在节日里发表演说。为了这件事，当时委托我起草一封邀请信寄给列宁。我写好信，但是还未来得及发出，列宁就成了我的“房客”。有一天，我拿信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看，告诉他这是个什么节日。列宁笑了笑，说道：

“我目前不得不停止演说。是呀，节日快到了，不过这件事让我们等到下一回再说吧。”

当时有个“财务”问题要解决。这并不是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那时没有钱，但可惜他带的是俄国的钞票。由于俄国货币不断地贬值，而芬兰马克的行情跌得不那么快；此外，还由于有人拿俄国钞票进行投机，赫尔辛福斯的银行给每一个人兑换的俄国钞票以十个马克为限。我一天光是买报纸就不止花这么些钱。我自己无法兑换到足够的钱，而且身为警察局长每天去兑换俄国钞票也显得不方便，因为所有兑换货币的人都被当作投机商看待，整个报界都在制造舆论反对他们。

怎么办呢？怎么解释我手头有大量俄国钞票？我找了局里的一些自己人，解释说接受了党委托的一个秘密任务，需要把俄国钞票兑换成芬兰钞票，因此要他们帮我忙。“以后我会给你们说明白的，而且你们的名字将因此载入史册，”末了我开玩笑地说道。结果我一下子就派了五个同志去兑换钞票，这样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财务危机”也就顺利地消除了。

有谁知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赫尔辛福斯吗？当时住在芬

兰的俄国同志中只有斯米尔加知道。列宁在我那里住下之后，就要我把斯米尔加找来见他。我上斯米尔加那里走了一趟，把他领到我的住处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详细地问了他有关水兵和卫戍部队的情况，也问了报纸和印刷厂等事情。芬兰同志中只有象曼纳、库西宁这几个中央委员知道，因为我告诉了他们，并且安排他们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见了面。曼纳那时候是议会的议长（或是主席）。有一天，我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乘了马车上他家去。谈话有时用德语，有时用俄语；至于谈话的内容我已经忘记了，只记得是关于反对军事化的问题，对这个问题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指出：反对军事化是小国的普遍倾向，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军事化造成的重负小国承受不了。但从阶级斗争观点来看，反对军事化是一种不正确的立场，工人应当参军去，应当学习军事并且要把军队夺到自己手里来，因为没有军队革命是不可能成功的。

库西宁会见列宁恰好是在列宁动身返回维堡之前。谈话全部用德语进行，因此我这个不懂德语的人就把人家讲给我听的这次谈话的内容一古脑儿给忘记了。

绍特曼来过几次。他给了我几个送信的地址，总之，他在安排同彼得格勒的通信。有一次，好象是在科尔尼洛夫叛乱发生之后，他跑来对我说：

“你可知道，四个月之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要当我们的总理了，”接着他就陈述起理由来了。

当我们到了伊里奇那里时，他就说：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四个月之后您就要组阁了，您将出任总理。”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向他详细询问了一切情况。

不记得是绍特曼还是斯米尔加讲到了臭名昭著的民主会议，

称它为泥潭。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称这次会议上讲的全是废话，说应该带领士兵去包围亚历山大剧院，把这个迂腐的泥潭里的一伙人全部逮捕起来：他们已经说够了废话。他狡黠地笑着问道：这件事情能不能想个办法出其不意地办成？

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来过列宁这里一次。^①列宁画了一张上他那里的地图，放在信里寄给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照着这张图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到赫尔辛福斯来找到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住处。

随着阶级斗争的尖锐化和我们党的影响的加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逐渐感到在赫尔辛福斯呆不住了。要更了解事变，要更靠近彼得格勒。有一天，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我说他想去维堡，要我给他搞一个假发、画眉用的油彩、身份证，并在维堡安排一个住处。

我就去执行任务了。在报纸上我找到了一个剧院理发师登的一则广告，便打电话向他询问订购假发的事。他说要本人亲自去，量过尺寸就可以制作任何一种发型的假发。

第二天一清早，我们就去了。我们尽量拣偏僻的街道走，来到了符拉基米尔街。我们走进一家理发馆。理发师原来是一个年老的彼得堡人，他在那里的玛丽娅剧院里做事，是这方面的行家。他给我们讲他如何让那些公爵、伯爵、将军和其他男男女女的贵族“变得年轻”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问假发什么时候能做好，他说要两星期以后，因为这是一种非常精细的手艺活儿。这怎么成呢！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打算过两天就要走的呀。

“你们是不是有现成的呢？”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问道。理发师量了一下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头部尺寸，问需要什么颜色的假

^① 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去过赫尔辛福斯弗·伊·列宁那里两次。——编者注

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假发里要掺杂有白发，大致要让他象个六十岁的人。可怜的理发师吃惊得差点晕倒。

“您这是怎么啦？您还那么年轻，要知道您还没过四十岁呢。您要买这样的假发干吗？您还没有白头发呢。”理发师绘声绘色地劝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不要过早地让自己扮成老年人的样子。他不顾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反对，还是劝了好久，说不要买有白头发的假发。

“我买哪一种假发对您不都是一样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道。

“不，我想使您保持年轻的外貌，”理发师又劝说开了。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仔细看了看橱窗，发现那里有一个有白头发的假发，就请理发师给他试试。理发师带着责备的神情拿出假发给他试戴。这个假发倒还算合适，只要稍微拆拆，改缝一下就行了。理发师答应明天早晨前做好。次日，我们又去那儿，假发已做好。我们试了试，完全适合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头形。理发师交代清楚了如何戴假发，我们付款后就告别了。我想这个理发师至今还会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感到惊讶，而且说不定正在给自己的顾客讲述这个怪人的故事：他本来可以让人当作一个青年人，但硬是要让人看成是个老头儿……

次日，我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那里去时，他告诉我他在学戴假发。他戴上假发，问道：

“瞧，怎么样，看得出来我戴的是假发吗？”

我仔细地看了看，说道：

“不知道的人是看不出来的。”

后来，我通过自己的同志搞到了画眉毛用的油彩和芬兰人的身份证，我把这些东西都交给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使用。在维堡的住所，我是请议员胡顿宁找的。当一切准备就绪和安排妥贴之

后，我就辞别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他被送到维堡去了，过了一段时间再从那里送往彼得格勒。地下状态的生活结束了……

要详细描绘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生活中一个极其重要的片断，就不能不说明一下他的个性。有一个古老的真理是人所共知的，说是一个人的性格在患难中表现得最充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最黑暗的时期里，即在七月事变后克伦斯基统治的日子里，是怎么样的呢？

惊人的镇静和沉着。当时在外面随时会遭到逮捕，而他一到我家，在写字台旁坐下就开始工作。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正是在赫尔辛福斯写完了自己的《国家与革命》一书。

在赫尔辛福斯的整个时期里我没有发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有过丝毫的急躁不安的情绪。他的情绪始终很好。听到什么有趣的事情时，就打心底里笑起来。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干起工作来是定时的、耐心的。工作完成后，他才出去走走，散散步。有时候在晚上，我们摸黑走上街去，在城里散步。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到了以后，他对我说：

“明天您不用到我这里来了，我会到您的住所去取报纸的。”

的确，第二天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同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一起从捷列穿过大公园走到哈格涅斯卡雅广场，来到了我的住所。

我发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任何情况下对事态都保持着清醒的估计。他的意志不是铁一般的（看来这样说还不够），而是钢一般的坚强。他总能达到自己的目的。当我没有按时完成交给我的任务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批评我说：

“您是怎么啦？为什么没有完成？”无论我如何辩白，他总坚持自己的意见，一直要到按他的要求全部完成为止。

至于说到个人的需求，那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则是异常的俭朴。关于这方面甚至连敌人对他也无可非议，无可指摘。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是个倍受敬爱、富有魅力的人。他是个彻底的革命家。

载于《论列宁》。（回忆文集）第1册
尼·列·美舍利亚科夫作序和编辑
1925年莫斯科第2版第111—119页

伊里奇在1917年十月革命前夕

玛·瓦·福法诺娃

七月事变以后，维堡区党委会打算把我的住所用作党的活动场所。

我的住所在维堡区紧靠列斯诺伊的地方（在大萨姆普桑大街和谢尔多博里街的拐角处，九十二号甲，四十一号住宅），是在大楼的最高一层上；窗户对着隔壁一幢楼的花园，所以从单独居住这个角度来考虑，我的住宅是很合适的。

大概在8月里作出了最后的决定：我应将住所提供给党使用一段时间，并且要把家属送走。我把这个决定告诉了妹妹，她就让我的孩子送到乌法省我的双亲那里去住。

9月底的时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从芬兰直接来到我这里。记得这是在星期五晚间将近八点钟的时候。他是从离我们的住所大约四俄里的乌迭利纳亚车站来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到了之后，跟着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也来到了。伊里奇走进了为他准备的房间，晚上他在自己房间里吃了点东西，到第二天早晨喝茶的时候，我们才相互介绍认识了。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当时也在。记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走出房间的时候，忘记戴假发，所以他第一天就露出了真面目。尽管他每天早晨教我用新的名字来称呼他（当时他的证件上贴的是一个谢斯特罗列茨克工人的照片），可我老是忘记。伊里奇则常常忘记戴上自己的假发，虽

然讲好我有责任随时随地提醒他戴好假发。顺便说一句，戴假发使伊里奇感到很不方便，因为戴着假发，他就老是要去理它，或者问他的假发戴好了没有。

戴假发的事总是很不顺利。伊里奇在10月24日(11月6日)到了斯莫尔尼宫，在第一百号房间(我似乎没有记错)开始脱衣服，他脱帽时连假发也除了下来，并且把它连同帽子一起塞进了大衣口袋里，当周围响起一片“伊里奇！伊里奇！”的喊叫声时，他才恍然大悟，摸了摸自己的头，但是已经晚了。伊里奇戴着假发进行秘密活动的经历就到此告终了。

最初，伊里奇足不出户，连散步都不去；我建议他到阳台上去走走(我们住所的第三个房间有个小阳台)，他也拒绝了。阳台上他只去过一次，是在他到来后的第二天。当剩下我们两人的时候，他要我领他去看看整个住所，以防在紧急场合下不从门里走而从窗口跳出去时能辨别方向。

起初，我甚至不懂伊里奇说这话的用意是什么。我领着他看住所。当我们来到第三个房间，我指给他看阳台的时候，我看见伊里奇高兴地笑了。他说道：

“好极了，现在可以准确地确定排水管是怎么装的，是否靠近我的房间——万一需要的时候，可以顺着水管滑下去。”

他踏上阳台，数了数窗户，说道：

“房间挑选得很适当，很成功。餐室里的第二个窗户不用关上，就象阳台那样。今天晚上，请您拿把小锤子到院子里去，把这个栅栏(他指着把我们家院子同隔壁院子隔开的栅栏)对着排水管的两块木板敲掉，敲掉上面两块还是下面两块，这随您的便。这件事要做，以防在意外情况下不能从家里走出去时派用场。”

当时，只要是彼得格勒出版的报纸，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通常都要翻阅。我的责任是在八点钟上班前，买回所有的报纸，这件事

我必须从早晨七点钟就开始办。在列斯诺伊往往不能买到所有的报纸，而要进城去买，即使在那里还得到处去找，因此有时候要过了早餐时间才能把报纸买回来，而早餐的时间总是在早晨八点半钟。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从报纸上迅速地了解社会动态，因此他对事态的进程了解得十分清楚。对于无论由于某种原因而不能买到某一种报纸的时候，他就感到非常不满意，通常在晚上就提醒我还没有买到的报纸，并把所缺报纸的单子写给我。

记得，有一次他交给我一个任务，要我把已出版的全部《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消息报》给他找来。当然，这个任务我完成了。不记得我搞到了多少号，但数量不少，总之，是一些值得加以研究的材料。连续两天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工作时间很长，甚至夜里都不休息。第三天早晨，他说道：

“这一下，我好象把社会革命党人彻底研究清楚了，今天只剩下看看他们农民的委托书了。”

午饭前（我们总是在傍晚五点钟时吃午饭）我回到家里的时候，看见所有的报纸都已经摊在餐室的桌子上了，他一看见我，就用手敲着报纸（我看见他手里拿着一份《农民消息报》），愉快地说：

“二百四十二名地方代表签署的委托书，这可真不简单呢！我们就拿它作为土地法的基础，看看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会有什么办法来拒绝。”

他把这份报纸给我看，在几个不同的地方都用蓝色铅笔划了线。

对这份由二百四十二名农民代表签署的可资借鉴的委托书，伊里奇议论了好几天，而且谈得很多。

在10月25日（11月7日）以后的最初几天里——我记得是10月26日（11月8日）——那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已经到了斯

莫尔尼宫，在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们来到斯莫尔尼宫的时候，他需要使用这一号的《农民消息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赶紧托人从我的住所给他送去这一号报纸。他们四处找了我好久，结果没能找到，因此这件事就委托玛丽亚·伊里尼奇娜去做。她用了留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身边的那把住所的钥匙，但是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房间里那么多的报纸和杂志里找不到所要的那一号报纸。当别人找到我的时候，大约已经是晚上十一点钟了。我就和玛丽亚·伊里尼奇娜一起去取这一号报纸，并把它送去交给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这是1917年8月19日的第八十八号《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消息报》。

10月24日(11月6日)白天，将近四点钟，我在自己的一个办公地点(在瓦西里岛的杰弗里因出版社)获悉尼古拉也夫桥被拉起来了。我立即放下工作，马上打四路电车路线朝尼古拉也夫桥走去，我是想证实一下桥是否拉起来了。结果证实了。于是，我就朝彼得格勒区走去，我不慌不忙地走过那里，来到萨姆普桑桥，但这座桥原来已经由维堡区的赤卫队所占领，所以不可能通过。我就经过格列纳杰尔桥到维堡区，想尽快地回到家里。我决定先到维堡委员会去一次，了解一下正在发生的事变的消息。

在维堡委员会听到的只是一些很不确切的消息，我把这些消息告诉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他听我讲完之后回到自己房间去了，过了一会儿，他手里拿着封信出来找我。他派我立即到维堡委员会去检查一下，所有的桥放下了没有，他把信交给我，要我只能通过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去转交该信。他说他认为再也不能拖延了。一定得采取武装行动了，所以他今天必须到斯莫尔尼宫去。

晚上八点钟左右，我回来了，我说维堡委员会告诉我桥放下了，原先把桥拉起来是因为妇女“敢死队”想要“造反”。他马上又

派我送一张字条给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很快我就带回了她的答复。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这个答复不满意。

他再次派我送了一张字条给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并且说，如果我十一点钟之前不回来，他就看需要采取行动了。

在维堡委员会我得到的又是一个否定的答复，于是，我雇了马车，急匆匆地要赶在十一点钟之前回到家。我大约提前了十分钟到家，但在家里没有见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当我走进熄掉灯火的住所后，起先真是不知怎么办才好。我开了灯，看了一下住所——所有房间的门都打开着，餐室的桌子上留下没有吃完的晚饭和第三套没用过的餐具，后来我才在这套餐具上面看清楚有一张狭长的字条，上面写着：“我走了，到您不愿我去的地方去了。再见。伊里奇。”

我看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签名没用假名，而是他那简练的“伊里奇”之后，我感到完全放心了，不再为伊里奇担心了。我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伊里奇是胸有成竹的。不过，我还是决定跟着伊里奇到斯莫尔尼宫去。我在那里看见他时他正把大衣、帽子连同假发一起脱下来。

早上将近五点钟时，我回到了自己的住所，刚刚吃了饭（一整天来还是第一次吃），躺到床上去，就响起了约定的信号——两遍短促的铃声。开始的时候，我闪过一个念头：这不可能是伊里奇吧！那么这又会是谁呢？我走出来问了一声，竟忘记随手拿房门的钥匙。原来是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我隔着门告诉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早已到斯莫尔尼宫去了。她没有进屋就赶回维堡委员会去了。

载于《回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第1卷1956年莫斯科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版第617—620页

弗·伊·列宁在1917年

(回忆片断)

尼·伊·波德沃依斯基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七月事变以后刚转入地下，他立即设法弄清楚全部事态，着手给我们写信，要我们从无产阶级的七月行动中吸取教训，并酝酿举行最后的起义。我们在七月里遭到了失败，原因是我们的组织准备不够，难以取得胜利。因此，现在必须尽一切努力使党和工人阶级切实作好起义的准备，坚定地走上起义的道路，将起义进行到底。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七月事变以后就立即提出了这个口号。

这以后，过了相当的一段时间并且发生了许多事件，工人阶级这才看清楚：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主张是正确的。

这段时间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七月事变的结果是工人阶级被解除了武装，赤卫队被迫转入地下。革命的部队被解散。工人阶级的胜利成果开始被夺走。工厂主开始解雇那些哪怕只有一点点革命情绪的工人，还唆使一部分工人去反对另外一部分工人；而资产阶级在千方百计地瓦解工人阶级队伍的同时，竭力纠集起自己的队伍来，以便对无产阶级进行最后的反扑。资产阶级企图扼杀革命的时候，是会复辟君主制度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看清了这一切，并且预先提醒了我们。他说资产阶级在七月事变以后，要向右急转。象以往那样，他的看法

是正确的。

切尔诺夫和克伦斯基提出要宣布布尔什维克党为非法的党，蓄意破坏革命组织的各种会议在暗中进行。反革命势力抬头了。正在酝酿实行军事独裁。以“忠实可靠和久经考验的俄国人”科尔尼洛夫为首的一批将军也被推选出来，他们将伙同卡列金一起向革命的彼得格勒进攻。

这样，决心粉碎革命的准备活动正从两个方面在进行着。

有联合政府积极参加准备的科尔尼洛夫叛乱开始了。科尔尼洛夫叛乱一旦成功，那就意味着苏维埃被消灭，战争要打到底，士兵委员会被废除和革命的最终失败。

科尔尼洛夫的反革命发动，显而易见就是整个资产阶级的发动，擦亮了工人们的眼睛。他们看到了布尔什维克在唤起所有的革命力量来对付科尔尼洛夫，不让这些叛乱的将军实现军事独裁。只有到了这个时候工人阶级方始彻底相信布尔什维克的话是正确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所走的道路是不同的。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曾指出，布尔什维克党已经到了要进行非常积极的组织工作，准备发动武装起义的时刻了。资产阶级已经现出了自己的反革命本质。他说，目前我们的党对工人阶级正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布尔什维克在莫斯科和彼得格勒苏维埃的改选中取得了明显的多数。

处在地下状态的列宁来信说，这件事极其可靠地证明，工人阶级开始完全懂得了布尔什维克的口号，起义的时刻现在已经来到了。如果我们现在耽误了，那么我们就把革命葬送掉，因为资产阶级会同德国人勾结起来把革命镇压下去。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从9月中旬开始要求加强起义的准备工作。他不顾一切危险，在10月初从芬兰返回彼得格勒，亲自参加了准备起义的工作。在维堡区住下之后，他召集了由负责的党员和

布尔什维克军事组织的工作人员参加的一系列秘密会议。在这些会议上他再次提出起义的问题，并且同那些企图阻止起义的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他向无产阶级发出号召：“准备起义！”他向各地的党的代表会议和工作会议写信，同样明白无误地提出起义的问题。列宁十分重视赤卫队，关心它的装备。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提出了起义的纲领，他象一位极其英明的战略家，制定了起义的计划，并以总指挥的身份领导了计划的实施。他说，首先必须占领全部桥梁、中央电话局、自来水厂、各个火车站和电报局。一直负责党的军事工作的军事组织必须组织起义，并且要建立一个为全体群众所公认的机构；结果成立了彼得格勒苏维埃军事革命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同布尔什维克的以及“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军事组织一起将直接领导起义。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要求我们采取最果断的行动。10月23日(11月5日)我们给所有的团队派去了我们的政治委员，这些团队必须服从他们的领导。这样，彼得格勒卫戍部队的领导权实际上就转到了我们手里，转到了工人和农民手里。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认为夺取资产阶级的堡垒和逮捕临时政府人员的意义是十分重大的，因为他很清楚，假如不能够占领资产阶级的根据地的话，那么这将会大大拖延斗争，而假如不把临时政府人员逮捕起来，那么他们分散到全国之后就会进行叛乱，反对苏维埃政权。

还在资产阶级举行形形色色民主会议和策划八月叛乱^①的时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认为必须召开苏维埃代表大会，以此同资产阶级组织相对抗。当布尔什维克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苏维埃

^① 指1917年9月14—22日(9月27—10月5日)举行的所谓“民主会议”和1917年8月25日(9月7日)开始的八月(科尔尼洛夫)叛乱。——编者注

的选举中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之后，他更加坚决地坚持这一主张。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建议在10月20日（11月2日）召开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而起义在大会之前就举行。某些人认为，既然代表大会就要召开，并将表明自己的愿望，也许就不需要举行起义了。^①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毫不留情地嘲笑了他们的主张。

“哪里见到过有人不经过战斗就会把政权交出来的，”他说道，“政权总是通过战斗夺取的。它不会靠发表什么宣言就从一个阶级转到另一个阶级那里去的，而任何宣言也维护不了这个政权。”

他要求不要等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召开就组织起义。

“现在的时机有利于起义，”他说道，“因此务必抓紧。一旦起义已经举行，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召开就将比较容易”。

这时候，克伦斯基及其政府已经在同德国人进行谈判，要向他们让出彼得格勒，撤出那里的革命的卫戍部队，从而由内部削弱革命，在 frontline 毁灭革命的成果。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竭力催促我们开始起义；起义开始后，他又坚决地要求把起义最有力最广泛地进行下去，要求极其迅速地占领城里所有的主要阵地。

10月24日（11月6日）夜里，列宁来到了斯莫尔尼宫，掌握了领导起义的整个联络网。他不时地派出信差，给我们送来写着三言两语的字条：“中央电话局和电报局拿下了没有？”“桥梁和车站占领了没有？”等等。他在口头上和书面上都坚持要我们检查他的全部命令的执行情况。他询问负责某据点的人是否真正可靠？某某街上有出击点，是否已经把它占领了？

^① 在起义的日期问题上反对弗·伊·列宁的是托洛茨基，他主张把起义安排在恰好是苏维埃代表大会举行的时候；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反对武装起义，主张“议会”的发展道路。——编者注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认为攻占反革命临时政府盘踞的冬宫意义尤为重大。

我们估计能在10月25日(11月7日)晨占领冬宫。但由于部队推进太慢,喀琅施塔特的水兵迟来等原因,使攻占冬宫的时间意外地推迟了。

弗·伊·列宁和整个斯莫尔尼宫里的人由于占领冬宫的时间推迟而感到万分的焦急。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从上午十一点到晚上十一点接连不断地给我们写来了字条。他说我们在使各项计划遭到破坏;代表大会正要开幕,而我们还没有攻占冬宫,也没有逮捕临时政府人员。他警告说,如果延误就要把我们全部枪毙。他要求我们从速攻下冬宫,把部长们逮捕起来;要我们向苏维埃代表大会报告这件事。

……冬宫成了敌人在劳动人民夺取政权的道路上设置的最后一道关口。

后来听人家告诉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随时等候着攻占冬宫的消息,没有出席代表大会的开幕式。他在斯莫尔尼宫的一间小房间里象笼中的一头雄狮焦急地跑来跑去。

但是,临时政府不顾我们的两次最后通牒,顽固不化,不肯投降。于是,“阿芙乐尔”的炮声宣布了总攻的开始。在彼得—保罗要塞大炮一阵阵轰击的掩护之下,我们的散兵线方能逼近冬宫,开始猛烈的射击并冲了进去。

……士兵、水兵和赤卫队员冲向大门,那里站着吓呆了的、职务羈身的士官生。

“这里是临时政府!”

“滚开!”突击队员喊着冲进房间里去。带队的是弗·亚·安东诺夫-奥弗申柯。

“我现在代表彼得格勒苏维埃军事革命委员会宣布临时政府

被推翻了，”他命令道。“你们被逮捕了！”弗·亚·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对吓得半死的部长们说。接着，他们在士兵的痛骂声中被带到了广场上，然后送往彼得-保罗要塞去。

这一切经过都报告了列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默默地听完了关于临时政府人员被捕和关进了要塞的报告之后，立即回到斯莫尔尼宫自己的房间里去。他在椅子上坐下，把一本书放在膝盖上就着手起草土地法令。

大家都因为夺取了政权而感到激动，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已经在考虑明天的事了：如果明天早晨法令不写好的话，那么就无法实现下一个步骤。当我来到斯莫尔尼宫布置岗哨的时候，我看到他正在写土地法令。这时，时间已经是深夜两点钟了。

载于《历史文献》1956年
第6期第129—132页

列宁给党中央的一封信

叶·德·斯塔索娃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出席了党中央委员会的会议后，我才知道他从维堡回到了彼得格勒。每天早晨，中央委员们在去斯莫尔尼宫之前总要顺便来中央书记处走走，交流交流各自的情况。他们自然也常谈起弗拉基米尔·伊里奇。

我们都知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9月份通过玛丽亚·伊里尼奇娜给党中央寄来一封信^①，后来党中央委员会停止广泛散发这封信。玛丽亚·伊里尼奇娜把这封信复印了十份拿给我，并且转达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请求，要我把信送给全体中央委员。我前面说过，中央委员们每当去斯莫尔尼宫的时候，总要顺便到书记处来，所以我就在那个地方把这封信交给了他们。我把信交给了安·谢·布勃诺夫，他念完后就说，我必须把复印的信全部销毁。

“为什么？”我问道。

“我以中央委员的身份告诉你，”他对我说。

“这封信是党中央委员会的一位委员寄来的，为什么我必须听从您呢？”

布勃诺夫说，中央将作出决议销毁这封信。听他这样说，我就

^① 见《列宁全集》第26卷第1—3页。——编者注

回答道：

“一旦中央委员会作出决议，那么我就服从决议，而不打算服从您。”

于是，我继续把其余几份都发给了中央委员们。同时，我也在考虑：可能，中央确实将作出决议，那么这封信就只好销毁。于是，我就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信放三份到我们的秘密档案里去。我现在讲这件事，是要让马列主义研究院的工作人员知道，当时除了一般性的档案之外，还有中央的秘密档案，它保存在一个铁箱里，存放在书记处以外的地方，在这个秘密档案里有中央委员会的文件。在另外一只箱子里（也放在书记处以外的地方）放着秘密图书。

在科尔尼洛夫进攻彼得格勒的时候，我把党中央的秘密档案交给了一个从叶卡特林堡来的同志，让他把档案拿到自己那里去，当时我以为档案放在那里将是安全的。可是哥尔察克在乌拉尔发动了进攻，这个同志只好把两个箱子都埋在地底下。应当提一句，这两个箱子至今尚未找到，而且也不知道它们埋在什么地方。

载于《关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
回忆录（1900—1922年）》1963年莫斯科
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版第225页

列宁在斯莫尔尼宫

亚·米·柯伦泰

如果有人问我，在我一生中什么时候是最重大、最值得纪念的，时刻，我就会毫不犹豫地回答：宣布苏维埃政权成立的那个时刻。

“全部政权转归工农兵代表苏维埃！”

当我们在斯莫尔尼宫里举行的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的讲坛上听到这一朴实而庄严的历史性决定时，我们心中幸福和骄傲的喜悦是无法形容的，也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在那个伟大的时刻，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的形象是令人难忘的！他宣布了苏维埃政权制定的第一批著名的法令——和平方令和土地法令。列宁那热情洋溢、富于想象和洞察万物的目光注视着前方——他已经看到我们还未能看到的远景：看到正在公布的一系列法令得到了生动的体现；看到我们要去争取的未来。

布尔什维克在掌握政权的最初时刻就着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开始新世界的建设。在这样的时刻，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坐在第一次苏维埃立法会议主席团的座位上，他那种聚精会神、鼓舞人心的沉思的神态极为动人而又令人难忘。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10月24日（11月6日）夜间来到斯莫尔尼宫。他是在秘密状态下从列斯诺伊区赶来的，根据党的决定他曾在那里躲避克伦斯基的暗探。

第二天列宁就公开前往出席彼得格勒苏维埃的会议。

有些同志想劝阻列宁，不让他冒险在苏维埃公开露面。为伊

里奇无比担心的那些时刻凡是亲身经历过的人是不会忘记的。

但是地下活动的时期已经过去了。列宁没有听从劝阻，甚至也没有向我们表示反对。他赶到苏维埃开会的白厅去了。

列宁比我们更了解城乡无产者群众的情绪，更了解前线的战士；他知道，他们正在期待着他，期待着他采取决定性的行动。

列宁终于出现在大厅门口。

大厅里响起一阵噉噉喳喳的说话声：“列宁！”。代表们的热烈欢呼声使他久久不能开始讲话。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报告非常有力，它激励了苏维埃代表们的心。

从会议厅回来的时候伊里奇温和地嘲笑我们说：

“你们看见代表们的反应了吧！可是你们当时还在怀疑。”他狡黠地瞅着身边辛勤的警卫员，表示责备地摇摇头。列宁掌握了对起义的直接领导。

我记得斯莫尔尼宫里那间窗户对着涅瓦河的房间。夜晚，暮色浓重的十月的夜晚。涅瓦河上劲风阵阵。房间里，在一张不大的方桌的上空亮着一盏小电灯，灯光暗淡。聚集在桌子旁开会的是经第六次党的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中央委员们。有人端来了几杯热茶。

列宁就在这里。他在我们中间。这使我们精神振奋，使我们对胜利充满信心。列宁镇定自若，列宁坚强沉着。他的每一个命令，他的每一个动作都十分明确、有力，象一位经验丰富的船长在风暴中指挥航行。这场风暴是空前的——这是最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风暴……

不久，我们就听到了“阿芙乐尔”的炮声。

我能够作为一个国家救济人民委员同列宁一起在第一个苏维埃政府里工作，这是我的幸福和莫大光荣。

人民委员会在刚建立的几个星期里是在斯莫尔尼宫三楼拐角

上的一个房间里开会的。这个房间当时就叫“列宁办公室”。

人民委员会开会用的一套设备是很实用的，而这种实用性已经造成了工作的不便。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台子靠着墙壁，台子上方低悬着一盏小灯。我们这些人民委员坐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周围，有一部分人则坐在他的背后。靠近窗户的地方放着人民委员会秘书尼·彼·哥尔布诺夫的一张小台子，他是做记录的。每当列宁要某个人发言或是对哥尔布诺夫作指示的时候，他就不得不转过身去。但是那时候大家都忙于重大的事情，谁也没有想到把台子重新放得妥贴些。那时候是不考虑自己的！……

我举一件事来说明。这件事清楚地说明了人民委员会的委员和列宁本人在那些热火朝天的日子里的日常生活情形。

事情发生在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闭幕以后不久。一些瑞典同志由于老交情（我作政治侨民时曾在瑞典工作过）从斯德哥尔摩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和我寄来了几大块荷兰干酪。

这份礼物是非常及时的。记得有一次在开大会的时候，我发表了演说，又同社会革命党人进行了一场激烈的政治性争论之后，感到头发晕。

“您病啦，柯伦泰同志？”一个赤卫队战士扶着我问道。

“不，大概多半是饿了。”

这个赤卫队战士当时要给我一个卢布去“买点面包”，我谢绝了；他打听到了我的住址，就把面包送到我家，没有让人知道就悄悄离开了。

说真的，我很高兴能够请伊里奇吃干酪，因为政府首脑也同我们一样半饥半饱。

人民委员会开会之前，我把几块圆形的红色干酪拿给伊里奇看。他不安起来了，他首先关心的是我们：

“应该分给大家吃。也别忘了哥尔布诺夫。这件事就请您来

处理吧。”

列宁返身回到办公室去了，而我就在相通的隔壁房间的一张台子上摊开报纸，取出刀来，开始分干酪，让同志们晚饭时吃。

我要去出席人民委员会的会议，便把刀子和干酪留在台子上就离开了。会议一直开到深夜，这种情况在那时是习以为常的。结果我把干酪的事情忘记了。等我返回去的时候，台上的干酪已不见了。刀和报纸还在，而干酪却一点也没剩下…… 大门口的岗哨一天要调换多次。岗哨把留在房间里分成几份的干酪当作是给他们的口粮了。所以没什么奇怪的，干酪在一天里全分给同志们吃了。

我回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办公室。他同哥尔布诺夫在一起校对记录（列宁总是这样做的，工作上这种非常细致、精确的特点是我们经常要向他学习的）。

“发生什么事啦？”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问道。我把事情全说了。他爽朗地笑了起来。

“怎么样，干酪味道挺好的吧？”他真诚地笑着问道。“到头来您一点也没有尝到吗？这真可惜。我认为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不是我们吃，就是别人吃。”

伊里奇的双眼由于亲切热情的微笑而发射出光芒。列宁的这一令人难忘的目光是在说：干酪我们没有拿来款待人民委员们，那反正也是款待战士们或者工人们了，他们当晚饭吃了——也很好！

说完，列宁继续看记录，又去处理人民委员会主席的日常事务了。

一个伟大的人物在继续从事创建世界上第一个苏维埃国家的巨大工作，这项工作以其不朽的篇章载入了人类的史册。

载于《关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
回忆录（1900—1922年）》1963年莫斯科
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版第218—220页

列宁在十月的日子里

(回忆片断)

安·谢·布勃诺夫

我想在这篇短文里写一点回忆，记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十月的日子里的生活。

起义前不久，我在维堡区曾经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见过面，那时他已经从芬兰回到俄国。列宁在促使加快起义，他非常注意研究那时候彼得格勒的力量对比，研究准备起义的具体问题。10月10日(23日)列宁第一次参加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会议(在苏汉诺夫的住所里)。10月16日(29日)他出席了在列斯诺伊区举行的中央委员会会议，这次会议还邀请了一些同志参加。这两次会议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为会上最后决定了有关起义的问题。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于10月24日(11月6日)夜里来到斯莫尔尼宫。在那个夜晚，包括列宁在内的全体中央委员会委员都在斯莫尔尼宫的第十四号房间里过夜，他们有的躺在地板上；有的睡在椅子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于攻占冬宫的事催得很紧，当他得不到有关进攻进展的消息时，他对大家，几乎对每个人都催得很紧。10月26日(11月8日)晨，他第一次出席了军事革命委员会的会议。

起义之后，当工人、水兵和士兵们犹如汹涌澎湃的革命巨浪涌向斯莫尔尼宫的那些难忘的日子里，我们这些中央委员们每天都

在斯莫尔尼宫里同列宁见面；有时候一天见面几次，那时彼得格勒附近大炮轰鸣，前卫战已经打响了，后来这竟成了延续整整三年的极其激烈的国内战争。

无论如何必须取得胜利，这是群众的伟大的意志，列宁当时就是这种意志的体现者。他在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上猛烈地抨击了动摇分子，毫不留情地把他们撇开。作为起义的领导者，他在自己的办公室里专注地考虑正在出现的局势，并且坚定地引导起义走向胜利。在短暂的休息时间里，他双手紧紧地反剪在背后，一边在走廊里踱步，一边跟同志们热烈地进行交谈。

在这伟大变革的日子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很活跃，很兴奋；他神采奕奕，不屈不挠，充满信心，坚定不移。

当时党内发生了一些事情，我认为其中有一点需要谈一谈，即关于确定党中央委员会十月路线的最后时刻的情况，因为这个时刻同时也是同反对十月革命的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作斗争的最后一个阶段。10月25—26日（11月7—8日）以后，全俄铁路工会执行委员会玩弄起妥协的拖延把戏来了，妄想把我们布尔什维克也牵连进去。

关于这个情况我们在第二期《中央委员会（布尔什维克）通报》里看到是这样写的：“全俄铁路工会要求成立社会主义联合内阁；如果敌对方面拒绝执行这一要求，铁路员工将举行总罢工。成立了协商委员会，参加的成员有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代表、各党派的中央委员会的代表、拯救革命委员会、铁路工会、邮电职工工会”。这个“协商委员会”在10月30—31日和11月1日期间喋喋不休地在议论关于成立“由所有苏维埃党派组成的社会主义政府”的问题。

伊里奇讨厌这种无聊的拖延，他果断地决定要结束一切犹豫动摇。11月2日（15日）中央委员会通过了列宁提出的决议案。

在这个决议案里，列宁尖锐地抨击了“对苏维埃中少数派的最后通牒和威胁”让步的政策，并且希望“所有的怀疑分子和动摇分子抛弃一切动摇，同心同德、全力以赴地支持这个政府的活动”。^①但是缺乏信心的人、机会主义分子和怀疑分子无视党中央委员会的意见，继续采取有利于孟什维克的机会主义的妥协路线。于是，列宁在11月3日（16日）起草了给中央委员会的声明，对妥协和犹豫不决的政策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声明写好后，他把中央委员会的委员一个个单独地请到自己的办公室里来，向他们介绍声明原文，并且要他们签名。大多数中央委员会委员都在声明上签了名。在随后召开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是在11月4日（17日）宣读了这份声明。

声明指责少数派的代表“始终执行显然是反对我们党的基本路线、瓦解我们自己队伍的政策，在必须表现最大的坚定性和不可动摇的时刻，他们却引起了动摇”。

声明接着指责当时的反对派，说它“想用纠缠的办法夺取党的机构，在党的工作的最近结局将决定党的命运、革命的命运的时刻，对党的工作实行怠工”。由于深信全党会一致拥护自己的中央委员会，大多数中央委员会委员在自己的声明里写道：

“党就必须坚决地请少数派代表在我们党组织范围以外进行他们的瓦解工作。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别的结局”。^②

对此，反对派除了撤销自己中央委员的称号之外，找不出更好的办法。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退出中央委员会的声明上签了名，可是他们竟在十月革命以后，再一次玩弄十月革命以前的故伎：公然在阶级敌人面前反对党中央于这一年

① 见《列宁全集》第26卷第259、260页。——编者注

② 同上，第261、262页。——编者注

10月10日(23日)作出的关于武装起义的决定。

在十月的日子里,列宁坚定地引导群众走向胜利,同时为了党的团结和革命的胜利,他对机会主义者和破坏分子采取了极其不寻常的措施。

载于《列宁在苏维埃政权最初几个月里》(论文和回忆文集)1933年莫斯科党的出版社版第44—46页

守卫在列宁身旁的斯莫尔尼宫 赤卫队战士

伊·费·叶烈梅也夫

1917年我在彼得格勒的普梯洛夫工厂（现名基洛夫工厂）做工，我参加了工厂的赤卫队。

十月革命前夕，赤卫队指挥部派我们普梯洛夫工厂的机枪队到斯莫尔尼宫去。在那里我们成了伟大的历史性事件的目击者和参加者。

当时，斯莫尔尼宫里里外外已经有许多赤卫队战士、革命的士兵和水兵。我们也在这里被命令下车设岗。我们把机枪架好，伪装好之后，就朝斯莫尔尼宫走去。我们驻在二楼的一个小房间里，那里已经有几个来自其它区的赤卫队战士。房间里没有任何家具。墙上孤零零地挂着一架电话机。来自其它区的几个没有去值班的赤卫队战士手里拿着步枪，随意地坐在光溜溜的地板上休息。

出席全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代表这时候正从各地来到斯莫尔尼宫。代表大会上来自前线的士兵代表们的革命精神尤其突出。他们人人都咒骂战争，要求和平。当时没有给他们准备好任何住的地方，他们同我们一起就坐在房间的地板上。我们把从家里随身带来的食品分给他们吃，告诉他们上饭厅去的路。

第二天，我们除了要在机枪旁值班以外，还要负责检查进入斯

莫尔尼宫的通行证。

10月25日(11月7日)前夕,斯莫尔尼宫里到处挤满了人——代表大会的代表、赤卫队战士、革命的士兵和水兵。斯莫尔尼宫里人声鼎沸,就象一个巨大的蜂房嗡嗡价响。

在10月24日(11月6日)夜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来到了斯莫尔尼宫二楼的一个不大的房间里。我们普梯洛夫工厂机枪队得到了崇高的荣誉:负责保卫伟大的革命领袖。

这时候斯莫尔尼宫里的情况很紧张。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散布荒诞无稽、挑拨离间的流言蜚语,妄想涣散赤卫队战士和革命士兵的斗志。他们企图吓倒我们,要我们相信克伦斯基为了摧毁斯莫尔尼宫正投入由获得乔治十字勋章的士兵所组成的五十个营和四十个军官营。可是赤卫队战士不是胆小鬼。布尔什维克党使我们经受了革命斗争的锻炼,我们随时作好对付资产阶级全副武装进行偷袭的迎战准备。斯莫尔尼宫里刺刀林立,机枪和大炮严阵以待。

10月25日(11月7日)白天,彼得格勒苏维埃在大礼堂里举行会议。我们听到乱哄哄的人声,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抓起枪就冲到走廊里去。原来是一场虚惊:出席会议的人在热烈地欢迎出现在台上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

我们也听到了他关于必须把全部政权转交给工农,即关于苏维埃政权的部分演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作的这一历史性的演说我们没有听完,因为我们被叫回到战斗岗位上去了。

在10月25日(11月7日)前,出席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全体代表到齐了。代表大会开幕不久,走廊里骤然传出一阵喧喧嚷嚷的声音。我们在离会议大厅不远的地方就立即抓起枪,跑到走廊里去。原来,有一伙孟什维克和资产阶级的喽罗们在会议上起哄,但是他们在遭到代表们的一致回击之后,不得不退却了。这

些反革命势力的代理人一边恶毒地咒骂着，一边退出会议大厅。而全体出席会议的人朝着他们愤怒地叫道：“滚开！打倒叛徒！”

十月革命的指挥部不断地收到报告：某工厂派出了多多少少武装的赤卫队战士去进攻冬宫；“阿芙乐尔”号巡洋舰轰击了冬宫；冬宫被攻占了；临时政府的人员被逮捕了……

在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夜晚，斯莫尔尼宫里谁也没有睡觉，直到天亮的时候斯莫尔尼宫里才安静下来。

10月26日(11月8日)上午十一点钟，斯莫尔尼宫的值班警卫员叫醒了我，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找我去汇报。我无论如何也不相信，心里嘀咕，这是值班警卫员在跟我开玩笑吧。但是他说：

“昨天晚上你不是通宵都同纳尔瓦区保持着联系吗，那你就去汇报吧……”

当我确信值班警卫员不是跟我开玩笑，我感到说不出的激动：我会不会汇报自己所知道的事情呢？

考虑来考虑去，想出了这么个办法：我作个口头报告就算是汇报，因为口头报告我可以先把它背熟了再去讲。我于是马上就开始背诵起来。当我自认已经能背出来后，就上伊里奇那里去了。伊里奇的房门口有我们的赤卫队战士在站岗。他们知道唤我来的事，所以立刻就让我进去。

当我走进房间的时候，伊里奇坐在一张不大的台子旁边写东西。他没有发现我进去。我走近台边，行了个举手礼，鞋后跟轻轻地碰了一下。听见了声音，伊里奇抬起头瞧了我一眼。我已经准备把我背熟的报告讲出来，但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见我笔直地站着，举着手行礼，就迅速地站起来，摇着双手说道：

“您瞧，您瞧，别这样！请坐下讲吧。”

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让我在他对面坐下后，我事先准备好的报告全忘记了，我就干脆把所见所闻和普梯洛夫工厂工人

思想状况讲给伊里奇听。列宁边听边继续写东西。我怕打扰他，就没有再往下讲。伊里奇那时又抬起头说道：

“您继续讲，继续讲，我在听着呢！”

我讲了工人们思想状况，讲了他们对苏维埃政权的看法。接着，弗·伊·列宁向我提问题。我记得他提了这样一个问题：“妇女们的情况如何，她们满意苏维埃政权吗？”

后来，我知道弗·伊·列宁也把其它区里担任联络的赤卫队战士找了去，向他们详细询问了工人们思想状况和工人们的要求。

这些事情我是永远忘不了的！我将一辈子记住：在苏维埃政权最初的日子里，我在斯莫尔尼宫曾向伟大的列宁报告过普梯洛夫工厂工人的生活 and 思想状况。

载于《回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
第1卷 1956年莫斯科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版第121—123页

斯莫尔尼宫的不平凡之夜

阿·瓦·卢那察尔斯基

整个斯莫尔尼宫灯火通明。在一条条走廊上情绪激昂的人群川流不息。每个房间里，都是热气腾腾的场面，但是热情最高、情绪最热烈的，是在楼上走廊拐角的地方。在那里最末了的一个房间里，军事革命委员会正在举行会议。有几个姑娘已经疲惫不堪了，然而还在顽强地应付着那些前来要求解释问题、听取指示、提出种种要求和申诉的人所带来的难以置信的压力。

如果卷进这个漩涡，那就能从四面八方看见一张张非常焦急的面孔和一双双要求取得某项指示或某种委任书的手。

一些重大的任务和任命就是在这里决定的。打字机当场就哒哒不停地打下口授的文件，随即把文件摊在膝盖上用铅笔签署。一个幸运地获得了任命的年轻同志，拚命地驾着汽车飞也似地消失在黑夜里。而在最末了的那个房间里，有几个同志坐在桌旁，犹如一道道电流似地把自己的命令发给全国各地的起义城市。

直到今天，每当回忆起这件了不起的工作时，我不能不感到惊讶。我至今仍然认为军事革命委员会在十月的日子里的活动是人的精力的一种表现，它证明了在革命的心灵里蕴藏着无穷无尽的精力，而当这颗心灵在革命惊雷的召唤下，它又能干出什么事来。

晚上，在斯莫尔尼宫的大厅里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了。前来开会的人个个兴高采烈，喜气洋洋。那时群情激昂，尽管冬

宫周围的战斗还在进行，时而又传来极其令人不安的消息，但是没有出现丝毫的慌张。

我说没有丝毫的慌张，是指布尔什维克而言，是指代表大会上赞同布尔什维克观点的极大多数人而言。相反，凶狠、窘迫、焦躁的“社会党”的右翼分子却是惶惶不可终日。

当会议终于开幕的时候，大会的情绪就完全明朗了。布尔什维克的演说受到了人们欣喜若狂的欢迎。大家怀着热烈赞叹的心情听取前来报告冬宫周围战斗的真实情况的年轻水兵们的发言。众所周知，冬宫周围的战斗打完时我们方面牺牲了一些人。

苏维埃政权终于进入了冬宫，资产阶级部长们被逮捕了——这一盼望已久的消息受到了经久不息的暴风雨般的掌声的欢迎！同时，在当时的军队组织里很起作用的孟什维克库钦中尉走到讲台前面来，威胁我们，说要立刻把他那一条战线上的士兵调到彼得格勒来。他代表第一、第二、第三，直至第十二集团军，同时还包括一个独立的集团军，宣读了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决议；末了，他公然对敢于采取“这种冒险行动”的彼得格勒进行赤裸裸的恫吓。

这种做法吓不倒任何人。而那种宣称全国的农民在我们面前就象一片汪洋大海，要把我们淹没的说法也是吓不倒任何人的。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如鱼得水，他愉快地不停地工作，已经在一个角落里草拟了新的政权法令、和平法令和土地法令。这些法令将成为本世纪历史上最有意义的篇章，这一点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了。

除了上面寥寥几笔之外，我还想回忆一下人民委员会的第一次任命情况。那是在斯莫尔尼宫的一个小房间里进行的，房间的椅子上扔满了大衣和帽子，大家挤在一张灯光暗淡的桌子周围。我们在选举新生的俄国的领导人。我觉得选举时通常带有偶然性，我老是担心被选上的那些人同重大的任务之间的差距过于悬殊，

因为我对于他们是很了解的；我觉得他们担负无论那一种专门工作都还不够水平。令人懊恼的是列宁不管我这些顾虑，却笑着说道：

“目前所有的岗位上都需要负责的人员，做了再看吧，如果不行，我们还能够调换。”

列宁是多么的正确啊！当然，有的人撤换了；有的人还留在岗位上。那些曾不无胆怯地担负起委任给他们的工作，后来表明是完全称职的人也不在少数。当然，有的人——不只是目睹革命的人，而且是参加革命的人——面对宏伟的远景和似乎不能战胜的困难晕头转向了。列宁以惊人的稳健神态，谛视着巨大的目标并紧紧地把握着它，就象一位富有经验的领港员，操纵着一艘远洋巨轮的舵轮。

载于阿·瓦·卢那察尔斯基：《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回忆和论文集）》1933年莫斯科党的出版社版第24—26页

作者小传

阿多拉茨基，弗拉基米尔·维克多罗维奇（1878—1945年）——马克思主义学者，科学院院士。1900年投身革命运动，1904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1905年被捕，被流放到阿斯特拉罕省。1906—1907年和1911—1917年侨居国外期间曾多次完成弗·伊·列宁所委托的任务。十月革命后任中央档案局副局长、列宁研究院副院长、联共（布）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院长和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晚年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总编辑，写有多种关于马克思主义史的学术论文；主持编辑出版了第一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的十五卷。曾积极参加《列宁全集》的编辑出版工作。

阿法纳西也夫，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1869—1953年）——曾是谢斯特罗列茨克兵工厂工人，1905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第一次俄国革命的积极参加者。1905年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谢斯特罗列茨克委员会委员，战斗队队员；曾在彼得堡和谢斯特罗列茨克参加过示威游行和罢工。1907—1911年末转入地下。屡遭逮捕，曾被流放。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担任党和苏维埃的负责工作。晚年为特种退休金领取者。

阿利路也夫，谢尔盖·雅柯夫列维奇（1866—1945年）——老

一辈的工人革命家、布尔什维克。从1896年起，在南高加索、莫斯科和彼得堡积极从事革命工作和党的工作。屡遭逮捕和流放。1917年7月，在他的彼得格勒住所曾匿藏过弗·伊·列宁。在苏维埃政权建立的头几个月里，曾参加建立与整顿许多工业企业的工作。国内战争时期，在乌克兰和克里木进行党的地下工作。以后，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做经济工作。

阿列克谢也夫，尼古拉·亚历山大罗维奇（生于1873年）——革命运动的积极参加者，老共产党员。1897年参加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1898年初被捕并被流放维亚特卡省（斯洛博茨克城）四年，1899年从流放地逃往国外。1900—1905年住在伦敦，曾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联合会”，后为“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同盟”会员。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后，任布尔什维克驻伦敦代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在苏维埃和党的机关里工作。现为特种退休金领取者。

埃森，玛丽亚·莫伊谢也夫娜（1872—1956年）——社会民主党人、火星派分子，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后为布尔什维克。九十年代初期投身革命运动，曾在叶卡特林诺斯拉夫、叶卡特林堡和基辅等地的工人小组中进行工作。1902年担任彼得堡委员会的工作，1903年底被补选入中央委员会。1906年为莫斯科委员会委员，在反动时期脱离革命活动。1917年二月革命后参加国际主义派。1920年加入共产党，在格鲁吉亚从事党的工作。1925年迁居莫斯科，曾先后在国家出版社、党史委员会、列宁研究院、共产主义新闻学院等处工作。

安德烈也娃，玛丽亚·费多罗夫娜（1868—1953年）——著名

的俄国女演员，社会活动家，阿·马·高尔基的妻子和助手。苏共党员(1904年入党)，1905年革命的参加者。曾直接受弗·伊·列宁的委托，完成了一系列党的任务。在经济上曾给党以支持。1912年秘密回国后遭到逮捕和审讯，后来受到警察当局的秘密监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积极参加国内的社会活动。1931—1948年任莫斯科科学工作者之家主任。

奥尔忠尼启泽，格里哥里·康斯坦丁诺维奇 (1886—1937年)——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的著名活动家。1903年入党。曾在西格鲁吉亚、阿布哈兹、巴库从事革命工作。屡遭监禁和流放。1912年在党的第六次(布拉格)代表会议上被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委员。1917年二月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后在亚库提亚从事建立革命政权的工作。1917年6月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彼得堡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委员。积极参加了彼得格勒的十月武装起义。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在乌克兰，随后在俄国南方任特别委员。国内战争年代任第十六集团军和第十四集团军及高加索战线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20—1921年是建立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等地苏维埃政权的组织者之一。1921—1926年任中央委员会高加索局主席，随后任南高加索边疆区党委书记，同时担任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26年起任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和苏联工农检查人民委员。1930年起任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1932年起任苏联重工业人民委员。1921年起为党中央委员，1926年起为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30年起为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

奥里明斯基，米哈伊尔·斯切潘诺维奇 (1863—1933年)——俄国革命运动老一辈的活动家，职业革命家，著作家。八十年代初

投身革命运动，接近民粹派。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起成为布尔什维克。曾任布尔什维克的《前进报》和《无产者报》编委。1911—1914年积极参加布尔什维克的《明星报》和《真理报》的工作。二月革命后在党的莫斯科委员会工作，任《社会民主党人报》编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积极参加者。后来领导俄共(布)中央党史部的工作，曾任《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编辑，列宁研究院院务委员会委员。

奥努弗里也夫，叶甫盖尼·彼得罗维奇（1884—1967年）——1904年入党。曾在奥布霍夫工厂建立布尔什维克小组，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涅瓦区委和彼得堡委员会的委员。1905年在奥布霍夫分区参加建立战斗队的工作。党的第六次（布拉格）全国代表会议的代表。屡遭逮捕和监禁，并被流放。1917年二月革命后为奥布霍夫分区赤卫队的组织者之一。1918年曾任彼得格勒特别委员会政治案件侦查员，后来从事党的工作和经济工作。

巴布什金，伊万·瓦西里也维奇（1873—1906年）——工人，职业革命家，布尔什维克。在彼得堡谢勉尼柯夫工厂当钳工时，是一个具有革命思想的先进工人。1894年在列宁领导的工人马克思主义小组中学习。1895年成为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一个积极的会员。后来他热情地参加了马克思主义的报纸《火星报》的组织工作，是该报的代办员及通讯员之一。屡遭逮捕、监禁和流放。1905年成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伊尔库茨克委员会和赤塔委员会委员，并在那里领导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1906年1月，他同一些同志从赤塔运送武器给伊尔库茨克工人时，未经审讯即被沙皇讨伐队在斯柳江卡车站杀害。伊·瓦·巴布什金牺牲的情况直到1910年才弄清。弗·伊·列宁对巴布什金评价很高，称

他是“人民英雄”，“党的骄傲”。《回忆录》一书是伊·瓦·巴布什金 1902 年在伦敦写的。

巴达也夫，阿列克赛·叶哥罗维奇（1883—1951 年）——工人，革命运动的积极参加者，苏共党员（1904 年入党），第四届国家杜马彼得堡省工人代表，杜马布尔什维克党团成员。1914 年 11 月巴达也夫和杜马的其他布尔什维克代表因进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革命活动被捕，1915 年被流放到土鲁汉斯克边疆区定居。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在党和苏维埃以及经济部门担任领导工作。

巴哥茨基，谢尔盖·尤斯廷诺维奇（1879—1953 年）——革命运动的积极参加者，职业是医生。1900—1904 年在彼得堡和基辅参加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曾多次遭受迫害。1910 年加入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1912—1917 年先在克拉科夫、波罗宁，以后又在瑞士执行弗·伊·列宁的各种使命。十月革命后是苏联保健事业的组织者之一。1918—1937 年任苏联红十字会驻日内瓦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代表。1937 年起任莫斯科红十字会执行委员会顾问。1950—1951 年任《苏联大百科全书》医学部一级学术编辑。

彼得罗夫斯基，格里哥里·伊万诺维奇（1878—1958 年）——俄国革命运动最早的参加者之一。1897 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第四届国家杜马叶卡特林诺斯拉夫省工人代表、杜马布尔什维克党团成员。1914 年 11 月，与其他的布尔什维克杜马代表一同被捕，并于次年被流放至土鲁汉斯克边疆区定居。在流放地继续进行革命工作。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担任党和国家的负责工作。

波德沃依斯基, 尼古拉·伊里奇 (1880—1948年)——俄国革命运动著名的活动家, 红军的组织者之一。1901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曾在乌克兰、雅罗斯拉夫里、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科斯特罗马、巴库、彼得堡等城市从事地下革命工作。屡遭逮捕和监禁。1912—1914年参加了布尔什维克报纸《明星报》和《真理报》的工作。1917年二月革命至十月革命期间, 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彼得堡委员会委员和彼得格勒苏维埃成员, 彼得堡委员会和党中央所属军事组织领导人之一; 《士兵真理报》编辑。第六次党代表大会的代表。在十月革命的日子里, 任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主席。在国内战争和外国武装干涉时期, 担任重要的军事工作。在第十三次、第十四次和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上被选为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晚年为特种退休金领取者; 退休后, 从事宣传和著作工作。

波克罗夫斯基, 米哈伊尔·尼古拉也维奇 (1868—1932年)——1905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布尔什维克, 著名历史学家。曾积极参加1905—1907年革命, 是党的莫斯科委员会委员。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伦敦)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1908—1917年侨居国外。在反动年代参加召回派和最后通牒派, 后参加“前进”反党集团, 1911年与该集团断绝关系。帝国主义世界大战期间持国际主义立场。1917年参加莫斯科武装起义, 为莫斯科河南岸区革命司令部成员。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 担任国家和科学部门的负责工作。1929年起为科学院院士。

博勃罗夫斯卡娅 (捷利克桑), 策威利娅·萨莫伊洛夫娜 (1876—1960年)——职业革命家, 最早的共产党活动家之一。苏

共党员(1898年入党)。曾担任《火星报》代办员,在特维尔、梯弗利斯、巴库、莫斯科、科斯特罗马以及其他城市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曾多次遭到逮捕和流放。曾在莫斯科参加1905年和1907年的革命事件。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做了大量党的工作并从事写作;党史委员会领导人之一。1928—1940年间在共产国际工作,1940年起在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工作。

布勃诺夫,安德烈·谢尔盖也维奇(1883—1940年)——党和国家的著名活动家,苏共党员(1903年入党)。曾在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莫斯科、彼得堡和其它城市从事党的工作;屡遭沙皇政府的迫害。积极参加了十月革命的准备和发动工作。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和党中央建立的领导武装起义的军事革命总部的成员。1918年起担任党、政府和军队的重要职务。曾加入过“左派共产主义者”反党集团。乌克兰苏维埃政府成员和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乌克兰战线革命军事委员会和北高加索军区成员。1920—1921年加入了机会主义集团“民主集中派”。1923年在托洛茨基的四十六人声明上签字;后来参加了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1924年起任工农红军政治部主任和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25年任俄共(布)中央书记。1929—1937年任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教育人民委员。多次被选为党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

茨哈卡雅,米哈伊尔·格里哥里也维奇(1865—1950年)——1880年参加革命运动。苏共党员(1898年入党)。曾在高加索、哈尔科夫和叶卡特林诺斯拉夫从事党的工作。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高加索联合委员会领导人之一、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代表。1905—1907年革命的积极参加者。屡遭沙皇政府迫害。1907—1917年

3月侨居国外，积极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日内瓦支部的工作。1917—1920年任党的梯弗利斯委员会委员。1921年苏维埃政权在格鲁吉亚取得胜利后，担任苏维埃和党的领导工作。

福法诺娃，玛格丽特·瓦西里也夫娜（生于1883年）^①——苏共党员（1917年4月入党），1902年起参加革命运动。1903年被捕，在监狱里服刑。1904年末开始在阿尔汉格尔斯克、辛费罗波尔、乌法、彼得堡等城市从事革命工作。二月革命后为彼得格勒苏维埃代表，执行过维堡区党委所委派的各项任务。弗·伊·列宁在最后一次转入地下期间曾秘密住在维堡区她的寓所里。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起先担任苏维埃的工作，后来搞经济工作。1933年起为特种退休金领取者。

福齐也娃，莉迪娅·亚历山大罗夫娜（生于1881年）^②——苏共党员（1904年入党）。1904—1905年在俄国国外布尔什维克小组工作；曾协助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同俄国地下组织进行通信联系。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和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参加者。1918年起任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秘书，兼任弗·伊·列宁的秘书。1933—1936年在重工业人民委员部动力总管理局系统工作。1939—1956年任列宁中央博物馆学术研究员；后为特种退休金领取者。

伏罗希洛夫，克利门特·叶弗烈莫维奇（生于1881年）^③——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的著名活动家。1903年入党，在卢甘斯克、

① 死于1976年。——译者注

② 死于1975年。——译者注

③ 死于1969年。——译者注

彼得堡、巴库、察里津等地从事党的工作。1917年任卢甘斯克工人代表苏维埃主席。十月革命的积极参加者。1918—1919年历任察里津战线司令官、南方战线副司令官、南方战线军事委员会委员、第十集团军司令官。1918年12月任乌克兰内务人民委员，后任哈尔科夫军区司令官、第十四集团军和乌克兰内地战线司令官。在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追随“军事反对派”。1919—1921年为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第一骑兵集团军的组织者之一。1921—1925年任北高加索军区司令官及莫斯科军区司令官。1925年起任海陆军人民委员和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1934—1940年任苏联国防人民委员。1940年起任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和苏联人民委员会国防委员会主席。1946年起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1953—1960年5月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1921—1961年10月为党的中央委员，1926—1952年为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后为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在二十三大会上被选进中央委员会，现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委员。

甘申，阿列克塞·亚历山大罗维奇(1869—1940年)——工艺工程师，莫斯科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创始人之一，参加过第一个莫斯科社会民主主义组织“中央工人协会”。参与印制秘密书刊。曾用胶印版印刷过列宁的《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一书的第一编及第二编(部分)。1895年6月因“中央工人协会”遭到破坏而被捕，并被遣送到维亚特卡省流放三年。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从事经济工作。

高尔基，阿列克塞·马克西莫维奇(彼什柯夫，阿·马)(1868—1936年)——伟大的无产阶级作家，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奠基人，苏维埃文学的鼻祖。

哥卢别娃，玛丽亚·彼得罗夫娜（1861—1936年）——八十年代起参加革命运动，起初持民粹派观点。1891年被流放到萨马拉受警察公开监视，在该地同弗·伊·列宁相识。1901年起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后为布尔什维克。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在工厂委员会中央理事会、司法人民委员部、彼得格勒肃反委员会工作，1920—1928年在联共（布）中央机关工作。

霍普纳尔，绥拉菲玛·伊里尼奇娜（1880—1966年）——1903年入党，曾在敖德萨、叶卡特林诺斯拉夫和尼古拉也夫从事革命工作。三次革命的积极参加者，屡遭逮捕。1910—1916年侨居国外，布尔什维克巴黎支部成员，在弗·伊·列宁的直接领导下工作。二月革命后，担任党的负责工作，曾参加布尔什维克党第七次（四月）全国代表会议。1918—1929年在乌克兰和莫斯科担任党和苏维埃的工作。1928—1938年为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委员。1929—1938年在共产国际书记处工作。共产国际历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晚年是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一级科学研究员和学术委员会委员。

哈利东诺娃，拉伊萨·波里索夫娜（1886—1968年）——苏共党员（1905年入党），曾在尼古拉也夫参加1905年的革命。1906年8月被捕，1907年侨居国外（德国、瑞士），在工厂当缝纫工，积极参加工人运动，任布尔什维克苏黎世支部成员。1918年1月回到彼得格勒。至1926年前，在国民教育机关工作，任彼得格勒市苏维埃委员，后任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和萨拉托夫市苏维埃委员。以后直至1950年，从事国民教育和教学工作。写有许多关于学校问题的著作和文章。

加涅茨基(菲尔斯滕贝尔格), 雅柯夫·斯坦尼斯拉沃维奇 (1879—1937年)——波兰和俄国革命运动的著名活动家。1896年加入社会民主党。多次参加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的参加者,并参加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四、五次代表大会。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被选为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帝国主义世界大战期间持国际主义立场。曾同弗·伊·列宁频繁通信,商讨党的工作问题。1917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国外局委员。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担任苏维埃的负责工作。从1935年起,任苏联国家革命博物馆馆长。

捷姆利亚奇卡, 罗莎丽亚·萨莫伊洛夫娜 (1876—1947年)——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的著名活动家。1893年投身革命运动。1896年从国外回来后,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基辅委员会委员。1901年起任《火星报》代办员,在敖德萨和叶卡特林诺斯拉夫开展工作。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系《火星报》多数派的一员。大会后,代表多数派一方被补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积极参加同孟什维克的斗争。1904年8月曾出席在日内瓦举行的二十二个布尔什维克会议,当选为多数派委员会常务局委员。曾任彼得堡党组织的书记,代表该组织出席了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1917年10月领导了莫斯科市罗果日-西蒙区工人的武装斗争。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历任党和苏维埃的要职。

卡尔宾斯基, 维亚切斯拉夫·阿列克谢也维奇 (1880—1965年)——苏联共产党最老的活动家之一,党的著名著作家、宣传家。苏共党员 (1898年入党)。屡遭逮捕。1904年侨居国外——日内瓦,在那里结识了弗·伊·列宁。从此一直在党的国外组织中工作,参加布尔什维克报纸《前进报》和《无产者报》的工作,主管俄

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日内瓦图书馆和档案馆。1914—1917年为党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撰稿，并从事出版和发行布尔什维克书刊的工作。1917年12月回到俄国，担任苏维埃和党的负责工作。经济学博士。

柯伦泰，亚历山德拉·米哈伊洛夫娜（1872—1952年）——职业革命家，九十年代起参加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参加过第一次俄国革命。1906—1915年接近孟什维克派；1915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开始后，持革命的国际主义立场。在斯堪的那维亚国家，后来又在美国，执行弗·伊·列宁所委托的团结社会民主党的左派国际主义者的任务。1917年二月革命后，返回俄国，任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在海军和陆军士兵中间开展工作；屡遭临时政府的迫害。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担任国家、党和外交方面的重要职务。在关于工会问题的争论期间（1920—1921年）是反党集团“工人反对派”的积极参加者。

克尔日札诺夫斯基，格列勃·马克西米利安诺维奇（1872—1959年）——老一辈的共产党活动家，弗·伊·列宁的战友；苏联著名学者，动力工程师。1893年起投身革命运动；曾与弗·伊·列宁一起组织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1895年12月被捕，后被流放西伯利亚（米努辛斯克专区）三年。流放期满后于1901年移居萨马拉，在他的积极参与下在萨马拉建立了火星派中心。1902年秋，克尔日札诺夫斯基曾参加负责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组织委员会；在代表大会上他被缺席选为党中央委员会委员。曾积极参加1905—1907年的革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致力于恢复和发展莫斯科的动力事业。1920年克尔日札诺夫斯基受列宁的委托，领导了俄罗斯国家电气化委

员会。1921—1930年领导国家计划委员会工作，1929—1939年任苏联科学院副院长，并担任由他创建的苏联科学院动力研究所常任所长，写有许多动力学方面的科学著作。

克尼亚泽夫，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大罗维奇（1871—1925年）——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会员，彼得堡港口的工人。1894年起同其他先进工人一起在弗·伊·列宁领导下参与组织工人小组的工作。弗·伊·列宁领导的小组曾在他的住所进行过活动。1896年被捕，被遣送到维亚特卡省流放三年。后脱离政治活动。

库奇金，安德烈·巴甫洛维奇（生于1888年）——苏共党员（1912年入党）。乌拉尔革命运动的积极参加者。1914—1915年在军队里进行革命地下工作，曾被捕并被流放至维亚特卡。二月革命后成为维亚特卡工兵代表苏维埃和布尔什维克组织的组织者之一。曾是全俄农民代表第一次代表大会代表、代表大会布尔什维克党团成员。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在喀山和乌法担任苏维埃和党的工作，是在东部战线两个军里做过政治工作。俄共（布）第十、十一次代表大会代表。1934—1940年在联共（布）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和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担任领导工作。历史学博士。写有许多有关党史、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方面的著作。

拉希亚，埃诺·阿布拉莫维奇（1886—1936年）——1903年入党。1905—1907年在彼得堡的芬兰铁路上工作，积极投身革命运动。1908—1910年任芬兰社会民主党俄国分部书记，后任主席。1911—1917年在涅瓦关卡外的谢烈布里亚科夫工厂工作。1917年七月事变以后，积极参加秘密护送弗·伊·列宁去芬兰的工

作；以后又在10月护送列宁回俄国。1918年在芬兰无产阶级革命时期指挥过赤卫队。1919年任西北战线联合兵团指挥员。

勒柏辛斯基，潘特莱芒·尼古拉也维奇（1868—1944年）——共产党著名活动家。九十年代初参加社会民主主义运动。1890年因参加学生运动被捕，并被驱逐出彼得堡。1895年再次被捕，1897年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在流放期间结识了弗·伊·列宁；与列宁交往密切，成为列宁的密友和学生。流放期满后（1900年）迁居普斯科夫，积极参加发行《火星报》的组织工作。1902年被捕，又被流放到西伯利亚。1903年逃往瑞士，在列宁领导下参加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积极参加了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勒柏辛斯基在教育人民委员部工作，是党史委员会的组织者之一，后来任历史博物馆和革命博物馆馆长。

林格尼克，弗里德里希·威廉莫维奇（1873—1936年）——职业革命家，布尔什维克。1893年起参加社会民主主义运动；1896年因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案件被捕，1898年被遣送到西伯利亚东部流放三年。1899年8月底—9月初他与其他十六名社会民主党人一起在弗·伊·列宁起草的抵制“经济派”《信条》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抗议书》上签了名。流放归来后，加入《火星报》组织；是筹备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组织委员会委员。在代表大会上被缺席选入党中央委员会和党总委员会。1903—1904年，在国外积极参加反对孟什维克的斗争。1904年2月回国，但不久因党中央委员会北方局案件被捕。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工农检察院和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担任负责工作。

柳德文斯卡娅, 塔吉杨娜·费多罗夫娜(生于 1887 年)——革命运动的积极参加者, 苏共党员(1903 年入党), 曾当过针织女工。1905 年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敖德萨委员会委员。曾多次遭受迫害。1907—1910 年在彼得堡从事党和工会的工作。1911 年 5 月出国侨居, 任布尔什维克巴黎支部的委员和书记。二月革命后在博哥罗茨克(现称诺金斯克)和莫斯科担任党的领导工作。在 1917 年十月革命期间任莫斯科苏舍沃-马里英区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 为赤卫队的组织者之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 在莫斯科和雅罗斯拉夫里担任党的负责工作。党的八大、十大、十四大代表。现为特种退休金领取者。

罗维奥, 古斯达夫·谢苗诺维奇(1887—1938 年)——1905 年入党; 职业是镞工。1907 年和 1910 年因参加革命运动, 曾两次被捕, 先是流放到沃洛格达, 后来流放到特维尔, 但两次都从流放地逃跑。从 1910 年年底起在芬兰居住和工作。芬兰社会民主党党员; 1913—1915 年任芬兰社会民主青年联盟中央委员会书记。1917 年 4 月由于革命事变被工人组织推选为赫尔辛福斯民警局局长。1917 年 8—9 月弗·伊·列宁曾住在他的寓所里, 以躲避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追捕。罗维奥是 1918 年芬兰工人革命的积极参加者。后来担任苏联党的重要工作。

卢那察尔斯基, 阿纳托利·瓦西里也维奇(1875—1933 年)——职业革命家, 苏联著名国务活动家。九十年代初投身革命运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后为布尔什维克。曾先后任布尔什维克报纸《前进报》、《无产者报》和《新生活报》的编辑委员。在反动时期背离马克思主义, 参加《前进》反党集团, 主张把马克思主义和宗教结合起来。帝国主义世界大战期间持国际主

义立场。1917年回俄国后，卢那察尔斯基加入了区联派；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同区联派一起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至1929年，任教育人民委员；后任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学术委员会主席。1930年起为科学院院士。1933年8月被任命为苏联驻西班牙全权代表。政论家、剧作家，写有多种关于文学艺术的著作。

美舍利亚科夫，尼古拉·列昂尼多维奇(1865—1942年)——社会民主党人，火星派分子；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后为布尔什维克。1885年起投身革命运动。1901年参加“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同盟”。1902年任《火星报》驻莫斯科的代表，但不久即被捕，被流放雅库茨克州四年；1905—1907年的革命使他从流放地获释。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在党和苏维埃的许多出版机构从事编辑工作。1927—1938年任《苏联小百科全书》主编和《苏联大百科全书》副主编。

米茨凯维奇，谢尔盖·伊万诺维奇(1869—1944年)——1893年入党；职业是医生。莫斯科工人协会的组织者之一。1894年被捕，1897年被流放到雅库茨克州。曾在特维尔、莫斯科、下新城、萨拉托夫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曾为布尔什维克报纸撰稿。俄国三次革命的积极参加者。国内战争时期，先后在一些前线的卫生处工作。1921年起做工会工作。1924—1934年任国家革命博物馆馆长。后从事写作。

萨莫伊洛夫，费多尔·尼基提奇(1882—1952年)——布尔什维克，职业是纺织工人。1903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曾在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从事党的工作。第四届国家杜马弗拉基米

尔省工人代表、杜马布尔什维克党团成员。1914年在瑞士治病，回彼得格勒后，带来了弗·伊·列宁关于战争的提纲。1914年11月因从事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革命活动，与其他布尔什维克代表一起被捕，于1915年被流放至土鲁汉斯克边疆区定居。二月革命后回到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担任党和苏维埃的负责工作。

绍特曼，亚历山大·瓦西里也维奇（1880—1939年）——职业革命家，布尔什维克。革命活动开始于1899年。曾在彼得堡和敖德萨积极参加1905—1907年的革命。1911—1912年任芬兰社会民主党赫尔辛福斯委员会委员。1913年在波罗宁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和党的工作者会议上被选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俄国局。1913年11月在叶卡特林诺斯拉夫被捕，被流放到纳雷姆边疆区。在托木斯克参加了1917年的二月资产阶级民主革命，1917年6月起任党的彼得格勒专区委员会委员；同年8月按照党中央所给的任务，负责护送弗·伊·列宁从拉兹里夫去芬兰的组织工作。积极参加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1923—1924年任卡累利阿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1926—1937年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工作，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的代表。在党的第十三次、十四次、十五次和十六次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

舍尔古诺夫，瓦西里·安德烈也维奇（1867—1939年）——工人，职业革命家，布尔什维克。1886年参加革命运动；1892年起在彼得堡工人小组中宣传马克思主义。是“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的组织者和活动家之一，因该协会案件被逮捕和流放。流放期满后，在叶卡特林诺斯拉夫、巴库、梯弗利斯和彼得格勒等地工作。

1910年先后参与创办《明星报》和《真理报》。屡遭逮捕和流放，致使双目失明。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住在莫斯科，参加莫斯科河岸区党组织的工作。

斯大林(朱加施维里), 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1879—1953年)——俄国和国际革命工人运动、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著名的活动家之一。1898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后为布尔什维克。曾在梯弗利斯、巴统、巴库和彼得堡从事党的工作。1912年1月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布拉格)代表会议选出的中央委员会委员；曾参加布尔什维克报纸《真理报》的编辑工作。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准备和进行期间，参加了党中央委员会为准备起义而建立的军事革命总部。在第二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人民委员会委员，领导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在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时期，任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在各条战线上工作过。1922年被选为俄共(布)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在实现列宁制订的苏联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计划的工作中，在为建设社会主义、为苏维埃国家的独立、为巩固和平而进行的斗争中，斯大林发挥了重大作用；在同列宁主义的敌人——托洛茨基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分子所进行的思想斗争中他的功绩显著。1941年起斯大林任人民委员会主席，后来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伟大的卫国战争时期(1941—1945年)他领导了国防委员会的工作，任国防人民委员和苏联武装力量最高统帅。

斯大林身居党和国家的最高职务，却严重违背了集体领导这一列宁主义原则和党的生活准则，破坏了社会主义法制，毫无根据地大规模迫害苏联著名国务、政治和军事活动家以及其他正直的

苏维埃人。

党坚决谴责了与马列主义格格不入的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并肃清了它的影响；赞扬了中央委员会为在党、国家和意识形态等一切领域恢复和发扬列宁主义的领导原则和党的生活准则而作出的努力；采取了措施以防止今后出现类似的错误和反常现象。

斯塔索娃, 叶列娜·德米特里也夫娜 (1873—1966年) ——革命运动老一辈的活动家。苏共党员 (1898年入党)。1905年以前在彼得堡、基辅、明斯克、奥廖尔、斯摩棱斯克、维尔诺和莫斯科从事地下革命工作, 曾任党的彼得堡委员会书记、中央委员会北方局书记。因参加革命活动曾多次遭到逮捕和监禁, 并被流放去西伯利亚。1917年2月—1920年3月任党中央委员会书记。1920—1921年先后在彼得格勒和巴库担任党的负责工作。1921—1938年在共产国际、国际支援革命战士协会以及中央监察委员会工作; 1934年参加建立世界反战和反法西斯妇女委员会的工作。1938—1946年任《国际文学》杂志编辑。1946年起为特种退休金领取者, 继续做了大量的社会政治工作。

瓦西里也夫, 瓦西里·瓦西里也维奇 (生于1900年) ——工人, 1932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14—1916年在普梯洛夫工厂做工, 曾因参加罢工而被解雇。1917年二月革命后重返工厂, 成为纳尔瓦-彼得哥弗区青年联盟的组织者。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参加攻打冬宫的战斗。从1917年12月起, 在南部战线工作。1918年回厂。1919年春, 自愿参加红军, 后负伤, 再次回工厂。

瓦西里也夫-尤任, 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 (1876—1937年) ——地下革命活动的积极分子, 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

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后接近布尔什维克派，成为职业革命家。1905年出国，侨居日内瓦，在那里会见了弗·伊·列宁。曾为布尔什维克的报纸《前进报》和《无产者报》撰稿。积极参加1905—1907年的革命。1905年夏，受中央委员会委托前往敖德萨同起义的“波将金”号装甲舰取得联系。后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委员会委员、莫斯科苏维埃和1905年莫斯科十二月武装起义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多次遭受迫害。1917年，为萨拉托夫武装起义领导者之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萨拉托夫委员会主席。1919年起担任党和国家的重要职务。

西尔文，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1874—1955年）——社会民主党人，1891年起参加革命运动；后参加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的中心小组。1896年被捕，1898年被遣送到西伯利亚东部流放三年。三年中一直同列宁保持经常联系。1899年8月底—9月初，西尔文与其他十六名社会民主党人一起，在弗·伊·列宁起草的抵制“经济派”《信条》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抗议书》上签了名。曾担任《火星报》代办员；1902年被捕并被流放到伊尔库茨克省，后从流放地逃往国外。1904年被补选进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同年年底转向孟什维克，但不久又回到布尔什维克一边，曾为许多布尔什维克报纸撰稿。1908年脱离政治活动并退党。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先后在俄罗斯联邦教育人民委员部、商务代表处工作；1931年起从事教学工作。

谢马什柯，尼古拉·亚历山大罗维奇（1874—1949年）——1893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职业是医生。1905年在下新城参加武装起义，遭逮捕，获释后侨居国外。曾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巴黎支部工作；曾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国

外局秘书兼财务干事。曾参加 1917 年十月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

1918—1930 年任俄罗斯联邦卫生人民委员。苏联医学科学院院士和俄罗斯联邦教育科学院院士。1947—1949 年任苏联医学科学院保健组织和医学史研究所所长。

雅拉瓦, 胡果·埃里柯维奇 (1874—1950 年)——芬兰铁路的火车司机; 1905 年芬兰铁路机务段革命事件的积极参加者, 曾领导了罢工委员会。第一次俄国革命失败后, 经常利用机车运送革命者和秘密书刊通过国境。1917 年驾驶二百九十三号机车时, 先后两次秘密运送弗·伊·列宁通过国境: 由拉兹里夫去芬兰; 由芬兰返回彼得格勒。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担任过司机教练员, 曾在卡累利阿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工作, 后来在斯维特洛夫斯克铁路管理局担任检查员。1925 年加入共产党。

雅罗斯拉夫斯基, 叶梅利扬·米哈伊洛维奇 (1878—1943 年)——共产党的著名活动家, 著名的历史学家和政论家, 科学院院士。1898 年入党。第一次俄国革命的积极参加者, 曾在彼得堡、特维尔、下新城、基辅、雅罗斯拉夫里、敖德萨、图拉和莫斯科的工人中从事党的工作。建立党的军事战斗组织的最积极的工作人员之一, 莫斯科军事组织的领导人, 《军营报》编辑。曾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坦默福斯代表会议, 及第四次、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屡遭沙皇政府的迫害。1917 年武装起义的领导人之一, 建立莫斯科苏维埃政权的领导人之一。1918—1943 年担任党和苏维埃的负责工作: 党中央委员、中央监察委员会书记、《真理报》和《布尔什维克》杂志编委、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写有不少有关党史和俄国革命运动史方面的著作。

叶烈梅也夫,伊万·费多罗维奇(生于1895年)——1914年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当锻工时投身革命运动。1916年起在沙皇军队里服役,多次参加过士兵的革命活动。在二月革命的日子里,随同第二机枪团补充连的士兵们支援了彼得格勒的工人。二月革命后进入普梯洛夫工厂工作,在该厂加入了赤卫队。1917年6月参加联共(布)。曾组织普梯洛夫工厂的工人机枪战斗队,该战斗队担负了守卫斯莫尔尼宫的任务。从1918—1953年担任军事和经济工作,参加过伟大的卫国战争。1953年起为特种养老金领取者。

叶梅利扬诺夫,尼古拉·亚历山大罗维奇(1871—1958年)——1904年入党;工人,革命运动的积极参加者。1905年,在谢斯特罗列茨克兵工厂工作时,曾组织工厂的战斗队,参加过由芬兰运送书刊回国的工作。1905年秋与弗·伊·列宁相识。1905年12月被捕,被流放到诺夫戈罗德五年。二月革命后担任彼得格勒苏维埃代表。1917年7—8月,弗·伊·列宁曾隐藏在拉兹里夫他的住地。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积极参加者。1918年担任军事工作。1920年被选为谢斯特罗列茨克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1921年参加平定喀琅施塔特叛乱。以后几年中担任经济工作。

译 后 记

《回忆列宁》第二卷由上海外国语学院列宁著作翻译研究室翻译。参加本卷翻译的人员有：戚雨村（第1—31页）、姚以恩（第32—93页）、王义琰（第94—124页）、谢天振（第125—151页）、周文馨（第161—189页）、李越常（第190—246页、第499—578页）、张坚（第247—285页、第333—418页）、周之璆（第419—498页）。作者小传由以上同志分别译出。本卷中斯大林的《论列宁》（第152—160页）采用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的译本；高尔基的《弗·伊·列宁》（第286—332页）采用曹葆华的译文，个别地方我们作了校正。

本卷译文由孙培伦、张坚两同志负责校订。

在翻译过程中参考了已有的某些译文，在此向原译者表示谢意。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回忆列宁 第二卷

作者 = 上海外国语学院列宁著作翻译研究室译 上海外国语
学院列宁著作翻译研究室译

页数 = 6 0 0

S S 号 = 1 0 8 8 6 2 9 2

出版日期 = 1 9 8 2 年 0 8 月 第 1 版

封面页
书名页
版权页
目录页
前言

回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 [格·马·克尔日札诺夫斯基]
 在狱中和流放地
 《火星报》时期
 第一次革命

我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第一次会见 [玛·彼·哥卢别娃]

往事漫忆 [伊·瓦·巴布什金]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彼得堡 [瓦·安·舍尔古诺夫]

尼古拉·彼得罗维奇 [弗·亚·克尼亚泽夫]

在“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的日子里 [米·亚·西尔文]

弗·伊·列宁和1893 - 1895年间的第一个莫斯科马克思主义组织 [谢·伊·米茨凯维奇]

弗·伊·乌里杨诺夫的文章《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是怎样印出来的？》 [阿·亚·甘申]

1898 - 1899年间弗·伊·列宁就哲学问题写给我的几封信 [弗·威·林格尼克]

在两个世纪交接的时期 [潘·尼·勒柏辛斯基]

关于伊里奇 [罗·萨·捷姆利亚奇卡]

弗·伊·列宁在伦敦 (1902 - 1903年) [尼·亚·阿列克谢也夫]

回忆列宁 (片断) [尼·列·美舍利亚科夫]

革命历史片断 [策·萨·博勃罗夫斯卡娅 (捷利克桑)]

同列宁的会见 [玛·莫·埃森]

论列宁 (1924年1月28日在克里姆林军校学员晚会上的演说 [约·维·斯大林]

 山鹰

 谦逊

 逻辑力量

 不灰心

 不骄傲

 原则性

 相信群众

 革命天才

侨居时期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会见记事 [阿·瓦·卢那察尔斯基]

同弗·伊·列宁在日内瓦和巴黎的会见 [莉·亚·福齐也娃]

列宁做编辑工作 [维·阿·卡尔宾斯基]

十八年来 [弗·维·阿多拉茨基]

—
—
—
—
四
五

在第一次革命的烈火中 [米·伊·瓦西里也夫 - 尤任]

在日内瓦的生活。与列宁同志相识

“波将金”号装甲舰上的起义。我返回俄国

列宁在 1905 年 (回忆片断) [阿·瓦·卢那察尔斯基]

同列宁的几次会见 [米·格·茨哈卡雅]

导师和朋友 [叶·德·斯塔索娃]

列宁同志 [米·斯·奥里明斯基]

列宁和高尔基 [玛·费·安德烈也娃]

我同费拉基米尔·伊里奇的第一次会见 [克·叶·伏罗希洛夫]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党的武装工作的领导 (我党军事组织和武装组织史实片断) [叶·米·雅罗斯拉夫斯基]

弗·伊·列宁 [阿·马·高尔基]

难忘的形象 [尼·亚·谢马竹柯]

在捷里奥基和巴黎 [塔·费·柳德文斯卡娅]

弗·伊·列宁在巴黎 [绥·伊·霍普纳尔]

在布拉格代表会议上 [尼·亚·谢马什柯]

永远同我们在一起 [叶·彼·奥努弗里也夫]

弗·伊·列宁在克拉科夫和波罗宁 [谢·尤·巴哥茨基]

列宁在帝国主义大战前夕 [雅·斯·加涅茨基]

列宁与国家杜马布尔什维克党团 [阿·叶·巴达也夫]

我们的英明领袖 [格·伊·彼得罗夫斯基]

在 1914 年 [费·尼·萨莫伊洛夫]

往事片断 [维·阿·卡尔宾斯基]

弗·伊·列宁在布尔什维克苏黎世支部 (1913 - 1917 年 3 月) [拉·波·哈利东诺娃]

《帝国主义论》是怎样产生的 [米·尼·波克罗夫斯基]

从二月到十月 [雅·斯·加涅茨基]

回到祖国 [米·格·茨哈卡雅]

在白岛火车站的会见 [亚·米·阿法纳西也夫]

1917 年 4 月弗·伊·列宁回到彼得格勒 [费·尼·萨莫伊洛夫]

难忘的日子 [绥·伊·霍普纳尔]

在奥布霍夫工厂 [谢·雅·阿利路也夫]

在普梯洛夫工厂工人中间 [瓦·瓦·瓦西里也夫]

在全俄农民代表第一次代表大会上 [安·巴·库奇金]
在1917年七月事变的日子 [谢·雅·阿利路也夫]
关于伊里奇 (回忆片断) [叶·德·斯塔索娃]
在最后一次地下活动中 [尼·亚·叶梅利扬诺夫]
伊里奇在七月事变的日子 [格·康·奥尔忠尼启泽]
列宁在地下活动时期 (1917年7-10月) [亚·瓦·绍特曼]
第二百九十三号机车的“司炉” [胡·埃·雅拉瓦]
回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 [埃·阿·拉希亚]
列宁隐藏在赫尔辛福斯“警察局长”家的经过 [古·谢·罗维奥]
伊里奇在1917年十月革命前夕 [玛·瓦·福法诺娃]
弗·伊·列宁在1917年 (回忆片断) [尼·伊·波德沃依斯基]
列宁给党中央的一封信 [叶·德·斯塔索娃]
列宁在斯莫尔尼宫 [亚·米·柯伦泰]
列宁在十月的日子 (回忆片断) [安·谢·布勃诺夫]
守卫在列宁身旁的斯莫尔尼宫赤卫队战士 [伊·费·叶烈梅也夫]
斯莫尔尼宫的不平凡之夜 [阿·瓦·卢那察尔斯基]
作者小传
译后记
附录页